全球畅销书

NORMAN DAVIES

欧洲史

[英] 诺曼·戴维斯 著
郭方 刘北成 等译

EUROPE A HISTORY

（上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由一双眼睛观察、一个大脑过滤、一支笔写就的“一部欧洲所有部分、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总体史”。

欧洲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从史前到当代的百科全书，融权威性和可读性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欧洲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不是探索一个简单的歌剧脚本，而是力图重现一个复杂的总乐谱，还有它包含的一切杂音，以及它本身无法仿效的交流密码。

从冰河时代到冷战时期，从雷克雅未克到伏尔加，从米诺斯到玛格丽特·撒切尔，诺曼·戴维斯在本著作中讲述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他选取了欧洲大陆经历过的十个最具理想的历史时期作为本书的时间主线。

“同时具有高质量和重要意义的书是不多见的。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就是其中之一。本书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它是以惊人的才智、明晰的语言和令人敬畏的知识广度写就的。……这是一部人人都应该阅读的巨著。”——A. C. 格雷林，《金融时报》

“一本伟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伟大之处在于其中充满了惊奇和情感……对历史上很多非常敏感的事件都给出了一流的评论。”——珍·莫里斯，《独立报》

“一部包罗万象、没有恭维、挑战阅读神经的著作。”——迈克尔·伯利，《星期日独立报》

“恢宏的、史诗般的巨著……戴维斯之后，将再也不可能用传统方式书写欧洲历史了。”——《伦敦书评》

“它满载着学识，充盈着常识，闪耀着智慧，洋溢着出色的评判。”——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星期日泰晤士报》

“不朽的、权威性的……一本探询所有时代的思想意识，回答众多的探询，并将激起更多探询的著作。”——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伟大的著作之一……它值得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泰晤士报》

“没有一部用英文写的欧洲史著作能像本书这样，如此公正地对待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鲜明的特色，生动的细节，犀利的观点，令人信服的分析，所有的一切造就了这部一流的读物。”——《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欧　洲　史

（上　卷）

［英］诺曼·戴维斯　著
郭　方　刘北成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史／（英）戴维斯著；郭方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
书名原文：Europe: A History
ISBN 978-7-5012-3077-8

Ⅰ.欧…　Ⅱ.①戴…②郭…　Ⅲ.欧洲—历史
Ⅳ.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49409号

图　字：01-2005-6236

策划编辑　王　立　张光勤
责任编辑　侯奕萌　阮中强　王瑞晴
文字编辑　傅立刚　杨志芬　赵雅雯　周明晟　田　非　陈　平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余　岚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欧洲史（上卷）
Ouzhou Shi (Shangjuan)
作　　者　［英］诺曼·戴维斯
译　　者　郭　方　刘北成　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购书热线　（010）65265919　（010）65233645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70×640毫米　1/16　41½印张　8插页
字　　数　732千字
版次印次　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129.00元（上、下卷）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从冰河时代延伸到原子时代的历史类精品著作，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表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本书以时间为主线由快到慢逐渐推进，第1章覆盖了长达百万年的史前时期，而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书出版当年为止的46年间的历史。

诺曼·戴维斯捕获了所有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这是第一部给予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同等分量的欧洲史。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它把传统的叙述体与独特的特写结合在一起，使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299个讲述各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概要介绍”（知识窗）散布于整部书，介绍的论题跨越了各章的界限，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和思想，这些通常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忽略的；12幅“快照”从最佳视点俯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欧洲的全景，如同对时间推进和领土扩张的迅猛进程叫一声暂停，帮助读者松一口气并审视这些重大历史变革，并如棱镜折射出欧洲历史丰富多样的变化；100幅地图和图表、72幅图片覆盖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所有这些说明，戴维斯的《欧洲史》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价值、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读物之一。

作者在牛津大学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参考了牛津大学图书馆丰富而古老的资料，同时也得到了哈佛大学乌克兰语研究所和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帮助。

原著第一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本书根据1997年Pilmlico公司出版的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聊城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翻译而成。

NORMAN DAVIES



作者简介

诺曼·戴维斯 1939年生于英格兰。曾获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博士学位，原伦敦大学东欧斯拉夫学院教授，在伦敦大学执教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欧与东欧史。现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教授。

主要著作：

《起义在1944年：华沙之战》(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被《纽约时报》评为2004年度100本最畅销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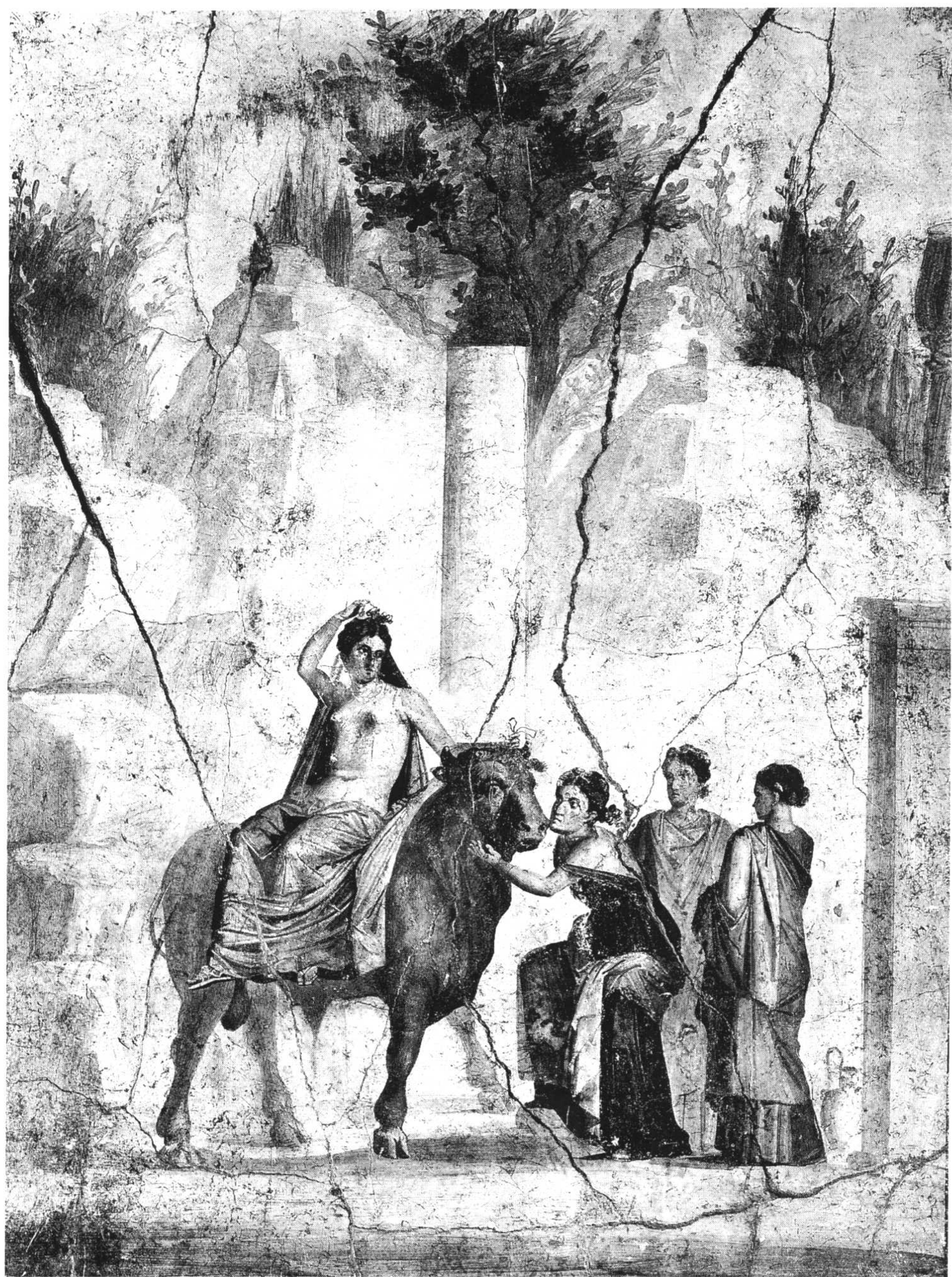
《上帝的操场：波兰史》(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欧洲的心脏：与波兰当代有关的历史》(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不列颠群岛：一部历史》(The Isles: A History)

《微观世界：一个中欧城市的肖像》(Microcosm: Portrait of a Central European City)

责任编辑：侯奕萌　阮中强　王瑞晴
封面设计：小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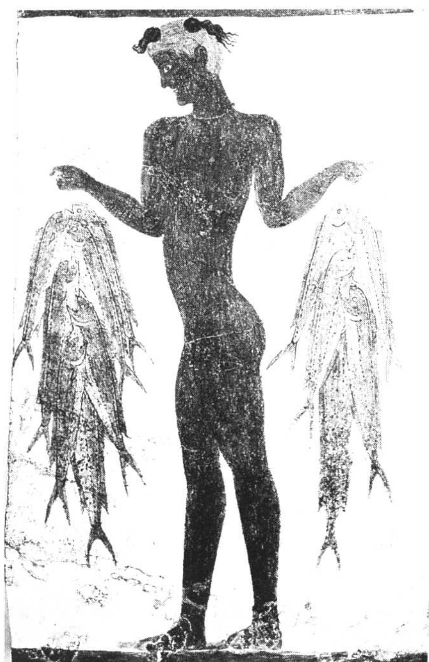


1．欧罗巴被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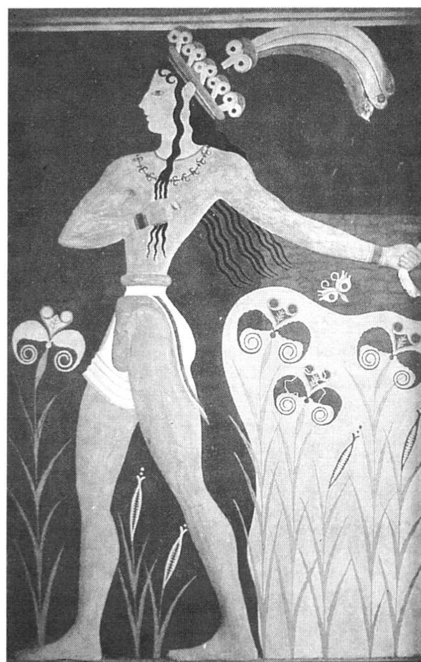
（图注见原书1205－12页）



2．采集者与狩猎者



3．米诺斯渔民



4．克诺索斯王子



5．酒宴——一场宴会

6．埃特鲁里亚



7．阿卡狄亚田园景象



8．掠夺萨宾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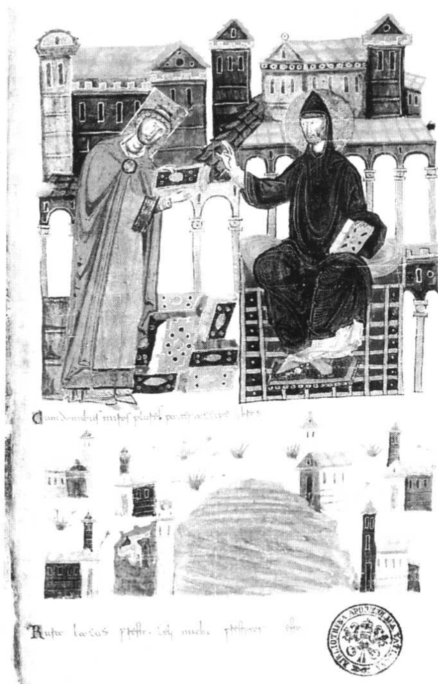
9．齐格弗里德之死



10．阿提拉侵略罗马，公元4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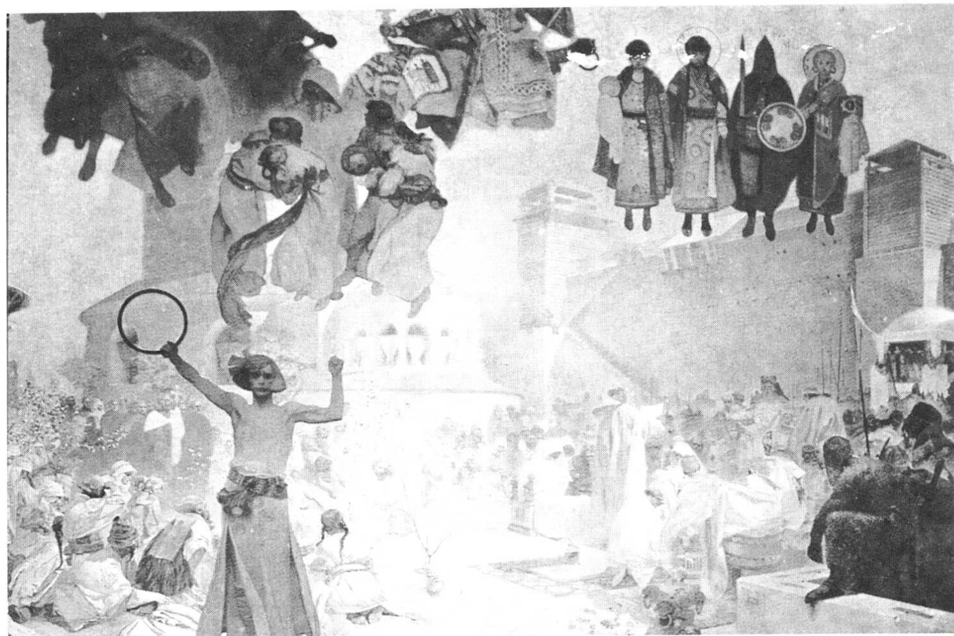
11．东正教



12．西方修院制度



13．君士坦丁献礼



14．斯拉夫人的礼拜

15．天主教的虔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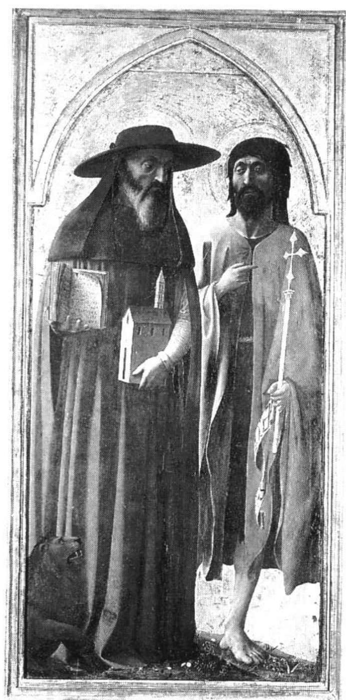
16．圣奥古斯丁



17．圣查理曼大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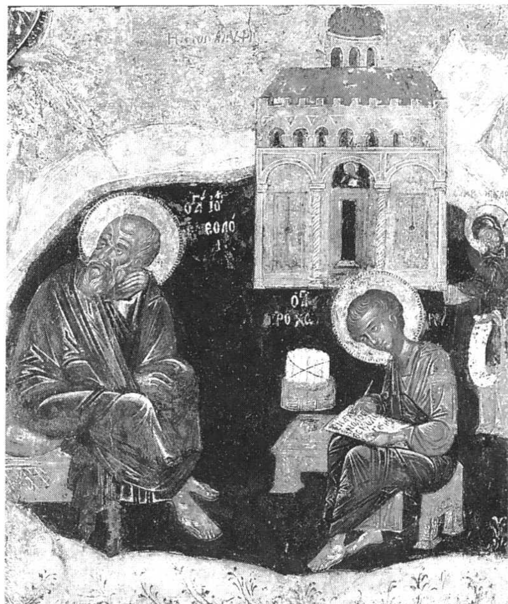
18．圣马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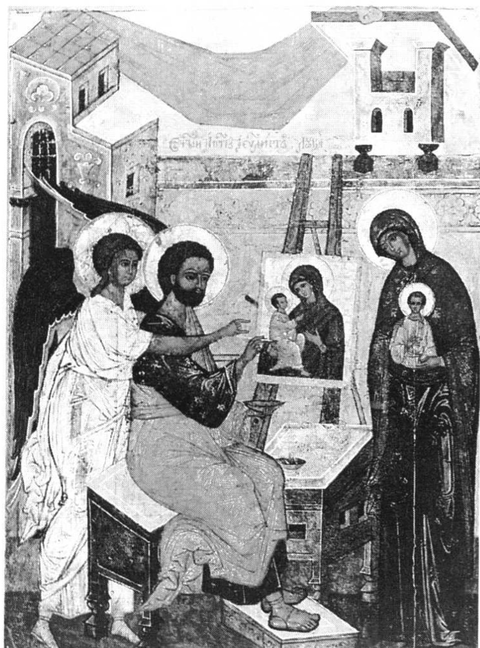
19．施洗者圣约翰与杰罗姆



20．圣母子



21．神学家圣约翰



22．圣路加—圣像绘画者



23．圣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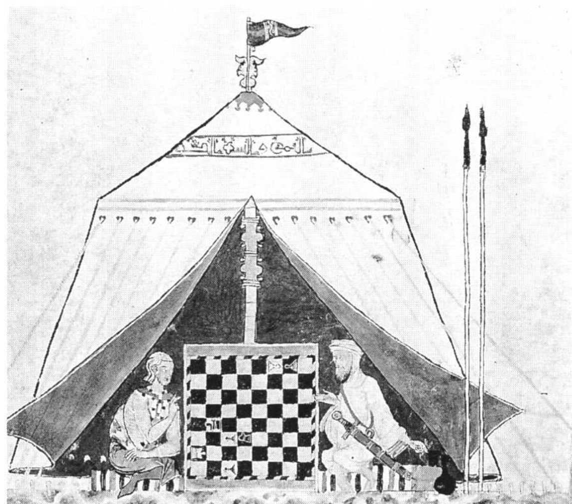
24．向奥托三世行效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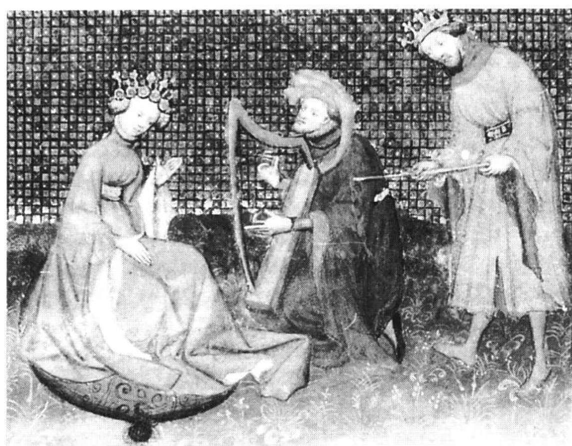
25．英格兰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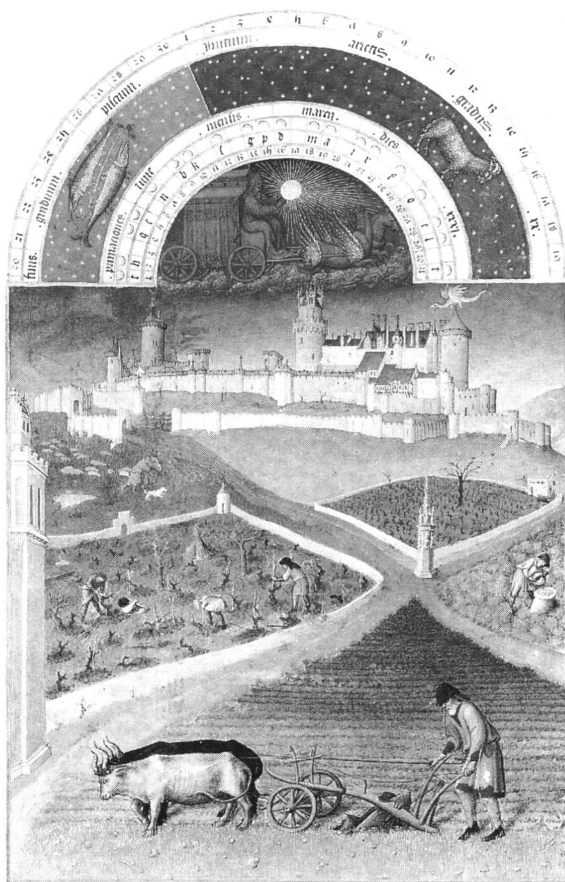
26．文德人十字军



27．光复运动中的休战



28．特里斯坦的最后之歌



29．铁犁



30．猎鹿寻踪



31．但丁在恋爱中



32．巴托罗缪进退两难



33．圣弗朗西斯向鸟赐福



34．卡西米尔国王问候犹太人



35．流浪者



36．马可·波罗



37. 扮成东方人的西方人

佳评如潮

这是一部从冰河时代延伸到原子时代的历史类精品著作。它讲述了欧洲东部和西部的故事。诺曼·戴维斯捕获了所有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这是第一部给予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同等分量的欧洲史，并且对于使人倍感神秘的少数者群体：从异教徒和麻风病患者到吉普赛人、犹太人和穆斯林教徒，提供了革新性的材料、知识和评价。本书在体例上也有突破，它把传统的叙述体与独特的特写结合在一起，使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299 个讲述各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概要介绍”散布于整部书的各章。12 幅“快照”俯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欧洲的全景，100 幅地图和图表、72 幅图片覆盖了整个东部欧洲的历史。所有这些说明，戴维斯的《欧洲史》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价值、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读物之一。

——亚马逊网站（amazon.com）

……一部罕见的作品，旁征博引、理性洞察、妙趣横生，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特别是对十字军和汉萨同盟等主题做出了经典的纵览。

——西奥多·拉伯，《纽约时报书评》
（Theodore Raab，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牛津大学的诺曼·戴维斯教授撰著《欧洲史》，承担了他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一本综合性的著作中对欧洲从史前到当代做了回顾，他卓越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欧洲史》是一部按照传统的叙事体写就的著作，以时间为主线由快到慢逐渐推进。本书开始部分覆盖了长达百万年的史前时期，而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书出版当年为止的 46 年间的历史。不同的是，戴维斯的著作充满活力、透彻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知识，在带领读者进入其叙事主线的同时，不时穿插探究具体地区、民俗或者事件的“概要介绍”。戴维斯著有两部波兰史，在本书中同样给予了欧洲东部应有的关注。不像他的许

多前辈那样，戴维斯在叙述伟人和王朝的历史的同时，也把平民、被迫害者或者被忽视者包括在他的历史中。《欧洲史》不能做到取悦每一个人，但它无疑是一部具有高度学识性和一流可读性的著作，它必将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摘自初版《欧洲史》

戴维斯是研究波兰历史的著名学者（《上帝的操场》和《欧洲的心脏》的作者），他现在将研究聚焦在整个欧洲。尽管这本书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对于叙述欧洲大陆从史前史到苏联解体这样一段完整的历史来说，本书的篇幅刚刚够。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戴维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外的国家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把这些国家看作是欧洲的正统部分，而不是刚刚开化的区域。（“出于某种原因，在一些历史学家当中弱化马扎尔人的影响成为一种时髦，”当论及什么应该成为欧洲中心这一议题时，戴维斯写道：“所有这一切的手段是让对马扎尔人的研究远离剑桥。”）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的主旨不是叙述组成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的历史，而是把欧洲大陆当做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因此，对伊丽莎白一世只做了简短的评述就一笔带过，而对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这位直到纳粹上台前一直致力于法德和解的法国外交部长却给了几个段落。在本书中，戴维斯除了定义欧洲，并且给予欧洲所有国家适当的论述外，还尽力展现出自己对于广泛涉猎历史题材的偏好（他蔑视过于专业化的研究，仰慕年鉴学派）。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师，戴维斯驾轻就熟地把握巨大的历史潮流，与必要的细节结合在一起，铸就了这部史学巨著。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从史前史时代到当今，写一部全景式的欧洲史，这一宏伟的工程由历史学家戴维斯（《欧洲的心脏》的作者）来完成是最合适不过的。他提醒读者，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开始阶段都经历了漫长的，各种事件、人物、运动和观念相互联系的历史阶段。叙述性的各章配有特殊事件的介绍。大量的相关内容穿插其中，优美的文字贯穿整部书。戴维斯的评论总是深邃且富于智慧，作者沉思于“欧洲文明的物质进步与政治和智力价值方面的可怕退化之间的尖锐对立问题”。最后，隆重地推荐这部坚实地建立在扎实的学识上，并提供了智慧和优美文字，真实且完整的《欧洲史》。

——大卫·奇默，加州大学斯坦尼斯洛斯校区
（David Keymer，California State Univ.，Stanislaus）

出版说明

一、关于页码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编者将原著的页码用［］扩起来置于文中左侧（右侧）空白处。例如，［16］为原著16页的起始位置。

二、关于“概要介绍”

作者提炼出一些重要或有趣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在本书中以框图文字的形式呈现，我们称之为“概要介绍”（知识窗）。正文中［］中的黑体字即与上下文相关的“概要介绍”。每个概要都要排在正文中时间与空间特定的交点上，用一个总结其内容的词目将其标明。

三、关于附件

原著的附件包括六部分：

各章注释（Notes to chapters，原书第1137页）

“概要介绍”注释（Notes to Capsules，原书第1173页）

附录一：“概要介绍”一览表（Appendix Ⅰ：List of Capsules，原书第1203页）

附录二：图片鸣谢说明（Appendix Ⅱ：Notes on Plates and Acknowledgements，原书第1205页）

附录三：历史图解简编（Appendix Ⅲ：Historical Compendium，原书第1213页）

重要人物、事件、机构、地点等的索引（Selective Index，原书第1337页）

本书将这六部分统一以附录的形式列于正文之后，其中，“重要人物、事件、机构、地点等的索引”翻译成中文，其余保留英文原文，以便读者查阅。除索引外，各附录所标页码均为原著页码，请按照［］中的原著页码进行检索。

四、关于内容

作者的观点和立场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或立场。对于作者在书中的某些立场和观点请读者审慎鉴别。

本书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各章译者

中译本前言、序言、导言：郭　方

第 1 章、第 3 章：胡玉娟

第 2 章：王大庆

第 4 章：李增洪

第 5 章：施　诚

第 6 章：孙宏伟、盛宏意、刘　城

第 7 章：郭　方、董忠荣、冀玉静

第 8 章：王静秋、刘北成

第 9 章：刘北成

第 10 章：王皖强

第 11 章：冯存诚、鲁丽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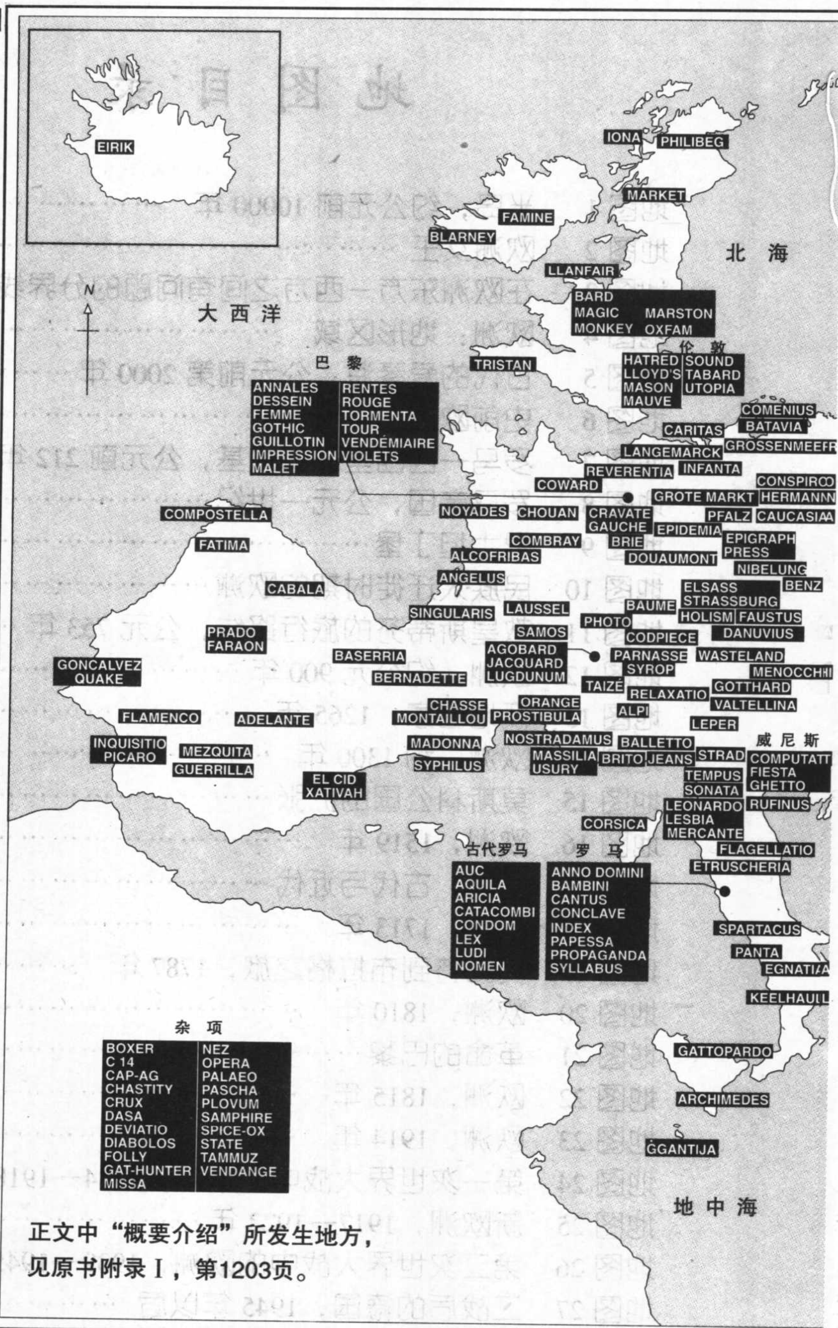
第 12 章：顾　宁、姜　南、王宏波
张红菊、何　风

地图、图表、索引等：郭　方

全书由郭方组织翻译，由郭方、刘北成对全书译文进行通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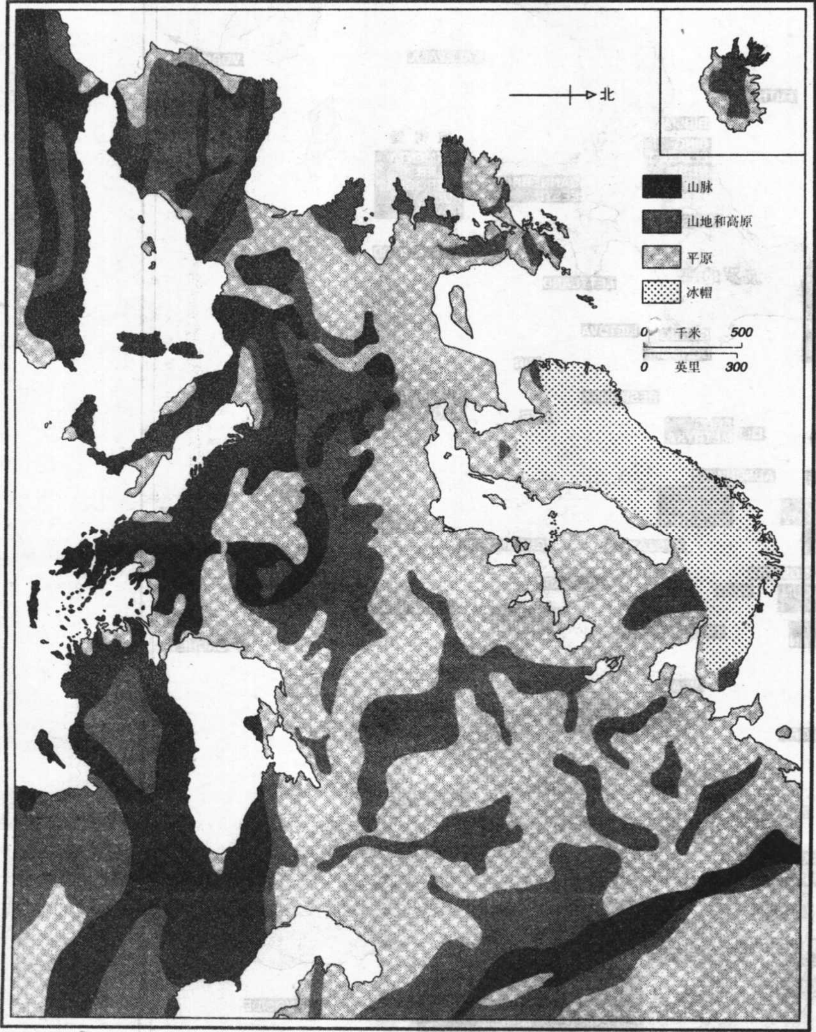
献给克里斯琴

我们的加利福尼亚人



正文中“概要介绍”所发生地方，见原书附录Ⅰ，第1203页。


FAROE
NORGE
FUTHARK
KALEVALA
VORKUTA
BIBLIA
DING
ELDLUFT
NOBEL
SOCIALIS
彼得堡
ELEMENTA
EULER
PETROGRAD
RUS'
SOVKINO
TOLLUND
DANNEBROG
EESTI
SUND
HANSA
SLESVIG
NOVGOROD
BATT-IOI
柏林
E=MC2
EMU
EULENBURG
GOOSESTEP
HOSSBACH
TOR
波罗的海
LETTLAND
GENUG
LIETUVA
DÖNHOFF
KRAL
GESANG
MIR
GOTHA
CANTATA
RESPONSA
KATYŃ
SMOLENSK
SPASITEL'
SUSANIN
TEREM
FREUDE
HEXEN
BNR
ALTMARKT
EROS
METRYKA
LILI
DOLLAR
ALCHEMIA
KONOPISTE
AUSCHWITZ
SANITAS
GRILLENSTEIN
GENES
SLAVKOV
HEJNAŁ
MICROBE
SZLACHTA
DIRHAM
BOGEY
TONE
WIENER WELT
LYCZAKOW
CHERNOBYL
CORVINA
MORES
MURANO
AQUINCUM
BUDA
VINO
BUCZACZ
HARVEST
UKRAINA
KONARMYA
CSABA
SHAMAN
TSCHERNOWITZ
ILLYRIA
USKOK
PUGACHEV
POGROM
VLAD
POTEMKIN
KHAZARIA
MOLDOVA
GAGAUZ
ILLYRICUM
MOARTE
SARAJEVO
FLORA
MATRIMONIO
NIKOPOLIS
CHERSONESOS
ZADRUGA
BOGUMIL
SHQIPERIA
MAKEDON
黑海
PAPYRUS
ABKHAZIA
ATHOS
IKON
TAXIS
TEICHOS
BOUBOULINA
HEPTANESOS
OMPHALOS
APOCALYPSE
古代希腊
ATHLETES
BARBAROS
BLACK ATHENA
CADMUS
CEDROS
DEMOS
ECO
ELEKTRON
EPIC
HYSTERIA
MO USIKE
NOMISMA
OEDIPUS
OMPHALOS
SCHOLASTIKOS
ZEUS
LOOT
ROMANY
GENOCIDE
GRECO
THRONOS



地图 1　半岛，约公元前 10000 年

中文版作者序言：

欧洲——一部历史，从史前到当代

亲爱的读者们：

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对于我的书将为许多中国人阅读感到极为高兴。我非常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们，当然还有我著作的两位主要翻译者——郭方教授与刘北成教授。我希望我能比其他欧洲史学家结交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遗憾的是，我不能够自己评判中文译文。为预备当一个欧洲史学家，我必须学会许多语言，但不包括中文。我劝告我的两个儿子补上我所缺的这一课。

尽管如此，我知道翻译者们承担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这个主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了许多国家，许多文化和许多时期。我的另一个翻译者，一位克拉科夫（Cracow）雅盖隆（Jagielonian）大学的女教授，她将《欧洲史》翻译为波兰文，发表了一篇关于翻译我这本书各种困难的分析性研究。

尽管如此，我坚信一位有技巧的作者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奥的概念，使广大的读者能够理解。在成为一位大学教授之前，我有作为一位学校教师的可贵经验，并且我记得我首次给男女孩子们讲历史和学习它的重要性时感到的巨大喜悦。我相信我这本书的中国译者们会将这种激动与兴趣的同样感觉传达给也许对欧洲历史的许多方面并不熟悉的读者们。

不用说，对于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应当互相理解的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现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将不会一直是这样。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政治权力不是永久的，强国有兴有衰。欧洲联盟已经比美国有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经济生产力，虽然它不是主要的军事力量。中国在财富与影响方面也将持续增长，如同欧洲一样，她将在二十一世纪起主要作用。今天，在欧洲与中国之间没有造成冲突的严重根源，但如果他们不打算了解彼此的历史和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我只在 1983 年春天访问过中国一次。我被邀请就我的专业主题

（被称为东欧史）作一系列讲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们对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出现后，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已经可见的增大的裂缝特别感兴趣。同时，他们在适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生的变化，并且他们告诉我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有关中国当代情况的有趣事情。

离开北京，我来到了开始迅速发展的上海，我到乡村做了几次迷人的远足。我生动地记得，在路上我要官方大轿车的司机停车，与一个村庄的男孩进行了一场即兴足球赛。在北京我要求骑自行车，在数千微笑的骑车者的围绕中环游城市，使我大为兴奋。在我归国的途中在香港做了短暂停留，那时它还由英国人统治（恰好香港的总督彭定康先生，现在是我所在的牛津大学的校长）。

然而，给我最强烈感触的是其他两件事。首先，我特别为我的中国主人们格外的友好所感动，他们很有技巧地使外宾感到宾至如归。我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通常是艰苦的，但他们实实在在的愉快和适度的良好幽默是很动人的。访问我的翻译倪先生（他的英语几乎是完美的）的家庭，并同他的妻子与儿子共享家常饭，是我逗留的一个高潮。

其次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对中国文明的古老感到无比激动。来到英国的美国人经常对英国的历史比美国的要长五六倍感到吃惊。而去中国的欧洲人对于当欧洲还是个婴儿时中国已经成熟这个事实的吃惊也类似。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没有人能赶上中国人！

我曾将《欧洲史》描述为“一部欧洲所有部分，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总体史”，它按三个层面撰写。十二个主要章节每一章包括了按年代的叙述。每一章以一个描述要详细得多的关键时刻的“快照”结束。最后，一系列300个放在方框里的“概要”介绍了广泛多样的有趣题目，这通常在通史书中是找不到其位置的。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读者们在驶过主要章节的“海洋”和探索快照与概要的“岛屿”时，会发现许多信息和乐趣。我祝愿你们所有人“旅途”愉快！

诺曼·戴维斯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3年10月

序　言

这本书没有包含多少新奇的东西。因为这个题目的大多数方面都[vii]被以前的历史学家彻底研究过。很少需要再进行第一手的研究。这本书的独特性没有别的，只在于它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并通过引入由一系列充分地综合的题目构成的框架，表现出一种难于获得的整体史印象。

学术性注释保持在最小限度，对于能够在公认的任何参考著作中查到的史实和论述不注明出处。在参考书中，特别必须提到的是我这里的二十九卷《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a）（第十一版，1910—1911 年），它远胜过后续的所有版本。只是在对不为人熟知的引文和在标准教科书范围之外的资料来源提供证据时使用页下注。人们不要认为书的正文必然会与所引著作找到的解释观点一致："当正文中阐述的学说观点与注释中的参考著作不总是一致时，人们不要吃惊。"*

作为本书写作基础的学术思考会在"导言"中说明，但对它的结构需要做一些解释。

本书正文是按几个不同的层面编写的。叙述性的十二章遍览了从史前史到现今的整个欧洲历史。它们从第 1 章覆盖了头五百万年的遥远视点逐渐推进，直至第 11、第 12 章相对靠近的观点，它们包含了二十世纪，几乎每年一页，每章有一个更特别的"摘要"选择系列，就像是用远距离照相，在年代学的长流中摘取描绘较为有限的题目。每章均从一个特定的最佳视点看起来对整个大陆推一个广角"快照"作为结束。整体的效果也许像一个历史图片集，在其中全景性的场面与书中的详细插页和特写图片集相得益彰。希望对在这些不同层次上达到的精确性程度有着很大变化会得到理解。确实，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不能指望会与有着相当不同目的的学术专著的标准相比。

---

* 费迪南·洛特：《古代世界的终结与中世纪的开端》（Fevidinand Lot：La Fin du Monde et le début du Moyan Âge，巴黎，1927 年），3。

主要的十二章是按欧洲历史的通行结构写的。它们提供了年代上和地理上的基本框架，所有其他的题目和内容都适于安插在其中。它[viii]们集中于“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关于主要的分野，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趋势，这些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将大量的信息分解为可以处理的（虽然必然是人为的）单位。年代学的重点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时期，在这个领域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欧洲共同性，能够观察到的运行。地理上的延伸的目标在于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Urals）欧洲半岛的所有部分给予相应合理的包括——北部、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

对于每个时期，都做了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偏见的努力（见原书《导言》，第16—19页；第19—31页）。但是在这个领域内的一本著作中，不可能将叙述扩展到欧洲本身的疆界之外。适当的态度是表明因时而异的论题的巨大重要性。如伊斯兰教、殖民主义，或欧洲海外移民。对于东欧的事态也给予其适当的突出地位。只要是适合之处，它们就会被结合到影响整个大陆的主要论题之中。在如蛮族入侵、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些题目的说明中包括了一种东方因素，所有这些通常都作为只与西方有关的事件予以论述。给予斯拉夫人（Slav）的篇幅可以说是由于他们构成欧洲民族家庭最大的部分这个事实，各民族的历史通常是扼要的概述；但是对无国家的民族给予了注意，而不是只限于民族国家。对于少数人团体，从信奉异端者、麻风病人到犹太人（Jews）、吉普赛人（Romanies）和穆斯林，都没有遗漏。

在后面的各章中，这种“历史的联盟计划”的优先性没有被遵循（见原书《导言》，第39—42页）。它们也没有批驳性的争论。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出戏剧的连续两篇”处理，给予中欧德意志与俄罗斯之间的斗争以优先关注。关于战后欧洲的最后一章对1989—1991年的事件和苏联的解体做了叙述。即认为1991年经历了被称之为“大三角”的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场的终结的论断，这个“大三角”起源时间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见原书附录Ⅱ，第1312页）。而它的崩溃给这段连续性的历史一个适当的中断。对二十一世纪的探讨是从设计一个新欧洲开始有了新机遇而着眼的。

这些有300个左右的提要（见原书地图30和附录Ⅰ），是要达到几个目的。它们吸引了对广泛变化的各种详情细节的注意，否则它们在综合性的历史写作的概括和简要方式中就无处下笔。它们有时介绍的论题跨越了主要各章的界限；它们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奇特的思想和不重要的支流，这些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忽略的。最重要的是，选择它们是对新近研究的“新方法、新学术、新领域”予以尽可能多的速览。它们提供了60个左右知识门类的典型样本，

它们尽可能广泛地分布在各章的各时期、地点和论题中。由于书的篇幅，出版者的耐心和作者的毅力这些人为原因，原有的摘要目录不得不缩减。虽然如此，还是希望这种总的说来是点彩画式的技术能创造[ix]出一种有效的印象，即使点彩的数量少一些。

每个摘要都要排在正文中时间与空间特定的交点上，用一个总结其内容的词目将其标明。每个摘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分别的、独立的片段。或者也可以与它穿插其中的论述联系起来阅读。

设计了十二幅“快照”，它们是用来表现一系列超越欧洲变化的地图进行的全景式的总观察。它们定格了按年代叙事的结构，通常是在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时刻，对时间和领土巨大扩张的迅猛进程叫一声暂停。它们可以帮助读者松一口气并审视在任何一个时期在许多不同方面进行着的大量变革。它们精心地从一个单一的有利视点摄取，没有试图比较考察无疑存在着的众多观点和其他视角。在这方面它们达到了明目张胆的主观和印象主义的程度。在一些例子中，它们近似于“派别式”的有争议领域，将已知的事件与没有文件根据的猜测和推论结合在一起。像这本书的其他几个部分那样，它们会被指责为超出了学术论证和分析的公认界限。若是如此，它们会不只唤起对欧洲历史丰富的多样性的注意，也通过它可以看到如棱镜折射出的丰富的多种变化。

这本书大部分是在牛津（Oxford）写成的。它得到了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丰富而古老的资料和图书馆富有人情味的旧式的服务标准的很大帮助。它也得到了维也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和哈佛（Harvard）大学的乌克兰语（Ukrainian）研究所慷慨提供的访学奖金。在它的写作中由于到欧洲大陆的几次访问而得到润色，特别是在白俄罗斯（Belarus）和乌克兰（Ukraine），在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波洛尼亚（Bologna）的路上，在法国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Alps）中，在荷兰（Netherlands），在匈牙利（Hungary）和在旺代（Vendée）积累的印象。

我要感谢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准予的一年研究假期和利用私人经费请人代课教学的条件。在其他没有准予假期的时间里，这本书可能得益于在各种有刺激性的地点写作的习惯——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快餐店中、在医院等候室里、在夏威夷海滩上、在其他人的学术讨论会的后排，甚至在垃圾焚化场的停车场里。我也要感谢海涅曼（Heinemann）和“满大人”（Mandarin）提供的特别资助，来加速补充资料的准备工作。

我要对同事和朋友们表达我的感谢。他们作为特定各章或部分的阅读者为本书服务。他们是 Barry Cunliffe，Stephanie West，Riet Van

Bremen, David Morgan, David Eltis, Fania Oz - Salzburger, Mark Almond 和 Timothy, Garton Ash; 众多的帮助者和求教者包括 Tony Armstrong, Sylvia Astle, Alex Boyd, Michael Branch, Lawrence Brockliss, Caroline Brownstone, Gordon Craig, Richard Crampton, Jim Cutsall, Rees Davies, [x] Regina Davy, Dennis Deletant, Geoffrey Ellis, Roger Greene, Hugo Gryn, Michael Hurst, Geraint Jenkins, Mahmud Khan, Maria Korzeniewicz, Grzegorz Król, Ian Mckellen, Dimitri Obolensky, Laszlo Peter, Robert Pynsent, Martyn Rady, Mary Seton - Watson, Heidrun Speedy, Christine Stone, Athena Syriatou, Eva Travers, Luke Treadwell, Peter Varey, Maria Widowson 和 Sergei Yakovenko; 一个由 Kingsley 领导的秘书助手班子, 版面编辑 Sarah Barrett; 设计者 Sally Kendall, 图片研究者 Gill Metcalfe, 编索引者 Roger Moorhouse, 制图员 Ken Wass 和 Tim Aspen, 插图画家 Ardrew Boag, 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和“满大人”（Mandarin）的编辑们, 项目经理人 Patrick Duffy,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忍耐, 这个计划永远不能实现。他们的贡献我是无以报答的。

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 欧洲史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学术论题, 它的基础是牢固地建立在过去确实发生的事件上。然而欧洲的过去只能够通过飞逝的一瞥, 局部的探索, 选择性的深入研究来复现。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因而这卷书只是能够写出的几乎难以计数的欧洲史之一。它是由一双眼睛观察, 一个大脑过滤, 一支笔写就的。

诺曼·戴维斯

1993 年花日（Bloomsday）于牛津

在准备《欧洲史》的修订版时, 只是对事实、专门术语和正字法的错误做了修正。没有做重新进入历史解释领域的尝试。在原来的求教者的行列中大多数人提供了第二轮的指教, 此外我还要对下列人表达我特别的感谢。

J. S. Adams, Ann Armstrong, Neal Ascherson, Timothy Bainbridge, Tim Blanning, Tim Boyle, Sir Raymond Carr, James Cornish, J. Cremona, M. F. Cullis, I. D. Davidson, H. E. the Ambassador of Finland, H. E. the Ambassador of Italy, Felipe Fernandez - Armesto, J. M. Forrester, Robert Frost, Michael Futrell, Graham Gladwell, Richard Hofton, Hugh Kearney, Noel Malcolm, Velibor Milovanovió, B. C. Moberly, Jan Morris,

W. Schulte Nordolt, Robin Osborne, Steven Pálffy, Roy Porter, Paul Preston, Jim Reed, Donald Russell, David Selbourne, Andrew L. Simon, N. C. W. Spence, Norman Stone, Alan H. Stratford, Richard Tyndorf, John Wagar, Michael West, B. K. Workman, Philip Wynn, Basil Yamey.

诺曼·戴维斯
1997 年 3 月 17 日



地图2　欧洲女王

（一幅出自塞巴斯蒂安·明茨尔的《宇宙志》版本的木刻。博德利图书馆特许使用。）

欧罗巴的传说

在初始时期没有欧洲。五百万年来所有的就是没有名称的一个[xvii]长而曲折的半岛，像一个船头雕饰，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块的船头上。西面是没有人跨越过的大洋。南面是两个为陆地包围的相联结的海，散布着岛屿、海湾和它们之中的半岛。北面是大的极地冰帽，随着时代扩张或缩小，有些像一个巨大的、冰冻的水母。东面是通向世界其余地区的陆桥，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文明将从那里过来。

在冰河时代之间，这个半岛接受了它第一批人类定居者。尼安德特（Neandertnal）猿人和克罗马农（Cromagron）穴居人，他们必然有过名称、面貌和思想。但是不能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谁，是什么情况。只能从他们的图画，他们的原始工具和他们的骨头中模糊地辨认他们。

只是在一万二千年之间，随着冰最后一次后退，这个半岛接受了新的移民浪潮，未被歌颂的先驱者和探索者慢慢地向西移动，绕过海岸，跨越陆地和海洋，直达最遥远的岛屿。他们最大的留存下来的杰作，在石器时代为青铜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建造在人类居住地边缘的一个遥远的、靠近海岸的岛上。但是没有什么现代的推测能确定地揭示是什么激励了这些石匠大师，或是他们的大石圈应称作什么。[1]

在这个半岛的另一端，这些遥远的民族的另一支在青铜时代的开端时期，建立了一个社会，它的影响延续到今天。传统上认为古希腊人（Hellenes）源出大陆内地的三次主要迁徙浪潮，在接近公元前两千年末期时控制了爱琴海（Aegean）海岸。他们征服和融合了已有的居民。他们通过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海岸与小亚细亚（Asia Minor）之间水域中散布的成千个岛屿扩张开来。他们吸收了大陆当时的文化和更为古老的克里特（Crete）文化。他们的语言将他们与“蛮族人”（barbarians），即“说话无法辨别的唠叨者”分别开来。他们是古代希腊的创建者。[**蛮族**]

后来，当古典时代的孩子们问人类是从哪里来时，他们被告知世界是由一个无法辨认的“造神者”（opifex rerum）创造的。他们还被

告知关于大洪水和欧罗巴（Europa）的事。

欧罗巴是古典世界最历史悠久的传说之一的主角。欧罗巴是克里特的霸主（Lord）米诺斯（Minos）的母亲，因而是地中海文明最古老的一支的女祖先。她被荷马（Homer）附带地提到。但是在被认为是叙拉古（Syracuse）的莫斯库斯（ Moschus）所写的《欧罗巴与公牛》（Europa and the Bull），尤其是在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所写的[xvii]《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她是作为一个被众神之父诱奸的天真公主而长久流传。在与她的侍女们沿着她祖国腓尼基（Phoenicia）海岸闲逛时，她被伪装成雪白色公牛的宙斯（Zeus）诱拐：

渐渐地她丢掉了恐惧，而他
敞出他的胸膛供她作处女的爱抚，
他的角上为她缠绕着花环，
直到这位公主敢于骑上他的脊背，
她抚摸着公牛背，不知道她骑的是谁。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走下宽阔的、干燥的海滩，
首先在这位伟大的神掀起的浅波中，
它那伪装的蹄子走得更远，
直到他带着他的捕获物进入开阔的大海。
她心里充满了恐惧，当她回头注视
看到迅速远退的沙滩，她的右手抓着
一只牛角，另一只手扶在他的背上
她飘动的外衣被微风吹起。[2]

这就是熟知的欧罗巴的传说，就像画在古希腊的陶瓶子上，在庞贝（Pompeii）的屋子中（见图 1），还有在近现代提香（Titian）、伦勃朗（Rembrandt）、鲁本斯（Rubens）、委罗内斯（Veronese）和克劳德·洛林（Claude Lorrain）的画中那样。

公元前五世纪写作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没有被这个传说打动。依他的观点，诱拐欧罗巴只是年代久远的抢掠妇女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一队腓尼基人（Phoenicians ）从推罗（Tyre）出发，带走了阿哥斯（Argos）国王的女儿伊奥（Io），因而从克里特出发的一队希腊人航行到腓尼基，带走了推罗国王的女儿。这是一个一报还一报的事例。[3]

欧罗巴的传说有许多含义。但是用将一位公主从腓尼基海岸（现在的南黎巴嫩）带到克里特岛，宙斯确实将东方更古老的亚洲文明的成果带到了爱琴海各岛新的殖民地上。腓尼基属于埃及法老

(Pharaohs) 的势力范围。欧罗巴的骑乘之旅提供了古代埃及和古代希腊之间的神秘联系。欧罗巴的兄弟卡德摩斯 (Cadmus), 他巡游世界 (Orbe pererrato) 去寻找她, 据信是他给希腊带来了书写的艺术。**[卡德摩斯像]**

欧罗巴的骑牛而去也引发了那些跟随她的脚步的人们实际上无休无止的到来。不像尼罗河 (Nile)、印度河 (Indus)、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和中国的大河流域文明, 它们都持续的时间很长, 但在地理上和知识上的发展却缺乏活力。地中海文明受到持续运动的刺激。运动引起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不确定性激发了一种持续的思想骚动, 不安全性激励了有活力的行动。米诺斯 (Minos) 以其船只著名。克里特以第一支海军闻名。这些船只载运着人民、货物和文化, 促进了它们航行到的各地区的各种交流。就像欧罗巴的外衣, 这些古代航海家的思想不断地一直"在微风中飘动" (tremulae sinuantur flamine vestes)。[4]

欧罗巴的骑行沿着太阳从东到西的路线, 根据另一个传说, 太[xix]阳是一辆火的战车, 由看不见的马拉着, 从日出处后面的秘密马厩直到日落处之外的休息地。确实, 几种有道理的词源学之一, 将亚细亚即"日出之地", 与欧罗巴即"日落之地"进行对比。[5]古腊人趋于将他们爱琴海西面的领地以"欧洲"命名, 以与小亚细亚更古老的领地相区分。

在欧洲历史的黎明时期, 已知的世界位于东方, 未知的世界在西方, 静静等待着注定中的被发现。欧罗巴的好奇心可能是她的灾难。但是这导致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 最终以她的名字传播到这整个半岛。

导　言

今日的历史

历史可以用任何放大的方式来写。可以只用一页来写全世界的历[1]史，或者用四十卷写一只蜉蝣的生命周期。一位杰出的前辈历史学家，他的专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曾写过一本慕尼黑（Munich）危机和它的后果（1938—1939 年）的书，第二本书是《和平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1939 年 8 月 31 日》。他的同事们徒劳地等待着被称为“午夜前的一分钟”的最后一卷。[1] 这是现代驱动人们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一个例子。

欧洲史也可以用任何度量的篇幅来写。法国的《人类的进化》（L’Evolution de l’humanité）系列，它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欧洲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计划是 110 主卷，还有增补的几卷。[2] 现在这本著作却相反，它的任务是将相同甚至更多的材料压缩在两个书封皮之内。

还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比得上诗人们那样节省思想：

如果欧洲是一位山林中的仙女（Nymph），
那不勒斯（Naples）就是她清亮的蓝眼睛，
而华沙（Warsaw）是她的心脏。
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和亚速（Azoff）、
彼得堡（Petersburg）、米塔乌（Mitau）、敖德萨（Odessa），
它们是她脚上的刺爪。
巴黎是头，
伦敦是上浆的衣领，
而罗马，是肩膀。[3]

由于某些原因，当历史学专著领域在变得更狭窄时，一般的概述却固定为一个每世纪几百页的通常放大方式。例如《剑桥中世纪史》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1936—1939 年),用八卷包括了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时代。[4] 德国的《欧洲史手册》(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1968—1979 年)用类似部头的七卷包括了从查理曼(Charlemagne)到希腊的上校们的这十二个世纪。[5] 通常的做法是给予当代比古代或中世纪时期以更大的篇幅。对于英国的读者,像里文顿(Rivington)的八卷本《欧洲史的各时期》(Periods of European History)这样的一部先驱性丛书,从远到近叙述的放大量越来越增加。查理·奥曼(Charles Oman)的《黑暗时代,476—918 年》(Dark Ages,476—918)(1919 年),以平均每年 1.16 页写了 442 年,A. H. 约翰逊(A. H. Johnson)的《十六世纪的欧洲》(Eurupeanin the Sixteenth)(1897 年),以平均每年 4.57 页写了 104 年,W. 艾利森·菲利普斯(W. Alison Phillipes)的《现代欧洲,1815—1899 年》(Modern Europe,1815—99)(1905 年),以平均每年 6.59 页写了 84 年。[6] 更新的丛书遵循了同样的模式。[7]

[2] 大多数读者对他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最感兴趣。但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愿意迁就他们。"'现今事物'在没有经历半个世纪之前不能成为'历史'。"一种观点这样认为,直至"文件可以利用和事后的认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清晰起来"。[8] 这是一个有用的观点。但是它意味着任何一般的概述必须在开始变得最有趣处中断。当代史易受到各种政治压力的攻击。而没有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可以希望有效地运用,而不需要以当代问题的起源作为基础。[9] 四百年以前,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在受到死刑判决的情况下写作,清楚地理解这种危险。他写道:"任何写一部现代史的人若是追随'真理'的脚跟太近,或许会把他的牙踢掉。"[10]

由于有这些复杂性,人们发现研究"欧洲"或"欧洲文明"这个论题多种多样,差异很大是不应惊奇的。概述整体欧洲史而没有依赖多卷本和多数作者的成功尝试一直很少,并且相继问世时间很长。H. A. L. 费希尔(Fisher)的《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1936 年)[11]或尤金·韦伯(Eugene Weber)的《欧洲近现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1971 年)[12]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它们都是关于"西方文明"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抄袭的论文(见下文)。也许大规模概述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些集中在一个论题上的作品,如肯尼思·克拉克(Kenmeth Clark)的《文明》(Civilisatlon),[13]通过艺术与绘画结晶的折射观察欧洲的过去。或是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的"人的上升"(The Ascent of Man)(1973 年)[14],通过科学技术史进行探讨。两者都是众多的电视产品的分支。一篇更新近的论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地质学和经济资源为基础研讨这个问题。[15]

多卷本的历史概述的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但它们被指责只是用来查阅的参考书而不是供阅读的。无论专职的历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都不打算在翻到最吸引他们题目之前就通读十卷、二十卷或一百一十卷的总的欧洲综述。这是不幸的。这整个框架设定的参数和假设没有在详细著作中各方面的讨论就再现出来。

在近些年，重新审视欧洲史的总框架的迫切性与高度专业化，高度放大化的研究风气成比例地增长。少数杰出的例外，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16]可以证明这个规律。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学生们被吸引到“关于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之中。以致到了更宽广的视角有时被遗忘的地步。而人文学科需要所有各种程度的放大。历史需要看到如行星在空间运转那样的事物；要聚焦和观察在地面上的人们，深挖到他们的皮肤和脚底的下面。历史学家需要使用相当于望远镜、显微镜、大脑扫描仪和地质探测仪的东西。

无须争论的是，历史研究在近年来由于新的方法、新的训练和新的领域大大地丰富了。计算机的出现开启了历史学家迄今办不到的[3]整个量化调查领域。**[地租]**。历史研究大大得益于应用从社会和人类科学中生成的技术和概念。**[阿利西亚] [杉柏] [狩猎] [避孕] [史诗] [节日] [基因] [哥特哈德] [列奥那多] [立陶宛语] [诺夫哥罗德] [犁] [宣传] [海蓬子] [葡萄收获学]**，由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从1929年起为前驱的一股潮流现在几乎已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学派]**。新的学术领域如口述历史、历史精神病学（或“心理史”），或家庭史，或行为史，现在都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幽灵] [风俗] [声音] [大家庭]**。同时，许多反映了当代关怀的题目赋予了历史一种崭新的面貌。反种族主义、环境、性别、性活动、闪米特族学（Semitism）、阶级与和平等题目占据了流行的写作和辩论很可观的部分。尽管有“政治正确性”在暗中起作用，所有这些都有益于丰富这个整体。**[黑色雅典娜] [高加索] [生态] [妇女] [诺贝尔] [大屠杀] [斯巴达克斯]**

虽然如此，领域的倍增和学术出版物的相应增长，仍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种严重的滥用。专业的历史学家对“追赶上文献”感到绝望。他们被诱使越来越深入到超专业化的窄胡同里，失去了与普通公众交流的能力。许多专业化已经使叙事史被损害。有些专家们依照不需要修正的概要大纲作为前提工作：新发现的惟一途径就是在一个狭窄的方面做深入发展。其他专心于探索“深层结构”的人，对历史的“表象”全然置之不顾。他们转而集中精力于分析“长时段的、潜存

的趋势”。像他们在文字批评上的有些同道们那样，他们认为一个文本的文字意义是无价值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当放弃研究习见的“事实”。他们制造出不打算学习发生了什么，及如何、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生的学生。

事实的历史的衰落伴随着“移情神会”的兴起，特别是在教室中。也就是运用激发历史想象力为目的的训练。想象力无疑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移情神会的训练只能伴随着一丁点知识来证明。在一个虚构的文献仍有着被当作历史信息的可尊重的来源的危险的世界里，学生们有时会有除了他们的教师建立在对过去的理解的偏见之外，什么也学不到的危险。[17]

历史与文献的脱节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当“结构主义者”们在人文学科中专业的一些领域被“解构主义者”们压倒时，历史学家们和文献鉴定家们看来都不但被排除在常规知识之外，并且还互相排斥。幸好随着解构主义较为荒唐的见解被解构，有了可以弥合这些神秘莫测的裂缝的希望。[18]绝对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审慎的历史学家不应当使用经过批判性评估的文本，或者说为什么文献鉴定家不应当使用历史知识。[豹][科纳尔姆亚]

[4] 因而现在看来，这些专家可能做得太过分了。在历史专业辛劳的工蜂和为蜂巢的劳动者带来秩序的蜂王式简化大师（grands simplificateurs）之间，一直有着合理的分工。如果让工蜂们完全掌握，就不会有蜂蜜了。而也没有一个人能接受“总体史”的总纲在一切时代一直固定下来。它们也随着时尚改变。那些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确定的东西已经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见下文）。同样地，对历史地质层面的研究必然不能与地面上的工作相脱离。在研讨“趋势”、“社会”、“经济”或“文化”时，不应该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视而不见。

专业化开启了通向赤裸裸的政治利益之门。因为没有人被认为有能力提供一个在他们自己拥有的“陷阱”之外的观点，应掳获的野兽们就安然游荡过毫无阻拦的草原。坚实的文献研究的结合被束缚在专断的选题中，它们的一个前提是排斥对所有重要的事实因素做充分的审查，特别是那些具有罪恶性的。正如据传 A. J. P. 泰勒（Taylor）曾说到过这样一部著作：“它是百分之九十真实而百分之百无用。”[19]

对于这些发展的谨慎回应，是主观解释的多元化，和“在次数上的安全性”，也就是促进特有观点的广泛多样性，以克服各个和每个观点的局限。一个单一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五十个、六十个或三百个观点放在一起，就可以依靠它们建立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综合论述。“没有一个真理，有着多少敏感度就有多少真理”。[20]

在第 2 章，说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对圆周率（π）问题的有名解决办法，也就是计算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的比例。阿基米德知道圆周的长度必然位于外切圆的正多边形边的数量与内接圆的正多边形的数量之间。由于不能直接算出来，他想出的办法是用在圆周内增加正多边形到 99 边的长度来找出一个近似值。他使这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它就越接近于圆的形状。与此类似，人们就因而会想到，揭示真相的来源的数量越大，在过去的真实和历史学家重塑它的努力之间的差距就越小。

在另外一方面，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摄影师那样，他静止的二维画面永远不能达到精确地体现运动的三维世界。“历史学家像照相机那样，总是在撒谎。”[21]如果把这个比喻发展下去，人们可以说摄影师能够大大增加他们工作的逼真程度（这里的目标是逼真程度），即增加同样主题的画面的数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镜头，滤色镜和胶片作大量拍摄，可以集合在一起克服单一拍摄的粗率选择。当电影制作者发现，按顺序拍摄大量的画面会创造出一种对时间和运动很不错的模仿。据此而来，“立体生动的历史”只能在历史学家审查了最广泛的可能范围的资料的结合重建。其效果永远不会是完[5]美的，但是每个不同的角度和每种不同的技术提供的各部分的揭示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

歪曲、失真是有信息来源的一个必然特点。绝对的客观是绝对达不到的。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强项和它的弱点。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每种技术的价值和曲解在何处，并得出一个合理的近似估计。批评家们反对历史学家使用诗、社会学或占星学，或无论什么东西，其根据是这样的资料是“主观的”、“带偏见的”或“不科学的”，他们提到了这些明显的事物。这好像是人们可以反对骨骼架的 X 光片，或是子宫的超声波扫描，其根据是它们给人类面貌以相当不足和差劲的影像。医生们运用一切已知的手段来窥探出人类心灵和身体的秘密。历史学家需要一系列的知识来深入洞察过去的神秘事物。

文献史已经享受了长期的独占地位，它同时是研究中最有价值和最危险的方法。要是处理得不小心，它就会导致错误传达的可怕形式。并且过去的经验有巨大的领域是不能记录的，而没有人否认历史文献仍然是知识最有成果的源流之一。**[霍斯巴赫]** **[王室档案]** **[斯摩棱斯克]**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剑桥历史学派的奠基者，曾经领会过文献史特别有害的一个影响。它倾向于给予搜集证据优先于历史学家解释证据的地位，阿克顿在约九十年前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献时代”，“它会使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以牺牲写作为代价去发展

学问”。[22]

总的说来，历史学家给予他们自己的辩论以更多的思想，而不是面对长期受害的读者遇到的问题。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大大减少了较早那种想象力的迸发，并将事实从想象中分离出来。在同时它减少了历史学家可以用来传达他们所发现的手段的数量。因为它不足以使好的历史学家只用来证实事实和收集证据。这个任务的另一半是洞察读者的心灵，与每一个历史的消费者具有的所有歪曲的感知作斗争。这些感知不只包括五种身体的感知（视、听、嗅、味、触觉），也包括预先的知识范围情绪，语言术语和地理名称的多样性，各种政治观点、社会习俗、感情气质、宗教信仰、视觉记忆和传统历史知识的符号先例系统。每一个历史的消费者都有一个以前经验的存储器，通过它所有输入的有关过去的信息必然会被进行过滤。

由于这个原因，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们必须像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信息那样投入大量的关注去传达它。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首要的事情和诗人、作家与艺术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必须密切注意所有其他[6]人有助于形成和传达我们对于过去的印象的工作，如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博物馆学家、档案学家、插图画家、制图学家、日记作家、传记作家、录音师、电影制作人、历史小说作家，甚至“瓶装的中世纪空气”的供应者。在关键的质量的每一个阶段上，正如维科（Vico）首先下的定义，是属于那些具有“创造性的历史想象力”的。没有它，历史学家的作品就只是一封死信，一条广播出去的信息。**[普拉多博物馆]［奏鸣曲］［国家电影委员会]**

在这个被认为是科学的时代，历史专业的想象力这一面无疑一直被贬低。难于阅读的学术论文和没有系统整理的研究资料的价值被夸大了。像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那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不只是被指责超越了诗人允许的界限，他们被遗忘了。但卡莱尔确信的历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至少是值得考虑的。[23]检查与证实是重要的，而卡莱尔有时没能做到。但是“讲述得正确”也是重要的。所有历史学家必须将他们的故事讲得令人信服，否则就会被置之不理。

“后现代主义”在近些年来，对所有那些将研究历史学家放在研究历史之前的人们来说成为一种娱乐。它属于一种跟随两位法国的宗师福柯（F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脚步的潮流，它既抨击历史知识已被接受的规则，也抨击传统沿袭的方法论。以一种探讨的思路而言，它企图否定文献资料的价值，使用的是文学解构主义者们企图摧毁文本的“意义”的方式。在其他方面它谴责“事实的景致”和“权

力型意识形态”，认为它们潜藏在信息的每个形式中。极端而言，它认为一切有关过去“真实”的叙述都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强制的包卖者包括所有主张“人类价值的一种责任”的历史学家。在它的批评者的眼中，它将历史贬低为“历史学家的乐趣”，它已成为政治化的激进分子们自己的一种宣传工具。在它对既有的资料的蔑视中，暗示着知道某些东西比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危险。[24]

而这个现象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它的热衷者只能像那些故作忧郁的学者，他们不是讲笑话，而是写大部头分析幽默的学术著作。人们也不清楚是否传统的人文历史编纂学可以正确地定义为“现代主义的”，而是否“后现代主义者”就不应当被限制在那些企图找到新与旧之间的一种平衡的人们。它是所有那些很好地嘲笑了一切权威的人，但是它最终只导致德里达的嘲笑。解构主义者们被他们自己的技术解构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在‘上帝之死’和‘人之死’中存在了下来，我们也必将在‘历史之死’中，还有后现代主义之死后存在下来。”[25]

但还是回到放大这个问题上来。任何记录历史长时期的进程的叙述必然对全景作不同的设计，来协调符合于一个特定阶段或时刻的[7]所有特点。对于阶段而言，历史记录的探讨必须强调创新的事物和运动，它们虽然在首先出现的那个时代是不典型的，但在后来的时代中会具有重要性。对于时刻而言，只涉及某一时期的探讨必须结合创新和传统的事物，和它们的相互作用。第一类的危险是犯时代错误，第二类的危险是静止地看问题。

早期现代欧洲就是这些问题进行实验的领域之一。自从它被探索人文主义、基督教新教、资本主义、科学和民族国家的根源的历史学家们控制，它就会吸引专家们的注意，他们很正确地显示出，中世纪和异教世界的因素是怎样存在下来和发展的。知识全面的历史学家必须设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例如在描述十六世纪时，它若被误导为完全去写关于女巫、炼金术士和妖女，就像曾经几乎完全去写路德（Luther）或哥白尼（Copernicus）或英国教会的兴起那样是不行的。综合性的历史必须注意到专家们的辩论，但是必须以同样的注意力发现一条超越他们过去关心的事物的途径。

欧洲的概念

“欧洲”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理念。它逐渐地取代“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这个概念是一个复杂的理性进程，从十四世纪延续到

十八世纪。但关键的时期是在 1700 年前后几十年，在经历了几代宗教斗争之后。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早期阶段（见第 8 章），对于各国分裂的社会团体，要提醒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一致性成为一个难题。而“欧洲”作为一个更具中性的概念满足了这个需要。在西方，反对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战争激励了许多国际法专家呼吁采取共同行动，来确定那时的区域划分。长时期被监禁的贵格（Quaker）教徒威廉·宾（William Penn）（1644—1718 年），一个英国—荷兰人联姻所生的儿子，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创建者，有着鼓吹普遍宽容和建立一个欧洲议会的名声。持不同政见的法国修道院长夏尔·卡斯泰尔·德·圣皮埃尔（Carles Castel de St Pierre，1658—1743 年），《一个永久和平的方案》（Projet d' une paix perpétuelle，1713 年）的作者，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强国的联邦来确保持久和平。在东方，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时期出现，使得需要对国际结构做彻底的重新思考。1713 年的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提供了一个最后的主要机会，当时制定了一个“基督教共同体”（Respublica Christiana）的国际关系。

在此之后，一种欧洲人反对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的认识占了上风。伏尔泰（Voltaire）在 1751 年所写的话，将欧洲描绘为：

> 一种大的共同体被分为几个国家，一些是君主制的，其他是混合政体……但所有国家都相互来往。它们都有同样的宗教基础，即使分裂为几种信仰。它们都有同样的公共法律和政治原则，这是世界其他部分不知道的。[26]

[8] 二十年之后，卢梭（Rousseau）宣称：“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只有欧洲人。”根据一种观点，“欧洲观念”的最终认识出现在 1796 年，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写道：“没有欧洲人可以完全逃亡到欧洲的任何部分。”[27]甚至如此，欧洲社会的地理、文化、政治上的参照系一直是有着争辩余地的。在 1794 年，当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出版了他最难理解的诗之一，题目是“欧洲：一个预言”，他用一幅全能的上帝（Almighty）从天上探出身来，拿着一个圆规的图画来描绘它。[28]

大多数欧洲的轮廓由它延伸的海岸线确定。但是它陆地边界的轮廓的形式却用了很长时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界线被古代人确定为从赫勒斯滂（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到顿河（Don）。在中世纪时代仍是这样。一个十四世纪的百科学者能够得出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

“欧洲据说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它的名字来自欧罗巴（Europa)，她是利比亚（Lib ya）国王阿革诺耳（Agenor）的女儿。朱庇特（Jupiter）劫走了欧罗巴，将她带到克里特（Crete），并称在她身后的大部分土地为欧罗巴。……欧洲起始于塔奈（Tanay）河［顿河］(Don)，沿着北部海洋延伸到西班牙末端。东部和南部起自被称为彭图斯（Pontus）海［黑海］，并都汇合入大海（Great Sea）［地中海］，终于加的支海（Cadiz）诸岛［直布罗陀（Gibraltar)］……”[29]

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埃内亚·皮科洛米尼）(Enea Piccolomini）在他的早期专著《论欧洲的状况》(Treatise on the State of Europe, 1458年）中，以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色雷斯(Thrace）开始，它们在交界处，受到土耳其人（Turks）的威胁。

无论古代人还是中世纪人都没有欧洲平原向东延展范围的详细知识。其中几个地区直到十八世纪还没有永久确定下来。因此直到1730年，一位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瑞典军官斯特拉伦伯格（Strahlenberg）认为欧洲的边界应当从顿河推进到乌拉尔（Ural）山和乌拉尔河。

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俄罗斯政府在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和秋明（Tyumen）之间路径上树立了一个边界桩，来标出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那时起沙皇流放者的队伍带着镣铐向西伯利亚(Siberia）前进，创造了跪在界桩旁并抓起欧洲最后一捧土的习俗。一位观察者写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界桩见到过这么多颗破碎的心。”[30]到1833年，当弗尔格（Volger）的“地理手册”（Hand buch der Geographie）出版时，“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31]

虽然如此，没有什么使这个占优势的规定神圣化。欧洲延伸到乌拉尔山之所以被接受，是俄罗斯帝国兴起的一个后果。但是它一直受到广泛批评，特别是分析派地理学家。以乌拉尔山作为边界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根据，对于他们环境因素是居于首位的，还有瑞士地理学家J. 雷诺（J. Reynold）写道：“俄罗斯是欧洲在地理上的对立面。”俄罗斯霸权的衰落也许正好会引起一种修正——在这种情况中一位俄罗斯出生的牛津大学教授的观点，即一个“浪潮式的欧[9]洲”——它的边界如同潮涨潮落，将会诞生。[32]

地理上的欧洲常常必须与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概念竞争。而由于缺少共同的政治结构，欧洲文明只能由文化标准来确定。特别的重点通常放在基督教的潜在作用，一种在基督教世界的标签失落时

仍未消失的作用。

在 1945 年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广播时，诗人 T.S. 艾略特(T.S.Eliot) 阐述了一个观点，即欧洲文明在一再削弱基督教的精髓而处于灭亡的危险之中。他描述了“欧洲精神边界的封闭”，这发生在民族国家确信它们自身就是全部的那些年代里。他说：“一种文化专制不可避免地要跟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他强调文化的有机本质：“文化是必然会成长的事物。你不能建筑一棵树，你只能种植它，照料它，等待它成熟……”他强调欧洲内部众多亚文化的相互依存。他称文化“贸易”为这个有机体的生命血液。他还强调文化人的特别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基督教传统的中心地位，它其中包含了“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

> 在每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共同文化，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宗教……我要讲的是基督教的共同传统使欧洲成为这个样子，还有与这个共同的基督教一道带来的共同文化因素……正是因基督教我们的艺术得以发展，正是因基督教欧洲的各种法律（直到最近）能够扎根。正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我们所有的思想才有重要意义。确实一个个别的欧洲人可能不信仰基督教，而不论他说什么，制造什么，凭什么，都……依赖于［基督教遗产］的内涵。只有一种基督教文化能产生伏尔泰（Voltaire）或尼采（Nietzsche)。我不相信基督教信仰若完全消失，欧洲文化会存在下去。[33]

这个概念在所有意义上说是传统的。它是衡量所有其他变化的、背离的及有着这个主题的辉煌思想的尺度。这是斯塔埃尔夫人(Mme de Staël)曾称之为“欧洲思想”（Penser à L’ européenne）的起始点。

对于欧洲文化历史学家而言，最基本的任务是识别在这个基督教传统中许多竞争的思潮，并评估它们与各种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因素的关系上有多大的分量。多元论是确切的（de rigueur)。尽管基督教信仰的明显优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不可否认许多现代最有成果的促进因素，从文艺复兴对古代的热情到浪漫主义者（Romantics）对自然（Nature）的执迷，在特点上基本是异教的。类似地也很难认为，当代对现代主义、性爱、经济学、运动、通俗文化的崇拜，基督教遗产能有多大作为。今天的主要问题是确定二十世纪的这些离[10]心力量是否将遗产贬低为无意义的旧杂物堆。现在几乎没有分析家会坚持任何类似于曾存在过一个铁板一块的欧洲文化的看法。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是将欧洲的文化遗产看作是由四个或五个相互重叠或连接

的圈子组成的。[34]（见原书附录Ⅲ，第1238页）。据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说，欧洲的惟一文化同一性是"一块两面可以翻转的织料，一面是多彩斑斓的，另一面是单一的鲜艳而浓重的颜色"。[35]

然而，若是认为"欧洲"没有政治内涵就会犯错误。相反，它经常被用作它所缺少的和谐与统一的同义语。"欧洲"一直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一个所有良好的欧洲人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

欧洲这种救世主式或乌托邦式的观点，远溯至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之前的讨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他的同盟者们组织了反对路易十四（Louis XⅣ）的联盟，他们的宣传曾响亮地呼吁这种观点，正如那些反对拿破仑（Napoleon）的人们所作的那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说："欧洲就是我们。"它在十八世纪表现为一种强国力量平衡的雄辩，在十九世纪表现为一种和谐一致的雄辩。它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和平的帝国主义时代，直到被1914年的世界大战粉碎之前，欧洲被看作是世界范围统治的根据地。

在二十世纪，欧洲的理想被决心愈合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政治家们复活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它被传播到苏联以外的这个大陆的所有部分。它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得到表现，特别是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工作中。（见原书第949—951页）。它特别对东欧的新国家有吸引力。它们没有受过欧洲以外帝国的干扰，并寻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对抗大国的强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铁幕"建立之后，它被那些计划在西方建立一个"小欧洲"的人们所利用，他们设想建立一系列以法国和德意志为中心的同心圆范围。但是它同样对其他在东部压迫性的共产主义统治下被隔绝的人们是一座灯塔（见原书第13页）。苏联帝国在1989—1991年的崩溃，为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能有希望扩展到这个大陆所有部分提供了第一线曙光。

但欧洲理想的脆弱性是其反对者和鼓吹者都承认的。在1876年俾斯麦（Bismarck）将欧洲看作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正如梅特涅（Metternich）曾对意大利的说法一样。七十年后"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看到了俾斯麦的鄙视的力量。他承认："欧洲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必须真正制造欧洲。"[36]

五百多年来确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在整个近现代史中，一个东正教（Orthodox）的、专制的、经济上落后的但却是扩张的俄罗斯一直是很不适合的。俄罗斯的西方邻居们经常寻找理由来排除它。俄罗斯人本身也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要

进入还是待在外边。

[11] 例如在1517年，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Cracow）的校长（Rector）马切伊·米肖维塔（Maciej Miechowita）出版了一篇地理论文，赞同传统上托勒密（Ptolemeian）对欧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europaea）与亚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asiatica）之间的区分，以顿河（Don）为边界线。因而波兰—立陶宛（Poland – Lithnania）在欧洲之内，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在欧洲之外。[37]三个世纪之后，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波兰—立陶宛此时已解体，而俄罗斯的边界引人注目地向西推进了。当法国人路易—腓力普·德·塞尼尔(Louis – Philippe de Ségur)（1753—1830年）在法国大革命前路过时，他无疑认为波兰不再处于欧洲以内。“人们相信自己完全离开了欧洲；一切事情给予的印象是时间倒退了十个世纪。”(On croit sortir entrèrement de l' Europe, tout ferait penser qu'on a reculé de dix siècles)，他在进入波兰后写道。用经济上的先进作为欧洲成员的主要资格，他是绝对赶得上时代的。[38]

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俄罗斯政府正在坚持获取它的欧洲证书。虽然事实上它的领土沿着连接的边界延伸过亚洲直至北美洲，叶卡捷琳娜女皇（Empress Catherine）在1767年明确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任何希望与圣彼得堡打交道的人都注意到了这点。毕竟，莫斯科公国从十世纪起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俄罗斯帝国是外交圈子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对“熊”的畏惧没有阻止一种将俄罗斯看作欧洲成员的普遍一致看法的增长。这种看法在十九世纪大为加强了，由于俄罗斯在打败拿破仑中所起的作用，还由于俄罗斯文化在托尔斯泰（Tolstoy）、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契诃夫（Chekov）时代辉煌的繁荣。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划分为“西方化者”（Westenizers）和“崇尚斯拉夫派”（Slavophiles），对俄罗斯的“欧洲性”不予确定（见原书第10章，第811—812页，第817页）。在“俄罗斯与欧洲”（1871年）一书中，崇尚斯拉夫派的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iy）（1822—1885年）认为俄罗斯本身拥有一种特别的斯拉夫文明，处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相反，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在诗人普希金（Pushkin）雕像的揭幕式上的讲话，选择了以对欧洲的一篇颂词开始。他宣称：“欧洲的各族人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亲切与宝贵。”只有一小群“东方派”（Vostochniki）主张俄罗斯完全是非欧洲的，大多数方面与中国相同。[39]

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的行为使旧的怀疑和模棱两可性复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国外普遍被认为是野蛮人。用

丘吉尔（Churchill）的话说是一个“残忍下流坯”（baboonery），一个像阿提拉（Attila）或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那样散布死亡和破坏的狂野的亚洲人匪帮。在苏维埃俄罗斯本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们经常被谴责为一种西方的移植物，由犹太人（Jews）控制，由西方的钱支持，被德国的知识分子操纵。在同时，官方观点的强硬路线主张，革命已切断了与“堕落的”欧洲的所有联系。许多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孤立感到屈辱，并自豪地说一个新生的俄罗斯不久将会压倒无信仰的欧洲。早在1918年，革命年代的主要俄罗斯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斯基泰（西徐亚）人”（The Scythians）大胆的诗。

[12]

你们是成百万人，我们是一群，一群
又一群，
与我们打交道吧，来证明我们的种族来源！
我们是斯基泰人，也是亚洲人，来自海岸
长着斜眼，据说很贪婪。

俄罗斯是个狮身人面怪（Sphinx）！
虽然在痛苦中获得胜利，
她用深色的血流洗浴自己的肢体，
她的眼睛盯着你，一盯再盯
在同一束目光中爱恨交织。
旧世界再一次醒来吧！你们兄弟的悲惨状况
苦工与和平，来一次火的交织。
再来一次！加入你们兄弟的欢乐之光！
服从这野蛮人（Barbary）诗歌的召唤。[40]

这不是第一次俄罗斯人从两个方向被立刻撕裂。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列宁（Lenin）和他的圈子紧密地与欧洲认同。他们将自己看作为法国大革命创始的传统的继承人。他们认为自己直接的根源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战略将是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联合起来。在1920年代早期，第三国际（Comintern）讨论过一个（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欧洲联合国家的可能性。只是在屠杀了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斯大林（Stalin）的统治下，苏联选择了在精神上与欧洲事务拉开距离。同在这几十年间，一个有影响的流亡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N.S.特鲁别茨科伊（N. S. Trubetskoy），P.N.萨维茨基（P. N. Savitsky）和G.韦尔纳茨基（G. Vernadsky），选择了重新强调俄罗斯文化混合

体中的亚洲因素。他们以“欧亚人”（Yevraziytsy，Eurasians）著称，从根本上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但保持着对西欧的价值观的怀疑态度。

当然，苏维埃极权统治的七十年建立了跨越欧洲的巨大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幕布。苏维埃政权的公开面目变得露骨地惧怕；憎恶外国人，这是一种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大为助长，并被斯大林主义者们尽力培养的态度。但是在他们心中，许多个别的俄罗斯人追随着苏联集团（Soviet Bloc）的大多数非俄罗斯人，培养他们对欧洲同一性的一种加强的意识。这是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精神生存的一条生命线。当共产主义的锁链熔化后，它使他们受到欢迎，用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说即“回到欧洲”。

虽然如此，关于俄罗斯欧洲资格的怀疑主义在俄罗斯国内外继续流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心里不喜欢和嫉妒“西方”，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兴奋点，他们为苏维埃权力的崩溃感到屈辱，他们所要的就是让帝国回来。作为希望有一个后共产主义民主的反对派核心，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与未改革的共产主义者的这个非神圣同盟，只能充满怨恨地看着莫斯科与华盛顿和与西欧发展着友好关系（rapprochement）。

在西方领导人这方面，稳定的需要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不能找[13]到一个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人道主义版本的苏联（USSR）这样一个持久伙伴关系，他们莽撞地冲上俄罗斯联邦之岸。他们对莫斯科要求经济援助，要求与北约（NATO）与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联合作出同情的反应。但随后他们中有些人开始看到障碍了。毕竟俄罗斯联邦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没有成熟到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它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跨越欧亚，仍是高度军事化的，并且仍然对它的安全表现出帝国式的反应。它没有清楚地认可让它的邻居们追随它自己的道路。除非它像所有其他前帝国主义那样，找出摆脱帝国遗产的方式，它不可能指望被考虑作为任何欧洲社会合适的候选者。这至少是欧洲议会议长的强有力观点，是在1993年9月说的。[爱沙尼亚人]

有些评论家主张不列颠（Britain）的欧洲资格比起俄罗斯的模棱两可之处并不少。从“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到“百年战争”，英格兰王国深深卷入了大陆的事务。但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期英国人在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在征服与合并了它在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的邻居们后，他们就航海驶去创造一个海外帝国。像俄罗斯人那样，他们的确是欧洲人，但是首要的是欧洲之外的利益。它们事实上是半脱离的。他们好像从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看待“大陆”的

习惯直到他们的帝国消失后才开始减退。还有，帝国的经验教给他们根据主要在西欧的“大国”来看待欧洲，而主要在东欧的“小国”则不予真正考虑。在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碑（Albert Memorial，1876年）周围的雕像，是一群象征“欧洲”的形象。它只包括了四个形象——不列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不列颠是“一个特殊例子”。[41]在1920年代的第一次泛欧洲运动的发起者们（见原书第944页，第1085页）认为不列颠与俄罗斯都不应参加。

在这段时期，作了各种尝试来确定欧洲文化的进一步划分。在十九世纪晚期，一个德国统治的“中欧”（Mitteleuropa）概念开始形成，与中欧强国的政治领域相一致。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一个被称为“中东欧”的地域被发明出来，与新独立的“继承国家”，从芬兰、波兰到南斯拉夫相一致。这个名称在1945年后再度流行，作为类似的一系列名义上独立但被掳入苏联集团的国家的方便标签。在那时，在由“北约”（NATO）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控制的“西欧”和由苏维埃共产主义控制的“东欧”之间的主要划分看来固若磐石。在1980年代由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领导的一群作家，创造了一个新说法的“中欧”，以打破统治的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另一个真正的“精神王国”。[42]

“欧洲的心脏”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观念，它具有地理上和感情上的含义。但它是特别不易捉摸的。一个人将它放在比利时，另一个人放在波兰，第三个人放在波希米亚（Bohemia），第四个人放在匈牙利，第五个放在德语区域。[43]不管它在哪里，不列颠的首相在1991年[14]宣称他打算去那里。对于那些认为这个心脏在一个静止的中心的人们来说，它位于或是圣克莱芒（St Clement）镇［阿利埃（Allier）］，欧洲共同体的地理中心，或是其他各种方式计算的欧洲地理的静止中心，在华沙（Warsaw）的郊区或深入立陶宛（Lithuania）。

在欧洲被最长时期的内部战争分裂的七十五年中，欧洲统一的概念只在那些有着最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视野的人们中保持着活力。特别是在四十年的冷战期间，需要有最大的知识上的勇气和毅力，去抵制不只是顽固的民族主义，还在欧洲完全基于西欧的繁荣这种狭隘的观点。幸好，有这种所需品质才干的一些人是存在的。他们以写作留下的遗产不久就将成为响亮的预言。

塞顿—沃森（Seton－Watson，1916—1984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列颠东欧研究的先驱者R.W.塞顿—沃森（1879—1951年）的大儿子，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曾在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膝上玩耍，他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匈

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像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一样不费力。他生于伦敦，在那里他成为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教授。他通常说自己是个苏格兰人（Scot）。他从来没有屈从于他那个时代流行的知识。他关于欧洲概念的遗言，表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篇论文中，他的论证强调三个基本点，即一个欧洲理想的必要性，东欧和西欧国家的互补作用，欧洲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每个论点应当以相当长的引文来说明。

塞顿—沃森的第一个猛烈抨击，是针对那些期望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建立在“北约”的安全利益或“欧共体”的经济利益之上的人们的短浅眼光的：

> 让我们不要低估一个积极的共同事业的必要性。因为一些事情比黄油的价格更激动人心，比确定防御条约更有建设性，即对一个欧洲神话（Mystique）的需求。[44]

第二箭是射向那些企图以西方文明的名义排除东欧人的：

> 欧洲文化共同体包括生活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民族……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由于他们今天不能属于全欧洲的经济或政治共同体这个事实所抹杀……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有如此广泛传播的一个欧洲文化共同体的信念，在事实上和重要性上像位于“欧共体”和苏联之间的国家那样……对于这些民族来说，欧洲的观念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每个特有的文化或亚文化都属于它。他们中没有谁能没有欧洲而存在下去，或者欧洲没有他们能存在下去。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一种真实和幻想的化学化合物。幻想的荒谬不一定就掩盖这个真实。[45]

[15] 第三箭是针对那些对欧洲文化持有简单化和铁板一块的观点的人：

> 欧洲与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交织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甚至最漂亮的诡辩也不能否认……但同样真实的是在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有些不是基督教的。有罗马的，古希腊的（Hellenic），可以说还有波斯的。并且（在近现几个世纪中）又有犹太的。是否也有穆斯林（Muslim）的部分就更难说了。[46]

结论确定了欧洲文化的目的与价值：

> （欧洲文化）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欧共

体官员或什么其他人的垄断所有物。为表达对它的忠诚，不等于要宣称它优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的统一不过是我们各个祖先三千年劳动的终极产品。它是一份遗产，我们若践踏它就会自取其害，并且这将是剥夺年轻的和未来的各代人的一种罪孽。应当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和更新它。[47]

塞顿—沃森是在欧洲黑暗的长夜中，举着欧洲火炬的孤独奔跑者的选手队伍中的一员。他是西方学者中少数跨越东西欧之间障碍的人之一，他以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他于发生的事件证明他的论断有如此之多的正确性的前夕去世。他的知识遗产是这本著作荣幸地最紧密地遵循的榜样之一。[48]

写一部欧洲历史，只有到欧洲的概念稳定下来，历史学家的技艺学问有了分析型的转变时才能着手进行。但它确实于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就在进行了。在综合方面最早的有影响力的尝试，是法国作家和国务活动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 年）作的。他的《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1828—1830 年）是以他在索邦学院（Sorbonne）的讲课为基础的。

幸亏有这些定义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同意，欧洲历史这个论题必须集中在欧洲过去每个伟大时代中发现的共享经验。大多数人也会同意，在古代晚期，欧洲历史不再是这个地理半岛内一些无关事件的组合，并开始呈现出一种更有凝聚性的文明进程的特点。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古典与蛮族世界的融合。一个有意识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最终确立，换言之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建立。此后，教会分裂、反叛、扩张、发展、分裂组合等各种行为发生了，造成了今天欧洲格外多种多样和多元的现象。这不是欧洲文明的主要构成的两列目录可以完全与之相符的。但是许多事项总是特别突出的：从基督教世界在希腊、罗马与犹太教的根源到例如启蒙运动、现代化、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极权主义这样的近现代现象。人们也不应忘记战争，斗争，迫害这些紧伴着历史每一阶段的令人遗憾的类别。也许最适合的类比是音乐。欧洲历史学家不是探索一个简单的歌剧脚本的故[16]事，他们力图要重现一个复杂的总乐谱，还有它具有的一切杂音和它本身无法仿效的交流密码。“欧洲……就像一支交响乐队。确实有些时候某些乐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甚至是完全沉默下来，但大合奏却存在着。”[49]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对欧洲音乐语言的这个看法，为欧洲传统的最普遍的总线索提供了一个说明。[MOUSIKE]

虽然如此，因为欧洲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统一过，多样性显然成为它最持久的特点之一。多样性可以在对这种共享经验的每一个所发生

的一大串反应中观察到。在民族国家与文化中维持着在欧洲文明这个整体之内最长久的多样性。在强大与衰落的变化节拍中有着多样性。基佐作为先驱者，不是惟一认为多样性是欧洲的首要特征的人。

欧洲中心论

欧洲历史的写作不能只因为集中注意力于欧洲事务，也就是紧扣主题而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由于内容。它指的是欧洲作者们的一种传统倾向，即将他们的文明看作是优越的和独立自足的，并忽视需要考虑非欧洲人的观点。发现欧洲历史主要是欧洲人为欧洲人写的，也不必惊奇或遗憾。每个人都会感到寻根的驱动力。不幸的是，欧洲历史学家们在探讨这个题目时，常常就像纳尔西苏斯（Narcissus）观看水池那样，只是去看自己美丽的倒影。基佐从他认为欧洲文明是"全能的主"的希望以来有许多仿效者。他的表述是："欧洲的文明已进入……永恒的真理，进入上帝旨意（Providence）的计划。""它依照上帝的意愿而进步。"[50]对于他和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而言，欧洲是"应许之地"，欧洲人是"选民"。

许多历史学家继续了这种自我祝贺的风格，并且经常十分明确地认为，欧洲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为所有其他民族遵循的模式。直到最近，他们对欧洲文化与它的邻居，在非洲、印度或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的相互影响很少予以注意。如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在1898年所写的，将欧洲文明首先追溯到"条顿族（Teutonic）部落的工作"，将欧洲是普遍性的模式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公理：

古代世界的继承者是条顿族部落；他们……逐渐在古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文明，并且在最近的时代中开始成为世界范围的，并给地球上所有居民带来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影响。[51]

[17]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最终敢于出版一卷本的欧洲史时，作者们用一种类似的偏爱感情开始他们的前言：

虽然有许多大的文明在各个时代存在，只有欧洲文明有着最深刻最广泛的影响，并且它现在（正在大西洋西边发展）为地球上所有民族确定了一个标准。[52]

这种思路和表达方式正不断地失去它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非欧

洲人而言。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 年）有时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一个中心人物，甚至作为“不列颠殖民扩张的文明使命的一位辩护士”。他著名的“东方和西方的歌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是心里想着印度来撰写的：

哦！东方是东方，而西方是西方，
这两条线永不会相逢，
直至大地与天空站在上帝最后审判的宝座前。
但是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也没有边界、种族的出身，
当两个强壮的男人面对面站着时，
尽管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53]

吉卜林很少有他那个时代通常与欧洲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傲慢。他不避开他那个时代关于我们“统治棕榈树和松树的领地”或“没有法律的较小种族”的用语。而他也强烈地为印度文化所吸引，因而他写了奇妙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而他是一个有深刻宗教感和谦卑的人：

喧闹和叫喊消亡了，
首领们和国王们离开了，
你的古代的牺牲品仍在怀着，
一颗谦卑而悔罪的心。
万军之主的上帝，还和我们在一起，
唯恐我们忘记，唯恐我们忘记。[54]

这些话对于任何将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总括为同样傲慢的一帮的人是一种永久的指责。

现在反对欧洲中心论有四个主要来源。在北美洲它在一部分黑人社团和他们的政治同情者中出现，他们正在反抗据称由“白人种族优越论价值观”统治的，换言之美化欧洲文化的教育制度。它在“黑人穆斯林运动”中得到表达。还有在学术上各种黑人研究（非洲学）直接反对传统的美国学术界。[55]它最有斗争性的形式，其目标是用非洲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即“相信非洲人在后现代历史中的中心地位。”[56]它基于这个论点，欧洲文明“偷窃”了人类的诞生权，特别是非洲人的。[57]在伊斯兰教世界，特别是在伊朗，类似的反对是由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发起的，他们将“西方”看作是撒旦（Satan）的领地。

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它为常常有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所拥护，他们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19]组成部分。[58]在欧洲，它在一代人中广泛传播，虽然不总是很明确的，这是由于当他们停下来思考时，对他们长辈的许多态度感到十分羞耻。

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第一条途径是对欧洲与非欧洲民族的相互影响给予更多的注意。[贡萨尔维斯] 第二条途径是使用非欧洲的资料来阐释欧洲的问题。[罗斯] 第三条途径就是坚持与欧洲的邻居们进行诚实的比较，也就是在许多方面和例子中不会对欧洲有利的比较。总之，从根本上是要改变调子。因为近百年来，这些“条顿族部落”，还有其他欧洲人的行为，没有太多好吹嘘的。

最终，像所有的人类活动那样，欧洲的历史记录必须以它本身的成就来判断。它不能合理地在“大著作”的一份目录中体现出来，它们选择任何令人愉快的事物而忽视了渣滓（见下文）。它可以带着赞美或憎恶的观点，或混合两者去看待。一位法国人的观点采取了一种乐观的调子：“毕竟，罪恶和西方历史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怎样（西方）给予这个世界的远超过它在反对各种社会与个人方面所做的事。”[59]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这种看法。

西方文明

在欧洲历史这两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常与“西方文明”的遗产相混淆。确实，这造成的印象是，所有“西方的”都是文明的，所有文明的都是西方的。由于引申或只是由于不负责任，任何笼统地看作“东方的”（Oriental）事物被认为是落后的或低级的，因而应该忽略。对这种综合症的剖析能够暴露出有关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态度，也就是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传统。[60]但是不难表明，它以同等的力量作用于与欧洲本身某些地区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东欧。总的来说，西方文明没有被认为扩展到整个欧洲（虽然它可以适用于地球上远离欧洲的部分）。

历史学家们最喜欢认为他们自己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北美的人，很少看到从全体上描述过欧洲历史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没有更多的理由去考虑东欧国家而不是仔细研究西欧更西边的部分。可以引用的许多题目都冒充是“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但它们完全不是这种历史。许多“西方文明”的综述将

[18]

地图 3　在欧洲东方—西方之间有问题的分界线

其局限于只与这个“半岛”他们选出的片断有关的题目。在许多这样的著作中没有葡萄牙，没有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没有斯堪的纳维亚，正如没有波兰，没有匈牙利，没有波希米亚，没有拜占庭，没有巴尔干半岛，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没有白俄罗斯（Byelorussia）或乌克兰（Ukraine），没有克里米亚（Crimea）或高加索（Caucasus）。有时有俄罗斯，有时没有。因而不管西方文明是什么，它不包括总括欧[20] 洲历史的任何诚实的努力。不管“西方”是什么，它并不是西欧的同义语。[61]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看来好像欧洲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做得像格律耶尔（Gruyère）的制奶酪者那样，使产品有着奶酪上那样多的孔洞。

例子是众多的，但举三四个就足够了。一位杰出的牛津大学导师写的《欧洲中世纪史》（A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长期被用来作为这个题目的标准介绍。因而读了其前言就会惊奇地得知，它的内容与标题不一致：

> 由于希望保持题目的连续性，……我也许一直对将事物过分简化感到内疚。……中世纪的拜占庭的情形和进程与西欧是如此不同，看来不要企图对它作任何系统的综述更为明智。我不胜任作这样的综述。我对中世纪俄罗斯的历史什么也没有讲，它离我选择追踪的题目太遥远。还有关于西班牙我也许讲的要比应当的少。[62]

事实上，这个题目应当定为“西欧（拉丁基督教世界），或多或少类似的说法”。[63]人们也许会认为如果这本书接受与其内容相符的一个标题，一切就好办了。“中世纪西欧史”或“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史”也许看来适合。但是人们就会发现书中原文几乎没有作什么努力述及甚至拉丁基督教的所有部分。例如没有发现提到爱尔兰或威尔士。雅盖隆（Jagiellons）王朝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国家，在本书选择的时代的后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绝对是最大的国家，只值两条附带的引证。一条是有关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Otto Ⅲ）的政策的，另一条的有关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悲惨命运的。庞大的、多民族的匈牙利王国，从亚得里亚海（Adriatic）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得到的关注要比拜占庭和希腊人少得多，而拜占庭与希腊人是作者先验地置于边界之外的。这本书有许多优点，但是像其他许许多多书那样，它相当于是欧洲的一部分喜好的区域中选择的题目的一个综述。

有着高度影响的《西方文明历史手册》（A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是由一个类似的奇怪结构组织起来的。它的三

个部分中最大的一个"欧洲文明"（约公元前900年至现在），以"欧洲文明的地理调整"开始，并解释如何"从东方的（Oriental）转变为古典的（Classical），再从古典的转变为欧洲文明，每次都包含一个向较古老的社会的外围的转换"。"欧洲文明的原始故土"被描述为依据"从比利牛斯山（Pyrenees）延伸到俄罗斯"的一片平原，而与"地中海地区"以一道"不规则的山脉障碍"分离开来。但是在后来的各章中并没有试图安排这块故土的历史。罗马帝国原来的领土"结果在三个文明之间被划分——伊斯兰教、东正派（Orthodox）基督教和拉丁基督教"，但是随后却没有系统讨论这种欧洲的三属划分。对于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只用了一句话，但是对任何其他后来基督教化的地区什么也没说。关于早期的"西欧各民族"有一小节（见原书第129[21]页），包括维特指的"印欧（Indo - European）部族人"，但是对任何时期的东欧各民族什么也没说。它零星地提到了斯拉夫人（Slavic）或"讲斯拉夫语的民族"，但是没有指明他们代表欧洲印欧族群的最大群体。关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公元900年至1500年"有主要的几章，但关于"东方基督教世界"却一章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扩张"的段落所说的不是德意志人的殖民就是欧洲之外的远洋航行。有两句话突然地告诉读者，在十四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实际上包括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立陶宛和匈牙利"，（见原书第345页），但没有讲进一步的详情。所有各章中最长的一章，"近现代世界，公元1500年至现在"，在处理这些题目时完全排除了东欧的因素，直到俄罗斯，并且只有俄罗斯，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时期显得作好了准备。从那时起，俄罗斯显然成为西方一个完全合格的成员。作者事先对他"安排和选择的专断原则"抱歉（见原书第XVIII页），可惜他没有展示过这些原则是什么[64]。

"大著作计划"（Great Book Scheme）是同一个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另一个产品。它声称收录了对于理解西方文明至为重要的关键作者和著作。它是于1921年在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发明的。从1930年起由芝加哥运用，变成了全美国大学教程的范本。没有人期望这样一种目录会对欧洲所有的地区与文化给予精确地平均分配，但是偏见和偏爱是明显的。在修订过的目录的151位作者中，49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27位是法国人，20位是德国人，15位是古代希腊人，9位是古代拉丁人，6位是俄罗斯人，4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3位是西班牙人，3位是早期意大利人，3位是爱尔兰人，3位是苏格兰人，还有3位是东欧人（见原书附录Ⅲ，第1230页）。[65]

政治理论家们经常暴露出同样的偏见。例如，很通常地将欧洲的民族主义依据相反的类型分类——"东欧的"和"西欧的"。一位杰

出的牛津学者，他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解释了他对这种分类的看法：

我称之为东方民族主义者盛行于斯拉夫人中间，同样盛行于非洲和亚洲……还有拉丁美洲。我不能称之为非欧洲的，并认为最好称之为东方的，因为它首先出现在西欧的东方；[66]

他于是阐释他对西方民族主义的观点，他以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为引证，以十八世纪晚期作为民族主义起始的时间，这时民族主义“在文化上已很好地装备起来”：

他们有适用于他们所属的有意识的进步文明的语言。他们有传授这个文明宝贵技艺的大学和学校。他们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有高度专业标准的法律、医学和其他专业人士……将他们自己放在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一个水平上，他们几乎不需要在文化上挪用对他们而言是外来的东西来装备自己。……他们最迫切的需要，也就是看来对他们而言，要获得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斯拉夫人的情况，以及后来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67]

[22] 难于发现对于欧洲文化史的地理和年代比这更为混乱的评论了。对“斯拉夫人”的分析，说到底，它显示出只有与捷克人（Czechs）、斯洛伐克人（Slovak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塞尔维亚人（Serbs）和克罗地亚人（Croats）有关的段落。对于三个最大的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Poles）什么也没说。而他们的经历与这种分析是完全相矛盾的。人们会奇怪，普拉曼纳茨（Plamenatz）教授想象的斯拉夫人是谁？是什么？在哪里？东欧只有斯拉夫人居住吗？波兰人、捷克人或塞尔维亚人就没感到获得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吗？波兰语不是在德语之前就发展为一种政府的和具有高度文化的语言吗？布拉格（Prague）（1348 年）和克拉科夫（Cracow）（1364 年）的大学是属于“东方”吗？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吗？

正好对于一种民族主义类型学有许多东西可说，它以文化发展的各种进程与民族性和国家性质的不同相互关系为基础。但没有听说给它戴上“东方”和“西方”标签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他会发现东方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最好候选者可以在西欧的最西面爱尔兰找到。正如

每个人都知道，爱尔兰人（Irish）是东欧的典型产物（见原书第 5 章，第 820—821 页，第 829—831 页）。

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化中的结构是如此经常地讨论，因此人们不必质疑所提供的资料的上佳质量。要讨论的问题是探询为什么这个结构会设计得如此奇怪。如果人类解剖学的教科书用与比重相同的重点构成，人们就注意到一个只有一片脑叶，一只眼睛，一只手臂，一个肺和一条腿的怪物。

这个主题的年代学也是具有启发性的。“西方”这个观念像希腊人一样古老，他们将“自由的希腊人”（Free Hellas）看作波斯人（Persian）统治下的专制主义的东方的对立物。在近现代，它被一长系列政治利害关系采用，希望增强他们的同一性，并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邻居分离开来。结果是“西方文明”被赋予了一层又一层的意义和内涵，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这里举出十几个主要的变种：

罗马帝国　它远远延伸到欧洲半岛以外，虽然如此，它给欧洲的发展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到现在这些国家有着清楚的区分，如法国或西班牙，它们曾经构成帝国的主要部分，而波兰或瑞典这些国家是罗马人从未到过的。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就成为与那些宣称为罗马遗产的一份的欧洲部分相联系，以与那些不能宣称如此的地区区分开来。(见地图 3)

基督教文明　它的主要基础是在欧洲奠定的，从公元七世纪起由与伊斯兰教的宗教边界所确定。(见第 4 章)。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伊斯兰教是东方。

天主教会（Catholic）世界　它建立在罗马与希腊教会分歧的传统上，特别是在公元 1054 年的教会大分裂（Schism）之后，并建立在使用拉丁语作为共同语言上。依这种说法，西方与天主教是等同的，[23] 在那里教会与世俗权威经常分离，促进了一系列打破传统规范的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见第Ⅶ章)，这些关键性的运动没有一个对东正教世界有早期影响。

基督新教（Protestontism）　它给予西方文明在北欧的一系列国家一个新的焦点，它们于十六世纪从天主教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像西班牙和波兰那样主要的天主教强国的迅速衰落，伴随着尼德兰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英格兰、瑞典及后来普鲁士（Prussia）的兴起，在那里海军和陆军的杰出战绩是靠经济和技术上的实力来支持的。

西方文明的法国变种　它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获得了突出地位。它在启蒙运动的世俗化哲学和1789年大革命的理想中得到了表达。两者都有着持久的影响。法语被德意志和东欧受到教育的精英（élites）接纳，使法语的应用比较早拉丁语统治时期更为普遍。

西方文明的帝国变种　它是以1914年以前长期的"欧洲和平"时期，主要的帝国列强无限的自信心为基础的。它是由上帝赋予"帝国种族"统治其他人的权利的信念所激发，还有他们所认为的在文化上、经济上、制度上发展的优越性。德国、英国和法国是明显的领袖，他们的偏见能够给其他人影响。其他的主要帝国拥有者，如葡萄牙和荷兰（Netherlands），是较小的欧洲内游戏参与者。俄罗斯与奥地利是有影响力的帝国列强，但是在其他方面达不到标准。因为西方的富裕帝国俱乐部是以它先进的工业经济和精密的行政体系为标志的，而在东欧的标志是农民的社会，没有国家的民族和不完备的独裁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它是帝国变种的一个镜中映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这个前提，西欧的帝国主义国家达到了高水平的发展，但是他们相信西方的早熟结果会是早来的衰退和革命。他们的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被重视。但是在一段时期中却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没有料到地被采用作苏维埃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德国变种　它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鼓动起来的。它依据的是"中欧"（Mitteleuropa），特别是奥地利，它希望在军事上打败法国和俄罗斯，再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强国分享将来的伟大。它的鼓吹者对德国在东欧的文明化使命毫不怀疑。而他们与法国的对抗，和他们对自由主义和"1789年理想"的[24]排斥，导致在"西部"（Abendlich，Occidental）和"西方"（Westlich，Western）之间的区分。这种计划的政治公式最密切地与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最密切的联系。它的消亡由于1918年德国的战败而注定。斯宾格勒（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中对此表示哀悼（1918—1922年）。在世俗文化领域，中欧（Mittel－europa）的时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强大的犹太人（Jewish）因素的渗入，它离弃东方，它融入德国的生活和语言正好与德国帝国野心达到高峰的时期相一致。[68]［维也纳

世界]

西方文明的 WASP（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新教徒）变种（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是美国历史形成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群体）是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的美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共同利益而结出的果实。它依据的是美国那时精英的亲英派倾向，基于有着共享的基督新教，议会制政府和普通法传统，反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对特殊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展望，英语此时开始获得成为国际交往主要用语的首要地位。尽管美国人蔑视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它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帝国列强是平等的。它最明显的文化纪念物在“伟大的著作计划”（1921 年）和接管《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可以发现。它的战略推论被“地缘政治学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和其他人系统化，并在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早期的表现。它在 1941 年美国回到欧洲和签订“大同盟”（Grand Alliance）后全力复兴起来。它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以“大西洋中部”为中心，随着不列颠帝国崩溃和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兴起，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但它留给不列颠一种“特殊关系”，它帮助了“北约”（NATO），并妨碍了欧洲的统一。它鼓舞了一个有特点的“历史联盟计划”，它在二十世纪的余下时期保持着统治地位。(见下文)

第二次德国变种　它是由纳粹党人（Nazis）策划出来的，恢复了第一次德国变种的许多特点，又加上了他们自己的。在原有的军事和战略考虑之上，又加上了“雅利安”（Aryan）种族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教神话和反布尔什维主义（anti - Bolshevism）。它成为第二次谋取欧洲霸权的根据，开始于 1933 年，在 1945 年以毁灭结束。它特别排斥犹太人。

西方文明的美国变种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围绕着接受美国领导，奉迎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想的一系列国家结合而成。它从较早的盎格鲁—撒克逊变种成长出来，但已脱离了它的欧洲起源。它不再依靠美国社会的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新教徒（WASP）优越地位或不列颠作为美国在欧洲代理人的中心地位。确实，它的重心不久就从“大西洋中部”移到“环太平洋圈”（the Pacific Rim）。加上西欧的“北约”成员，它像“西方”那样得到如日[25]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南非、以色列甚至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支持。在“冷战”的 40 年中，它为共产主义世

界范围的威胁的观念所激发。它们奇怪它能够如此长久地继续称自己为“西方”。

西方文明的欧洲变种　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现于锻造一个新的（西）欧洲共同体的努力之中。它以“铁幕”的存在，法国—德国的和解，对海外帝国的排斥，“欧共体”（EEC）的物质繁荣，限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影响的愿望为依据的。它追溯到查理曼（Charlemagne），并指望一个联合在它的创建成员领导下的联邦欧洲。只要这个共同体将其主要活动局限在经济领域，它与美国人另一种模式的“西方”，或美国领导的“北约”就不是不相容的，这为它提供了保护。但是联合国的加入，“铁幕”的崩溃，更密切的政治与货币联盟的计划，其成员向东扩张的前景，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在认同性和目的性上都引发了深刻的危机。

从所有这些例子中看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的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在意识形态上，无数的认同过程中，在文化宣传上精心撰写的文章和复杂实践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他们认为适合的几乎任何方法定义。它有伸缩性的地理范围一直由各宗教的分布，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要求，现代化的不平等进程，由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造成的分裂的影响，由法国哲学家，普鲁士历史学家，不列颠和美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教育家的意向导致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理由忽视或藐视“东方”。在它最后的阶段，它被欧洲实质性的分裂大大加强了，这种分裂从1947—1948年延续到1991年。在面临二十一世纪时，人们有权要问，在将来它可以用来为谁的利益服务。

一系列说法不时反复出现。第一种是坚持无论西方和东方怎样定义，几乎或是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第二种的意思是欧洲的划分是由自然的和不可逾越的分歧为正当根据的。第三种认为西方是优越的，第四种认为只有西方配得上欧洲这个名称。这种地理假定是由一种更为明显的政治性质的选择性构想促成的。被采用的西方文明的每个变种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和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边缘。大的强国总是能得到注意。失败的强国，较小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民族，少数人的文化，弱小的经济都不必考虑，即使它们在全部的史实场景中占据着很大一部分。

有四种手法一直被用来表达所需的效果。使用一种简约的手法，[26]人们可以将欧洲史压缩为一个故事，描述当代关心的最重大的题目的起源。使用排除法，人们可以去掉所有相矛盾的资料。使年代错乱，

人们可以按类别陈述事实，认为现在的各集团是历史事件持久固定下来的产物。使用强调的和热情的语言，人们可以指出什么应予赞扬，什么应当悲叹。这些是普遍的宣传手段。它们贬低欧洲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变的模式。它们拒不接受由充分的历史记录得出的解释。它们将不自觉的读者们带进一个相互吹捧的社会。

使时代错乱的手法是特别狡猾的。通过将短暂的当代分界如“铁幕”作为“西方”或“东方”的持久定义，人们必然会歪曲对较早时期欧洲的任何描述。波兰从文艺复兴起被干脆删除，匈牙利从宗教改革时起，波希米亚从工业化起，希腊从经历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占领起都是如此。更严重的是，人们错误地估量了外交家、商人和学者，删掉了欧洲一大部分真正的历史人物，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就欧洲史的作品而论，这是西方文明的宣传家们最想要强调的，每个人的目录都是不同的。在二十世纪初后期，许多人愿意显示宗教宽容、人权、民主政府、法治、科学传统、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性。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和优越的基督教道德，如怜悯、慈爱和对个人的尊重。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真实代表欧洲的过去是可争辩的问题。不难拟出一份相应的目录，以宗教迫害开始，以极权主义对人类生命的蔑视结束。

如果欧洲优越性的主流宣称者无疑出自西方，不应忘记并不缺少来自东部的相反的宣称者。正是德国曾经反对法国启蒙运动，而东正教会，俄罗斯帝国，泛斯拉夫运动和苏联都反对过更强大的西方，并产生了宣称真理和未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一再主张，虽然西方也许富裕和强大，东方则摆脱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腐败。

在共产主义统治东欧的最后年代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题目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变种。他们在苏联集团的政权和其人民的信仰划出一个基本区别。他们感到自己较少受到西方无意识的唯物主义的传染，并认为共产主义的压迫增强了他们对欧洲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盼望在一个欧洲重新联合的时代，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欧洲性”换取西方的食品与技术。这也是明智的想法的另一种运用。

在确定西方文明和欧洲历史之间的不同时，从幻影中筛选出真实不是件容易的任务。要发现对西方文明歪曲是从哪里来的，历史学家[27]们必须将一些事情放在其应有的地位上。答案看来是在于达到全面考察的目标，也就是写遍欧洲的东、西、南、北部；注意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描述可赞美的、悲惨的和平庸的事物。

虽然如此，没有历史学家能否认，有许多真实的和重要的地图上

的界线有助于将欧洲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也许最持久的界线是在天主（拉丁）基督教和东正（希腊）基督教之间。从我们时代的最早几个世纪起它就一直处于适当的地位。正如南斯拉夫崩溃时期的事件所显示的，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件中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界线。有一条罗马帝国边界（Limes）的界线，将欧洲划分为有着罗马历史的地区和没有它的地区。有一条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界线。在更为近代的时期有一条奥斯曼帝国的界线，它区分出巴尔干数个世纪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的地区。更新近的是有存在到 1989 年的“铁幕”。(见地图 3)

不那么确定的是社会科学家们从他们自己训练的标准为基础发明的划分。例如，经济史学家们看到了一条分离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东方农民社会的界线。[**资本主义农业**] 历史人类学家们指出了一条由列宁格勒（Leningrad）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界线，被认为是用以区分核心家庭与扩大家庭地带的。[**大家庭**] 法律史学家探查出一条界线，区分采用与没有采用罗马法形成的地区。宪政史学家们强调划分着自由、民主传统和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之间的界线。如上面已提到的，政治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条划分“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界线。[70]

所有这些真实的和想象的界线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表述和写作的框架。它们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致一些评论家可以轻蔑地谈论一个西方的“白欧洲”和一个东方的“黑欧洲”。因而将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两半不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人们必须断定，这种东西方的划分从来不是固定或持久的。并且，它粗暴地践踏了其他许多有着同等重要性的划分界线。它忽视了在西方内部和东方内部严重的分歧。它也忽视了南方与北方之间明显的，历史性的划分。任何称职的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在估量到充分范围的因素时，只能推断出欧洲不应划分为两个，而是五个或六个区域。

类似地，没有称职的历史学家打算否认，欧洲在它的各种外表下，总是拥有一个中央的核心与一系列扩张的边缘。欧洲各民族迁移得又远又广阔，人们可以认为在很真实的意义上，欧洲的边缘处于沿着连接旧金山（San Francisco）与布宜诺斯艾利斯（Bnenos Aires），开普敦（Cape Town），悉尼（Sydney）和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的一条线上。而核心的组成是什么，又不可能有简单的定义。不同的训练得出不同的分析。他们将他们的研究结论的基础放在欧洲的地理[28]半岛上；放在印欧各民族的欧洲分支的种族传承上；放在基督教世界的文化遗产上；放在由“欧洲和谐”成长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上，或在经济学家掌握的世界经济的增长上。

但是要达到全面讨论的目的，有关所有这些定义重要的事情是，任何一个或每一个定义都包含着地区方面的多样性。不管从哪里或什么地方作为核心，它联系着埃布罗河（Ebro）、多瑙河（Danube）与伏尔加河（Volga），如同罗讷河（Rhône）与莱茵河（Rhine）；它联系着波罗的海与黑海，如同地中海与大西洋；它联系着波罗的人（Balts）与斯拉夫人，如同日耳曼人（Germanics）与凯尔特人（Celts）；它联系着希腊人如同拉丁人（Latins）；它联系着农民如同无产阶级。尽管它们有不同，欧洲所有地区有着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它们居住着主要是印欧文化及与其有相关亲缘的各民族。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继承者。他们被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合与相互影响联系起来。尽管他们自己之间有着敌意，他们分享着对外来影响的畏惧与渴望，不管是来自美洲、非洲或亚洲。他们基本的一致性比起他们明显的多样性同样显而易见。

西方的优越性是那些在欧洲历史上有些地方适用而其他地方不适用的教条之一。它不适用于较早的世纪，例如当拜占庭远比查理曼（Charlemagne）帝国先进时（这解释了拜占庭为什么经常被忽略过去）。它适用于较近时代的许多领域，当西方明显的比东方更富裕和更强大时。而许多人会认为，西方人在二十世纪的犯罪行为摧毁了所有以前所称道的东西的首要基础。

因而“欧洲”这个题目，就像它较早的标签“基督教世界”那样，很难以它几个地区中的一个来冒充全部。东欧即使是贫穷的、不发达的，或被暴君统治的，依然是欧洲的。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它受到剥夺，它变得更为欧洲化，更依恋于富裕的西方人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价值。东欧也不能因为它是“不同的”而被排斥。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不同的。所有西欧国家是不同的。而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跨越了这种划分。一个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也许与德国或不列颠很不同，但是波兰的经历对于爱尔兰或西班牙而言，要比许多西欧国家互相之间接近得多。像希腊这样一个国家，许多人因荷马（Homer）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优秀价值而认为是西方的，并被接纳进欧洲共同体，但是它在近现代形成的经历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世界中，他们与西欧国家的距离要比那几个发现自己处于“铁幕”中错误的方面的国家要遥远得多。

几乎所有“西方文明”的故事都确实有一部分邪恶的性质，是由于它们被理想化地呈现出来，因而本质上是关于过去的真实的一幅虚假图画。他们抽取一切可以被评价为适宜的令人难忘的事物，并且漏掉任何看来是庸俗或令人讨厌的事物。实在恶劣的是他们将一切积极[29]的东西归功于“西方”，并对“东方”进行污蔑。而他们甚至没有给

西方以诚实的叙述。从一些教科书来判断，人们得出突出的印象是，在西方的每个人都是天才、哲学家、先驱者、民主主义者或圣人，是一个完全由柏拉图（Plato）与玛丽·居里（Marie Curies）这样的人居住的世界。这样的理想化传记不再可信了。欧洲文化的既定信条无可救药地亟待修正。关于“西方文明”的夸夸其谈有使得说了太多好话的欧洲传统名声败坏的危险。

在美国，关于西方文明的争论集中在美国教育的变革需要上。在近些年来，它似乎被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的需要所推动，也被那些不是源自欧洲或以欧洲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的美国人所推动。总的来说，它没有重新检验欧洲的遗产，没有类似于“大著作计划”那样的推销，它也没有被欧洲后裔的美国人更公正地介绍欧洲的要求打扰。在那里西方文明的课程被抛弃了，它们由于有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被排斥，而不是因为对欧洲有限的视野。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世界史教程取代，这被断定为更适合于美国对当代“西方”的理解。

一个宣传得很好的反对“西方文明”缺点的运动要取消它。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Stanford）大学在1989年起了带头作用，设立了一项“文化、理念与价值”课程以暂代以前的“西方文化”基础课程，从此成为所有新生的必修课。据报道，大学当局屈服于“嘿—嗬！嘿—嗬！西方文化必须走开！”的呼声。对维吉尔（Virgil）、西塞罗（Cicero）、塔西陀（Tacitus）、但丁（Dante）、路德（Luther）、阿奎那（Aquinas）、莫尔（More）、伽利略（Galileo）、洛克（Locke）和密尔（Mill）的阅读被里戈韦尔塔·曼楚（Rigoberta Manchu）、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胡安·鲁尔弗（Juan Rulfo）、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文章摘录取代。（他们中没有一个沾染“该死的白种欧洲大男子主义者的污点”。）[71]这个事件格外具有讽刺性。斯坦福可以为看到一个问题并企图抓住它而感到自豪。但麻烦在于这种矫治也许结果比弊端还要糟。在理论上，据说将“多元文化论”与“种族多样性”引入美国学术界作了许多事。遗憾的是没有知名的西藏（Tibetan）的塔西陀，非洲的阿奎那，墨西哥的密尔供学生们学习。确实，在任何有记录的非欧洲文化中，没有很多可以描述美国所想象中的自由传统。[72]

在对斯坦福关于西方文化的计划受到欢呼的时候，与其相应的欧洲历史课程却逃脱了注意。但它们是以同一个模式塑造的。例如，为“欧洲Ⅰ、Ⅱ与Ⅲ”计划选择的39项读物中，显示出这种具有深远含义的选择的印记。除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科热尼奥夫斯基（Korzeniowski），没有一个来自东欧的作者［康拉德是因为他关[30]于非洲的小说被包括在内，如《黑暗的心脏》（Heart of Darkness），而

不是他有关东欧的写作]。除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没有一个作家与凯尔特（Celtic）世界有何种联系（阿诺德包括在内是作为英语的批评家和诗人，而不是作为凯尔特文学教授）。没有一位意大利作家比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死于1528年）更近代。有一位南非的小说家，但没有一位爱尔兰的，没有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除了德国人外没有一位中欧的，没有一位巴尔干国家的，没有一位俄罗斯的。最奇怪的是对一个历史系而言，没有一篇比希罗多德（Herodotus）更晚的历史文献。[73]

公平地说，选择总是必需的，总是困难的，也总是不能满意的。斯坦福的窘况不是惟一的。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的选择形式是由世界上最昂贵的学术中心之一实行的，是更广泛的影响的显现。它声称要介绍“欧洲”，但是只介绍了欧洲大陆的一小角。它声称要介绍“西方遗产”，这是它的教科书的题目，但它没有触及许多西方的事物。它声称对欧洲的“文学与哲学方面”予以强调，但强调的只是欧洲文化的部分片断。它没有提到乔伊斯（Joyce）、叶芝（Yeats）、安徒生（Andersen）、易卜生（Ibsen）、克尔恺郭尔（Kirkegaard）、卡夫卡（Kafka ）、克斯特勒（Koestler）、昆德拉（Kundera）、索尔仁尼琴（Solzhenitzyn），甚至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没有商品说明法案会批准一种产品，它的成分目录竟缺少那么多基本项目。

没有动物园能包容所有的动物。但同样地，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动物园会只限于收集猴子、兀鹰或蛇。没有哪个公正的动物学家可能赞同一个爬行动物馆冒充一个旅行者公园，只包括有12条鳄鱼（两性都有），11条蜥蜴，1只渡渡鸟和15只树懒。无论如何，斯坦福很难说是惟一这样做的。到1991年，据国家人文学科基金被引用的一项估算，学生们不用学习西方文明的课程，就可以在78%的美国学院与大学毕业。[74]事实上，人们会怀疑这个问题在欧洲研究的论题中还没有那些呈现这些东西的人们的见解重要。像“大著作计划”那样的许多美国课程，是指导特定的美国青年人一代的，他们极为迫切地想学习他们移民祖先失去的遗产一个简化的文本。现在，它们明显地需要改变以配合有着不同观念的新一代人。阅读有关欧洲的东西，如果掺加了一些它不那么愉快的方面，就会引起少一些憎恶。聪明的学生在一些事情被隐藏时总能意识到，这时它们所期望的不是被理解而是赞扬。

一些美国的少数民族确实有驳斥欧洲中心论的根据。若是如此，美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的起源绝大多数是欧洲的，是选择从另外的立场排斥“西方文明”的。许多美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如爱尔兰人、西班牙人、乌克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他们来自的那些欧洲

地区在“西方文明”现存的综述中几乎找不到位置，他们有各种理由期望改进。

然而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很大矛盾在于这个事实，被西方文[31]明的美国变体最珍视的美德——容忍、思想自由、文化多元主义，现在看来处于最受惠于它们的民族的攻击之下。批评家观察到“美国精神的终结”。[75]自封的“自由派”显示出在追求一种“思想狭隘的教育。”[76]六十年来，“大著作计划”的作者还自诩于“美国精神的开放”，宁可严厉指责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而不是变更他的规定内容。[77]这种争论也许报道得过分了，但是美国向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看来正在败给那些喊叫得最响的院外活动集团和压力群体。

谨慎地说，历史不是如“西方文明”的热爱者所希望的那样预先设计的。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欧洲统治的信仰者。斯宾格勒（Spengler）如他正确地记录了西方的衰落那样，也错误地相信俄罗斯未来的霸权。但是这些理念延续了下来，它们最终的失败还没有发生。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他们已丧失了以前的活力。他们被两次世界大战和丧失海外帝国所伤害。他们将会明显地以美国作为最后的立足地。

因为只有在美国“西方文明”的真正源泉仍在流动，自从苏联帝国在 1991 年崩溃，美国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惟一继承者，也继承了其态度的许多方面。它也许不是一个旧式的帝国，但它留有“白种人的负担”。像在它以前的帝国主义欧洲那样，美国为维持世界秩序而斗争，而在它自己的疆界内进行着种族和民族斗争。像今天的欧洲，它急需一个统一的神话，以超越单纯的民主与消费主义已经衰退的吸引力。不像欧洲，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在它自己面前没有经受战争的冲击。

绝对大多数的美国人的根在欧洲。他们采用了或适应了英语和建国祖先的欧洲文化，并经常是用创造的方式。而这些欧洲美国人从来不会从亚洲或非洲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或从总体上研究世界。为了掩盖他们自己，他们深切地需要与欧洲遗产拉上关系。为了成功地这么做，他们必须对欧洲历史的观点从它以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欧洲的榜样毕竟显示了些什么，它显示出相信“西方文明”的决定性主张是一条必然走向灾难的道路。

欧洲过去最伟大的智者们不为东方与西方这种人为的分离费什么话：

Gottes ist der Orient!

Gottes ist der Okzident!
Nord – und südliches Gelände
Ruht in Frieden seiner Hände.

（上帝是在东方，上帝是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土地平安地待在上帝手中）。[78]

民族历史

在近现代，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研究它自己的国家的历史比研究欧[32]洲整体史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使这些部分看来比整体更重要。语言的障碍，政治的利益，与最小抵抗的路线有助于使国家的历史编纂学的统治地位永久化。相伴随的还有这种态度。

这个问题在大不列颠特别尖锐，在那里旧的惯例从来没有被政治的崩溃或国家的失败颠覆。直到最近，不列颠历史总的来说是作为与欧洲历史相分离的题目，它需要分别种类的专门知识，分别的课程，分别的教师和分别的教科书。传统的岛国狭隘性对于另一个广泛传播的传统，即将不列颠历史与英格兰历史等同是一个适合的伴侣。（只有最爱恶作剧的历史学家才会费心提出，他的英国史只是指英格兰。）[79]政治家们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这种错位的等同。在1962年，当反对不列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女王陛下的反对党的领袖觉得能够宣称其十分错误，因为这样一个步骤会导致"一千年不列颠历史的终结"。[80]英国人不只是狭隘的岛民，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来没被教授过他们自己诸岛的基本历史。

类似的态度在大学里盛行。可称誉的例外无疑是存在的。但是不列颠最大的历史专业直到1974年才开始教授"不列颠史"，甚至那时其内容仍几乎完全是英格兰的。学生们很少学到任何关于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东西。当他们参加"欧洲历史"考试时，他们面对的是少量有关东欧的选择题，并没有一道有关不列颠的。其后果只能是一种世界观，英格兰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外国的。[81]这种基本上是荒谬的臆说，如一位持异议者所写的："在不列颠历史中一切有重要性的事情都可以从不列颠的原因中去解释。"还有"根深蒂固的，没有削减的"不列颠"（实际是英格兰的）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分离，……出于一种狭隘的视野，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阻碍性文化因素。"[82]据另一位严厉的批评家说，传统的结构，神秘的研究和过度的专业化的结合，使不列颠历史落到"支离破碎"的地步。他在明智地

移居外国之前写道："在大学像在学校中那样，历史提供一种教育的信念……几乎消失了。"[83]

在不列颠的大学里教授的文化史通常紧紧团结着一个狭隘的、国家的中心。对国家根源的旧式研究有着明显的偏好，处于广泛的国际比较之上。例如在牛津大学，对于所有英语专业学生一本惟一的必修科目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贝奥武甫》（Beowulf）[84]。直到最近在牛津的近现代史专业（原文如此），一个惟一的必读书是七世纪的拉丁文本，圣徒比德（Venerable Bede）的"英吉利教会与人民史"[85]。

[33] 同样奇怪的状况无疑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例如在德国，大学遭受了"学术自由"的洪堡（Humboldtian）原则造成的后果。德国历史学教授据说自由地教授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德国学历史的学生们自由学习从他们的教授提供的菜单上选择的任何东西。在大多数大学，惟一的规则是每个学生必须至少选一门古代史课程、一门中世纪史和一门近现代史课程。在德国国家施加巨大压力的时代，同情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授们故而就自由地用大剂量的德国民族史添加到菜单上。（又一次回到条顿族各部落。）在较近的时代，当国家不愿意干涉时，他们就自由地设计一个菜单，学生们若希望的话可以完全避开德国民族史。

民族偏见的问题也许在学校教科书与通俗史的领域最好的观察得到。历史学家们越是必须压缩和简化他们的资料，就越难掩饰他们的偏见。这里需要略加评论。

在一方面，可以认为当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教育传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味道。在它于十九世纪发源时，历史教育被纳入为爱国主义服务。在它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内容比人名、年代和统治王朝的名称的一份花名册好不了多少。由此它发展为一种国家的英雄，胜利和成就的叙述。[布布莉娜] 在它最极端的形式中，它被精心设计用来训练学校的儿童，使他们将来在国家的战争中充当杀人者和死伤者的角色。[86]在另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的历史教学没有经受过挑战是不正确的。一直有一股长长的反潮流，企图教导灌输对更宽广视界的认识，在 1945 年以后至少在西欧，做法基本上改变了。[87]

一本著名的关于"现代史"教科书，于 1889 年在奥地利统治的加里西亚（Galicia）出版，直接对抗民族主义时代的傲慢。这本书是为波兰语的中学设计的，它的作者是来自华沙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不能在当时处于俄罗斯统治下的故乡自由出版。他解释了这种重要性：

在现代的斗争和成就中，各国不是以他们自身而是集体地行动。它们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集团和联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使用

“共时方法”，也就是讲述在既定时间所有这些国家参加的事件。这样的整体史不能体现所有包括在内的国家的完整画面，而……它们个别的历史……必须归属于特有的、国家史的（类别）。[88]

结果是在这本书里，第一卷包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648年这个时期。哈布斯堡（Habsberg）王朝与波兰的事件确切地各占71页和519页。作者对“波兰”与（“波兰—立陶宛—卢坦尼亚—普鲁士）（Polish – Lithuanian – Ruthenian – Prussian）国家之间作了仔细的区分。学生们可以学到“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宗教改革”的某些细节，如同有关伊斯兰人与奥斯曼人（Ottomans）的某些细节那样。地理范围从葡萄牙[34]的航海发现延伸到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对喀山汗国（Khanate of Kazan）的征服，从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在爱丁堡被推翻到查理五世（Charles V）远征突尼斯。[89]这卷书在非民族主义的标准上，比许多仍出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家的书水平还高。[90]

也要公平地说，近年来一直在做协调的努力，来清除教材中错误信息较为明显的形式。双边的教科书委员会对于如军国主义、地名和历史地图，单方面解释这类事情做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学者们与教师们也许比以前更加认识到这些问题。[91]分析到底可以看到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是宇宙式的探讨，那些历史学家希望写出，学生希望学习到有关所有时代世界的所有部分。另一个极端是狭隘式的探讨，在那里注意力限于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国家。宇宙式的探讨有广度，但缺乏深度。狭隘性的探讨可能有深度，但缺乏广度。理想是必须在广度与深度之间想办法对得失进行权衡。

因此，人们必须承认，苏联集团国家中央计划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有时比他们西方相应的东西更成功。尽管其实际内容倾向于可怕的沙文主义和意识形态化，它的年代与地理框架常常是令人称赞地全面。所有苏联的学校儿童必须刻苦读完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获得原始社会、古典古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从1917年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苏联的历史教程坚持对俄罗斯与俄罗斯人的主导历史作用给予优先地位。在同时，甚至在斯大林主义那最恶劣的年代里，任何标准的苏联教科书都对古代希腊人，斯基泰（西徐亚）人（Scythians）和罗马人，对高加索人（Caucasus）的历史，对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与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帝国，对喀山（Kazan）或克里米亚（Crimea）的穆斯林国家都会给予篇幅。人们在欧洲最全面的历史中也不会找到这些事情。

在英格兰正相反，那里的历史教学大纲大部分由各个学校与教师决定，其年代上和地理上的框架倾向于极端狭隘。甚至高年级学生在

学习高水平的历史时，经常局限于如“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The Tudors and Stuarts）或“十九世纪的不列颠”这样的标准课程。[92]

地方史对有一些这些两难处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它利用熟悉的与切切实实的东西，鼓励个人的探索与研究，而它相对而言能抵抗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它很适合于如家庭这样的题目，它容易被学校儿童理解，却被专家们用作广泛的国际理论化的基础。[93]在天平的另一端，世界历史一直在大学和学校中发展。它有强有力的论证，即它有利于教育必须在“地球村”找到他们的位置的一代人。[94]它的批评者认为，就像一些人对欧洲史的看法那样，它的内[35]容的单薄分量抛弃了一切，只剩下它最能干的实行者所进行的没有价值的概括。

自然，一种狭隘性给另一种广泛性提供了机会。年代上与地理上变量的狭隘使得教师们能够宽泛运用各种技术和视角，在所选择的领域内进行探索。总的来说，英格兰的学生们在学习史科上，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在政治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上，在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的技艺上相对有较好的基础。在这方面他们的历史教育是有长处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们的学习研究局限在世界上最小的大陆的 38 个主权国家之一，还只是其三分之一，又是其全部历史进程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这确实存在着某种错误。

国家偏见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不再将历史当作国家政治的工具时才能消失。在 1800 多年以前希腊作家琉善（Lucian，120—180 年），劝告说“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中应该忘记他的民族属性”。这是一个正确的劝告。在较长的时期里，真正定义上的欧洲史也许会由一位中国人，一位波斯人（Persian）或一位非洲人来写。有着一些好的先例：一位法国人曾写过对维多利亚（Victorian）女王时期英格兰的最好介绍，一位英格兰人现在确立作为主要意大利史学家的地位，而惟一一部予所有四个民族以相称的分量的不列颠史综述是由一位在美国的流亡者写的。[95]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以“从欧洲人的观点”写作历史为目标的尝试得到普遍的欢迎。有些历史学家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进行了求助于欧洲的基督教基础的尝试。[96]。但是道森的天主教理论没有说明近几个世纪的多元化，也没有说服他的主要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WASP）的读者群。其他人以探寻欧洲统一的趋势作为任务。[97]这方面的困难是内容的目录格外地短。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在历史作为一种系统性科学写作的整个时代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史被允许占主导地位是出于缺乏其他选择。这也许令人遗憾，但它反映了一个欧洲在近几个世

纪以来一直深刻分裂的真实状况。自从基督教世界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破碎以来，欧洲就没有统一的理念。历史学家不可能妄想其他情况。像一些分析家对美国的理解那样，欧洲这幅镶嵌画的每一片都像这个熔炉那样重要。

因而就一切可能性而言，要有一种可以表达和接受的令人满意的欧洲综述仍为时过早。民族感情仍大量存在。国家史不能简单地被抛弃，如果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同会任意地淹没在"一些浅薄的欧洲历史中"，就会是一种严重的歪曲：

> 欧洲历史也许多于它各部分的总和，但是它只能建立在以充分研究那些部分的特性的基础上。……看起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家史；但是"泛欧洲史"是不能轻易做到的。[98]

这是明智的忠告。言外之意是重塑欧洲历史必须伴随着一个更广[36]泛的欧洲共同体的建设慢慢进行。两者都不会在一天建成。

不幸的是，民族的偏见消亡得很慢。在 1605 年 4 月，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因国王个人而联合后不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给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写信，建议"编写一部两个民族公正而完整的历史。"他的希望一直还没有得到认可。用少数试图提出不列颠的认同问题的不列颠历史学家之一的话说，"对有关不列颠的本质提出根本性问题有根深蒂固的厌恶，这仍会持续下去。"[99]

两种失败的幻象

在二十世纪，由于民族主义的盛行，没有助长国际主义的历史。但为克服这种流行的划分作了两种强有力的尝试，并为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欧洲历史的幻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框架。两种尝试都失败了，并注定要失败。

在这两者之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欧洲历史幻象首先开始并且持续得最长。它出自马克思主义，却忽略了它的精神与目的。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变成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工具之一。在它的初始阶段，1917—1934 年，在它的热衷者如 M.N. 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y)（1868—1932 年）的倡导下，它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气味。波克罗夫斯基完全接受了历史是"面向过去的政治"，他热情地投身到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写道："大俄罗斯是建立在非俄罗斯各民族的骸骨之上的，在过去，我们俄罗斯人是地球上最大的掠夺者。"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拒斥俄罗斯的帝国传统是该诅咒的。从

1934年起，当斯大林对历史教学的命令生效时，方向就突然改变了。波克罗夫斯基死了，他那些不认错的同事们大多数被枪杀了。他们的教科书被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与极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有害混合，由苏联所有的意识形态机关在此后五十年提供。[100]

这种共产主义的历史学的两个因素本质上是矛盾的。它们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救世主式的教条结合在一起，没有人能公开提出疑问。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被包含在著名的“五个社会阶段模式”中，即从史前时代导向1917年革命。俄罗斯的因素被断言为，俄罗斯民族被赋予作为苏维埃各民族“老大哥”与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使命。而列宁自己承认，苏维埃俄罗斯还没有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先进。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创建并播下了世界革命的种子，在资本主义最终衰亡时期坚守社会主义堡垒，最终继承全地球。在这期间，社会组织与经济计划的优越的苏维埃方式会确保[37]不久就迅速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确实作为教科书的最后一章，总要强调在从军事力量到生活水准、技术、环境保护一切事情上，苏联都在潮流的前面。社会主义（如共产主义经常的称谓）的最后胜利被当作是由科学证明和不可避免的。

尽管它空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苏联人的历史思想尊重“欧洲中心论”，并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尊重“西方文明”。它的欧洲中心论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论证为基础的欧洲各个例证的来源中，与对欧洲方式的工业化的狂热追求中得到了表现。它特别露骨地强调寄托于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苏联人在这最后一个论点上的傲慢触怒了它们帝国中的欧洲成员，对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们造成了一种混乱的影响，是中国—苏联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眼中，在1950年代出现的一群群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比起他们知道的以前的“外国鬼子”人潮来，表现出一种更坏的欧洲人的傲慢自大（和坏的机器）。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波罗的人（Balts），波兰人（Poles），或格鲁吉亚人（Georigians）那样，俄罗斯人对他们自己优越性的信仰是异想天开。如果说俄罗斯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习惯于自己是“西方人”，他们在与欧洲人的主体的关系上明显是“东方人”。

无疑苏联共产主义宣称“西方”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同时它不否认它自己的根位于欧洲。列宁最热切的希望是将俄国革命与所期望的在德国的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西方文明”不都是坏的。确实，主要的西方人物只要他们死了，就能容易地得到崇拜。其要旨是：西方已走向衰落，而东方在英雄的无产阶级手中，保持了活力和健康。早晚资本主义各国政权会衰亡，社会主义祖国会给它们最后一击，边

界将会瓦解，东方将会在苏维埃俄罗斯的领导下以一种新的革命兄弟关系联合起来。这就是列宁的梦想的，也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谈到“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时心里所想到的。[101] 这种共产主义的救世主使命的观点以各种当地的变种出口到苏联控制的所有国家。在它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领域，它谋求灌输两个根本的教条——“社会经济力量”的首要地位与俄罗斯扩张的仁慈性质。苏联在1941—1945年打败德国被大加吹嘘，到1980年代晚期还被作为福音教授给几千万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就在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末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重提了“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的口号。[102]它被许多外国评论家所理解并受到广泛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时间解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从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到堪察加（Kamchatka）（如同相邻的阿拉斯加＜Alaska＞）那样对欧洲人而言遥远的半岛）的帝国的独裁者。也许戈尔巴乔夫的梦想可能是一个环绕地球的更大的欧洲？

敌对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开始得较晚，兴盛期更短。在某种[38]程度上它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回应成长起来的，在纳粹党人（Nazis）的手中变成了他们“新秩序”的工具。在它的初始阶段1922—1934年，它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包含有某种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为意大利的变种与墨索里尼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所支配。从1934年当希特勒开始再造德国时，方向突然改变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清除了。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种成为主导，明显的种族主义表现了出来。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种族主义和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有害混合物，在纳粹帝国（Reich）存在期间一直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机关服务。[103]

尽管纳粹与苏联是敌对的，纳粹意识形态与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并非完全不同。它断言种族因素将特殊使命赋予了被认为是白种雅利安人（Aryan）最有活力和健康的分支德意志人，德意志帝国的生存环境被断言遭受了凡尔赛（Versailles）和约罪恶的“单方面强加的苛刻条件”（Diktat），而德国被认定有恢复其领导地位的权利。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计划，以使纳粹的力量遍布全欧洲，并最终超出欧洲之外。这些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在意大利，他们的民族主义总是具有强烈的反德国调子。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时间去自行发展了。

纳粹的历史思想包含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曾经有过的最极端形式。“统治者种族”等同于雅利安欧洲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他们是惟一的真正人类，历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所有非雅利安人（非白人和非欧洲人）被归类为在遗传上低劣的，被置于“次人类”（Untermenschen）的低等类别。在

欧洲内部建立了生物学优点的类似等级，高个子、瘦长、金发碧眼的北欧（Nordic）类型——像戈培尔（Goebbels）那样的“高个子”？像戈林（Goering）那样的“瘦长”？像希特勒那样的“金发碧眼”？——被认为比其他所有人优越。东欧的斯拉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等），被错误地分类为一个种族亚群，被宣称比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各民族低劣，被当作各种非雅利安次人类同等对待。欧洲居民中的最低种类是那些非欧洲起源的人——主要是吉普赛人（Gypsies）和犹太人（Jews）——被诅咒为要对欧洲历史上所有罪恶负责，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纳粹的战略大部分都建立在这些谬论上，在这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区分是最主要的。在除去顽抗的政府之外，希特勒没有什么反对西欧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西欧的保护者。他藐视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法兰克人性质（Frankishness）已大为淡薄了，他们对德国的历史上的仇恨必须设法矫正。他不喜欢意大利人及他们与罗马的联系，感到他们是不可靠的伙伴。他尊敬西班牙人，他们曾经从黑人（Blacks）手中拯救了欧洲，并为佛朗哥（Franco）的不愿合作大伤脑[39]筋。除了某些堕落的个别人物，他赞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并觉得他们顽固的敌意令人沮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行为只能理解为这些日耳曼人在准备为主人种族的统治而竞争。他对他们的所有要求，就是他们应当让他来做主。

纳粹所有的最极端的野心是针对东方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清楚地指出东欧是德国未来“生存空间”（Lebensraum）扩张的地方。东欧居住着一系列低劣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它的遗传血统必须由大量的德意志人殖民来改进。这种“疾病的因素”必须用外科手术去除，也就是屠杀。东欧也是苏联权力的领域，这个“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的巢穴必须消亡。当纳粹发动德国对东欧的侵略时，首先针对波兰然后针对苏联，他们感到他们是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Crusade）。他们这样毫不隐讳地说。他们的历史书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沿着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光荣台阶前进。他们宣称正在加速“一千年历史”的最终大较量。

不像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没有75年的时间来精心策划它的理论和实践。在伟大的帝国（Great Reich）能够巩固之前，它被盟国联合的力量摧毁了。从未让其达到使纳粹营造的欧洲必须清楚地表明它对其他大陆态度的地步。而如果苏联像它在1941—1942年那样几乎被征服，纳粹主义就会成为有着巨大面积的欧亚强国的驱动力，它必须准备与美国和日本的敌对中心进行全球性对抗。斗争必然会随之而

来。而实际上纳粹统治区域局限在欧洲疆界之内。希特勒没有得到机会操纵欧洲以外的世界上他的雅利安人伙伴。不管作为一个理论家还是政治领袖，希特勒到底仍是一个欧洲人。

虽然纳粹统治地区一度从大西洋延伸到伏尔加河（Volga），纳粹的历史观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期间自由地起作用。在德国本身，它的事业只限于十二年，比一个班级在学校的日子还短，在其他地方，它只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播下了种。它的影响是强烈的，但也是极为迅速地消逝的。当它在耻辱中于1944—1945年崩溃时，它留下了一个中断的真空，只能由各个强国的历史思想来填充。在从1944—1945年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苏联的历史观不客气地就强加给他们了。由英国—美国人解放的西欧，对“历史的同盟计划”敞开了大门。

历史的同盟计划

欧洲的当代观点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感情和经历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大同盟”的胜利。由于他们在1918年和1945年的胜利和冷战在1989年的结束，西方强国能够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在世界范围输[40]出。他们这方面在德国特别成功，他们的接受由于在本国的罪恶与同盟的再教育政策的结果而得到提高。

从战时的特殊收获而来的同盟国态度产生的要点与前提，在关于二十世纪方面是很共同的，有时会投射到更遥远的时期。可以试着将它们总结如下：

——相信西方文明惟一的、长久的特有品质在于“大西洋共同体”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尖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以《大宪章》（Magna Carta）为传统的法律规则，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善的最高形式。这个计划的基石包括威尔逊的（Wilsonian）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则（1917年）与《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年）。

——“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赋予“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意义，被定义为善战胜恶的事件。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受到其迫害，是衡量功绩的最高标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对者或牺牲者理应得到最大的赞美和同情。

——一种对德国这个两次被击败的敌人魔鬼研究式的狂热。作为

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帝国主义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恶毒特性的首要发源地，德国处于受谴责的地位。站在德国一边战斗的个人和国家，特别是在 1939—1945 年，被打上了“通敌”的烙印（注意：德国的文化不能与德国的政治相混淆）。

——一种对于沙皇（Tsarist）帝国和苏联宽容的、浪漫化的观点。这个在东方的战略同盟者通常被称为“俄罗斯”，俄罗斯明显的错误不应当被归入敌人一类。因为俄罗斯正不断地向西方靠拢。俄罗斯的大优点是在“反法西斯主义”同盟中作为伙伴，它的巨大牺牲使法西斯主义投降，这胜过它的所有负面记录。

——不言而喻地接受欧洲划分为西部和东部区域。“大西洋价值”可以期望在更先进的西方占有优势，而俄罗斯可以理解的对安全的愿望，使它对落后的东方的统治是有理由的。当然西方强国要保护自己对抗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但是它们不应当干涉俄罗斯合法的影响领域。

——有意地忽视所有不能对以上论点增加可信性的事实。

历史的同盟计划的发展自然超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同情心，并且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或精确地系统阐述过。在自由社会的喧闹声中它从来不能树立一种垄断地位，它也没有遇到系统的挑战。在第[41]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世纪，它在任何地方的学术讨论中仍明显表现出来，并且也许不知不觉地，在这个概念框架中表达了各政府的政策决定。它是一种事态的自然残留，那时同盟国的士兵可以因为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样地坏”被正式逮捕。[104]

在学术领域，可以看到同盟计划在以制度化的重点和结构进行。还有就特别的题目的辩论。它对致力于研究纳粹或与纳粹有关题目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的压倒性优先地位，突出对德国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美国。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东欧事务的分析继续由分离的“苏联”或“斯拉夫”研究机构组织，为什么苏联问题专业明显地不愿暴露苏联生活的现实。[105]它对在苏联和斯拉夫人领域内过分强调俄罗斯人负有部分责任，并经常在总体上排除了非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观的假设和幻象。在这场战争过去后半个世纪，与这个同盟神话相矛盾的大多数事件继续被缩小或不予重视。[**阿尔特马尔克广场**] [**卡廷**] [**基乃豪尔**]

许多战争时代的旧模式一直存续了下来，特别是对东欧的看法。

人们可以看出一种清晰的等级观念，是以与同盟事业各国作贡献的程度相关联而定的。例如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有着与俄罗斯合作并与德国敌对的长期传统，对同盟计划很适合。可以被认为是“勇敢的”、“友好的”和“民主的”，至少在波斯尼亚（Bosnia）战争之前是如此。斯洛伐克人（Slovaks）、克罗地亚人（Croats）和波罗的海（Baltic）各民族则相反，被认为拒不做西方的朋友或是与敌人勾结，不值得受到这样的赞美。波兰人如其一贯的那样，不适合于任何计划。由于抵抗了德国的侵略，他们明显地为民主在坚决斗争。由于抵抗了苏联的侵略，他们明显是“背叛的”、“法西斯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和“反民主的”。乌克兰人也完全不适用于这种分类。虽然他们也许遭受了欧洲国家中绝对数量最大的平民死伤，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摆脱苏联和俄罗斯的统治。对于这样一个令人为难的民族，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假装它不存在，并接受过去沙皇主义者的谎言，说他们是“小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既不“小”，也不是俄罗斯人。[**乌克兰**]

在政治领域，同盟计划是美国想象的与联合王国的“特殊关系”的基石，并且是将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日本排除在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类组织之外的一个根源。当一位不列颠首相就《大宪章》（Magna Carta）与《人权宣言》（Rights of Man）的相对优点指责法国总统时，或是一个欧洲“超级国家”的前景在令人回忆起皮特（Pitt）或丘吉尔（Churchill）的论调中被摧毁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不列颠议会下院投票赞成一项“战争罪行法案”的依据。它将这些罪行限制在“德国或德国控制的领土”上所犯的，仿佛其他战争罪行都不算数。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它也体现在一个国家大毁灭纪念博物馆在华盛顿开馆时。[106] [**42**]

然而同盟计划的影响，也许在对1989年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的反应中最强烈地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狂热”（Gorbymania）的爆发，对战争时期同盟国（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南斯拉夫）的完整性给予了优先考虑。而这种将东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故意混淆，只能解释为对预先设置的历史作出的反应。只有经过缓慢的再强调过程，西方观察者才了解“俄罗斯”和“苏联”不是同一回事；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是一个深受憎恨的政权；南斯拉夫联邦是一个共产主义阵线组织；最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出自塞尔维亚的共产党的领导，或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克罗地亚是明确的欧洲民族，有追求国家地位的合法权利。理解到“西方”已经在如此之多的基本问题上被误导，必然引起修正欧洲历史的要求迅速增长。

欧洲史

于1945年后在西欧开始的欧洲统一运动，是被一种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想主义燃起的。它的目标是去除给过去的斗争火上浇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造成的混乱。所有社会都既需要现在的个性的意识，也需要分享过去的意识。因此历史的修正是一种自然的需要。第一步是找出扩散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错误信息和错误理解的根源。第二步是对一种新的“欧洲史”的确定内容建立一致意见。

欧洲委员会为最早发生的讨论提供了讲坛。作为一个由24个西欧政府支持的组织，它从来没有被“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或“北约”（NATO）的政治所束缚，并在文化领域它得到了四个来自苏联集团的四个非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的合作。它的资金投入来自从梵蒂冈（Vatican）到克里姆林宫（Kremlin）。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于1953年在克拉夫（Claw）组织起来，讨论“历史教学的欧洲理念”起，委员会四十年来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主要的关于历史事件的主要国际会议。1965年在埃尔西诺尔（Elsinore）关于“历史教学”的专题讨论会，和1986年关于“北欧海盗（Viking）时代”的讨论会，强调了在广泛基础上的题目和拓展的地理和年代方面广范围内令人满意的成就。

除了历史的教导，和将以技艺为基础的“新历史”引进学校教育的问题，主要焦点在于消除欧洲教育中的民族与宗教偏见。对各国历史教科书的缺点给予了特别注意。许多双语双边委员会建立起来，以检查所有欧洲教育家在表现他们自己和邻国的历史时都有过错的删[43]节和强加的罪过。格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西德的不伦瑞克（Braunhschweig）的建立，起到了先驱作用。[107]

然而，创造出一种关于欧洲历史的一致性，其障碍是众多的。一条阵线追随着戴高乐主义（Gaullist）的一个“各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的概念，满足于一种各国历史的混合物，只是去掉所有令人不快的材料。其他人寻求将民族的因素融合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整体。一个主要的障碍在于变化着的政治现实，和（西）欧共同体扩充着的成员。设想将最早的“六国”的历史观念调和起来的一部历史是一回事，而预想到“十二国”，“十九国”甚至“三十八国”的意识是一个大得多的任务。到1990年代欧洲统一的概念不能再局限于西欧。“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将必须抛弃对欧洲旧的双重观点，以利于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概念”。[108]在这期间，勇敢的人不会畏于尝试一种新的综合。

一个历史计划得到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on）的财政支持（虽然不是最初的）。在1989—1991年的政治洪流之前就已设计，以“理解的探险”为标题，它被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个500页的欧洲历史综述，一个10部的电视系列，同时出版一部用欧洲共同体（EC）所有八种语言写的学校教科书。它的作者们对他们的“政治追求”十分开放：他们的目标是取代根据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写的历史：

民族主义，和欧洲分裂为民族国家，相对而言是较近的历史现象。它们也许是暂时的，绝不是不可逆转的。各帝国的终结和由民族主义造成的破坏一直伴随着极权主义的失败和西欧自由民主缺席的胜利，它在1974—1975年完成了。这使人们开始从他们民族主义的本能中摆脱出来。[109]

“民族主义的本能”是一个不幸的阶段。但是主要作者，曾出版了论早期基督教和“历史中的欧洲理念”（L' Idée de l' Europe dans l' histoire)(1965年)，他相信欧洲的根本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有确定的历史原因把欧洲看作不只是一幅各文化的镶嵌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次冒险的时机是不幸的。因为当它进入市场时，已值它依据的地理框架刚好崩溃。它将“欧洲”界定为“欧共体”（EC）成员国的领土，加进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瑞士，对芬兰、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地位它作了暗示，但并不明确。因此这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又一次实践。批评者中有几位不那么客气。一位评论家说它的道德调子比作“让人联想起……苏联集团的历史编纂学”。在另一个地方它的探讨被总结为这个标题：“关于半个欧洲的半个真相”。[110]

希腊人特别被激怒了。虽然希腊从1981年起就是“欧共体”（EC）的一个成员，迪罗塞耶（Duroselle）删去了大部分古希腊和拜占庭的贡献。寄给欧洲委员会的抗议信有几位希腊的欧洲议会议员[44]（MEP)、雅典大主教和其他人。这个文本被比作《撒旦的诗篇》（Satanic Verses)。注意力被吸引到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观点：“L' Europe est grecque par la pensée et l' art, romaine par le droit, et jndéo-chrétienne par la religion.”（欧洲的思想和艺术是希腊的，法律是罗马的，宗教是犹太一基督教的。）一位不列颠的来信者援引了Europa（欧洲）和Istoria（历史）各词的希腊来源，他质问，如果希腊的贡献被否认了，人们就不知道这本书应当称作什么。欧洲委员会必须及时地与这个计划脱离关系。[111]

在评论中最说明问题的观察源自雅典学院。它涉及迪罗塞耶先生(M. Duroselle)的"一部欧洲的欧洲史"概念。如果一项研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欧而被归类为"欧洲的",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的其余部分不知为何不是欧洲的,"非西方"就成为意味着"非欧洲","欧洲"就等于"西方",在除了单纯的地理学之外的一切方面都是这样。[112]东欧,无论是拜占庭欧洲、东正教欧洲、斯拉夫人欧洲、奥斯曼(Ottoman)欧洲、巴尔干欧洲或苏联的欧洲,被长期置于这个范围之外。这就是导致迪罗塞耶先生在讨论"欧洲的古代人民"时没提到希腊人或斯拉夫人的根本谬误所在。作者为自己辩护的企图不总是言辞恰当的。因被指责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到马拉松(Marathon)战役,据说他回敬以它也没有提到凡尔登(Verdun)战役的新闻。这个例子只能被评价为在西欧历史方面如同在欧洲整体史方面那样有弱点。[113]

这个计划的教科书由十二个不同国家的十二位历史学家编纂,在1992年面世。这个文本是由集体讨论确定的。一种德国的叙述"蛮族(Barbarian)入侵"改为"日耳曼人(Germanic)入侵",西班牙人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描述为"海盗"的说法被取消了。在封面的肖像中一幅戴高乐(de Gaulle)将军的照片被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的照片取代。不管是什么原因,《欧洲历史书》(The European History Book)在不列颠没有找到出版者,并被评判为看来不能通过德国16个州(Länder)的严格审批标准。[114]

然而,欧洲史不是处理琐碎事务的。它的强项在于探求欧洲共同体的一种有活力的梦想,它会有能力创造它自己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它的起始形式上,这个梦想必然是发育不良,毕竟它是在冷战当中的经历起源的。但是它能够把握一个本质的真理,即主权民族国家没有提供可靠的政治共同体的惟一形式。各民族国家本身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它们建立在权力的神话上,和政治性的被改写的历史上:

> 所有比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民(或与此同等的)更大的团体都是想象出来的……甚至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会永远不认识他们的同族人。……但在每个人心中活跃着他们交往的想象。[115]

[45] 欧洲人需要这种同样的想象。或早或迟,欧洲历史的一幅有说服力的新图画必然会伴随着对欧洲未来的新渴望编纂出来。

1990年代的欧洲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它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帮助给予它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会帮助那些成百万的欧洲人,他们的多种个性和多种忠诚已经超越

了现存的边界，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欧洲的历史

当被问到“欧洲的历史”的定义时，许多专业历史学家不能给出一个清楚的回答。他们通常自己不关心这些事情。然而如果坚持要问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将过去假设的确定性与现在的混乱相对比。由一个历史期刊在1986年组织的调查带来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回答。一位杰出的学者说：

> 当我在1930年代还是法国的一个小学生时，对于“什么是欧洲的历史?”……的回答似乎是简单和明显的……任何地方，事件或人物与法国有关系的就属于欧洲史，并且，对历史来说仅此而已（Tout court）……（但是现在），没有单一的欧洲历史，而是有着许多种。[116]

第二个回答者表达了对欧洲传统上的狭隘地方观念的指责和缺乏世界范围的视野进行观察：

> 欧洲历史的概念，实际上说，就是欧洲历史不过是欧洲人眼中看到的历史，依据的是欧洲人的历史幻象……这种表现在今天是不可宽恕的。[117]

这个推论似乎是，他那些犯了错误的先辈的欧洲中心论态度，不知为何使整个题目变得没有意义了。

一位匈牙利的投稿者指出不列颠人将“欧洲的”与“不列颠的”历史分辨开来的偏执习惯。[118]通过这种区分，“欧洲的”就成为“大陆的”的意义，而不列颠的部分就成为看起来完全是独特的事物。

而另一位投稿者提供了对欧洲历史三种分别的定义的一个分析。他列举了“地理的”、“文化的或文明的”，还有一类被他描述为“对从十六世纪起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的一个简便说法”。[119]

在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一个人曾有着更深刻的观点。A.J.P.泰勒（Taylor）先生为这个期刊的调查目的提供了一个无可仿效的样本：

> 欧洲史就是历史学家所要的任何东西。它是事件和理念的一个总结，有政治的、宗教的、军事的、和平的、严肃的、浪漫的、近在手

边的、遥远的、悲剧性的、喜剧性的、意义重大的、无意义的，还有任何其他你愿意写的东西。只有一个限制因素，它必须发生在或是源自我们称为欧洲的地域。但是当我不能确定这个地域确切地意味着什么时，我对于其余的事情在朦胧中感觉良好。[120]

[46] 像通常那样，我的年老的导师说的多半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很有趣的。但是他将自己放在了这样一伙人中，他们认为欧洲史即使存在，也不是一个值得操心的题目。

因此说到底，理智性的界定引发的问题比它们所回答的还要多。这对于欧洲历史就像对一头骆驼而言是一样的。实践上的探讨不是要对它进行试验或是界定，而是要去描述它。

目　录

（上　卷）

中文版作者序言：欧洲——一部历史，从史前到当代 … 7
序　言 …… 9
欧罗巴的传说 …… 15
导　言 …… 19

第 1 章　半岛：环境与史前时期 …… 1
第 2 章　希腊：古代希腊 …… 54
第 3 章　罗马：古代罗马，公元前 753 年—公元 337 年 …… 116
第 4 章　起点：欧洲的诞生，约公元 330—800 年 …… 186
第 5 章　中世纪：中世纪，约 750—1270 年 …… 272
第 6 章　危机：危机中的基督教世界，约 1250—1493 年 …… 368
第 7 章　再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约 1450—1670 年 …… 462

（下 卷）

第 8 章 启蒙：启蒙运动与专制主义，约 1650—1789 年 …… 585

第 9 章 革命：动乱的大陆，约 1770—1815 年 …… 689

第 10 章 动力：世界的发电站，1815—1914 年 …… 774

第 11 章 熄灯礼拜：阴影笼罩下的欧洲，1914—1945 年 …… 920

第 12 章 分裂和统一：欧洲的分裂和统一，1945—1991 年 …… 1091

附录一 各章注释 …… 1173

附录二 “概要介绍”注释 …… 1209

附录三 “概要介绍”一览表 …… 1239

附录四 图片鸣谢说明 …… 1243

附录五 历史图解简编 …… 1251

附录六 重要人物、事件、机构、地点等的索引 …… 1375

地 图 目 录

地图 1　半岛，约公元前 10000 年 …………………… 6
地图 2　欧洲女王 …………………………………… 14
地图 3　在欧洲东方—西方之间有问题的分界线 ……… 39
地图 4　欧洲：地形区域 …………………………… 3
地图 5　古代的爱琴海：公元前第 2000 年 ………… 49
地图 6　史前欧洲 …………………………………… 57
地图 7　罗马—西西里—迦太基，公元前 212 年 …… 107
地图 8　罗马帝国，公元一世纪 …………………… 114
地图 9　君士坦丁堡 ………………………………… 180
地图 10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欧洲 ………………… 190
地图 11　教皇斯蒂芬的旅行路线，公元 753 年 …… 266
地图 12　欧洲，约公元 900 年 …………………… 275
地图 13　低地国家，1265 年 ……………………… 358
地图 14　欧洲，约 1300 年 ……………………… 370
地图 15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 ……………………… 453
地图 16　欧洲，1519 年 ………………………… 463
地图 17　罗马，古代与近代 ……………………… 578
地图 18　欧洲，1713 年 ………………………… 584
地图 19　莫扎特到布拉格之旅，1787 年 ………… 683
地图 20　欧洲，1810 年 ………………………… 691
地图 21　革命的巴黎 ……………………………… 764
地图 22　欧洲，1815 年 ………………………… 773
地图 23　欧洲，1914 年 ………………………… 902
地图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1914—1918 年 …… 922
地图 25　新欧洲，1917—1922 年 ……………… 967
地图 2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1939—1945 年 … 1028
地图 27　二战后的德国，1945 年以后 ………… 1082
地图 28　欧洲分裂，1949—1989 年 …………… 1090
地图 29　欧洲，1992 年 ………………………… 1164

第1章

半　岛

环境与史前时期

许多关于欧洲环境史的描述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决定论色彩。很多[47]欧洲人认为他们的“大陆”是如此得天独厚，以至于大自然使它命中注定将成为世界的主宰。而且，很多人甚至以为欧洲的好运气将持续到永远。孟德斯鸠在1748年写道：“气候王国位居众王国之首”；他进而说明，欧洲的气候无与伦比。对于孟德斯鸠及其后继者来说，欧洲就是进步的同义词。[1]

也有不少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人类地理学的创始人，年鉴学派的思想前辈之一，伟大的保罗·韦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年），也难免受到高卢沙文主义的影响。他强调，法国地理的最明显特征是其多样性。他写道：“针对多样性的侵袭，法国调动了同化的力量。她把所接受的东西统统加以改造。”相反，在不列颠，他引用一段打油诗说：“这个可怜的小海岛，土地稀少，气候糟糕。”一百年之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持相同的态度。[2]多样性特征其实是法国堂而皇之虚构出来的，但它并非只为法国所独有，而是属于全欧洲的标志。

事实上，欧洲半岛根本不是一个“大陆”：不是独立构成的大片陆地。其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还不足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也不足南北美洲各自面积的一半。近代地理学家把它像印度一样，划分为欧亚板块的次大陆：“旧大陆之角，亚洲的西部之尾。”尽管如此，不能否定欧洲拥有无与伦比的全面、完备的地形特征。地表、气候、地质和动物群落共同营造了一个良性环

境，这一点对于理解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

[48] 欧洲的地表不同于其他大陆或次大陆。北部和南部的下降地带被海洋冲刷，形成了两个平行的海洋链条，深深插入内陆地区。在北部，北海—波罗的海的水域面积为1500平方英里（2500平方公里），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在南部，地中海—黑海的水域面积超过2400平方英里（4000平方公里），从直布罗陀到高加索。在这些四面[49]合抱的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海湾复合体和一大串熠熠生辉的海岛群。结果，海岸线在陆地中所占比率出奇的高：约为37000公里，或23000多英里，欧洲的海岸线几乎相当于赤道的长度。对于早期人类来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来往方式。

更有甚者，由于欧洲半岛的海岸位于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温带纬度，因此享受着温和适宜的气候。盛行的海洋风向西刮着，大陆的西海岸在温和的海风影响下获益最多。而只有少数面向西方的陆地海岸能够切实享受到这种好处。其他地区，如果西海岸不被高耸入云的山峰或冰峰所阻隔的话，就会出现长长的沙漠地带，诸如撒哈拉、卡拉哈里、阿塔卡马。

因此，欧洲的气候就其纬度来说，通常是温和的。一般来说，在湾流影响下，北欧温暖而潮湿；南欧相对暖和、干燥、阳光充足。中东欧享有真正的大陆气候的各种因素，拥有清爽、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但是，各地气候变化多端。极端情况通常不会出现。甚至在欧洲的俄罗斯，那里1月份和7月份的平均气温差距可达到45摄氏度，西伯利亚（Siberia）的温差幅度只及它的一半。欧洲最潮湿的地区在西挪威，年平均降水量为3500毫米（138英寸）。最干燥的地区在里海周围，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9英寸）。最寒冷的地点在沃尔库塔（Vorkuta），1月份平均气温达到零下20摄氏度之寒。最炎热的地点在有争议的塞维利亚（Seville）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7月份的平均气温都达到了29摄氏度之热。这些极限不能同亚洲、非洲、美洲的同类情况相比。

欧洲温和的气候满足了原始农业的需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位于适宜耕种的草原自然带之内。那里有丰富的林地，可以提供燃料和住所。高地平原通常靠近肥沃的山谷。在西部和南部，牲畜可在露天过冬。当地的条件往往能激发特殊的适应性。绵延的海岸线，连同宽阔的大陆架给渔民带来丰厚的赏赐。开放的平原，尤其是多瑙河盆地，为欧亚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牧马、养牛业提供保障。阿尔卑斯山由林带以上的高山牧场而得名，该山区很早就开始实行转场放牧制度。

欧洲的气候可能也对当地人种的肤色有一定影响。中等程度的日

[48]



地图4　欧洲：地形区域

晒和超强紫外线辐射意味着中等程度的色素沉淀被编码、输入半岛基因数据库中。在历史上，浅色脸庞占大多数，同时存在北方地区的棕发或金发、蓝眼睛。绝大多数欧洲人及其后代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其长相被辨认出来。

当然，直到最近，人们才有可能考虑除最明显的种族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对血缘集团、身体组织和DNA印记的分析，直到[50]二十世纪晚期才被知晓，而人类究竟拥有多少共同的基因物质，直到

今天还无从知道。结果，持种族理论的人倾向于根据外部标准如皮肤颜色、身材或骨骼形状下结论。在现实中，欧洲人口的种族构成总是显示出相当丰富的多样性。有高大、蓝眼睛、浅肤色、金发碧眼的所谓“日耳曼种族”，他们自视为斯堪的纳维亚类型，这是惟一的自古即有资格贴上“白人”标签的集团。他们一点也不像矮小、棕眼、黑皮肤、黑头发的所谓“地中海人种”，或“印度—地中海人种”，这些人占据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无数的色调。半岛人口大多数可清楚地同蒙古人种、印地人种、尼格罗人种区别开来，但不容易同其他分布在近东和北部非洲的人种集团相区分。

通过对现代基因的研究，今天的史前史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血清提炼、发现 DNA（1953 年），以及随后对 30 亿人类基因“字母”进行制图，使得一种非常成熟的调查研究得以实现。现在，遗传与语言记录的相互关系显示出生物与文化进化模式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更接近。最近的研究表明，遗传物质进入史前欧洲的运动与同时期的文化潮流相一致。“基因、民族和语言纵横发散”，一位首屈一指的学者写道。[3] 地方研究表明，孤立的文化社团，如非印欧人种的巴斯克人，带有显著的他们自己的遗传特征。不存在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曾经是伪科学的欧洲基因遗传学研究现在成了一项受人尊敬的事业。最后，“我们正在开始阅读远古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信息。”[4] **[高加索]** **[塔木兹]**

从心理学观点看，在早期人类眼中，半岛是一个机会与挑战并存，充满刺激的地方。它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压力，需要去认真对待，但尚足以应付。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收获。季节的节奏培养着行为，它要求按部就班并富有预见。变换的四季激发了灵活性。需要克服许多自然灾害——海洋风暴、冬季雪灾、夏季干旱和疫情，而健康和生存的前景是美妙的。可以推测，史前欧洲的原始居民同几百万年之后居住在北美东海岸的他们的后代相比，感觉上要安全得多。

不可贸然断定，欧洲半岛是惟一的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地方，而其他大多数地方都有缺陷。同人类最早的发源地——赤道以南河谷地区相比，半岛的季节变更和温和、舒适的气候，在总体上，构成一种更适宜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地理、生物环境丰富多彩、多种多样。有“年轻”的阿尔卑斯山脉，古老的原始丘陵，活火山；幽深的峡谷和宽阔的平原；奔腾于崇山峻岭间的急流，宽广的河流，数以千[51]计的湖泊；亚寒带的冻土地带、永冻层、冰川；岩石海岸、沙滩海滨、宽阔的三角洲。有开放的草地，辽阔的落叶林，阴森的针叶林，还有亚热带棕榈树；脱水的半沙漠化的土地，广阔的沼泽地，以及深厚的黄土和“黑土地”带。动植物分布地带极为广大。现存的欧洲野

生动物足以显示这里的原始物种从前的模样。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海拔高度和空间距离所造成的限制要比别的地方小得多。欧洲的位置与自然通道网络相联系，原始人定然发现了这些通道有利于交往而不是障碍。正如在绝大多数内河沿岸，人们都可乘独木舟漂流，因此，也可以乘船沿着任意一条河流，朝任何方向漂流。塞纳河、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维斯瓦河（Vistula）、涅曼河（Niemen）、德维纳河（Dvina）都向北流；埃布罗河（Ebro）、罗讷河、马里查河（Maritsa）、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向南流。塔古斯河（Tagus）、卢瓦尔河（Loire）、塞文河（Severn）向西流。泰晤士河、多瑙河、波河、德涅斯特河向东流。在它们之间，人们进行着无休止的短途旅行和便利的货物搬运。例如，在上勃艮第的欧克斯瓦（Auxois）地区，人们可以在通向地中海、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海水中徜徉好几个小时。在阿尔卑斯山中部，莱茵河与罗讷河的源流在安德马特（Andermatt）附近并肩流淌，最后分别向北、向南流去。在德维纳—第聂伯河（Dvina - Dnieper）的陆上运送地点，在维特布斯科（Vitebsk）附近，人们能够轻易地拖动一只来自瑞典，前往埃及的船舶。

不可低估欧洲的大道和小径形成的漫长线路，它们为人类的迁移和定居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欧洲相对便利的旅行是其他较大的大陆所无法相比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来自中国，需要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穿越亚洲腹地。然而，从无法记忆的年代开始，任何一名合格的，有一定进取心的旅行者都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或者在几天之内，穿越欧洲。

把欧洲分成“自然”区域，或者“历史”区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项既具有消遣性，又没有定论的智力游戏。界定“西欧”与“东欧”之区别的尝试如同分界线的标准一样多如牛毛（见原书图3及引言，第22—25页）。半岛中央的阿尔卑斯山是清晰而永久的“北欧”和“南欧”的分界线。但是，它却不能同样适用于欧洲的远西地区、伊比利亚（Iberia），或者欧洲的远东地区，黑海腹地。进而有争论想证明，地区谱系中的“中欧”或“中东欧”的划分有些聪明得过头，以至于造成了扭曲。[5] 看来以地形、地理特征为基础给欧洲划分区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欧洲半岛由五种自然成分构成。在历史上，这些地理单元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与此同时，凌驾其上的政治单元却起起落落，变幻无常。那些“尘世中傲慢的帝国”接连不断地走向灭亡。但是，平原和[52]山脉、海洋、半岛、岛屿显然会持续到永远。

1. *欧洲大平原*毫无阻碍地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长达2400多英里（4000公里）。这是欧洲最主要的地形特征。实际上，由于乌拉尔只不过是座平缓的桥梁，平原可以被视为低地的延伸部分，它进一步伸向东西伯利亚的维尔克霍·扬斯克（Verkhoyansk）山麓。乌拉尔山的纵向长度为1200英里（2000公里），贯穿巴伦支海与里海之间。在低地国家的海岸与山丘之间，它缩小到不足200公里。平原上几乎所有大河的流向都以南—北为轴心，因此，给东—西交通制造了一系列自然断裂带，并把平原横切分割成六到七个平缓的台地。维斯瓦河以东，不可逾越的普里佩特沼泽（Pripet）把平原劈为两个自然通道——北部一线环绕着波罗的湖泊地带，南部一线则是进出草原的通道。[**乌克兰**]

[53]

乌克兰（UKRAINA）

乌克兰是这样一片土地，绝大多数欧洲民族正是通过它最后抵达自己的家乡。古时候，那些早在斯拉夫人到达之前就占据了旁提卡草原（Pontic）的人们把它称作斯基泰（Scythia）或萨尔马提亚（Sarmatia）[**半岛城**]。其面积覆盖了南欧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介于伏尔加走廊与喀尔巴阡隘道之间；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由此经过。它的现代斯拉夫语的名字意思是“在边缘上”，近似于美语“边疆”这一概念。第聂伯河的湍流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草原通道与水上商路在此交汇，过往的人们在此发生激烈冲突，因为这里是西方定居地区与东方开阔草原之间的过渡地点。乌克兰富有矿物资源——例如“顿巴斯”（Donbass）的煤炭和克里沃罗格（Krivoi Roh）的铁。欧洲最富裕的农业地区的地底下蕴藏着著名的“黑土”层，该地区在1914年以前成为欧洲大陆名列前茅的粮食出口地区。

然而，除了克里米亚半岛和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迪恩河等主要河谷地带以外——它们既是[**卡扎里亚**]的中心，也是第一批东斯拉夫国家的中心（见原书附录Ⅲ，第1249页），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只是在近代才进行系统地移民安置。直到那时，广阔的“荒野平原”一直受到异教徒和游牧民族的侵袭，或处于哥萨克和鞑靼人的战争压迫。十五至十八世纪奥斯曼的统治拉近了它与黑海和穆斯林世界的距离。1569年之后，波兰的统治带来了许多波兰地主和波兰犹太人。在1654年至1945年之间逐渐扩大的

俄国统治把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带到这里。1775年，俄国军队摧毁了位于第聂伯河的一座小岛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的据点；1783年灭了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Tartar Khanate）。在沙皇的统治下，整个地区正式被命名为“小俄罗斯”。被指定为新殖民地的南方诸省叫做“新俄罗斯”。

经历了这么多反复无常的命运之后，难怪乌克兰的现代居民对土地的依恋之情特别强烈。一首朴实无华的诗歌突出地反映出了这一特点：

遗　嘱

我死以后，请将我高高葬在
古老的山冈上，
在我深爱着的乌克兰
在那辽阔无羁的大草原。
从那里可以看见无边无际的
麦田伸向远方
还有第聂伯河岸边的，
峭壁嶙峋。
从那里可以听见奔腾的大河
发出惊心动魄的咆哮
奔向遥远的蓝色海洋
冲刷掉敌人的污血
我将离开永恒的山岳和田野
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求主赐我安息
直到那时，仍对上帝一无所知。
先把我送进坟墓。然后从死亡中起来
解除你的锁链
愿你的自由
在可恶的敌人的血管中奔流！
最后，在这个大家庭里
年轻又自由。
不要忘记我，
请将我的故事娓娓道来。

[54]

然而，由于大平原从来就是权力政治的竞技场，因此乌克兰人很少能够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二十世纪，他们一次次遭到镇压。他们的短命的共和国在1918—1920年间成为俄国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主要战场之一，最后被胜利的红军所推翻（见原书第928—929页）。他们是大陆上最可怕的人为制造的灾难的牺牲品，也是大规模种族灭绝政策的牺牲品。他们在1918—1920年战争中，在1930年集体化战役中，在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中的丧生者达到2000万人。[**切尔诺贝利**][**丰收**]他们中有一些人因自己在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面前的软弱无能而感到万分沮丧，又没能找到受压迫的根源，绝望中使用暴力反抗他们的邻居。[**布恰奇**][**集体迫害**]乌克兰的人口规模近似于英格兰或法兰西，并包括许多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历史书中的地位却很小。多年来，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当他们受到赞扬时，常常被当成“俄罗斯人”或者“苏联人”，只有在他们做了什么坏事的时候，才被称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们才恢复了自由的声音。乌克兰共和国，尽管前途未卜，终于在1991年12月宣布独立。[1]

莱茵河与奥德河之间的是大平原最不易防守的地段。在这里，耸立着不可穿越的、森林茂密的山岭。阿登高原（Ardennes）、托伊托堡林山（Teutoburger Wald）、哈尔茨山（Harz）即使在今天仍是坚固的屏障。它们阻挡住沿平原进行的水平移动和从平原到阿尔卑斯山的纵向运动。现代德国地图表明，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如何被几乎完全限制在平原上，或者在莱茵河、美因河、内卡河（Neckar）、多瑙河四个河谷盆地之中的。

有一个长期的缺陷使得居住在平原上的人民深受其苦。他们找不到地理上的自然界限来区分他们所选择的居住地。他们不得不为此打斗。低地居民把自己看成是温顺的种地者，不同于凶狠、残忍的山地居民。在现实中，正是平原居民不得不学习系统的军队组织、军事占领艺术。在平原上，人们学会了要先发制人，否则就会被人所制。平原一直是定居地的首选位置绝非偶然。而且，在适当时候，它还孕育出了欧洲历史上最坚强的军事大国。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都是通过不间断的平原战争成长壮大起来的，并且全都培养了一种尚武传统，以便应对他们所处的困境。低地给最伟大的军事巨人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战场：昆内尔斯朵夫（Kunersdorf）、库尔斯克、莱比锡、坦嫩堡（Tannenberg）、滑铁卢、斯大林格勒。

欧洲平原的地形走势指向两个不同方向——一方面从阿尔卑斯山麓向北部海洋沿岸倾斜，而另一方面，由东向西，从乌拉尔峰（1894米）向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倾斜。东—西向落差大约为每3000英里下降6000英尺，或者每英里下降26英尺——下降率仅为0.04%。

“文化坡度”在欧洲平原上的走势与其地形走势正好相反，这一观念的发展与欧洲特有的定居模式和政治演变有关。它是这样产生的：最初的永久定居地出现在南部和西部，后来在北部和中部，最后在东部出现。因此在上一个4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从平原翻越高山，然后下降到地中海地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文化升级”运动。与此类似，在近代，沿着欧洲平原自西向东的运动，则被普遍视为“文化降级”。

日耳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渗透着“文化坡度”（*Kulturgefälle*）这一概念：它对西欧文化的主宰地位十分反感，同时又认为自己比东方更优越。从法国人对待比利时和德国的态度，德国人对待斯拉夫人的态度，波兰人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俄国人对待中亚地区民族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类的天性总是促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居住在文化高地上，而他们的邻居则住在地狱中。例如，在不列颠小岛上，占人口多数的英格兰人倾向于把所有的文化坡度的走势看成从[55]牛津的世界屋脊或海德公园拐角开始，朝着“凯尔特边缘”、“苏格兰轻雾”、“爱尔兰沼泽”、“海峡大雾”的方向，逐渐走下坡路。英语谚语“东方佬起自加莱”（Wogs begin at Calais）与法国的“比利时历史”（histoires belges），与梅特涅（Metternich）最具维也纳风格的名言“亚洲起源于土路”，与波兰谚语“在俄罗斯，人们不得不如此”（Na Rusi Sie musi）简直如出一辙。与富有弹性的文化地理相一致的偏见，毫无疑问，出于对平原生活不稳定的担忧而得以强化。

欧洲大平原的轮廓极为完美，每个小分支部分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现在位于匈牙利的潘诺尼亚（Pannonia）平原是仅有的一块山脉地区以南的草地延伸部分。它以北部的喀尔巴阡山麓（Carpathian）为屏障，向南伸展，直抵多瑙河中流河段。它有三个天然门户——西边的门户在维也纳，东边的那个穿越了铁门关（Iron Gates），北边的第三个门户穿过了摩拉维亚峡谷（Moravian Gap）。水源充足的草原为自东向西运动的游牧民族提供了天然的平台，为许多准备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提供了一块方便的跳板。它接连不断地成为格庇德人（Gepids）、匈奴人（匈牙利由此得名）、阿瓦尔人（Avars）、库曼人（Cumans）、斯拉夫人，最后是马扎尔人（Magyars）的故乡。马扎尔人自称Alföld（低地），有时称为puszta，该词源于斯拉夫语，意思是“狂野”。

2. *高山*。连绵的群山形成两道优雅的弧线，从普罗旺斯的滨海

山脉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喀尔巴阡山脉，由此可见半岛的核心特征。这道令人印象深刻的屏障构成了半岛的脊梁，造成一道分水岭，将北部平原与地中海地区分割开。西部的最高峰如勃朗峰（4807米）、马特峰（4478米）、大帕拉迪索山（4061米），都大大高出东部山脉诸峰——朱里安山脉的特里格拉夫峰（2863米）、塔特拉山的格拉克峰（2655米）、罗马尼亚的摩尔多韦亚努峰（2543米）。即便如此，由于朝南的“阳光地带”（Sonnenseite）3200米以上，朝北的山岭2500米以上终年覆盖着积雪，所以那些较高的山脉几乎无法翻越。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阿莱奇冰川（Aletsch）在位于伯尔尼山地（Bernese Oberland）的少女峰（Jungfrau）脚下延伸，东部地区没有类似的冰川。但是，在冬季的几个月中，最高的通道统统不得关闭。因为在长达1200英里的线路上，只有三个重要的隘口——巴伐利亚（Bavaria）的多瑙河隘口、波希米亚的易北河隘口，以及把西里西亚与匈牙利联系起来的摩拉维亚隘口。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居住在高地山谷中的人们往往置身于低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事件之外，把他们的山岳之家视为抵御入侵者的庇护所和堡垒。瑞士，一个诞生于十三世纪的山区联合体，直到今天仍保持着这种外表下的某些特征。[**阿尔卑斯**]

[57]

阿尔卑斯（ALPI）

与人们的第一印象相反，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谷为早期殖民和原始农业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它拥有充沛的阳光、新鲜的水、燃料、建筑材料、水泥，以及最重要的东西——安全。偏远也是一种财富。很久以前就有人居住在这里，公元前四世纪，汉尼拔在此遇到猛烈的抵抗。在瑞士的塔密纳山谷（Tamina）2445米处的德拉亨洛克山（Drachenloch）岩洞中发现了火塘的遗迹，时间为里兹—乌尔姆间冰期（Riss – Wurm）。季节性迁移放牧的证据可追溯到120000年。尤其是在瓦尔·德·奥斯塔（Val d' Aosta）和诺里库姆矿区（Noricum），那里有完好的罗马建筑物和定居点。[1] 阿尔卑斯的沿海山地和普罗旺斯高地的村庄坐落在易守难攻的岩石山上，因而避免了匪徒、入侵者和税吏的骚扰。

在中世纪，许多阿尔卑斯社区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上的独立。瑞士联邦并非惟一的例子。1343年，布里扬松（Briançon）

的 52 个公社通过一项自由宪章，比维也纳皇太子将其余祖产和头衔出卖给法国国王早六年。他们的自治政府一直维持到法国大革命。

其他地区由于缺少与外界的交流而未受到严格控制。巴塞罗那特，由普罗旺斯伯爵和巴塞罗那伯爵所建，根据乌得勒支条约，与于拜地区（Pays d' Ubaye）一起归属于法国。但是，人们不得不骑骡子跋涉 15 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直到 1883 年才修建了一条永久性的道路。维尔敦峡谷中的村庄直到 1947 年才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阿尔卑斯山以西最低的山口埃什莱山口（Col de l' Échelle），其两侧至今仍没有可全年通行的道路。

许多道路是由于战略原因而修建的。蒙热耐夫尔（Montgenèvre，1054 米）山头耸立的一座方尖碑上用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声明，这条路于 1807 年开通，为方便辎重车辆通行，“适值拿破仑皇帝在奥德河和维斯瓦河战胜了敌人。”欧洲海拔最高的道路位于加利比耶山口（Col du Galibier，3242 米），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法国边境防线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下半叶，阿尔卑斯山受到最密集的开采，当时混合性畜牧业向高纬度地区推进，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然而，现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引起大量人口外流，老一辈山民抱怨道：“我的山羊总是朝着山上走，而我的妻子却是朝着山下走。”这股潮流在许多地区达到了危险比例，直到 1945 年以后，水电业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尤其是冬季滑雪，情况才有所改变。[2]

阿尔卑斯山区生活的古老性与独特性启发人们建造了一大批专门性的博物馆。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 1874 年建于都灵的山地博物馆。日内瓦的民族工艺博物馆，像许多小型博物馆一样，专门陈列工具、建筑物、陶炉和阿尔卑斯社区的民间艺术。

这些山岳既起了联合作用，也起了分裂作用。跨越它们不需要跋 [56] 涉千山万水。从意大利的奥斯塔（Aosta）到伊塞拉（Isère）的博格·圣·毛利斯山（Bourg St Maurice）和罗讷河的马尔提尼（Martigny）的距离仅仅只有 62 公里和 88 公里（39 英里和 55 英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距离蒂洛尔州南部（Tirol）的布雷萨诺内（Bressanone，又名布里克森 Brixen）68 公里；德涅斯特的桑博尔（Sambor）位于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上，距离乌日哥罗德（Uzhgorold）105 公里。一旦人们征服了阿尔卑斯山的山路，山岭两边的地区就建立起了共同联系、共同利益和很大程度上的共同文化。例如，都灵离里昂和日内

瓦要比离罗马近得多。米兰或威尼斯同苏黎世、慕尼黑或维也纳之间的联系，要比同遥远的西西里的联系更紧密。德国中部的广阔森林和山岭切断了巴伐利亚同北方的联系，使之与邻近的伦巴底地区的关系更为密切。喀尔巴阡山北麓的高卢旧行省与匈牙利的关系远远超过南麓。任何旅行者都会发现，尽管近代民族国家制造了许多障碍，阿尔卑斯世界（*Alpenraum*）和喀尔巴阡世界的区分依然存在。[**哥特哈德**]

[58]

哥特哈德（GOTTHARD）

圣哥特哈德隘道是穿越阿尔卑斯山中心地区最短的隘道，也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重要的大动脉。它与蜿蜒向北抵达莱茵河的赫伊斯山谷（Reuss）相通，又与蜿蜒向南抵达波河的提契诺山谷（Ticino）相通，提供了一条南部德国和北部意大利之间最直接的交通线。它的高度为2108米，比竞争对手们低得多，而其他隘道在冬季和坏天气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关闭道路（见原书附录Ⅲ，第1219页）。

有趣的是，圣哥特哈德隘道直到相对较晚的时期才成为主干道。它不是由罗马人修建的，罗马人更中意偏西的隘道，尤其是约维斯山（Mons Jovis）上的大圣伯纳德隘道（St Bernard）。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除不断有移民从北部迁移到南部以外，该隘道的西部从未被利用过。问题在于上罗斯山谷的一小块区域，距现代的安德马特（Andermatt）以北三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山岩陡峭的大峡谷。绍勒嫩峡谷（Schollenen）的上入口与笔直的悬崖峭壁相连，断绝了一切交通，直到人们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械工程改造为止。改造工程从公元1200年之后就开始了。宏伟的单拱魔鬼桥跨越了峡谷的门户，其庄严的构造丝毫不比哥特式大教堂的拱顶逊色。最陡峭的峡谷隘道，名为 *scaliones*，又名绍嫩（*Schollen*）的岩石层被切成陡壁，并嵌有托举木板栈道的支架，那栈道悬在空中，与突出的崖壁穹顶平行伸展。公元1300年，隘道山顶的客栈被献给希尔德黑姆（Hildesheim）教区的大主教圣哥特哈德，这显然说明旅行者的往来已变得稳定而有规律。

差不多有600个夏天，圣哥特哈德这条路，从7月到11月，一直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南北通道。从鲁采奈湖（Lucerne）之首的阿尔特多夫（Altdorf）到勒旺提那（Levantina）之首的比阿斯卡（Biasca），川流不息的朝圣者、商人和士兵面对的是长达60英里，

要翻越四到五级阶梯的艰苦攀登。南部山麓穿过蕴藏着一种名叫闪透石的透明矿物的“闪烁峡谷”（Valle Tremola），其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一点也不逊于魔鬼桥。小路蜿蜒崎岖，只有那些负重的骡子、挑夫和步行者们才对此毫不在意。在1830年道路拓宽以前，英国人查理斯·格里维尔（Charles Greville）是惟一的坐在车子里穿越隘道的人，1775年，他跟人打赌，并通过付钱雇佣一队瑞士向导用肩膀扛着他的活动旅行车走完全程的办法获胜了。

开通圣哥特哈德隘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促使瑞士的乌里区（Uri）承担起守卫隘道的特殊使命，并因此唤起了整个瑞士联邦的警觉。它使得军队能够在德国与伦巴底之间迅速走上一个来回，这一便利条件被许多帝王，其中最著名的是1799年，被苏沃洛夫（Suvorov）将军率领的俄国人所利用。 [59]

1882年圣哥特哈德铁路的建造并不比修圣哥特哈德公路逊色。为此需要在山峰下面挖一条15公里长的主隧道和另外80条隧道。在著名的格舍嫩（Goschenen）之上的“帕森之跃”（*Pfaffensprung*）处，列车进入盘旋的轨道，向右驶去，上升了几百英尺之后转而向左行驶。这条铁路夺走了许多工人的生命，也夺走了设计师的生命。自1980年起，这条铁路隧道与一条16.5公里长的公路隧道相连通，这条公路隧道拥有六条车道，可以在任何季节、任何天气下保证车辆通行。摩托车手们紧搂着心爱的车子，他们的身体紧贴着真皮后座，只一眨眼的工夫就从隘道中呼啸而过。

在魔鬼桥上驻足片刻的现代的旅行者们可以看到，位于现代通道之下，建造在巨岩之上的一座奇妙的纪念碑。铭文用沙皇专用的西里尔字母写成，可大致译为：致陆军元帅苏沃洛夫—里姆尼斯基伯爵兼意大利亲王的英勇不屈的伙伴们，他们于1799年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征途中牺牲。[2] 该纪念碑建于这次远征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它有助于唤起人们对欧洲整体格局的记忆，也使那些雄伟壮观的山脉浮现心头。

山岳的布局走势赋予群山之中的三大隘口以特殊意义。巴伐利亚隘道，沿多瑙河中流走廊自帕绍（Passau）至克雷姆斯（Krems），成为北部与南部的首要联络线。易北河隘道具有重要影响，要不是它打通了波希米亚至德国的道路，波希米亚林山将会受到阻碍。摩拉维亚隘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较早的时期，它为许多来自草原的民族提供了一条天然的通往南方的巷道。在中世纪早期，第一个斯拉

夫国家、大摩拉维亚帝国就建立于此（见原书第4章）。历史上，它为无数军队提供了通道，索别斯基（Sobieske）曾打这里通过而发动土耳其战争；拿破仑曾由此经过前往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像穿过巴伐利亚和易北河隘道的道路一样，最后，它在“欧洲心脏之中的心脏”维也纳附近通向了多瑙河。[**斯拉夫科夫**]

当然，除了中央山脊以外，欧洲还拥有许多高大的山脉。（西班牙）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穆拉森山（Mulhacen，3478米），比利牛斯山脉的内托峰（Le Pic de Néthou）又称阿内托山（3404米），西西里的埃特纳山（3323米），亚平宁的科尔诺山（2912米），保加利亚的穆萨拉山（2925米），阿尔巴尼亚的科拉比山（2764米），以及奥林匹斯山（2917米）本身，所有这些山峰都与阿尔卑斯山旗鼓相当。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清楚，半岛上的最高峰不在勃朗峰，而在大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

3.*地中海*，这个壮观的封闭性的海洋，轻轻拍打着欧洲的南部海岸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海上交通为文化、经济和政治交流提供了现成的渠道。它是古典世界的摇篮。在恺撒统治时期，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罗马的湖泊。在文艺复兴和此后的几个世纪，这里是物质与文化相互交融的最重要的文明中心。[6] 然而，令人感叹的是，自从罗马政权衰落之后，地中海就再也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海上强国从来就难以战胜以四方疆域为根基的陆地帝国。事实上，一旦穆斯林国家在勒旺（Levant）和非洲扎下根，地中海就变成[59]了长期存在政治分歧的地区。海上和商业霸主如威尼斯无力统一整个地区。十九世纪的欧洲诸霸主从叙利亚到摩洛哥到处建立殖民地，但他们受到对手的阻遏，无法摧毁位于土耳其的穆斯林的首要基地，因此也就无法建立起普遍的霸权。

政治上的不统一可能是导致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某种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统一性的原因。“平行政权”的存在，例如敢于藐视任何企图镇压它的南部意大利黑手党，体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7] 据大多数历史记载，地中海北部沿岸的居民数量大大超过南部邻居，其人口比例至少为二比一，因而占据主导地位。北非的人口膨胀将会打破传统的平衡。无论如何，“地中海地区”从未被局限于紧临海岸线的地区。在欧洲，地中海的分界线位于遥远的北部，达到巴伐利亚、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没有一个大国或一种文化曾经把所有这些地区都统一起来，即便是罗马也没有做到。

从欧洲其他几个封闭的海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历史中可以观察到类似模式。波罗的海取得重要地位的时间相对较晚。在汉萨同盟时期，它是德国商业扩张的焦点，在十七世纪，则是瑞典人争霸的焦

点。然而，没有一个波罗的海大国曾经实现了“海上霸主”的梦想。德国人、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彼此竞争，使得波罗的[60]海直到今天仍保持分裂局面。[8] [汉萨]

黑海，古人最初视之为“不好客的海”（Axenos），后来变成“好客海”（Euxine），再后来成了蓬杜斯海（Pontus）——地中海的连体双胞胎。它流经希腊、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然而，又是在这里，在俄罗斯崛起的一个重要的陆上强国导致其最终分裂。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及其卫星国始终盯着这片充满敌意的大海对面，分布在土耳其的北约南翼势力。更为严重的是，黑海的大部分区域很可能缺氧，也就是说，海水中浸入了过量的二氧化硫，“其深度造成了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无生命的水域”。如果把海水的层次发生“颠倒”的话，那么，将会引起“自末次冰期以来地球所遭受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难”[9]。

由于不可能实现对欧洲诸大洋毫无异议的统辖权，因此人们特别关心三个海上战略门户。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丹麦的松德海峡遏制住了大国的过度扩张，并对控制海峡的国家产生影响。[**松德海峡**]

松德海峡（SUND）

像其南部的直布罗陀海峡一样，丹麦的松德海峡被称作欧洲的颈静脉。它辖制着通往重要海洋的惟一入口，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和商业价值。[1]1200年，人们初次认识到其潜力，当时丹麦国王卡努特六世（Canute VI）囚禁了一些吕贝克（Lubeck）商人，直到他们付了钱才被获准前往波罗的海的青鱼捕捞区。从此以后，丹麦人就尽可能地强行榨取松德的过路税。松德税被中世纪其他波罗的海大国所接受，如波兰、条顿国家和汉萨同盟，十七世纪，顶住了瑞典的挑战，得以继续保留。1732年之后开始衰落，但仍继续存在，直到1857年丹麦签订战败赔偿条约为止，当时英国海军势力终于迫使丹麦人放弃了这项祖传的利益。即使在那时，松德海峡仍保持着重要地位，直到普鲁士王国于1866年夺取基尔（Kiel），并且修建了一条穿越松德海峡的威廉国王运河（1895年）。一旦飞机能够飞过海峡，所有的海峡，包括英吉利海峡在内，就都失去了战略意义。剩下的只有辉煌的记忆，关于一个渡口的记忆，以及在埃斯诺莱城墙上游荡的哈姆雷特幽灵的阴影。

4.*半岛的大陆躯干*因几个伸入周围海洋中的大型次半岛而被放大了。其中一个多山的岬角是斯堪的纳维亚，临近波罗的海。另外三[61]个临近地中海的是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巴尔干。还有两个临近黑海，它们是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它们尽管在地形上与大陆相连，但从海上比从陆地上更容易到达。

斯堪的纳维亚，曾经是欧洲冰盖收缩后留下的遗址，从来就不能供养大量人口。但是，荒凉的西部港口海湾受湾流的影响变得温和；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矿物；退缩的冰川留下的冰碛湖中盛产鱼类。尽管气候条件不佳，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得到的安全可靠的家园足以补偿这一切。

伊比利亚半岛由一大块板状陆地组成，比利牛斯山高高的山峰把它与大陆分隔开来。其东部海域构成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在很早以前，它先后落入迦太基人、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之中。但是，大部分干燥的内陆沿杜罗河（Douro）、塔古斯河、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河谷朝大西洋方向延伸。因此，在近代，当阿拉贡王国向东扩张到达地中海的时候，葡萄牙和卡斯蒂尔（Castile）偷偷地向西边的大洋挺进。他们是欧洲最早的殖民强国，曾一度将世界在他们手中瓜分。

意大利是最完美的半岛。阿尔卑斯山是北部的一道天衣无缝的屏障。波河平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天然厨房。狭长而多崖的“小腿和脚趾”部分庇护着广大肥沃而滋润，并且易于通向大海的山谷。意大利的某些地方富裕而性格外向，其中一个是罗马，那里兴起了古代世界最大的帝国。但是，罗马衰落之后，这些地区拼命维护自己的独立，以至于差不多过了2000年，意大利都未能再次实现统一。

巴尔干半岛的条件远远不及意大利，其内陆更干燥；从迪纳拉山（Dinaric Alps）到罗多彼斯山（Rhodopes）的山脉更多岩石；山谷更偏僻，不便于通往海洋。它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是使那些固守在本乡本土、停滞落后的社团得以保存下来，并隔断了地中海世界与多瑙河盆地之间的直接通道。

克里米亚半岛，曾被称为陶鲁斯（Taurus），其主要部分是位于乌克兰大草原——那里最近才出现永久性定居点。它面向大海、太阳和南方，在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征服前，是一系列东地中海文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半岛城**]

高加索也具有许多半岛特征。尽管在地形上，它的两端都与大陆相连，北部连着欧洲，南部连着亚洲，由于许多巨大的山脉环绕在其朝向大陆的一侧，因此其走势不得不朝向大海。山顶海拔18000英尺（5486米）的大高加索山麓比阿尔卑斯山或喀尔巴阡山要高得多。南

部的小高加索在阿拉拉特山（Ararat，16786英尺，或5165米）也呈现出类似的隆起。高加索居民属于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欧亚人种。[**高加索人**]

5.*大自然赐予欧洲一万个岛屿*。最大的岛屿有冰岛、爱尔兰岛、大不列颠、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和克里特，它们曾在不同时期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实体。一个王权统治下的小岛，在特殊情况下，并且在短期之内，曾一度急剧膨胀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 [62] 国。它们全都属于欧洲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地形上和心理上却被分割开来。迈西纳和叙拉古的邮箱上的两个一模一样的投递槽正好显示出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西西里（Sicilia）和大陆（Continente）。

从施皮茨山（Spitzbergen）到马耳他，许多较小的岛屿像看守一样，站在孤独的大海中央。其他一些岛屿却美美地聚在一起，连成群岛，由此产生出一种休戚相关、相互认同的感觉。设得兰群岛（Shetlands）、奥克尼群岛（Orkneys）、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脱离了大不列颠；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脱离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更为重要的是爱奥尼亚（Ionians）、斯波拉泽斯（Sporades）、基克拉泽斯（Cyclades）、佐泽卡尼斯（Dodecanese）脱离了希腊。所有这些岛屿都既带有集体特征，也带有个性特征。[**法罗**]

[63]

法罗（FAROE）

在欧洲所有岛屿中，没有哪一个能与法罗群岛那孤寂的壮丽相比，它那高大的黑色玄武岩峭壁从白浪滔天的北大西洋的海中崛起，介于冰岛、挪威和苏格兰之间。有人烟的岛屿共17座，集中分布在斯特莱莫（Stremoy）和托尔斯（Tórshavn）的主要港口，这些岛上的现代人口为45464人（1984年），主要从事渔业。作为八世纪定居于此的挪威人的后代，法罗人参加了西挪威的议会（Gulating），也参加他们本地的议会（Loegting）。[**民众大会**] 他们的语言属于一种挪威方言，但他们有自己的传说、诗歌和艺术家，有自己的文化。然而，自从1814年挪威被丹麦兼并，这个"欧洲最小的民主制政权"就不得不服从于丹麦总督和丹麦利益。

结果，法罗民族运动直接针对丹麦，这个"与他们最无共同语言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 由此，法罗继冰岛之后，首要的目标是要保持自身独立。1940年6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

动，当时哥本哈根被纳粹占领，一艘英国战舰命令一名托尔斯港的船长升起法罗的旗帜，换下丹麦国旗。1946年全民公决主张拥有无限制主权，是为1948年4月1日和解协定之先声。法罗接受了在丹麦王国下的自治。1970年，成为北欧议会的独立成员。托尔斯港的挪威宫（Norðurlandahusið）用瑞典的木材、挪威的石板、丹麦的玻璃、冰岛的屋顶建成，并配有芬兰的家具。

然而，今天，隔离局面正在飞快地萎缩。举例来说，大不列颠的海上帝国正是兴起于海军力量能有效地将它与大陆事务相隔离的时代。同等程度的隔离不再是可能的了。海军力量被飞机所超越，而飞机又被ICBMs（洲际弹道导弹）所超越，它们使得地表特征，如英吉利海峡几乎变得无关紧要。大英帝国消失了，而英国对其大陆邻居的依赖相应地增强了。1994年开通海峡隧道是一个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不列颠岛国历史的终结。

从半岛所分化出的几个主要区域来看，有三个次地区具有特殊重要作用：米迪（Midi）、多瑙河盆地和伏尔加走廊。

米迪，即现代法国的“南部”，紧邻地中海之滨，界于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它为地中海上游弋的人们提供了惟一一条舒舒服服通往北部平原的通道。在米迪一登陆，立刻就有一条轻松通往大陆主要部分的旅程展现在眼前。从古代的马赛，或者从罗讷河河口的阿尔勒（Arles）出发，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越朗格多克地区（Languedoc）的低地到达大西洋，或者环绕中央山岭抵达洛林河与塞纳河的源头。罗讷河的主要支流索恩河（Saône）直通贝尔福特峡谷（Belfort Gap），然后缓缓泻入莱茵河。在直布罗陀和达达尼尔之间其余的每个地方，都会有早期朝北走旅行者所遇到的山地隘道、走不通的死路或越绕越远的弯路。

米迪是介于地中海与大平原之间的桥梁，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产生了重要后果。它为南部古代文明与北部“蛮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最有效的舞台。它给罗马人提供了山南高卢，这一意大利以外第一个重要行省；给第一个建立起重要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帝国的蛮族法兰克人提供了天赐的阳光和高度发达的文化。他们在罗马政权覆灭之后的一个世纪，于公元537年建立了一个立足之地，并且再也没有放弃它。后来的法兰西王国，一部分在北部，一部分在地中海，发展出最有影响、最具普遍意义的大陆文化。

多瑙河盆地，像米迪一样，将大平原与地中海联系起来，但此处[63]的联系是东西走向的。多瑙河发源于黑森林，穿越群山，在帕绍

(Passau)的巴伐利亚峡谷间流淌，东流1500英里注入黑海。对于从东部而来的人们来说，它提供了通往内陆腹地的最短捷径；对于平原上的人们来说，它是一条强烈地吸引着人们通往南部海洋的道路。其绝大多数地段组成了罗马帝国的主要边防线，因此也构成了“文明”的边防线。在近代，多瑙河流域为哈布斯堡多民族大帝国提供地域基础。这里也上演了一幕幕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重大冲突。［多瑙河］

[64]

多瑙河（DANUVIUS）

在古代，多瑙河是欧洲半岛的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公元一世纪，这里设立起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把文明与野蛮分开。拉丁语称之为Danuvius，希腊语称之为Ister。

然而，后来，多瑙河发展成为一条欧洲主要的运输河流，一条贯穿东西的开放的林荫道。[1] 在罗马那沃纳广场（Plazza Navona）上，贝尔尼尼（Bernini）著名的四大河流喷泉组合中，正是多瑙河作为欧洲的人格化身，与非洲的尼罗河、亚洲的恒河、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并肩而立。

在上游多瑙地区（Donau），河水穿过日耳曼世界的心脏。位于黑森林中的多瑙河发源地的源头公园里的有一块陶瓷匾，上面写着：此处为多瑙河的发源地。穿过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的故乡锡格马林根（Sigmaringen），河流通过乌尔姆（Ulm）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这两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接着，穿过帕绍，进入奥地利的“东部王国”。在奥地利，它沿着尼贝龙根［**尼贝龙根**］，穿过林茨（Linz），弗里德里克三世皇帝被葬在那里，墓碑上写着格言A－E－I－O－U，意为“奥地利将屹立于世界之巅”（Austria erit in orbe ultima）；流过阿姆斯特丹（Amstetten），弗里兹·费尔迪南德（Franz Ferdinand）被葬在那里；流过凯尔林（Kierling），卡夫卡死于此地；流过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那里是海顿最后的居所：

> 上苍，请接受我们的感激！
> 我的一生
> 是一首和谐的旋律

流过维也纳，如同梅特涅所说，在那里，“欧洲”与“亚洲”相会。

在中游都纳（Duna）地区，宽阔的河流进入匈牙利，这块马扎尔人的土地，像楔子一样，插入斯拉夫的两侧。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波罗尼（Pozsony）/布雷斯堡（Pressburg），河水拍打着曾为“上匈牙利”的首都，现为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费尔特德（Fertood）是埃斯泰尔哈齐（Eszterházy）的“第二个凡尔赛宫”的旧址；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匈牙利先民的故乡圣安德列（Szentendre），曾为塞尔维亚人流放者的避难所，现在成为波希米亚艺术家的圣地。在布达（Buda）和佩斯（Pest）的河岸一侧，有一座土耳其城堡，面对着对岸的一座英式议会大厦。[**布达**]

在游，在铁门关之外，河水穿过天主教地区进入正教地区。在尼克波里斯［**尼科波利斯**］，乌尔菲拉（Wulfila）将希腊文圣经翻译成哥特文，是为“日耳曼化的开端”。[**《圣经》**] 位于左岸的罗马尼亚自称前身为图拉真时代的达契亚（Dacia）。右岸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建于拜占庭行省的顶端，曾长期被奥斯曼帝国占领（被称为图纳）。奇莱瓦乔（Chileavecche）曾经是热那亚的前哨。最后一站是位于多瑙河三角洲的苏里纳（Sulina），那里有欧洲最大的鸟类保护区，那是一个不属于文明世界的，属于永恒大自然的世界。[2]

对于地理学家来说，河流是沉积物和贸易的载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承载着文化和观念，有时也承载着冲突。[3] 它们就像生命本身。从多瑙河源头到三角洲，河水流淌了2888公里，从未停歇。

在所有的陆桥中，没有哪个能比伏尔加河流过的地区更重要。按照现代的划分标准，大陆分界线位于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一线。乌拉尔以西，在伏尔加河盆地，一半在欧洲；乌拉尔以东，在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一半在亚洲。因此，在伏尔加沿岸，站在萨拉托夫（Saratov）或者察里津（Tsaritsyn）的人其实是站在关口上。因为伏尔加是大草原高地上的欧洲第一站的标志。河水在波罗的海与高加索之[65]间的走廊流淌着。直到十七世纪，伏尔加一直是基督徒居民区所达到的极限，因此是一道重要的文化疆界。它是欧洲最大的河流，是一名恪尽职守的卫士，守护着从“大西洋伸展到乌拉尔”的半岛。

环境是变化的，这一点被地形地理学各方面所公认。然而，传统理论，如地质学给人的印象是，这一变化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以至

于在人类生存的时间框架之中根本感觉不到。只是在最近，人们才意识到，现代的环境远不像以前所以为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

例如，气候就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美国学者爱尔斯沃士·亨廷顿发表了他对加利福尼亚红树林卓越的研究成果。这是历史气候学的开端。由于红树林可生存三千年以上，又由于其年轮的大小随着每年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红树树干的横切面提供了三千年以上的气候变化的系统记录。亨廷顿的技术现在被称为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在它的启发下，产生了一种另类气候术语“脉动理论”（Pulsatory Theory），可适用于各个大洲的历史。结果给这一理论贴上了环境决定论的特殊标签。地中海古典文明的发展应归功于潮湿期的到来，它使北非能够种植小麦，举例来说，在同一时期，北部欧洲遭遇了过量降水、大雾和冰雹。古代世界的衰落应归咎于气候向相反方向变化，它使地中海的阳光洒在阿尔卑斯以北。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蒙古人的迁移（见原书第364—366页），其原因可能是干旱在中亚绿洲蔓延。在其晚期著作《文明的推动力》（1945年）中，亨廷顿探讨了现实环境中的其他因素，例如饮食和疾病，及其与人类遗产的互动作用。[10]这些粗糙的联系给这一研究对象带来了坏名声，此后人们努力修改、完善早期的发现。

尽管如此，周期性理论（periodicity theories）仍继续获得支持。“周期热”（Cyclomania）还没有消失，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太阳黑子与蝗虫灾害等每个因素都有联系。无论它们多么值得优先考虑，学者们最重视的还是环境变动现象，及其对人类事务的影响。总而言之，一个基本事实是气候确实在变化。罗马世界的某些地区曾经人口繁荣，现在却变成了沙漠中的废弃之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维京墓穴曾被挖成一个个小方块，而那里的永冻层坚硬得根本无法刨掘。在十七世纪，一年一度的交易会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冰面上举行。军队曾在波罗的海冰冻的海面上穿行，现在要是在那个地方做这类冒险活动的话，简直就等于自杀。欧洲环境不是固定的实体，即便是微妙的变化节奏也往往不能被精确地测量出来。[**葡萄收获学**]

[67]

葡萄收获学（VENDANGE）

历史气象学依据文献中保存的记录和大自然本身所保存的记录。前者包括日记、旅行者的陈述，地产经纪人、谷物商人和制

酒商所保留的气象数据。后者包括对树木年轮、化石、沉积物、钟乳石和冰川的研究。[1]

大自然本身的记录的精确度令人惊讶，甚至在有史以来的时代也相当精确。克里米亚的大盐湖每年的沉积物可追溯到公元前2294年。一些巨大的石笋，例如在汝拉州（Jura）的奥尼涅克（Aven d' Orgnac）溶洞中的石笋有7000多岁，其方解石沉淀物的不同厚度忠实地反映了历史降水情况。

物候学（Phenology）是研究水果成熟的学科，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葡萄收获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每年法国的众多葡萄园都要公布即将进行的葡萄采摘时间。提早的日期意味着有一个阳光充足的生长季节；推迟的日期意味着有一个寒冷的季节。通过排列某个特定地区首批酿制的葡萄酒的日期（Première Cuvée），历史学家们可以制作出相当长时期的完整的“物候序列”。通过对照不同地区的物候序列，他们可以计算出每个地区的季节性的平均日期。这些“葡萄收获曲线”（courbes de vendanges）显示出气候变化的精确指数[2]（见原书附录Ⅲ，第1220页）。

冰川运动提供了另一种信息来源。冰川的推进发生在寒冷时期，收缩则发生在相对温暖时期。更有甚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冰川在每个特定年代的长度通常可以根据见证人的陈述，根据旧的印刷品，或者根据官方记录得以确定，诸如萨伏伊伯爵（Comptes de Savoie）宫廷档案中所包含的视察官关于冰川挺进，摧毁村庄，或阻碍村民们交纳什一税和捐税的报告。例如，1600年是沙莫尼（Chamonix）的灾难之年，居住在勃朗峰两侧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居民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对于瓦莱州（Valais）的罗讷冰川（Rhonegletscher），或者蒂罗尔州（Tyrol）的韦尔纳克特（vernagt）的冰海冰川（Mer de Glace）进行的深入细致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冰川在十六世纪晚期时的终点要比现在它们所在的位置低几公里，说明欧洲存在一个“小冰期”。冰川的巅峰时期在1599—1600年，1640—1650年，1680年，1716—1720年和1770年。1653年，当地居民挑衅似的在阿莱奇冰川之上立了一尊圣伊格那提乌斯（St Ignatius）的塑像，于是冰川止住了脚步。自1850年开始，现代冰川就持续发生退缩。[3]

当不同资料来源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时，气候数据几乎是令人信服的。例如，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疯狂波动的天气既被德国树木年轮所证实，也被法国—瑞士葡萄收获学所证实（见原书附录Ⅲ）。欧洲葡萄园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年代在1816年。在万圣节

(11月1日)那天，法国东部开始收集腐烂了的葡萄。正在瑞士度假的玛丽·雪莱甚至无法出门去散步。她只能待在屋子里，结果创作出了《弗兰肯斯坦》。

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3—1939年)，阐释了一个关[66]于文明发展、崩溃和分解的综合理论，它还是一部杰出的环境史巨著。根据人类对“环境的挑战”所做出的反应讨论文明的产生之后，他提出“灾难的益处”定律。引用罗马的荒野、犹地亚的半荒漠、勃兰登堡的沙化荒地，以及新英格兰恶劣的海岸作为沉默不语，却引起人们强烈反应的环境。也许还要加上莫斯科大公国的落后、偏远地区。在列举了“打击、压力和惩罚的刺激”之后，他总结出“中庸之道”的概念。如果说东欧的斯拉夫人苦于从前缺乏刺激的话，那么，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则苦于遭受了过多的灾难。根据汤因比的理论，最接近理想状态的事情是古希腊人所创造的希腊文明——“一朵从未绽放过的最完美的花朵”。[11]

目前，尽管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被低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受到重视。[生态]历史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恰好产生于“温室效应”刚刚开始扭转人们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之前。它广泛借助于神奇的技术魔法。航空考古学革新了我们对史前地理景观的知识。研究河流沉淀物模式的沉积物学和研究冰川里冰块形状的冰川学，为千百年前环境变化提供了新的确证。测试古代聚居地土壤中能说明问题的磷酸盐的地理化学分析法赋予考古学家新的强有力的工具。分析保存在土壤中的古代谷物的孢子学(Palynology)，或花粉分析，使人们得以重构先前的植物谱系。专家们围绕着“大榆树的衰落”、史前农业中的谷物，或周期性出现的森林空地的证据展开争论。靠研究泥炭沼泽构成物质和聚集比率的泥炭分析认定，在公元前3000年—前1000年之间，存在过五种主要的气候“恶劣期”。史前史科学已经走出考古学家只能从地下挖掘东西的时代，正努力将他们的发现同古人文献中残缺的参考资料联系起来。[碳14]

[68]

碳14(C14)

4000年是碳14同位素显示出可测定的放射性迹象的周期。这意味着用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可以被应用于自新石器晚

期到刚刚过去的历史中的各种有机物质。公元前35000年，尼安德特人消亡殆尽，人类开始生活在克罗马农的山洞中。

碳14的开发利用赢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其价值在于，碳14的衰变具有自发的、固定的频率。它是三种碳素中惟一具有放射性的元素，而且，通过宇宙活动对大气层所产生的辐射，在所有生物中不断积累。它在骨骼、身体组织、甲壳、肉、毛发、绳索、布料、木头和许多与考古遗址相关的物质中都有所表现。有机体一旦死亡，就马上发生衰变，并且持续不断地发生衰变，一个半衰期超过5730多年，平均衰变期约为8033年。据测量，发生百分之一的衰变大约需要80年。

对结果的校正充满了变数。但是，近年来取得了重大改进，原因是互补技术的发现提供了一个便于比较的基础。例如，热照明（TL）和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出矿物质晶体中的自然辐射所引起的微小变化，这对于测定年代特别起作用。用群体光谱加速器（AMS）进行碳同位素测量将年代测定范围扩大到大约100000年，对前个时代关于最古老的类人生物遗迹的年代估计提出了质疑。[1]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放射性碳素定年的方法已经被用于指导大量数据采集。以中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为例，他们可以参考在欧洲各地发现的样本，这些发现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一条来自下萨克森（Saxony）的埃特祖姆（Eitzum）地区的珠链状陶器残片被测定为约6480±210年。西伯利亚的瓦拉萨克（Vlasać）遗址的木炭大约为7930±77年。在靠近华沙的卡罗瓦涅（Calowanie）发现的碳化松树干的年代大约为10030±120年。[2] 每一项新的测定都加强了整体画面的可靠性。

然而，碳14所遇到的最刺激的挑战当属给都灵的裹尸布测年。据说这块裹尸布是十四世纪从圣地运到欧洲的，上面带有死者面容和躯体的淡淡的印迹，并被尊奉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遗物。1988—1989年的测试表明，这块裹尸布制作于公元1260—1390年之间。但是他们并未对死者的身形做出解释。[3]

今天，史前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史前社会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几乎把所有新文化现象都用人类迁移理论来解释的时代。一种新的墓葬形式的出现，新仪式、新工艺或者新语族的出现都自动同假想中的新民族的来临联系起来。现在，尽管不应低估史前迁移，但物质和文化的变化也可能是在现存人口当中发生的革新。必须将技术进步、宗教

信仰的转变和语言变革也统统加以考虑。

欧洲的史前史涉及两套时间幅度截然不同的年表。地理时间表的跨度始于大约45亿5千万年前地球的形成，从无生代（Azoic）到全[69]新世（Holocene），被分为代、期、世。相比之下，人类的生命只局限于地理时间表的终点，最早起源于上新世中期的非洲。在更新世中期，人类到达欧洲。直到第四纪末期，人类才进入所谓“文明”阶段。欧洲变成现在这般模样还不到500万年。在欧洲有人类存在的时间也只有100万年之久（见原书附录Ⅲ，第1215页）。

在地理时间范畴中，欧洲半岛的形成定然被算作一个近代的事件。在8亿年前，大多数后来构成欧洲大陆的陆地还只是浸泡在大海中央的一些散落的群岛。此后，当大西洋的扩展达到其极限的时候，漂浮的非洲板块从南部锁住了大洋缝隙。500万年以前，非洲还直接与欧亚大陆接壤，与此同时，阿尔卑斯山和阿特拉斯山从干燥的地中海凹地的两侧拔地而起。但是，此后“直布罗陀的天然大坝崩溃了”。比维多利亚瀑布大一百倍的巨大海潮涌进来，塑造了我们所熟悉的半岛的轮廓[12]。1万年以后，又发生了两次大变动，终于打通了英吉利海峡和丹麦的松德海峡，由此先造出了不列颠群岛，而后造出波罗的海。

在此后约100万年的时间里，年轻的半岛经历了17个冰期。在最厉害的时候，冰川边缘抵达德文郡北部、汉诺威、克拉科夫和基辅一线。在温暖的间冰期，有一种类人生物开始出现了。欧洲最早的人类踪迹是在匈牙利靠近维尔特斯却略斯（Vertesszölös）的地方，以及在意大利的伊塞尼亚（Isernia）地区发现的，时代都为公元前700000年—前850年。伊塞尼亚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以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各种动物为食。在尼斯河岸边的塔拉·阿马塔（Terra Amata），发现了一个40亿年前的人类的足迹，印在被烤得坚硬的泥块上。1987年，在西班牙靠近博尔赫斯（Burgos）的阿塔普埃卡（Atapuerca）的幽深洞穴中发现了一个有人类遗迹的化石洞窟。

在冰川时期，人类的进化经历了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新人（*homo sapiens sapiens*）几个阶段。1856年，在尼安德特山谷中靠近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采石场发现了一种过渡性生物的遗迹，因而引起了关于人类起源的公开争论，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猴子**] 拥有巨大骨架和短小四肢的尼安德特人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于冰川条件的欧洲人变种。他们使用燧石工具，已知道使用火的秘密，埋葬死者，并照料生者。其独特的“莫斯特”石器制造技术因多尔多涅（Dordogne）遗址而得名。他们靠集体组织进行狩猎，正如泽西岛上的圣布雷拉德村（La Cotte de St Brelade）

遗址，或者最近在波兰发现的兹沃伦（Zwoleń）遗址所显示的那样，那里的陷阱使用的时间超过数千年，带有大量野马和猛犸象的压痕。他们在大约40000—35000年以前，在最后一个间冰期消失。最近在圣凯萨莱（St Césaire）的发现说明他们同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新移民一道生存了一段时间。[13]

[70] 新移民体格纤细，但更加灵巧，指骨细小，只及前人的一半。如同北俄罗斯的桑格（Sungir）遗址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能够用精致的骨针穿针引线，还能缝补衣裳。他们是广为人知的“洞穴人”，但山洞只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他们在原野游荡，猎取野牛和猛犸象，并采集野生植物。在乌克兰的麦兹里奇（Mezirich），一个冰川时期的陷阱仍保存得完好无损。宽敞的茅舍用数以百计的猛犸象骨头搭建而成，上面覆盖着兽皮。[**采集狩猎者**]

[71]

采集狩猎者（GAT-HUNTER）

很少有人把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或者说“国家”的起源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前。一些理论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对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部落和部落酋邦进行了考察。另一些人考察在农业方面发生的新石器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定居地的发展。例如，根据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的研究，一个按照居住地，而非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国家，其先决条件必须包括地域性权威、剩余资本、象征性纪念物、长途贸易、劳动分工、分层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文字艺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古希腊城邦首先具备了这些条件（见第2章）。

然而，关于狩猎采集者的复杂社会的分析，将这个问题在时间上大大向后推了。狩猎采集者，或采集狩猎者，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因为农业进步而完全摆脱古老的灭顶之灾的威胁。相反，他们享受了数千年“无尽的悠闲与富足”。当农业兴起时，他们对此并不熟悉，但排斥它，只是把它当做边缘性或补充性的活动。

更有甚者，在史前时代晚期，他们发展了允许有不同分工存在的社会结构。作为对四处游荡的猎人—战士和居家的采集者的补充，一些集团专门从事新的集约型捕鱼、捞海鲜、割野草和拾坚果，或者逮鸟雀。另一些人空闲下来，成为联合体和地区联盟中的专门的组织者或协调人。换句话说，狩猎采集者团体拥有一个萌芽状态中的代议制政治阶级。通过对北美、澳大利亚或新几

内亚的土著居民进行比较，可以找出这个历史问题的答案。

由此看来，关于狩猎采集者的最大疑问，并不是“他们是如何朝着农业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高级阶段迈进的?”而是“是什么使他们放弃了原始生活方式中安全、供给充足、心灵上无拘无束这些好处的?”[1]

第一次火山大喷发导致了末代冰期的终结。在非洲板块的挤压下，地中海盆地的边沿被拉开了一道裂缝，并造成了一连串的火山，这股压力直到今天仍然存在。36000年前，最大的一座火山喷发了，它留下的火山灰烬一直飘到了伏尔加河。在靠近那不勒斯的波佐利(Pozzuoli)，它留下了一个方圆7英里宽的火山坑（caldera)。它是历史上所有火山大喷发的先驱——后来的大喷发是公元前1628年在塞拉岛（见原书第93—94页)、公元79年在维苏威［**潘塔**]、1669年在埃特纳。它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一直如履薄冰地在脆弱的地壳——这份地理遗产上生活。

欧洲史前史的人类部分通常被约定俗成地描述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体系”。该体系在1836年由丹麦古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最先提出，它依据原始人类的工具的变化制定出一个时间框架。因此，旧石器时代指的是冰期结束前，人类使用砍削石制工具的漫长时期。中石器时代指在公元前8000年—前3000年左右，继末冰期之后到来的晚近时期。我们自己主观的年代学所说的公元或公历（common era）前两千年［**公元**]，曾连续经历了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每一个技术“时代”可分成早、中、晚阶段。然而，需要记住的是，这种三时期体系并非建立在任何绝对时间范畴的基础上。在任意一个给定时期，某个地方可能还徘徊在新石器时代，与此同时，别的地方已进入铁器时代。在任意一个给定地区，那里的人们可能生活在不同发展阶段，或者同时采用不同形式的技术。

旧石器时代可追溯到100万年前。它与地理学时代的第四季次末期更新世同步，也分别与最末代大冰川——明德尔（Mindel)、里斯(Riss）和乌尔姆（Würm）同步。除了尼安德特人和慕斯捷时代（Le Moustier）以外，在克罗马农（1868年)、格里马尔蒂（Grimaldi，1874年)、康勃—卡佩莱（Combe - Capelle，1909年)、尚塞拉德（Chancelade，1888年)，并且在阿比维耶（Abbeville）与奥伊楚夫（Ojców）之间许多地点都有不可估量的珍贵发现，每个发现都与特定的人种、时期、文化有关。在奥瑞纳克（Aurignac)、索鲁特莱（Solutré）和马德

莱纳（Abri la Madeleine），首次出现了以“维伦多夫（Willendorf）的维纳斯”或“劳塞尔（Laussel）的维纳斯”为代表的人形雕像。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马格达林阶段（Magdalenian），随着骨器的流行，在最后一片冰盖的阴影下，洞穴艺术取得了卓越成就。精彩绝伦的地下[71]艺术画廊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1879年）和多尔多涅的拉斯考（Lascaux，1940年）得以保存下来，以至于某些评论家把它们称为“法兰西—康塔布里安学派”。在里维埃拉（Riviera）靠近芒通（Menton）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了来自印度洋的一大堆贝壳遗迹（Cassis rufa）。这些贝壳被认为拥有起死复生的威力，它们在此出现，看起来，既证实了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也证明存在着远程贸易网络。[14] [劳塞尔]

[72]

劳塞尔（LAUSSEL）

“劳塞尔的维纳斯”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0年。它是一尊刻在多尔多涅的一个山洞内壁上的小雕像，并用红赭石颜料涂抹。这是一个看不清脸部特征的坐着的女性形象，但长发浓密，垂落肩头，乳房长大，悬挂在胸前，两膝岔开，露出阴户。左手抚摩着怀孕的肚子，弯曲的右臂高举一支月牙形野牛角。

像占据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欧洲早期艺术人像一样，明显的女性性别特征在这种艺术品中既醒目又令人心仪。人们普遍认为它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的神性，“伟大的宇宙之母”的变异体，该崇拜在母系社会的宗教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有一种解释说，它可能出现在面具仪式舞蹈中，在那里，女人、男人和孩子试图同动物灵魂进行神秘的结合。有一点不太确定，那就是它是洞穴居民形象的最高表现形式，他们生活的洞穴是“大地母神的子宫—坟墓—迷宫”，而“流血—妇女—月亮—野牛角—生育—魔力—生命循环都类比为具有神秘力量的连绵不断的回声或和声。”[1]

母系社会，或具有“母权”特征的史前社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然而，关于母系社会只在最“原始”的阶段实行的假设现在被视为无效。诗人罗伯特·格拉夫斯（Robert Graves）在其论神话的著作中探讨了欧洲母权文化的起源及其命运，考察妇女地位的衰落——从古代的神圣性到古典时代的奴隶性。[2]

另一些人研究语言中的阴性起源，由此研究意识的文化。在

人类漫长的“婴儿时期”，妇女和儿童很可能在一起学习如何说话，而此时男人们则在外面打猎。若果如其然，性别的差异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男孩子必定同他们的姐妹们在一起学说话。

更可信的说法是，极有可能，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彼此重叠，造成广泛的混杂局面。如果这种金布塔斯（Gimbutas）的理论是正确的（见原书第 86 页），那么，新石器晚期的“库尔干人”向黑海草原的挺进就不仅标志着印欧人的到来，而且标志着好战的父系传统的到来。另一方面，继第一股伊朗—萨尔马提亚同盟浪潮——萨尔马提亚人到来之后，新来的母系制人种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同先到的父系制人种相融合。由于这种联系，希罗多德听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传说阿马宗（Amazon）女战士们逃到黑海南岸，同斯基泰勇士婚配之后，在“从美奥提亚湖出发走三天路程”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家园。这个故事被斥为纯粹编造，[73] 直到考古学家真的从萨尔马提亚墓地里发掘出了许多女战士的遗骨。在顿河的科尔比阿科夫（Kolbiakov）发现了一座萨尔马提亚公主的坟墓，这位时代较晚的老式公主同她的战斧葬在一起。[3]

像每个公认的教条一样，女权主义者对“史前史”进行夸大其词的研究。但是，这并非完全不可信：

> 因为我们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以及整体与宇宙分割开来，以至于人们十分难以理解冰川时代人文精神的整体论和神话诗学思维，只有诗人或神话学家才能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所谓工具、猎人和男人，当我们发现的雕像和绘画大声宣布，这种冰川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一种艺术文化，是对动物和女人的热爱——采集同狩猎同等重要，但是人们只讨论狩猎。讲故事已被拿来讨论，但是讲故事的人是个猎人，而不是衰老的月亮神女祭司。人们想象着第一次成人经历，但这种经历并不是月经初潮来临时的少女将要同月亮之间产生某种联系，而是一个少年男子即将变成一个伟大的猎人。[4]

无论西方文明如何定义，一般都认为它具有犹太—基督教传统以及古典世界之根源。这两种文化来源，无论是耶和华的，还是宙斯—朱庇特的，都是以阳性神性为主的。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在漫长的早期时代，神性曾经是阴性的。可以设想，只要人类还是一个弱小的、易受伤害的生物，他就更倾向于繁衍与生殖的女性角色，而不是杀戮与死亡的男性角色。

各种各样的人梦想着在遥远的过去存在着一个失踪已久的天堂。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拥有自己理想化的伊甸园，他们的半神话的黄金时代。现在，女权主义者们正在做着同样的事。[5]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劳塞尔的维纳斯，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东西，不是让男性玩赏的性对象。事实上，她根本不是维纳斯。

[73] 中石器时代代表了一个过渡时代，当时的人们正在适应迅速改变的气候条件。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冰原上的冰碛末端的年代为公元前7300年。技术进步的特征表现为细石器的出现——很小的、尖利的或开刃的燧石器。鱼类和贝类食物供给的极大增长把人们吸引到湖泊、河流和海岸沿线定居。南部的早期文化，如比利牛斯山的阿济尔农舍（Mas d' Azil），因吸收更多的北方文化因素而得以完善。例如，西兰岛（Zealand）的马格勒摩斯（Maglemose），或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埃尔特波莱（Ertebølle），在那里出现了深海捕鱼业。细石器石斧第一次能剥落最粗壮的大树的树皮。

[74] 从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植物和动物的种植与驯养，又被称为农业，伴随着石器技术的进一步改进，通过研磨、抛光和钻孔制造出来的工具质量上乘。“新石器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000年的中东，在欧洲的北部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从此开始出现驯养的牛、羊、猪，马匹饲养和杂交的骡子，系统的谷物生产、耕耘、纺织、制陶、采矿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殖民浪潮席卷了半岛，而在此之前，半岛上只有零星的居民点存在。

可以看出存在着两条体现新石器时代进步的主线。第一，与线形陶器有关，它从多瑙河谷迅速转移到中欧。在第五千纪的短短700年时间里，它穿越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和荷兰之间的1500英里土地。最初的定居者们簇拥在庞大的公共长屋的周围居住。长屋是取自新夷平的森林中最粗壮的木材建造而成的。农业上过度耕种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导致暂时的退步，随后废弃的地点又被重新占据。第二，与“压模陶器”文化的传播有关，它向西移至地中海沿岸。在第四千纪，农业定居地更远地扩散到半岛的西部和北部的极限——抵达伊比利亚、法国和瑞士、不列颠群岛、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东部的大平原。到大约公元前3200年，整个半岛低于北纬60度的地方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生产经济。[15] **[采集狩猎者] [塔木兹] [葡萄酒]**

[75]

塔木兹（TAMMUZ）

塔木兹是宇宙之母伊丝塔（Istar）或阿斯塔尔（Ashetar）之子，是古代巴比伦的谷神。收获结束时，最后一捆麦束的长茎需被打褶，塞进鼓风机里，或稻草笼子里，使得神灵能够在此避难，直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在麦收的地方一直都在制作这种谷神偶像或"玩偶"。在巴尔干人那里，有一个名叫蒙太古的扇形玩偶娃娃，仍保持着其尼罗河祖先的造型风格。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稻草扎成的星星和稻草扎成的天使是流行的圣诞节装饰品。

在英格兰，当这门艺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绝迹的时候，乡村自然资源保护者们收藏了大量全套的谷神玩偶。在种植小麦的乡村到处都能发现一些简单的设计，诸如领圈和马靴，绳结和猫抓，钟表和灯笼。当地特产包括施罗普郡（Shropshire）的牡马、德比郡的王冠和剑桥的雨伞。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果核娃娃和肯特的象牙女郎只不过是"地母神"的现代版，是埃及伊丝塔女神远方的女儿，是希腊人的狄密忒尔（地母神，掌管农业的女神——译者注），以及罗马人的凯勒斯（掌管农业的女神——译者注）的现代翻版。[1]

世界上有三种最主要的农作物：大米、玉米和小麦。在三者中，"欧洲选择了小麦"。小麦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欧洲，无论欧洲人被迫定居何处，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小麦——他们首先居住在新石器时代的西北部荒无人烟之地，晚近时期定居于美洲、澳洲和南西伯利亚的处女地。这一"选择"过程因此包含了一系列数千年无尽的经历。尽管在欧洲，一直存在着裸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这些谷物的竞争，然而，小麦王的胜利挺进所向披靡。[2]

小麦——孕育谷粒的灌木科植物中的天才（Triticum）——已知有超过1000个品种。其谷粒极有营养，平均含有70%碳水化合物，12%蛋白质，2%脂肪，1.8%矿物质。其蛋白质含量大大超过大米，1磅产生1500卡路里热量。小麦所提供的营养是使大多数欧洲人在身材方面明显受益、超过大多数以米饭和玉米为主食的人的一个因素。小麦是一种季节性作物，只要求在春天进行播种、秋天进行收割的集约性劳动。不像种稻米的农夫，不得不长年累月地结成训练有素的生产小组来管理稻田。种小麦的农夫拥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搞点副业，种点别的庄稼，开荒、建筑、打

仗、从政。这里面也许恰好包含了导致欧洲社会史和政治史诸多[76]特征——从封建主义和个人主义到好战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前提条件。然而，小麦却迅速耗费着地力。在古代，土地只能通过麦地定期轮流休耕，靠家畜施肥来保持肥力。由此产生传统的欧洲混合耕作、畜牧模式，并出现谷物、蔬菜和肉类各种不同的饮食。

制作面包时，当面粉被掺水和成生面团时，小麦的蛋白质具有独一无二生成谷蛋白的成分。反过来，生面团保留着酵母发酵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结果是小麦面包要比其他的同类食品更轻，更好看，更美味。[3]“请赐予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对于这份情感，欧洲文明能与部分中东邻人分享，却不能从印度人、中国人、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那里找到同感。

[77]

葡萄酒（Vino）

葡萄酒不是一种寻常饮料，它总是与爱情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它的名字像维纳斯一样，源于梵文 vena，意思是“珍爱”。它来自高加索，在古代世界的日常饮食和宗教典礼上都有它的身影。它由诺亚（Noah）首次种植（创世纪 ix，20），不但给异教酒神崇拜以启示，而且启发了基督教的圣杯制度。[1]

图尔（Tours）的圣马丁（Saint Martin），生于萨巴利亚（Sabaria，现代的索姆巴特利 Szombathely）靠近多瑙河的地方，他是第一个庇护酒徒的圣人。圣乌尔班（St Urban）和圣文森特（St Vincent，戏剧“冒烟的葡萄酒”就取自他的名字）成为葡萄酒生产者和葡萄酒商人的主要保护神。

在波尔多（Bordeaux）地区的普里俄雷堡（Chateau – Prieuré），以及在勃艮第（Burgundy）的美丽海岸（Côte de Beaune）的克罗斯·伏歇（Clos Vougeot）等地，本尼迪克派僧侣（Benedictines）是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性葡萄酒生产的开路先锋。靠近马贡（Macon），位于黄金海岸（Côte d’ Or）的克鲁尼加教团（Cluniacs）和努伊·圣乔治（Nuits St Georges）的西多教团（Cistercians）沿袭了传统。根据伏瓦萨（Froissart）的记载，波尔多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曾要求派一支由 300 艘船组成的舰队把葡萄酒运回家。来自费坎（Fecamp）修道院的圣本铎修会僧侣（1534年）和来自皇太子领地

的包租商（Dauphine Charterhouse）发明了烈性酒。

欧洲的葡萄酒区域把半岛切分成两半。其北部地区沿着卢瓦尔河（Loire），经香槟地区，至摩泽尔（Mosel）和莱茵地区，由此向东顺多瑙河山坡而上，登上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克里米亚这条线路延展。只有很少几个葡萄酒生产地区不曾属于罗马帝国统治。曾被反对饮酒的奥斯曼人下令禁止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巴尔干葡萄酒，味道相当不错，同西班牙、意大利或法国葡萄酒一样古老。

葡萄酒的消费给社会、心理和医学造成了深远影响。人们把它视为决定宗教集结和政治集结的一个因素，例如在德国的新教—天主教的划分，甚至把它视为决定战争的命运的因素。“正是葡萄酒和啤酒在滑铁卢展开较量。葡萄酒的红色愤怒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冲击着啤酒之子们的毫不动摇的城墙……”[2]

圣马丁的家乡并未丧失其卓越的葡萄栽培技术。托卡伊山（Tokay）覆盖着火山灰的山坡，匈牙利平原夏季炎热的空气，博德罗格河（Bodrog）的湿气，以及美丽动人的熟透了的“阿斯簇（Aszu）”葡萄，这一切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组合。味道辛辣，柔软光滑，桃状的金托卡伊的果实（essencia）并非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并且近几十年来的生产情况也不好。但是它曾经被置于波兰限制最严的地窖中长达200年之久，作为敬献于国君的灵柩之用。一瓶弗朗西斯—约瑟夫时代的“皇家托考伊”葡萄酒仍然是鉴定师渴望得到的最高奖赏。[3]

在这个时代，湖畔村庄建立起来了，如靠近格莱诺贝（Grenoble）的尚拉维奈（Charavines）村，或者在汝拉（Jura）地区的查莱因（Chalain）村，乌腾堡的费德塞（Federsee）村，或者苏黎世湖畔的村庄。这些村落对于考古学家特别有价值，因为湖泥几乎充当着绝好的保护剂的角色，保存着从厨具到被啃掉半边的苹果核等一切东西。[托伦]

总而言之，六大新石器地区已经形成：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区，受到来自勒旺地区的强烈影响；特里波莱——库库特尼（Tripol' ye—Cucuteni）区位于乌克兰草原；有着绳文陶器和“战斧”民族的波罗的海—黑海区；线形陶器的中心区域，其心脏地区位于波希米亚，以莱茵河为西部前哨，以维斯瓦河为东部前哨；大平原上的北部区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漏斗状瓶颈酒杯器；有着“喇叭口状”酒杯的民族所属的西部区域，从南西班牙延伸到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晚期新

石器文化通常与宏大的巨石建筑联系在一起，从简单的石桌状墓(Dolmens)、或糙石巨柱（Nenhirs），到巨型墓室、石板街道和巨石圈。主要遗址在新格兰治（New Grange）、爱尔兰和奥克尼（Orkneys）的麦斯·豪威（Maes Howe），在布列塔尼（Brittany）的卡尔纳克(Carnac)，在维尔特郡（Wiltshire）的阿维伯里（Avebury）和巨石阵(Stonehenge)。人们大胆推测，这些建筑的发展归功于国际性参[76]与——甚至归功于同埃及人或很可能同迈锡尼人的——探矿者的联系。[**冈提加**] [**十进制**]

[78]

冈提加（ĠGANTIJA）

马耳他群岛展现了两个历史之谜——它的语言和巨石阵。前者是闪族语系，起源于中世纪阿拉伯语。它是惟一用拉丁文书写下来的闪族语言（浪漫派语言学家曾经把它同古代腓尼基语联系起来）。巨石阵要古老得多。主要遗址在戈佐岛（Gozo）上的冈提加（Ggantija）神庙和哈尔萨弗里尼（Hal Saflieni）的独一无二的地下“墓室群”（hypogeum），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400年，比最早的由岩石切割而成的纪念碑要晚一千年。[1]

马耳他的文明进程读起来像一部简明欧洲史指南。[2] 继建造了巨石文化的新石器穴居民和青铜时代的酒杯民族之后，迦太基人来到这里（从公元前七世纪），然后是罗马人（从公元前218年）。戈佐往往被视为“卡里普索之岛”，奥德赛就是在这里搁浅的。公元60年，圣保罗在瓦莱塔（Valleta）北部遭遇海难，此后这个海湾就以他的名字命名。395年，马耳他被划分给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从此接连被阿拉伯人（从870年）、诺曼人（从1091年）、慈善骑士团（从1530年）、法国（从1798年）、英国（从1802年）统治——并且从1964年起，好不容易马耳他人才实现了自己当家做主。

[79]

十进制（DASA）

一部通俗数学史说，伴随酒杯民族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的，既有印欧语的传播，又有十进位制度。这一说法得到一些采用十进

制计数法的印欧语言中数词表的支持。其意义在于，史前欧洲早在十进制以文字形式传入之前三千年，就已经对这种以十为基础的计数法相当熟悉了。[1]

当然了，这可真是有趣，想想看，生活在遥远而无知的社会里的人竟然会改造计数方法，而关于这一切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然而，今天使用的数字不一定自史前时代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必须谨慎地在所有最相近的语言中检验这一假说：

凯尔特语（威尔士语）	德语		拉丁语	古希腊语	斯拉夫语（俄语）	梵语
1. *un*	eins	Ⅰ	unus	heis	odin	eka
2. dau	zwei	Ⅱ	duo	duo	dva	dvi
3. tri	drei	Ⅲ	tres	treis	tri	tri
4. pedwar	vier	Ⅳ	quattuor	tessares	chetyre	katur
5. pump	fünf	Ⅴ	quinque	pente	piat'	panka
6. chwech	sechs	Ⅵ	sex	hex	shest'	shash
7. saith	sieben	Ⅶ	septem	hepta	syem'	sapta
8. wyth	acht	Ⅷ	octo	octo	vosyem'	ashta
9. naw	neun	Ⅸ	novem	ennea	devyat'	nava
10. deg	zehn	Ⅹ	decem	deka	decyat'	dasa

梵语（意为“完美的语言”）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二大古老的印欧语言。它是古代印度的语言，并且，在宗教传统中，它还是神的语言。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它被用来编写吠陀文学。在发明了十进制的印度河文明灭亡后不久，它达到了鼎盛时期。

梵语的数词完全按照十进制计数。从 1 到 10 的个位数单位符合在其他印欧语言中所见的情况。十几仅仅是个位数与十这个数词的结合，因而 ekadasa（1 + 10 = 11）或 navadasa（9 + 10 = 19）。几十是个位数与表示“十倍” *dasat*（i）的集合数的结合，因而 vimsati 或 dvimdesati（2 × 10 = 20）或 *trimsati*（3 × 10 = 30）。表示 1000 的字 *dasasata*，意思是“十百”，与它并列的还有 *sa-hasra*，可通过组合，用来表示更大的数字。有一个单独的字 *crore* 表示“1 亿”，另有一字 satam，表示“百分比”[2]。拉丁数字也是十进制的，但其结构与罗马数字无关，罗马数字是以个位数、以 5 倍数、以 10 倍数的整体为基础的。

[80] 凯尔特语，其中威尔士语是至今尚存的最活跃的现代凯尔特语，曾经推广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它们属于最古老的西印欧语族。然而，凯尔特数字却保留着五进制和十进制，尤其是二十进位制因素。现代威尔士语，像梵语一样，从 1 到 10 采用十进制单位计数，但是，对于十几，它采用与罗马数字结构近似的数字。16 是 *un ar bymtheg* 即 “1 + 5 和 10”（XVI）；19 是 *pedwar ar bymtheg* 即 “4 + 5 和 10”。超过 19，则采用二十进位制计数。*Ugain* 是基础，而 *deugain*（40），*trigain*（60），以及 *pedwar gain*（80）全都是 20 的倍数。30、70 和 90 被表述成 “10 以上” 意思是 20 翻一倍。50 为 *hanner cant*，意思是 “一百的一半”。

	威尔士语		拉丁语	梵语
11	un ar ddeg	XI	undecim	ekadasa
20	ugain	XX	viginti	vimsati
30	deg ar hugain	XXX	triginta	trimsati
40	deugain	XL	quadraginta	katvarimsati
50	hanner cant	L	quinquaginta	pankasati
60	trigain	LX	sexaginta	shashti
70	deg â thrigain	LXX	septuaginta	septati
80	pedwar ugain	LXXX	octoginta	ashiti
90	deg â phedwar hugain	XC	nonaginta	navati
100	cant	C	centum	sata
1000	mil	M	mille	dasasata/sa-hasra

二十进位制的计数法，始于将脚指头和手指头一起用来计数，保留在英文单词 “score” 中，该词是从计数木棍上刻写的标记引申而来。它也反映在法文 80（quatre - vingt）一词中，意思是 “4 × 20”，这有可能是凯尔特·高卢遗迹。

因此，很可能，欧洲的先民们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两倍、五倍、十倍、十二倍或二十倍来计数。在某些方面，他们必定也接触到了巴比伦人的六十进位制，它被用来计算分和秒。没有理由认为，印欧人，尤其是酒杯民族，一般地，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化的。

实际上，直到公元十三世纪十进制数字被广泛引进之前，欧洲还处于等待状态。关键的一步，即用 0 表示 “零”，是印度最早采用的。十进制从那里传播到穆斯林世界，然后通过阿拉伯控制下的西班牙进入基督教世界。好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与笨拙的、甚至无法做加法和乘法的罗马数字并存、并用。当它最终取得胜利时，

许多欧洲人并没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数字根本不是欧洲的产物。[3]（见原书附录Ⅲ，第1242页）。

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Age）是某些史前史家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石器和青铜器重叠使用的漫长过渡阶段。

铜与锡混合制造出一种新的合金是青铜时代的标志。青铜时代兴起，在中东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代，在北部欧洲可能要晚一千年。尤其在地中海地区，该时代见证城市文化的发展：文献档案、手工业分工、散布四方的贸易。人们发现青铜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mann）1876年挖出的迈锡尼，在于亚瑟·伊文斯爵士（Arthur Evans）1899—1930年期间进行考古发掘的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这些遗址与巨石阵的三个建筑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巨石圈大致属于同一时代。从巨石阵第一阶段的“奥布雷孔”（Aubrey holes）取得的木炭，经碳素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848±275年；从第三阶段的一个石头插座中取得的一支鹿角梭镖的年代为公元前1710±150年。因此，当与中东文明相类似的先进文明在爱琴海地区发展时，西北民族正处于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迈进的过渡时期。[**海蓬子**]

[82]

海蓬子（SAMPHIRE）

水煮海蓬子——7月、8月落潮时，可到海滩采摘海蓬子。采到后必须仔细冲洗，最好趁着新鲜马上品尝。将洗净的海蓬子连同完好无损的根须一起捆扎成束，放进少量不加盐的水中煮8—10分钟。割断绑绳，拌上溶化的黄油即可享用。吃海蓬子时，要捏住根部，使茎部朝上，轻轻地咬上一口，把鲜嫩的瓤从木壳里吸出来。[1]

史前时代的食物早已腐烂，不易进行研究。现代学者尝试着根据六种主要信息来源恢复新石器时代的食谱和烹饪技术。史前时代的垃圾堆在考古学家面前展示出大量的肉骨头、蛋壳和贝类遗存。茅屋遗址的厨房所在位置往往会发掘出可被鉴定、分析的种子和谷物粉。渔猎工具和烹饪、餐具被大量保存下来（蒸煮食物的大锅很常见，但平底煎锅不多见）。除掉现代食物清单，如酵母、葡萄酒或洋葱，根据一份包括大量可食用的植物和野生物种的清单，我们可以对以往所有的食物资源进行评估。各种再也

不会出现在烹饪书中的美味佳肴，曾经的确被人们享用过：海鸠、海甘蓝、刺猬、山毛榉、黑刺李。许多食物可以根据原始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食物技术类推得出，这些社会所拥有的方方面面的技艺，从野生草药到风干、腌制和久制保藏，必定相当丰富。最后，现代技术能够对史前尸身肠胃中的东西进行分析。例如，托伦人吃过亚麻籽、大麦和野生植物。[**托伦**] [**葡萄酒**]

是否能够最终复制出一份可信的新石器时代的饭食来，还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宁可一边研究，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海蓬子和大骨，并佐以麦酒（维尔帕）：

髓骨。（8盎司/225克带骨髓的大骨，面粉、盐、烤面包干）将骨头削刮、洗净，将骨节半锯开——加水和面揉成硬面团。将骨头的两端用面团糊住，塞住骨髓不使流出，大骨裹上一层面粉。加盐的水烧开后，将大骨竖直放入锅中，慢炖两小时——除去每块大骨的面粉壳和两头的面糊，用餐巾纸包好，配上烤面包干，即可享用。[2]

发酵燕麦麸粥又名维尔帕（Virpa）。（1磅/450克燕麦片，3磅小麦片，16品脱/9升水）将两种麦片放进石壶中。加入14品脱或8升温水搅拌，然后放5—8天直到变酸。倒出清水——这就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佳酿斯瓦兹酒（Swats）。壶中的剩余物像厚厚的淀粉一样，加入2品脱或1升水稀释黏稠物，倒进用粗棉布制成的过滤器中过滤。这种液体——保留了燕麦片的所有营养成分——轻轻地用一把木勺刮刮壶底，最后再拧一拧过滤布——如此操作将加快整个制作过程。[3]

[83] 重构历史就像翻译诗歌一样，可以去做，但不可能完全准确。一个人无论研究史前食谱、殖民地定居点，还是研究中世纪音乐，都需要发挥巨大的想象力并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能避免缺乏艺术性的真实与毫无根据的抒情两种风险的话。新石器时代的厨师们上菜时，真的会把大骨用餐巾包好吗？或者说，他们会用棉布过滤麦酒吗？还有，在史前史上，采集海蓬子的季节确实在8月吗？

座椅（THRONOS）

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的王位宝座被描写成“欧洲最古老的座椅”。这种说法不太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高靠背带扶手的座

椅在古代一直是作为墓葬之用的。它们使统治者和高级祭司们处于舒适、尊贵和崇高的地位，而其他每个人都站在他们的脚下。从御座引申出来的座椅概念，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影响到主教辖区以及专家的坐席。

我们日常用来落座的家具，相对而言是近代欧洲的发明。当他们不站立的时候，原始人就或坐、或蹲、或躺在地板上。许多亚洲民族，包括日本人，仍喜欢这么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斜靠在椅榻上。中世纪人使用坚硬的长条板凳。独立的椅子最早被引进修道院的密室中使用，可能是为了方便读书之用。直到十六世纪以前，这种椅子都还不是标准的家庭用具的新发明，并且，直到十八世纪以前，还未被添进精品家具设计清单之中。直到十九世纪以前，它们还没有广泛应用于学校、办公室和工作室。

不幸的是，平底座椅不符合人体构造的要求。不像马鞍能将骑手的大部分重量转化到足蹬上，使自然弯曲的脊背不受损伤，椅子托起臀部，使之与躯干形成一定弧度，破坏了躯体骨架的平衡性。如此以来，它们对骨盆、髋关节、腰部造成了不正常的压力。周期性的背痛是现代进步所导致的多种自我创伤之一。[1]

然而，也许不能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来谈论建造巨石阵的工匠们的技艺，他们设法将80块每个重达50吨的大青石，从遥远的南威尔士普里切利山运来，精确地垒架起来，以至于瞠目结舌的参观者们以为他们是太阳能计算机的一个操作部分。[16]实际上，在巨石阵中的斧头和匕首上的文饰与迈锡尼竖井墓中所发现的刻画文饰极为相似，这再次引发人们猜测该地区与地中海地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地区间贸易，尤其是矿物贸易，是青铜时代欧洲重要特征之一。半岛的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多样，但是分布不均；分布广泛的商路网络弥补了这种不平衡。人们很早就开始寻找盐，既通过开采岩石中的[78]盐，也通过蒸发卤水从海边盐池中取盐。巨大的盐石山脉通常位于从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凯多那（Caedona）到奥地利的萨兹卡莫古特（Salzkammergut），或波兰的维耶利奇卡（Wieliczka）。原始的盐池（salinae）位于炎热的南部海岸沿线，从罗讷河到德涅斯特河。现在，永久性“盐道”开始发挥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古代的盐道（via salaria），它将罗马同亚得里亚海岸的盐池联系起来。在日德兰西部海滨和维斯瓦河以东的波罗的海岸边到处都能找到的琥珀，像珠宝一样十分值钱。古代的“琥珀之路”沿奥德河谷而下，穿过摩拉维亚峡谷到达多瑙河，越过布莱纳隘道（Brenner）到达亚得里亚海。黑曜石和

天青石的需求量也很大。铜和锡是大宗产品。铜首先由塞浦路斯而来，其名称也由此而来，后来出自多洛米特斯（Dolomites)，并且主要来自喀尔巴阡山。喀尔巴阡的铜向北运输，很早就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后来向南运往爱琴海。锡，古人并不总是能够将它与铅区别开，是从遥远的康沃尔（Cornwall）运来的。寻找铜和锡所促成的洲际合作要比后来寻找铁矿的合作更有效，相比之下，铁矿更容易找到。

那些能就近搞到紧俏商品的地区由此享有特殊的优势。其中一个地区是萨兹卡莫古特（诺里库姆)，在那里，出产食盐的伊什尔（Ischl）山和霍尔斯塔特（Hallstatt）山横亘在诺里埃（Noriae）铁矿之[81]侧。另一个地区位于克拉科夫，在那里，距离上维斯图拉一投石之遥的地方，银矿、铅矿、铁矿和盐都可以找到。然而，产量最大的地区在爱琴海群岛。米洛斯出产黑曜石，帕罗斯出产纯白大理石，克诺斯产铜，斯芬诺斯和阿提卡海滨的劳里温出产白银和铅。克里特以及后来迈锡尼的富裕与强盛，显然与控制这些爱琴海自然资源有关，也与其处于大陆间商路终点的地位有关。它们集中体现了所谓青铜时代的“国际精神”。

无论是克里特，还是迈锡尼都不为早期古典学家所知，正是他们首先影响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但是，现在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克里特的米诺斯文化和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化构成了“欧洲第一个文明”的两座高峰。当谢里曼在迈锡尼的一个王室竖井墓中发现一面死者的金面具，并拍电报发出一条错误消息说：“今天我看到了阿伽门农（Agamemnon）王的脸”时，显然，他所发现的东西意义重大，绝不仅仅只是又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史前墓穴。[**掠夺物**] 不仅克里特、克诺索斯、费斯图斯（Phaestus)、玛丽娅（Mallia）的王宫遗址，而且本土的迈锡尼、提林斯（Tiryns)、派罗斯（Pylos）的王宫遗址都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宗教、技术，以及一个比以往更为成熟的社会组织的证据。米诺斯生活的黄金时代在所谓“王宫时期”，约始于公元前1900年。更为好战的迈锡尼人的时代在三四个世纪之后才到来，他们的城堡控制着阿戈斯平原和科林斯海湾。同控制着达达尼尔海的特洛伊人一道，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使欧洲的历史摆脱了缺乏考古学发现的尴尬境遇。[**座椅**]

在中欧青铜时代晚期，一个分布广泛的“瓮棺文化”民族因其墓地而别具特色，死者火化后的残余物被装进骨灰瓮中，同特意挑选的随葬品一起埋葬。青铜时代重要的遗址在塔拉马拉（Terramare，意大利)、埃尔·阿加尔（El Argar，西班牙)、略宾根（Leubingen)、布豪（Buchau)、阿德勒堡（Adlerberg，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拉格的乌涅提斯（Unětice)、罗马尼亚的奥托马尼（Otomani）被发现。

在二千纪下半叶，大约公元前 1200 年，青铜时代的欧洲遭受了一场无法解释的打击，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考古学家的写法是"普遍系统的崩溃"。贸易被中断、城市被废弃；政治结构被摧毁。入侵者的浪潮袭击了剩余部分。勉强熬过一系列可怕的自然灾难之后的克里特，在迈锡尼自己被摧毁之前，已落入迈锡尼的希腊人之手。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内，许多固有的中心就被人们统统忘却。爱琴海地区被来自内陆的诸部落搅得天翻地覆。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宣告结束。埃及自己被不明身份的"海上民族"所围攻。瓮棺民族在中欧苟延残喘，在一个漫长而被动的时代里情况更加恶化，直到凯尔特人的出现才告一段落。希腊陷入上古黑暗时代，把特洛伊战争的传说时代与后世有历史记载的城邦时代划分开来。

铁器时代将史前史带入常规史料来源的范畴。冶铁术通常被认为[83]是小亚细亚的赫梯人的发明。从阿拉卡·乎于克（Alaca Hüyük）的王室墓穴中出土的一把带有铁刃的金柄匕首，可能产于公元前 3000 年末。从那里开始，铁器的使用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首先传播到埃及；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到达爱琴海；而后约公元前 750 年到达多瑙河盆地。**[托伦]**

[85]

托伦（TOLLUND）

托伦是丹麦阿尔胡斯（Aarhus）附近的一片沼泽地的名字，1950 年在那里发现了一具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史前时代的男尸，现被陈列于斯尔克伯格博物馆（Silkeborg Museum）。鞣酸泥炭使他变成了一具完美的干尸，甚至面部特征都保存得完好无损，胃中物质也被保存下来。除了一顶尖皮帽子和腰带以外，他全身赤裸着，是被一条编织的皮绳勒死的。显然是两千多年前在祭祀仪式中被杀害的牺牲品。他奇异的命运，至今仍使人难忘，令人同情：

当他策马奔驰的时候
他那悲哀的自由
就会朝我走来，趋赶着，
叨念着一些名字
托伦、格劳巴莱、内贝尔加德，
看着那些乡巴佬手指比划，
却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言语。

就在日德兰那边
在古老的，杀人的教区
我迷失了方向
郁郁寡欢，于是返回家园。[1]

然而托伦人并非惟一的发现。30年之后，在柴郡（Cheshire，英国）的林度沼泽（Lindow Moss）有类似的发现；1991年9月，在特里尔南部奥兹塔拉山（Otztaler Alps）的斯密劳恩（Similaun）山脊附近的冰川溶石坑中，一具特别有趣的尸体被曝光。这具尸体看起来是前青铜时代的猎人，穿戴整齐，并且全副武装。他身高5英尺（152厘米），体重120磅（54.6公斤），年纪约为20岁，蓝眼睛，刮过脸，甚至大脑健全。他的周身上下裹着鞣制的皮斗篷和绑腿，一顶麂皮帽，一副桦树皮手套，一双里面垫着干草的厚底靴。他的皮肤上有四处蓝色的部落标志文身，佩带着一条用20个太阳石镶嵌的皮带和一颗小石头珠子做成的项链。他携带着一只空空的木制箭囊，一张32英寸（81.3厘米）的折断的弓，14支带有石箭头的利箭，一把石刃斧头，顶端带有纯铜，一把燧石短刀，还有一条扎在身上、装有燧石和火绒的束带。他显然是在穿越隘道时，遭遇暴风雪而被冻死的。僵硬的尸身凝固住了他向外探出的手臂，仿佛仍想要挡住眼睛似的。其年代为公元前2731±125年，耽搁了5000年之久，最后他终于到达了一个不曾预料的目的地，被放置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低温冷冻柜中。[2]

史前时代的人体无疑是有价值的科学信息来源。最近在“史前病理学”方面的进步有助于对身体组织、疾病、细菌和饮食进行细致分析。但是没有人能完全忘记皮尔当人（Piltdown man）的例子，1908年其遗骸在苏塞克斯（Sussex）的一个采石矿被发掘出土。同年发现了托伦人。皮尔当人已被证实是最大的赝品之一。

[84] 在半岛的内陆，史前铁器时代习惯上被分成两个连续阶段——即霍尔斯塔特（约公元前750—前400年）和拉·泰纳（La Tène，约公元前400—前50年）。霍尔斯塔特，位于萨兹卡莫古特遗址，1846年被首次发现，它代表一个先前的瓮棺民族传统与来自东方的新影响相融合的时代和文化。拉·泰纳，1858年在瑞士纽卡特尔湖（Neuchatel）发现的遗址，代表第二个时期，当时铁器制造能力达到了极高水平。精工制造的长剑，以硬铁为剑身，以软铁为剑刃，削铁如泥，令人胆寒，是生活在高岗堡垒背后的武士社会的标志。这些人熟悉陶轮、马

拉战车、铸币，以及结合了本地的、地中海的甚至游牧民族因素的高度的风格化艺术形式。在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圣十字架山上的鲁迪基（Rudiki），他们留下了欧洲史前史上范围最广的铁器制品遗迹。他们是活跃的商人。在他们的国王们的坟墓中，堆积着凯尔特人的珠宝、埃特鲁里亚的陶瓶、希腊的双耳瓶和罗马的工艺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个知道其名称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凯尔特人，但是，关于这一点，并非没有异议。除拉·泰纳本身以外，还有一些重要遗址分布在普罗旺斯的恩特莱芒（Entremont），勃艮第的阿莱西亚（Alesia）和埃密利亚（Emilia）的维兰诺瓦（Villanova）。

随着凯尔特人的出现，欧洲史前史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考古学家根据其他地区所提供的民族和语言集团的资料给物质文化下的定义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史前史学家的确赞成把那些拉·泰纳时期的铁器制造工匠视为凯尔特人。他们起源于公元前一千纪凯尔特部落组织或部落集合体，并且他们与希腊罗马文献所提到Keltoi 或 Celtae 属于同一民族。但是，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认为，凯尔特语起源的时间可能会提前，追溯到更远的新石器时代。[17]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现代语言研究已经证实凯尔特人的语言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是同源的。凯尔特人是语言共同体的先锋，该共同体的含义要比史前考古学共同体更为明确。凯尔特人处于印欧氛围的中心位置。

很久以前，在 1786 年，一位在加尔各答任职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做出一项划时代的发现，他发现欧洲的主要语言同印度的主要语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琼斯看出了古典拉丁语、希腊语与古代梵语之间的关系。随后证明，许多现代印度语言同欧洲语言中的罗曼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一样（见原书附录Ⅲ，第 1232 页），都是同一语族的组成部分。

当时，没有人知道"印欧语族"是如何穿越欧亚大陆的，尽管有人假设，它们定然是由迁移的民族带到西方的。但是在 1902 年，一位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库斯纳（Gustav Kossinna）将印欧人同一种遍布德国北部遗址中的特殊类型的绳纹陶器联系起来。库斯纳的结论[86]表明，"印欧人的故乡"可能存在于铁器时代的北欧。这一观点被杰出的澳大利亚考古学家维莱·戈登·柴尔德（1892—1957 年）进一步发展，其综合性成果《欧洲文明的黎明》（1925 年）一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不久前，美国立陶宛裔考古学家马利伽·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确认了印欧人的家乡在乌克兰草原，其根据是该地区广泛分布着以大墓冢形式出现的库尔干文化（Kurgan Culture）：

不断积累的考古发现有效地破除了关于印欧人的故乡的早期理

论——库尔干文化似乎是仅存的一个有待证明是否为原始印欧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再也没有哪种文化符合这种根据共同词汇复原出的假想的印欧母文化；也没有影响整个地区的更大规模的扩张和征服，那里最早的历史资料和文化的连续性证明，曾经存在过一批讲印欧语的人。[18]

此处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戈登·柴尔德及其继承者们在使用根据物质和语言标准界定的，与人类集团有关的“文化”这一术语。然而，若对此进行反思，就会发现，似乎不好解释为什么考古学文化必须以这种方式同语言集团发生联系。印欧人之谜并没有被真正破解。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意识到语言是通过无休止地变更而发生演进的，就像有生生不息的有机体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的是，欧洲语言变化的年代顺序同基因变化顺序之间有一定关联。通过“语言时钟”的时间轨迹与我们的“分子钟”之比较，也许有一天，能揭开欧洲民族及其语言起源的秘密。[19]

欧洲地名是数千年岁月的产物，为理解它们的过去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河流、山岭、市镇、行省和乡村的名字往往是逝去年代的遗迹。专名科学能够探究到历史记录下面的内壳。[20]一般认为，河流的名称是最古老和经久不变的。它们常常是惟一保留下来的同以前的居民之间的惟一联系。通过累积过程，它们有时把两岸次第兴起的定居浪潮保存记录下来。例如，“埃文河”（Avon）就有了两个意思相同的名字，一个是英语，另一个是古威尔士语。五个与水有关的凯尔特词根——*afon*，*dwr*，*uisge*，*rhe*，可能还有 *don*，构成那些贯穿欧洲的河流的名称中最为常见的要素。当然，学者们永远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河流有伊恩河（Inn）和约纳河（Yonne），罗讷河上（Rhodanus）的阿维尼翁（Avignon，意思是“激流之河”上的“水城”），埃斯科河（Esk），埃什河（Etsch，或阿迪格河，Adige），乌斯克河（Usk）和多瑙河。

凯尔特名字从葡萄牙传播到波兰。例如，现代威尔士语中的 *dŵr* [87]“水”的同族词汇有 Dee，Douro，Dordogne，Derwent（清澈的水），Durance 和 Oder/Odra。*Pen* 意思是“头”，引申为“山”，出现在潘宁（Pennine），亚平宁（Apennine），皮埃尼尼（Pieniny），品都（Pindus）中；*ard*，“高”，有 Arden，Ardennes，Lizard（高高的海岬）和 *Auvergne*（Ar Fearann，高地）；dun，“堡垒”，有敦克尔（Dunkeld，凯尔特人的堡垒），敦加仑（Dungannon），伦敦（London），维尔敦（Verdun），奥古斯托敦努姆（Augustodunum，奥古斯都的堡垒，奥敦 Autun），鹿敦乌姆（Lugdunum，又名里昂 Lyons），鹿古迪努姆（Lugodinum，又名莱登 Leyden），瑞士的土恩（Thun）和克拉科夫的铁涅奇

(Tyniec)。所有这些都证明凯尔特语曾广泛传播。[兰法尔][鲁格敦乌姆]

类似地，可以练习寻找诺斯词根（Norse）、日耳曼词根、斯拉夫词根，甚至腓尼基词根和阿拉伯词根。*Etna*，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腓尼基名字，意为“火炉”。在西西里其他一些地方，*Marsala*，有一个简单的阿拉伯名字，意思是“神之门”。图拉真跨越西班牙塔格斯（Tagus）河上游的大桥，现在被称为 *La puente de Alcantara*——*al cantara* 正是阿拉伯语“桥”的意思，相当于拉丁语 *pons*。

斯拉夫地名向西传播的范围远远超过今天斯拉夫人分布的区域，例如，在德国北部汉诺威地区，斯拉夫地名十分普遍。在奥地利，*Zwettl*（*světlý*，“亮点”），*Doebling*（*Dub*，“小橡树”），或 *Feistritz*（Bystěice，“激流”）这类名称，从维也纳到第罗尔（Tyrol）随处都能遇到。在意大利的弗留利行省，它们与意大利地名相互重叠。

城镇和村庄的名称通常记录着它们的起源。爱丁堡（Edinburgh）曾经是“爱德温的城堡”；巴黎，“帕里斯部落之城”；都灵（Torino），“陶利尼人的城市”；哥廷根，“哥丁斯人家族之地”；克拉科夫（Cracow），“好皇帝克拉科之席位”。在另一些地方，他们记录了当地的职能特征。*Lisboa/Lisbon*，意思是“好地点”；*Trondheim*，意思是“王位之家”；*Munich/München*，“僧侣之地”；*Redruth*，“德鲁伊教派之地”；*Novgorod*，“新城”。有时，它们是对发生在很远以前的大灾难的回忆。托斯卡（Tuscany）的 Ossaia，意思是“白骨之地”，位于公元前 217 年汉尼拔取得特拉西美尼（Tresimeno）战役大捷的遗址；普罗旺斯的 *Pourrières*，原名“Campi Putridi”（腐烂之地），是公元前 102 年马略对条顿人进行大屠杀的标志；巴伐利亚的 Lechfeld，意为“死尸之地”，正是公元 955 年马扎尔人全军覆没的现场。

民族的名称通常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盎格鲁—撒克逊的西部凯尔特邻居自称为 *Cymry*“同胞”，但是，用日耳曼人侵者的话来说，却是 *Welsh*“外邦人”。类似的，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ns）被佛拉芒人（Flemings）称为 *Waalsch*。日耳曼民族常自称为 *Deutsch* 或 *Dutch*（意思是“关系密切的”或“相似的”），却被他们的斯拉夫邻居称为 *Niemtsy*“哑巴”。斯拉夫人认为他们是 *Slovo* 民族，意为“同一种语言”，或者 *Serb*（亲族）。他们经常把拉丁人称作 *Vlachy*，*Wallachs*，*Wtochy*——这是“威尔士”类型的另一种变体。巴尔干人中未分化的弗拉赫人（Vlachs）和瓦拉几亚人（Wallachians）倾向于把自己称为 *Romani*，*Rumeni*，*Aromani*（罗马人）。

国家和行省的名称通常记录着曾经统治过该地区的人民。凯尔特词根中的 Gal-，意为“盖尔人或高卢人的土地”，出现在葡萄牙

(Portugal)，西班牙的加里西亚（Galicia)，Gallia（高卢)，Pays des [88]Galles（威尔士)，康沃尔（Cornwall)，Donegal，Caledonia（后来的苏格兰)，Galloway，Calais，波兰南部的加里西亚（Galicia)，甚至远在小亚细亚的加里提亚（Galatia）这些名称当中。

然而，地名处于无限的变更之中。它们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并随着使用者的语言和意志而改变。它们是使用者的智力的产物，并因此造成无休止的冲突。它们可以被当做宣传品，刻意编造的东西，经过严格审查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战争的产物。在现实中，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变化的名称的地方，不能说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只能说，这些变化适合特定的时间、空间或用法。同样，在提及某些涉及大范围时空的事件时，历史学家常常不得不从那些都不太合适的多项选择中挑出一个来。

但历史学家必须总是对事物蕴涵的意义十分敏感。人们很容易忘记“西班牙”、“法国”、“德国”、“波兰”或“俄罗斯”是较晚才使用的名称，因而在使用时也容易犯时代错误。把罗马时期的“高卢”说成“法国”显然是错误的，就像把“俄罗斯”置于莫斯科公国之前一样荒唐可笑。用英语写作时，人们提笔就写“English Channel”（英吉利海峡)，而忽视了“La Manche”（拉芒歇海峡）至少有一半是法国的。使用波兰语时，人们会自动把莱比锡（Leipzig）写成“Lipsk”，而无须声明它的波兰名字是萨克松尼（Saxony)，正如在德国，人们把 Gdańsk（格但斯克）念成“Danzig”（但泽），或把弗罗茨瓦夫（Wroctaw）念成“布列斯劳”(Breslau)，而不必严格搬用德文名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或西里西亚（Silesia)。人们忘记了官方语言中的地名是为统治者国家官僚机构所喜悦的形式，却不一定总是符合当地居民的使用情况。最重要的是，人们忘记了不同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用不同方法取地名，并且没有人有权独断专行。某人所说的德里（Derry）是另一个人所说的伦敦德里（*Londonderry*)。这一位的安特卫普（*Antwerpen*）是那一位的安沃尔斯（*Anvers*)。一些人称之为东高卢（East Galicia）或东方小波兰（Eastern Little Poland）的，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西乌克兰”。对于古人来说，是 Borysthenes，对于现代人来说，却是 Dnipr，Dnepr，或 Dnieper（第涅伯)。对于别人来说，是 *Oxford*，甚至是 *Niu-Jin*（牛津)，对于我们来说，却永远是 *Rhydychen*。

“欧洲历史”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实际上，“欧洲”和“历史”都模糊不清。欧洲也许仅仅指陆地边界长期未划定的半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须自己决定，将他们的研究置于何种严格界限范围之内。但是，起源于半岛的民族和文化却都是“欧

洲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同“欧洲文明”这个世界性难题打交道。历史也许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过去；或者，特指史前史，它可以被限定在有充足史料来源的那一段过去内。研究史前史的人需要运用神话学、语言学资料，并且，最重要的是运用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研究狭义历史的人也要运用文献记载、档案资料，并且，最重要的是运用前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另外，一个人无论是被史前史末期所诱惑，还是被真正的历史开端所吸引，他都会被引到欧罗巴坐骑出发的起点——克里特岛。

公元前 1628 年，克诺索斯，克里特。米诺斯宫廷中的大臣们站[89]在王宫北边的高台上，向外望去，越过金光闪烁的橄榄树和柏树林，眺望着远处的大海。他们是伟大的祭司——国王，世界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克里特海上霸权（*thalassokratia*）之君的奴仆。依靠四处航行的商船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他们过着一种舒适的、有着宗教仪式和管理秩序的生活。他们的住处有流水供应，有下水道和污水排泄管道。他们的墙壁上画着壁画——狮身鹰首兽、海豚和鲜花被置于深蓝色和金色的绚丽底色之上。他们极为宽敞的庭院自然变成了竞技场，用于举行仪式化的体育运动斗牛。他们的地下室储藏间堆满了巨大的石槽，里面盛有足够 4000 人吃的粮食、葡萄酒和橄榄油。他们的家庭事务被清清楚楚地记在软泥板上，其书写方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发展，先后经过象形文字、草书体和线形文字几个阶段。他们的工匠擅长制作珠宝、铁器用具、陶瓷器皿和彩陶。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和富足极为自信，以至于没有一座王宫是设防的（见原书附录Ⅲ，第 1217 页）。

宗教在米诺斯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崇拜对象很可能是大地女神，即后来为人们所知的宙斯之母雷娅（Rhea）。已发现她有多种造型和表现形式，并有一批较次要的神侍奉左右。她的神坛位于高山之巅、山洞之中，或王宫里的庙宇。在一块现存的印章石上刻有一个裸体女人，正如痴如狂地拥抱着神圣的大圆石。献祭活动被公牛崇拜、酒神（Orgies）、大量仪式用具诸如神坛祭桌、祭物盛器、盛血的木桶，以及蜂腰的生殖女神塑像所环绕。随处可见的公牛角象征和唇形双头斧（labrys），在游行队伍中被挂在长竿上高举着。在危险时期，或遇到大灾难的时期，除动物献祭以外，还增加一项儿童献祭，把人类的孩童活活喂了食肉的野兽〔在记忆中，雷娅（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神）的丈夫克拉努斯（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天空之神）就专门吞噬幼儿，并且要不是及时将他算计，他还差点吃掉了婴儿时期的宙斯〕。因此，米诺斯仪式相当酷烈。但是，它是产

生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成分，它使一个和平的社会保持了好几个世纪。一些人观察到这里缺少展示米诺斯男性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英武气质的东西。[21]这些说法必然引起关于该岛在从“原始的母权制”向新兴的“父权制战争”过渡阶段中的作用问题。（见地图3、地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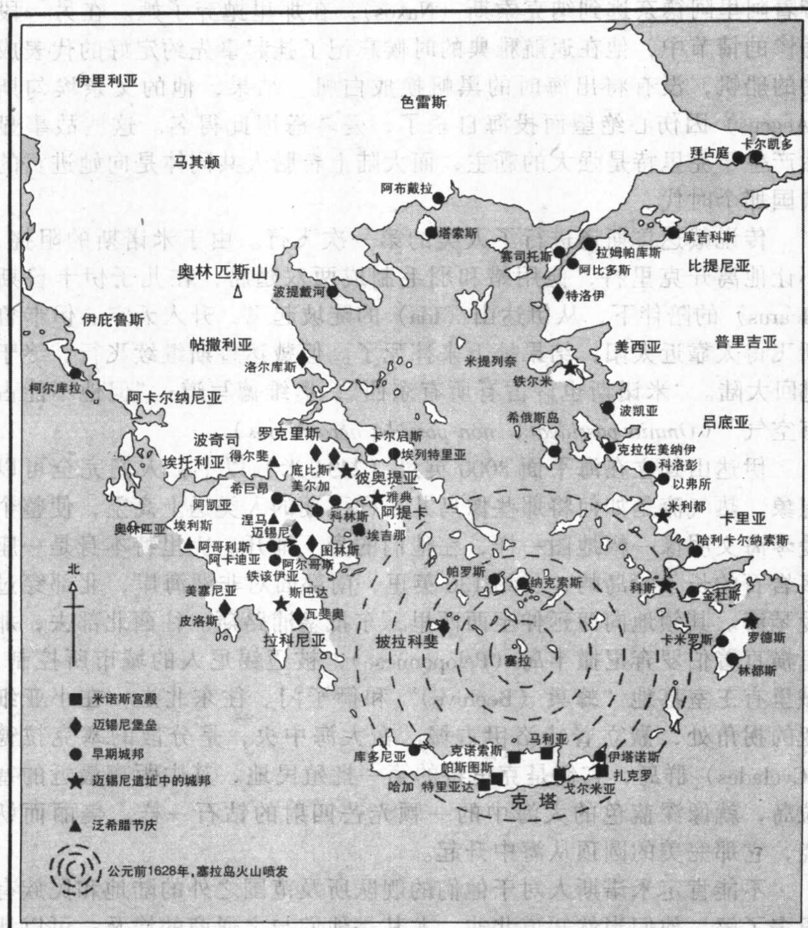
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的全盛时期达一千年。根据克诺索斯的发掘者亚瑟·伊文斯爵士的研究，它经历了九个突出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陶器风格，从早米诺斯文明第一期到晚米诺斯文明第三期。鼎盛时期的到来发生在中米诺斯文明第二期，即公元前2000年[90]的下半叶。就在那个时期，出乎台阶上众朝臣意料，在所有灾难中最大的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他们身上。

米诺斯人的民族身份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过去以为他们是希腊人，现在已不为广泛接受。线形文字A，也许能解开上古语言之谜，但还未被破译；而线形文字B，1952年被鉴定为希腊文，显然属于最后一个阶段。亚瑟·伊文斯坚信，克里特不仅受到强有力的埃及文明的影响，而且还有可能是埃及人的殖民地。“也许应该这样问，[91]是否在标志着王朝因素在尼罗河河谷取得胜利的那个时期，那些老居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口确实没在克里特的土地上居住过。”[22]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克里特似乎遭到几股移民浪潮的侵袭。有理由认为，岛上的希腊化始于“灭顶之灾”之后到来的最后一股移民潮。

另一个可能性是，中期的米诺斯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赫梯人。赫梯人属于印欧人，讲一种叫卡那西安（Kanesian）的语言。他们的大联盟以现在位于安那托里亚的哈图萨为中心，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元前十四世纪，他们最伟大的统治者苏皮卢留马斯（Suppilululiumash）或苏皮卢留马（Shubbiluliuma，约公元前1380—前1347年）四处扩张，远及耶路撒冷。公元前1269年，他们同埃及结成同盟（一份双语泥板文献记录了这一事件，它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外交档案，现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宴会厅中展览）。公元前1256年，赫梯国王哈图什利斯（Khattushilish）三世前往埃及参加他的女儿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婚礼。因此，假如赫梯的影响已远播到中东，那么，它也极有可能通过大陆波及克里特。尤其是，在安那托利亚查塔·乎于克（Çatal Huyuk）的赫梯中心发现的公牛崇拜，表明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但是，一切都还不能肯定。

根据晚期希腊传说，克里特既是宙斯的出生地，也是令人恐惧的米诺陶牛的出生地。宙斯劫持了欧罗巴之后，直接把她带回他海岛上的家。伊达山上的一座洞窟仍作为宙斯的出生地遗址向游客们展示。相反，米诺陶牛则是一次离奇纵欲的产物。据说，米诺斯王后帕斯法（Pasiphaë）迷恋上了一头给海神波塞冬献祭的公牛，在克诺索斯的能

[90]



地图 5　古代的爱琴海：公元前第 2000 年

工巧匠戴达鲁斯的帮助下，成功地与之交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达鲁斯设计出一个空心的木头母牛，使胆大妄为的王后可以在里面摆出合适的姿势。意外诞生的是怪兽米诺陶牛——一半是人，一半是兽这一羞耻的产物（l' infamia di Creti）。结果，戴达鲁斯奉命建造一座迷宫，将它看管起来。

雅典的英雄提修斯（Theseus）的到来给这个故事增添了新情节。提修斯之所以执意要杀死米诺陶牛，是因为他的母亲也曾经被一头公牛戏弄过。在加进了雅典每年要交出七对童男童女给克里特进贡的故事中，他设法到达克诺索斯；然后，用帕斯法之女阿里阿德奈（Ariadne）给他的一卷丝线引路征服了迷宫，杀死了米诺陶牛并逃生。他

带着阿里阿德奈逃到纳克索斯（Naxos），在那里抛弃了她。在另一段悲惨的情节中，他在返航雅典的时候忘记了挂起事先约定好的代表成功的船帆，没有将出海时的黑帆换成白帆。结果，他的父亲埃勾斯（Aegeus）因伤心绝望而投海自杀了，爱琴海因此得名。这些故事显然产生于克里特是强大的霸主，而大陆上希腊人共同体是向她进贡的属国那个时代。

[92] 传说戴达鲁斯还进行了人类的第一次飞行。由于米诺斯的阻挠，不让他离开克里特，他用蜡和羽毛制成两双翅膀，在儿子伊卡鲁斯（Icarus）的陪伴下，从伊达山（Ida）的陡坡起飞，升入天空。伊卡鲁斯飞得太靠近太阳，结果掉下来摔死了。但戴达鲁斯继续飞行，终于逃回大陆。“米诺斯也许占有所有东西”，奥维德写道；“但他不能占有空气”（*Omnia possideat, non possidet aera Minos*）。

伊达山耸立在海平面8000英尺（2434米）以上，人们完全可以想象，热气流是如何将那些像鸟儿一样飞翔的人类送上高空，使整个爱琴海文明像一幅地图一样，在他们的身下铺开。克里特本身是一座多岩石的长条状岛屿，长约130英里，南部面对非洲海岸，北部穿过爱琴海。其领地向西延伸至西西里，东抵塞浦路斯。往西北部去，那里横亘着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被迈锡尼人的城市所控制，城里有王室墓地“蜂巢（Beehive）”和狮子门。往东北走，在小亚细亚的拐角处，矗立着特洛伊古城。在大海中央，是分散的塞克拉德（Cyclades）群岛，它们是克里特的第一批殖民地。其中距离最近的塞拉岛，就像深蓝色的大海中的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一样，美丽而妖娆，它那完美的圆顶从海中升起。

不能肯定米诺斯人对于他们的舰队所及范围之外的陆地和民族有很多了解。他们当然知道北非，尤其是他们与之通商的埃及：可以从底比斯（Thebes）神庙的墙壁上辨认出克里特的特使。克诺索斯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是米诺斯文明晚期第二期，恰逢阿蒙霍特普（Aminhotep）三世的第18王朝终结，因而也与图坦哈蒙（Tutankhamun）的即位巧合。米诺斯人知道地中海东部诸城市——西顿（Sidon）、推罗（Tyre）和耶利哥（Jericho）——这些城市已很古老，并且正是通过他们了解到近东国家。公元前十七世纪，希伯来人（Hebrew）仍在埃及做囚徒。雅利安人（Aryans）刚刚从波斯迁移到印度。巴比伦人统治着两条大河之间的土地，被立法者汉谟拉比（Hammurabi）统一起来。基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当时达到了文明的顶点。亚述人刚刚沦为巴比伦的奴隶。赫梯人在建立起西亚最强大的城邦之后，开始向巴勒斯坦挺进（见原书附录Ⅲ，第1216页）。

米诺斯人也许早已同意大利前拉丁民族打起了交道。没有任何障

碍阻挡其舰队驶入西地中海。他们还有可能遇上绳纹民族和马耳他及西班牙南部的巨石建造者们，并且航行进入黑海，在那里，他们可能与特里波莱人（Tripolye）相遇。后者也许在最后一条南翼商路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领导这条商路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乌涅提斯人（Unětice）和内陆的图穆路斯（Tumulus）人。主要商品是铜，多罗米特斯（Dolomites）和喀尔巴阡山的铜矿是其主要来源。

除此以外，米诺斯人的直接知识可能被面纱遮挡得严严实实。当他们享受着青铜时代的成果时，北部地区还徘徊在新石器晚期阶段。印欧人的西进征程无疑已然开始。有时会将它同男性为主体的武士文化联系起来，这种文化将其崇尚和平的前辈及妇女置于附属地位。凯[93]尔特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在中欧安营扎寨。日耳曼、波罗的和斯拉夫人的部落驻扎在侧翼的某些地方。第一批“边境”以外的北方捕兽人和商人可能已经抵达了爱琴海。琥珀和玉石辗转传播到了克里特。

塞拉岛（Thera，即 Santorini）的火山喷发是史前欧洲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一场厄运中，如在近代的克拉卡托（Krakaroa）灾难中，30 立方公里的岩石、火焰和硫酸喷洒出 20 英里，进入同温层。在距离现场仅 100 英里的地方，人们在克诺索斯会看到地幔和火光，以及浓烈的灰烬烟柱。过了九分钟，他们会听到轰轰隆隆，乒乒乓乓的崩裂声。看到大海在顷刻之间灌满了海底的沟壑，然后迅速退却，只为积蓄力量，掀起排山倒海的大浪头，将克里特海岸淹没在 100 英尺的咸水之下。

在高出克诺索斯的尤克塔斯山（Juktas）北坡，山上圣地的祭司们忙着举行祓除灾难的人祭。在这种情况下，日常供奉的水果、种子或葡萄酒，甚至宰杀一条壮硕的公牛都不够有效。在黑暗的神庙大殿之中，一个人将一只点缀着公牛形象白色浮雕的盛血器预备好。在大殿西厢的尽头，一个年轻妇女脸朝下，卧在地下，两腿分开。在一张矮桌上，躺着一个年轻男子，双脚被缚——胸前挂一把青铜刃的匕首，上面雕刻着一只野猪头。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位有权有势的男子，佩带着一条珍贵的铁制戒指和一枚玛瑙印章石，上面刻有一位大神正在踢打船只的图形。但是，塞拉岛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抢先发生了。神庙的屋顶坍塌了。献祭仪式没能完成。献祭者的尸体留在他们待过的位置，直到 3500 年之后才被发现。[23]

塞拉岛火山喷发的日期靠树轮年代学方法已基本测定出来。公元前 1628 年，像加利福尼亚的刺毛球果松和爱尔兰的沼泽橡树一样宽阔的年轮进入了一个生长迟缓的时期。气温显然在整个北半球发生摇摆，很可能是高空中悬浮的火山灰烬所带来的“灾害后果”所引起

的。根据格陵兰岛相关冰层中发现有硫酸沉积物的现象，可以证实在公元前 1645 ± 20 年这段时期，曾发生过全球性大灾难。最近在对塞拉岛本身所做的碳素测年也表明，火山喷发的日期至少要比以前估计的公元前 1500 年早一个世纪。当然，科学怀疑仍然存在，但是公元前 1628 年显然是“最管用的假说”。[24]

克诺索斯王宫幸而逃脱了后世庞贝城和赫库拉涅乌姆城（Herculaneum）的厄运。火山喷发的当天，恰巧刮起一阵西风，使最厚重的灰烬被吹落到小亚细亚。尽管如此，克诺索斯仍被地震摧毁了墙垣和立柱；并且这么可以说，米诺斯海军遭受了重创，即便没有损失殆尽，也是极为惨重的。在几小时之内，圆锥子一般的塞拉岛就被变成了环状的，隐没在海水中的黑色玄武岩峭壁，四周环绕着怪异的硫磺泻湖。就像泻湖中央的那块残破不堪的岩石一样，克里特岛必定也是遍体鳞伤，留在一个已经凋敝了的帝国的正中央。

[94] 克里特岛东部的考古学地层表明，有一段明显的中间期将塞拉火山的喷发与后来发生的，仍未被解释清楚的灭顶之灾划分开来。这场灭顶之灾将克诺索斯王宫化为灰烬，将泥板烤得硬硬的，至今仍能被人识读。塞拉火山并没有像人们曾经以为的那样毁灭了克诺索斯。但是，它确实打出了第一记重拳，米诺斯文明正是在这一系列打击下，才终于寿终正寝的。物质上瓦解和人口丧失必定加剧了孱弱贸易的崩溃。贫弱的克里特无助地向多利安武士们敞开了门户，并且以某种方式被彻底希腊化了。

欧洲第一个文明被暴力所毁灭，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对于文明兴起与衰落的总体思考。人们想知道，米诺斯的幸存者们是否会把不幸的遭遇归咎于本身的缺陷。人们想知道，是否适用于物理科学各部门的灾难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事务的长时段模式。人们想知道，数学上的混沌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长期、稳定的成长、发展时期会被突然插入的混乱与纠纷所打断。可否认为，塞拉火山喷发被证明是由于史前时代的某只蝴蝶扇动了翅膀所致呢？

考古学家们和史前史学者所思考的是很长的时间段。对于他们来说，随着克诺索斯和迈锡尼而结束的史前史、青铜时代文明恰恰是欧洲历史的三大循环圈中的第一循环。第二循环恰巧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重合。第三循环开始于罗马帝国末年的“体制崩溃”，与近代欧洲的兴起重合，我们仍然身处其中。

自从克诺索斯被毁灭到现在，时间差不多过了 3500 年。在那段时间，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多次变更。正如希腊继承了克里特的荣誉，罗马也建立在希腊的基础之上，并且，“欧洲”也是建立在罗马的废墟上的。强壮的年轻人、自信的成年人和虚弱的老年人似乎都被

编排到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之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在欧洲，克里特的命运、城邦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一再重演，它们都曾经强大，而现在却衰弱了。欧洲自身就曾经强大，但现在却衰弱了。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惊醒了民众，意识到发生一场类似于塞拉火山喷发的大陆灾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1989年东欧诸国家爆发的剧变唤起了人们对更大的和平与统一的希望。新的欧洲第三代的守望者担心他们的命运是否将走向终极衰落，是否会遭遇某些新野蛮人的入侵，或者，可能将被大灾难所毁灭。或者，他们可能活在世上亲眼目睹新的欧洲第四代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的盛世景象。

第2章

希　腊

古代希腊

[95]　古代希腊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卓越品质。同样，希腊光线的质量使画家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确、深刻的目光来看待事物的形体和颜色，以至于希腊人的发展不仅使人类的外在环境而且使人类的内部生活都深受其益。确实，高强度的阳光可能是制造出如此壮观成就的众多配料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可以被看成是自身天赋与光合作用的产物。

当然，为了解释希腊现象，我们必须对多种因素的独特结合进行衡量。一个因素是阳光充沛而又随季节变化的气候，为充满活力的户外生活提供了最佳动力。第二个因素是爱琴海，海中的岛屿和海峡为航海技术、商业和殖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繁育地。第三个因素是接近更为古老的现成的文明，其文明成就将被引进、发展。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就像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或南部澳大利亚，也拥有同样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其他一些封闭的海，就像波罗的海和北美洲的大湖，也适合于原始的航行。有很多地区靠近非常适于居住的大河河谷的文明。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日本海可能是个例外——像东地中海那样表现出三种因素的结合。古代希腊的诞生常常被众多无比敬畏的仰慕者视作奇迹；但是，它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人类历史最令人惊讶的时期”这一流行的说法。现代的观点深受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代的特殊辩护的浸染，以至于往往很难看到古代希腊的本来面貌。“发现者”

约翰·亚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创造出一种审美的主题，从那以后，他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人对希腊的看法。在他的《对模仿希腊作品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1755）和他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rt A-[97] mong the Ancients）（1764）中，他提出了在理论上赋予希腊人的一切以“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和“完美的艺术法则”的说法。[1] 座右铭被认为是“没有过分的事情”或“在任何事情上都保持中庸”。我们现在怀疑，许多古典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作出的解释更多地受到了温克尔曼时代的现实主义和拘谨风格的影响。不论是对于希腊生活的非理性因素，或是单单是其酒神精神（joie de vivre）的强调都是不合时宜的。十九世纪的热爱希腊的浪漫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首先是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他的《希腊古瓮咏》（Ode on a Grecian Urn）：

啊，希腊的形象，雅典的风貌！
　　周身用大理石雕饰的男男女女，
还有林中的树枝，践踏过的青草；
　　你，静默的形体，逗引我们忘却了俗虑，
正像永恒逗弄我们一样：清冷的牧歌！
　　当老年磨蚀了我们一代的岁月
　　你还会存留，当别人经受另一种苦恼，
　　这时你将作为朋友对人们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在这世界
这就是你们所知和需知的一切。*

接着是雪莱（Shelley）对“希腊”的热忱：

伟大时代在世界上更始，
　　黄金岁月重返人寰；
大地脱下敝旧的冬衣，
　　恰似蛇蜕，新装美矣。
天公在笑，宗教和帝国光影摇曳

* 译文选用黄宏煦主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2页，黄宏煦译。——译者注

像一场春梦留下的残迹。*

最重要的是，年轻的拜伦爵士（Lord Byron）对“希腊的岛屿”的梦想：

让我攀登苏尼阿的悬崖，
在那里，将只有我和那海浪
可以听见彼此飘送着悄悄话
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

浪漫主义者带着一种消遣性的天才来写希腊；他们能够“哄得我们失去思考的能力”，这并不奇怪。即使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会丧失他们的批判能力。他们当中的一个在写作有关希腊文学的内容时指出，“结果在形式上是如此令人满意，在内容上是如此的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他们的作品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完美的典范。”另一个则渲染着发掘的欢乐，“在希腊世界的任何一个古典的或接近古典的地点……在那里实际上你所发现的每件东西都将是美丽的。”然而，另一个声称，“古代希腊的精神……具有如此生机勃勃的普遍的特质，以至于正是这些岩石和树木，正是这些溪流和荒野突然说起话来。”现代人可能受到了对年轻时代的世界的怀旧情绪的煎熬，或者被一种证明古代希腊的独特性的不适当的愿望所驱动。或者可能是，由于惊异于存[98]留下来的杰作，他们便忘却了那些没有保存下来的渣滓。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即便是在那个奇妙的城市的街道上走上一圈”，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雅典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在她的辉煌的神殿里去朝拜，在她的舰船上航行于地中海。”[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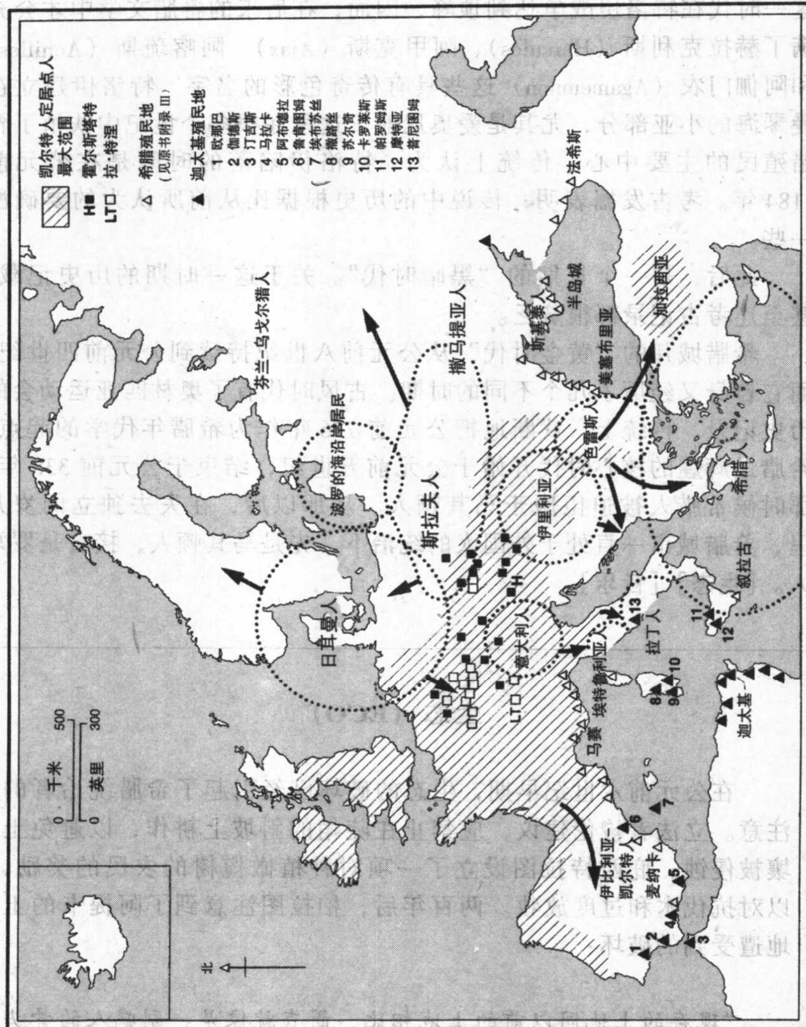
无疑，反面的东西也会被人发现。那些受到如此景仰的高贵的希腊人依然被“卑劣的迷信、违反自然的恶习、人殉和奴隶制度”所包围。[3]许多评论者比较了早期阶段的品格高尚的活力与后面几个世纪的暴力和颓废。事实就是事实。当古代希腊的文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时候，它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古老的世界的联系是微弱的。[**黑色雅典娜**] [**卡德摩斯**] [**史诗**] 然而，在三百或四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在人类所尝试的各个领域中，它都取得了惊人的成

---

* 译文选用黄宏煦主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下册），第 119 页，黄宏煦译。——译者注

** 译文选用黄宏煦主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下册），第 44 页，查良铮译。——译者注

[96]



地图 6 史前欧洲

就。欧洲的历史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勃发的生命力，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显而易见的是，希腊并不是缓慢地、有条不紊地滋长着，而是蓬勃燃烧着生发出来的。

古代希腊的政治史跨越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最初的史前时代，面向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两个中心，结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它的后期在很大程度上与所谓“英雄时代”相重合，

这一时代在特洛伊战争达到顶峰，因而，在后来的希腊文学中才会充满了赫拉克利斯（Hercules）、阿甲克斯（Ajax）、阿喀琉斯（Achilles）和阿伽门农（Agamemnon）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特洛伊建立在爱琴海的小亚部分，尤其是爱奥尼亚，这里在很多个世纪中扶植了希腊殖民的主要中心。传统上认为，特洛伊陷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184年。考古发掘表明，传说中的历史根据比从前所认为的要确凿一些。

此后，是一个长期的“黑暗时代”。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甚至连考古记录都很贫乏。

希腊城邦的“黄金时代”从公元前八世纪持续到公元前四世纪，而它自身又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古风时代有了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历史记录，传统上，武断地把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年代学的起点。希腊最辉煌的核心时代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结束于公元前338年，那时候希腊人被迫臣服于马其顿人。从那以后，在失去独立的岁月里，希腊城市一直处于外国人的统治下，先是马其顿人，接着是罗马人。**[生态]** **[音乐]**

[99]

生态（ECO）

在公元前六世纪早期，生态的破坏已经引起了希腊统治者的注意。立法者梭伦建议，应禁止在陡峭的斜坡上耕作，以避免土壤被侵蚀；庇西特拉图设立了一项对种植橄榄树的农民的奖励，以对抗伐木和过度放牧。两百年后，柏拉图注意到了阿提卡的土地遭受到的破坏：

“现存的土地同以前的土地相比，简直就像是一副病人的骨头架子，所有肥沃和松软的土地都已经被耗尽……有一些山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蜜蜂的食物，但是在不久以前它们还有林木……和无边的牧场。而且，每年从宙斯那里获得的天赐甘霖使它更加丰饶，它并不缺水，就像现在……有丰盛的泉水和溪流[提供保障]，在从前有喷泉水池的地点，神坛仍然保留着，直到今天[1]。”

从生态的观点来看，“选择了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性的变化”。它被称之为“第一次转变”，因为它创造出了第一种人工的

居住形式——可从事农耕的乡村。欧洲，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西南亚的主要发展进程的一个后来的补充，与中国和中美洲并列发展，但是分担了所有这些的后果——持久的粮食过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增长潜力；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社会强制力的增长，既表现在劳动上，也表现在战争方面；城市的出现，有组织的贸易，文字文化——还有生态灾难。

首要的是，思考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各种特殊方式产生了。命中注定地要在欧洲取得胜利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起源于"第一次转变的时代"，它强调人类超越其他造物，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些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于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纪，9)

你叫他［Man］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诗篇，8)

天是属于主的，但地却交给了人的子孙[2]。(诗篇，115)

持反对意见的思想家们，诸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就对这套为开发利用大自然而搞的骗人的把戏非常反感，这种人必定少得可怜。

即使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世俗思想出现之后，这种态度也没有改变。(参看第7章）"如果我们面向终极原因的话"，弗兰西斯·培根写道，"人必须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包括了毫无限制的物质上的发展在内的进步观念是启蒙运动的理想之一。通过作为新科学的经济学的应用，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被认为是可以日臻完善的。然而，在真正的生态学家的眼里，"经济学使我们的一些最乏味的心理倾向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物质追求、竞争、暴饮暴食、傲慢、自私、目光短浅，以及赤裸裸的贪婪。"［市场］ [100]

当然，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世界开始进入到"第二次转变"的时期，开发利用的逻辑正在发展，从"强暴大自然"，也就是说，粗暴地对待可再生的动植物资源，转向毫无限制地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尤其是像煤炭和石油这样一些地下开采出来的燃料。在这一阶段，欧洲确定无疑地成为了领导者。工业革命极大地增

加了纯粹的人口数量，城市的蔓延，对财富的渴望，消费比率，污染以及耗损。最重要的是，它提高了人类在一定规模上制造生态创伤的能力，这是梭伦和柏拉图所不能想象的。

人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环境破坏的影响。当1821年前皇帝拿破仑躺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的朗武德堡（Longwood House）的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那致命的疾病引起了巨大的不安。一份尸检报告断定死亡的原因是腹癌。但是，当1840年尸体运回法国埋葬时所进行的检查表明，在他的发根发现有砒霜中毒的迹象。早先的谋杀的怀疑似乎被证实了。他的很多随从人员都被列入了凶手的名单。然而，一百年之后，一个新的猜测出现了。在十九世纪早期，砒霜复合物有时会被用来固定织物的颜色；在朗武德堡的细致调查表明，在前皇帝的重新装饰过的房间的壁纸上有强烈的砒霜成分。这个推测还是引起了争论。但是，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拿破仑的死不是一次谋杀事件，而是由于环境的污染。（见原书第762页）

[101]

钱币（NOMISMA）

Nomisma 的意思是“钱币”，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使用这个字。money 一词，来自法文 *monnaie*，源于拉丁文 *moneta*，意思是铸币厂，货币就是在那里铸造的。（在早期罗马，铸币厂坐落在卡皮托山的朱诺女神庙里。）

公元前七世纪早期，作为货币的钱开始在爱琴海流通。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是吕底亚王国铸造了第一种钱币。一斯塔特（Stater）或两德拉克马（drachma），即一种金银合金，在吕底亚或爱奥尼亚被铸造出来，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货币。[1] 当然，弗里及亚（Phrygia）的国王，从能够把他所碰过的任何东西变成黄金的传说中的米达斯（Midas），到其名字是惊人的财富的同义语的克罗索斯（Croesus）（公元前561—前546年在位），都与钱币的起源密切相关。他们拥有帕克托路斯（Pactolus）河的“金沙”，这条河靠近吕底亚的首都萨第斯（Sardis）。

埃吉那（Aegina）岛也参与了早期的货币制造。公元前670年铸造的埃吉那银币肯定是欧洲的第一套银币。这些铸有海龟徽章的银币既标志着广为流行的“埃吉那”度量衡制度的开端，也标

志着古钱币艺术的诞生。[2] 随后产生的每一枚铸币都带有类似的徽章图案——雅典的是猫头鹰或橄榄枝，科林斯的是柏伽索神（pagasus）*，叙拉古的是阿列霞（Arethusan）林间仙子。从很早开始，用神的头像和铭文来作为铸币或当政者的识别标志也是常见的现象。印有统治者头像的货币直到希腊化时期才流行起来，但是在罗马帝国则成了家常便饭。

研究货币的古钱币学是历史的辅助科学之一。它研究的是一些古代最为耐久的证据，对于确定考古遗址的地层的年代尤其有用。用坚硬的金属铸造的钱币能够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它们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见证，而且还显示出国际贸易和文化接触的详细情况。

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埃吉那货币遍及了世界。它们构成了大多数金融体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铸币权成为了政治统治权的标志之一。仅仅在古希腊就知道有1500种铸币。吕底亚的斯塔特在罗马、基督教欧洲以及现在的所有国家的货币中都有其后代。就像埃吉那的银德拉克马一样，一些货币的流通远远超出了它们最初计划的时间和地区范围。的确，钱币的魅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很多人开始害怕它。来自马其顿的圣保罗在公元65年写道，“对金钱的迷恋是一切邪恶的根源。”[**货币“圆”**]

这个黄金时代发生的首要冲突是反对波斯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8—前529年）吞并了希腊世界的西部的情况下发生的，后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的城邦之间陷入了自相残杀。发生在马拉松平原（公元前490年）、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湾的入侵的波斯人被挡住和击退的战斗受到了无尽的颂扬。与此相反，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借助波斯人的支持取得的对雅典的不光彩胜利，或底比斯（Thebes）对斯巴达无情的压制，则很少受到注意。

希波战争给予了免于波斯统治的希腊人一种持久的认同感。自由的希腊被看成是“光荣的西方”，“自由之地”，美与智慧的故乡。东方则是奴隶制度、暴政和无知的所在地。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把这些情绪放在了波斯皇后的口中。场景是在苏撒（Susa）的皇宫，传[102]来的她的儿子在萨拉米斯被打败的消息：

---

* 有双翼的飞马，被其足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译者注

皇后：我的朋友，人们所说的这个雅典在哪儿？
合唱队：朝向太阳渐息的火焰的很远的地方。
皇后：然而我的儿子想要把它追究到底。
合唱队：那么所有的希腊都将会臣服于国王。
皇后：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吗？
合唱队：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给波斯人带来这么多灾难。
皇后：谁指挥他们？他们的军队的牧者是谁？
合唱队：他们既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也不是臣民。[5]

希腊是完全自由的，波斯是完全专制的，这是一个极端主观的看法。但是它为一种顽固地把“文明”与“欧罗巴”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提供了基础。（见原书导言，第22页）[**野蛮人**]

[103]

野蛮人（BARBAROS）

每本教科书都强调在团结“自由希腊”的人民和确定他们的希腊认同感中希波战争所起到的塑造作用。不那么明显的事实是，同样这些战争也推进了一个希腊人用来界定他们对外部世界，即“野蛮人的世界”的看法的过程。然而，“创造希腊人”和“创造野蛮人”是同时进行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戏剧提供了获得这种印象的媒介。[1]

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之前，希腊人并没有表现出把他们的邻居视作敌人的强烈的情绪。古风时代的诗歌经常制造包括泰坦（Titans）和阿马宗人（Amazons）在内的超自然的外来者的英雄。荷马把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平等对待。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依靠与大平原地区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富有成效的联合和交换而生存。[**半岛城**]

然而，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越来越变得自我膨胀和憎恨外人。有人发现，尽管对更加古老的文明尤其是埃及推崇备至，但是，由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之前）提出的种族因素由于希腊人的“共有的血缘”和共同的语言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但是，转变观念的最有效的催化剂是悲剧，尤其是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之前）的悲剧，他亲身参加了马拉松战役。在他的《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创造出一种持久的成见，依照这种成见，文明的波斯人被降低为卑躬屈膝的、卖弄的、傲慢的、

残忍的、女人气的和没有法律的异类。

从此，所有的外来人都被贬低为野蛮人。没有人能够与智慧的、勇敢的、有见识的和热爱自由的希腊人相比。色雷斯人是粗鲁的和虚伪的。马其顿人不是真正的希腊人（echte hellenisch）。到了柏拉图的时代，一个持久的屏障在希腊人和所有的外国人之间建立起来。他们认为只有希腊人拥有进行统治的权利和天生的气质。在雅典，雅典人完全可以像外国暴君的做法那样地对待臣民，只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古希腊人的"优越感情结"不可避免地导致后来欧洲出现了类似的种族中心主义和仇视外国人的观念。这一点当然被罗马人继承下来，并且，必须考虑到，像罗马人这样一些"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们"（purveyors），与古代希腊人简直亲如一家。在古典修正主义这面独特旗帜下，对"西方文明"展开的联合攻击，也并非与此无关。[**黑色雅典娜**] 一些评论者认为，古希腊人通过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接触所得出的结论已经深入到欧洲传统的躯体之中：

> 在这次特殊的接触中，"欧洲"观念诞生了，它无比傲慢，带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历史悠久，夸口天生就有权做世界的主宰。[2]

希腊北部的一个希腊化国家马其顿崛起了。在马其顿的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以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达到鼎盛。通过一连串的无与伦比的漂亮仗，这个过程只是由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死于高烧而宣告结束，波斯整个的大片领地被蹂躏，希腊世界延伸到了印度河沿岸。按照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把整个已知世界（oikoumene）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人。但对于老资格的英国希腊史专家来说，在他的著作的第十二卷的结尾和他的第九十六章里，"自由希腊"的消逝比亚历山大受到的赞美更加令人伤怀。"历史学家感到生活已经远离了他的主题"，他写道，"带着悲哀和屈辱结束了他的写作"。[6] 在政治的意义上，开始于马其顿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一希腊化时代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被崛起的罗马霸权有组织地消灭为止。[**马其顿**]

希腊世界在地理上的扩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环绕在爱琴海的多石的海岸周围的这些袖珍岛国和城邦通常缺少能够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资源。可耕地非常珍贵。即使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但商业出口还是增加了。为了与内陆地区进行有效的接触，需要友好的商业站点。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克隆（clone）殖民地的建立很有吸引力。因此，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的一些最古老的城市——哈尔基斯（Chalcis）、埃勒特里亚（Eretria）、科林斯（Corinth）、麦加拉（Megara）、弗凯亚（Phocaea），最重要的是米利都——都加入到活跃的殖民活动中来。最稠密的定居点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在色雷斯以及黑海或“友善海”（Hospitable Sea）的沿岸被发现——就像太平洋，人们希望这个名字可以补偿它的品性。[半岛城]

[105]

半岛城（CHERSONESOS）

“半岛城”是在公元前422到421年由来自黑海的多利亚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它坐落在陶瑞卡（Taurica）半岛* 的西海岸的岬上，在今天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三公里以外。它是黑海北岸的希腊城市据点之一。这些城市大部分是米利都—优比亚（Miletus－Olbia）（“财富”），在博斯普鲁斯（刻赤海峡）的潘提卡皮乌姆（Panticapaeum），顿河（Don）的塔那斯（Tanais），梵那戈里亚（Phanagoria）以及其他城邦的殖民地。它的建立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参观邻邦优比亚恰好相合，他留下了居住在旁提卡（Pontic）大平原的斯基泰人和陶瑞卡人的第一个描述。就像其邻居一样，它以与岛屿的部落经商以及大麦、酒、皮革和咸鱼的海洋贸易为生。其人口大约有两万人，居住在一个典型的直接用石头造成的街道的网络中，由通常的阿戈拉广场（agora）、卫城、剧场和港口组成。[1]

异乎寻常的是，半岛城经受住了接下来的1700年中的所有的风暴而幸存下来，连续的经历了希腊人、撒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罗马人和拜占庭等阶段。在作为一个单一的希腊前哨站的最初的阶段之后，它在公元前二世纪被以邻近的潘提卡皮乌姆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吞食掉。这个从谷物贸易尤其是与雅典的谷物贸易中大发横财的王国被来自于大草原的最后的浪潮——伊朗撒尔马提亚人所征服，它的融入到前辈的希腊文明中的能力创造出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的综合体。它的为内地

* 陶瑞卡半岛现在的名称是克里木（*Krym*）或克里米亚（*Crimea*），源于土耳其语 *kerim*，意思是“要塞”，仅从十五世纪开始使用。

的斯基泰酋长的订单工作的金匠制造出了古代世界的几件最优美的工艺珠宝。它的并不是希腊人建立的斯巴多西（Spartocid）王朝最终要寻求米特拉达悌六世攸帕托国王（Mithridates VI Eupator）的保护——即莫扎特的早期歌剧《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 Re di Ponto*）的主题——他于公元前63年去世（在刻赤的卫城仍然叫做米特拉达悌）。那时建立的罗马要塞在将近两个世纪中没有行使完全的帝国统治。

尽管遭到了接二连三的入侵，尤其是哥特人、匈奴人和哈扎尔人（Khazars）的入侵，后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时期还是在半岛城建立了大约五十座基督教堂。在它们其中的一座里，在988或991年，最后的一个蛮族访问者基辅的弗拉基米尔（Wolodymyr or Vladimir）王子，在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结婚之前，走进大理石池子里接受了洗礼。那时，哈扎尔的领主权已经衰微，拜占庭有能力把半岛城重建为克里马塔（Klimata）行政区[2]的都城。1299年，“半岛城”最后毁于蒙古鞑靼人之手，他们正忙于把克里米亚（Crimea）变成自己的家乡。该城存在期间，既没看到十五世纪奥斯曼人的到来，也没有看到1783年俄国人的征服。 [106]

在半岛城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8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发掘得到强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支苏联考古队重新恢复了发掘。保皇派们主要是为了寻找弗拉基米尔受洗礼的证据。1891年，他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建立起来一座巨大的圆顶教堂，现在被毁掉了。苏联人在寻找一个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物质文化的遗存。[3]

现代的古典时代黑海遗址群的所有者们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自豪感。塞瓦斯托波尔的航海港口在半岛城的废墟旁边建立起来，有一个合适的希腊名字，意思是“荣耀之城”。为纪念克里米亚的征服者波将金亲王而在圣彼得堡修建的陶瑞德宫（Tauride Palace）开创了俄罗斯的“本土古典风格”。克里米亚经受了1854—1856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进攻，俄罗斯人在此进行了英勇抵抗，此后，克里米亚海岸成为沙皇的朝臣们和苏联共产党官老爷们的一个宜人的避暑圣地。他们都用以圣弗拉基米尔为开端的可疑的俄罗斯版本的历史来证明他们来到此地的合理性。1941—1942年期间，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第二次围攻之后，克里米亚曾一度沦为纳粹占领区，他们妄图通过“格特兰计划”（Gotland Project）把这个半岛交给德国殖民者。1954年，在另一个具有争议的事件的三百周年纪念日上，莫斯科的苏联政府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人。这

件礼物的意图是为了表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结果恰恰相反。1991年8月，苏联最后一个总书记正在塞瓦斯托波尔沿岸休假，他在弗罗斯（Foros）的别墅中被捕，当时的一次流产的政变结束了苏联时代。[4]（见原书第1126页）

近年来，众多的克里米亚原住人口几乎消失殆尽。古代的陶瑞人（Tauri）和陶瑞—斯基泰人（Tauro－Scythians）早已被征服。克里米亚哥特人（Crimean Goths）保有他们在曼伽浦（Mangup）的内陆堡垒直到1475年。鞑靼人在1942年大批地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旁提卡希腊人（Pontic Greeks）幸存下来，直到1949年被放逐。逃脱了纳粹的一小撮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往以色列。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了绝对的多数民族。

1992年，当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前苏联的军属们与游客共同分享这块多砾石的海滩时，当他们在半岛城那一排排柱头已朽烂的柱廊下面晒太阳的时候，他们忧心忡忡，担心鞑靼人回来，担心乌克兰人对黑海舰队的声明，担心俄罗斯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克里米亚共和国。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能让他们回想起，荣耀不会持续到永久。

最后，随着早期的殖民地自身又产生出他们自己的新的殖民城邦，整个的城市链条或家族建立起来，每一个都对他们的母邦保有持久的忠诚。米利都组建了最大的这样的家庭，多达几代的八十位成员。在西方，在西西里，第一批哈尔基斯殖民地，纳克索斯（Naxos）[104]和麦撒那（Messana）（美西拿［Messina］），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35年。伊比利亚的恩伯里亚（Emporia）（阿姆普里阿斯［Ampurias］），博斯普鲁斯的马赛里亚（Massilia）（马赛［Marseille］），拿波里（Neapolis）（那不勒斯［Naples］），叙拉古撒（Syracusae）（叙拉古［Syracuse］），拜占庭（Byzantium），北非的昔兰尼（Cyrene），在黑海南岸的锡诺帕（Sinope）都可以回溯到同一时代。后来，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希腊城市在亚细亚的腹地兴起。包含有马其顿征服者的名字的城市包括世界之端的亚历山大（霍詹特［Khojent］，在土耳其斯坦［Turkestan］），阿芮亚（Areia）（赫拉特［Herat］）的亚历山大，阿拉科西亚（Arachosia）（卡恩达哈［Kandahar］）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亚历山大，最重要的，埃及的亚历山大。从坐落在遥远的西方的萨古图姆（Saguntum）（邻近巴伦西亚［Valencia］的萨古图［Saguto］）到位于旁遮普的位于东方的终点的布斯法拉（Bucephala）（赫卢姆

[Jhelum])，以亚历山大的忠诚的冲锋者命名的希腊城市连接起来可以绵延几乎4500公里，也就是说，几乎是穿越北部非洲的距离的两倍。[**马赛里亚**]（见原书附录Ⅲ，第1222页）

[107]

马赛里亚（MASSILIA）

马赛里亚（马赛）是由来自于小亚细亚的弗凯亚的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建立的。根据福提斯（Photis）的传说，他们的领袖把军舰开进了港口，正好赶上当地的利古里亚（Ligurian）部落的国王正在为他的爱女举行订婚仪式。当要求这个姑娘把订婚的杯子交给集合起来的武士当中的一个的时候，她却递给了英俊的希腊人。在所有希腊殖民地中最富有的和最强有力的一个就是这样宣告开始的。

在高大的白色岩石的包围和一个远离海岸的海岛的保卫下，古代马赛里亚的优良的港口曾经在2500多年里是商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中心。政府是商业寡头制的。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终身任职的600个公民组成的大议会任命一个15人的小议会，他们组成了行政机构。马赛里亚人的商业和探险活动遍布很大的区域。他们统治了从托斯卡纳（Tuscany）的鲁纳（Luna）到伊比利亚南部的海洋，他们在尼西亚（Nicaea）（尼斯[Nice]），安提波力斯（Antipolis）（安提贝斯[Antibes]），罗达（Rhoda）（阿尔莱斯[Arles]），以及遥远的恩伯里亚，建立起很多商业据点，所有都献给他们自己的庇护女神，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Ephesian Artemis）。他们的水手对于赫拉克利斯柱子（the Pillars of Hercules）以外的大海并不感到害怕，以到达北方的冰岛和南方现在称之为塞内加尔而闻名。一个勇敢的四世纪的马赛人菲西阿斯（Pytheas）在欧洲的北部海岸航行，包括“提恩群岛”（Tin Islands）（希罗多德所称的不列颠）。他的失传的《大地环行纪》（Survey of the Earth），斯特拉波（Strabo）和波里比乌斯（Polybius）都有所了解。

面对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满怀忌妒的竞争，马赛经常向罗马寻求保护。但是他们做过了头。公元前125年，当他们为了对抗高卢人要求军事援助时，罗马军团蔓延到了整个国家，因而设立了山北高卢行省（普罗旺斯）。从此，一个讲希腊语、拉丁语和凯尔特语的三语社会发展起来了。从那以后，这座城市的生活反映出地中海政治的所有变化——阿拉伯人，拜占庭人，热那亚人，

以及从1841年开始，法国人。马赛的最辉煌的日子开始于十九世纪，随着法国人在黎凡特的利益而开始。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及德雷赛普斯（de Lesseps）修建苏伊士运河，是关键的插曲。

现代的马赛像古代的马赛里亚一样，仍然靠海洋为生。因马萨尔·帕格诺（Marsel Pagnol）的情节跌宕起伏的三部曲而名垂不朽的维克斯（Le Vieux）港，早已被防波堤外庞大的奥托诺梅（Autonome）港所超过。然而，芳妮（Fanny）、马略和恺撒之间绝望地忍受离别之痛，苦苦等待船只归港的动人情感却经久不衰，一次又一次重演：

芳妮：马略，你爱我吗？

马略：我已经说过了，芳妮，我不能跟你结婚。

[108] 芳妮：呵，我明白了，因为我是一个来自老城的下贱女人……说吧，说出来。

马略：不。我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你，芳妮。我正要告诉你。我想离开。[1]

从高高坐落于一座希腊神庙遗址上的岗哨平台向下看，你可以看到一只只帆船，像福提斯的舰队一样，徐徐驶入海湾。或者，你还可以想象关押在伊芙堡中的基督山伯爵或马略，是如何穿越大海逃出生天的情景。[2]

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那时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意思是“更大的希腊”［Greater Greece］）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它们与希腊本土发展出与美国和西欧一样的关系。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征服小亚细亚，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非常牢固地集中在爱琴海。米利都是一个比雅典更大和更繁荣的城市。但是一旦“欧罗巴”受到了威胁，最先是来自于波斯，接着来自于马其顿和罗马，大希腊的城市具有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充满奢侈和僭主的西西里由于它的与周边的腓尼基世界的独特的共生现象而繁荣起来。叙拉古对雅典的作用就像纽约对伦敦的作用。对于西西里及其自相残杀的战争，米什莱（Michelet）表现出特殊的雄辩：

它变得异常的巨大。它的火山、埃特纳（Etna）峰使维苏威（Vesuvius）相形见绌……周围的城镇对它的壮丽作出反应。多利亚人的赫拉克利斯之手在阿克拉加斯（Acragas）（阿哥利詹吐姆［Agrigen-

tium]）的遗迹，在波西多尼亚（Posidonia）（帕西吐姆［Paestum]）的柱子，在白色的幽灵塞利诺特（Selinonte）中可以看到……然而这些城市的巨大的力量，它们的惊人的财富，它们的海军装备……都没能延缓它们的毁灭。在大希腊的历史中，一次失败就会招致灾难。因而，塞巴里斯（Sybaris）和阿哥利詹吐姆从世界上消失了，成为西方的推罗（Tyre）和巴比伦……[7]

大希腊控制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在这里，希腊世界与对抗的范围直接接触，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罗马人。

欧罗巴的故乡腓尼基与希腊同时开始繁荣，并且有着类似的风格。实际上，腓尼基的城市国家远在它们的希腊对应物之上，腓尼基的殖民地亦然。当克里特处于最后的衰落中的时候，西顿（Sidon）和推罗达到了顶峰。*Kart - hadshat* 或"新城"（迦提贡［Kartigon］，迦太古［Carthago］，迦太基）号称是由皮格马里昂（Pygmalion）* 和他的姐姐领导的殖民者于公元前810年在北非建立起来的。邻近的乌提卡（Utica）更为古老。当旧的腓尼基就像小亚细亚一样被波斯征服，迦太基和乌提卡也像希腊大陆的城市一样保持了自身的繁荣。

迦太基通过海上力量、贸易和殖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子邦从位于伽德斯（Gades）（卡蒂兹［Cadiz］）的赫拉克利斯柱子之外延伸到西西里的坦吉斯（Tangis）（丹吉尔［Tangier］）和帕诺姆斯[108]（Panormus）（巴勒莫［Palermo］）。在它的全盛期它可能是所有城邦中最繁荣的，统治了西部地中海的所有岛屿和海岸。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它打击并毁灭了西西里的许多希腊城邦，只是到了罗马霸权的到来，它的野心才稍有收敛。

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属于闪米特种族。作为地中海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的最终的失败者，他们既没有得到希腊人也没有得到罗马人的同情。作为最终被制成木雕偶像的太阳神巴尔（Baal）的崇拜者，他们总是被挑出来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后继者们嘲笑的对象，而希腊罗马世界最终还是接受了它。尽管欧罗巴的腓尼基亲属又延续了一千多年，但他们的文明却不再有人知道或研究。他们的故事可能会遭受到另一种反犹主义的变体的灾难。

希腊宗教从早期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和拜物教（fetishism）向把世界看成是"一座神和人的伟大的城市"的世界观发展。奥林匹亚众神在史前时代后期已经很突出。众神之父宙斯（Zeus）和他的配偶赫拉（Hera）统治着奥林匹亚的任性的家族——阿波罗（Apollo）、

---

* 神话传说中塞浦路斯的国王兼雕塑家。——译者注

阿尔忒弥斯（Artemis）、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e）、阿瑞斯（Ares）、波塞冬（Poseidon）、赫尔墨斯（Hermes）、狄奥尼修斯（Dionysus）、狄米忒尔（Demeter）、普鲁托（Pluto）和佩尔塞福涅（Persephone）。他们的奥林匹斯山顶的家通常被认为位于希腊故乡的北部边境。一大堆由地方神祇、森林之神、幽灵、仙女、复仇女神、女巫、缪斯组成的观众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希腊人向他们献出供品。动物的牺牲的奉献仪式仍然是通常的惯例。尽管变幻无常是神祇的特权，尽管像战神阿瑞斯或者海神波塞冬这样一些神可以具有报仇心理，但这里没有魔鬼，没有黑暗或罪恶的力量攫食人们的更深层的恐惧。人类的最大的错误是自负（*hubris*）或过分的骄傲，通常由复仇女神（*nemesis*）的愤怒来惩罚。[**香料—牛**]

[109]

香料—牛（SPICE - OX）

毕达哥拉斯（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530年左右）说过两个著名的格言："一切都是数"和"吃豆子与吃掉双亲的脑袋同罪"。关注现代科学起源的学者们研究他的数学。关注希腊精神运作的那些人则研究他对烹调的看法。（见原书附录Ⅲ，第1221页）

就像后来移居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那样，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在宗教上持不同意见者，他乘船离开故乡萨摩斯（Samos），在大希腊建立起一个教派殖民地（sectarian colony）。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宗教理论运用到食物和饮食及其他事物中。他的中心论点是从灵魂转世的观念引发出来的，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可以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身上，或者从人转到动物身上。结果是，他从原则上反对用动物来做牺牲的风俗，坚持认为，加热后的香草生产出来的香水或香料与烤过的动物脂肪产生的恶臭相比更适合作为献给众神的供品。

但是，如果说香料形成了与天堂的联系，那么豆子则与冥界相连。蚕豆，它的没有节的茎不断地伸向阳光，被认为可以起到从下界转世的"人的灵魂的阶梯"的作用。豆子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繁殖制造了一堆热辣辣的猥亵形状，使人联想起生殖器和流产的胎儿。类似的禁忌还针对高贵的肉类，尤其是牛肉的消费。像猪和山羊这样一些动物，到处啃食，破坏自然，被判定有害，所以是可以吃的。其他如提供羊毛的绵羊，以及人类最忠实的伙伴"耕牛"，则被认为是有用的，因此是不能吃的。如果需要的

话，低等动物的腿肉可以吃，但是像心脏和大脑这样关系到生命的器官则不能吃。根据塔林敦（Tarentum）的阿里斯托塞诺斯（Aritoxenos）的说法，最终的食谱包括 maza（大麦饭）、葡萄酒、水果、野葵菜和野日光兰、artos（白面包）、生熟蔬菜、调味品，以及在特殊场合的乳猪或小猪。有一次，被毕达哥拉斯从一片豆子地里救出来的一头牛被供养在一座当地的赫拉神庙中，并获得了终生享用的大麦口粮。

更为有名的是，当毕达哥拉斯的信徒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利（Enpedocles）赢得了公元前 496 年奥林匹亚马车比赛的胜利的时候，他拒绝按照传统奉献一头烤牛。作为替代品，他焚烧了一个用油脂和香料做的牛形的模具，在乳香和树脂的浓烟中向神致敬。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相信饮食是伦理学的一个主干。“只要人们还在屠杀动物，”大师说，“他们就不会停止自相残杀。”[1]［科诺普什蒂］

一千个神话，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对崇拜和神谕的选择，在扩散。它们培育了一种看法，在那里，在敬畏的调和之下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被认为会以健康和财富作为嘉奖。以奥林匹亚为中心在奥林匹亚[110]赛会上坐东的宙斯崇拜是普遍的，虔诚与竞争的努力相互结合。流传甚广的光明之神阿波罗崇拜以它的在提洛岛（Delos）以及德尔斐（Delphi）的诞生地为中心。土地之神狄米忒尔的秘密宗教在埃留西斯（Eleusis），还有更加迷人的酒神狄奥尼修斯的秘密宗教从古代的肥沃之地发展起来。歌唱者奥尔菲斯崇拜（Orpheus），他穿过下界追寻他的死去的爱人欧律狄刻（Eurydice），开启了对灵魂的存在和净化的信仰。从公元前七世纪一直持续到晚期罗马的奥尔菲斯主义（Orphism）激发了从柏拉图和维吉尔开始的无尽的诗歌的评论：

只有那个抄起七弦琴的人，
即使他已化为鬼魂，
才能倾诉无限的赞美。
只有与死神一道服用过罂粟的人，
才能连最轻柔的音符都不会漏掉。
尽管池塘中的倒影常常会在我们面前消失——
你要晓得这幻影是怎么回事！
只有在双重国度中，
声音才会恒久、温柔。[8]

与希腊化时代的密特拉（Mithras）和伊西斯（Isis）崇拜一样，当在第200届奥林匹亚赛会之后基督教产生的时候，所有这些崇拜仍然在全方位地向外传播。[脐石]

[112]

脐石（OMPHALOS）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德尔斐位于世界的正中央。它的 *OMPHALOS* 或“脐石”标志着宙斯的两只鹰的会合处，一只从东方派出，另一只从西方派出。在这里，同样在被黑色的松树和帕那索斯山（Mt Parnassus）的玫瑰色的悬崖环绕的深谷中，阿波罗杀死了蛇神皮同（Python），并且，一个冒着热气的地裂口的上面有一个蒸汽弥漫的山洞，洞中修建起一座最受尊敬的神谕发布所。在历史上，阿波罗神庙就建在一座剧院、一座为举办德尔斐神庙赛会的体育场和一些守护神的城市的宝库的旁边。公元前331年，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侄子写下了那一届的德尔斐神庙赛会的所有胜利者的名单。它们被刻在四块石碑上，是由现代的考古学家发现的。[1]

神谕的程序遵循着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仪式。在每个月的第七天，高级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在卡斯塔里亚温泉（Castalian Spring）沐浴之后，登上位于地裂口上的神圣的青铜三脚架上，在烟雾中陷入灵魂出窍的昏迷状态，等候她的请愿者提出要求。请愿者们在观看过传统的山羊献祭之后，就等候她用六韵步诗歌的形式发布那众所周知的模棱两可的答复。[2]

传说中米诺陶牛（Minotaur）的刺杀者和雅典的建立者提修斯（Theseus）得到了这样的安慰之辞：

提修斯，埃勾斯（Aegeus）的儿子，……不要悲伤。因为，像一个皮囊一样，你将驾驭海浪，即使波涛汹涌。

铁拉（Thera）的市民，由于他们没能在非洲沿岸建立起殖民地而感到焦急，被劝告重新考虑一下那块地盘：

如果你比我更了解利比亚，畜群的看护者，在你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的时候……我佩服你的智慧。

昔兰尼从海上的岛屿迁移到内陆而繁荣起来。

吕底亚的国王克罗索斯希望知道是开战还是保持和平。神谕说：“开战并毁灭一个大帝国。”他开战了，结果他的帝国被毁灭了。

在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役之前，一个雅典的代表团渴求阿波罗的援助以对抗波斯的侵略者：

雅典娜不能平息宙斯的愤怒……但是当其他所有一切都被占领的时候……广袤苍穹之主宙斯却会交给特赖登生的（Triton – Born）*一座木墙……保佑你和你的孩子。*

雅典的海军统帅梯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正确地推断出了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他的木制战船。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成功地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将军来山德（Lysander）受到的警告是： [113]

我命你警惕防范一名呼啸而来的重装步兵和一条蛇——大地的狡猾的儿子，在你身后发动的攻击。

他是被一名持有蛇徽盾牌的士兵杀死的。

以行贿而臭名昭著的马其顿的腓力据说被告知"用银矛战斗"。更为权威的说法是，在准备对波斯人进行战斗时，他得到了这一则预言："公牛被戴上花环。末日来临。牺牲近在眼前。"此后不久，他就遭到刺杀。

罗马人鲁西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和他的两位同伴请教神谕，询问他们的将来：

年轻人，你们当中第一个吻他母亲的人将在罗马获得最高的权力。

布鲁图斯的伙伴从字面上接受了启示，而布鲁图斯却弯下腰来亲吻了土地。公元前509年，布鲁图斯成为罗马第一任执政官。

四个世纪以后，西塞罗询问神谕，一个人如何获得最大的名声。他被告知：

让你自己的天性，而不是大众的意见，引领你的生活。

害怕死亡的尼禄（Nero）皇帝被告知："从73岁开始期待罪恶。"受到了神谕的鼓励，他想他可能活到73岁。在一次事变中，他被赶下台，年仅31岁就被迫自杀身亡。七十三成为他的继任者伽尔巴（Galba）的年龄。

可能最有名的是，当亚历山大大帝询问神谕，得到的是沉默。[3]

热衷于此道的现代人几乎与从前迷信的希腊人一样，对德尔斐那无所不知的神谕无比信赖。然而，对于学者来说，问题在于把神谕的所取得的真正成就与它被无限夸大的名声区分开来。怀

* 特赖登，希腊神话中的一种人身鱼尾的海神。——译者注

疑论者指出，没有什么所谓的预言是在它们所指的事件发生之前曾经被记录下来的。神谕的惊人的力量不能被加以检验。一个强有力的崇拜，一个有效的宣传机器，以及一个轻信的公众都是这种操作的基本要素。

许多最著名的神谕名言被刻在了阿波罗神庙的墙壁上。这当中包括“不要过度”和“认识你自己”。[4] 它们成为了希腊文明的标语。

希腊哲学是在与传统的宗教观念的对立中成长起来的。石匠的儿子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因为“引进了陌生的神”和“毒害青年”在雅典被判处死刑，喝下了毒芹做成的酒。然而，苏格拉底的用来检验构成知识的假设的不断深入地提出问题的方法为后来所有的理性思考提供了基础。它被苏格拉底用来挑战那些他所认为的早期诡辩派或“智者”的似是而非的论点。他的座右铭是“未经审查的生活不值得一活”。根据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说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一无所知。”它是认识论的完美的开端。

柏拉图（约公元前429—前347年）和他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共同打下了思辨和自然哲学的大多数分支的[111]基础。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的克吕昂学府（Lyceum），或者被称为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 School），是古代世界的牛津和剑桥（或哈佛和耶鲁）。记住它们，有人说：“希腊人给予西方哲学的遗产是西方哲学。”就在这两个人当中，柏拉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创造了第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有关共相和不朽的基本理论，有影响的宇宙起源论，一种范围深广的知识批评，一种著名的爱的分析。在思想史上没有什么比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更有影响力，这个比喻说明我们只能间接地看世界，只能通过反射在墙上的光影看到现实。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则是“富有灵感的常识的实践者”，一个分类者。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的范围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到政治学、文学批评、逻辑、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

最初以史诗为形式的希腊文学是那些明显地以一种成熟的状态产生的奇迹之一。可能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并进行写作的荷马开发利用了一种更加古老的口头传统。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归功于他的那些著作的惟一作者。但他被广泛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是无可匹敌的，没有超越者。古典学家称之为“崇高”的荷马的语言被证明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和富有意味。[**史诗**]

[114]

史诗（EPIC）

传统上，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在欧洲曾经被认为，不仅是最古老的欧洲文学作品，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是最早的高级文学形式。然而，1872年，随着在古代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巴尼巴（Assurbanipal）的宫廷图书馆中的大量泥板文书被发掘出来，《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荷马的诗作正在形成的时候，《吉尔伽美什史诗》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实际上，它可以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传统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代。它是这样开始的：

> [他] 见过万物，我来告诉大地，
> [他] 经历过一切，[我来道出] 全部。
> 他寻遍 [?] 大地 [?] 每个地方
> 他经历了一切，获得了全部的智慧
> 他已然获得珍藏，看穿隐秘
> 他带回来一个洪水以前的时代的故事，
> 他跋涉千里，归来时已是力尽筋疲，
> 他把一切艰辛全都刻上了碑石。[1]

对巴比伦史诗的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它与《圣经》的联系上，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关于洪水和方舟以及创世故事的叙述。但是，学者们注意力不久就转到了荷马的影响上。毕竟，二者在年代学上是相当接近的。亚述巴尼巴是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最后25年中在尼尼微建立起他的图书馆的；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被毁，与荷马的诗歌最后定型处于同一个时期。（见原书附录Ⅲ，第1216页）

很多文本的相似性可以通过所有前文学的史诗所具有的口头习惯而得到解释。但是，有很多事情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解释。《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开篇与《奥德赛》的开篇在语气和情绪上十分相似：

> 歌唱的女神啊，告诉我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攻下神圣的城市特洛伊之后，又漂泊了很长的时间，到过许多

地方。看到过不少城市，了解到他们的心肠，他心中忍受了很多痛苦……女神，宙斯的女儿，给我讲讲那些事吧，随你从哪里讲起。[2]

还有一个更能证明《吉尔伽美什》对《伊利亚特》所产生的影响的例证。两部史诗都运用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转折性情节，该情节发生在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友中的一个死去时。吉尔伽美什为恩吉都（Enkidu）而悲伤，正像阿喀琉斯为帕特克卢斯（Patroclus）而悲伤。其他的情节，像众神抽签来分配土地、海洋和天空也惊人地相似。人们曾经猜测“希腊人可能欠亚述人的情”，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3] 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荷马史诗不止提供了把古典文字与数代游吟诗人（aoidoi）所传唱的无字歌谣的古老传统联系起来的纽带，还跨越了传统的西方文学经典与比它古老得多的非欧洲文学作品之间的鸿沟。

书面文献依赖于文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字母系统的引进。字母的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希腊生活的城市特征的激励，但是其渗入到不同的社会层面的程度则存在一些争议。[**卡德摩斯**]

[116]

卡德摩斯（CADMUS）

阿革诺耳（Agenor）的儿子，腓尼基的国王，欧罗巴的兄弟**卡德摩斯**是许多希腊神话的主角。他被誉为是彼奥提亚的底比斯（Boeotian Thebes）的建立者，字母的引进者。为了寻找他的被诱拐的姐姐，卡德摩斯向德尔斐神谕请教。他被告知“在一头牛可以休息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所以他跟随着一头牛从弗西斯来到了彼奥提亚平原。他最终选中了一个靠近一座山丘的地方，开始兴建卡达米亚（*Cadmea*），底比斯的椭圆形的卫城。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卡德摩斯在雅典娜的建议下所杀死的一条龙的牙齿中生出来的，雅典娜使他成为他们的总督，宙斯给了他一个妻子哈摩尼娅（Harmonia）。

狄奥尼修斯和赫拉克利斯的出生地，根据预言家的说法，是在特雷西亚（Tiresias），根据魔法音乐师的说法，是在安菲翁

(Amphion)。底比斯也是《俄狄浦斯》(*Oedipus*)和《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的悲剧发生的地点。它是雅典的邻居和世世代代的对手；它是斯巴达的同盟和后来的毁灭者；它自己是被亚历山大摧毁的。[**俄狄浦斯**]

被认为是卡德摩斯带到希腊来的腓尼基字母是发音的，但纯粹是辅音。众所周知，就像它的同伴希伯来文，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其基本的形式已经取代了早期的象形文字。作为一种很容易被孩子学会的简单的系统，它打破了对神秘文字的垄断，而前代中东文明的祭司阶层已垄断文字书写达一千年之久。字母的名字几乎毫无变化地转入到希腊文中：aleph（alpha）=“牛”，beth（beta）=“房子”，gimel（gamma）=“骆驼”，daleth（delta）=“房门”。早期的希腊字母表是通过给原来的十六个腓尼基辅音加上五个元音而产生出来的。它还为了作为数字使用而翻了一倍。正是通过这种渠道，它演变为主要的欧洲文字支脉的祖先，包括现代希腊文、埃特鲁利亚文（Etruscan）、拉丁文、格来哥利蒂克文（Glagolitic）和西里尔文（Cyrillic）。（见原书附录Ⅲ，第1218页）

拉丁字母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它是以诸如大希腊的库麦（Cumae）这样的哈尔基斯殖民地（Chalcidian colony）发现的一种字母为基础的。后来它被所有的西方基督教王国所采纳和改造，从爱尔兰到芬兰，在较近的年代还有很多非欧洲语言，包括土耳其语。

格来哥利蒂克文语和西里尔字母是在拜占庭时期为了书写某种斯拉夫语言从希腊文发展而来的。在东正教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用西里尔字母写成；在克罗地亚，同样的语言用拉丁字母写成。[**伊利里亚**]

腓尼基、希腊和罗马文字的有棱角的风格是出于石刻艺术的需要。草书风格的逐步产生是由于在蜡版上使用尖笔和在羊皮纸上使用鹅毛笔才成为可能。

作为现代“小写字母”的拉丁小写大约在公元600年出现，尽管罗马的大写字母也被保留了下来。[**古文字**]

字母和文学是欧洲文明的辉煌成就之一。卡德摩斯的故事暗示，它们的根在亚细亚。

荷马的后继者——从他的史诗作家的同伴从赫西俄德（Hesiod）（最活跃的时期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到不知名的称为“荷马赞美

诗”的作家（们），从以弗所（Ephesus）的卡里努斯（Callinus）（最活跃的时期从公元前690年开始）到克勒丰（Colophon）的色诺芬（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前480年）的哀歌作者，从萨福（Sappho）（公元前612年之前）到品达（Pindar），从阿那克里翁（Anacreon）（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530年左右）到开俄斯（Ceos）的西蒙尼德（Simonides）（公元前556—前486年）的抒情诗人——吸引了无数的仿效者和翻译者。叙拉古的狄奥克里塔（Theocritus）（约公元前300—前260年）写作的充满美女和牧羊人的田园诗成为了从维吉尔（Virgil）的牧歌到《正像你喜欢它》（*As You Like It*）以来的一种田园传统的范本。但是没有人唱出了列斯堡岛（Lesbos）上的“第十缪斯”这样甜美的歌：

有人说世间最好的东西
是骑兵，其他人说
是步兵，是舰队；
但在我看来是心中的爱。[10]

朗诵诗歌与音乐联系紧密；七弦竖琴的旋律通常是与六韵步诗的朗诵相伴的。希腊字 *musike* 包括了所有有旋律的声音，不论是文字还是音符。诗歌存在于最简单的文字中，存在于广为流行的警句艺术中：

[115] （希腊文：略）
（一切都是笑声，一切都是尘埃，一切都是虚无。/从无理中产生了存在的一切。）[11]
以及墓志铭：
（希腊文：略）
（去告诉拉西戴梦人，过客。/我们恪守纪律，决定赴死。）[12]

希腊戏剧起源于宗教节日中的仪式。悲剧的概念，文字上的意思是“山羊之歌”，最初与仪式中的献祭有关。雅典的最早的一些戏剧是在狄奥尼修斯节的时候上演的。就像运动会一样，它们以一种竞争的精神被搬上舞台。演员和合唱队之间的风格化的对白为探究最可怕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媒介。在他们当中，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年）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前406年），把部落的神话和传说转化成世界文学的奠基石。《七将攻

忒拜》、《奥列斯特》(*Oresteia*)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俄狄浦斯王》(*Odepus the King*)、《厄拉克特拉》(*Electra*)、《安提戈涅》(*Antigone*);《陶里安的伊菲格涅亚》(*Iphigenia among the Taurians*),《美狄亚》(Medea),以及《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这些只是在数量庞大的全套戏剧中残存下来的剧目。[**俄狄浦斯**]

[120]

俄狄浦斯(OEDIPUS)

底比斯城的国王,"瘸腿的"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神话和文学中最频繁登场的人物之一。他是古典传统的重要例证,许多古典传统都是从他的各种形象中演化出来的。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底比斯的放逐者,被他的皇家父母抛弃,命中注定要进行最可怕的尽管并非自愿的复仇。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就被遗弃,因为他的父亲拉伊乌斯(Laius)害怕关于他的一个坏的预言。他被一个牧羊人救了,并在邻近的科林斯,被并不知道其出身的人抚养成人。他向德尔斐的神谕请教,被告知他将会杀死他的父亲并娶他的母亲为妻。为此,他逃离了科林斯,再次来到了底比斯。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他杀死了拉伊乌斯;破解了斯芬克斯(Sphinx)的谜题;消除了城市对它的恐惧。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国王的寡妇尤卡斯塔(Jocasta)、他的母亲,作为妻子。在通过这一不知情的乱伦结合成为了四个孩子的父亲之后,他发现了事实的真相,看到尤卡斯塔在绝望中上吊自尽。他随即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女儿安提戈涅的指引下被放逐。他的末日来临了,在阿提卡的克罗诺斯,在那里,悲惨的漫游者消失在一片神秘的丛林中。

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提到过俄狄浦斯。但它是一部失落的史诗。《底比斯人》(Thebais)很可能是后来这个故事的主要来源。后来,它成为了索福克勒斯的底比斯三部曲的中心内容,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和幼里皮底斯的《哀求者》(Suppliants)和《腓尼基妇女》(*Phoenician Women*)的背景。

俄狄浦斯在此后的欧洲文学中不断重现。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写了一部史诗《底比斯人》(*Thebaid*),它反过来成为拉辛(Racine)的第一部戏剧《底比斯人》(*La Thebaide*)(1665年)的原型。罗马的悲剧诗人塞内加(Seneca)创作了索福克勒

斯的《俄狄浦斯》的改编本，激发了由高乃依（Corneille）（1659年）和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950年）的更晚的版本，以及由当代诗人泰德·雨果（Ted Hughus）随意改编的剧本。索福克勒斯的《克罗诺斯的俄狄浦斯》（*Oedipus at Colonus*）为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诗剧《老政治家》（*The Elder Statesman*）和琼·科克托（Jean Cocteau）的《饵雷》（*Infernal Machine*）（1934年）提供了基础。他的《安提戈涅》的追随者是由科克托、琼·阿努尔（Jean Anouilh）和布莱西特（Brecht）创作的相同名称和题材的戏剧。安托尼·博尔赫斯（Anthony Burgess）写了一部名为“*MF*”（1971年）的俄狄浦斯的小说。安格尔斯（Ingres）画过两幅《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Oedipus and the Sphinx*）（1808年）的画。有一部由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创作的改编自科克托的拉丁歌剧名为《俄狄浦斯王》（Oedipus - Rex）（1927年）的清唱剧，还有一部帕索里尼（Pasolini）创作的名为《俄狄浦斯王》（1967年）的电影。

然而，对这一传说的最著名的应用是由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做出的，他给予了男孩对他们的父亲的被压抑的敌意以“俄狄浦斯情结”（Odepus Complex）的标签。从父亲和儿子争夺母亲的感情而来，这个综合病症会在后来的生活中导致一种病理性的对母亲的依恋。

古典传统也许可以被定义为，为了当代的需要而创造性地利用古代主题进行新的创作，这类例子成千上万。经过文艺复兴以来五个世纪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的滋养，古典传统的知识体系极大丰富，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对此十分熟悉。它与基督教一道，注入“欧洲文化的血流”，并提供了“一个即时识别身份的标准”。二十世纪晚期的古典传统的衰落随着社会和教育中的优势学科的改变而加速。支持者们争辩说，古典传统的生存至关重要，假如欧洲文明不想因异化而萎缩的话。

只有三十二部悲剧幸存下来；但它们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被搬上舞台。它们尤其是深受恐惧困扰的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悲剧使我们能够在不能忍受的困境中生存下去。”“最伟大的希腊悲剧是在可能发生的噩梦面前，时常教育人们……我们都将在黑暗、绝望和自杀中结束生命。”“既然已勇敢地正视所谓世界历史可怕的毁灭性和自然界的残酷性，于是希腊人得到了安慰……是艺术，并且通过艺术—生活之路，使他得到了拯救。”[13]

喜剧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50—前385年）的引导下，以为能随便跟任何人——从哲学家到政治家开玩笑。《骑士》、《鸟》、《云》、《黄蜂》、《蛙》，纯属虚构的情节夹杂着污秽的、性感的幽默；引得后世的观众们也爆发出阵阵大笑。阿里斯托芬确有一种无人匹敌的天赋，能杜撰新词，令人难忘。就是他发明了 Nephelokokkugia，（Cloudcuckland “理想国”）一词。[**书呆子**]

[121]

书呆子（SCHOLASTIKOS）

“爱说笑的人”（philogelos）曾经被认为是亚历山大的菲拉伽里乌斯（Philagrius）和公元五世纪的作品，其实是一部更为古老的希腊笑话集。它刻画了一个最初的“书呆子”（scholastikos），还有一个阿布德拉男人（Abdera）和一个库麦男人，其笑料接近于爱尔兰（或波兰）笑话的早期形式。

- 一个书呆子想看见自己睡觉时的样子，就站在镜子前紧闭双眼。
- 一个书呆子遇到了一个朋友，说：“我听说你死了”，“但是你看到我还活着”，“是的，可是告诉我的人比你更可靠。”
- 一个库麦人到殡葬师那里去取他死去的父亲的尸体，殡葬师找了一下，问他的父亲有什么特征，“咳得厉害。”
- 一个库麦人卖蜂蜜。一个过路人尝了一下，发现很不错。“是的”，库麦人说，“要不是一只老鼠掉了进去的话，这蜜早就卖光了。”
- 一个苏格兰书呆子决心通过训练他的驴子不吃东西来节省粮食，所以他不给它喂饲料。当这只动物饿死之后，主人抱怨道，“它这才开始学会不吃东西地活着。”[1]

民间故事的收集者们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俄罗斯和希腊，采集到关于最后那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他的《交换率》（Rates of Exchange）中采用了这个故事，作为他想象中的东欧国家斯拉卡（Slaka）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腊字母构成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出发点。

[117]“有很多奇迹，”索福克勒斯写道，“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人类更神奇”：

合唱队：地球上的奇迹很多，它们当中最伟大的
就是人，他在海洋驰骋……
他是亘古不变的地球的主人，
他使不朽的众神之母服从自己的意志……
他是众生的主宰……
语言的运用，大脑飞快运转
他学会，发现了共同生活的法则
在城市中……
他的力量无所不能……[14]

希腊的演说术是在剧场和公众的法庭和政治集会的共同养育下产生的一门艺术。叙拉古的考拉克斯（Corax）（最活跃时期约在465年左右）在《语言的艺术》（The Art of Words）一书中首次阐发的修辞学是作为一种正式的学科来研究的。在从安提丰（Antiphone）到科林斯的狄纳库斯（Dinarchus）的“阿提卡十大演说家”当中，没有人可以和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的技艺相媲美。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孤儿和口吃患者，他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使他的最大的对手埃斯奇里斯（Aeschines）（公元前389—前314年）遭到了放逐，成为公共演说和散文体的公认的能手。他的《反腓力》（Philippics）系列演说雄辩地和充满热情地论证了对马其顿的腓力进行抵抗的必要性。他的演说《论王位》（On the Crown）发表于公元前330年的一次审判的辩护上，被麦考莱（Macaulay）并不过分地描述为“人类艺术的最高典范”。

希腊艺术也经历了伟大的觉醒，一位权威学者大胆地称之为“在整个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惊人的革命。”[15]现代艺术鉴赏无疑受到那些保存完好，闻名遐迩的石头雕像、建筑物、陶瓶上的人物画的影响。即便如此，古代僵硬、阴沉的风格突然发生了飞跃，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所产生的繁荣巨变，仍然令人惊叹。受到精神和宗教动机的强烈驱动，希腊艺术家对于人体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正像苏格拉底所极力主张的，试图通过观察人们在变动中的身体的内在感情效果“来表现灵魂的运作”。菲迪亚斯（Phidias）（约公元前490—前415年）的两尊最著名的雕塑其实只是后世的复制品；但是，不知何故被爱尔金爵士（Lord Elgin）抢救出来的帕特农（Parthenon）神庙的雕带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掠夺物**]一个世纪以后，一个洋溢着

轻松、优雅气质的雕刻家普拉克希太莱斯（Praxitele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却不如菲迪亚斯那么幸运，其代表作品几乎没有留传下来，尽管奥林匹亚的赫尔墨斯（Hermes）和阿尔莱斯[119]（Arles）的阿芙洛蒂忒（Aphrodite）也体现了他的才华。这些，与后来的诸如阿波罗神青铜雕像（Apollo Belvedere），或米洛的阿芙洛蒂忒，即为人所熟知的“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在一起，经常被视为女性美和男性美的理想典范。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希腊人已创造了“半个世界的图画语言”。[16]

希腊建筑的成功在于利用大量的技术手段为精妙的情感服务。建筑艺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很大程度上以其巨大的规模为表现方式，现在却要更多地展示精神价值。精致且比例和谐的多利克（Doric）神庙，以其精巧的锥状柱廊和带有雕刻装饰的柱础和山墙，既能体现力拔泰山的肌肉力量，就像波西多尼亚（Poseidonia）（帕埃斯吐姆［Paestum］）的波塞冬神庙那样，又能体现轻松自然的优雅姿态，就像雅典帕特农神庙的白色大理石那样。神庙的格调和韵味可根据居住在高耸的立柱背后和密闭的“圣殿”（cella）里面的那些神祇的性格特征来进行调整。由第一代古典旅行家西顿的安提帕特（Antipater）在公元前二世纪列出的“世界七大奇迹”中，有五个是希腊建筑的杰作。在埃及的金字塔和在巴比伦的塞米拉米斯（Semiramis）的空中花园（the Hanging Gardens）之后，它们是：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的（第三个）神庙，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的陵墓（Mausoleum），罗得岛（Rhodes）上的巨像和亚历山大的法罗斯（Pharos）灯塔。[宙斯]

[118]

音乐（MOUSIKE）

希腊单词MOUSIKE包括了诗歌和人造的声音的艺术。两者都有很长的历史。古代希腊的音乐建立在“调式”的基础上。一个音乐的调式，就像一个标尺，就是一个音符的固定序列，它们之间的间隔提供了旋律创作的基础。希腊人非常熟悉它们当中的六个；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家们正确地计算出构成它们的复合音、半音和四分之一音的基础的频率。然而，调试系统并不像后来的音调和音节系统那样的方式运作。调式的变化可以改变在一条旋律线上的间隔的构造，而音调的变化却只能改变音高。

在四世纪，圣阿姆布罗斯（St Ambrose）选择了四个称为“权威

的调式”在基督教会中使用，教皇格列高利大帝（Gregory the Great）在上面又加上了四个称为“变格调式”，共制造出八个“教堂调式”。些形成了无伴奏齐唱乐的基础。[**圣歌曲调**] 十六世纪，瑞士僧侣哥拉如斯（Glarus）[**格拉瑞阿努斯**（Glareanus）] 的亨利（Hennry）列出了一个十二个调式的全表，给了它们一个与古代的最初的名称不相符合的混乱的名称序列，只有一个例外：

编号	格拉瑞阿努斯	希腊名称	音域	主调音	属音
1	多利亚	弗里吉亚	D－D	D	A
2	变格多利亚	——	A－A	D	F
3	弗里吉亚	多利亚	E－E	E	C
4	变格弗里吉亚	——	B－B	E	A
5	吕底亚	和谐吕底亚	F－F	F	C
6	变格吕底亚	——	C－C	F	A
7	混合吕底亚	伊奥尼亚	G－G	G	D
8	变格混合吕底亚	——	D－D	G	C
9	爱奥里亚	爱奥里亚	A－A	A	E
10	变格爱奥里亚	——	E－E	A	G
11	伊奥尼亚	吕底亚	C－C	C	C
12	变格爱奥尼亚	——	G－G	C	E

现代和声的发展反映了大多数古代多余的调式。但是它们当中只有两个，第六和第五，吕底亚和爱奥里亚幸存下来。从十七世纪开始被认为十二个音节的大调和小调的变体，它们提供了旋律系统的“欢乐的”和“悲伤的”两个方面，大多数欧洲的“古典音乐”是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节拍和和声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在音乐语言中三个基本的语法要素之一，这标志着欧洲与它的亚洲和非洲邻居的分离。

既然欧洲从来没有找到一种普遍使用的口头语言，也就是说，没有共同 musike 口语，那么，欧洲的音乐术语，非口语性 musike，一定会被视为欧洲共同文化的最持久、最牢固的联系纽带。的确，由于该词从西班牙传播到俄罗斯，却没有传播到印度或伊斯兰世界，这不禁使人猜测，它是泛欧洲交流中惟一可通用的媒介。

希腊科学只是总体哲学的一个分支。大多数哲学家都既关注物理科学又关注抽象科学。认为万物来源于水的米利都（Miletus）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 636—前 546 年）恰恰因掉进一口水井而卒。

他测量了尼罗河的洪水线，船之间的距离，以及山的高度。据说，他预测出了日食。与此相反，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认为火是所有物质的主要形式，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伯利克里的老师——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的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年）论证了一个最高精神“努斯”（nous）的存在，它激发了所有的生命，通过在无尽的可见“种子”上施加力量，使它们能够结合成为所有的物质形式。他声称，行星是从地球上凿下来的石头，太阳由于运动成为炽热的东西。

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利（Empedocles）（约公元前493—前433年）认为地球由四种“元素”制造成：火、土、空气和水，这些元素经常在爱和冲突的矛盾张力下融合与分裂。据说为了检验灵魂的再生能力，他跳进了埃特那山的火山口。结果火山只还回来一只凉鞋。阿布德拉的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61年）改进了劳奇普斯（Leucippus）的原子理论，认为所有的物理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为一些“不可分裂的”微小颗粒的无序碰撞。他号称爱说笑话的哲学家（laughing philosopher），因为他喜欢对人类的愚蠢行为进行讽刺、挖苦。

科斯（Cos）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57[122]年）使医学从宗教和魔法的王国中分离出来。有大量关于公共健康、卫生学、病人护理和外科学的文章都被归结在他的名下。医生们把它们的生命奉献给他们的病人的康乐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直到近来仍然是医疗实践活动的奠基石。他的格言书开头的一行是：“生命短暂，艺术长存。”[歇斯底里]

[123]

歇斯底里（HYSTERIA）

根据希波克拉底的很多关于医学的文章，歇斯底里症是仅仅妇女才有的一种与子宫失调有关的疾病。歇斯底里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子宫”；当经血不能够流出时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焦虑状态：

> 当经血受到了抑制或不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时就会生病。这发生在子宫口被堵住或阴道的某个部分下垂的情况下……当两个口的经血都积聚在子宫里的时候，它们流进了肺部，在那里消失了。[1]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子宫自身被认为发生了错位，在身体的腔洞中摇摆。由于压住了心脏或大脑，导致了焦虑和最终的不能控制的恐慌。宗教的禁忌禁止人体的解剖；妇女的（以及男子的）身体的内部运作直到现代才被了解。然而，根据一个分析者的观点，即使在古代的解剖理论被轻视的情况下，古代的妇女观念却保存下来。“这种观念坚持认为，妇女的精神能够受到她们的生殖系统的不利的影响。”[2]

女性身体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历史上，她们的身高、体重、体形、肌肉发展、月经、生育能力、成熟、衰老和疾病模式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正像她们的象征意义、她们的宗教涵义、她们的美学鉴赏、她们的化妆、衣着和表演那样。妇女的对她们的身体潜能上的认识尤其受到了抑制。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这门学科的一本标准的教科书能够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1900年以前的妇女能享受到性的快乐吗？”男性身体的历史没有这样的问题。

至于子宫所具有的良好运作方式，现代研究认为，女性神经和生育系统的相互依赖是极为成熟的。例如，在1944年到1945年布达佩斯被长期围困期间进行的一项妇女健康调查表明，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闭经率（amenorrhea）。月经的推迟是由于毋庸置疑的焦虑，而不是歇斯底里。子宫无须被告知，一个最低限度的出生率正是在最危险的时期出现的。

辛都斯（Cnidus）的优达克修斯（Eudoxu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350年左右）提出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同时发明了日晷仪。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都写出了系统的著作。他的对动物种类的划分形成了所有后来的动物学的基础。他的《政治学》是以这一举世无双的名言开篇的：“人首先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列斯堡的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0—前288年）把同样的方法运用于植物的分类。他的论文《论性格》可以被看作是分析心理学的奠基之作。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赫拉克利特可能是这些先驱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服从于永恒的变化和衰亡：而且变化是由于对立面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所造成的——换句话说，由于辩证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打开了历史学家的职业的两种基本的观念——时间的变化和因果关系。他的最受称颂的格言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明亮的石头**］

[124]

明亮的石头（ELEKTRON）

“明亮的石头”是古希腊人对琥珀的称呼。希腊人了解到，当受到摩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吸引其他的诸如羽毛的物体的力量。米利都的泰勒斯曾说它具有一种“灵魂”。“明亮的东西”厄拉克特拉是两个希腊神话中的杰出的妇女的名字。一个是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是宙斯的一个宠幸的情妇。另一个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的女儿，奥列斯特的姐姐，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底斯的悲剧中的角色。

可以排斥和吸引的无形的物理力量一直没有名称，直到“磁学之父”威廉·吉尔波特（William Gilbert）在他的论文《论磁力》（*De Magnete*）（1600 年）中称之为“电”。他写道，“地球不是别的，只是一块大磁铁。”

电和磁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是由 A. M. 安培（A. M. Ampere）、H. C. 奥斯特（H. C. Oersted）和米歇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做出的，直到 J. C. 麦克斯韦尔（J. C. Maxwell）（1831—1879 年）把这两种事物结合在电磁力的理论中。H. R. 赫兹（H. R. Hertz）（1857—1894 年）证明了填充在一个由不同的频率组成的光谱的电磁波的存在。电的运用已经从发电机和电动马达发展到收音机和 X 光上面。1891 年，英国物理学家 J. D. 斯托尼（J. D. Stoney）需要给相反的带电粒子一个名称，这些粒子构成了物质的最小的组成部分，与固定的带电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一起，围绕着一个原子核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中以一个大头针头的大小运动。他把它们称为电子。（见原书附录Ⅲ，第 1272 页）

希腊数学是在思辨思想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传说泰勒斯在埃及学到了数学和几何学的基本原理。但是，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 572—前 497 年）在汇编的他的前辈的成果以外，做出了一些原创的进展。他提出了数字理论，推导出了关于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的公式，最有趣的是计算出了音乐和谐的数学基础。他可能是美丽的但却是错误的“天堂音乐”理论的提出者。优达克修斯发现了比例原理，测量曲线表面的递减方法。他的学生梅纳克姆斯（Menaechmus）发现了圆锥的剖面。

所有的研究都为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德（Euclide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方法作了准备，他的《几何原本》（Elements）据说比任何书籍的盛行都要长久，直到《圣经》的出现。欧几里德是伟大的使数学系统化的人，他开始为所有存在的知识提供了持久的证据。当埃及的统治者问他几何学是否能够弄得更简单一些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皇家的方法”。下面的一代是由阿基米德和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6—前196年）统治，后者计算了地球的直径在252000斯泰底亚姆（stades）或7850公里，误差不超过1%。最后是佩尔奇（Perge）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220年左右），他写了一部大部头的八卷的圆锥研究，并发现了一个比阿基米德的结果更为接近圆周率的大致数字。[**阿基米德**]

[125]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叙拉古的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是数学家中的数学家。他拥有一种孩子般的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解决问题的乐趣。他并不反对现实的事物。在亚历山大的研究之后，作为国王希罗二世（Hiero Ⅱ）的顾问，他回到了西西里。在那里，他发明了用来提水的“螺旋”；他制造了一个天象仪，后来带到了罗马；他设计出了打退罗马人对叙拉古的最后围攻的石弩和铁爪蒿（见原书第143—144页）。他开创了流体静力科学，传说中最有名的是在他洗澡的时候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光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大喊着“尤里卡，尤里卡”（Heureka，Heureka）（我发现了）。这个定律认为，一个浸在水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排出的水的重量相等。那么，这就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该物体的重量。在杠杆的问题上，他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

然而，他的最大的热情是留给纯粹的思辨的问题的：

1. 沙计量器（*The Sand - reckoner*）。阿基米德自己试图计算出填满整个宇宙需要多少粒沙子。为了对付其中庞大的数字，由于十进制还没有被发明，他最先使用了“一万的一万”的概念，也就是说10000×10000或者10000的平方。即使他把宇宙等同于太阳系，他10000的37次方的答案也完全是值得尊重的。

2. 测量圆周（*Measuring the Circle*）。阿基米德通过从一个九十六边形的周长的上下极限，着手计算出圆周和半径之间的比率。

他得出了某些著名的近似值，接着发现了必要的七位数字的平方根的近似值。当然，他不得不用一种笨拙的计数的字母系统进行工作。但他对现在称为 π 的计算结果在 $3\frac{1}{7}$（=3.1428571）和 $3\frac{10}{71}$（=3.140845）之间。(现在的公认值为3.14159265)

3.牛类问题（Problema Bovinum)。阿基米德想出过一个看上去简单的难题，即阿波罗有一群牲畜，公牛和母牛在一起，一些是黑色的，一些是棕色的，一些是白色的，一些是带斑点的。在这些公牛中，白色牛的数量是黑色公牛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大于棕色的数量……如此类推。在母牛中，白色的数量是所有黑色牲畜的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如此类推。那么牲畜群的构成如何？答案是总数达到了790亿以上，远远超过了西西里岛上所能容纳的牲畜的数量。（西西里的25000平方公里只能够容纳127.5亿头牲畜，每两平方米一头，不排除那些必须站在埃特纳山的沸腾的火山口上的牲畜。)[1]

在后面的世纪中分裂为几个对抗流派的希腊道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传统宗教的教导。不知在何时由埃里斯（Elis）的皮浪（Pyrrho）创立的怀疑论派宣称，不可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确定的知识，[124] 因此人的惟一的目标应该是对道德的追求。他是一个反思辨的思辨者，对柏拉图死后的雅典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犬儒学派是由锡诺帕的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前323年）创立的，他在把自己从欲求中解脱出来的价值观上持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信仰。他们的名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狗”。第欧根尼是一个著名的怪人，他生活在一个桶里，做出一种抛弃世间的舒适生活的姿态。他白天提着一盏灯走在雅典的大街上“寻找诚实的人”。在科林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会面中，据说他曾经告诉国王“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名字来源于萨摩斯的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前270年）的伊壁鸠鲁学派提出，人们应该使他们自己投身于快乐的追求，既不必害怕死亡也不用害怕神灵。（这是一种可以在美国宪法中找到的思想）由于只追求快乐，他们获得了一种不应该得到的名声；在现实中，他们坚持认为通向快乐的道路在于自我控制、平静和自我否定。

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n）（公元前335—前263年）创立的斯多葛学派（Stoics）的名字来源于雅典的“画廊”（Stoa poikile），在那里这个学派的人们最初聚集在一起。他们遵从这样的信仰，即人类的情

感应该受到理性的统治，（像怀疑论者一样），追求道德是生活的全[126]部。他们的对人类的普遍友爱的远见，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严格的训练，用来使他们确信可以摆脱痛苦和灾难，被证明对罗马人尤其具有吸引力。[竞技者]

[127]

竞技者（ATHLETES）

运动会是希腊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一座有自尊心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运动场。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泛希腊运动会仅仅是一百多个这样的节日当中最有名的一个。[1] 对于运动员和神灵的共同崇拜——举办运动会的目的正是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给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国家带来的一种强烈的文化一体的感受。所有运动员都是男性，在十个设置好的项目上进行竞赛。从七世纪开始，当一个运动员意外地掉落了他的内衣时，他们便开始了裸体参赛的习俗。他们绝不是一群惯于艰苦训练，盼望拿到一笔丰厚奖金的业余选手。公元前一世纪在阿弗罗第西亚斯（Aphrodisias）的一次小型节日上的奖金税（以第纳尔计算［dinarii］*）显示了具体项目的情况：

长跑：750；五项运动：500；武装比赛：500；快速跑（1斯泰底亚姆［Stade］**）：1250；角斗：2000；摔跤：2000；竞走（2斯泰底亚姆）：1000；拳击：2000。

标准的斯泰底亚姆约为212米。跑步者绕着一个标杆，起点与终点相对。五项运动（pentathlon）包括五个项目：跳远，掷铁饼，标枪，竞走，摔跤。角斗（pankration）是一种自由式的摔跤，就像柔道一样，一方想方设法迫使对方屈服。掷铁圈和赛车同样十分重要。[2]

运动员和他们家乡的城市从他们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的胜利中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斯巴达是十分突出的。雅典在她的黄金时代在可能的183次比赛中仅仅获得过四次胜利。但是最成功的地区是公元前776年的第一个有记录的冠军克罗布斯（Corobus）的故乡伯罗奔尼撒的埃里斯，以及奥林匹亚本地。

---

* 罗马货币单位，古罗马的一种银质小硬币。——译者注

** 古希腊长度单位，相当于606.95英尺。——译者注

蝉联过多次冠军的运动员是克罗敦（Croton）的米洛（Milo），他在公元前536—前520年的连续五届奥林匹亚赛会上获得了摔跤的冠军。在最后一次，他肩扛用于祭祀的牛绕体育场一周，然后坐下来食用。[香料—牛]

品达罗斯（Pindar）流传下来的大部分颂歌都是献给体育运动会的：

赛跑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人和神；
我们都是从惟一的母亲那里获得了生命的气息
但是万物各自的力量不同
它促使我们分离。
因为万物皆虚无，只有黄铜色的天空
牢固不变直到永远。
但我们可以强健心灵和体格
仿佛永生的天神一般，
尽管我们不想前往那个终点
在白天，或者在黑夜
但是命运已注定，我们不得不前行。[3]

运动的精神很好地保存到了基督教时代。圣保罗（St Paul）若不是一个参赛者的话，也算得上是一个竞技爱好者。“我在比赛中发挥得不错”，他写道，“我跑完了全程，一直保持着信心。”[4]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希腊式的感受。 [128]

最后一届古代的奥林匹亚赛会是在公元389年或公元393年举行的。385年，最后一个著名的胜利者是亚美尼亚人。没有证据表明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正式取消了赛会。很有可能是，因为基督教观念反对异教的所有类型的崇拜，所以在395年西哥特人入侵希腊之后也就不能再恢复了。取而代之的赛会继续在亚细亚的安条克持续到530年。[5]

在间隔了15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4月6日至12日在雅典得以恢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是法国的一位运动员巴龙·皮埃尔·德·顾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年）。在整个二十世纪，除了战争时期的例外，运动会每隔四年在不同的地点举办一次。从1912年起，妇女被允许参加比赛。从1924年在夏蒙尼（Chgamonix）举行的

会议开始组织冬季奥运会。1896年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产生的第一个马拉松冠军是一个希腊人路易斯·斯皮里顿（Louis Spyridon），真是恰当极了。

希腊人的性生活是一些时髦的学者愿意写上一部专题著作或短文的一个题目。曾经被老一代的学者视为“非自然的邪恶”的东西现在则被提升到个人的“倾向”或“爱好”地位；男性的同性恋行为被普遍认为在古代的社会行为模式中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正如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模式有着非常现代的色彩。“希腊的邪恶”并没有产生罪责：因为一个男人去追求一个年轻的少年并不比追求一个年轻的女子更应该受到指责。就像英国公立学校的男孩一样，年轻的希腊男子在大街上行走时大概就会受到鸡奸。家长们想方设法地保护他们的儿子，就像保护他们的女儿一样。女性同性恋显然与男同性恋并存，但列斯堡岛——女诗人萨福及其伙伴们的家乡，在古代，还没有成为这一现象的代名词。乱伦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的悲剧的命运，他错误地杀死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神谴的证明。大体说来，希腊人看起来并不像现实中的坦率的希腊人那么放荡不羁，或者洁身自好。他们的世界中充满了明显的色情诱惑，对此他们泰然处之，毫不羞愧。[17]

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希腊人对性的看法与现代的加利福尼亚人的看法相同。例如，一个奴隶占有制的社会认为，非自由人的身体是可以被自由人任意使用或滥用的。性行为于是具有了一种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关系中的亲密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共享的情感就更少。性满足主要与主动的男性的生殖器的快乐相联系，他把他自己和他的器官强加给他的被动的接受者。尽管有法律上的约束，但高等级的男人还是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侵犯他们的下层；这些下层包括妇女、男孩、仆人和外国人。如果恰当地给予确认的话，这种观念将使得现代在同性和异性性行为之间的区分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同样，鸡奸（*pederast*）与爱欲（*philerast*）的区分与其说依赖于个人的癖好，不如说更依赖于成长中的男人所自我确认的年龄。[18]

研究此类事情的古典文献——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的阿里斯托芬的神话——提到一些看上去预兆了相似的现代分类的性行为。然而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希腊人可能遵循着一种与我们自己的十分不同的价值系统。根据神话，人类最初是一种六条腿、两张脸的生物，每个人在前后有两套生殖器。他们分为三种——男性、女性和雌雄同体的人。后来宙斯把他们一分为二，为了分开的

两半的利益而发明了性交。人们拥有与他们所由此出的祖先的类型一致的相匹配的性欲。因此，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似乎是没有的；所有人都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多元性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基本的[128]生存条件。不幸的是，现代学者的见解表现出来的多元主义并不少于手头的这个题目。[19]

希腊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一幅简单的图画。在城邦社会和边远的山区——像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Arcadia），在那里游牧的前希腊的部落保存到罗马时代——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奴隶制是一个根本的特征，尽管它并必然形成所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像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相信的那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五阶段论”中，古典的奴隶占有制被认为是所有社会历史的必然的出发点。）在雅典，人口被划分为奴隶、“定居的外国人”（*Metics*）和公民。称为 *andrapoda* 的奴隶，字面上的意思是“人脚”，被看作是动产，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被杀死。他们不允许在军队中服役。被释奴隶自动地上升到麦提克的地位，可以被征税和征兵。公民（只有他们能够称自己为“雅典人”）具有拥有土地财产的特权和在军队服役的义务。他们被划分为十个 *phylai* 或部落，部落分成更小称为“三一区”（*trittyes*）或“德莫”（demes）的团体。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社会生活，在公民的和军事组织中都扮演着一种角色。

希腊政治组织以多样性和实验性为特征。因为每个城邦（polis）[129]至少在理论上是自治的，由此发展起一种大范围的政治传统，每一个都有其变体，派生物和仿制品。存在君主制，像萨摩斯在它的海岛国王波力克拉特（Policrates）的统治之下。存在专制政府，尤其是在波斯的榜样作用的影响下的小亚细亚的城市当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寡头政治，像科林斯、斯巴达或马赛里亚。存在民主制，像顶峰时期的雅典。然而频繁的战争、同盟、联合导致了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每种不同的政体都经历着剧烈的演变。

雅典的制度自身经历了很多变化，从公元前七世纪第一部“德拉古”（Draco）法典的作者德拉古统治下的最早的引人注目的表现，到公元前六世纪的梭伦改革和庇西特拉图的开明专制，德拉古之后两百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招致了“三十僭主”的一段插曲和伯利克里的主要批评者激进的克里昂（Cleon）的统治。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现代学者对于公民参政的确切程度也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复杂的争论发生在奴隶数量、城市流氓的角色、公民们占有土地的限度、农民公民的位置，首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城邦会议——boule 或“五百人议事会”，作为主要立法机构的公民大会（Ecclesia）以及陪审法庭——的问题上。过去的情况

表明，被认为由超过50000的完全的男性公民组成的德莫斯（*Demes*）或"人民"并不比民主更容易界定。伟大的民主人士伯利克里或德莫斯提尼（像华盛顿和杰弗逊那样）是奴隶主，或者民主的雅典对那些不那么独立的城邦实施着一种僭主式的控制，把这样的事实调和起来同样不那么容易。[民主]

[130]

民主（DEMOS）

一些人相信，在公元前507年一个影响久远的民众统治传统是由阿克门尼德（Alcmaeonid）的克里斯梯尼（Cleisthenes）开启的。公元1993年，这些人前去庆祝"民主诞生2500周年"。为了这个目的，古典学会的主席在伦敦的市政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1]。实际上，雅典民主政治的种子在克里斯梯尼改革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已经播下了。在卫城附近的品克斯（Pnyx）的集会广场进行的公民大会（ecclesia）是由梭伦创立的。但是它很容易受到像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和他的儿子这样的贵族领导者的控制，他利用公民大会支撑了他的从公元前560—前510年的长达五十年的僭主政治。

克里斯梯尼属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试图分享庇西特拉图的权力，接着选择了放逐。可能是他用帕里安（Parian）的大理石重新修缮了德尔斐的宙斯神庙的门面，以此偿还他的亲属进行大屠杀所欠下的血债。他在公元前513年领导了一次流产的入侵，很可能得到了波斯的援助。但是，是斯巴达人而不是克里斯梯尼在三年之后驱逐了庇西特拉图的残余。

据说，克里斯梯尼鼓动民众起来颠覆他的前辈们所依靠的旧有的部落组织。通过提议授予公民大会以最高权力，他获得了进行更为广泛的改革的权威。他用十个新的部落取代了旧有的四个，每个都有其自己的神龛和英雄崇拜。他极大地加强了"德莫"或"教区"组织，并在其中划分部落，把选举权扩大到了雅典地区的所有定居的自由人。首要的是，他组建了五百人议事会（Boule），作为一个掌握方向的委员会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他还创始了法律上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他被称为"公共组织观念艺术的创立者"。

持续了185年的雅典民主远远不是完美的。人民的最高统治权受到了五百人议事会的策划、德莫的反复无常以及富有的捐助

者和人民领袖的持续的影响等种种限制。为了保障公民大会达到六千的法定人数，公民们确实被用一根蘸了红颜色的绳子从大街小巷“鞭打而来”。不论是城市中心区还是郊区，大会的参与程度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2]。但是公民们确实参与了统治。他们在法律面前享受着平等的地位。他们选举出十个包括军事指挥（Strategos）在内的高级官员。他们通过抽签在他们之中分配上百个任期一年的管理职务。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视为公众的仆人。欺骗和渎职会被解职，甚至被处死。

[131] 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触动。柏拉图认为民主意味着无能者的统治。阿里斯托芬取笑“那个愤怒的、尖刻的、倔犟的老人，品克斯的德莫斯”。他问道：“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回答是，“女人们”。

不幸的是，古代雅典与当代欧洲的民主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民主并没有在它的诞生地盛行起来。它并没有受到罗马思想家的仰慕；在一千多年中它几乎被遗忘了。今天欧洲的政治实践可以把它们的起源更多地追溯到维京（Viking）类型的公民大会［**民众大会**］，封建王公召集的议会以及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雅典的至高无上的由所有的符合资格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的观念可以在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匈牙利和波兰——没有继承者的政治制度——发现它的对应物。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在古典知识中混入了一种宪政改革的兴趣；对古代雅典的罗曼蒂克式的看法在受到过古典文化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本身也是批判性的。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痛斥“多数人的暴政”。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法国模式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民主并不是一种标准。

现在关于民主的本质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在理论上，它提倡所有的德性，从自由、正义和平等到依法统治、尊重人权、倡导政治多元主义和公民社会。在实践上，“由人民来统治”是不可能的。有人把大众统治的大陆品牌与议会统治（见原书第631页）的英国品牌作出了很多区分。所有的品牌都有它们的缺陷。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政治体制中最糟糕的一个，除非为了所有其他的人”。一直存在的是对于僭主政治的近乎普遍的憎恶。这就是驱使所有新解放的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动力，并不顾忌到从前的现实。“我们整个的历史都使我们倾向于民主的力量”，1918年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样宣布[3]。在1989—1991

年，同样的情绪在前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领导者中也有所流露。

不能否认的是，像任何其他的运动一样，民主也需要其创始的神话。它需要一个古代的谱系和可尊敬的英雄。有谁比阿克门尼德的克里斯梯尼更加古老或更值得尊敬呢？

希腊政治实践的极端复杂性为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倡导由某种极权主义繁育出来的哲学王们所组成的卫士们的统治。该书与主张把人界定为“城邦的动物”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提出了关于这一论题的两种相反的意见。现代世界的基本政治词汇，从“无政府”到“政治”一词的本身，基本上都是希腊人的发明。

像戏剧一样，希腊的历史作品也有其三位巨匠。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0年）通常以“史学之父”而闻名于世，但是他的对异域土地的强烈的兴趣使得他从他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同胞中得到了“谎言之父”的称号。他的写作来自于他的长途旅行的现场报道和亲身观察。他从欧洲和亚细亚之间的巨大的冲突的角度看待过去，他的九卷本的著作以希波战争为顶点。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很多其他人看来，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55—前401年）简直是“有史以来最富政治性的历史学家”。他引进了因果关系的系统分析；他大量地摘引文献和[132]论文；在他的几个主要的主人公的一篇篇演说中，他发现了一种把主观的看法注入到他的严格意义上的公正的叙述中去的了不起的方法。在他的八卷本的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的构思中，他写道，“不是为了迎合大众一时的趣味，而是长久存留。”另一个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8—前354年）是《希腊史》（Hellenica）和《远征记》（Anabasis）的作者。《希腊史》是从修昔底德中断的时间（公元前411年）讲起的一部接续的希腊历史，就像修昔底德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续了希罗多德叙述一样。翻译为“波斯的远征”的《远征记》描述了一万名包括色诺芬自己在内的希腊雇佣兵的远征，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回来后服务于一个波斯的王位觊觎者。“塔拉萨！塔拉萨！”（Thalassa！ Thalassa！）——“大海！大海！”——的呼喊声，在几个月长途跋涉之后，色诺芬的同伴们从特雷比宗（Trebizond）后面的山上看到了海岸，被证明是军事年代记上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一致认为，希腊文明的顶峰是在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到来的。在公元前480年城邦从波斯的入侵下被拯救出来和公元前431年与斯巴达的毁灭性的战争开始之间，雅典的政治、学术和文化达到了高潮。

将军和政治家伯利克里（约公元前495—前429年）是温和的民主派的领袖人物。他组织了被劫掠的雅典卫城的重修工作，是艺术家们和哲学家们的朋友。他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的阵亡将士的墓前演说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城邦的自由和高度发达的文化的骄傲感：

我们是美的热爱者，但并不奢侈；我们是智慧的爱好者，却并不软弱。我们把财富与其当做借以矜夸的物品，不如说是用作行动的手段……你们将发现同一些人对私人和公共事物同样关心……仅有我们才把不参与公共事务者看作是一无是处的人，而不是只考虑其私事的人……在其他人那里，勇敢意味着无知，考虑却引起了犹豫。那些充分明了各种痛苦不下于对各种幸福的认识，然后勇往直前担当其即将到来的事故的人，才被正确地看作是最勇敢的人。[20]

与伯利克里同时代的雅典人给予了让他骄傲的充分的理由。阿纳克萨格拉和苏格拉底，幼里皮底斯和埃斯库罗斯，品达罗斯和菲迪亚斯，安提丰和阿里斯托芬，德莫克里特和希波克拉底，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在同样的街道上走过，都眼看着帕特农神庙在公元前438年逐渐完工。“希腊的眼睛，艺术和演说术的母亲”雅典完成了神谕的预言：“你将永远成为云间的一只鹰”。最为恰当的赞美可能是品达罗斯的一首诗歌的残篇中的词句：

（希腊文：略）

（闪亮的，用紫色王冠加冕的，用歌声赞美的希腊的堡垒，著名的雅典，神圣的城市。）[21] [133]

斯巴达，或是被称为拉西戴梦（Lacedaemon），是雅典的陪衬和对手。以现代的情感来看，它是丑陋的，正如雅典是充满魅力的。十分异常的是，它是一个封闭的城邦，坐落在伯罗奔尼撒中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平原上。它没有自己的海军，全心全意致力于军事扩张，同所有邻邦发生冲突，包括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阿尔哥斯人（Argives）和阿卡迪亚人（Arcadians）。其政府体制，据说是远古时代神圣的来库古（Lycurgus）所创建的，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被描述成一种具有专制形式的寡头政体，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寡头形式的专制政体。一个由监察官（ephors）组成的议会行使着独裁大权。他们向两个世袭的斯巴达国王下达指令，这两个国王扮演着最高祭司和军事指挥的角色。斯巴达没有什么殖民地，依靠从其男性婴儿中挑选出体弱者杀死的办法来解决其人口过剩的问题。体弱者通过仪式被公开遗

弃。所有幸存的男孩从七岁开始由国家进行身体技能和军事纪律的训练。在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公民兵的服役生活。他们被禁止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由一个下等的奴隶阶级黑劳士（*Helots*）来供养。结果导致这种文化几乎没有给艺术和优雅生活留下空余时间，也缺乏与其余希腊人之间的认同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它还是一个男人的数量惊人地减少的社会，很大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妇女手中。说话“简洁”就是要抛弃漂亮话。当马其顿的腓力给斯巴达发出一封表示威胁的信件：“如果我进入拉西戴梦，我将会把它夷为平地。”监察官的答复只有一个字“if”（“如果”）。[**马其顿**]

[134]

马其顿（MAKEDON）

问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就像问普鲁士人是不是德国人一样。如果有人追溯他们的遥远的起源，那么，两者的回答都必将是“不”。古代的马其顿的发展历程开始于伊里利亚或色雷斯文明的活动范围。但是，正像皇家墓葬的发掘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其顿的腓力征服希腊之前，它经历了很高程度的希腊化过程。[1] [**纸草**]

罗马的马其顿行省延伸到了亚得里亚海（Adriatic）[**埃格纳提亚**]，从六世纪开始有大批斯拉夫移民定居下来。一种理论认为，斯拉夫人融合了前希腊人口的残余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非希腊的马其顿国家。由于它与希腊的联系，拜占庭帝国有时被称为“马其顿”。但是从前的马其顿行省以及大部分的伯罗奔尼撒都淹没到“斯拉夫尼亚”（Sclavonia）中去了。

在中世纪，马其顿在一个时期被并入到保加利亚帝国当中，一直保留在保加利亚东正教基督教会总督区内。这加强了后来的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在十四世纪，它被转移到塞尔维亚的统治之下。1346年，斯蒂芬·杜散（Stefan Dusan）在斯科普里（Skopje）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这又加强了塞尔维亚人的领土要求。接下来的是奥斯曼帝国。

在十九世纪晚期，奥斯曼马其顿是一个典型的有混合的宗教和种族构成的巴尔干行省。基督教东正教与穆斯林比邻而居，希腊人、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比邻而居。按照习俗，由于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忠诚，所有的东正教基督徒都应被视为“希腊人”。

在巴尔干战争中（见原书第874页），马其顿被希腊、保加利

亚和塞尔维亚打败。它被一分为三。(见原书附录Ⅲ，第1309页)以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为中心的南部马其顿被希腊占领。在1922年希腊—土耳其的人口交换之后，由于1949年的内战，斯拉夫人离开了，开始由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极端爱国的希腊人——“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从土耳其移民过来的。东部马其顿包含在保加利亚当中，被当做“西部保加利亚”的同义语。以斯科普里和上瓦德尔（upper Vardar）山谷为中心的北部马其顿拥有一批居住在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混合人口。

当这一北部的部分在1945年随着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Makendonija)自治共和国而得到重建时，发起了一场决心简化历史，转变全部人口身份的运动。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试图减小战时保加利亚占领的影响，抵制古希腊文化上的魅力。政治精英的斯拉夫方言被宣布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旧的“教会斯拉夫语”与“旧的马其顿语”具有平等的地位；整个一代人都是根据追溯到数个世纪以前的一种斯拉夫马其顿的“伟大的观念”接受的教育。[2] [135]

并不奇怪的是，当斯科普里政府在1992年宣布独立，没有人能够同意他们的共和国的名称。据报道，一个希腊学者由于揭露了在关闭了的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境内存在着一个说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而接到了死亡的威胁。[3] 国外持中立态度的评论家采纳了一个有号召力的缩略语FYROM——“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同样有用的是奇怪的有助于记忆的缩略语FOPITGROBBSOSY——“前伊里利亚、前色雷斯、前希腊、前罗马、前拜占庭、前保加利亚、前塞尔维亚、前奥斯曼帝国、前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行省”(Former Province of Illyria, Thrace, Greece, Rome, Byzantium, Bulgaria, Serbia, the Ottoman Empire, Serbia and Yugoslavia)。

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希腊城邦的世界消失在一个由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造的范围更大但基本上是非希腊的世界当中——常常由于它的衰颓而受到轻视。当然，在政治的范围内，亚历山大的四分五裂的帝国中所充斥的王朝内部的自相残杀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几个世纪和广泛的地区，希腊文化表现出了耐性和一个共同的传统的有益的影响，不应该受到漫不经心的忽视。印度河谷的希腊统治者，在那里，希腊文化的外观是最淡薄的，坚持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由亚历山大的一只眼的将军

安条克（Antigonus）（公元前382—前301年）创建的马其顿的安条克王朝的统治直到186年被罗马人终结。在叙利亚，以及一个时期在波斯和小亚细亚，由塞琉古一世尼卡多尔（Nicator）建立的塞琉古王朝控制了大片的但曾经被削减的亚洲地区。他们是活跃的希腊化主义者，忠诚地实施着亚历山大的在亚细亚建立一个希腊殖民网络的计划。他们在公元69年被罗马战胜。塞琉古王国的东半部分在公元前250年被帕提亚人阿萨息斯（Arsaces）（死于公元前248年）占领，他的阿萨息斯王朝在波斯统治了将近五百年，直到公元226年一个本土的波斯帝国的再次诞生。由亚历山大的杂种的半个兄弟“保护者”托勒密·索特（Ptolemaeus Soter）（死于公元前285年）建立的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1年。

托勒密王朝以其对艺术和学术的热爱和忠诚而著称，甚至偶尔地在托勒密七世菲斯肯（Physcon）（“大肚皮”）时期，他们同时以最令人憎恶的堕落而闻名。通过一系列婚姻的曲折，菲斯肯竟然娶了他的妹妹，她还是他兄弟的遗孀（因此她同时成为了妹妹、妻子和弟媳）；为了她女儿以前的一次婚姻，他与她离了婚（她同时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侄女和干女儿）；他杀死了他的儿子（他还是一个侄子）。为了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洁性，乱伦是法老的一个传统，但被其他的文化视为堕落。

然而，色尔美（Therme）（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安条克、帕伽马（Pergamum）、帕尔米拉（Palmyra），尤其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成为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伴随王朝衰败，在希腊和东方影响下诞生的混血儿，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希腊化文化，并最终战胜了西方的拉丁主人。毕竟，在罗马陷落后又将罗马帝国坚持了一千多年的拜占庭的“罗马人”是希腊化的希腊人的继承者，而且的的确确算得上是亚历山大的最后的传人。用贺拉斯（Horace）的话来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的残忍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n victorem cepit*）

因此，希腊文化获得了一个比她的希腊祖先广泛得多的基础。用阿提卡末代演说家伊索克拉特（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的话来说，“雅典使希腊这个名字不再仅仅代表一个种族，而是作为聪明才智的代表而得以流传。”结果，希腊作家的数量确实增加了。出现了一批地理学家，从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3年到公元21年）到帕萨尼阿斯（Pausanias）（最活跃的时期约在公元150年左右）。出现了大量的诗人：阿波罗尼乌斯（Apoloni），阿拉图斯（Aratus）和《阿多尼斯挽歌》（*The Lament for Adonis*）的作者比昂（Bion）；欧辟安（Oppian），梯蒙（Timon）和狄奥克里特（Theocritus）。有一大群历史学家：王国和王朝的年代学体系的创立者埃及的曼涅托（Manetho），巴比伦的比罗索斯（Berosus）（巴—欧塞［Bar－Osea］）；

罗马的希腊辩护者美伽罗波力斯（Megalopolis）的波里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4—前122年），犹地亚（Judaea）的总督和《犹太战[136]争》（*The Jewish War*）的作者约瑟夫（Josephus）（公元36年之前）；阿庇安（Appian），阿里安（Arrian），希罗地安（Herodian），欧塞比乌斯（Eusebius），盖伦（Galenus）（公元前129—前99年）写出了一书架的医学著作，赫尔莫哥尼斯（Hermogenes）（最活跃的时期约在公元170年左右）写出了标准的修辞学论文。在新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中，诸如希拉波力斯（Hierapolis）的埃庇克泰德（Epictetus）（公元55—135年），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相对立：普洛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年），波菲里（Porphyry）（公元232—305年），普罗克鲁斯(Proclus)（公元412—488年）。由埃庇克泰德撰写的或斯多噶主义的"手册"（enchiridion）曾被称为古典世界后期的道德指南。传记作家和散文家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6年），讽刺文学作家和小说家朗古斯（Longus）（二世纪晚期）和希里奥多洛斯（Heliodorus）（三世纪）是罗马统治下希腊散文传统得以继续的多样化的典范。[**纸草**]

[137]

纸草（PAPYRUS）

1963年，在马其顿境内接近塞萨洛尼卡的德尔维尼（Derveni）出土了一卷公元前四世纪的已经炭化的纸草。它是被烧或是作为葬礼仪式的一个部分，或是可能是用来点火的。但是它仍然能够读出来。它是被维也纳的费克尔曼（Faekelmann）博士释读的，他利用静电使被加热过的卷子的页层分离开来，发现它上面记载着对一首德尔斐诗歌的注释。它替代了在埃及的阿布色尔（Abusir）出土的Thmotheus' Persae（P. Berol. 9875）纸草，成为希腊最古老的纸草学发现。[1]1964年，与此相似的一卷纸草在罗马尼亚的黑海沿岸的卡拉提斯（Callatis）的一个公元前四世纪被埋葬的人的手中被发现。但是在被发现的时候，它就破碎了。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埃及人就使用一种植物纸草（*Cyperus papyrus*）来进行书写。它被纵向和横向地铺开，然后压平，而形成一个长卷。芦苇茎尖或者羽毛蘸着由烟灰制成的一种浓重的黑墨来写字。纸草在希腊和罗马时代继续使用，尤其是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约有800卷的古典时代的纸草的最大发现来自于被熔岩覆盖的赫库拉尼乌姆（Herculaneum）的遗址。

纸草学——研究纸草的学问——对古典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由于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很少有其他形式的书写幸存下来，所以纸草学极大地推进了古代文书学的知识；它有助于弥合古代和中世纪希腊文之间的文字学上的裂痕。它提供了很多已经失落的古典文献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索福克勒斯的《追踪者》(*Trackers*)和米南德(Menander)的《心怀不满的人》(*The Discontented Man*)。它在《圣经》研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有7000条《圣经》的片断的早期希腊文手稿现在被发现。死海古卷同时包括了一些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文献。有两卷前基督教的纸草包含了《圣经·申命记》的残篇。记载着圣约翰福音书的公元125年的一卷纸草显然要早于任何羊皮纸上的版本。幸存的一些最古老的罗马教皇的训令也出现在纸草上。[2]

随着纸草让位于羊皮纸、仿羊皮纸和最终的纸，卷子也让位于抄本的折叠页码。纸草的消失与抄本的出现相结合引发了书籍的诞生。[**《圣经》**] [**沙提瓦**]

在希腊化时期的作家中，很多人都把希腊文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约瑟夫、琉善(Lucian)、马克·奥略留(Marcus Aurelius)属于这类，就像基督教的福音书作者马修、马可、路加和约翰，以及首要的圣保罗那样。

在希腊化世界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很快获得了雅典在希腊所享有的优势地位。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它发展成为最大和文化最发达的东方城市，在富有和壮观上仅次于罗马。其多民族和多语言的人口由“马其顿人”、犹太人和埃及人所组成。镌刻在“罗塞塔石碑”(the Rosetta Stone)上的法令，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提供了使商博良(Champollion)得以释读出其中的象形文字的三语文献。拥有70万卷藏书的巨大的*Museum*或“缪斯学院”为古代希腊文化的搜集、保存和研究做出了贡献。它是一座学术的灯塔，照亮了古典世界晚期的知识生活，就像伟大的法罗斯灯塔照亮了港口的海上航道一样。亚历山大的早期的图书管理员之一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257—前180年)被认为完成了希腊文献的第一个注释本，同时首次对希腊文法和标音法做出系统的分析。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最活跃的时期在公元前150年左右)整理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文本。亚历山大的繁荣的犹太社区的一位领导人斐洛(Philon)或犹太人斐洛(Philo Judaeus)(公元前30年—公元45年)试图把希腊哲学与传统的犹太神学熔为一炉。一个不知

道确切年代的亚历山大的工程师希伦（Hieron）发明了蒸汽机、虹吸管和一台投币机。

在文化传承史上尤为重要的是所谓“赫尔麦提克文献”*（Hermetic Writings）。长期以来一直归功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赫尔墨斯·特雷斯美基图斯（Hermes Trismegistus）（众神的抄写员，“最伟大的赫尔墨斯”），这部来自亚历山大的庞大的希腊文献集成据说实际上是一部古代埃及的百科全书。四十二本神秘的书籍概述了法老的法令、他们的神祇、仪式、信仰、宇宙结构学、占星学和医学。其他著作的时间为三世纪，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与希伯来神秘哲学（cabbalistic texts）发生奇特混合的文本，显然是针对基督教的兴起的。[**黑色雅典娜**]

[138]

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其他任何一部论著都没有像《黑色雅典娜》这本书那样造成古典学领域如此之大的分裂。传统主义者视之为异想天开；另一些人认为它值得密切关注。[1] 这部论著有两个独立的方面——一个是批判性质的，一个是建议性质的。批判的部分与一种势力进行辩驳，即认为古典研究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假设的影响下铸造成型的，希腊和罗马对更加古老的近东文明所欠的人情完全被忽视了。批评者的“减小欧洲人的文化上的傲慢”的目的看上去很有成效，尽管“希腊文明的雅利安模型”的讨论还存在争议。

这部论著的主题集中在希腊文明十分明确地植根于埃及，而古埃及文明“基本上是非洲的”和由“黑人”创造的这样两种看法之上。这条思路站在十分脆弱的地基之上。科普特文（Coptic）对希腊词汇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画在陵墓壁画上的法老的肤色比他们通常的黑人仆从要白皙得多。埃及男人是棕褐色的，女人是暗白色的。公元前七世纪的努比亚王朝在三十一个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可以被真实地列入“黑人”所建立的王朝。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认为学者受到了美国的种族政治的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必要重申一下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一个人关注于尽量远地寻本溯源，那么毫无疑问，欧洲人和欧洲文明的起源肯定是远在欧洲之外。问题是：史前史学家应该回溯

---

* 属于或关于埃及智慧之神陶特的神秘的炼丹术著作及其教义。——译者注

多远，到达哪个起点上去？[**卡德摩斯**][**高加索人**][**十进制**][**史诗**]

然而，从长远来看，希腊的“海岸线文明”不能同邻近的陆地强国的大本营相比，这一点并不奇怪。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像“海岸边乱窜的蚂蚁那样地”生活的比喻强调了集中希腊的人力和资源的策略问题。狭长、绵延的交通线在经济和文化的扩展上十分有效，但在军事进攻上却极为脆弱。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的进攻被顽强地打退。在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蹂躏了整个希腊和波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罗马军团不可阻挡。希腊人不再能够把五万名以上的重装兵投入到战场上去；然而，一旦罗马共和国能够征募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半岛的人力，她就拥有了五十万以上的军力可供调遣。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军事斗争从一开始就向一方倾斜。罗马在公元前266年的皮洛士战争（Pyrrhic Wars）的末期完成了对大希腊的征服。西西里随着公元前212年叙拉古激动人心的保卫战的结束而被吞并。马其[139]顿在公元前168年的皮德纳（Pydna）战役中被打败。在阿卡亚同盟的领导下再次宣布从马其顿的统治下独立的希腊本土在公元前146年被执政官L. 姆米乌斯（L. Mummius）征服，变成了罗马的阿卡亚（Achaia）行省。

在这以后，罗马接连降服了前马其顿帝国的所有的希腊继承者的国家。具有戏剧性的结尾发生在公元前30年，那一年，托勒密七世奥雷泰斯（Auletes）的女儿和埃及最后的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用“把毒蛇贴近在她的雪白的胸脯上”的方式结束了一个政治传统和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恺撒和安东尼的情人，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控制无情的进攻，罗马人的进攻。但是帕斯卡尔的名言（bon mot）“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面貌就将完全不同了”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希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消耗殆尽；罗马的绝对霸权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希腊化和罗马世界的结果上的融合，希腊罗马文明的混血儿的产生，使得找到古希腊的灭亡的确切时间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希腊和希腊化的传统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长得多。德尔斐神谕继续运作，直到公元276年被蛮族劫掠者破坏。奥林匹亚赛会继续每隔四年举行一次，直到公元392年的292届赛会。雅典学院继续在雅典教授学生，直到公元529年被基督教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关闭。尽管在恺撒的围攻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火灾，亚历山大图书馆直到公元641年穆斯林的哈里发的到来才最后关闭。从克里特的黎明和迈

锡尼的曙光到这时正好走过了二十个世纪，或者两个整个的千年。

希腊文明大多已失落了。大部分被罗马人吸收了，并在基督教和拜占庭的传统当中得以传承。大部分不得不等候文艺复兴及以后的时代来将它们重新发现。然而，幸存下来的东西足够使一个东欧小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欧洲之母”，“西方之源泉”，如果不是欧洲惟一的源泉，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叙拉古，西西里，第141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六年的夏末，意大利的城市罗马和非洲城市迦太基之间的史诗般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迦太基将军汉尼拔（Hannibal）消灭了一批前来阻挡他的罗马军队，向意大利的纵深进军，在南部奋勇作战。他刚刚占领塔林敦的港口和堡垒（见原书第三章，第155页）。不能够直接驯服他的罗马人尽全力阻止他的同盟——北部意大利的凯尔特（Celts）人，入侵到伊里利亚的马其顿的腓力五世，以及希腊城市叙拉古。他们尤其急切地想征服叙拉古，因为叙拉古不论在汉尼拔从非洲的粮食供应线还是在他们自身的再次征服西西里的目标上有具有关键的意义。作为结果，叙拉古经受了M. 克劳狄乌斯·马塞留（M. Claudius Marcellus）领导下的罗马军队的第二个季度的坚决的围攻。

大希腊之首叙拉古是所有的希腊人的西方殖民地中最大、最繁荣[140]据说还是最美丽的城市。在希腊化时代骄傲地保持着独立，眼看着大多数城市被征服，叙拉古长期保持着对雅典的优势地位，并逃脱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注意力。她超过了她一时的对手壮丽的阿克拉加斯，后者被迦太基人夷为平地，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在公元前三世纪，她在跨越罗马和迦太基的重叠区域中保持了她的有利的地位。她是没有被征服的希腊文明的最后的主要代表。

坐落在西西里的东海岸，位于埃特纳山的积雪的斜坡和岛屿的帕其努姆角（Cape Pachynum）最南端之间，叙拉古控制着一块无比壮丽、安全和便利的土地。她是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贸易的天然的集散地，是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最经常的补给站。最初建立在一个布满岩石的近海的小岛奥尔提基亚（Ortygia）上，它向邻近的海岸边的高地上拓展，被一圈几乎是连续的峭壁和岩石的围墙保护着。弯曲向南将近五公里的在一个完美的海湾中的巨大的港口映出高山的影子。在奥尔提基亚的另一面，第二个港口同样可以容纳最大规模的船队。（见地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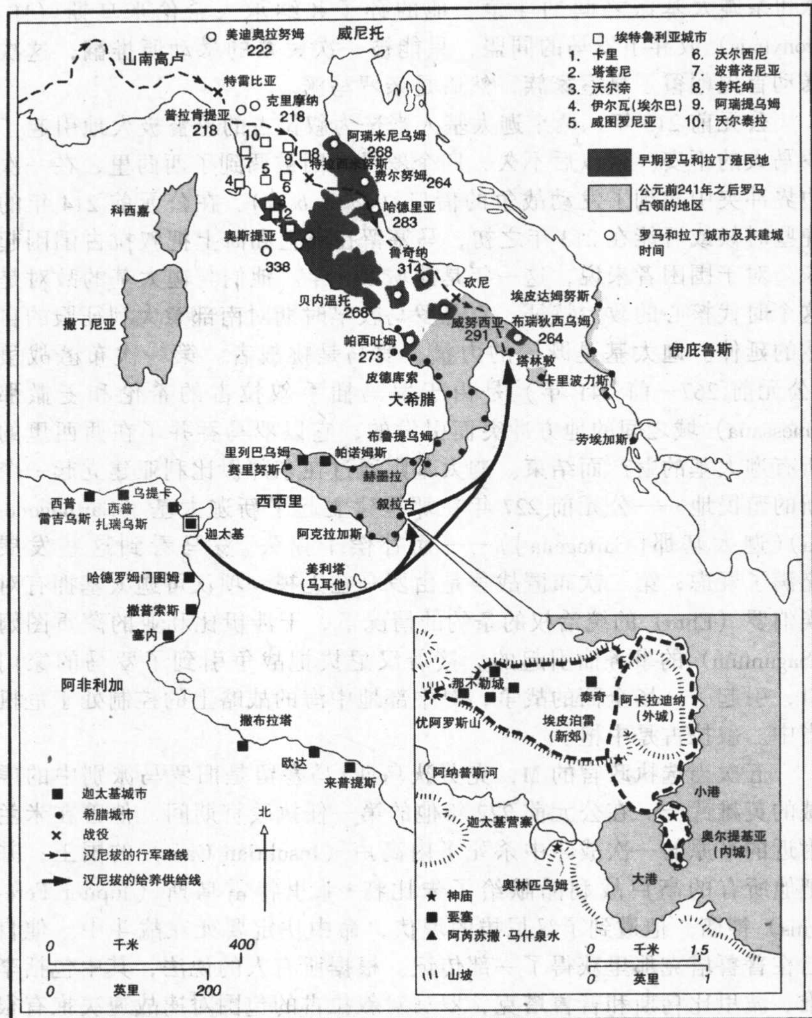
作为城市的卫城的奥尔提基亚岛在公元前六世纪通过一条设防的通道插手大陆的事务。受到阿芮苏撒（Arethusa）的无比甜美的清泉

的滋润，它受到了巨大的阿波罗神庙的控制，这座神庙隔着海港与对面的奥林匹乌姆（Oliympieum）海岬相望。在公元前五世纪整个高地被一座巨大的石头城墙所环绕，超过了所有自然的特征。这些绵延了十五公里以上的城墙在山脚下的优瑞阿罗斯（Euryalos）城堡才终止。它们包围着生活在五个独立社区的五十万市民。拥有自己内部的城墙的阿克拉迪纳（Achradina）或者“上城”包括了阿戈拉（Agora）或市政广场（Forum）的主体。在外面是泰奇（Tyche）和埃皮泊雷（Epipolae）有人居住的郊区，在它们的上面是那不勒斯（Neapolis）“新城”的纪念性的建筑，包括一个靠山的剧院，一组神庙，希伦祭坛（Hieron's Altar），是古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祭司建筑。在整个的这一壮丽无比的地方只有一处瑕疵。一块沼泽横跨流入大港（the Grand Harbour）的阿纳普斯（Anapus）河，这是夏季瘟疫的声名狼藉的发源地。由于这一附带条件，叙拉古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好处。用后来统治过那里的西塞罗的话来说，没有一天不是阳光明媚的。隆起的高原挡住了一缕缕从酒红色的浪尖上吹来的风。岩壁上山花烂漫，即使在冬季也常开不败。

在罗马军队到来之前，叙拉古可以自豪地宣称拥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科林斯的殖民者在公元前734年建造了这座城，仅仅比罗马年轻二十年，并通过殖民地网络扩大了影响。在公元前474年，萨拉米斯海战仅六年之后，她成为摧毁埃特鲁利亚海上力量的主力，因此消除了罗马命运的一个早期的障碍。像许多城邦一样，她也经历了寡头制、民主制和君主制政府的阶段。她在公元前415—前413年和公元前405—前404年接连的围攻中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而幸存下来，前一次来自于雅典人，后一次来自于迦太基人。

由于缺乏更好的材料，古代西西里的政治史不得不在连续的叙拉[142]古僭主的意义上进行写作，他们通过一系列血腥的政变和骚动进行统治。[22]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公元前405—前367年在位）被亚里士多德视为“通过煽动家吸引贫困阶级来获得权力”的类型的僭主的一个代表。曾经亲身在一种柏拉图的哲学王国和学院的方式下学习的他的亲戚狄翁（Dion）（公元前357—前354年在位），率领一支事先安置好的加里巴尔狄（Garibaldi）的千人军队从希腊航海回来后控制了叙拉古。科林斯的“自由之子”提莫里昂（Tinoleon）（公元前357—前354年在位）是另一个在雇佣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人；但是他似乎在很多城邦中引进过民主的宪法，在使希腊和迦太基地区之间的哈利库斯（Halycus）河的疆界固定下来的问题上获得了成功。残忍的阿伽索克里斯（Agathocles）（公元前317—前289年在位）是一个贫穷的陶工，由于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而发迹。公元前310年，他

[141]



地图 7　罗马—西西里—迦太基，公元前 212 年

通过把战争引向非洲而解救了第二次迦太基对叙拉古的围困。这位风格独特的“西西里国王”据说被一把蘸毒的匕首刺成瘫痪，活着就被放到他的火葬的柴堆上。在接下来的一代，叙拉古被皮洛士从罗马扩张的势力中解救出来。皮洛士是伊庇鲁斯（Epirus）的冒险家国王，他为他的支持者国王希伦二世（Hieron 罗）（公元前 269—前 215 年在位）的长久统治清除了道路。阿基米德的庇护人希伦二世通过一个与罗马的牢固的和约维持了和平，为叙拉古的独立的财富添上了最后的一笔。然而，发生在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的希伦的死却加剧了亲罗马

派和亲迦太基派之间的斗争。他的孙子和继承人希伦米乌斯（Hieronymus）放弃了罗马的同盟，只能被一次民众的暴动所推翻，这次暴动首先颠覆了皇室家族，然后是亲罗马派。

公元前215年，两个迦太基人当选为叙拉古的总督极大地引起了罗马人的不安。这以后不久，四个罗马军团被调到了西西里，在一次边界冲突中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casus belli*）。在公元前214年的晚些时候或可能在213年之初，马塞留在陆上和海上把叙拉古围困起来。对于围困者来说，这一年是建城538年。他们与迦太基的敌对是这个时代核心的政治特征。它是罗马较早时期对南部意大利征服的自然的延伸。迦太基是既定的力量，罗马是挑战者。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7—前241年）是由于罗马插手叙拉古的希伦和麦撒那（messana）城之间的地方冲突而引发的；它以罗马吞并了在西西里的所有迦太基的财产而结束。迦太基则通过在东部伊比利亚建立起一个新的殖民地——公元前227年在那里建立起了新迦太基（Carthagonova）(迦太基那[Cartagena])——而补偿了损失。罗马看到这些发展充满了疑虑；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由罗马在无视一项认可迦太基拥有对埃伯罗（Ebro）的统治权的条约的情况下，干涉伊比利亚的萨贡图姆(Saguntum）的事务而引起的。接着汉尼拔把战争引到了罗马的家门口，引起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对中部地中海的战略上的控制处于危机当中。叙拉古是中枢。

五次当选执政官的M. 克劳狄乌斯·马塞留是旧罗马派别中的虔诚的英雄武士。在公元前222年他的第一任执政官期间，他曾在米兰附近的平原的一次战斗中杀死了内高卢（Insubrian Gaul）的国王，并把他所有的高卢战利品献给了朱比特·菲里特雷乌斯（Jupiter Feretrius）神庙。他遭到了汉尼拔的埋伏，命中注定要死在战斗中。他自[143]己在普鲁塔克那里获得了一部传记。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其中包括李维、波里比乌斯和普鲁塔克，罗马对叙拉古的包围对速战速决抱有很高的希望。马塞留遭到了坚固的城墙和充满信心的保卫者的阻挡。然而，除了三个军团大约两万五千人之外，他还装备有一百艘战船，一大批攻城的器械，还认识到叙拉古的执政官们是四分五裂的。李维写道，他料想到了一切，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阿基米德，“天空和星系的无与伦比的观察者，甚至比战争用的大炮和器械的发明者和工程师还要伟大。”[23]在希伦二世的统治过程中，阿基米德建立了一个制造不同的射程和口径的精巧的反围攻的机器的兵工厂。

李维所描述的罗马军队靠近海边的城墙的这一场景很值得一读：

被海水冲刷过的……阿克拉迪纳的城墙受到了由马塞留率领的六十五艘五排桨战船的攻击。从大多数船只，弓箭手和投石手……几乎不允许任何人不受伤地站在墙头。

另外五条浅滩上的船，并排捆绑在一起……由最外的一条船的桨推进，就像一条船一样，运来了几层高的攻城塔，还有攻城的器械。

为了对付这一海上的装备，阿基米德在城墙上放了一排不同规格的大炮。躺在海岸边的船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巨大石头的炮弹的轰击。较近的船只则受到较轻但更密集的投掷物的攻击。

最后，为了让他的军队放箭但不暴露在敌人面前而受伤，他在城墙上从上到下地开了很多约一肘宽的小洞。通过这些装置，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有些人向敌人射箭，另一些人则使用小的防护“弩炮”。[24]

波里比乌斯讲到，漂浮的工程塔被称为萨姆布卡（Sambucae），因为它们的形状与一种同名的乐器萨姆布卡类似，无疑这是现代希腊的勃祖基琴（bouzouki）的祖先。

最令敌人感到不安的是阿基米德的用于把进攻者提出水面的装置：

巨大的横梁突然间从城墙上伸出来，就在船只的正上方，接着它又通过从上面释放重物沉入水中。另一些船则被铁爪和铁钩抓住船头，就像起重机一样，被吊起在空中，然后狠狠地被摔进水里。另一些船再次被城里面的器械弄得晕头转向，撞在陡峭的崖壁上……船上的战斗者损失惨重……常常是，一条船被提升到半空中，到处乱转……直到其船员向各个方向被抛出去……[25]

马塞留认识到对手的强大。“让我们停止与这个几何巨人的战斗”，他大喊道，“它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另一次他说，“我们的萨姆布卡乐队被用鞭子赶出了筵席。”普鲁塔克评论道，“罗马人似乎在与众神作战。”

随着进攻被打退，围攻也就转变成为持续两年的一次封锁。叙拉古人保持了数月的精神的活跃。一支迦太基人组成的援军在阿纳普斯[144]山谷安营扎寨，要求马塞留从帕诺姆斯（Panormus）调来第四个军团。一支海上突击队成功地出了港，并带回了一支增援舰队。在岛的内部发生的一场罗马人对罕那（Henna）城——一座对普洛色皮纳

(Proserpina)*具有神圣意味的城市——的公民的屠杀使西西里人转而反对他们。在公元前212年的春天，在阿尔忒弥斯节日期间对伽雷阿戈拉塔（the Galeagra Tower）发动了一次晚间的袭击，突破了黑克撒皮罗门（the Hexapyloi Gate）进入了埃皮泊雷的郊区。但是主要的堡垒坚固依旧。到了夏天，迦太基的海军司令纠集了一支700条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在130条战船的保护下，由于存在明显的优势，他把船排列开来等候罗马的舰队从帕其努姆海角出发。在最后的时刻，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拒绝了马塞留的挑战，转向大海，向塔林敦驶去。

最后，围攻的结果是被瘟疫和背叛决定的。曾经在两个世纪以前进攻叙拉古的时候受到过瘟疫打击的迦太基人，现在在试图保卫她的时候受到了同样疾病的毁灭。接着，随着会谈的进展，一个名叫莫瑞斯库斯（Moeriscus）的伊比利亚船长，阿克拉迪纳的三位长官之一，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决定让罗马人从阿芮苏撒清泉附近进入。按照约定好的信号，在一次转移注意力的进攻当中，他打开了城门。在亲罗马派的人的家中安置了卫兵之后，马塞留对叙拉古进行了劫掠。

阿基米德是众多的受难者之一。后来在传统上认为，阿基米德是正在沙地上计算一道数学题的时候被一个罗马士兵杀死的。普鲁塔克回顾了流传当中的不同说法：

> 事情发生的时候，阿基米德独自在一个图表的帮助下运算一些问题。由于精神完全固定在他的研究上，他没有意识到罗马人的侵入。
>
> 突然，一个手持出鞘的剑的士兵来到他的跟前，命令他去见马塞留。阿基米德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他算完了他的题目。……士兵于是勃然大怒，了结了他的生命。
>
> 另一个说法是罗马人……威胁说要立刻杀死他，当阿基米德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真诚地哀求他等一等，以便把这道题目的答案的证明完成。但是这个士兵并没有理会，马上就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
> 第三个故事是说，几个士兵恰巧遇到了阿基米德，当时他正在把他的一些诸如日晷、天体仪、象限仪之类的科学仪器运到马塞留那里去。他们杀死了他，以为他拿的是黄金。
>
> 然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马塞留为阿基米德的死大伤脑筋，避开了杀人者，到处去找寻阿基米德的亲戚，向他们献上他的尊敬。[26]

这就是当希腊文明遭遇罗马霸权时所发生的碰撞。

---

* 统治死人的地下世界的女神。——译者注

按照他自己的遗愿，阿基米德被掩埋在一个设计成一个圆柱体中的一个球体的形状的坟墓中。他曾经说过 2:3 的比率，就像有相同的长度和直径的一个球体和圆柱体所表现的那样，提供了一种最令人愉快的比例。

叙拉古的陷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文化阵线上，它加重了罗马对任何希腊的东西的迷恋。李维写道，艺术上的战利品并不少于[145]如果迦太基自己受到洗劫的数量。它创造了一种在这以后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的典范的希腊作品和希腊观念的风格。它可能是一种共享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生过程中惟一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在战略方面，它完成了罗马对迦太基的控制。它使迦太基与贸易和粮食的一个主要来源分离开来，使汉尼拔失去了他主要的后勤基地。在叙拉古陷落之前，罗马在一场由希腊—迦太基—罗马三方组成的力量游戏中是一个平等的选手。在叙拉古陷落之后，罗马在所有的方向上赢得了主动。

从长远来看，罗马人在西西里的胜利促使他们更深地卷入希腊的事务当中。在围困叙拉古的过程当中，为了挫败迦太基的另一个盟友马其顿，罗马人刚刚已经打通了与中希腊的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的联系。从那时开始，罗马拥有了希腊的委托人，必须使他们得到满足，利益得到保护。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15—前 205 年，公元前 200—前 197 年和公元前 171—前 186 年），以及反对马其顿的主要盟友的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斗争，使罗马人带着仇恨进入了希腊。最后，就像在西西里一样，罗马决定通过把整个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转变为罗马的行省来结束纠纷。

当时，叙拉古的覆灭肯定很快就被遗忘了，甚至也被叙拉古人所遗忘。他们幸运地逃避了其他的被战败的城市的命运，在那里，全部幸存下来的人按照惯例被卖为奴隶。毕竟，这只是与罗马的兴起和希腊的衰落相伴随的一系列无休止的战役和战斗当中的一个。然而，考虑一下的话，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很多转型和变化的外部症状，这些变动正在对一个比地中海中部大得多的政治区域中的居民产生影响。

回顾罗马胜利扩张的历史学家们被其随后的发展的相关知识吸引住了。他们充分意识到，作为结果而出现的希腊—罗马文化注定要统治整个古典世界，并作为“西方文明的”一块柱石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影响。他们的触角对于其他与之并存的潮流和前景不太敏感。同样地，由于完全靠希腊和拉丁知识这一现代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媒介武装头脑，他们有时会对希腊—罗马范围内的发展与当代事件所处的全

景之间的联系反应迟缓。没有人能够轻易否认，希腊和罗马世界的融合，其中以叙拉古的陷落为信号，是一个极为重要意义的过程。很难说这一过程还将发生在哪些方面。

关于叙拉古人在围城期间进行的反思，没有记载留传下来。但是这个商人的城市的公民们必定到处旅行。他们生活在一个岛上，这个岛长期以来是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争夺的对象，只是到最近才受到罗马人的入侵。结果是，不论他们偏向哪一方，他们都必须把迦太基看作是，像他们自己一样，受到新兴的罗马的挑战的古老秩序中的成员。[146]的确，作为一个面向海洋的商业民族，他们可能对迦太基人比罗马人有着更深的亲切感。在亚历山大使希腊人与波斯和印度进行亲密接触之后，又居住了一个多世纪以后，他们当然会把自己视为希腊化的希腊—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尚未产生的希腊—罗马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世界的中心毫无疑问既不是迦太基，也不是罗马，而是亚历山大。

现代的观点经常把迦太基定位为一个希腊城市，因而是一个欧洲城市，它与欧洲的罗马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即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应该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他们本能地避免提出，希腊人在这一点上更像亚洲人，而非欧洲人，或者说他们可能一直保持着同东方的无限联系。没有几门西方文明课程在赞美阿基米德的时候指出，这个伟大的数学天才是为了反对希腊城邦与罗马联合而献身的。

坎尼（Cannae）战役的四年之后（见原书第 155 页），罗马的地位仍然极为危险。亲迦太基派认为马塞留没有力量用攻击的办法取得迦太基，这一估计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罗马在叙拉古的失利给了迦太基的其他盟邦以信心；西西里的迦太基力量的再次宣言保证了对汉尼拔的恰当的后勤供应；得到有效供给的汉尼拔将打破意大利的僵局；换句话说，罗马被打败的机会是很多的。在叙拉古没有（Cato，Ca 为罗马一极端主张毁灭迦太基的元老）；但是把招惹麻烦的城市夷为平地是一个惯例。在叙拉古人的城墙的排开的哨位上，完全有可能，一些阿基米德的部下，如果不是阿基米德自己确实陷入过沉思：罗马人被消灭了（*Roma delenda est*）——也就是说，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瘟疫降临，莫瑞斯库斯打开了城门。

叙拉古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可能大部分局限在大海以及东方国家的范围内。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地理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古代人直接了解的世界的边界并没有剧烈的改变。与阿基米德同时代的一个人，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 276—前 196 年），亚历山大的图书管理员，曾经得出结论，世界是一个球体；他的著作为托勒密和斯

特拉波所了解。但是，除了腓尼基人开辟的到提恩群岛（Tin Islands）的路线，在实际的探测上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与西部非洲、美洲和北部欧洲的更加偏远部分相接触的记载。地中海沿岸的“文明的”世界与这以外的“野蛮的”荒野之间的严格的界限还没有被突破。

在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地中海的文明仍然由三个有影响的主要区域所组成：西边的迦太基，中心的罗马—意大利，东方的希腊。应该感谢亚历山大的征服，与从埃及到印度的东方帝国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沿着中亚的脆弱的交通线，与中华帝国也有了一些微弱的联系，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修建抵御游牧民族进犯的万里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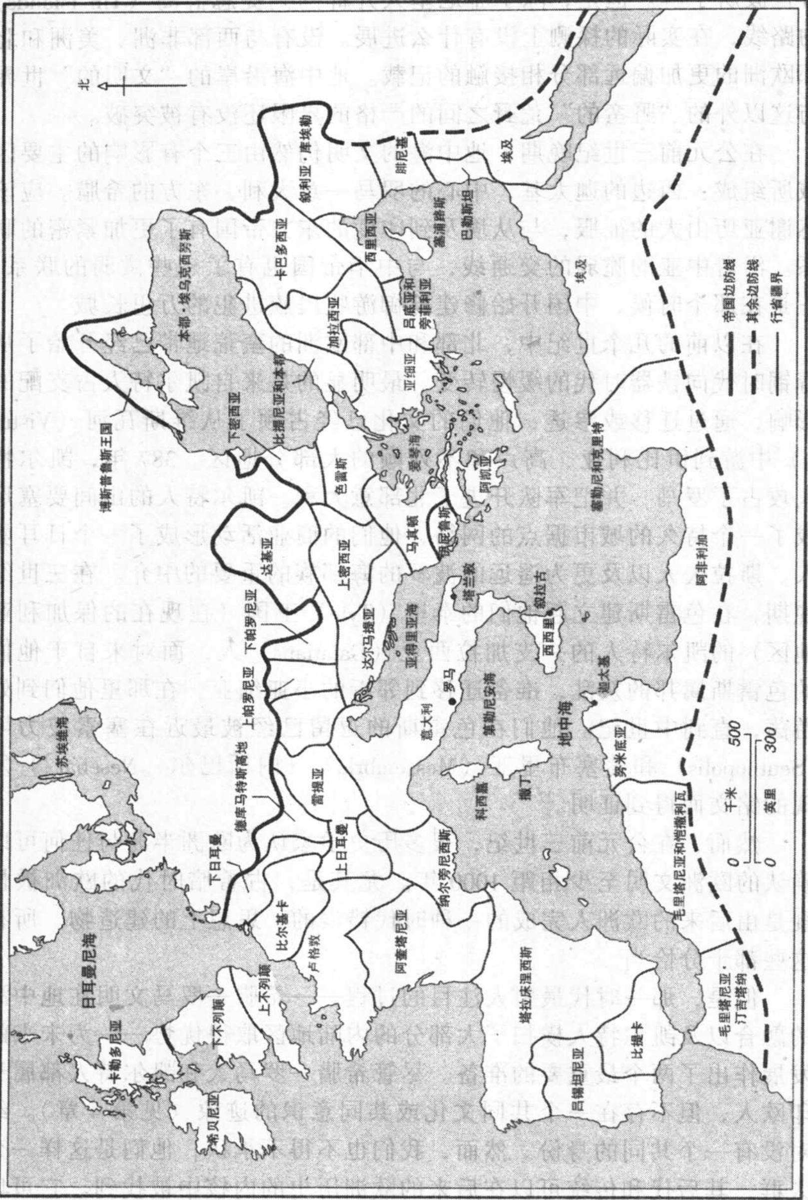
在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北部和中部欧洲的蛮荒地带已经开始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缓慢转变。最明显的是来自凯尔特人占支配的[147]影响，通过迁移或渗透，他们的文化已经占领了从维斯瓦河（Vistula）中游到伊比利亚、高卢和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387年，凯尔特人攻占了罗马，并把军队开进了北部意大利。凯尔特人的山间要塞形成了一个持久的城市据点的网络，他们的商业活动形成了一个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以及更为遥远的波罗的海部族的重要的中介。在三世纪晚期，在色雷斯建立起他们的泰里（Tyle）王国（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地区）的凯尔特人的一支加拉西亚（Galatians）人，面对来自于他们的色雷斯属邦的叛乱，准备迁移到邻近的小亚细亚，在那里他们到处游荡，直到中世纪。他们在色雷斯的逗留已经被最近在塞索波力斯（Seuthopolis）和美塞布里亚（Messembria）（内斯巴尔［Nesebar］）发现的铭文而得到证明。[27]

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半岛与任何可以确认的欧洲文明至少相距1000年。尤其是，古希腊时代的欧洲被怀疑是由后来的欧洲人完成的一种时代错误的、思想上的建造物。所有这些都十分恰当。

但是，那一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过程——希腊—罗马文明在地中海的融合以及凯尔特人横扫了大部分的内陆地区取得优势——为未来的发展作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准备。尽管希腊—罗马人和凯尔特人都属于印欧人，但不存在一个共同文化或共同意识的迹象（见第4章）。绝对没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这样一个人群，其后代和传统可以在后来的欧洲历史的内核中被找到。它可以用来纠正对于古代世界的过分的欧洲中心的解说，这种解说已经流行了太长的时间了。这也会走到另一种极端，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后来的欧洲历史关系甚微或根本没有关系。

有某些发生过的事情，其影响至今仍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

[148]



地图 8　罗马帝国，公元一世纪

视而不见。如果莫瑞斯库斯没有打开城门；如果叙拉古抵抗住了罗马人的进攻，就像他们曾经抵抗住了雅典人的进攻那样；如果汉尼拔摧毁了罗马，就像罗马后来摧毁了迦太基那样；作为结果，如果希腊世界最终与说闪米特语的迦太基融合在一起，那么历史就将会十分不同了。关键之处在于：莫瑞斯库斯确实打开了城门。

第3章

罗　马

古代罗马，公元前753年—公元337年

[149]　罗马世界具有一种内聚性品质，希腊文明或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不具备这种品质。就像罗马城墙上的石块既是按照整齐的设计，又是由极为坚固的罗马水泥堆砌而成一样，罗马国土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在地理的、组织的和心理的控制下，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整齐划一的实体。地理上的约束包括驻扎在各行省的军事据点网络，把行省与罗马联系起来的石板道路网络。组织上的约束是以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共同原则为基础的，也是靠那些强制推行共同行为准则的罗马正规军建立起来的。心理控制建立在恐惧和惩罚上——任何威胁罗马权威的人或事都必被彻底摧毁。

罗马人迷恋整体性和内聚性的缘由很可能植根于罗马早期发展模式之中。希腊是从一些分散的城市成长起来的，罗马则是从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中长大的。同希腊世界沿地中海沿岸扩张相比，罗马世界是通过陆地征服集结而成的。当然，这种比较并不完全准确。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希腊人曾被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陆地征服者；而罗马人，一旦走出意大利，很快也学会了海上争霸的本领。然而，不可否认存在着本质区别。希腊世界的关键所在是高桅帆船；正如罗马的霸权主要依赖于能征惯战的军团一样。希腊人钟情于大海，罗马人则热爱土地。希腊人可说是水手，而罗马人则是农夫。

当然，为了解释罗马现象，人们不得不强调那种近乎动物本能的“土地欲望”。罗马人善于组织、利用和保卫疆土。很可能，正是肥沃[150]的拉丁平原培养出定居的习惯与技能，带来了土地财产、土地经济、

土地管理，以及一个以地为本的社会。从这个社会中涌现出在军事组织和政府管理方面富有天才的罗马人。反过来，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和稳定的乡村生活使罗马人养成了各种美德：责任感（*gravitas*），对家庭和祖国的献身精神（*pietas*），遵从自然法则（*iustitia*）。老加图写道："种地的人造就了最强壮的人和最勇敢的战士。"[1]

现代人对罗马文明的态度变化很大，从无比景仰到极端厌恶。因为总是有一群崇拜权力的人，尤其在历史学家当中，他们偏向于崇拜强大的事物，在他们看来，罗马的强横比希腊的精巧更有吸引力。他们崇拜科罗塞姆竞技场的规模和力量，却从不考虑建造它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科罗塞姆竞技场已变成了罗马文明的象征。它变成了一句俗语："当科罗塞姆倒下时，罗马就会倒掉；罗马一倒，整个世界也将垮掉。"[2]与此同时，存在着一种厌恶罗马的观点。对于许多人来说，罗马充其量不过是对希腊的广泛模仿和继承。希腊文明讲质量，罗马只讲数量。希腊是原创性的，罗马是演化而来的。希腊有风格，罗马有金钱。希腊是发明家，罗马则属于研究和发展部门。这就是那些有学问的罗马人的意见。"如果希腊人像我们一样鄙视新鲜事物的话，"贺拉斯在《书信集》（*epistles*）中问道："那么，还能有什么古代作品流传至今呢？"更有甚者，罗马人粗制滥造了许多仿制品。例如，在建筑方面，他们借鉴了沉重、奢华的晚期科林斯风格，而不是多利斯式和爱奥尼亚式。一个评论家写道："当希腊接触到一个纯粹追求实用的民族如罗马时，希腊艺术的整体结构顿时变得支离破碎。"[3]

尽管如此，希腊对罗马仍有着巨大的贡献。在宗教上，罗马人完全吸收了奥林匹亚诸神——把宙斯转变为朱庇特，赫拉变成朱诺，阿瑞斯变成马尔斯，阿芙洛蒂忒变成维纳斯。他们吸收希腊道德哲学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斯多噶学派在罗马比在雅典更典型。在文学上，希腊作家被拉丁继承者们着意奉为典范。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应能流利地使用希腊文，这一点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在思辨哲学和科学的早期成果方面，罗马人基本上毫无建树。

然而，不应认为在希腊—罗马文明中，罗马只是个次要角色。罗马人的天赋投射到一些新的领域——尤其是法律、军事组织、行政管理和工程领域。罗马国家的内部张力更是创造出最高级的文学、艺术情感。没有证据表明许多杰出的罗马士兵和政治家是高明的作家。同样，一长串罗马人的罪行不可忘记。批评者尤其提到遭人唾骂的奴隶制，它残酷无比到了腐朽堕落的地步，使希腊主义看起来倒像是清教徒一样。

按照最宽泛的定义讲，从公元前 753 年"永恒之城"建立到公元[151]

1453年罗马最终瓦解，古罗马的政治史延续了2206年。较为常用的定义认为，从建城到以罗马为首都的西方部分的罗马的崩溃，罗马存在的时间差不多只有其一半。习惯上把罗马划分成三个重要时期：王政、共和国和帝国。[**罗马纪元**]

[152]

罗马纪元（AUC）

罗马纪年法是根据传统的建城日期而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确定的罗马元年相当于公元前750年，此后的日期按照“罗马纪元”（AUC，ab urbe condita，直译：自建城以来）计算。公元前一世纪出现了一个修正的历法，根据当时“最有学问的罗马人”M. 泰兰提乌斯·瓦罗的计算，所确定的城市始建时间相当于公元前753年。

然而，在瓦罗的时代，大多数罗马人也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不以年代而以年度执政官的名字纪年的系统。在官方记录和日常谈话中，他们说“泰兰提乌斯·瓦罗和埃密利乌斯·保路斯那一年”（公元前216年），或者是“马略七次担任执政官的那几年”（公元前107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3年、公元前101年、公元前100年和公元前86年）。需要对罗马历史详细掌握才能弄清这些暗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老瓦罗和埃密利乌斯·保路斯曾在坎尼惨败之后指挥过罗马军队。

幸运的是两种系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彼此可以相互支持。例如，尤利乌斯·恺撒的崛起与覆灭可参照下列计算：

罗马纪元	执政官	公元前
695	M. 卡普尼乌斯·毕布鲁斯和C. 尤利乌斯·恺撒（I）	59
705	C. 克劳狄乌斯·马凯鲁斯和L. 科尔涅利乌斯·兰图鲁斯·库鲁斯	49
706	C. 尤利乌斯·恺撒（II）和P. 塞维利乌斯·瓦提亚·埃撒乌里库斯	48
707	Q. 鲁斐乌斯·卡莱努斯和P. 瓦提尼乌斯	47
708	C. 尤利乌斯·恺撒（III）和M.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46
709	C. 尤利乌斯·恺撒（IV）单独任执政官	45
710	C. 尤利乌斯·恺撒（V）和M. 安东尼	44

711	C. 维毕乌斯·潘撒和 A. 赫尔提乌斯，双双被杀，接替者为三头同盟 M. 安东尼，G. 屋大维，M.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43

正是恺撒意识到了当时的日历变得不好操作。旧的罗马年只有304天，分成10个月，始于3月11日或4月21日。多出来的1月和2月被当做“空档”。因此，罗马纪元的708年，在恺撒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时，发生了一次重大改革。一年延长了151天，以便使新年能够从建城以来的707年/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运行包括365天的12个月直到12月31日为止。建城以来的737年/公元4年，奥古斯都做了进一步调整，把旧的第5月和第6月更名为尤利乌斯月（以恺撒之名）和奥古斯都月，并且引进了四年一度的闰日。结果有着365¼天的儒略历年，与地球自转之间的误差只有微小的11分零12秒，直到公元1582年一直在世界上通用。

不仅如此，在元首制时代，执政官继续被任命；而以执政官纪年的习惯也随之保留下来。皇帝们的年号并不经常被提起。在晚期帝国，执政官被废除，罗马纪元系统参照15年一循环的税收指示计。当公元六世纪中期，基督教的年代最终得以使用时，罗马人的年代已被运用了13个世纪。[1] [纪元] [153]

具有半传奇色彩的罗马王国在许多方面同早期希腊“英雄时代”有关。王国起源于一个据说是埃涅阿斯的后代，一对由母狼哺育的双胞胎孤儿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的传说，终结于公元前510年，七王中的最后一位名为“傲慢的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的国王被驱逐。这是早在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两个半世纪的事情。罗慕路斯，罗马的建造者，据说组织抢劫萨宾妇女，以便帮助新城市繁衍人丁。萨宾人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引进了历法和官方宗教仪式。他在广场上（*Forum*）建造了雅努斯神庙（*Temple of Janus*），其大门在战争时期打开，在和平时期关闭。第三任国王图里乌斯·霍斯提利乌斯（*Tullius Hostilius*）是拉丁人，夷平了邻邦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并掠走居民。安库斯·马西乌斯（*Ancus Marcus*）为外来的俘虏创造了平民等级（*plebs*）或“普通人”等级。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赋予罗马人第一部宪法，使平民独立于贵族或被称为“长老”，并建立拉丁同盟。第五王塔克文·普里库斯（*Tarquinius Priscus*）和第七王塔克文·苏帕布斯（*Tarquinius Superbus*）都有埃特鲁利亚血统。前者兴建了罗马的第一批公共工程，其中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庞大的下

水道系统。后者因其子强奸鲁克拉提娅（*Lucretia*）而被驱逐。[**埃特鲁利亚**]

[154]

埃特鲁利亚（ETRUSCHERIA）

在圣塞维拉（Santa Severa），古时候叫做帕尔吉（Pyrgi）靠近罗马的地方，考古学家发掘出两座俯瞰大海的埃特鲁利亚人（Etruscan）的神庙。1956—1964 年的这个发现很特别。它是第一个并非墓地的埃特鲁利亚遗址。在那里找到三块纯金薄板，时间大约为公元前 500 年，上面的铭文用布匿文和埃特鲁利亚文写成：

致阿斯塔特女士。该圣地是由吉斯拉（Cisra）之王特法列·维利阿纳斯（Thefarie Velianas）在祭日之月……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在基尔月（the month of Kir）的圣葬节（the Day of the Burial of the Divinity）所建造和奉献的。这一年，女神的塑像多如天上的繁星。[1]

帕尔吉是附近吉斯拉镇的港口（即现代的凯维特利）（Cerveteri）；国王特法列或者叫“提比略”（Tiberius）选择此地祭祀迦太基女神［**塔木兹**］。这些神庙必定是在埃特鲁利亚人在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袭击希腊的库迈（Cumae）失败之后的某个时期，或许是在罗马人发动起义，推翻了埃特鲁利亚人的主宰地位之后的近十年间奉献的。

公元前 700 年—前 100 年，埃特鲁利亚人在托斯卡尼（Tuscany）和翁布里亚（Umbria）一带十分兴盛。他们声称是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他们的字母表源自希腊文，很容易读，但他们的语言还未被充分破译。经过最初的君王时代之后，在六世纪，他们进入了希腊式的商业城邦时代。他们的墓室里布满了精美、别具风格、栩栩如生的壁画，通常描绘的是死者在宴席中的情景（见插图 5）。有关他们的少量知识既来自考古学推论，又来自充满敌意的罗马人的晚期记载。当时，他们被刻画成饕餮者、好色之徒和狂热的宗教信徒。从 1837 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埃特鲁利亚展览会到最近于 1992 年在巴黎举办的展览会，[2] 人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便引起欧洲公众对埃特鲁利亚学的兴趣。1828—1836 年发生了最令人兴奋的事，乌尔西（Vulci）、凯列（Caere）和塔奎尼亚（Tarquinia）的墓穴被打开，然后发现了帕帕尔城邦（Papal State）。

但是，一种浪漫的假说成为主导模式。组织第一次调查的麦

迪西（Medici）自称是埃特鲁利亚人的后代。十八世纪，约书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把他的陶瓷制品命名为“埃特鲁利亚”，他不知道时髦的“埃特鲁利亚款式”其实属于希腊类型，而并非埃特鲁利亚类型。普罗斯培尔·梅利米（Prosper Mérimée）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锋乔治·丹尼斯（George Dennis）一样，对埃特鲁利亚人的神话迷惑不解，D.H. 劳伦斯（Lawrence）也是如此：

（埃特鲁利亚）在那些轻松岁月中所做的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就是埃特鲁利亚人的真实品格：轻松、自然、生活富足——死亡只不过是完整生命的自然延续。[3]

这不是埃特鲁利亚学（Etruscology），这是“埃特鲁利亚爱好”，或者如法国人所说的 *étruscomanie*。

拥有七座小山丘，占据台伯河交叉路口战略要地的罗马只是说拉丁语的几个拉丁城邦中的一员。早先它曾被更强大的邻居，尤其是北方的埃特鲁利亚人所统治，其设防的城市维爱（Veii）坐落在距离罗马广场仅 16 公里的地方。在乌尔西（Vulci）、塔奎尼亚（Tarquinia）和佩鲁贾（Perugia）发现的“埃特鲁利亚人之地”的遗迹与一个先进而又神秘的文明有关。罗马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按照李维的记载，埃特鲁利亚人企图摧毁罗马城，使塔克文复辟，但独眼的霍拉提乌斯·克科勒斯（Horatius Cocles）坚守苏布利安桥，使城市得以幸免于难。

勇敢的霍拉提乌斯，
守护城门的队长，站出来说道：
“尘世中的每个人
或早或迟都会死亡；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
为了父辈的亡灵，为了他的神庙
更体面地死去
而不与胆小鬼为伍呢？
砍断吊桥吧，执政官先生，
越快越好，
我将带上两个帮手
与敌人周旋。

[153]

三个人要将敌人的千军万马来阻挡。
现在，谁愿意同我并肩作战守护吊桥？"
"霍拉提乌斯，"执政官说，
"好吧，就照你所说的去干吧。"
于是，三个无所畏惧的勇士，
迎着枪林箭雨冲锋陷阵。
因为在英勇无畏的往昔岁月里，
罗马人遇到罗马式的争端时，
从不割让土地与黄金，
也决不会让出儿子或妻子，
肢体或生命。[4]

罗马共和国见证了一个城市的成长，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区变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主人。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前509年第一次执政官选举，公元前478年之后，当屋大维建立起第一个帝国王朝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这是一个连续不断征服的时代。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控制了其近邻，占据了822平方公里（314平方英里）的领土。公元前491年是一个著名的时刻，被罗马放逐的马尔西乌斯·科瑞奥拉努斯（G. Marcius Coriolanus）率领一支所向披靡的沃尔西人组成的军队来到罗马的城门外，他的母亲哭着劝他撤兵。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劫难中恢复过来，并在三次激烈的萨姆尼特战争中建立起对中部意大利的霸权。公元前三世纪时，罗马发动对南部希腊人的征服，首先对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公元前282—前272年在位）开战，此人前来帮助他的同胞。后来经过一系列战役，罗马最终兼并了西西里（见原书第138—147页）。这些战役挑起了同迦太基（Carthage）的进一步冲突，并招致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

在所有罗马的战争中，只有同迦太基的百年冲突最能展示罗马人那著名的由坚忍不拔与残酷无情混合而成的品格。非洲的迦太基比罗马古老，由腓尼基移民所建，拉丁语称之为布匿（Punica）（见原书[155]第104—108页）。传统上两国关系友好，受一份保存在最古老的罗马历史档案中的条约保护。这份条约可追溯到共和国元年，它使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影响范围。和平维持了三个世纪，直到罗马军队跨过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迦太基本身相对来说没有受罗马陆地霸权的影响，尽管丢掉了西西里。罗马学会了海战艺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公元前218—前201年），汉尼拔

(Hannibal) 翻越阿尔卑斯山，举行了一次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宏伟远征，罗马仅仅靠顽强抵抗，才在灭亡的边缘苟延残喘。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起义了，西西里大部分地区也揭竿而起；通往罗马的道路几乎没有设防。特拉西美尼湖战役（lake Trasimeno，公元前 217 年）和坎尼战役（Cannae，公元前 216 年）是罗马最致命的失败。只是靠了“拖延者”（Cunctator）Q. 费边·马克西姆（Fabius Maximus）固执地保存实力，又占领了叙拉古（Syracuse）（见原书第 142—144 页），才使罗马得以幸存。汉尼拔的兄弟哈斯杜鲁拔（Hasdrubal）第二次试图从西班牙入侵意大利，结果被杀害。公元前 203 年，汉尼拔自己被迫撤退。他跟随小普布里乌斯·科尔奈利·西庇阿·“阿非利加”（Publius Sicipio ‘Africanus’），坎尼战役的幸存者，新迦太基的征服者来到非洲。公元前 202 年，在扎马（Zama），汉尼拔遇到了对手。他逃到视罗马为敌的希腊人那里，最终被迫自杀。

迦太基在丧失了舰队后，背着沉重的贡赋负担，苟延残喘了 60 余年。但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公元前 149—前 146 年），老加图呼吁彻底摧毁敌人。“迦太基应被毁灭”。公元前 146 年采取行动，城市被夷平，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址被犁开，壕沟里泼洒盐粒。用塔西陀的话说，罗马人“制造了一片荒漠并称之为和平”。西庇阿·埃密利乌斯在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陪同下看到此情此景，心生感触，引用《伊利亚特》中赫克托尔（Hector）的话说：“神圣的特洛伊将要覆灭的日子就要来了。”当被问及是何用意时，他回答：“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波利比乌斯，然而我深怕有一天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我自己的祖国头上。”[5]

摆脱迦太基的挑战之后，共和国凯旋的军团转而开始收拾地中海地区的残余国家。公元前 241—前 190 年之间，山南高卢（Cisalpine）被征服。公元前 201 年，伊比利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成了战利品。伊利里库姆在公元前 229—前 168 年之间被征服。马其顿同希腊大陆一道于公元前 146 年被占领。公元前 125 年，山北高卢（Transalpine）遭入侵，最后于公元前 58—前 50 年被恺撒降伏。公元前 67—前 61 年，小亚细亚的独立王国被兼并，公元前 64 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被兼并。[**埃格纳提亚**]

[156]

埃格纳提亚（EGNATIA）

在所有的罗马道路中，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被证明

是最重要的道路之一。它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将罗马同拜占庭（Byzantium）联系起来，后来又把东、西帝国联系起来。它得名于阿普利亚地区（Apulia）的埃格纳提亚城，那里有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神坛，它在罗马同亚得里亚港口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um）之间具有重要地位。在意大利，它可以取代目的地一致，经贝内温敦（Beneventum）抵达塔兰敦（Tarentum）的旧的阿庇安大道（Via Appia）。这条道路的起点在东亚得里亚海岸的戴拉奇奥（Dyracchion）（杜拉斯 Durres），有一条辅路与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相连。它穿过马其顿行省（Macedonia），经莱克尼德斯（Lychnidos）（奥克利德，Ochrid）和佩拉（Pella）至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在抵达色雷斯（Thrace）地区的终点希布罗斯（Hebros）（马利撒，Maritsa）的戴普塞拉（Dypsela）之前，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和腓利比（Philippi），环绕察基迪克（Chalkidike）半岛转了一圈。[1]

通往拜占庭的最后一段路起初不叫埃格纳提亚这个名字，人们修了很长一段内陆弯道以便绕开海滨的潟湖。只有查士丁尼一世才铺设了一条直接连接雷基恩（Rhegion）与赫布多蒙（Hebdomon）的道路，使旅行者们只需花 20 天，走完 500 英里，就能到达君士坦丁堡的金门。有句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也可以这么说，条条大道都从罗马伸向远方。

在共和国存在的最后一百年里，对外战争变得与一系列内战交织在一起。成功的将军们竭力控制罗马中央政府，与此同时，一批有能力的改革者们竭力满足下层人民的要求。斗争的结果导致出现了一个动荡不安的中间期和独裁统治。公元前 133—前 121 年，保民官提比略·塞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和他的兄弟 G. 塞普洛尼乌斯·格拉古试图把公有土地分配给那些效力于共和国的征服战争却无处安居的农民。他们俩都遭到贵族寡头统治者的反对，[156]并双双遇害。公元前 82—前 79 年，L. 苏拉·菲利克斯（Sulla Felix）在打败了当时最伟大的军人马略（G. Marius，公元前 157—前 86 年）的党羽之后，宣布自己为独裁官。公元前 60 年，三个军人政治家李锡尼乌斯·克拉苏（M. Licinius Crassus）、庞培·马格努斯（Pompeius Magnus）和尤利乌斯·恺撒（C. Iulius Caesar）组成了第一个三头政权。但是，公元前 48 年，恺撒粉碎了三头集团中仅存的庞培之后，声称享有"最高司令官"（*Imperator*）头衔。最后，公元前 31 年，第二个三头政权瓦解之后，屋大维结束了内战。他在亚克兴战役中获

胜，使得埃及投降、安东尼（Antony）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丧命、根除了反对派，并使自己获得“奥古斯都”（Augustus）的头衔。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次扩张恰巧与夺取地中海沿岸残存的最后一片至少在名义上是独立的地盘相重合。在差不多500年时间里，亚努斯神庙的大门一直关闭着，只是偶尔打开过三次。[鹰]

[157]

鹰（AQUILA）

鹰自古以来就贵为“君王之禽”，正如狮子是“君王之兽”一样。罗马人认为，鹰是朱庇特的“风暴鸟”，能带来雷电。在巴比伦和波斯，鹰被刻画为权力和强大的标志，罗马将军马略征服东方之后接受了这一形象。罗马帝国的军团跟随鹰徽前进；罗马执政官也携带着三头鹰权杖[1]（见原书附录Ⅲ，第1228页）。

斯洛伐克的民间传说讲，从前有三个兄弟莱克（Lekh）、捷克（Chekh）和鲁斯（Rus）一起出发去寻找宝藏。鲁斯朝东走，捷克朝南方的波希米亚走，而莱克穿过平原向西走。莱克来到一个湖边，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树上有一只白羽毛的老鹰筑的巢。他就是波兰人之父，而格涅兹诺（Goniezno），意为“鹰巢”，就是他们最初的家园。

同样的，在威尔士，被视为祖国的心脏的斯诺顿山（Snowdon）之顶峰，也被称作埃瑞利（Eryri），即“雄鹰之地”。

在基督教的符号中，鹰与福音传道士圣约翰（St John）（以及天使和圣马修的斧头，圣路克的公牛和圣马可的狮子）有关。它出现在教堂的诵经台上，用展开的翅膀托着《圣经》，驱逐那条犯了罪的蛇。根据圣哲罗姆（St Jerome）的说法，它象征着升天。

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帝王之鹰总是被那些自称比其他君王高贵的统治者所选中。查理曼（Charlemagne）穿的是一件绣着雄鹰的斗篷；卡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也披着这种服饰下葬。[2]拿破仑一世和三世的装饰品都以鹰为标志。拿破仑的继任者——罗马王，得到“小鹰”（aiglon）的绰号。惟独英国人与众不同，对老鹰丝毫不感兴趣。

遍布于欧洲人纹章上的雄鹰，早就在伊斯兰教的徽章上出现了。[3]塞尔维亚和波兰为白鹰，而波兰的鹰戴了顶王冠（目前被共产党政权去掉了王冠）。提罗尔（Tyrol）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衍生出红鹰，在瑞典的韦姆兰（Varmland）是蓝鹰。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的那只具有简单造型的黑鹰取自亚琛（Aachen）的城市纹章。直到帕莱罗格王朝（dynasty of Palaeologues），拜占庭帝国才以展翅飞翔的黑色双头鹰为标志，它是罗马在东方和西方的继承者的象征。它又通过适当的渠道传给了莫斯科的沙皇、“第三罗马帝国”，传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皇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德国人有句谚语说：“老鹰不抓小虫子。”

内部斗争首先是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外部表现，两加图的事业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俩都是失败的一方的支持者。“监察官”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成了古罗马朴素、纯洁品德的化身。在结束了27年军旅生涯之后，他退居农场，编写历史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他谴责希腊化时期的奢侈、腐化风气，尤其谴责在他看来是个无原则的野心家西庇阿的作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无情地号召摧毁迦太基。他的曾孙波西乌斯·加图·乌提肯西斯（M. Porcius Cato Uticensis，公元前95—前46年）表现出同[158]样的耿直与倔强的性格。他受过斯多噶学派的训练，参加了庞培阻止恺撒妄图实行独裁的战役。当庞培大势已去时，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经过英勇跋涉，穿越了利比亚荒漠之后，他被围困在乌提卡的小镇里，读着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著作《菲多篇》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夜。就这样，他成了共和派反对僭主的象征，成了一个坚持原则的反对派的象征。西塞罗赞扬他。恺撒在其《反对加图》一文中试图恶毒诋毁他。诗人琉善（Lucan，公元39—65年）宁肯自尽也不愿向专制者低头，并把他视为追求政治自由的楷模。继琉善之后，但丁（Dante）把他塑造成通向灵魂自由之路的炼狱山的守护者。

C. 尤利乌斯·恺撒领导了对既定的共和国进程的致命攻击。作为一个成功的将领和行政管理者，他同庞培和克拉苏分享了公元前60年的前三头政权，担任过执政官，并且从公元前59年起做了两高卢的同执政官。恺撒的敌人憎恨他恬不知耻地贿赂罗马大众，操纵政客，通过军事战争巧取豪夺。西塞罗的抗议“啊，时代！啊，道德！”（O tempora！O mores！）仍然萦绕在耳畔。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越过意大利边界，在卢比贡河（River Rubicon）畔对罗马宣战。他谢绝了专制君主的外在饰物，但他的独裁却是实实在在的。他的名字成了绝对权力的同义词。他甚至成功地修改了日历。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被一群共和派的阴谋家暗杀了，领头的是布鲁图斯（M. Brutus）和卡西乌斯·朗基努斯（C. Cassius Longinus），崇拜者们称他们是“解放者”。布鲁图斯是罗马的第一任执政官的后代，是他推翻

了塔克文王朝。莎士比亚称其为“最高贵的罗马人”。但丁把他置于地狱的最底层，因为他背叛了恺撒的友谊。

恺撒死后，恺撒集团的领导权由其侄子屋大维掌握。当屋大维（约公元前63年）作为恺撒的正式继承人之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当全部战争都结束后，他的名字又有所改变。他和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 Aemilius Lepidus）以及安东尼（约公元前82—前30年）为第二个不稳定的三头政权效力12年，在腓力比（Philippi），他们共同镇压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领导的共和派集团。然而，此后他离开了他的同伴，转而攻击占主导地位的马可·安东尼。屋大维是西方的主人，安东尼是东方的主人，而亚克兴海战，对于几乎整个罗马世界都被卷入其中的联合武装冲突来说，毋宁说是一个温顺的结局。但是，亚克兴战役具有决定性：它结束了内战，葬送了共和国，并且赋予屋大维至高无上的头衔“奥古斯都”。

帝国始于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的凯旋，早期被广泛称作“元首制”（the Principate）。从大西洋到波斯湾，到处都建立起令人惊叹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尽管政局动荡、暗杀阴谋层出不穷，罗马的情况尤其严重，但行省被牢牢控制，战争大多局限在遥远的边疆。帝国也增添了少量新领土——公元43年征服不列颠，63年征服亚美尼亚，105年征服达契亚。但帝国主要致力于保卫从哈德良长墙[159]（Hadrian's Wall）到多瑙河三角洲的“边防线”（*limes*）后面的欧洲部分，在亚洲同罗马最顽固的敌人——帕提亚人（Parthians）和波斯人进行战斗。[**阿奎因库姆**]

[159]

阿奎因库姆（AQUINCUM）

像邻近的卡嫩图姆（Carnuntum）一样，阿奎因库姆起初只是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多瑙河畔的一座军营。不久，它吸引来一批“非正式的定居点”（canabae）。公元二世纪它被正式授予自治市地位（municipium）。作为从潘诺尼亚通往帝国的门户，它富甲一方，既是军团基地，又是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富庶程度体现为两座一模一样的圆形剧场，一个为军用，一个为民用，并且较富裕的宅第都装饰着壁画。[1]

阿奎因库姆废墟位于现代布达佩斯的郊外[**布达**]。匈牙利人像英格兰人一样，没有直接在罗马世界生活过，是随着帝国的覆灭而移居到他们现在的家园的，但他们仍然珍爱这份“罗马遗产”。[2][**野蛮人**]

终于，帝国开始发生衰落。衰落导致边缘的崩溃和中心的堕落。公元三世纪短命的帝王们已经开始瓦解坚如磐石的帝国了。通过把帝国分为东、西两半，一度显现复兴的迹象。但是到四世纪，出现明显的朝东方的资源转移，随后首都由罗马迁至拜占庭，时年为公元 330 年。罗马成为名义上的政治中心。它的“永恒”统治经历了从王政、共和国到帝国整整 1083 年。

罗马扩张的能力远比希腊城邦或马其顿强大得多。尽管亚历山大帝国的面积笼统算来稍微超过了晚期的罗马世界，然而，罗马系统地定居和活动的地区毫无疑问要大一些。从一开始，罗马就运用各种法律的、人口统计的和农业工具以便保证被兼并地区能为罗马的战争机器提供全部资源。根据实际情况，被征服地区居民将被授予不同身份地位，或者享有全部罗马公民权，或者只有半公民权（无投票权公民，*civitas sine suffragio*），或者是罗马的同盟者。根据每种情况仔细评估他们在提供金钱和士兵时应尽的义务。忠诚的士兵会受到慷慨的奖赏，获得一块经过测量，划分成矩形的份地。结果增加的边境需要更多部队防守，而增长的军队需要更多土地供养。一个由厌倦了服兵役的公民集体组成的军事化社会对土地的胃口越来越难以满足。城邦[160]的土地基金，即公有地被用来作为城邦最具献身精神的公仆，尤其是元老们的报酬。

在这一整套策略下，政治管理手段极为灵活。正规的行政管理并非立刻被引进。公元前三世纪被罗马统一的意大利半岛，200 年之后才被重新组织成正式的行省。地方统治者经常被调离、更换。那些坚决抵制或发动叛乱的人将冒杀头的危险。例如，在希腊，当公元前 146 年罗马将军出现在地峡赛会上，宣布允许城邦保留自治时，反抗被颠覆了。拒绝这一条件的科林斯，遭受到与迦太基相同的命运（在同一年）。

罗马的宗教生活具有惊人的折中性。好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人同地中海地区绝大多数神祇保持着接触，并把每一种神的崇拜添加到自己的收藏中。在早期，罗马家庭的献祭是以灶火神和谷仓神为核心的家神崇拜。市民生活以一系列保护神崇拜，诸如照管永恒的圣火的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为核心的，还以一个由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监制的复杂的节庆日历为核心。后来，在附近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带动下全盘接受了奥林匹亚众神（Olympian pantheon）。公元前 431 年，第一座阿波罗神庙在罗马落成。伊壁鸠鲁派，尤其是斯多噶派也找到了许多追随者。在共和国晚期，东方的神秘崇拜流行起来——其中有来自叙利亚的阿塔噶提斯（Atargatis），来自小

亚细亚的西伯利（Cybele）“大母神”（Magna Mater），还有来自埃及的伊西斯（Isis）。在帝国时代，官方宗教转变成一种对现任皇帝的义务性崇拜。波斯的太阳神密特拉（Mithras）崇拜迅速崛起，尤其在军队中得到蓬勃发展，使基督教的传播一度受阻。爱的信条必须符合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路线，入会仪式上要用公牛的鲜血沐浴，并庆祝 12 月 25 日神的诞生。我们可以通过“第 30 军团的赞美诗”想象他们在地下秘密举行的献祭仪式：

密特拉，清晨之神，唤醒城墙的号角！
罗马是万国之首，而您是万物至尊！
此刻，人数已清点，卫队已出发，
密特拉，战士，赐予我们无穷的力量！

密特拉，日落之神，沉入西边的地平线——
您永远不会沉没，永远都会重新升起！
此刻，时光已残，美酒已尽，
密特拉，战士，使我们安然入睡直到天明！

密特拉，正午之神，在大公牛倒下的地方，
从黑暗中凝视您的孩子。
啊，请接受我们的献祭！
您所指明的条条大路——都通往光明！
密特拉，战士，教导我们如何死得其所！[6] [阿利西亚]

[161]

阿利西亚（ARICIA）

罗马以南数英里外，在阿尔班（Alban）群山中的一座火山口，坐落着“洞穴之湖”涅密湖（Nemi）。在帝国时期，涅密湖附近的村庄叫做阿利西亚。在整个罗马时代，湖畔的树林掩蔽着神圣的阿利西亚洞穴，那里就是狄安娜·涅密西斯（*Diana Nemorensis*），即“洞穴狄安娜”的家。

我们对阿利西亚崇拜的了解既来自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又来自现代考古学。它在许多方面并不太引人注目。包括对一棵神圣橡树的崇拜，其树枝是不能被折断的；还有一个火焰经久不息的祭坛。除了狄安娜以外，还有两位小神祇住在那里——蓄水池之神埃格利亚（Egeria）和一个被宙斯的愤怒驱赶的落难神

维尔比乌斯（Virbius）。现存的大量献祭物品显示，想怀孕的妇女是主要献祭者。在一年一度的仲夏节的日子里，洞穴被无数火把点亮，来自意大利各方的妇女们燃起火焰，以示谢恩。

只是在某个方面该崇拜显得与众不同。拥有“涅密西斯之王”（Rex Nemorensis），即“洞穴之王”称号的阿利西亚祭司长必须通过刺杀前任祭司长才能赢得该地位。他同时是祭司、刺客，又是未来刺客的牺牲品。他拖着疲惫的宝剑，悄无声息地在洞穴附近徘徊，即使在死寂沉沉的深夜，也警惕地等待下一个对手出现，折取橡树枝，同他进行生死决斗的时刻。

最近，阿利西亚的洞穴变得声誉鹊起，因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1890年）就是以研究该洞穴开始的。弗雷泽作为改变了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先锋，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齐名。弗雷泽给自己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祭司要杀死自己的前任?”和“为何在行刺之前，他必须折断金枝?”[1]

为了找到可靠的答案，他开始调查各种已知文化中的超自然信仰，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他考察了中国的祈雨仪式；考察从法老（Pharaohs）到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各种祭司兼国王人物；考察从新几内亚到吉尔吉特雪松（Cedar of Gilgit）的树精；考察从斯凯岛（Isle of Skye）到阿都尼斯花园的谷精；考察五朔节、仲夏篝火节和丰收节。他描述了夏威夷人对内在灵魂的信仰，以及西伯利亚的萨莫耶德人（Samoyeds）对外部灵魂的信仰——他们相信有转嫁灾祸和驱邪这类事。他极为全面地勾画出献祭仪式的轮廓：从曼谷孔德人（khonds）的牺牲到立陶宛（Lithuania）的“食神（肉）”，还有德文郡（Devon）的收割者“哭脖子”（“脖子”是用一小捆麦穗扎成的颈状物——译者注），等等。

弗雷泽做了两个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假设。一方面，他坚持[162]认为所谓“原始的”或“野蛮的”实践是建立在严肃观念基础上的，因此，只要剔除其怪异外表，还是值得尊重的。与此同时，他指出，文明世界自以为先进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受益于先前的多神教。“古代国王和祭司的一生充满了教导”，他写道：“这里面总结了幼年世界中一切被公认的智慧。”[2] 或者还有：

我们与野蛮人的相似之处远比我们的差异大。……我们就像一笔财富的继承人，它已传承了数代，以至于记不清是谁创造了这笔财富。……他们的错误不是故意夸大其词，也不是疯子的胡

言乱语。……我们最好仁慈地对待他们的错误，视其为探索真理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误，而且还要善待他们，把将来说不定哪天我们自己也需要的宽容给予他们。[3]

弗雷泽的普遍宽容性代表了一种学说，它意味着欧洲人文主义者可以由此逃脱狭隘的基督教的束缚，向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敞开胸怀。他提出许多基督教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来源于多神教实践的观点格外引起震动：

复活节到来时，西西里的妇女们把小麦、扁豆、金莲花种撒在盘子里，放在暗处，浇上水。……植物迅速生出芽来：把幼苗用红绸带束起来，连同盛物的盘子一起埋进坟墓，同受难日教堂制作的基督殉难像埋在一起。整个风俗习惯——坟墓和盛着发芽的谷物的盘子——很可能仅仅是在另一种名义下，对阿都尼斯祭的延续。[4]

回到阿利西亚洞穴，弗雷泽得出结论，长着金枝的大树是洞穴之王的人格化身，从高卢到挪威，在许多欧洲民族那里都有相似的死亡仪式。他提出，金枝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寄生植物，他从威尔士语推断出它的名称，意思是“纯金之树”。“活着的和死去的丛林之王是至尊无上的阿利安神的化身，其生命寄居在金枝里。[5]

为稳妥起见，他在最后一段里添了一句话说，今天到涅密湖树林的游客们能听到罗马教堂的钟声，“从远处镇上传来，余音缭绕，渐渐消失在宽阔的平原沼泽中——国王死了，新王万岁！”[6]换句话说，多神教的洞穴之王走了，基督教的“天上的君主”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统治。他不经意地暗示，基督教的君王也是注定要被干掉的。

罗马经济把内陆地区大量的自给自足经济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商业贸易结合起来。除几条主要的道路以外，穿越陆地的运输花费昂[163]贵，因此，行省的城市绝大多数商品交易都只局限与周边地区打交道。但是，最初由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经营的海上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标准的大宗货物为葡萄酒、橄榄油、毛皮、陶器、金属、奴隶和谷物。[杉柏]

[163]

杉柏（CEDROS）

希腊人和罗马人只会用一个词 kedros 或 cedros 来描述两种不同的树木：柏树和杉树，这一事实值得用九页附录来叙述。以一个真正的专家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来看，《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树与木材》这类专题应写成像你手头这本书一样厚的大部头。[1]

而且每一页都值得一读。这表明一位敬业的学者能够通过小事物展示大舞台，换句话说，如果允许用这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的话，如同通过一个横截面透视古典世界的躯干一样。像其他此类著作一样，这本书一开始细致考察考古学、文献参考书、铭文、神庙使徒的陈述和报道、树轮年代学提供的不同证据来源。然后，对研究对象进行审查——从克诺索斯的木板横梁，到阿喀琉斯的芩树杆长矛，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花了 45 天造出的 220 条罗马战船，到尤利乌斯·恺撒用 10 天在莱茵河上架起的桥梁。

像极北地区的民族一样，希腊和罗马没有以木材为基础的文明。[NOVGOROD] 但是，他们关于木材的知识是很有名的，而且木材贸易确有发展。读完这篇文章，人们见到一棵枫树时，不可能不想起萨拉米斯湾的雅典战舰，或者经过一棵落叶松时，不禁联想起罗马三列桨帆船上高达 100 英尺的桅杆。每座光秃秃的山脊都是由于罗马人对南部意大利和北部非洲的森林乱砍乱伐造成的。[**生态**]

历史需要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过更合适的楔子能把古代的树木与木材同一个纽约州的木材商人契合在一起。

不断增长的罗马人口靠城邦提供的公共口粮供养，这些粮食起初从拉丁地区运来，后来来自西西里和北非。然而，罗马人也对奢侈品感兴趣，并且也买得起。“丝绸之路”通中国，“香料之路”通印度。罗马商人，享有“大批倒卖者”（*negotiatores*）的盛名，跟随军队在帝国境内自由活动，随身携带着值钱的、时兴的和紧俏商品。[**萨摩斯**]

[164]

萨摩斯（SAMOS）

萨摩斯器皿是罗马帝国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红陶”，大约起源

于萨摩斯岛，但大规模的手工制作并不在那里。红陶器皿的生产从阿雷提乌姆的一个重要工场，该工场在公元30—40年最为活跃，转移到高卢从事大型陶器的生产。已知有45个主要中心。但一些重要的中心一世纪时坐落在拉格劳费森科（La Graufesenque）、巴纳撒克（Banassac），二世纪时在列马特德维莱（Les Martres de Veyre）、莱松克斯（Lezoux）。三世纪时在特里尔（Trier）和德国的塔贝尔奈雷纳奈（Tabernae Rhenanae）。地理范围从西班牙和北非延伸到英格兰的柯尔彻斯特（Colchester）、阿普彻基（Upchurch），以及奥地利的维斯特朵夫（Westerndorff）。[1]

蜡像学试图在创造力和才学方面胜过考古学家数以万计的瓦罐和碎片，而萨摩斯陶器提出了最大的挑战。自从1879年开始研究以来，已经确认的窑场超过了160个，还有超过3000个制陶匠的标记。汉斯·德拉根多夫（1895年）区分出55种标准形状的器皿（D1—D55）。其他人对一些装饰性花纹进行了编排，对技术方面的东西，诸如抛光、黏土和雕花陶器（terra sigillata）的密度，或固定的颜色谱系，从巴纳撒克的橙红色到列马特德维莱的橙棕色进行了分析。最早的一些收藏品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加纳博物馆里，它们为从多伦多到卢布尔雅那进行的无数项研究提供了方便。[2]

陶匠的标记尤其富于启发性。通常以字母f（fecit，制造），m（manu，手工制作），或of（officina，由某工厂制造）打头，它们使那些为帝国贸易承担了最广泛的商品生产的工匠们复活了。51个高卢中部地区的制陶匠的工龄被精确地计算出来。可卡图斯·伊登利斯和兰托在图拉真统治时期（98—117年）干了一辈子；辛纳姆斯和莱佐克斯在公元150—190年十分活跃；巴努斯、卡苏利乌斯和迪维克斯图斯的寿命贯穿了五个朝代，从安东尼努斯·皮乌斯（公元138—161年）到阿尔巴努斯（公元193—197年）。[3]

结果产生出一个庞大的信息集成，它是如此成熟，以至于足以精确地鉴定出最小的萨摩斯陶器碎片的时间和产地。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它对研究工作的帮助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个来自高卢地区的蜡封萨摩斯陶器在庞贝被发现了，尚未开启封口。类似的托运物品被发送到帝国的每个城镇和定居点。

公元前269年通用货币被引进意大利，公元前49年才在罗马全境内流通。帝国时期有金币、银币、黄铜货币和青铜货币。黄铜铸的塞斯忒提乌斯成为货币的基本单位。一枚金币（奥雷乌斯）等价于

100个塞斯忒提乌斯，4个银币（迪那利乌斯）和1¼个青铜货币单[165]位。本地货币继续并存、使用，但铸币权是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钱币]

罗马社会是建立在公民与非公民，非公民中的自由民与非自由民在法律上的根本差别上。世袭的社会“等级”或地位系统十分严格。这一措施最初适用于古拉丁平原，后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调整，直到把帝国行省中众多、混杂的人口全部包括在内。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元老或城邦长老从平民或老百姓中分离出来，禁止彼此通婚。贵族氏族既利用元老院主宰城邦的政治生活，又通过把持土地的分配控制着经济生活，还长期抵制平民的挑战。但是，他们的特权最终被推翻。公元前296年，《奥古尼亚法案》（*Lex Ogulnia*）规定，允许平民成为神圣的祭司团和占卜官成员。公元前287年，《霍腾西乌斯法案》（*Lex Horatius*）宣布平民大会对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平民已经变成了机制的一部分。在公元前90—前89年所谓的“社会战争”中，罗马的意大利盟友成功宣布获得了全部公民权。然而，在公元122年之前，康斯坦丁·安东尼（*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就将公民权授予了附属于帝国的全体自由民生的男子。

共和国晚期，贵族寡头制内部发生了重大分化。一小群最古老的元老氏族，即大氏族（*gentes maiores*）们在贵族中形成一支显贵——瓦拉里（Valerii）、费边（Fabii）、克尔奈利（Cornelii）、克劳狄（Claudii）及其他人。显贵（*nobiles*）较大，但仍属于元老集团，由全体自称是执政官后裔的人组成。他们拥有在公共场合展示其先辈蜡像的高贵权利。骑士构成仅次于元老的财产阶级，他们拥有服骑兵役的装备。他们有权穿镶有两条较窄的紫色绲边的托加长袍，与元老托加袍的区别在于元老托加袍上的绲边较宽。在剧场里，他们坐在前14排，紧挨在合唱队后面的座位是为元老们保留的。经过奥古斯都的大力提拔，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显贵被大量替换掉，他们是奥古斯都主要受益者。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强烈对比依然存在。就像罗马自己一样，行省的城市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中心，往往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工程为其特色——铺设的街道、引水渠、浴池、戏院、神庙、纪念碑。并且，随着商人、工匠和无产阶级的增长。城市暴民成为重要的社会因素，他们不断被安抚，用尤文努（Juvenal）的话说，靠的是“面包和竞技场”。在乡下，当地体面人物的别墅凌驾于在大庄园里辛勤劳动的广大奴隶之上。本质上处于中间地位的、活跃的被释奴或“被解放的奴隶”集团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共和国征服战争的结束造成进口的新奴隶人口萎缩。[斯巴达克斯]

[166]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卒于公元前71年）是一名角斗士，也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奴隶起义的领袖。他生于色雷斯，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后来因为逃跑被卖到卡普阿（Capua）的角斗士学校做奴隶。公元前73年，他冲破牢笼，率领一群跟他一起逃亡的同伴在维苏威山上安营扎寨。此后两年，他挫败了各种捕获他的企图。他的军队把那些绝望的人们吸收进来，扩充到近10万人，在意大利纵横征战，抵达阿尔卑斯山和墨西拿海峡。公元前72年，他在阵地战中先后打败当政的两执政官。最后，他被堵在路坎尼亚（Lucania）的佩特利阿（Petelia），与高卢和日耳曼同盟者断绝了联系，被大法官M. 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的部队歼灭。斯巴达克斯是手持利剑奋战而死的，他事先就杀掉了战马，放弃了逃生的机会。[1]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奴隶主。他通过没收马略党人的地产大获其利，并通过训练奴隶经商谋利，下井采矿而变得极其富裕。他以"富豪"闻名于世，曾与庞培同掌执政官，公元60年与庞培、恺撒组成三头同盟。为庆贺战胜斯巴达克斯，他在卡普阿到罗马长达120英里的道路上，沿途竖立钉着俘虏的十字架，并赏赐给罗马人民一桌宴席，供1万人吃喝。担任叙利亚总督期间，他更是大肆敛财，结果在公元前53年，死于帕提亚人之手。他的脑袋被割下来，嘴里塞满熔制的金子，并附有一张帕提亚国王发布的告示，上面写着："吃吧，在你死后，把你生前所贪图的金属吃个够！"

奴隶制是罗马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据说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它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着城市的奢华生活。奴隶及其子女遭受着肉体的、经济的和性的剥削。共和国的战争是奴隶制的保障，战争带来数以十万计的俘虏，后来是通过系统的奴隶劫持和奴隶贸易。尤利乌斯·恺撒仅在一次战役之后，就在阿图阿提亚（Atuatia），即那姆尔（Namur）把53000个高卢战俘卖为奴隶。提洛岛（Delos）是贩卖来自东方的和多瑙河以北的野蛮人的主要交易场所。

罗马时代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奴隶制仍然是欧洲生活的一大特征，正如它也是绝大多数其他文化的特征一样。它持续存

在的时间贯穿了中世纪基督教帝国，尽管它逐渐被农奴制所取代。基督教徒一般允许奴隶制存在，只要奴隶不是教徒就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奴隶制还很普遍。在那里，穆斯林奴隶受到的待遇就像这个国家原来的情况一样。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欧洲列强只容许在海外殖民地保留奴隶制，那里的奴隶制在奴隶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依然残存。

[167] 废除奴隶制是欧洲启蒙运动主要的社会产物之一，分三个主要阶段演进。先宣布蓄奴为非法，紧接着抑制国际性奴隶贸易，然后禁止在海外殖民地蓄奴。英国在1772年、1807年和1833年达到了上述几个阶段。废奴运动并非是通过斯巴达克式的暴动发生的，而是如爱默生（Emerson）所说，是“通过暴君的忏悔”发生的。[2]

在现代，斯巴达克斯被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历史英雄。他的名字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先驱所借用，名为1916—1919斯巴达克团。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把他用作小说《角斗士》中的主角（The Gladiators，1939年）。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奴隶暴动是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特征，并在共产主义文献中被赋予相当突出的地位。人们发现在后来的“苏联领土”克里米亚有一位与斯巴达克类似的人，他就是领导斯基泰奴隶暴动的撒乌马库斯。苏联史学家们并不想强调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的世界同古拉格（劳改营）、强迫集体化和干部体制（nomenklatura）之间的相似之处。[3]
[半岛城]

尽管罗马社会中拥有巨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与属于他们的大量奴[167]隶之间，城市居民的富足与周边荒野中的部落和野蛮居民的落后之间形成极度反差，但阶级冲突相对少见，这应归功于罗马社会传统中富于变通的父家长制（*pater familias*）。亲属集团赖以繁衍生息的血缘关系在罗马具有重要意义。贵族统治社会，近似于父家长统治各个分支家庭。贵族起初分为三个部落；部落分成30个胞族（*curiae*）；胞族分成氏族（*gentes*）和家族。到了晚期，氏族（*gens*）由那些自称拥有相同男性始祖的人组成，而家族（*familia*）则是狭义上的“家庭集团”。父亲对家族中的全体成员享有绝对权力，即父权（*patria potestas*），这是家族法的基石。**[名字]**

[168]

名字（NOMEN）

罗马式人名是以氏族和家族为基础的。所有男性贵族都有三个名字。praenomen，打头的名字通常由 12 个短小的名单中选出，一般采取缩写形式：

C（G）= 盖乌斯，Gn = 格涅乌斯，D = 德西乌斯，Fl = 弗拉维乌斯，L = 路西乌斯，M = 马库斯，N = 努麦利乌斯，P = 普布利乌斯，Q = 昆图斯，R = 鲁弗斯，S = 绥克斯图斯，T = 提图斯

nomen 表示某人的氏族名，cognomen 表示其家族名。因此，C. 尤利乌斯·恺撒代表来自尤利氏族、恺撒家族的盖乌斯。

出自相同贵族氏族的男子享有相同的姓，同时全体父系亲属均可分享姓和氏。结果，在某段时间里，有好几个"尤利乌斯·恺撒"在流通使用，每一个都得靠名来区别。那位著名将领的父亲叫 L. 尤利乌斯·恺撒。当好几个家族成员的三个名字都相同的时候，他们就用附加的记号加以区分：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公元前 396—前 395 年的保民官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留胡子的"），公元前 306 年的独裁官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阿西纳（"母驴"），公元前 221 年的执政官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公元前 218 年的执政官，阿非利加的父亲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梅尔（"老阿非利加"公元前 236—前 184 年），将军、公元前 205 年、公元前 194 年执政官、战胜汉尼拔的人

L.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阿西阿提乌斯（"亚细亚人"），阿非利加的兄长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密讷（"小阿非利加"），阿非利加·梅尔之子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埃密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密讷·努曼提努斯（"努曼提亚人"公元前 184—前 129 年）；阿非利加努斯·密讷的养子，迦太基的毁灭者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那西卡（"鼻子"），公元前191年的执政官

P. 科尔奈里乌斯·西庇阿·科尔库隆（"小心脏"），公元前150年的大祭司长

平民如G. 马利乌斯或M. 安东尼就没有姓。

相比之下，妇女只有一个名字——或者是贵族氏族阴性化的姓，或者是平民家族阴性化的氏。因此，尤利氏族的全体女儿都叫"尤利娅"，或者李维氏族的女儿叫"李维娅"。姐妹之间没有区别。马可·安东尼的两个女儿都叫"安东尼娅"。一个成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母亲，另一个是尼禄的祖母。马略所有的女儿都叫"马利娅"。这是罗马妇女地位低下的标志，因为她们被剥夺了个人身份的确认。[1]

罗马实践表明，只有那些享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公民才需要多[169]种多样的名字。然而，在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人并不太需要太多名字。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名，一个"教名"加上一个表示父系的词或形容词。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相应的词用来表示"小个约翰，大个汤姆的儿子"。至于个人名字，妇女经常用一个词组表明她们是谁的妻子或女儿。在斯洛文尼亚，采取后缀形式-欧娃或-欧瓦娜。"马利娅·斯蒂芬欧娃"（波兰语）代表"斯蒂芬的妻子马利娅"；"埃琳娜·波利索弗娜"（俄罗斯语）意为"波利斯的女儿海伦"。知名人物和外国人经常采用表明其来历的名字。

在中世纪，封建显贵需要把自己同采邑，或确定其级别的土地财产联系起来。结果，他们采取以居住地为基础的首名，或者用前缀，诸如冯，或迪，或者后缀，诸如斯基。由此，法国亲王"查理·德·洛林"可能被德国人称作"卡尔·冯·洛林根"或者在波兰语中变成"凯罗·洛塔林斯基"。行会成员采用的名字表明了他们的手艺和贸易。独一无二的贝克斯（面包师）、卡特斯（造车匠）、米勒斯（磨房工）和史密斯（铁匠）属于用得最多的传统家族姓氏。后来，国家政府把传统习惯变成了一道法律要求，将个人置于人口调查、税收和征兵的网络之中。[2]

苏格兰的盖尔人和波兰的犹太人这两个古老共同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无姓的。两者都喜欢共同体自治，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使用传统的姓名模式，或者用父系表示法〔如犹太人"亚伯拉罕·本·以撒（Abraham Ben Isaac）"，即以撒之子亚伯拉罕〕，或者使用具有个人特征的名字。大约在1660—1732年间，

有一个著名的高地匪徒，低地讲英语的居民称之为 Rob Roy MacGregor，在他的母语中，意思是 Rob Ruadh of Inversnaid（红色的罗伯特）。盖尔人和犹太人的命名法在十八世纪晚期都沦为国家官僚机构的牺牲品。詹姆斯党（Jacobite）失败之后，苏格兰高地居民按照以前很少使用的氏族名称被登记入册，由此产生了成千上万的 MacGregors，MacDonalds 和 MacLeods。波兰被分割之后，在俄罗斯的波兰犹太人的姓氏往往取自故乡的名字，或者是他们的贵族老爷的姓氏。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官员把德国姓氏分配给他们。从 1795 年到 1806 年，华沙的犹太社团得到当时该城首席普鲁士行政长官霍夫曼（E.T.A.Hoffmann）的恩赐，他随心所欲地赐予犹太人各种姓氏。幸运者得到了 Apfelbaum，Himmelfarb，或者 Vogelsang；不太走运的人变成了 Fischbein，Hosenduft 或 Katzenellenbogen。[3]

罗马经常召开公民大会，它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双重功用。贵族们在他们自己的库里亚会议（comitia curiata），即“胞族会议”会晤。在那里，他们审批执政官的命令以及其他事务。平民也定期举行特里布斯会议（comitia tributa），即“部落会议”，在那里讨论他们的共同事务和选举他们的官员——保民官（tribune），或“部落代言人”，财务官（*quaestores*）和营造官（*aediles*）等平民职官。公元前 449 年以后，他们可以被执政官传唤，就像被保民官传唤一样。他们在广场上集会，并且通过平民决议（*plebiscita*）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任何托付给他们的事务。

出于军事需要，贵族和平民共同举行森都里亚大会，或者叫“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他们在城外宽阔的马尔提乌斯校场，[170] 即战神之地集会，在那里，他们按 35 个部落列队。每个部落根据财产分成五等，骑士（*equites*）处于顶端，最穷的步卒（*pedites*）处于底层。有时，还有一个叫“无产者”（*proletarii*）的无财产的等级。各等级依次组织成森都里亚（*centuriae*），或“百人团”，每个百人团分为“年长者”（征募名单中年龄在 45—60 岁之间的男子）和“年轻者”（年龄在 17—45 岁之间适合参加激烈战斗的男子）。公元前 241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共有 260000 名公民属于 373 个百人团，几乎每个百人团有 700 人。这就是罗马（男性）社会的全貌。百人团大会逐渐具有以前被贵族所掌握的大权（imperium），包括选举主要行政职官、确认军事长官的指挥权、审批法案和决定宣战与媾和。他们离开百人团封闭的会场时，把黏土做的小泥丸投入两只篮子里，用这种方

式表决。这一程序要求在一天之内完成。

在这些大会中，保护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个高度分化，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使得富有的贵族能够操纵低等级的行为，进而影响民众机构的决策。结果，每个保护人（*patronus*）身后都跟随着一大群门客（*clientes*）。门客们指望得到金钱、官职和财产的犒赏。为一个富有的保护人效劳是提升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正是保护制度使得罗马政府具有民主制形式与贵族制专权相混合的特征。

公民大会、官员轮换和频繁的集会所构成的系统网络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每个罗马公民都清楚地知道，应该跟自己的部落、氏族、家族、百人团和保护人站在哪个位置。参与和效力是一种公认的美德。严格说来，高级官职是由公民大会任命的，而元老院由这些官员任命。实际上，却是元老们操纵各个机构为他们谋福利。谁主宰了元老院，谁就统治着共和国。

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都位居舞台中央的元老院，由300至600人组成。其成员由执政官指定，他把他们召集来听取建议。但是，自从要求执政官们应使用那些“有经验的人”。自从元老保护人控制了城邦中所有重要职务，元老院就得意洋洋地长期把持政府。这是一个自我永久化的精英核心。元老院中主导成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依赖于彼此竞争的个人、氏族和被保护人集团之间的微妙的权力平衡。但这些贵族姓氏反复出现，持续了数个世纪，直到一股大浪潮兴起，终于把他们席卷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老院控制渐渐失去效力，让位于日益增长的[171]派系主义。当元老院在内战中变得瘫痪之后，惟一能维持系统运转的方式就是设立一个公认的独裁者，或者由一个靠武力推行其意愿的集团执政。这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出现了一串独裁者的原因。结果，屋大维·恺撒，即未来的“奥古斯都”领导的集团使其意旨强加于全体人民之上。屋大维成为保护人的保护人，把全体元老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两个执政官，罗马联合执政的首席行政官员，任期从1月1日起为一年。最初，这一职位本质上是一种军事职务。他们由元老院提名，经百人团大会任命，被授予军队指挥权（*imperium*），负责完成特定的任务。但是，他们逐渐具有了额外的功能。他们出席元老院，并且与元老院携手处理外交事务。他们监督掌管法律系统的“大法官”（*praetores*），负责税收和公民登记的监察官（*censores*），负责公共财政的财务官（*quaestores*），维护城市安全，举办赛会的营造官（*aediles*）以及高级神职人员大祭司（*pontifex*）管理城邦的内政。他

们与保民官合作，希望贵族与民众之间保持和平。执政官的重要性有一个标志，即罗马人在继续罗马城的历史记录时，不是用自建城以来的序数来纪年，而是用执政官在位时间来纪年。[**罗马纪元**]

多亏马略和苏拉实行的改革，执政官制度的轮廓发生了改变。它通过总督（*proconcules*）管理行省，权力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它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罗马政府似乎是一个由许多错误概念构成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可称为共性的尺度，也许，安东尼时期除外。其不容置疑的成功取决于目标有限而明确。它指定官员去调解纠纷，征收贡赋。它组织军队进行对外防御，维护法律和内部安全。通过参加宗教仪式和公共典礼，它支持那些本地的和地方精英享有权威。城邦在损害固有的权利和特权的时候，极度小心翼翼，而在维护法律权威时，又绝对毫不留情，二者神奇地组合在一起。用维吉尔的话来说：

> 罗马人，承担起统治万民的责任吧！
> 让和平降临人间，宽恕臣服者，征服傲慢者，
> 这些才是你们所擅长的。[7]

然而，用现代的观念来看，罗马政体具有欺骗性。在罗马王国，君主不是继承而来的，并且受到贵族元老院的限制，后来还被元老院所推翻。共和国早期的两个执政官是由贵族元老院年选产生的，具有[172]完全的“指挥权”。但是，他们严格受到职位双头制的约束，并受到公元前494年平民保民官设立的否决权的制约。因此，有了著名的口号SPQR——罗马元老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一切权力均以他们的名义实行。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绝大多数传统的职官和立法机构幸存下来，但它们都服从于日益增长的独裁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之下。

罗马政治文化决定了变化了的制度如何运作。政治和宗教生活总是交织在一起。飞鸟占卜伴随着所有的决策制定。家庭和本地权威受到高度重视。结果，公民责任、服兵役的义务和尊重法律被深深铭记在心中。官职的轮换要求高度的游说能力和优先特权。在共和国时期，共识是通过吸取建议（consilium）所取得的。在元首制时期（或帝国早期），则顺从于当权者。

罗马法律被描述成罗马人“对世界历史最具有恒久影响力”。[8]这项工作始于公元前451—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后来它被视为“平等法律”的源头，全体公民均平等地受这些观念的约束。它分为两个主要

组成部分：市民法（*ius civile*），规范公民之间的关系；万民法（*ius gentium*）。它是通过吸收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实践发展而来的，并用法律方式（*prudentia*）确定下来。年复一年，每一条法令都受到检验、修正，或者延伸。法官们是制定法律的主体，直到哈德良皇帝颁布"永久敕令"终止了对法律的进一步修订。由官员们创制的法令（*leges rogatae*）不同于由几个公民大会创制的"平民决议"（*plebiscita*）。

法律实践的复杂性和古老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学的兴起，从Q. 穆基乌斯·斯卡沃拉（Mucius Scaevola，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开始，产生了一长串的罗马法学家。作为腐朽年代的征兆，两个伟大的法学家希腊人埃米利乌斯·帕皮尼阿努斯（Aemilius Papinianus，即帕皮安Papinian，卒于213年）和多米提乌斯·乌尔比安努斯（Domitius Ulpianus，即乌尔比安Ulpian，卒于223年）都被处死了。[**法律**]

[173]

法律（LEX）

人们常说，罗马法是欧洲文明的支柱之一。的确如此，拉丁文中的法律（*lex*）意思是"束缚"，"束缚之物"。另一个构成了罗马法律基础的相同概念是"契约"（*pactum*），由两个团体自愿达成的协议，无论它是出于商业的、婚姻的，还是政治目的。罗马人认为，法治是健全的政府、公平交易和有序社会的保障。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罗马传给欧洲的法律传统遗产并非通过单线直接继承而来的。帝国的法律条文，随着帝国的瓦解大部分被废弃了，中世纪不得不重新把它们发掘出来（见第5章）。它们在拜占庭存在的时间最长，但不是通过这条途径对近代立法产生强烈影响。其实，就直接的例子而言，它们极有可能迅速对天主教的教会法程式产生了影响。

更有甚者，甚至在世俗领域，罗马传统的复兴也要面临其他非罗马的，往往与之相抵触的法律习惯的竞争。欧洲法学的渊源众多，罗马只是其中之一。习惯法尽管形态各异，也同等重要。在某些国家，诸如法国，罗马传统与习惯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在日耳曼地区大部，罗马法直到十五世纪末的某个时期才推广到这里。英格兰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平等原则修订的共同法实质上取得了垄断地位。

即便如此，罗马人对公私事务的划分符合欧洲政体发展的目标。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法所依据的立法原则都是罗马式的（与

盎格鲁—美利坚的法律先例的概念不同)。从这一点来说，单个的最具影响力的制度是法国的拿破仑法典（1804 年）。

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欧洲的法官们都承认自己受惠于西塞罗，是西塞罗的继承者。正是西塞罗在《论法律》（De Legibus）中写道：“人民的利益即为最高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1]。也可以这么说，法制给人民带来了最大程度的安全保障。

罗马军队是长期征战的社会培育出的产物。其后勤供给系统同机械技术和合作美德一样著名。500 年来，从公元前三世纪灾难性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它几乎不可战胜。它取得了无数胜利，每个胜利都通过凯旋式，通过大量提图斯式拱门或图拉真功德柱式的纪念碑得到张扬。罗马所遭受的失败往往令人震惊，因为这种例外不常有。公元 9 年，三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森林中被歼灭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伤痛，只有 251 年德西乌斯皇帝（Decius）在对哥特人的战役中战死疆场，或 260 年瓦拉里皇帝（Valerian）被波斯人俘虏才堪与之相比拟。拉丁谚语“想要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概括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赫尔曼纪念碑**]

在罗马和平时期（*Pax Romana*），由 30 个军团组成的能征善战的[173]军队加强了帝国的要塞和边疆。许多军团同行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长期驻扎在那里，有好几代人，甚至有好几个世纪之久，例如，不列颠的“奥古斯塔第二军团”（Ⅱ Augusta）和“瓦拉里·维克特里克斯第二十军团”（ⅩⅩ Valeria Victrix），潘诺尼亚的“阿波里纳利斯第十五军团（ⅩⅤ Apollinaris)”，麦西亚（Moesia）的“马其顿第五军团（Ⅴ Macedonica)”。

每个军团大约共计 5000—6000 人，由一位元老指挥。军团由三[174]列步兵组成——*hastati*, *principes*, *triarii*，每一列有十个小队，由一个“前百人团队长”和“后百人团队长”指挥；一支小分队（*velites*），一支由十个中队（*turmae*）组成的骑兵补充部队（*iustus equitatus*）和一列工兵。还有大量的辅助部队，由同盟者和雇佣兵组成，他们在自己的指挥官的领导下组成单独的步兵大队（cohort)。

随着时光推移，公民战士的比例严重衰落；但这一体制的支柱仍建立在中级罗马职官等级之上，他们担任百人团队长。功劳卓著者会获得功勋章的嘉奖，或者得到将军的头衔；忠心耿耿的老兵可以指望在一个军事殖民地获得土地赏赐。军事纪律靠严厉的惩罚维护，包括鞭笞和把叛徒钉十字架。后来，内部体制的衰落给予军队谋取帝国政治的机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从伊比利亚人那里传来的利剑（*gladius*），被角斗士

握在手中,这是罗马享乐的象征,也是所向无敌的象征。

罗马建筑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倾向，其成就应属于工程领域，而非设计领域。尽管修建神庙的希腊传统仍然存在，但最富有创意的还是与道路和桥梁，与城市规划，与世俗的、有实用功能的建筑物有关。罗马人不像希腊人，他们掌握了拱门和拱顶技术，并以此为基础，运用于桥梁和屋顶建筑中。因此，装饰了几乎所有的罗马城市的凯旋门，是技术上的优越性与罗马建筑上的民族精神的结合。万神殿，始建于公元前 27 年，由阿古利帕（Agrippa）主持修建，为纪念“全体神祇”和亚克兴战役而建，拥有一个拱形穹顶，比圣彼得教堂的穹顶宽 1.5 米（现在叫 Santa Maria Rotunda ad Martyres)。大斗兽场（Colosseum，公元 80 年)，正确的叫法是弗拉维圆形剧场，是杰出的希腊和罗马特色的合成物，共有四层配有石柱的拱门。它拥有 87000 观众席。卡利可拉的大型砖造浴池（又称为 Thermae Antoninianae，公元 217 年）——雪莱在那里写下名为《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的诗篇，它是反映罗马生活方式的纪念物，有 360 平方英尺（330 平方米)。根据温度变化按照惯例划分成几个区域——冷水区（frigidarium)，温水区（tepidarium)，热水区（caldarium)，有一个可容纳 1600 人洗浴的水池（piscina)，一个体育馆，一个希腊文和拉丁文图书馆，一个画廊和几个会议室。戴克里洗浴池(公元 306 年）甚至更奢侈。大竞技场用于赛车，经过扩大，能够容纳 385000 位观众。[**碑铭**]

[175]

碑铭（EPIGRAPH)

碑铭学，即铭文研究，是一种探索古典世界的重要的辅助学科。由于太多的材料和文化证据已经毁灭了，保存在石头和金属上的铭文就提供了无价的信息来源。对墓碑、献祭的石碑、塑像、公共纪念碑，以及诸如此类东西进行的细致研究取得了丰硕收获，了解到铭文所记录的人们的隐秘生活细节——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姓名和头衔，他们的作品和职业，他们的组织制度，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神和他们的道德。庞大的铭文汇编，如拉丁铭文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CIL*）和希腊铭文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CIG*)，都是在十九世纪的柏林制作完成，像它们收录的那些纪念碑一样坚实而耐久。

罗马最著名的铭文——十二铜表法,在广场上树立了好几个

世纪——没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材料相当丰富。

罗马墓志铭常常载有一首描述死者个人生平、职业的诗歌。一块来自莫昆提乌姆（Moguntium，即美因茨 Mainz）的墓石上就有一首为墓主人之死鸣不平的诗：

牧羊人，马可·泰兰提乌斯的被释奴。
旅人啊，无论你是何人，请停下来浏览这几行诗。
看看我死得多么冤枉，听听我无用的哀鸣。
我的寿命还不足三十年。
一个奴隶夺走了我的生命，然后他自己也投了河。
这个谋害主人的家伙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我的）恩主是用自己的钱为我立此（石碑）的。[1]

敬献给神祇，是公共纪念碑的常见特征。在大竞技场发现的一段铭文，现在被安放在人民广场的一个方尖碑上，该石碑始建于公元前 10—前 9 年，是奥古斯都皇帝为纪念征服埃及而建的：

皇帝恺撒·奥古斯都，
神之子，
大祭司长，
十二次担任总司令，
十一次担任执政官，
十四次担任保民官，
他把埃及交给罗马人民统治，
并将这份礼物敬献给太阳神。[2]

那些极为质朴的东西往往记载着有趣的铭文。花瓶和陶器上刻着制造者的标记。金属图章得到广泛使用，它们可以将姓名或者广告印在黏土上。在兰斯（Reims）的一个镜片制造商的一些瓶子上发现了一大批这类图章：[176]

德西姆斯·加利乌斯·绥斯图斯的洗眼液，用于瞳孔清洗。[3]

罗马文学的魅力主要是因为她对盛行的尚武精神构成了挑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庸人社会的挑战。罗马文学自然拥有一批文人墨客，尤其是共和国晚期和早期帝国中的闲暇贵族。但是，他们无论

[176]如何也不能像希腊同行那样与风景融为一体。在书信所展示的老于世故的世界与僵化的罗马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拉丁文学起步甚晚，为什么受到加图之流的如此敌视，他视文学纯粹是堕落倾向的希腊风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夸张的喜剧成为率先被引进的胚芽，为什么讽刺是罗马人自己坦然自嘲的惟一媒介。在30多个拉丁诗歌大师中，维吉尔（Vigil）、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西塞罗（Cicero）赢得了世人瞩目，但是，对奢侈、贪婪、残酷的罗马生活十分反感的人一定会对那些敏感的、强烈反抗周遭环境的人产生亲密感，会对卡图路斯（Catullus）精致的诗歌、尤文努斯（Juvenal）辛辣的才智、马尔提乌斯（Martial）的警句产生亲密感。

第一批罗马作家用希腊文写作。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约284年—前204年）把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希腊奴隶，公元前272年，塔林敦（Tarentum）陷落后被带到罗马。严肃的拉丁文学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涌现出涅维乌斯（Cn. Naevius，卒于约公元前200年），马西乌斯·普劳图斯（T. Maccius Plautus，公元前约254年—前184年），泰兰提乌斯·阿法尔（笔名“泰兰斯”）（P. Terentius Afer，公元前185年生）这三人成功地改编了希腊喜剧，由于他们的成就，剧院成为了罗马文化体制的中心。恩尼乌斯（Q. Ennius）是最主要的文学先锋之一，他开创了拉丁本土诗歌之先河，引进了悲剧，倡导讽刺艺术，创造了拉丁六步格新风尚——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基本格律。

演说术在罗马生活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如同在希腊一样。伟大的演说实践家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用一种崭新的形式演讲和写作，从此成为拉丁散文的典范。“新人”西塞罗公元前63年升任最高长官执政官，最终被罢黜，在第二次半途而废的政治活动之后，被列入黑名单并丢掉了脑袋。他的作品包括道德哲学、政治理论以及演讲术，对于基督徒和理性主义思想来说，都具有巨大影响。在法学方面，他在共和国政府中首屈一指。他的传人——[177]老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55—公元37年），来自科多巴的修辞学家，编撰了一部关于演说术的鸿篇巨著。

史学作品极大丰富。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著有142卷的罗马史，现存35卷。他把罗马共和国理想化，其表述偏重于风格，而轻于分析。李维起笔写道：“尽我所能致力于记述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的业绩将是一种乐趣。”C.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既是罗马历史的卓越创造者，也是记录者。他的《高卢战记》和反对庞培的《内战记》是简明易懂的经典著

作，曾经广为欧洲学童所熟知。撒路斯提乌斯·克利斯帕斯（C. Sallustius Crispus）又称“撒路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继承了恺撒的政治和文学趣味。科尔奈里乌斯·塔西陀（Conelius Tacitus，公元55—120年）接着李维的编年史续写一世纪的帝国史，对罗马帝王毫无热情，其无与伦比的简约风格也体现在他的其他专著中，诸如《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吉本（Gibbon）在一条脚注中写道：“时代变革也许会带来同样巨大的灾难，但是，即使没有塔西陀的记载，时代还是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9]

传记艺术也兴旺发达。曾为哈德良皇帝的秘书的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奎努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公元69—140年）就是一个卓越的传记作家。他的生动活现的《十二恺撒传》（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是一个信息和娱乐的宝库，堪分塔西陀为其岳父不列颠总督阿古利可拉所做的传记媲美。

毫无疑问，拉丁文学被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们推上了顶峰——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抒情诗人瓦拉里乌斯·卡图路斯（C.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年），哀歌诗人阿尔比乌斯·提布路斯（Albius Tibullus，约公元前55—前19年）以及名副其实的绥克斯图斯·普罗帕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50—前15年），他献给怒气冲冲的辛西娅的情诗堪与卡图路斯写给莱丝比娅的情诗相匹配。普罗帕提乌斯写道：“丘比特一丝不挂，不喜欢任何人为的粉饰与装扮。”

维吉利乌斯·马洛，即“维吉尔”（P. Vi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年）创造出一种即便用来写最世俗的主题也不会令人生厌的语言。他的《牧歌》（Eclogues）又被称为牧歌“诗选”。《田园诗》（*Georgics*）歌颂田园生活。《埃涅阿斯》（*Aeneid*）又名《埃涅阿斯之旅》是一首长篇寓言性史诗，表达出罗马人对荷马史诗和希腊的敬意。通过叙述特洛伊的幸存者、罗慕路斯及尤利亚氏族的祖先埃涅阿斯的冒险生涯，维吉尔提供了一个被有教养的罗马人所认同的神话谱系。技艺精湛的六步格韵简直无法翻译。这首史诗是以十年内每日一行的速度写成，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曲调吟唱。它是那么迷人、缠绵、典雅、忧伤：

> 快乐是个通晓万物由来的人
> 时间飞逝，一去不回头
> 爱情战无不胜，不如向爱俯首
> 不列颠彻底与世界分离
> 那里有奔流的泪水和揪心的死亡[10]

[178]

但丁认为维吉尔是“那些闻名于世的人物中的大师”，“是一股喷射出如此宽阔的语言河流的清泉”。早期基督教徒们认为他是一个异教诗人，在他的第四首牧歌中曾预言基督的诞生。现代人把他视为“语言大师——诗人中的诗人——运用人类唇齿所能达到的最为庄严的尺度进行创作的诗人”。他很可能给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彼得拉克（Petrarch）在波祖奥利（Pozzuoli）见过此碑：

> 曼图阿生了我，
> 卡拉布里亚带我走四方；
> 纳波利留住了我。
> 我歌唱过牧场、田野和君王。[11]

霍拉提乌斯·弗拉库斯（Q. Horatius Flaccus），即“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是维吉尔的朋友和同时代的人，著有《颂歌》（Odes）、《讽刺诗》（Satires）、《逸事》（Epodes）、《书信集》（Epistles）。他在雅典学习过，指挥过一支军团，在退居萨宾农场，接受恩主麦凯纳斯（Maecenas）庇护之前，曾参加过抗击菲利皮的战斗。他是一位温和、宽容的人。他给皮索斯的信件，尤其是《诗艺》（Ars Poetica）备受后世诗人们的崇拜。他的讽刺诗针对的是人类的愚蠢而不是罪恶。他的颂诗清澈透亮，“表达了无比幸福的感受”：

> 为祖国捐躯是多么甜美和惬意
> 大山将有后代，愚蠢的小耗子也要降生
> 追求真理直到入土也不停息
> 我造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还要耐久
> 我将永垂不朽[12]

贺拉斯是人们最热衷于仿效、翻译的诗人。

奥维第乌斯·纳索（P. Ovidius Naso），即“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年）曾是罗马社交界的顶尖级人物，直到他被奥古斯都皇帝放逐到黑海岸边。遭放逐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一首诗就一个错误”。毫无疑问，那首诗指的是《爱的艺术》（Ars amatoria）；那个错误可能涉及皇帝的女儿朱利娅，她也遭到放逐。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改写了两百多个希腊和罗马神话和传说，被列为古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不仅为罗马人，也为乔叟（Chaucer）、蒙田（Montaigne）、歌德（Goethe）等各种人提供了一个饶

有趣味的读物。自彼得拉克到毕加索（Picasso），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都曾从它那里得到灵感。奥维德写道：“想要被爱，就必须去爱人。”[13]

拉丁文学的白银时代从奥古斯都之死延续到大约二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巨人较少。除了塔西陀和苏埃托尼乌斯以外，还[179]有一批才华横溢之士：斯多噶派哲学家塞涅加二世（Seneca Ⅱ）、两普林尼（Plinys）、诗人琉善（Lucan）和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小说家帕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尤其还有讽刺诗人尤尼乌斯·尤文纳利（Iunius Iuvenalis），即“尤文纳”（Junenal，约公元47—130年）。尤文纳写道：“不写讽刺诗简直太难了。”

罗马生活中所充斥的暴力颇为引人深思。对外战争中的大屠杀在城邦内战中再次重演。李维那句动人的名句“向死难者志哀”（Vae victis!）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公元前88年，被称为“伊弗索斯的薄暮”（Vespers of Ephesus）的苏拉（Sulla），贵族派（Optimates）的领袖，曾亲眼目睹米特里达提（Mithridates）国王下令将大约10万罗马人在一天之内斩尽杀绝，他自己却挥师罗马，杀害大批跟自己作对的马略党人。保民官苏尔皮奇努斯·鲁弗斯（P. Sulpicius Rufus）的首级被摆在广场上示众。城市大法官在协和神庙（Temple of Concord）前面，正准备主持献祭，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公元前87年，当罗马向马略敞开大门的时候，就轮到贵族派掉脑袋了。马略的奴隶军团和达马提亚卫队（Dalmatian）把那些没有得到将军致敬的元老统统砍倒在地。他的牺牲品中有些名字后来变得极为重要——屋大维是当政的执政官，克拉苏、安东尼、恺撒全都是前执政官。公元86年，马略暴卒之后，将军的亲信塞尔托利乌斯（Q. Sertorius）把刽子手们召集起来，借口是付给他们报酬，然后将他们一举诛杀，死者多达4000人。公元82年，当贵族派最终获胜，他们也大肆屠杀俘虏：“武器的撞击声和垂死挣扎者的呻吟清楚地传到了战神的庙宇（Temple of Bellona）中，而苏拉此时正在主持元老院会议。”[14]

此后，为了避免类似情形发生，指定了处决程序。获胜的党派将在广场上张贴一份名单，命令失败一方的头领站出来接受审判，违令者将冒被查抄家产的危险。上了黑名单，按时自杀的人通常是躺在温暖的浴池中割开动脉，这样方能保全其家族免遭涂炭。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将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一份新的名单，刻在大理石上，宣布他们的生命以及亲属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例如，公元43年，后三头的处决名单造成至少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的死亡。其中包括西塞罗，他的头和手被人从尸体上割下来，摆在广场上的演讲台上示众。罗马统治阶级做出示范，群众纷纷效仿。[赛会]

[180]

赛会（LUDI）

“征服了世界的民族，”尤文纳说，“现在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面包和竞技场。”“谈话艺术死去了！”塞涅加宣称，“今天还有谁能谈谈除了赛车以外的事情呢？”“赛会”变成罗马人生活的中心。始于一年中4月、7月、9月和11月中设定的四星期，它们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大竞技场和圆形大剧场几乎永远有节目上演。在公元前264年第一次有记载的赛会上，三对奴隶拼斗到死。四个世纪之后，图拉真皇帝举办了一个节庆，使1000名囚徒和11000只野兽残杀至死。[1]

职业角斗士给人们提供生死打斗表演。他们列队从生命之门中走出来，步入竞技场，按照传统方式大声向皇室致辞：“万岁！恺撒！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向您致敬！”身手轻巧的轻装角斗士（retiarii）手持鱼网和三叉戟，迎战身披重型装备，手持剑和盾的重甲角斗士（secutore）。有时，他们联合作战对付一组囚徒或来自异域他乡的野蛮人。失败者的尸体被钩子拖出死亡之门。如果角斗士受伤倒地，皇帝或赛会主席将用“举指赞成”或“按指反对”表示赦免或处决。赞助人利用角斗士学校之间的竞争牟利，大肆宣传著名表演者的战绩。

现存资料记录了一场普格纳克斯·奈尔第三（*T. v Pugnax Ner* Ⅲ）与姆蓝努斯·奈尔第三（*M. p Murranus Ner* Ⅲ）之间的搏斗节目，例如，这两个斗士来自卡普阿地区的奈罗尼安（Neronian）学校，各自赢得过三场比赛，一个在搏斗中使用色雷斯武器——小盾牌和锯齿剑，另一个使用的是高卢密尔米罗式武器。结果普格纳克斯胜出，而姆蓝努斯战死。[2]

渐渐的，对于宏大的奇观场面的渴望导致角斗表演中时常点缀一些“猎兽”（venationes）表演和全套的军事战役，甚至在蓄水的竞技场里上演海战。有时还要求表演一些猥亵、兽行和极端残忍的节目。一些流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幅场景：四肢摊开的女孩子们被涂抹上母牛的阴道分泌物，同野公牛兽交；基督徒俘虏被活活炙烤，钉十字架，被吊起来或喂狮子；或者把可怜的人们赶到一条行将沉没的船上，河里满是鳄鱼。这些只是花样层出不穷的牺牲与折磨中的短暂的变奏曲而已。这种游戏一直持续，直到身为基督徒的皇帝洪诺留（Honorius）压制元老院，并于公元404年终止了各项赛会。

然而，没有哪一项比赛能比战车竞赛更能激发热情，这项活动起源于罗马，在拜占庭得以延续。传统上是由六组驷马拉的战车绕竞技场跑七圈，争夺大奖。惊心动魄的血肉横飞、车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人们投下巨额赌注。获胜的战车手成为暴民们的偶像，富比元老。获胜的马匹被刻成石头雕像永久纪念："图斯库斯，由蓝队的弗尔纳图斯驾驭，赢得386场比赛。" [181]

竞赛掌握在白、红、绿、蓝四派的手中，他们供应竞赛用的马鞍、团队和车手。竞技场"派别"的支持者们对于多起暴乱负有责任。在拜占庭时期，他们变得制度化，并且曾经试图以此为基地组建初期政党。这一理论现在已基本被抛弃。但是，类似政治党派的团体在晚期拜占庭庆典活动中仍然活跃。基督教会对此十分头痛。"有些人信靠战车，有些人信靠马匹，但我们要记住上帝是我们的主。"[3]

"罗马革命"并非古代世界的专用词汇，但被史学家广泛采纳，他们看到了从共和国向元首制的过渡是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件，一点也不像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个时期见证了权力和财富的巨大变动"，该理论的最重要的阐述者写道："奥古斯都的元首制是革命进程得以巩固的表现。"[15]在这种背景下，罗马旧贵族成了最大的牺牲品。最大的革命者是恺撒的继承人，年轻的屋大维——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和老辣的恐怖分子"，一个流氓、"变色龙"，他反过来装成一个嗜血的复仇者，[181]或是一个温和的和平创造者。最终的变化是，既有的统治阶级土崩瓦解，新兴的社会因素蓬勃发展，野心勃勃的意大利外来者主宰着罗马，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实际上的君主制诞生了。罗马政治的关键在于几个彼此竞争的霸王——尤其是恺撒、庞培、马可·安东尼和屋大维所提供的庇护。群体生平学（prosopography）是理解根本制度的关键——通过具体分析各阶级所从事职业的情况，揭示使一个阶级变得活跃的诱因。塞姆（Syme）借助闵采尔（Münzer）的著作对罗马史所做的研究类似于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对乔治时期的英格兰（Georgian England）所作的研究。他写道："给政治生活打上烙印，并左右着政治生活的因素并非党派和带有近代议会特征的政治纲领，也不是元老院与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是对于权力、财富和荣誉的争夺。"[16]在内战中，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品质是操纵军队和用土地、金钱和尊重取悦于士兵。骁勇善战对于成功的将军来说，似乎只是次要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易变而轻易缔结的同盟胜过了原则性很强的党派。西塞罗那一套政治概念——人民的自由（*libertas populi*）、元老院的权威（*auctoritas Senatus*）、等级协和（*concordia ordinum*）、意大利人和衷共济（*consensus Italiae*），仅仅被视为标语和口号。罗马宪政“仅仅是一个展示人类卑鄙本能的屏幕”。旧贵族可以被收买。新人受贪婪和虚荣驱使。他们是“长裤元老”，是一批依附于恺撒行省的“胡作非为令人作呕的卑贱之徒”。后三头在元老院里塞进了“上千个家伙”；屋大维雇佣奴隶出身的辩护士和鼓动家以便赢得公众的支持，扭转历史。在这些背后，隐藏着银行家，挥金如土的百万[182]富翁，冒险家——麦凯纳斯（C. Maecenas）、来自噶第斯（Gades）的科尔奈里乌斯·巴尔布斯（L. Cornelius Balbus），亚历山大里亚的珠宝商拉比利乌斯·普图姆斯（C. Rabirius Posthumus）。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公元前43年出现了转折点，继恺撒之死，在后三头屠杀政敌期间，屋大维凭借其才能接替了领导权：

> 共和国被推翻了——专制统治靠暴力和没收财产来维持。最优秀的人物或丧命，或被通缉。元老院里充斥着暴徒。执政官，曾经是对公民美德的奖赏，现在变成了对投机和罪恶的补偿。道义无存，法律无存——恺撒党人宣称有权利和义务为恺撒复仇——从恺撒的鲜血中诞生出了君主制。[17]

余下的是尾声。所有的人都高喊着：“自由”，所有的人都向往和平。“当和平到来时，它带来的是专制主义。”

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全盘否定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年）的业绩，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宣传的成果。他无疑在某些方面有缺点，但他对于罗马至关重要，好运总是站在他那边。苏埃托尼乌斯讲了一个故事，在皇帝出生前九个月的一天午夜，他的母亲在阿波罗神庙当值时，通过一条蟒蛇预见了未来。当他第一次庆祝恺撒凯旋庆典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在亚克兴战役前夕，就在他给下属阿古利可拉布置作战任务的地方，他遇到一个希腊农民，正赶着驴子在海边走。“我是尤泰凯斯［繁荣］，”农夫说道：“这是我的驴子尼康［胜利］。”[18] **［避孕］**

[183]

避孕（CONDOM）

公元前18年和公元9年，奥古斯都皇帝试图通过禁止堕胎和杀婴来提高帝国人口生育率。这些材料及其他材料清楚地表明，罗马人熟悉多种避孕方法，包括草药避孕法：男性生殖器用含有西洋杉树胶、醋，或橄榄油的药水灌洗，阴道口用蜂蜜浸润，避孕套用山羊的膀胱制成。一位罗马作家建议："在左脚上系一只盛着猫肝的套子……或者是一只装有母狮鬃毛的象牙套。"[1]

对中世纪避孕实践的研究曾认为，当时还未具备"扭转自然规律"的智力水平。[2]但这一观点已被修正。对教堂忏悔的研究表明，这类话题多次被讨论，尤其是"手淫之罪"可以被合理地归入中断的性交之类。[3]但丁在《天堂》第15篇中所暗示的佛罗伦萨"空空的家宅里"和"床榻上可能发生的事"，令现代人感到难以想象。城市娼妓业的繁荣增进了人们对避免受孕的兴趣。纯洁教派以弃绝生命而臭名昭著。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宗教裁判官成功地说服一名纯洁派教士的情妇揭露他们的通奸伎俩：

当他［教士］想要从肉体上了解我的时候，常常佩带一种用亚麻布裹起来的草药——大约有我的第一节小拇指那么长。当我们做爱的时候，他常常用一根长长的索子绕在我脖子上；吊在绳索的顶端的这东西或草药直达我的胃的入口处——有时候，在一个晚上他想要从肉体上了解我两次或更多次。这时候，教士把他的身体同我的结合在一起之前，会问道：草药在哪里？——我会把草药放在他手里，然后他自己把它放到我的胃的入口，让那条绳索依然通过我的两个乳峰之间。

这里惟一漏掉的细节是草药的名字。[4]

研究意大利商人家庭和英国乡村的历史人口学家得出结论，在中世纪和近代，出生率必定被人为地控制在低水平上。[5]在十八世纪，好色之徒如詹姆斯·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毫不掩饰使用"铠甲"。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党们谈论着"英国外套"或"保护伞"。他们中的英雄当属神秘的康敦上尉（Captain Condom），据说他既是一名医生，又是查理二世宫廷卫队司令。[6]1731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Clement Ⅶ）成为第一位谴责避孕的教皇。

现代支持计划生育的人并未鼓动批准避孕。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尽管身处放浪狂潮之中，仍倾慕于老式的罗曼蒂克。在《婚后之爱》（Married Love）和《巧为人之父母》（Wise Parenthood）一书中，她提议给予妇女摆脱抚养子女的机会，享受婚姻中的性爱之欢。[7] 负责给西线部队分发“法国来信”的军队当权者们既关心士兵的健康，也关心同平民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在共产党世界，像在罗马帝国一样，堕胎仍是主要的技术手段。在西方，避孕并未导致性道德发生变化，直到出现了“避孕药丸”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青少年免费提供咨询的诊所。然而，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钟声仍在回响一样，胜利成果并未得到充分保障：

珍妮，珍妮，满怀心愿
捧着玛丽·斯托普斯的大作，手不释卷。
但是，看看她的周围
这书不宜阅读，否则事与愿违。[8]

早期帝国或者说元首制，就其性质而言，极具有欺骗性。皇帝奥古斯都为自己和他的继承人赢得了永久性的权力，并不是靠推翻共和国体制，而是通过把全体职官集中起来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使自己成为“最高司令官”（*Imperator*）、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大祭司长和西班牙、高卢、叙利亚、西里西亚的总督，凡此等等。结果，他所拥有的权力像独裁君主一样广大；但他并未通过由中央集权发展到专制君主这一渠道就做到了。他用一个准帝国取代了元老院贵族政体下的伪共和国，其陈旧的体制被迫按照新的方式运作。通过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这样一个新职位，他就充当了元老院主席。元老院成员既有由他指定的前任行政官员，也有皇帝提名的人。他让元老院负责半数以上的行省事务，现在帝国全都被划分为各个行省。但是，皇帝对元老院的决定享有否决权。独裁官的大权委托给从前的市政官员，诸如负责审判刑事案件的城市大法官（*Praefectus Urbi*），或者委托负责管理贸易、市场和谷物救济的市政官（*Praefectus Annonae*）。类似的，大批代理人负责监督各种事务，从道路、河流交通到公共建筑的修缮。他们现在全都单独对皇帝负责。在基督教时代，专制政体形式发展得更为正规，尤其是在受波斯的影响很强的东罗马帝国。（见原书附录Ⅲ，第1223页）

[184] 共和国的立法程序逐渐被废弃。但是大多数法律条文保留了下来。部落大会（*comitia tributa*）只是偶尔召集一次，批准由其他部门

制定的法令；元老院审议权（*senatus consulta*）还照旧进行。然而，从公元二世纪开始，皇帝成为制定新法律的惟一源泉——通过他的饬令、命令、手谕、审判规范、行政训令等。至此，元老院作为高级上诉法院的地位已被皇帝的大法官所取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法庞大的体系已被反复编制、固定下来。在这方面，共有三种局部编制法典的尝试：格雷哥里安法典（Codex Gregorianus，约公元 295 年）、赫尔莫基尼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约 324 年）、提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438 年）。类似的，还有提奥多西饬令（Edict of Theodoric，515 年之前），所谓《阿拉里克律法摘要》（Breviary of Alaric，506 年），《勃艮第法典》（Burgundian Code，516 年），蛮族统治者打算把他们在罗马行省发现的法律编成提要。然而，最重要的系统的著作是在查士丁尼皇帝的领导下完成的。五十决议（531 年）、惯例（533 年）、法律摘要（534 年）、修订法（534 年）、新法典（565 年）涵盖了公法与私法、刑事法与民事法、世俗法与教会法两个方面。正是通过查士丁尼的法律著作才使得这笔巨大的遗产流传到现代世界。[**法律**]

行省（provincia）的意思是“活动的区域”，起初指的是派去管理被征服土地的司法行政长官。在帝国统治下，该词指的是该地区本身。每个行省被授予一项宪章，行省法（*lex provincialis*），规定了其界限、区划和特权。宪章受总督（Proconsul 或 propraetor）托管。总督负责征集军队，收集贡税，其饬令具有法律权威，他们由一班元老院指定的信使、卫队和亲兵陪侍。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行省同留给元老院的行省区别开来。创建行省对于罗马和帝国的命运都具有深远影响。[185] 短期内，罗马从源源不断涌来的贡税和经常性的人口、商品交易中获得利益，变得极为强大。从长期效果看，随着行省的内部逐渐得到巩固，首都的财富和权力资源被榨取殆尽。四个世纪之后，“罗马母亲”渐渐地竟然被她自己的孩子们视为累赘。

罗马衰落了，行省却发达起来。在第一阶段，行省精英汇集了一批蜂拥而来新移居的骑士和元老，正是他们毁弃了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治并经营着帝国。在第二阶段，当军队越来越集中在自给自足的边缘地区的时候，行省城市例如鲁格敦乌姆（即现代的里昂），或麦第奥兰努姆（Mediolanum，即现代的米兰）变得繁荣富足起来，与罗马发生竞争。政治生活被行省将军的竞争对手搞成了一场灾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了皇帝。在第三阶段，边缘地区与罗马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行省开始宣布享有自治地位。尤其在西罗马帝国，情况已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权力、资源中心的转移是导致帝国晚期悲惨命运的隐患之一。[**伊利里库姆**] [**鲁格敦乌姆**]

[186]

伊利里库姆（ILLYRICUM）

罗马行省伊利里库姆占据了亚得里亚海东岸，位于意大利的伊斯特里亚区与希腊的伊庇鲁斯行省之间。北部越过达拉沃斯河与潘诺尼亚比邻，东部毗邻麦西亚与马其顿。希腊人称之为伊利里亚的蛮族（Illyris Barbara），因其隶属于未被马其顿的腓力普征服、仍保持自由的古代伊利里亚的一部分。在帝国时代，它被分为三个行政辖区——海边的利布尔尼亚（Liburn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内陆的拉皮第亚（Lapidia）。除了西斯基亚（现代的萨格勒布 Zagreb）和纳罗纳（Narona，莫斯塔尔 Mostar）以外，其主要城市都是海港——塔尔他提卡（Tartatica）、阿戴尔（Ader，扎达尔 Zadar）、萨罗奈（Salonae，斯普利特 Split）、伊庇达乌鲁（Eridaurum）。最南端的堡垒利苏斯城（Lissus）是公元前 385 年叙拉古殖民者建造的。（见原书附录Ⅲ，第 1231 页）

伊利里库姆是分步骤表示臣服的。最初于公元前 229 年开始向罗马纳贡，在二世纪马其顿战争中，曾两次被侵占。公元前 23 年，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彻底被兼并。公元 6—9 年，参加了帕罗尼亚大起义，在帝国时期一直被保留到拜占庭时期。

我们关于古代伊利里亚人的情况知道的不多。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可能是现代阿尔巴尼亚语的潜在基础。物质文化以其成熟的铁器制品闻名。从六世纪开始，其"Situla 艺术"就以雕刻在铜制酒桶上以宴饮、赛车、赛马为背景的精美浮雕人物肖像而声誉鹊起。三世纪时制造出一枚银币。伊利里亚战士打仗时披链子铠甲，像斯基泰人一样，但不像凯尔特人那样驾驶战车。[1]

伊利里库姆出过两位罗马皇帝和圣徒哲罗姆（Jerome）。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曾退居到建造在他的故乡萨罗奈（Salonae）海边的宏大宫殿里。他的八角形陵墓被保存下来，成为基督教的教堂——这座基督徒迫害者的陵寝的命运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圣徒哲罗姆公元 347 年生于斯特里都（Strido）附近，比第一批斯拉夫人，即后来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译者注）的祖先要早 200 年。

伊利里库姆像不列颠一样，属于被移民大潮彻底改变了民族与文化联系的众多罗马行省中的一员（见第 4 章）。但是，伊利里亚人的心目中还珍藏着对祖先的回忆。他们所秉承的遗产同那些对罗马一无所知的某些欧洲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伊利里亚]**

[187]

鲁格敦乌姆（LUGDUNUM）

公元前 43 年，执政官穆尼阿图斯·普兰库斯（Muniatus Plancus）为一座俯瞰莱茵河与塞纳河的新城市勾画了一幅蓝图。鲁格敦乌姆将成为罗马高卢的重要城市，成为星状道路网络系统的交汇点。从佛维埃拉斯山（Fourvières）上还能望见其半圆形剧院。它不仅管辖罗讷河——莱茵河走廊，而且辖制从意大利到海峡之间的西北要道。[1]

罗讷河，尽管通航，却是一条多变、湍急的河流。在下游，船舶冒着被无数礁石和岛屿撞沉的危险航行。在上游，它们只能靠马匹拖拽着逆流而上。在 1821 年蒸汽机船到来之前的数十年中，共有 6000 匹马在河岸两侧的纤道上劳作，它们先把驳船拖到里昂，然后乘木筏顺流而下，返回原地。

从 1271 年到 1483 年，在罗讷河下游形成了一条国际边界。左岸称作帝国（l' Empi），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右岸及其岛屿属于法兰西王国（Le Riaume）。在日内瓦和阿尔勒（Arles）之间修建了 15 座石桥；好几个地方还设立起姊妹城，如瓦伦斯（Valence）和比奥凯尔（Beaucaire）就是在彼此的对岸发展起来的。

在同一时代，里昂恢复了从前它在古代高卢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优势。腓力普·勒·贝尔（美男子）（Philippe le Bel）1311 年 3 月 3 日进入该城，使之并入法兰西。从此，它就位居连接法国南北两部分领土的“法兰西地峡”之首。从 1420 年起，里昂每年举办四次国际贸易集市；1464 年得到特权，目的是挤垮日内瓦的商业；从 1494 年到 1559 年，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国对意大利作战的基地。里昂的商业精英具有一个突出特点，他们出自许多意大利家族，包括美第奇（Medici）、格瓦达尼（Guadagni，噶达尼 Gadagne），还有许多姓格诺埃斯的（Genoese）。这座“生机勃勃、果敢坚定而又神秘莫测的城市”，“陷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旋涡和节奏之中”，使自己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导中心”。[2]

“里昂老区”（Vieux Lyons）是依偎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街区，它能唤起人们对城市黄金岁月的回忆。山坡上街道狭窄，杂乱无章的社区连接着纵横交错的“公交车线路”（*traboules*），沿线充斥着华丽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的宾馆、花园、广场和教堂。从“天主教唱诗班学校”（*Manécanterie*）到“犹太区”（*Rue Juiverie*）的加达涅旅馆（*Hotel de Gadagne*），这些名字令人联想到过去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那多姿多彩的生活。巴勒克宫（*Palace of Bellecour*）建于路易十四（*Louis XIV*）时期，坐落在河流交叉处的平原上。宫中的太阳王塑像是从巴黎经海上运来的，在转运途中不慎落水，人们不得不从河里把它捞出来。

考虑到里昂的战略位置，及其以丝绸为基础的工业能力［**雅卡尔**］，地理学家感到奇怪，为什么它没有胜出巴黎而成为法国首都呢？这只是一个存在着可能性，但不现实的美好构想。从1311年起，里昂不得不屈居法国第二大城市。地理只决定什么是可能的，并不决定哪种可能性会实现。“国家就是一座贮藏着大量潜能的仓库”，这位大师写道：“大自然只是播下了种子，人们将决定它们的用途。”[3]

帝国的财政像行省一样分裂成两块。元老院的金库（Aerarium）是继承了设在萨图恩（Saturn）和奥普斯（Ops）神庙中的共和国国库而来的。皇帝的小金库（Fiscus）是奥古斯都的发明。理论上，它同皇帝的私人财产（patrimonium Caesari）相分离；实际上，二者之间的界限无人理睬。主要收入款项包括：意大利国有土地的租金，行省的贡赋、关税（portaria），国家对盐业、冶金业的垄断，对奴隶、释放奴隶、遗产继承，以及特殊借贷所征收的直接税。除了用于军队开支以外，主要开销包括宗教庆典仪式、公共设施建设、行政管理、济贫救困、调剂粮食价格，以及应付帝国法院的开支。帝国代理官员曾一度掌管罗马城以外所有的税收。

军队的规模和力量逐渐增强，公元前31年达到了最大规模，约有60支军团。亚克兴战役之后，帝国常备性国防军队由28支军团组成，每支军团有大约6000名职业军人。海军在莱茵河、多瑙河地区保持分遣队（squadron）编制，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从公元前2年起，奥古斯都创制了由精锐御前侍卫组成的九个编队（cohort），使其驻扎在罗马。士兵的年薪为侍卫（preatorian）720便士，骑兵225便士，军团士兵（legionary）225便士，服役期均为二十年。

各军团都有编号和名称。奥古斯都保持了他自己的军队和马可·安东尼军队的连续性编号，同时把不同的名字赐予带有同样编号的部队。因此，就有奥古斯塔第三军团和昔兰尼卡第三军团，维克特里克斯第六军团和法拉塔第六军团。有几个军团拥有同一个编号I，这是因为皇帝喜欢使他自己组建的部队享有高级地位。在战场上被消灭了的军团，例如，在日耳曼尼亚丢掉的XVII、XVIII、XIX军团，或者是公元120年在不列颠全军覆没的西斯帕纳第9军团，从此再也没有

重新组建。

边防线（limes）是最具特色的帝国防御体系。它不像人们曾经以为的那样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军事角度看，它最多不过是一道[188]警戒线，或者说一系列平行的警戒线，其用途是抵御偶尔发生的外敌侵袭。与此同时，当边境遭到严重破坏时，能启动积极有效的反击措施。这是一条除非通过缴纳关税（*portaria*）和接受帝国的权威才能穿越的防线。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标志，它标示出哪些领土是服从罗马法律的，哪些领土是不服从罗马法律的。它最大的特点是连绵不断。蜿蜒于山岭和溪谷之间，绵绵不绝，沿途经过边境上的所有河流和海岸。在某些地区，例如在不列颠，它的形状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其他地区，它有时由一些筑在土垒上的木栅栏构成，或者是一列长长的海滩工事，或者像在非洲的边防线那样，由一块块面向内陆荒漠的设防的农舍群组成。在它守卫的交叉路口，城关和通衢大道历历可见。边防线所在地自然成为在军营近旁滋长出来的市镇的中心，也是边境集市的中心。

多亏有了边防线，罗马才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同蛮族的关系。在整个帝国时期，蛮族军官和辅助部队都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蛮族部落经批准被安置在帝国的各个行省。蛮族的罗马化和罗马人的蛮族化的过程，早在共和国征服意大利之初就已在运行之中了。恺撒的“长裤元老”毕竟是些具有高卢血统的罗马人，他们仍然喜欢在宽外袍（toga）的下面打上本民族的绑腿。

人们常说，社会风气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就像死鱼先从头烂起。罗马早期帝王名录中的腐败堕落行径简直罄竹难书。

提比略皇帝（14—37年在位），是奥古斯都的养子，离开罗马前往卡普利，行为残忍而不正常。在他统治下，大规模集体屠杀再次盛行，告密者们的致命投诉更是火上浇油。卡里古拉（37—41年在位）在生前就宣布自己为神，并把自己的一匹坐骑任命为执政官。“他有一个习惯，轮番同他的三个姐妹发生乱伦关系，”苏埃托尼乌斯写道：“在大型宴会上，当他的妻子们斜靠在他身上时，他把她们轮流压在身子下面。”“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无法无天，他宣布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若提到山羊，就犯下了死罪。”[19]他遇刺身亡，刺客恰恰刺中他的生殖器。克劳狄乌斯（41—54年在位）娶了两个搞暗杀的女子为妻，美塞利娅（Messalina）和阿古利庇娜（Aggripina），他因服食了一份掺有毒菌汁的蘑菇而中毒身亡。[20]

尼禄皇帝（54—68年在位）是一个疯狂的唯美主义者和纵欲狂，[189]他刺死了自己的母亲（在迫使她流产之后）。他用剂量足以致命的泻药谋杀了亲姑母，以不成立的通奸罪名处死了第一任妻子，把怀孕的

第二任妻子活活踢死。"除了引诱自由清白的男孩和已婚妇女以外，"苏埃托尼乌斯写道："还奸污了维斯塔贞女鲁布里娅（Rubria）。"接着：

> 他阉割了小男孩斯波鲁斯（Sporus），把他打扮成女孩，与他举行婚礼，嫁妆、新娘的面纱和全套仪仗应有尽有，全体皇室成员都出席陪伴，然后把他领进家，待之如妻子一般——如果尼禄的父亲多密提乌斯（Domitius）也有这样一个妻子，世界就有福气了。[21]

最终，他自杀身亡，留下一句话："这么伟大的艺术家竟随我一道灭亡。"

伽尔巴皇帝（Galba，公元68—69年在位）是一介武夫，被叛军所杀，死于"四帝统治之年"，奥托（Otho）和维特里乌斯（Vitellius）是其继承人。韦斯巴芗（Vespasian，公元69—79年在位），一个行省税吏之子，"宁肯站着死"，并最终如愿以偿。他的临终遗言是"哎呀，我一定是变成神了"。[22]提图斯（Titus，公元79—81年在位）很可能是被其兄弟毒死的，他给罗马带来了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惟一不幸的是发生了维苏威火山喷发。投毒嫌疑人图密善皇帝（Domitian，公元81—96年在位）被妻子和亲信刺杀而死。陆陆续续继承皇位的十个奥古斯都中有八位都死得十分可耻。[**潘塔**]

[190]

潘塔（PANTA）

公元79年8月24日，庞贝城被掩埋在五米厚的火山灰烬底下，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类生活全被毁灭殆尽，无论是典雅的、世俗的，还是丑恶的。然而，自1869年以来，当庞贝城被挖掘出来后，历史生活中崇尚情爱的一面，被正式披露出来。大批藏品在十九世纪被视为淫秽物品，因而被封存在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的"禁区"长达数十年之久。[1]

相比之下，庞贝的性交易简直达到赤裸裸的、鲜廉寡耻的地步。妓院，或称为朱壁纳里（Iupinari）坐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开打出花魁名录和价目表的广告。最便宜的女郎，如苏塞莎（Successa）和奥普塔塔（Optata）值两阿斯，斯帕兰妲（Speranza）值八阿斯，阿提卡（Attica）值16阿斯。妓院外边贴着禁止偷窥的告示。其中有一条写着："闲人不得在此——统统走开。"妓院

之中张贴着刺激嫖客的图画。即使在私人房中，反映性主题的画和雕塑也寻常可见。描绘城市的“神秘”崇拜的壁画具有半神圣的特点。巨型阴茎造型随处可见，它们被做成油灯支架、喜剧画幕的装饰品，甚至被做成饮水杯的喷嘴。还有一些寻常可见的诙谐的小玩意暴露出了男神们的神圣武器，还有表现潘神正在同一头仰倒的母山羊交媾的形象的东西。

城里的妓女大多有名有姓，或者像女戏子那样有艺名（noms de scene），如潘塔（浑身上下），库莉波尼娅（可爱的屁股），卡莉特莱米娅（超级胯骨），拉克莎（口大的），兰迪库莎（大阴蒂），或埃克斯塔莉奥莎（黑阴道）。她们的主顾也有名字或绰号。有一个叫恩克里奥奈的（勇敢的酒鬼），另一个叫斯库多婆多尼库斯的（吃大蒜的能手 garlic farter）。庞贝最大的一家妓院的老板在火山喷发的前不久死去了。他的仆人在大门上刻了一段悼词：“对于所有悲伤的人来说，阿非利加努斯已经过逝了。鲁斯提库斯谨记。”这种交易既是双性的，也是双语的：男童出租，两性皆可满足，取乐的语言既可讲希腊语，也可讲拉丁语。基本词汇包括“操”、“急茬儿”、“口交”、“阴茎图像”、“男性生殖器”、“阴茎”、“贱货”、“骚货”、“母狼”。

大多数的感想都被刻写在墙壁上，古代极乐的时刻与灾难降临的时刻都被永久保存下来：

多少女人才能使一个风流公子心满意足[2]

打住，伊卡鲁斯（希腊传说中人物）锁住了你的双足[3]

重束衣衫之后，我开口讨要一缕青丝作报酬[4]

女郎们用牧羊拐杖抽打你……贱货们傲慢地把你打发……一次又一次地将你扔在一边……

这里是交欢场所……[5]

你必强令她们折腰[6]

麦西乌斯一个都没搞到手[7]

然而，罗马盛极而衰的时期还未到来。“如果要某人从世界历史上划定一个人类最幸福、最繁荣的时期来，”吉本写道：“他将毫不犹豫地指出是从图密善（Domitian）皇帝之死到康茂德（Commodus）即位这一时期。”[23]在涅尔瓦（Nerva，公元 96—98 年在位）、图拉真（Trajan，公元 98—117 年在位）、哈德良（Hadrian，公元 117—138 年在位）、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 138—161 年在位），以及

马可·奥略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年在位）诸帝统治时期，帝国的地理界限不但达到最大，而且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与稳定的时代。涅尔瓦开创了朴素浮雕的传统，图拉真是一位诚实而不知疲倦的战士，哈德良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的保护人。关于安东尼·庇护，吉本写道："他的统治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关于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的记录。"[24]

帝国全盛时期行政管理的具体情况保存在图拉真皇帝与贝塔尼亚—本都（Bithynia - Pontus）行政长官小普林尼的多卷往来书信当中。

普林尼：尼凯亚（Nicaea）花了1000万塞斯塔尔维修一个残破的剧院，还花了一大笔钱修建一个被火烧了的运动馆……在克劳狄奥波里斯（Claudiopolis），他们在山脚下挖了一个浴池……我该怎么办？

图拉真：你在现场，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至于建筑师的问题，在罗马，我们是派人去希腊找建筑师的。你应该在当地寻找。

[191] 普林尼：支付给行省城镇的钱已调入，没有人愿意按百分之十二的利息贷款，我是否该降低利息？……或者强迫议员们按照相等份额借款。

图拉真：把利息减低到足以吸引借款人，但是不要强迫任何人借款……这种方式与我们的时代精神不相符合。

普林尼：拜占庭的一支使团由下麦西亚指挥官派遣而来……前来守护其特权。朱利奥波里斯（Juliopolis）……也要求享有同样的优惠。

图拉真：拜占庭是个伟大的城市……但是，如果我支持朱利奥波里斯的话，所有的小城镇都会提出这种要求。

普林尼：一场大火烧毁了尼柯米迪亚（Nicomedia）。是否应建立一个由150个消防队员组成的社团？

图拉真：不行。那些合作团体，无论其名称如何，必定会演变成政治团体……

普林尼：我从未处理过涉及基督徒的问题，因此，我不知道他们因何故……而应受到惩罚——那些悔改的人能否被宽大？他们受惩罚，就因为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吗？

图拉真：不必搜捕基督徒。如果他们被带到你面前，并且认罪的话，那么必须对之严惩不贷。但是，针对他们的匿名控告不应对判决结果产生任何影响。[25]

罗马因马可·奥略留（161—80年在位）而拥有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皇帝。作为伊壁鸠鲁学派的门生，他把自己训练得能够经受长期战

争的严酷考验，行政事务的沉重负担，以及放荡家庭生活的各种要求。他在“写给自己”的笔记，著名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中流露出最真挚的情感：

一个智慧而善良的人除了对待一切事务都心平气和、泰然处之以外，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他不会怀疑深藏于胸中的神圣信条，绝不用纷繁芜杂的虚幻追求去扰乱内心的平静……他的一言一行都严格遵循真理与正义；尽管他诚实、谦虚的品格受到人们的诽谤……却将别人的猜疑置之不理，绝不偏离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道路，每个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纯洁的良心踏上这条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毫不犹豫、无怨无悔地接受自己的命运。[26]

马可·奥略留深刻地感知到他是谁，他在哪儿：

作为安东尼乌斯皇帝，罗马是我的城市和我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世界公民——亚细亚和欧罗巴仅仅是地球的一角，大洋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圣山（Athos）只是宇宙中的一颗沙粒。眼前的光阴同永恒相比只是一瞬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微小的，变化的，会腐朽的；然而，万事万物的运转——都是合乎理性的。[27]

到公元三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呈现出种种内部痼疾所具有的外部症状。政治腐败明显表现为中央缺乏决断力，以及周边地区失控。从公元180年以后的90年当中，有不少于80个短命的皇帝合法地，或非法篡夺了王位。“加里埃努斯的统治，”吉本写道，“只不过使得19个冒牌货登上了王位——从茅屋到王位，从王位到坟墓，其更迭速度之快、之频繁，可供一个平凡的哲学家思索消遣。”[28]军队对平民长官发号施令而不受追究。蛮族涌入边防线，往往无法阻止。哥特人的骚[192]扰变成了永久占领。268年，他们攻陷雅典。在一个叫波斯图穆斯（Postumus）的人的领导下，中部高卢出现了一个破碎的“帝国”，在帕米拉（Palmyra）也出现了一个。由于难以强迫人们崇拜那些无用的、昙花一现的皇帝，结果导致对逐渐发展壮大的基督徒社团的新一轮的迫害。从250年到265年，瘟疫席卷了许多地区。有一段时期，仅罗马一地，一天当中就有5000人死亡。饥荒接踵而至。一时之间，物价昂贵，货币随之严重贬值。马可·奥略留发行了一种纯度为百分之七十五的帝国银币。一个世纪之后，在加列努斯（Gallienus）统治时期（260—268年在位），银币的不纯的成分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赋

税增多。帝国的官员们在边疆行省聚敛财富。在其他地区，许多行省的中心都衰落了。圆形剧场被拆掉，为防御墙提供石料。

甚至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305年在位）——他在位21年，被视为“新帝国的奠基人”，但情况也未有所好转。四帝共治，即由“四个统治者”把帝国一分为二，各自拥有自己的奥古斯都及其代理人恺撒，目的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和边疆防御。军队急剧扩大，同时也造成官僚机构的膨胀。物价上涨得到了控制，但人口增长率却未降低。对基督徒的迫害仍在继续。304年，罗马举行了一场宏伟的凯旋仪式，但这却是最后一次。一年以后，戴克里先被罢黜，退居故乡达尔马提亚。

弗拉维乌斯·瓦拉里乌斯·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后来被称作“君士坦丁大帝”，生于上麦西亚的奈苏斯（尼斯，现位于塞尔维亚，而不是吉本所说的达契亚）。其父康斯坦提乌斯·克罗鲁斯是戴克里先的西部帝国的恺撒，即位不久就死于埃波拉库姆（约克）。其母海勒娜是不列颠的基督徒，传说她发现了真正的十字架。君士坦丁把分成两半的帝国统一起来，并且在《米兰敕令》中宣布普遍实行宗教宽容。在其执政的两个关键时刻，他声称看到了异象。起初，据说他见到的异象是阿波罗神，后来变成了十字架，两次都带有这样一段文字：“你将藉此征服。”他同罗马公民发生了争执，决定把首都迁移到博斯普鲁斯岸边。他临终时正式接受洗礼变成了基督徒。就这样，当罗马的皇帝改宗成为基督信徒时，罗马就不再是自己所创造的帝国的中心了。

基督教

基督教起初并不是欧洲的宗教。基督教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像它们一样出自西亚；然而，在好几个世纪中，欧洲并不是基督教最密集的地区。

拿撒勒（Nazareth）的耶稣（Jesus，公元前5年—公元33年）是一个不肯妥协的、云游四方的传道者，生于罗马行省犹地亚（Judaea），时值奥古斯都统治中期。他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遭处决，被钉上十字架，当时是提比略统治时期（公元14—37年），在本都·彼拉多（Pontius Pilatus）为地方官之时，他的首名（praenomen）不[193]详，这人是罗马骑士，后来在高卢的维也纳服役。据报道，尽管未发现耶稣有什么过失，但是，地方官应犹太祭司们的请求，仍将他判处死刑。[**十字架**]

[194]

十字架（CRUX）

像方块、圆圈、三角、箭头、缺口标志一样，十字形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不可低估的重要符号。有时它被称为“符号中的符号”，在科学上，它表示“加”，“以上”和“正的”。然而，由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缘故，它很早就成为基督教的重要象征。

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到处可见：在教堂，在墓地，在公共纪念碑上，在纹章上，在国旗上。基督徒凭着十字架标志接受洗礼，接受教士的祝福，他们因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向神祷告或聆听布道时画十字的方向恰好相反，而彼此区别开来。人们发现基督教的十字架具有多种变形，每一种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或装饰含义。[1]（见原书附录，第1229页）[国旗]

然而，前基督教符号，在欧洲曾长期与基督教符号并存。最著名的是古老的 swastika“弯曲的十字架”，这个名字出自梵语“良好的”一词。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当它的折钩朝左时，意味着“厄运”，而折钩朝右则是“幸运”。斯堪的纳维亚的十字架的形状被认为是代表两条彼此交叉、电光闪闪的雷电，或者说是两条交叉在一起擦出火花的棍棒。圆形的凯尔特十字架在爱尔兰很常见，它代表太阳。[2] 几千年过去之后，异教的纳粹党徒选择了一个现代版的十字架（hakenkreuz）作为党徽。

另一个东方与非基督教象征符号的转化例子是古代撒马提亚（Sarmatian）的“图形卜辞”（tamgas）。Tamgas 有时代表某些简单的会意汉字，作为中世纪早期进入近东的突厥诸部落的标志，它们再次出现。人们认为，西方的十字军武士们在圣地见到的伊斯兰教徽章制度就是通过这条途径传来的。[3] 与此同时，它们与较晚时期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波兰徽章体系中的符号惊人地相似。结果，学者们猜测这种相似性表明波兰贵族是撒马提亚人的后代，这种说法可能并非无稽之谈。他们所谓的“撒马提亚观念”，他们的徽章化的氏族，以及他们卓越的骑兵传统，都与失踪已久的东方鞍蹬骑士有关系。一种假说认为，关于波兰的撒马提亚因素，最好的解释是，它们是公元四世纪消失在东欧森林中的撒马提亚诸部落留下的遗产。[4]

撒马提亚标志



波兰氏族的徽章标志



(波兰氏族的徽章标志：Abdank，Leliwa，Nałęcz，Radwan，Bogorija)

符号能唤起最深厚的感情。当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建立时，只有少数欧洲人意识到它将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同情标志。然而，它不得不通过适当方式以红新月、红狮、红星标志为辅助。同样，当一个基督教十字架在奥斯维辛（Auschwitz）前纳粹集中营的旧址竖立起来时，却遭到激烈反对，尤其是那些不了解集中营中的死难者包括大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人更是反对。1993年，九年的诉讼终于结束，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创建一个欧共体的纪念中心。[5] [**奥斯维辛**]

根据四个短篇福音书所提供的证据，其中有重复，也有矛盾之处，我们了解到少量耶稣生平事迹。没有任何历史档案提到过他，罗马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关于他的线索。他甚至没有引起当时的犹太作家如约瑟夫、斐罗等人的注意。他的个性化的教导是通过大量的比喻，通过他在各种偶发事件中和创造奇迹的过程中留下的名言，通过他与追随者们的谈话，通过一些警语名句而广为人知：例如他在山顶的布道，他在神殿中、法庭上的应答，在最后的晚餐上的话语，在十字架上的遗言。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Messiah)，即犹太教经书所预言的救世主；但他把卷帙浩繁的经书压缩为两条简单的戒命：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

音22：37—9）

耶稣并没有向世俗权威发起挑战，只不过有时偶尔强调："我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团体，没有教会或僧侣集团，没有政治遗嘱，也没有福音书；只给门徒们留下一些高深莫测的教诲。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4—5）

基督教有朝一日会变成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实在是难以预料。历代基督信徒们都把基督教的胜利仅仅视为上帝的意志。这一点从未被认真地讨论、分析过。但是，对于世纪之初的许多罗马人来说，这件事一定非常令人吃惊。耶稣一直被视为一种无名的、地方性的现象。他的追随者们，外人把他们的信仰同犹太教弄混淆了，看起来不像要建立一个普世性宗教。奴隶和淳朴渔夫的信仰并不为阶级和社团的利益谋福利。他们的福音书在精神上的"上帝的王国"与恺撒的统治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线，看来早已放弃了任何尘世的野心。即使当他们人数多起来，因拒绝参与帝国的崇拜而遭到迫害时，基督徒也很难被视为是主要的威胁。[启示录]

[196]

启示录（APOCALYPSE）

帕特莫斯（Patmos）是欧洲最边缘的一座海岛，靠近爱琴海的亚洲海岸。公元一世纪，该岛被附近的罗马城市以弗所用作监禁地。此地正适合编撰基督教圣经的最后一卷。

启示录的作者名叫约翰。他从未像后来的传统所说的那样，自称是十二使徒之一的圣约翰，他的外形和长相也与第四部福音书不太吻合。他因宗教原因犯事而被流放，写作时间很可能在公元81年和96年之间。

圣约翰的神圣启示录记载了一系列神秘的幻象，与犹太人的启示文学如出一辙，预言现存秩序的终结。对于其中各种奇异的象征物的解释——羔羊、七封印、四兽和四骑士、巴比伦的大淫妇和红龙，等等，一直令基督徒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心章节的内

容讲的是同反基督势力作斗争，里面有丰富的魔鬼论思想。[**魔鬼**] 结尾部分，第21—22章提出“新天新地”的观点。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在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1)(启示录21：4—6)

当然，有人会说，基督教强调内省的生活可以填补精神空白，而罗马生活方式不能提供帮助。而且，关于救赎、死后升天的基督教义一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人们也不难理解帝国官吏所进行的抵制，例如贝塔尼亚的小普林尼（参见第162页）。有一件事决定了古代世界已经成熟到足以接受一个新的宣扬“拯救”的宗教的程[195]度；无须解释为什么是基督教，而不是别的宗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所有质疑基督教会兴起的作品中，无人能及得上爱德华·吉本。吉本的《衰亡史》一方面堪称最辉煌的英语史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反对教会脱离基督教原旨的最坚决的论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坦诚而理智地考察一个纯洁、卑微的宗教是如何建立、演变，最终在卡皮托山顶竖立起十字架的胜利旗帜”。[29]（参见原书附录Ⅲ，第1236页）

基督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在基督遭磔刑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基督社团在东地中海地区绝大多数的大城市里建立起来。圣保罗主要在讲希腊语的东方城市活动，他的作品构成新约的主体部分，他是第一个长途跋涉到处传教的基督教领袖。圣彼得是基督最亲密的门徒，据说乘船航行到罗马，于公元68年殉道。福音书从罗马传到从伊比利亚（Iberia）到亚美尼亚（Armenia）的帝国各个行省。

毫无疑问，被称作圣保罗的来自塔尔苏斯的扫罗是关键性人物。他生为犹太人，受的是法利赛人（Pharisee）的教育，他参与过早期犹太人迫害基督信徒的行动。大约公元35年，在耶路撒冷，他在现场目睹了第一个基督徒殉道者斯蒂芬（Stephen）被石头砸死。但是，他在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上突然转变了信仰，此后接受洗礼，变成了新生之路上的最积极的改宗者。他的三次传教旅程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他取得了各种不同的成功。53年在雅典，他发现了一座献给“未知的神灵”的祭坛。犹太人对他心存敌意，希腊

人也对他表示怀疑。

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雅典人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徒行传 17：18—21)

他去过两次科林斯，在意气相投的同伴那里逗留，很可能就是在[197]那里写下了致罗马人的书信。在返回耶路撒冷时，他被起诉违犯了犹太法律，但作为罗马公民请求在罗马受审。一般认为，在尼禄迫害时期，他死于罗马。

圣保罗的贡献主要在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作为十二使徒，他建立起这样一项原则，新道不再是犹太部落所掌管的东西，它向所有前来的人敞开。"再也没有犹太人与外邦人之分，没有受束缚的与自由的区分。"另一方面，他奠定了其后所有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有罪的人性通过基督的神圣的怜悯而获赎，基督的复活突破了旧律法，并开创了精神领域的新时代。基督不只是弥赛亚：他是圣子，他的神秘躯体得到了教会的确认，信徒们通过忏悔和圣礼得以分享，直到他第二次降临。耶稣是启发这种灵感的惟一源泉，但正是圣保罗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富有凝聚力的宗教。[**贞洁**]

[198]

贞洁（CHASTITY）

终身放弃性行为这层意思上的贞洁，被早期基督徒所吸收，作为其道德准则的核心特征。古代人并非对此一无所知，尽管尤文那提到，"自从萨图恩神即位之后"就再也无人保持贞节了。异教中纯洁观是通过女祭司守节实现的，例如罗马的维斯塔贞女，若破坏了贞操就会被处死，在犹太人的世界，是由清一色的男祭司守节的。但贞洁从未被当做一种普遍的理想。

终身追求童贞生活确实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它威胁家庭，这一最受尊重的罗马生活制度，它还破坏婚姻。在婴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不超过 25 岁的世界，成年的家庭主妇平均要怀孕五次才能维持人口数。成年人中的独身主义严重危害物种的再生产。

然而，基督徒对贞洁抱有不懈的热情。从圣保罗以来，他们不断谴责"肉体的枷锁"。"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戒律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戒律交战，把我掳去

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1]

保罗的教导之所以受欢迎，只能片面地用这种说法解释，即精神生活要求摆脱所有世俗成见。相信"再临"即将到来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这种信仰认为人口繁殖过剩了。性器官受到谴责，因为它使自由意志丧失殆尽。许多人以为孩子的性格是由父母结合时的体液所决定。这种观念制造出更多的禁忌，因为情人们会害怕不纯洁的性爱感情会毁掉他们生的孩子。加兰报道了一种荒谬之极的医学观念，竟然认为精子是从沸腾的热血泡沫中产生的。对于男人来说，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失控。对于女人来说，终身保守贞操似乎是摆脱专横的丈夫和传统家庭义务，获得自由的最佳方式。因此，一般看来，性是一种使"父辈的罪"代代相传的机制。

386年8月，在米兰发生了一起自我供认的通奸犯改宗事件。圣奥古斯丁的《供认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使人们能够深入了解她保守贞洁的内心活动。然而，当时距离圣保罗的年代已有300年之久了。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社团感到需要发展壮大。

因此，次等的理想——基督教婚姻在头等理想——基督教贞洁的身边复苏了。婚姻正式作为一种制止性措施保存下来，它帮助那些缺乏自制力的人们抵御诱惑和私通。圣保罗写信给科林斯的基督徒说："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2]

在中世纪，这种"肉体的骚动"继续摇摆不定。世俗的拉丁牧师加入了修道士的行列保持独身。"童贞圣人"普遍受到尊敬。对童贞玛利亚的崇拜，纯洁的受孕与生育，被置于同三位一体信条类似的地位上。基督教禁欲主义者实践了各种对思想和肉体的限制方式，自我阉割亦不排除在外。

贞洁的历史是《心理》（*Mentalités*）一书研究中的一个主题，该书十分有助于现代读者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它是进入所谓"灭绝已久、沉默至深的世界"的入口。对神职人员的研究，查出了希腊拉丁传统中教会神甫关于贞洁争论的线索，但没有提到当时人们对性的态度，它定然被早期基督徒们视为暴君。然而，它给每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同于过去，往往将贞洁，如习语所说，视为最违反天性的禁欲现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彼得·布朗总结说："早期基督教的禁欲、节欲、独身和童贞生活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冰冷的颤音——无论他们声称

会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多少帮助、多少好处，读者们——必须自己做出决定。”[3]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这件事影响深远，尤其在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关系方面。公元70年犹太人起义之后，离散的犹太人开始广泛散布到欧洲各地。犹太教不再局限于犹太地区（Judaca），“圣经民族”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成为一支宗教性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基督是个假弥赛亚，一个篡权者和背教者。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是一种威胁和祸患，这个危险的敌人劫持了圣经，并破坏了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区别开的神圣禁忌。对于基督徒来说，犹太人也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他们是基督的同胞，但不承认他的神圣性，他们的领袖还把他逮去处死。大众传奇故事和后来的官方神学曾一度把犹太人视为“杀死基督的凶手”。

犹太—基督传统之间的分裂加深了双方背离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基督教同犹太教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与其他宗教的冲突。这是没有解决的，也无法解决的家庭内部纠纷。从犹太教正统派的观点看来，基督教本质上是反犹主义的，反犹主义被视为一种特定的基督教现象。从基督教正统派的观点来看，犹太教本质上是反基督的温床，一个恶劣的失败者，永远是污秽、亵渎和羞辱的根源。尽管有宽恕的教义，但是，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使基督徒和犹太人承认他们是出自相同传统下的伙伴了。只有道行高深的基督徒才打算把犹太人称为“我们的老兄”。

基督教并不仅仅从犹太教而来。帝国时期的各种东方宗教都对它发生过影响，尤其是希腊哲学。圣约翰的福音书开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同其他三部福音书截然不同，那些书里没有如此明显的关于逻各斯（*Logos*）的希腊学说。现代学者在强调犹[199]太背景的同时，也强调希腊化的影响。亚历山大里亚的斐罗（Philo），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他试图调和犹太圣经与柏拉图主义，并且成就卓越。[**魔鬼**]

最新研究趋势显示，基督教与犹太教可能在两个世纪中并未完全分离。在数十年时间里，两个重叠的社团可能都对弥赛亚抱有同样的希望。在新近发现的《死海古卷》中保存的公元前200—公元50年的犹太文献同基督教福音书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种估计认为，基督徒与犹太人最终决裂发生在公元131年，当时，反对罗马的第二次犹太大起义的首领西蒙·巴尔克巴（Simon Bar - Kohba）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因而截断了两者之间的纽带。[30] [**复活节**]

[201]

复活节（PASCHA）

复活节是基督教历法中的一个重要节日，庆祝基督的死而复生。经过40天的封斋期，在从棕榈主日开始的圣周八天里达到高潮。在受难主日，从受难日正午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开始，悲痛达到顶点，到第三日终于迸发出了喜悦，在复活节的早晨，打开坟墓，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复活节在欧洲大多数语言中被称为帕斯卡（*Pascha*），一种变异的晚期拉丁语，源自希伯来语 *Pesach*，意为“逾越”。它在西班牙语中叫 *Pascua*，法语为 *Paques*，威尔士语为 *Pasg*，瑞典语为 *Pask*，俄语和希腊语为 *Paskha*。但是，在德语中却是 *Ostern*，像该词在英语中一样，源于日耳曼的春天女神爱奥斯图娅（Eostro，或奥斯图拉 Ostara）。由此可见，基督教吸收了早期的春节的因素，它标志着冬季之后生命的复苏；它也符合犹太教逾越节的象征，十字架上的基督变成了“逾越节的羔羊”。

名称上的区别反映出古时候复活节日期是不一致的。早期基督徒遵行犹太教逾越节的规矩，把复活节定于春分之后的第14天的满月之日。325年，尼凯亚的执政官决定将复活节定为随春分来临的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问题还不仅在于此，由于几个天文学体系并存，引起阳历年和阴历年的计算发生矛盾。起初，亚历山大的大天文台用数学方法计算，但很快发生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以及各行省拉丁教会之间出现重大分歧现象。387年，高卢于3月21日庆祝复活节，在意大利是4月18日，而埃及是4月25日。此后标准化的努力只取得了些许成果，3月21日和4月25日仍作为终极期限。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从未统一过。由于复活节是一个变动的节日，因此，基督教历法中所有依赖于它的节日，从圣灵节到升天日都随之发生变动。[1] 复活节在《圣经》中并无记载，惟独在1613年的英语核准本中的一段误译中出现，该书《使徒行传》12:4中以“复活节”一词取代了“逾越节”的位置。

两千年来，基督教世界每逢复活节就回响着基督“战胜死亡”的颂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这些颂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对于信徒来说，他们表达了对自身存在的最深切感受。古人们唱着

四世纪的歌谣“金色阳光迎来新的一天”，“斗争停息，战斗结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复活节颂歌有“欢迎愉快的清晨”，“国王的旗帜指引前进”和“歌唱辉煌的战斗”。最后这首歌由维兰提乌斯·福图纳图斯（约530—610年）作曲，他有时被称作波伊提埃尔的教皇。最优秀的希腊颂歌有“复活日”，有时和着兰开夏（Lancashire）曲调歌咏，由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作曲（约675—749年）。德国人唱 Jesus lebt！法国人唱 à Toi la gloire，O résuscité！波兰人唱 Chrystus zmartwychstan jest，希腊人唱 Hristos Anesti！英语世界的人们唱“基督吾主今日升天”，由查理斯·威斯利作词：[202]

石头、守卫、封条统统无用，
基督冲破地狱之门。
死亡挡不住他的复活。
基督开启天堂之门。
我们荣耀的君王再次复生；
死亡啊，现如今你如何能逞凶狂？
他的死拯救了我们的灵魂；
坟墓啊，哪里才是你的胜利？

哈利路亚！[2]

[202]

魔鬼（DIABOLOS）

所有构成欧洲文明的重要传统中都具有强烈的魔鬼意识。在史前宗教中，例如在异教的民间传说中，魔鬼常常化作一种带角的动物——龙、蟒蛇、安息日女巫的山羊人，一位颇有魅力的绅士，无法把他的尖角、尾巴和蹄子藏起来。在古典神话中，他是阴间的主宰，其身世可以追溯到吉尔迦美什（Gilgamesh）遭遇胡瓦瓦（Huwawa）的故事。[**史诗**] 在摩尼教（Manichean）传统中 [**保加尔派**] 是黑暗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他只不过意味着善的缺席而已。但是，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这个古老的坏蛋永远是颠覆分子（*diabolos*）和反对派。在《旧约》中，尤其在《约伯书》中，他是罪和无法言说的痛苦的制造者。在基督教传说中，基督在荒野中的试探者变成了撒旦和地狱中的魔鬼。中世纪的魔鬼学研究、圣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和上帝许可邪恶的讨论，以及弥

尔顿和歌德的代表作都以魔鬼为核心主题。近来欧洲人放松了警惕。但是，一部没有魔鬼的欧洲史将是不可思议的，如同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一样。[1]

无论最终分裂的时间如何，犹太教与基督教并存的现象并未被根除。两千年来，每周，总是犹太人先一步在星期五晚上庆祝安息日，随后，基督徒的安息日在周日到来。点亮蜡烛，祷告平安，活动的高潮是在打开经匣，诵读律法书《托拉》的时候：

[200]

托拉是生命之树，
倚靠大树的人们有福了。
它的道是通向快乐之道，
它的路全都指向和平。

经匣关闭；聚会者落座。[31]

早期基督教有许多竞争对手。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中，对伊西斯、西伯利，以及波斯太阳神密特拉斯的神秘崇拜都极具威胁性。它们具有一些同早期基督教一样的重要的特征，包括疯狂信靠神性的团体，人格化的救世主或上帝的观念，以及与洗礼有关的入道仪式。宗教人类学研究特别强调这些相似性。

诺斯替教（Gnosticism）也同基督教极为相似。起初，诺斯替教徒是一批“探索知识”的哲学家，但是其宗教特征更为突出。他们既大量借用犹太教的东西，又不断吸取基督教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有时被视为基督教的一个宗派。他们把制造了罪恶世界的造物主同那个至高无上的至尊者加以区别；在人的天性方面，也把人的邪恶的、肉体的存在与光芒闪烁的神性本质——正是它使得人们能够进入天堂世界，加以区别。《新约》中提到了西蒙·马古斯（Simon Magus）。约136—165年间，瓦兰提努斯（Valentinus）在罗马很活跃。巴西利德斯（Basilides）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活动。马尔基翁（Marcion，卒于160年）建立了一个诺斯替宗派，一直到五世纪。他训导说，基督的躯体并非真实的，因此复活不可能在任何肉体意义上发生。他否定《旧约》，坚信犹太教的耶和华，如果没有耶稣揭示的神之爱，将不能实现。这种“基督幻影论”（Docetism）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基督真实性质的基督学争论。

基督徒与诺斯替教徒之间的争论反映出人们需要一套被认同的文

献经典。哪一种神圣的经文是上帝授予的，哪一种只不过是人为的？这是一个在二三世纪一直萦绕在基督徒脑海中的问题，尽管直到367年，阿塔那西乌斯（Athanasius）在佳节书中（Festal Letter）才把这个问题明确表述出来。《新约》的核心——四部福音书和圣保罗的13篇书信，大约在130年被人们所接受，而《旧约》，即希伯来经典，除伪经以外，大约在220年被确定下来。其他经书，尤其是关于《启示[203]录》（Apocalypse）的争议，时间持续得更久。[**启示录**]

神学争论预示出教会权威正在千方百计地要解决这些问题。罗马的克雷芒（Clement，卒于约90年）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他继承和发扬了十二使徒的学说。基督教的首领们如果能够找出十二使徒之一曾授权于他们的线索，或者说，如果能找到证明他们是使徒所认可的继承人的线索的话，那么他们将获得权威。在圣保罗之前的第三任罗马“教皇”克莱门就是根据经文“你是彼得，凭着这块石头，我将建立起你的教会”要求自己的权利的。里昂教皇伊莱聂乌斯（Irenaeus，约130—200年）更加强化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反对诺替斯教派的文章中写道：

众所周知，最伟大、最古老的教会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建立的——其他教会，即那些由信徒们在其他地方建立的教会，应同罗马教会保持和谐一致，服从原始的权威。传统正是在那里，从十二使徒那里生发出来，并得以保留下来——[32]

这里已存在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本质。（见原书附录Ⅲ，第1224页）

随着时间推移，几个具有竞争力的对手被打败了，而罗马教会所阐释的使徒序列却从未被普遍接受。尽管，直接同基督使徒发生联系显然会带来荣誉。除了圣克雷芒以外，使徒神父们还包括安条克（Antioch）的伊纳爵斯（Ignatius），西拉波利斯（Hierapolis）的帕皮亚斯（Papias），以及被活活烧死的士麦那（Smyrna）的圣波利卡普（St Polycarp，约69—155年）。

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那些热衷于此道的团体所编撰的殉道史是难以解开迫害程度的谜团的。吉本写道：“四五世纪的教会作家把自己心中的不通融、冷酷无情的情绪强加到罗马官员们身上。”[33]虽然，确实发生了镇压事件。64年，尼禄把基督徒当做罗马大火灾的替罪羊，这是与普遍宽容的民族宗教信仰政策相对立的。例如，就犹太教而言，基督教曾被当做犹太教的同道。图密善下令把他本人当做多密努斯神加以崇拜，以无神论的罪名处决了抗拒这一命令的基督徒。马可·奥略留批准了177年在里昂进行的一次严厉镇压活动。但是，直到250年，德西乌斯皇帝（240—251年）才下令，凡是拒绝向邦神献祭的臣民将被处以死刑。又过了一段时间，

戴克里先于303年下令，摧毁所有基督教教堂，把所有《圣经》付之一炬。大规模迫害持续了十三年之久，成为下一个王朝宣布普遍宽容政策的序曲。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是罗马帝国向基督教的投降。**[地下墓穴]**

[204]

地下墓穴（CATACOMBI）

由于相信人死后会复生，所以在早期基督教社会中，葬礼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距离罗马的奥略留城墙（Aurelian Walls）两英里，在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附近，有一个区域是通向地下坟墓的（*Ad Catacumbas*），小心谨慎的早期基督徒把死者埋葬在那里的地下甬道中。自十六世纪发现了这些墓葬之后，共有42座此类坟墓得以确认，每个墓穴都有纵横交错的巷道，分为五到六层，把迷宫般的墓室与家庭入口（*loculi*）联系起来。最早的坟墓，例如，公元95年执政官之妻弗拉维娅·多密提拉（Flavia Domitilla）的坟墓，年代可追溯到一世纪晚期。但坟墓数目最多的时期是三世纪迫害时期。地下坟墓从未有人居住过，但是，后来在基督教统治时期，它们成为受人喜爱的聚会场所，人们在那里举行节庆，修建礼拜堂纪念主教和殉教烈士。大多数铭文是那时刻写的。例如，在普莱德克图斯（Praetextus）的地下坟墓中，有一篇铭文是献给教皇西克斯图斯（Sixtus）殉难的副主祭圣拉努阿利乌斯（St Lanuarius）的，258年8月6日，与他一起被捕：BEATISSIMO MARTYRI IANUARIO DAMASUS EPISCOP FECIT（主教达马苏斯建造此纪念碑献给吾主保佑的烈士拉努阿利乌斯）。

最大最复杂的要数圣卡利斯图斯（St Callistus）的地下坟墓，它是由奴隶出身、后来成为217—222年的教皇的人修建的，集教皇制陵寝之大成，包含了直到教皇密尔提亚德斯（Miltiades，卒于314年）的所有墓葬，圣塞西利亚（St Cecilia）之窖，萨克拉门兹（Sacraments）窖中收藏的壁画尤为突出。地下坟墓艺术是对精神生活、死后世界的高度象征。它所喜爱的花纹包括鸽子、猫、海豚和渔夫，好牧羊人（耶稣以此自喻，意思是时时看护、不惜献身拯救世人——译者注），以及预告复活的约拿。

五世纪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劫掠使得许多遗物转移到城市中的教堂里。耶稣再次降临的推迟逐渐使人们放弃了地下埋葬方式。

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窖是少有的几个仍时常被人光顾的地窖。中世纪的朝圣者们发现了它，并在里面躲避瘟疫。

在巴西莱奥（Basileo）坟墓旁边矗立着一座教堂，它是罗马最著名的基督教传奇的标志。沿着阿庇安大道逃离迫害之后，圣彼得在路上遇见了基督，并问他："主人，你往哪里去？"基督回答说："去罗马，准备第二次被钉上十字架。"彼得返回去，殉难而死。

42座坟墓中有三座是犹太人的，它们分别在维拉·托尔罗尼亚（Villa Torlonia）、维各纳·兰达提尼（Vigna Randatini），以及维尔德山（Monte Verde）。[1]

牧师制度，作为独立于俗人的团体，似乎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公认的领袖"主教"（*Episcopos*）和"副主祭"（*diaconus*）的职位在"教士"（*prebyter*）之上，发挥着专职僧侣的作用。任何一个行省或乡村的大主教的"教父"头衔，曾经长期用法不一。没有关于罗马大主教[205]的身份地位的特殊规定。其因领导帝国首都的基督教社团而拥有的权威，随着帝国政府不再定都于此而衰落了，并导致罗马的基督徒遭受更大的迫害。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有一长串主教登上了"圣彼得的宝座"，但他们不是作为一支教会的领导力量出现的，直到五世纪，有人认为直到七世纪，他们才取得领导地位。

"教会教父"是一个自四世纪以来用于指称先前时代的基督教领袖的集体标志。从雅典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到特图里安（Tertullian，155—255年）的辩护士们澄清了最终成为正统信仰的教义。其他，如希波莱图斯（Hippolytus，165—236年）、克雷芒（Clement，约150—215年）、奥勒根（Origen，185—250年）、迦太基的塞普里安（Cyprian，卒于258年）因维护信仰，同异教和异端作斗争而受到尊敬。全套"教父文献"直到收录了圣约翰·克莱索斯图姆（St John Chrysostom，347—407年）的作品之后才被最终审定。

异端当然是一种具有倾向性的概念。它是一群信徒谴责另一群信徒的标记。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些谴责别人的人相信自己的教义是惟一的真理。在基督教历史上，异端只有二三世纪才以普遍巩固划一的面貌出现。大多数教会教父都有不同程度的异端思想。按照晚期正统教派的定义，主要的异端包括基督幻影论派（Docetism），孟他奴派（Montanism），诺瓦提安派（Novatianism），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ism），涅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优迪克派（Eutychianism），阿里乌斯派（Arianism），贝拉基派（Pelagianism），多那图派（Donatism），基

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ism），惟一意志论（Monothelitism）。其中，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最为重要，因为它赢得了帝国内外许多社团的支持。该异端是由亚历山大的一个教士阿里乌斯创立，认为基督作为上帝之子，不可能分享天父的全部神力。它激怒了第一个泛基督教会议，并受到该会的谴责。但是，在君士坦丁二世的支持下，它又卷土重来，并且被一些野蛮民族，特别是哥特人所接受。它甚至分化成三个异端支派：阿诺麦安派（Anomoeans）、霍莫麦安派（Homoeans）、半阿里乌斯派（Semi - Arians），它们直到六世纪才慢慢消亡。［**不列颠人**］

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完全起源于东方。荒漠中的圣安东尼（St Antony，约251—356年）也是亚历山大人，他反对阿里乌斯，建立了第一个隐修团。

因此，通过特定方式被宣布为天主教（全体的）和正教（正确的）的基督教观念与实践是多年来辩论和意见分歧的结果。经过四世纪晚期的教会四博士——马丁、哲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的努力，才使得这些概念的含义得以确定。除了很快就让位给基督神学问题的逻各斯（Logos）的争论以外，他们还集中讨论关于神恩、赎罪和教会的教义，关于僧侣、施洗、圣餐，尤其是三位一体。325年，当君士坦丁皇帝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Nicaea）召集第一次全体教会会议时，共有300名代表应邀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条款进行了摘要陈述。来自亚历山大的教会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反阿里乌斯派或由阿[206]塔那西乌斯领导的三位一体说派占了上风（约296—373年）。只有少数主教来自西方，包括科尔多瓦（Cordoba）和里昂。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 I）缺席，派两名特使代替他出席。其成果是把耶路撒冷实行的洗礼程序同著名的"本体同一说"（homoousios）观念合并起来。尼西亚信条对后世全体基督徒都具有约束力：

> 我们信靠惟一的上帝，全能的天父，
> 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 我们信靠惟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 他是天父的独生子，
> 与天父同为一体；
> 天上和地下的万事万物都由他造；
> 为了我们人类和我们的救赎
> 他下到尘世，道成肉身，现身为人，
> 受难并在第三日又复活；
> 升上天堂；

审判活着的和已死的人们；

并且存在于圣灵之中。[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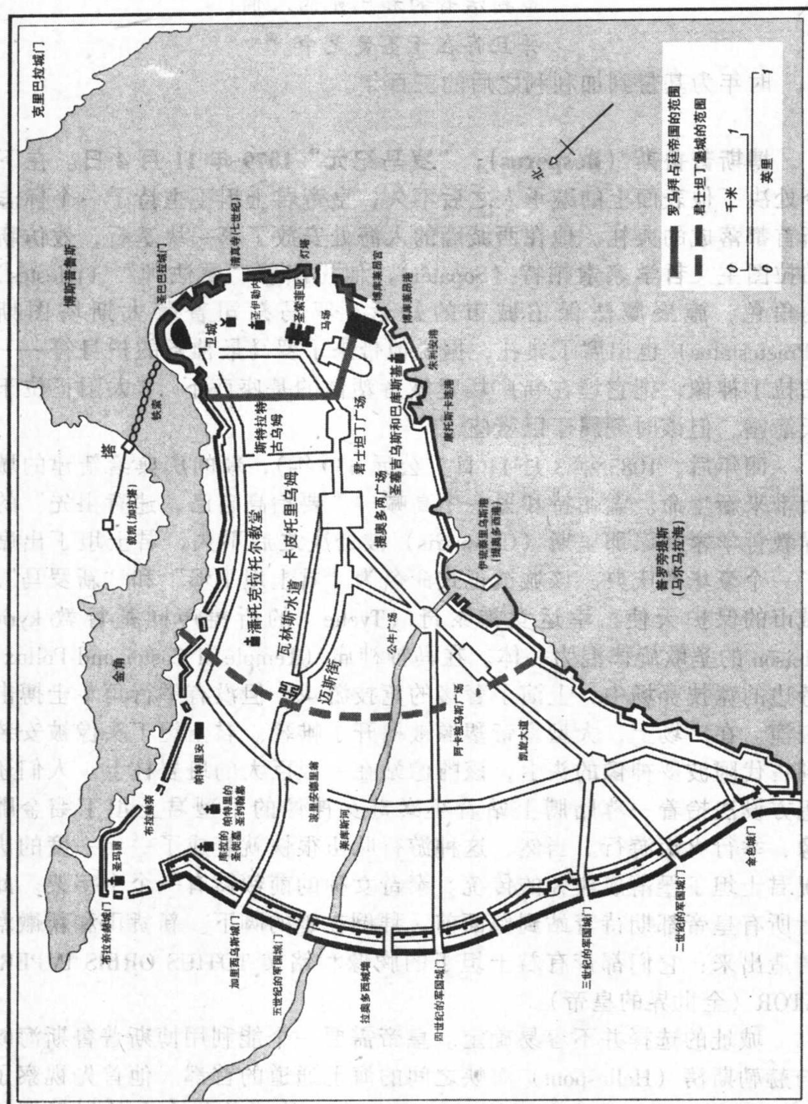
时年为基督到加利利之后的三百年。

博斯普鲁斯（Bosporus），“罗马纪元”1079年11月4日。在下令处决了他表面上的继承人之后不久，皇帝君士坦丁主持了一个标志新首都落成的典礼。他在西城墙的入海处安放了第一块基石，效仿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索帕特（Sopater），他扮演着“魔法师”（telestes）的角色，施展魔法保佑城市的好运。罗马祭司普莱太斯塔图斯（Praetestatus）也出席了典礼，据说他带来了罗马最神圣的护身符——帕拉丁神像，把它埋在新广场建城者塑像的基座底下。“太阳正位于天箭座，但该时刻属于巨蟹座。”[35]

四年后，1083年3月11日（公元330年），新的庆典给新建的城市带来新生命。索帕特和另一个高喊“不要抬高自己，违背祖先”的异教哲学家加诺那里斯（Canonaris）被处决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出席了一个豪华的庆典。该城被正式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和“新罗马”。城市的保护天使，幸运女神泰奇（Tyche）的祈祷声同基督教kyrie eleison的圣歌旋律混为一体。在马神神庙（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旁边的竞技赛场中，上演了奢侈的竞技游戏，但没有举行角斗士搏击表演。在广场上，大型皇帝塑像被揭开了帷幕。君士坦丁头像被安装到古代阿波罗神像的头上，该雕像站在一根巨大的斑岩柱上。人们还想方设法抬着一尊胳膊上站着小泰奇女神像的小型君士坦丁镏金雕像，举行火炬游行。当然，这种游行队伍很快就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的传统。泰奇女神的前额铸有一个十字架。此后所有皇帝都期待着站到她面前，拜倒在她的脚下。新货币和新徽章[208]铸造出来：它们都带有君士坦丁的胸像和铭文TOTIUS ORBIS IMPERATOR（全世界的皇帝）。

城址的选择并不容易确定。皇帝需要一个能利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之间的海上通道的首都。他首先视察了在亚洲岸边的古老的查西敦（Chalcedon）。然后前往古老的伊里乌姆（特洛伊），关于该城的传说同罗马建城有关，很有象征意义。他访问过特洛伊的田野，在一个被尊为赫克托尔之墓的地方，画出了未来城市的轮廓。在他再次改变主意之前，城门已修建起来（至今仍可见到），穿过大海到达欧洲岸边的拜占庭小镇，他新近在那里指挥了一次成功的围困。最后，实际情况和占卜结果都没问题。据后世传说，君士坦丁曾独自考察城墙沿线。他大步走在测量员的前面，手持长矛，把随从远远甩在身后。当有人向他喊道：“究竟有多远，陛下？”

[207]



地图9 君士坦丁堡

时，他神秘地回答道："直到走在我前头的那位停下脚步为止。"

把拜占庭小镇变成宏伟的君士坦丁堡需要庞大的工程和惊人的速度。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环绕半岛，从金角到马尔马拉海（Marmora），距离西边的古代卫城约两英里。君士坦丁堡的广场紧靠拜占庭的旧城墙之外。两个彼此分开的郊区叙凯（Sycae，加拉塔 Galata）和布拉赫

奈（Blachernae），分别位于金角（Golden Horn）的两边，各自设防；与此同时，旧城的大部分被拆除。公元269年，为纪念一次著名的胜利而建造的优雅的克劳狄乌斯·哥提库斯（Claudius Gothicus）立柱，位于岬角之上，面临大海，眺望着亚洲。君士坦丁堡像罗马一样拥有七座山丘，山上很快就布满了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八年之后，有一份文件提到有一个卡皮托学院，一座竞技场，两个剧院，8个公共浴池和153个私人澡堂，52个门廊，5座谷仓，8个引水渠，4个会议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以及登记在案的4388个具有卓越建筑贡献的住宅。为了装扮这座大都市，大量艺术珍品从希腊运来，有派提安（Pythian）的阿波罗，萨米安（Samian）的赫拉，奥林匹亚诸神［宙斯］，罗得岛林都斯（Lindos）的雅典娜。427尊塑像被集中起来，只陈列在圣索菲亚（St Sophia）教堂前面。附近聚落的人们被迫迁来殖民。为了养活这些人口，也为筹集每年的口粮，来自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运粮船队往返穿梭。君士坦丁堡不得不及时采取行动，因为邻近地区已遭生灵涂炭，被洗劫一空，饥荒遍野。

君士坦丁的个性发人深思。他以首位基督徒皇帝的形象被写入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圣录集（hagiography）中。第一位传记作家该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这样写道："当我凝视蕴藏在这颗受三倍祝福的心灵之中，与上帝同在，超凡脱俗的灵魂时，凝望着如电光闪烁般耀眼的锦袍和光芒四射的王冠时，任何言辞和理由都变得悄然无声了。"[36]但贬低他的人却把他说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伪君子、暴君和杀人凶手，只有他临终前的改宗和后世伪造的作品才为他洗刷了名誉。吉本对基督教传说颇有抵触，不赞成一般的解释，强调说他[209]的才华只因晚年的奢侈生活而有所损伤。君士坦丁"高大又尊贵，多才又多艺——在战争中无所畏惧，在和平时期和蔼可亲——一贯谦虚，故而脾气温和——当之无愧享有第一个公开信奉基督宗教的皇帝的称号"。[37]

除他母亲的例子以外，君士坦丁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是一个事实上的基督徒，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他公开承认他对惟一的上帝感恩戴德，但是，他的大多数行为，包括颁布宽容敕令，可以解释为出于宗教宽容政策的考虑。在君士坦丁堡的一系列节日庆典中，他对搞个人崇拜最感兴趣。与此同时，他热衷于赞助兴修教堂，不仅在罗马，那里的圣彼得教堂和君士坦丁会堂（圣约翰·拉特兰教堂）都是由他建造的。321年，他强令星期日这个一般性的节日成为休息日。众所周知，他一再推迟正式接受洗礼，直到临终时才由阿里乌斯派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施洗。对于罗马主教，他并无特殊好感。他十分欣赏在晚期帝国崇拜中深化了的戏剧

艺术。作为不可战胜的太阳（*Sol Invictus*），他继承了戴克里先的王权崇拜（*adoratio purpurae*）的做法，使自己陷入东方专制主义的谄言之中。公共艺术，如罗马的君士坦丁拱门上的雕饰所展现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僵硬、一本正经。在君士坦丁宫廷中的学术生活中，新兴的基督教潮流同传统文化相调和的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君士坦丁十分倚重他在特里尔（Trier）结识的一位改宗的修辞学家拉克塔提乌斯（Lactantius），让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并通过《神学阶梯》（*Divinae Institutiones*）一书，系统阐释基督徒的世界观。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宗教定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米兰敕令（313年）颁布之后，教会得益于政府的宽容政策，有了稳定的收入，并通过尼西亚信条获得了统一的教义。然而，在教会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仍然仅仅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教派。没有至高无上的教会权威。正典化的圣经还没被全体接受。从约翰·克里索斯托到奥古斯丁，任何一位伟大的教会教父都还没有出世。最著名的异端阿里乌斯，334年从流放地被召回，在帝国宫廷中相当有影响力。实际上，阿里乌斯教派注定要主宰后面几个朝代。多纳图教派在非洲刚刚被镇压。亚美尼亚和阿比西尼亚是仅有的两个基督教发展越出帝国范围的地区。零星迫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延缓了异教的灭亡"。

330年，帝国的情况比前几十年要好一些。东部与西部重新统一。普遍和平得以维持。君士坦丁改革遭到否定，被视为"一种怯懦政策，它把统一的统统割裂，把伟大的统统降低，对每个生机勃勃的大国都害怕得要命，指望以不堪一击的姿态证明自己极为恭顺"。至[210]少，改革使帝国得以喘息。通过把军区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的大权分割成对立的骑兵与步兵指挥权；使帕拉丁精锐部队的地位高于驻扎在边疆的二等军队之上；广泛引进蛮族军官和辅助部队等手段控制了军队。皇帝豪华的建筑计划，重修道路和驿道系统的资金是通过榨取土地税获得的。无孔不入的帝国密探网络，扮演着政府间谍的角色，令那些潜伏的叛逆者们提心吊胆。

君士坦丁没打算解决继承权这一缠绕终身的麻烦。他杀死长子克里斯普斯，只因听信存在着一个罗马阴谋集团的谣言。但他还剩下三个儿子——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一个受宠的侄儿和三兄弟。他死前两年，把帝国分配给了他们，把儿子们提拔为恺撒。他们辜负了他的慷慨馈赠。君士坦丁二世在入侵君士坦斯的领地时被杀。君士坦斯被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所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剩余的亲属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最后从马克森提乌斯手中夺取了帝国。

继前一世纪的混乱之后，帝国经济恢复了少许的繁荣和稳定。市民的慷慨程度远不如前一时期的水平；但是，行省城市，尤其是中欧边疆地区城市的公共工程仍有令人骄傲之处。狄奥多西的税收改革，以农业生产为评估依据，为正常的预算计划提供保障。帝国官僚机构也膨胀起来。不时传来抱怨税吏向纳税人过度收税的声音。以一磅金块锻压成60枚铸币的比率制造出来的金币抵消了铜币的贬值，奠定了拜占庭稳定的通货体制。

帝国边疆固若金汤，甚至一度有所扩张。297年，好不容易从波斯手中夺取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亚美尼亚行省，通过罗马化和基督教化奠定了一个永恒的、具有特色的文化的基础。为了方便行政管理，帝国分成四个军区：东方军区（君士坦丁堡）、伊利里库姆（塞米乌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米兰），以及高卢（特里尔）。在西方，在不列颠地区，君士坦丁的父亲率领远征军对皮克兹（Picts）和斯科特（Scots）海湾地区进行掠夺。在东方，有来自萨珊波斯的威胁，但没有取胜。在南方，摩尔人部落正逼近罗马的阿非利加。

欧洲政治和民族版图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正在超出帝国的界限，并超出了文献历史所记载的范围。凯尔特霸权控制下的广大地区迅速萎缩。凯尔特人在不列颠和高卢的西部要塞严重罗马化。他们在中部的家乡受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迁移的影响，正在被压倒、被吞并或被消灭（见第4章）。法兰克人已经定居在莱茵河边境两边。哥特人已走完从维斯瓦河到第聂伯河的远征。斯拉夫人朝中部地区向西聚集，在那里，凯尔特·波希米亚正变得斯拉夫化。波罗地人早已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自从分裂以后，芬兰—乌尔甘人（Finno - Ugrian）就一直朝着他们未来的领土前进。芬兰人在伏尔加—波罗的海之间的陆桥停留下来；马扎儿人在南部平原沿途无数个停歇点中的一个驻扎[211]下来。游牧民族和海上劫掠者在外部边缘地区仍长期存在。斯基泰（Scythiaus）人仅仅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匈奴仍待在中亚。挪斯人已在挪威出现，他们用最古老的粗体字刻写的铭文表明了这一点。

君士坦丁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很可能受罗马交流状况的限制。通过丝绸之路脆弱的接触，人们得知了中国，当时由于三国时期所造成的大动荡，她仍处于分裂状态。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的使者访问了中国。当时中国名义上隶属于西晋，西晋的势力是逐渐由北方扩张到南方的。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孔子的哲学，并通过佛教的兴起同印度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印度北部地区刚刚臣属于笈多（Gupta）皇帝的统治，他是印度教艺术文化的最伟大的赞助人。印度更靠近罗马，并更为人们所了解。几乎可以肯定，山德拉笈多（Shandragupta）一世在马加哈（Magadha）加冕的消息通过埃及传到了

君士坦丁堡。埃及也是来自亚比西尼亚消息的来源，该地区是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基督教传教团的目标。萨珊波斯帝国同罗马之间有很长一段脆弱的边防线，是一个令人产生强烈兴趣的对象。她排斥前一阶段的希腊化文化，进入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时代。摩尼（Mani），二元论的摩尼教先知，竭力使琐罗亚斯德的原理同基督教相结合，60多年前就已被处决。小皇帝沙普尔二世（Sharpur Ⅱ，310—379年）还处于祭司和御林军（Magnatial Guardians）的控制之下，除了完成圣书经卷《阿维斯塔》（Avesta）的编撰以外，还对全体反对者痛加迫害。罗马—波斯之间的和平持续了33年，一直维持到君士坦丁去世时。

330年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这一划时代的事件，看起来符合把君士坦丁的统治视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的这种通行的做法。这个时间不得不同其他一些日期展开角逐：例如，392年，这一年狄奥多西一世即位，他是第一个统治纯粹的基督教帝国的皇帝；622年，伊斯兰教兴起，使先前的罗马世界分为穆斯林和基督教两个半球（见原书第251—258页）；800年，查理曼在西方恢复了一个基督教帝国（见原书第298—306页）。如果这些分界线被严肃对待的话，那么恐怕小君士坦丁会被判定为古代人，而老君士坦丁则变成了中世纪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特定时代，过去的遗产与新生事物的总和之间保持着整体平衡状态——即专业历史学家在某些时候所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比较自信地宣称，公元330年，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出现这种重要的平衡状态的迹象。

[212] 罗马城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不只是因为君士坦丁废黜了禁卫军，并夷平了他们在罗马的总部，其实，罗马的实际重要性老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长远看，它其实受益匪浅：由于丧失了对行将瓦解的帝国的控制，因而确保不受帝国命运的牵连。它将要寻找一个崭新、持久的角色，成为基督教中最有势力的掌权者的老家。然而，当时的罗马主教却不这么肯定。西尔维斯特一世（314—335年）既没出席君士坦丁314年召集的，旨在结束多那图派争吵的阿尔莱斯会议，也没出席尼西亚全体大会。

大多数历史学家们会认为，在古代世界晚期固定下来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核心，最初主要在帝国内部，而后又在复杂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庇护与包容下，牢牢地扎下了根。相反，中世纪文明的核心扎根于基督教社会和纯粹的基督教文化土壤之中。其发展是在地域基础上，通过前罗马民族与非罗马民族的融合而实现的，其地域范围只有一部分与前代帝国相吻合。在330年，导致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演变的过程才刚刚起步，变化微乎其微。君士坦丁自己也不是欧洲人。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事件的后果。从君士坦丁到查理曼之间的时间跨度，要比从恺撒和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的时间跨度更有意义。同样，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今天，那些标示出整个近代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然而，君士坦丁没有播下基督宗教与政治相融合这一历史概念的种子。基督本身是绝对反对政治参与的；而且，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们并未想过通过掌握政权，推动基督教的发展。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与上层政治携手合作。在清教徒看来，这是一个产生腐败的时刻。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君士坦丁堡迅速变成了基督教政权的发源地。331 年，在庆祝建城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它被确立为罗马帝国政府的首都，并保持这种突出地位长达一千多年。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它的基督教特点就占据了绝对优势。教堂数量大大超过神庙，直到神庙被彻底禁止。正是“拜占庭”国家的根源及其核心，这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不仅为“西方文明”做出了贡献，而且是欧洲历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4章

起　点

欧洲的诞生，约公元330—800年

[213]　试图描写晚期罗马帝国的近代人，大多有一种厄运迫在眉睫的感觉。虽然在每一个现代人看来，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事实事先都是清楚的，但是，当最终结果仍是谜团时，对长期历史作一全景透视是不可能的。伏尔泰视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为“荒谬可笑的”；吉本则将其描述为“野蛮和宗教的胜利”。

当然，当代人不可能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持有相同的观点，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确实感到他们是历经艰难而幸存下来的。没有什么比晚期罗马帝国哲学家波伊提乌斯（约公元480—525年）的话更令人产生对时代的回味，他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写道：“不幸当中之最不幸是曾经拥有幸福。”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即使经历了帝国的衰落，也没有必要预见其灭亡。对许多基督徒来说，罗马帝国末日的到来意味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世界末日如此一再地延期，在人们的实际思考中已不起作用了。再者说来，尽管野蛮人的入侵是罗马帝国软弱的最显著征兆，但是，野蛮人有无毁灭罗马帝国的意图却是令人怀疑的。相反，野蛮人是想分享罗马帝国利益的。公元410年，由于罗马帝国皇帝拒绝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定居于帝国境内，引发了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大洗劫。从现代人的观点看，野蛮人所预期的真正奇迹是罗马帝国的千秋万代，以及前罗马世界与前野蛮世界的相互依赖。从长远观点来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被称作“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实体，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

君士坦丁去世时，“已知世界”分成两个简单的部分，即一直存在着的罗马世界和野蛮世界。在边界线的一边是重新统一起来的罗马帝国，保持着稳定；边界线的另一边是大致处于部落制发展阶段的不安分的人们，耕种着森林里的空旷地带或漫游于平原地带。于是，罗马人将这一划分用黑白两词来表示也就不难理解了。对罗马人来说，[214] 帝国是“文明的”，它服从于有组织的政府；野蛮人则是“不文明的”。尽管“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确实是存在的，如被俘的不列颠部落首领卡拉塔库斯（Caractacus）在罗马游行时所表现的那样。但是，横越罗马帝国到未知世界却被视为一步一步由光明走向黑暗。

事实上，罗马世界和非罗马世界的区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如此界线分明。罗马军队通常是由蛮族将领统率作战的，而蛮族将领则利用蛮族辅助军作为帮助驱逐帝国的敌人。靠近罗马帝国边界的国家受罗马人的影响已有数世纪之久了。罗马的商人和手工业品远远突破了帝国的边境线。在整个德意志和东欧都有罗马硬币出土。在汉诺威附近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波美拉尼亚的卢布索（Lubsow）、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立陶宛的卡拉吉佩达（Klajpeda），甚至在阿富汗，储藏窖和坟墓里出土了大量罗马时代的金、银、铜制品。远到南印度都有重要的罗马贸易场所在运转。[1]

要想精确了解罗马帝国衰落的节奏同样是困难的。君士坦丁之后，开始成为历史发展主流的三大历史进程已经开始，其中的每一进程都持续了数个世纪：一是蛮族由亚洲向欧洲不屈不挠地西进（见原书第 215—238 页）；二是罗马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日益扩大着的裂痕（见原书第 239—251 页）；三是基督教向异教人群的稳步扩展（见原书第 275—282 页）。这三大历史进程主宰了后来被称为“黑暗时代”的那个时期。第四大历史进程是伊斯兰教的兴起（见原书第 251—258 页），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冲出阿拉伯半岛，迅速确立起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并与其他地区产生了相互影响。

现代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历史学家所怀抱的传统的罗马中心论和基督教观念。在对待“黑暗时代”的方式上，这些历史学家们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他们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宗教信念。当然，人们没有理由不站在波伊提乌斯或图尔的格雷戈里可能采取的立场上去接受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判断。果真如此的话，厄运日益迫近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一种观点被接受其他的观点就应该一概排除在外。如果资料比较丰富的话，人们也会正确地理解进步中的野蛮人的体验、异教徒的体验，或者是穆斯林战士的体验，那么，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或许是令人振奋、令人期待和充满希望的。根据马赛的萨维安（Salvian of Marseilles）的观点，许多有着

良好出身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在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中间寻求庇护，“在蛮族中寻找罗马人的人性，因为他们已不再支持罗马人关于蛮族不仁道的观念了”。[2]

迁徙与定居

[215] 在第一个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半岛（指欧洲大陆——译者注）的小部分被后来永久定居于此并称之为“故乡”的人居住着。罗马边境线以外的人口，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大大小小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无休无止地探寻着较为理想的活动场所。有时他们的游动步伐会因为食物匮乏或者由于游牧民族的暴力袭击而加快。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在某地逗留几十年甚或几个世纪之后会突然迁徙到别的地方。

无规律的迁徙节奏是由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的，其中涉及气候的变化、食物的供应、人口的增长、来自本地的竞争与远方的危机。对于密切关注着边境线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因素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各种压力会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积聚，直到某些无法预料的事件突然冲破对它的限制，于是长期的静止代之以短暂而剧烈的波动。通常情况下，迁徙行动决定于惯性力量的微妙平衡，即本地灾难的“推动”和远方丰美牧草的“拉动”之间的平衡。所有迁徙主要发源于遥远的中亚大草原，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群链一端的变化会沿着链条产生层层波动。在这一链条西端的最后一个部落，像列车编组站里一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样，会被巨大的力量所驱动而脱离静止状态。

正是这样，匈奴人在他们踏上欧洲的土地以前很久，就在西方激起了层层涟漪。匈奴帝国大约在公元前36年或35年被中国人摧毁。于是，匈奴人部落和他们的畜群就从原住地移居到现今的突厥斯坦。他们的突袭队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扫荡一二千英里。骑在急驰的蒙古马的马背上，身佩弓箭，匈奴人的铁骑在一个夏季便在欧洲和中东做了一个往返。像所有真正的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对农耕世界或半游牧世界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他们之间在这一动力的作用下产生了联系。在公元二世纪，匈奴人的本部移至里海以北；公元四世纪，又移向现今的乌克兰。375年，匈奴人在此与迁徙方向完全相反的一支日耳曼人——东哥特人相遇。两者冲突的结果驱使东哥特人及其邻近的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在此之后的五十年内，另一个联合成部落的阿兰人（Alans）出现在几乎是远在三千英里以外的今天的葡萄牙南部。直到441年，匈奴人本身并没有进攻罗马帝国。当然，迁徙的速度异常缓慢。阿兰人大约在公元375年越过第聂伯河，406年跨

过莱茵河，抵达大西洋岸边的时候已是公元五世纪的二十年代了，平均每年行进五英里。作为与阿兰人同行的汪达尔人（见下文），他们“突然的入侵”保持着每星期两公里的低速度。这些部落的行进被辎重车、牲畜所拖累，物质供应也抵不上游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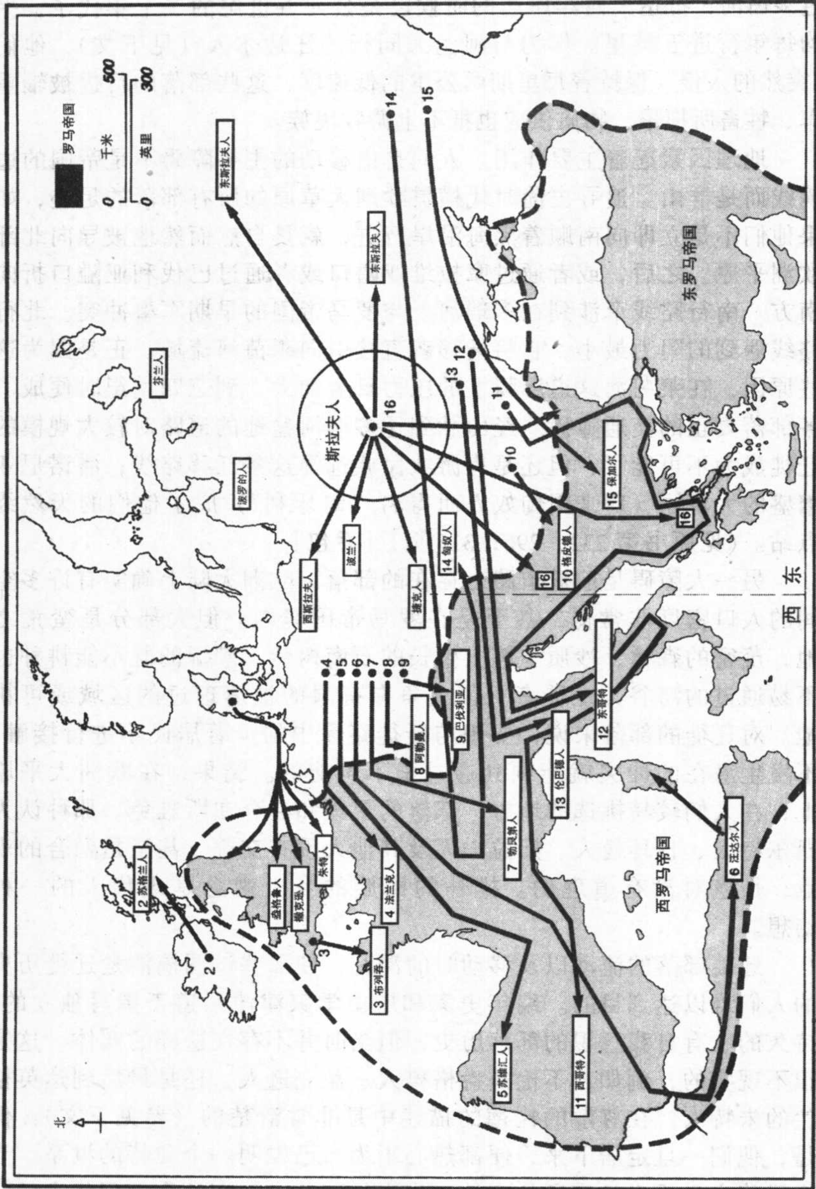
地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人们自由移动的主要障碍不是帝国的边[217]境线而是群山。追寻史前时代横贯欧洲大草原的所有部落的足迹，如果他们不是立即向南顺着黑海沿岸行进，就是自然而然地被导向北部欧洲平原。之后，或者通过摩拉维亚隘口或者通过巴伐利亚隘口折向南方。南行路线牵涉到在多瑙河上与罗马帝国的早期军事冲突。北行路线遇到的阻力最小，它将迁移者直接引向莱茵河流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莱茵河这道屏障上的压力日益加大，到三四世纪时便成了各部落真正的交通障碍。经山脉到达多瑙河盆地的道路对较大规模的迁徙成为不可能了，但还是有游牧民族选择这条迁移路线；潘诺尼亚繁盛的大草原（后来因匈奴人而得名“匈牙利”）成了他们的天然终点站。（见原书第 232，296，316 页）[**乔包**]

另一大障碍是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部落。欧洲大陆上确实有许多空间的人口密度非常低，甚至是在罗马帝国境内。但大部分是蛮荒之地，茂密的森林、沙质土壤上生长的石南树丛、潮湿的既不能耕种也不易通过的河谷，迁徙者只能去争夺有限的被清理过的区域或可耕地。对迁徙的部落来说，要想与迁徙路途中的土著居民不进行接触、不发生潜在的冲突就能顺利通过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欧洲大平原上，在人们较易挑选的地方，部落的聚集和混合在所难免。那种认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及其他人没有交叠、甚至是融合的观点，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排外的民族的乡土观念是现代人的一种幻想。

迁徙部落的流动以及移动时的混乱，使那些试图搞清楚迁徙历史的人们难以达到目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于撰写独立的、持久的、有自我意识的部落历史，但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这是很不现实的，例如，不论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最后到达英格兰的朱特人，在尊敬的比德的描述中是非常清楚的（参见下文）。但是，他们一旦定居下来，便都热心于为自己发明一个独特的世系。当今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把现代人的特性回溯到史前时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除非用传统部落的方法，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是如何描写这场迁徙的。但是了解这一方法的缺点也是必要的。

从重大历史进程的背景看，罗马帝国将这场迁徙称为“蛮族入侵”，站在西欧这一局部立场上，它又常常被称为“日耳曼人的入

[216]



地图 10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欧洲

侵”。日耳曼人称之为 *Volkerwanderung*，即“人口的漫游”——一个恰当的术语应较好地适应于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两方面情形。而实际上，这场迁徙席卷了欧洲半岛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一直持续了整个的第一个千年，而且还要久远，直到所有的漫游者找到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为止。仅仅凭借罗马人的史料，我们才了解到其中的主要事件，因为那些不识字的漫游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记录。然而，这一进程就是后来划分民族国家所必须追寻的历史源头。套用后来的一句成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 Drang nach Westen，即“指向西方的动力”，通向永久定居的道路。没有这一进程，任何“欧洲”或“欧洲人”的概念都得不到确认。人类学的分析表明，人口的[219]三大类型为：罗马帝国境内的定居者，他们生活于城市或乡村的地产上；蛮族部落，他们依靠粗放的耕种或精细的耕种为生；真正的游牧民。人们同样要加上像游牧民一样的海上偷袭者，他们很大程度上依靠掠夺为生，活动于北部海域的广大地区。

[218]

乔包（CSABA）

“起初，在广阔的亚洲大草原上，生活着两支勇敢、野蛮的部落。他们被称为匈奴人（Huns）部落和马扎尔人（Magyars）部落。当其人口大量增长时，匈奴人开始寻找新的定居地。经过无数艰难，他们来到一块地方，那里有着青翠的草原、碧绿而欢畅的河流、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峦。但是，这地方并不能无偿使用，它是罗马帝国的属地，叫做潘诺尼亚。

匈奴人中最勇敢的是年轻的王子阿提拉，人们推选他为国王。他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铁腕统治人民。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留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叫乔包，另一个叫白里达（Aladar）。他斗胆要求罗马皇帝的女儿做他的妻子，并要皇帝将半个帝国作为嫁妆。

最后，他们在卡塔伦（Katalaun）发生碰撞。匈奴人的轻骑兵像旋风一样对罗马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但在罗马铁铠护卫兵面前被撞得粉碎……平静的河流变成了血红色。‘上帝之鞭’被折断……精神上的刺激加速了他的衰老，之后不久就死了。

后来，乔包决定带上最强壮的人返回远方的亚洲……在马扎尔人那里，他召集起他的人民，对他们承诺道：‘不论死活，只要你们有难，我们都将伸出援助之手。’

当他离开时，仍有一支与匈奴人相对抗的庞大军队。残酷无情的战士一队队地掠过匈奴人的要塞，匈奴人双膝跪地向乔包祈祷。长而低沉的雷声做出了回响……一道闪烁着的白光在星空中出现，形成一条彩虹般的巨大拱门。乔包和成千上万手持闪光的剑、高喊战斗口号的战士们，伴随着成千上万匹马发出的咔哒咔哒的马蹄声从天而降，将惊恐的敌人驱赶得四散逃窜。

乔包与他的天兵天将最后一次回来，领导马扎尔人在我们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再次结成兄弟。从此以后，乔包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闪闪发光的天路——‘勇敢的战士之路’则永远留在了那里。”[1]

民间传说是集体记忆的宝库。传说是供人娱乐的，但也加强了部落的认同感。五百年来，匈奴人与马扎尔人各自在匈牙利开拓疆土。然而马扎尔人依然对他们的祖先和一同迁徙的伙伴怀有亲和力。直到现代，只有马扎尔人的家庭仍梦想着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阿提拉。

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看，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铁器时代的农业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同一块土地上通过耕种所获要大于持续不断的移动所获。野蛮人并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简单地寻求冒险，他们渴望一块永久的居住地。

从人种学的角度看，欧洲大陆的居民拥有最多的血缘联系。根据某些人的看法，可以假定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头五百年印欧语系居民的因素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尽管大多并不是正宗的拉丁人或希腊人，但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完全拉丁化了，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的也完全希腊化了。某些显著的例外是，蛮族迁徙者属于另外一支重要的印欧语族（见原书附录Ⅲ，第1232—1233页）。

除了游牧民之外，非印欧人还包括：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西班牙的原始伊比利亚人群；意大利偏远地区前拉丁人的残余；巴尔干地区尚未同化的伊利里亚人、达契亚人、色雷斯人。犹太人散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也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芬兰人或者叫做 *Suomalainen*，从西伯利亚出发，艰难地跋涉穿越北极的针叶林带，占据了波罗的海东端至伏尔加河上游，即后来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在人种方面，他们与两方面的人种有关：一方面是匈奴人和马扎尔人；另一方面是逗留于乌拉尔地区的几支小的族群，如切列米斯人（Cheremiss）、莫尔多瓦人、帕米尔人、沃尔古人（Voguls）和奥斯加克人（Ostyaks）。更远一些，他们还与包括突厥人（Turks）、

蒙古人和鞑靼人在内的阿尔泰语族居民有关系。他们的邻居是与北极驯鹿一起处于无休止流动的拉普兰人。拉普兰人自称"Sameh"，而出于诅咒的目的，北欧民族通常称他们为"芬兰人"，瑞典因此而设有芬兰马尔克省区。

在高加索有两个支离破碎、相互间极少联系的族群。北高加索人由阿布哈兹人（Abkhaz）、车臣人、阿瓦尔人组成；南高加索人由拉兹人（Laz）、明格利里亚人（Mingrelians）、格鲁吉亚人（Georgians）组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格兰血统的业余语言学家、有着一个俄罗斯名字的尼古拉·雅克维利奇·马尔（Nikolai Yakovelitch Marr 1864—1934 年）提出一项理论，将高加索语与巴斯克语、伊特鲁里亚语和古希伯来语联系了起来，使欧洲民族舞台上散落的碎块密切联系了起来。不幸的是，尽管获得格鲁吉亚人最强大的支持，马尔的理论得不到广泛的证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部分充斥着亚洲游牧民族浪潮般涌入欧洲大陆的事件。公元五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匈奴人是早期游牧部落的后[220]代，这些驰骋在同一片大草原的早期游牧部落中，较著名的有古代的斯基泰人和伊朗—萨尔马提亚人，他们被托勒密（Ptolemy）描述为公元二世纪大草原上的霸主。他们是到达欧洲中部的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的前辈。其他游牧部落的活动局限于黑海附近。突厥—保加尔人的一支在伏尔加河中游建立了一个王国；另一支于公元七世纪定居于多瑙河口附近。卡扎尔人紧步保加尔人的后尘建立了一个从北高加索延伸到德涅斯特河的王国。佩切涅格人（Patzinaks 或 Pechinegs）在卡扎尔人的刺激下进入巴尔干半岛。继他们之后，丘门人（Cumans）在黑海大草原建立了另一个短命国家。十一世纪，吉普赛人或"罗曼尼人"（Romanies）由印度到达欧洲。与此同时，突厥人的一支冲击了高加索地区；突厥人的一个主要分支在十四世纪征服了巴尔干。

非印欧语系居民几乎没有留下永久的印记。巴斯克人和马耳他人经历了数世纪后，仍说着与其邻近民族不相干的语言。犹太人仍保持着他们自身的特点。波罗的海地区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成功地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而拉普兰人仍在追逐着驯鹿。作为蒙古人近亲后裔的鞑靼人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斯坦"，近代被驱逐到克里米亚。吉普赛人散布于欧洲各地。曾经拥有庞大帝国但最终失去了帝国的突厥人，在邻近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保有不稳定的立足之地。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尔人得到斯拉夫世界的认同，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政权对土耳其少数民族实行迫害时，受迫害者并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而是土耳其化的斯拉夫人。如果保加

利亚的官僚作风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大规模地开除所有的保加尔人，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而是“斯拉夫化的土耳其人”[**加告兹人**]

必须强调的是，“印欧人”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的分类（见原书第一章，第49—50页），仅仅涉及那些把印欧语言作为本族语的人们。属于该人种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在5000年前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原始印欧语中追溯到源头。此后，该人种散布于从冰岛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译者注）的广阔地区，通过近代殖民化又散布于世界各大陆。有人说：“语言本身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毫无疑问“印欧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语言群体之一。[3]（见原书附录Ⅲ，第1232页）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除了语言遗产外，印欧人的共性是什么。旧有的关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必有联系的观点已经不足为信了。语言极易由一个人种移植给另一人种，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的民族语言与他[221]们的民族起源便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一点从英语世界就可以得到证明，英语被数百万的美国黑人和加勒比黑人所采用。）在欧亚大陆，是褐色皮肤的印度人将其语言输送给了他们的皮肤较白的“欧洲人”邻居，还是相反，或者他们两者是采用了第三者的语言，对此我们一点都不清楚。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是阿富汗。即使真的存在这样的发源地，那些被称为“欧洲人”、“高加索人”、“雅利安人”的民族群体，其语言并不与印欧语相一致。例如，土耳其人的大部分，从种族上说是高加索人，但是从语言上说他们很明显是非欧洲人。[**高加索人**]

从欧洲人的情况看，有史以来纯净种族的确无从谈起。罗马帝国的人口中就包含有北非黑人与西亚闪米特人两者的彻底混合。蛮族部落也不断地从被俘的妇女和战俘中补充其基因库。尽管对爱尔兰或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参观会较容易地证明，种族类型并非是想象的虚构，但与种族相比，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是种族划分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任何部落群体或社会群体，在共同生活的每一时期都需要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同样，为了保护认同感，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碍反对种族间的交互繁殖是经常发生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某一群体成员是通过由宗教禁忌支持的血缘标准来界定的，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可能受到驱逐的惩罚。于是，语言和血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

克尔特人作为北部平原印欧人的先锋，在罗马时代已迁移到西部。他们曾创造了一些考古学上最先进的文化（见原书第84页），使人联想到金属加工业的传播。正因为拥有铁制武器所以才会有大规模

的扩张。公元前390年，克尔特人席卷了罗马，公元前279年又席卷了希腊。他们高大的身材、红色的头发、凶残的性情、令人作呕的猎取人头的习俗，使被征服者惧怕不已。公元前二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作为辛布里人，他们同条顿人一起从日德兰半岛出发，引发了高卢和西班牙的一场大浩劫，到罗马执政官马略时才被制止住。Putridi一役消灭条顿人之后（见原书第87页），公元前101年，马略又在维罗纳附近的Raudii战役中消灭了辛布里人。但是，一两次的挫折并没有阻止辛布里人的扩张浪潮。波希米亚（Boii）克尔特人以“波希米亚人”而著称。其他克尔特人凭借武力定居于北部意大利，创建了山南高卢。占据整个阿尔卑斯山西部和西北部土地的克尔特人创建了山北高卢。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克尔特人，创建了加利西亚（Galicia），进入莱茵地区。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克尔特人已经侵入海上岛屿，因而创建了“不列颠”群岛。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当罗马军团征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正是克尔特人在当地形成了抵抗力量。罗马帝国时期，在基本人口的血统上，他们形成了在西班牙的罗马化了的克尔特—伊比利亚人、高卢[222]的高卢—罗马人、不列颠的罗马—布列吞人的主干。在现代的一些地方，虽然它们已完全失去了与克尔特人的联系，但在名字上仍可辨认出来——*Boii*（波希米亚）、*Belgae*（比利时）、*Helvetii*（瑞士）、*Treven*（特里尔）、*Parisi*（巴黎）、*Redones*（雷恩）、*Dumnonu*（德文）、*Cantiaci*（肯特）、*Brigantes*（布里格斯蒂尔）。最后，许多地区受到日耳曼人的另一次流动的沉重打击，在偏远的西北部、不列颠的“克尔特人的边缘”——爱尔兰、西部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克尔特人建立了永久性据点。公元四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压力下，克尔特人从康沃尔移居到西班牙半岛西北部的“天涯角”（Finisterre），在那里创建了布列塔尼。有六支克尔特语在当代还有保留，其中的三支属于戈伊德尔语或者称之为Q—克尔特语族，三支属于布立吞语或者称之为P—克尔特语族。Cymru am byth！一支克尔特人迁往小亚细亚。公元52年，当圣保罗访问这些“东方的高卢人”时惊叫道：“噢，愚蠢的加拉提亚人。”（《加拉太书》3:1）。特里尔的圣哲罗姆在三百年后正确地指出，加拉提亚人实际上说着与他的故土莱茵地区的高卢人一样的语言。[**特里斯坦**]

罗马时期，日耳曼人可能是最大的一支蛮族。首先是南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支——波塞多尼乌斯在公元90年称之为日耳曼尼亚人（*Germani*），已经开始定居于后来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那片地区。在西部，他们与克尔特人相交叠，所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在不同时期被称为克尔特人、日耳曼人或日耳曼化了的克尔特人。在东部，他们与

斯拉夫人相交叠，所以塔西佗曾提到过的温尼德人（*Venedi*）到底是斯拉夫人的温德族，还是日耳曼人中的汪达尔人，或是日耳曼化了的斯拉夫人，成了极富争论的问题。

日耳曼人大致划分成三个族群。斯堪的纳维亚族群演变成了后来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冰岛人。西日耳曼族群以北海沿岸为中心，包括巴达维亚人、弗里斯兰人、法兰克人、阿拉曼人、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他们是后来的荷兰人、佛拉芒人、英吉利人、低地苏格兰人最重要的祖先，同样也是部分法国人最重要的祖先。东日耳曼族群以易北河以东为活动区域，包括斯瓦比亚人、伦巴德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格皮德人、阿兰人、哥特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阻碍了欧洲北部平原的种族流动，是导致西罗马帝国危机的主要参与者。[**福萨克**]

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部落的习俗、社会结构、宗教提供了详尽的考察。从铜器时代始，日耳曼人就与地中海世界有了贸易往来，并采用罗马人的耕种方法乃至葡萄栽培技术。他们的氏族以血缘关系相联合，其政治制度与由战士组成的民主大会上敲击武器的“叮叮”声相协调。他们的宗教以丰产之神诺斯和弗瑞尔、魔力大师和战神沃丁、保护农夫反对巨人和精灵以及各种邪恶势力的神托尔为中心。他们中间还没有产生祭司，因为军事领袖经常以国王的名义行使军事和宗教职能。尽管哥特人在较早时期就接受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但日耳曼人对基督教有着长时间的抵制。（见下文）

[223]

特里斯坦（TRISTAN）

在康沃尔郡的福尹（Fowey）以北两英里，米耐比利的路旁，矗立着一根约七英尺高的尖细石柱。上面留有用六世纪罗马字母写的依稀可见的碑铭：“DRUSTANS HIC IACET CUNOMORI FILUS”（这里安睡的是特里斯坦，科沃尼莫留斯的儿子）。铁器时代的要塞工程 Dôr 城堡就兴建在附近。在其周围发掘出土的文物表明，该地在中世纪早期曾被重新占领过。附近的兰特然（Lantyan）农场也表明古代的兰辛宫（Lancien）——“国王马克称之为科沃尼莫留斯（Quonimorius）”的宫殿——就在此地。莫瑞斯克（Moresk）或莫洛伊斯（Morrois）森林、邪恶的玛尔帕斯的福特、提尔·格温（Tir Gwyn）或拉·布兰奇·兰德（La Blanche Lande）庄园、格兰特的圣萨姆森（St Sampson – in – Golant）修道院，所有的名字都在接

下来的故事中重现，它们都建在附近。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墓碑属于伟大的特里斯坦。[1]

根据传说，失去土地的莱昂尼斯（Lyonesse）王子特里斯坦与爱尔兰公主伊索尔特（Isolt）陷入热烈的爱情。特里斯坦曾渡海护送伊索尔特与他的同族亲戚——国王马克结婚。被神秘的爱情毒药所迷惑，他们的爱情注定成为终生的幽会和私奔。最后，当特里斯坦遭受国王毒枪致命一击后，伊索尔特也在他们的最后拥抱之中死去。几个世纪后，克尔特人悲惨的爱情故事在整个欧洲宫廷罗曼史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法国人最早的故事片段，如爱尔哈特（Eilhardt）撰写的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故事，可追溯到1170年。由高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伯格（Gottfrieed von Strassburg，约1200年）编纂的最为完整的德国版本，是瓦格纳（Wagner）歌剧剧本（1859年）的主要资料来源。还存在着普罗旺斯版本和英语版本。像法国的《特里斯坦传奇》一样，托马斯·马洛礼爵士（Sir Thomas Malory）写于十五世纪的《亚瑟王之死》，将特里斯坦的故事与亚瑟王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法国版本的副本，维也纳手稿编号2537，现存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有着华丽而明亮的插图。[2]白俄罗斯的特里斯坦故事创作于十六世纪，现存于波兰的波兹南，它是白俄罗斯世俗文学的最早作品。[3]到那时，特里斯坦的故事已经流传有千年之久：

> 那时，特里斯坦爵士与拉·比尔·伊索尔特出海，……在船舱里，突然感到口渴，他们发现一小壶金子，感觉像是上好的葡萄酒……然后，他们开怀畅饮……但是，喝完之后，二人相互爱慕不已，不论是祸是福都不能将他们分开……[4]

像特里斯坦的故事一样，亚瑟王系列传奇的中心人物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大部分学者认为，“从前和未来的国王”亚瑟，一定是一位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军事领袖。但是，没有与亚瑟的故事确切一致的。八世纪的编年史家南尼斯（Nennius）称亚瑟为军事统帅（dux bellorum），他曾在“巴东山”（Mount Badon）打败撒克逊人。威尔士的资料称其为amheradawr或“皇帝”。十二世纪，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说，亚瑟王出生于康沃尔沿海的廷塔杰尔（Tintagel）巨大的海岛要塞，在圣杯神殿附近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去世。现代考古在廷塔杰尔发现了一座晚期罗马的修道团体遗址，进一步加强了亚瑟王是康 [224]

沃尔人的观点。但是，另一研究则将亚瑟王与威尔士军事领袖奥温·德党特哥温（Owain Ddantgwain）相联系，他是圭内斯（Gwynedd）和波伊斯（Powys）的国王，既是龙王的儿子也以“熊”著称，死于520年。[5] 萨莫塞特的传说则认为，凯德伯里（Cadbury）的山顶要塞庇护着亚瑟王的卡莫洛特（Camelot）宫殿，同时，格拉斯顿伯里就是亚瑟王去世的地方“阿瓦隆”（Avalon）。1278年，国王爱德华一世曾命令开启格拉斯顿伯里的一座墓葬，发现了一个战士和妇人的棺柩。他确信其中就有亚瑟和格温娜维尔（Guinevere）的遗体。后来遗失了的坟墓上的十字架铭文写道：“这里安葬着著名的阿瓦隆岛国王亚瑟”。[6]

古老的传说在不断更新着它们的用途。正像中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诺曼国王们那样，喜欢将他们与被征服土地上的前撒克逊统治者相联系，富于幻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通过回顾古代布列吞人的命运来强化现代不列颠的团结意识。阿尔弗列德（Alfred），享有桂冠诗人称号42年的丁尼生勋爵（Lord Tennyson，1809—1892年），将55年的时间用于《国王叙事诗》这部毁誉交加的亚瑟王史诗上。这是一部扩大了的唯心与唯物之间永恒斗争的寓言：

……他们的恐惧
像早晨的影子始终大于中午的影子
抛弃它们，不是那些先前的悲伤
西方有那场战役留下的黑暗
高尚而圣洁的人们在此死去。[7]

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公元二世纪，哥特人从维斯瓦河（即维斯图拉河—译者注）下游的驻地出发，逆流而上向东南方缓慢移动。两百年之后，西哥特人在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黑海沿岸定居下来。东哥特人在更加遥远的东部克里米亚和第聂伯大草原定居下来，不时地与挺进中的匈奴人相遇。在四世纪，一些法兰克部落受罗马帝国的邀请作为皇帝的同盟者（foederati）承担莱茵河上的防卫。

紧随日耳曼人之后的是斯拉夫人。因为与罗马帝国接触较少，史[225]前史又缺乏记载，所以斯拉夫人的早期历史成了现代人凭借灵感自由杜撰的天下。古代“斯拉夫人的故乡”常被看成是一块固定的保留地。较为令人信服的是，斯拉夫人的发源地在更东一些的喀尔巴阡山脉斜坡上的森林地带，尽管如此，波兰的“土著派”史前史学家坚持

认为，斯拉夫人一开始就分布于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域范围内。因为一些不可解释的原因，西方学者喜欢将原始斯拉夫人的发源地划定在没有吸引力和不舒适的地方，亦即普里皮亚特湿地的中部。无论其活动范围在哪里，斯拉夫人的故乡偏离重要的史前地带。这一地区一定被强大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多次劫掠过或征服过。在尼斯河西部的维塔兹科沃（Witaszkowo）发现了一名斯基台人首领的墓葬及其随葬的财宝。关于萨尔马提亚人在此逗留 2000 年的回忆，使波兰贵族得以声称他们拥有萨尔马提亚人的血统。[**十字架**] 迁徙中的哥特人和格皮德人慢慢地移动过去，并没有产生坏的影响。公元五世纪，除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诗篇中留下一段有趣的诗句外，有关匈奴人的信息非常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维德西泽》（Widsith）告诉我们"希德用锋利的剑捍卫自己的古老权位不受维斯特拉森林地区的艾特拉人的侵犯"。[4] 继匈奴人之后是阿瓦尔人创立的斯拉夫—阿瓦尔人联盟，他们的历史在六世纪第一次载入拜占庭史册。

直到公元一千年的中叶，原始斯拉夫民族的语言能否被辨认出来还存在着疑问。这种区分只能从学者的复原中得知。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原始斯拉夫民族语言以非常复杂的词尾变化、动词变位，以及自由的词序为特点。斯拉夫部落常被认为发展了一套有特色的社会制度 [**大家庭**] 或者"联合家庭"，首领的所有亲属都生活在严厉家长的束缚之下。他们崇拜三头神特里格拉乌（Triglav）、太阳神斯瓦罗格（Svarog）、雷神皮伦（Perun）及其他许多神。非常有趣的是，在他们的宗教词汇中，从 Bog（上帝）到 raj（天堂）都有着萨尔马提亚—伊朗语的渊源；正如他们词语中许多与原始技术有关的词是日耳曼语一样，如 dach（在波兰语中是屋顶的意思）、plug（在俄语中为耕作之义）等。尽管独处一隅，他们显然受益于与邻近民族的交往。（见原书附录Ⅲ，第 1223 页）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斯拉夫人历史资料之不可信，以及因此而持怀疑态度是基于对斯拉夫人的如下描述，这些描述是以押韵诗的形式编纂的，"来自普罗可比和皇帝莫里基厄斯（Mauritius）的证据"：

使用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较粗糙且不规则）的斯拉夫人，以其外表的相似性而著名，有别于浅黑色皮肤的鞑靼人，而接近于有着高身材和白皙皮肤的日耳曼人，与日耳曼人又不完全一样。在俄罗斯和波兰省区散落着四千六百个斯拉夫人的村庄，他们的小屋是用原木草率搭建起来的……我们可以夸张地将它们比喻成河狸的建筑。……

[226]

福萨克（FUTHARK，北欧古字母）

卢恩字母或“火柴杆似的符号”构成了维京人使用的字母表基础，该字母表起首的六个字母构成了“福萨克”这一名称。卢恩字母是用凿子刻在木头或石头上的，常作为长似蛇形的碑铭。福萨克有两种异体形式，普通的或丹麦语的福萨克和瑞典—挪威语的福萨克，每一种都有十六个基本符号：

ᚠᚢᚦᚬᚱᚴ ᚼᚾᛁᛅ'ᛏᛒᛘᛚᛦ

卢恩文字的碑铭已有大量发现，尤其是在中部瑞典和丹麦。它们记载着航海、法律协议及死亡，有时是以游吟诗的形式记录的。在北部挪威的特鲁恩斯（Troons）发现的银质项圈，其铭文诉说了该项圈是如何获得的：

Forum drengia Frislands a vit
ok vigs fǫtum ver skiptum
我们占领了弗里西亚人的土地，
并分享了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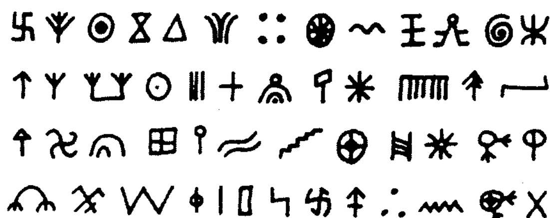
在南曼兰（Sodermanland）的格里帕索尔姆（Gripsholm），一位母亲哀悼她的儿子英格玛（Ingmar）和哈罗德（Harald），他们死于对地中海的远征：

Peir fóru drengila fiarri et gulli
ok. austarla arne gáfu
dóu sunnarla á Serklandi
像男子汉一样，他们为黄金而出征，
在东方，他们曾弯弓射雕，
在南方，他们殒命塞尔兰（Serkland）。

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清真寺的一间美术陈列室，保存着一件卢恩人粗糙的雕刻。另一件雕刻品是圣马克的狮子中的一个，被从雅典带到威尼斯。[1]

但是，卢恩字母不是书写符号。维京人有16个字母的福萨克

可以追溯到公元350年，是从十分广泛的霍瑞斯特宁革（*Hallrist-ningar*）或叫做“卢恩字母库”中精选出来的，这一字母库从铜器时代开始便被用于神秘的预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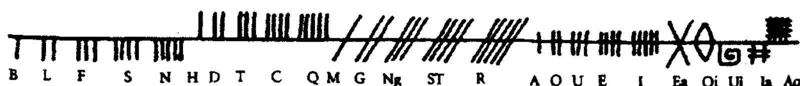


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叙述了有关卢恩字母的知识：

他们从果树上折下一根枝条，将其劈成长条；每一木条上都写上一些卢恩字母，然后听天由命地将其抛在一块白布上。接下来，由国家祭司……或家族的族长……向神灵祈祷之后……拾起其中的三条，每次只拾起一条，并解释刻在木条上的卢恩字母的含义。[3]

后来，出现了许多卢恩字母的变体，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发展出33个符号的字母系列，在通用日耳曼语的地区发展出广泛应用的18个符号的阿曼尼恩（Armanen）的卢恩字母系列（见原书附录Ⅲ，第1234—1235页）。卢恩字母文字为打开维京人神秘而异彩纷呈的审美世界提供了途径。 [227]

欧甘文字（Ogham，或Ogams）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卢恩字母文字的克尔特人翻版，既用于书写又用于占卜，特别是在爱尔兰。每一个符号都是由简单的几根木棒组成，木棒或是垂直于某一水平线，或是倾斜于某一水平线。起初，每一符号都与一棵树有联系，并且一个字母与一种树的名称相对应。但是，通过头韵，也可以使其与鸟和动物相联系，与颜色、一年的周期、一周的每一天相联系：[4]



欧洲土著的书写体系在本质上是异端宗教的衍生物。与北部意大利文字和伊特鲁里亚文字（Etruscan）一样，欧甘文字和卢恩文字是在上帝的预言被一次又一次地置于知识和判断的中心地位中确立起来的。虽然如此，与此相连的知识和魔法一直到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来临时还存在着。

是肥沃的土地而非土著人的劳动，为斯拉夫人提供充足的供应。……种植稷和粟的土地提供的不是面包而是粗糙的营养匮乏的食物。……他们崇拜的最高的神是无形的雷神。

斯拉夫人鄙视对暴君的顺从……他们颇为尊崇老年人和勇敢者，而且每个部落或每个村庄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所有的人都是说服而从不强迫别人。……他们在作战时都是赤着脚，近乎裸体一般。……他们游泳、潜水，潜水时用一根中空的芦苇秆保持呼吸。这些是间谍或逃兵的发明创造。我们对斯拉夫人的军事技术一无所知，其战争的名称我们不知道，征服情况也是模糊的。[5]

说波罗的语的人也仍然处于较为隔绝的状态。维斯瓦河三角洲的东部是普鲁士人，涅曼河谷地区是立陶宛人，杜维纳河西部是列托人，他们的语言在学者们看来相对不发达。这些语言曾被错误地认定为斯拉夫语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与梵语相比它比较接近原始的印欧语。与所有的印欧人一样，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居民一定是在史前时期从东方的某一地点迁移过来的，但是对他们的这些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他们定居在最后一次冰川的冰碛遗迹上，身处黑暗松林之中与泛着微微亮光的湖泊为伴。在第二个千年的头五百年，从相反方向大规模迁徙之前，同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一样，他们也处于隔绝状态。[**立陶宛语**]

[228]

立陶宛语（LIETUVA）

有权威确认，立陶宛语是“所有印欧语中最古老的”，[1] 抑或是“与其他当代印欧语相比，它保存着古老的形式”。[2] 甚至在卡尔·布鲁格曼于1897年出版的《语言学大纲》（Grundriss）中，立陶宛语仍是罗曼蒂克派语源学（etymologists of the Romantic）最具说服力的语言。

确实，古典学者从立陶宛语词汇手册的单词核心部分辨认出：vyras 是“人”，saulē 是“太阳”，mēnuo 是“明亮”，ugnis 是“火”，kalba 是“语言”。立陶宛语还保留着双数和复数、由鼻音发出的长元音、七种格的变化、动词的时态、动词的变化、不同于拉丁语的语气变化。另一方面，立陶宛语词汇中的斯拉夫语因素也很多：galva“头”的意思（俄语中为 golova）；ranka“手”的意思（波兰语中为 ręka）；paukštis“鸟”的意思；žiema“冬天”的意思；

sniegas 意为"雪"（波兰语中为 ptaszeh，zima，和 śnieg）。波兰语中也有复数、鼻元音、七种格的变化。与立陶宛语（或法语）不同，大部分斯拉夫语并没有失去中性形式。实质上，与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相比，立陶宛语最主要的特性是大众化。任何认为立陶宛语近似于梵语的人见此都会陷入失望。

立陶宛语的一些遗存仍然值得注意。在立陶宛大公领地（见原书第 392 页）内，立陶宛语保存在当地农民的方言中长达数世纪之久，但从来没有被作为高级文化的语言或官方语言。用罗塞尼亚语（ruski 或 Ruthenian）写的《立陶宛条例》（Lithuanian Statutes）在 1530 年译成拉丁语，1531 年译成波兰语，然而从来没有译成立陶宛语。M. 马兹维达斯（M. Mazvidas）的《问答集》（Catechism，1547 年）认为，立陶宛语是宗教语言。十九世纪，俄国教育家试图将其用古代斯拉夫语的字母（Cyrillic）印刷出来。但是，波兰的维尔纽斯（Wilno，即 Vilnius）主教们用罗马字母表支持立陶宛的初等教育，使这一策略并没有实现，并因此而将立陶宛与天主教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为业余语言学家学习圣经文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Ir angēlas
tare jiems:
'Nesibijoktes!
Štay!'
Apsakau Jams didį dźaugsmą?
kurs nusidůs
vissiems źmonems.（Luke 2：10）[3]

不论西方人的习惯如何，将蛮族迁徙视为一个整体是非常重要[229]的。在这里，蛮族并不局限于日耳曼人，范围也不限于西方的罗马边境线。公元四世纪末叶，戏剧性地突然出现在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有着更为广阔的地理学和编年学上的背景。

这场民族迁徙浪潮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 376 年。此时，东哥特人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向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请求定居在默西亚。于是，一些东哥特人被允许跨过多瑙河，但要求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子女。两年后，即 378 年的 8 月，双方在亚得里亚堡（Hadrianopolis，即 Edirne 埃迪斯）展开一场激战，皇帝瓦伦斯阵亡。多亏哥特人的同盟者——萨尔马提亚的阿兰人的重装骑兵，不可战胜的罗马军团才被彻底打败。（在军事史上，萨尔马提亚式长枪及其大

型军马的出现，标志着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战争开始。）此役之后四年，西哥特人也开始了迁徙。他们的国王和军事领袖阿拉里克与东哥特人的胜利并不是毫无联系。作为安抚手段，阿拉里克被授予伊利里亚军事长官的头衔（magister militum illyricorum）。但是在为期30年的冒险生涯中，帝国的这一头衔并没有阻止他进行大肆掠夺，首先劫掠了雅典（396年），之后又洗劫了罗马（410年）。阿拉里克之所以被激怒，直接原因是帝国拒绝接受西哥特人提出的定居诺里克姆（Noricum）的请求。因此，阿拉里克计划率领部众去非洲。他在科林扎（Cosenza）的去世使这一计划发生了改变。阿拉里克的继任者阿泰阿尔夫（Athaulf）娶了被俘的罗马皇帝洪诺留（Honorius）的异父姊妹。阿泰阿尔夫的弟弟瓦利亚（Wallia）时，通过使西哥特人定居于阿基坦缓解了迁徙进程。在图卢兹（Tolosa 即 Toulouse）建立的西哥特王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以短暂的王国为跳板，在507年之后的时间里，西哥特人由此出发在西班牙创建了最为持久的遗产。

西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蹂躏为三次更大规模的入侵打开了缺口。当罗马的高卢军团因为阿拉里克的入侵而撤回以保卫君士坦丁堡时，莱茵驻军就变得薄弱了。约于公元400年的某个时候，勃艮第人趁机进占莱茵河与美因河交汇处。30年后，他们受到罗马将领埃伊希厄斯（Aetius）的挑战，但被匈奴援军击退。443年勃艮第人退回，长期定居于里昂附近。此后，勃艮第王国在罗讷河与索恩河流域一带发展，控制了通往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通道。[**尼贝龙根**]

406年的圣诞节，大批蛮族人在科布伦茨跨过冰封的莱茵河。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涌入高卢。汪达尔人采取的是阿拉里克当年前往非洲的迂回路线。他们在409年穿越比利牛斯山，在429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在439年突破了迦太基的大门。汪达尔人用33年的时间从莱茵河地区长途奔袭2500英里到达非洲，又从迦太基本土打到地中海岸边，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和撒丁岛。455年，在亨塞里克（Genseric）率领下，汪达尔人效仿阿拉里克掠夺了罗马城。非洲的汪达尔王国一直到下一个世纪，到东罗马帝国的力量有所恢复时仍保持着它的强势。在西班牙，汪达尔人与原来的同行者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发生了分离。苏维汇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建立了一个王国，西部阿兰人占领了塔霍河流域。

[230]

尼贝龙根（NIBELUNG）

五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勃艮第宫廷坐落于莱茵河畔的沃姆斯。在从前军事首领的率领下，以尼贝龙根人而著称的勃艮第人作为一种补充力量驻扎在帝国的边境线上。435—436年，在与罗马将领埃伊希厄斯以及与西进过程中的匈奴人作战期间，他们被驱逐出原来的驻地。从后来的《勃艮第法典》（Lex Burgundiorum）中，我们知晓了勃艮第王室三兄弟的名字：贡特尔（Gundharius或Gunther）、吉塞尔（Gislaharius或Giselher）和吉穆特（Godomar或Gemot）。在日内瓦一带停留不久之后，461年他们进入里昂，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勃艮第王国。[鲁格敦乌姆] 在沃姆斯，前王宫遗址的一块纪念碑使我们依稀看到这座城市的一些特征：

这是曾是
罗马人的神庙圣地
尼贝龙根的王室城堡
查理大帝的驻地
沃姆斯王公主教的宫廷所在地
这一切都毁于1689年和1754年法国人的入侵
这里曾举行过无数次皇帝和王公的会议
在这里，面对皇帝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曾站着大义凛然的
马丁·路德[1]

由此往北，在今天荷兰边境附近的克桑滕有一座圣维克托大教堂。圣维克托是后期罗马时代的一位基督教殉教者，在传奇故事中，他成为武士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即Victory - Peace胜利—和平）的原型。

勃艮第人在沃姆斯逗留期间，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仍驻扎在多瑙河中游的平原地带。最为著名的德国传奇故事中，匈奴人也成为许多历史背景材料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再加进神话和传奇的幻想共同构成了这部英雄传奇。

《尼贝龙根》是由2300节诗组成的史诗，完成于十三世纪早期的奥地利。在现存的34个手稿中，手稿A存于慕尼黑，手稿B存于圣戈尔（St Gall），手稿C存于多瑙埃兴根。所有手稿的内容都是关于齐格弗里德到来之后，勃艮第宫廷里发生的一系列冒

险故事。齐格弗里德是一位隐形王子，曾经杀死一条龙，因此被称为屠龙者。他还是尼贝龙根宝藏的守护人，拥有一件制造黑暗的魔力披风。齐格弗里德从萨克森军队手中拯救了勃艮第国家，征服了冰岛女王布伦希尔特（Brunhild）。按照布伦希尔特的愿望，她只屈从于在体育比赛中击败自己的人。齐格弗里德并没有娶布伦希尔特，而是将她让给了国王贡特尔，以此赢得了国王的妹妹克里穆希尔特（Krimhild）。当布伦希尔特得知自己在体育比赛中失败的秘密后，夫妻二人的甜蜜立即就被冷淡所取代。贡特尔的扈从哈根（Hagen）发现了齐格弗里德的致命之处后，趁齐格弗里德在泉边喝水之机用长矛将其刺杀致死，然后将其财宝抛进莱茵河。[2]（见图9）

[231] 正如《尼贝龙根》的匿名作者将异教徒的传说转换成中世纪德国宫廷和基督教风格的故事一样，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将《尼贝龙根》的故事改编成富有浪漫色彩的歌剧形式：《莱茵河的黄金》（*Das Rheingold* 1869年）、《女武神》（*Die Walküre* 1870年）、《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1872年）和《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 1876年）。1876年8月，在拜罗伊特的费斯特斯拜尔豪斯以《尼贝龙根的指环》的剧名，首次全部上演。

《尼贝龙根》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成为寡妇的克里穆希尔特离开德国，同不信上帝的埃策尔（Etzel 即 Attila 阿提拉）结婚。不久，她在埃策尔堡邀请她的勃艮第亲属来访，目的是要为她心爱的齐格弗里德报仇。当她用齐格弗里德的忠诚之剑砍下哈根的头之后，也把整个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带进了一场血亲复仇的大屠杀之中。

当代精通文学的圣地朝拜者们，可以从沃姆斯到"匈奴人之地"（Hunland）探寻一下勃艮第人走过的道路。可以从帕绍（Passau）"三河交汇处"这一克里穆希尔特的弟弟担任主教的地方出发，到鲁帝格伯爵（Count Rudiger）的宫廷所在地博希拉恩（Bechlaren，即 Pochlärn），然后再到麦尔克（Melk）要塞、罗马人的门户特赖斯毛尔（Traismauer），再到埃策尔迎接他的新娘的地方图尔恩（Tulln），再到曾经举办过17天新婚宴会的维也纳（Vienna）。但是，结局是令人悲痛的：

> 这就是传说的结局。
> 就是尼贝龙根的毁灭。

410年，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撤离，给了渡海而来的入侵者以

进攻的信号。一个多世纪以来，罗马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坚守这一“撒克逊沿岸”的堡垒。如今，罗马—不列颠人被孤立无援地留在了不列颠。418 年之后，部分罗马军队可能回防了一二十年，但是，446 年，向埃提乌斯提出的援助请求归于徒劳。不久，不列颠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定期联系变得严峻起来。从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长船不仅带来了袭击者，而且带来了雇佣兵和殖民者。457 年，肯特屈服于亨吉斯特率领的朱特人。朱特人的名字得自该部落取道弗里西亚去往丹麦的“朱特兰”(Jutland)。盎格鲁人接管了不列颠的东部沿海地区。盎格鲁人的名字得自于较早的居住地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盎格伦”(Angeln）地区。他们驾船进入亨伯河，见到了庞大的麦西亚王国统治下的农村公社。麦西亚意为“马尔克”或“边疆”。撒克逊人在艾尔(Aelle）的率领下首次登上了不列颠南部海岸，奠定了南部撒克逊(Sussex 苏塞克斯）王国的基础。诸如中撒克逊（Middlesex 米德塞克斯）与东萨克森（Essex 埃塞克斯）之类的其他撒克逊人，则溯泰晤士河谷而上进入不列颠。

对东部不列颠的长期征服和殖民的结果，产生了“英格兰”。三个多世纪以来，成百个地方酋长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弹丸小国，直到通过[232]一段时期的联合和兼并出现较大的政治集团将其兼并为止。作为后来最为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公国的西撒克逊（Wessex 威塞克斯），直到 940 年，也就是第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到达不列颠后 500 年，才翦除其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受到强大压力的不列颠人也极力阻止这一征服进程。公元 500 年，带有半传奇色彩的亚瑟王在蒙斯巴多尼库斯(Mons Badonicus）取得胜利，使盎格鲁·撒克逊人被迫退却，西部的克尔特人得以留下来。[**特里斯坦**]

当日耳曼人蹂躏罗马帝国西部各省的时候，这场灾难的发起者匈奴人则最终出现在潘诺尼亚。420 年，他们在蒂萨河（Tisza 或 Theiss）的平原地带建起了营帐式都城。443 年他们受阿提拉的统治（约公元 404—453 年）。阿提拉的名字变成了肆意破坏的代名词：“阿提拉的马踏过的地方，草永远不会再变绿。”阿提拉这一“上帝之鞭”在帝国的多瑙河各省施行了报复性掠夺。451 年，他掠过北方和西方，纠集起一个包括格皮德人和勃艮第人在内的蛮族联盟。在圣吉纳维夫（St Geneviève）的祈祷下，巴黎避免了阿提拉的洗劫。但是，在夏龙(Chalons）附近的卡达拉翁旷野（Catalaunian Plains），习惯于草原地带的匈奴骑兵在埃提乌斯组织的由狄奥多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和“滨海”的由墨洛温控制的撒利安法兰克人组成的联军阻击下遭到惨败。“匈奴人向莱茵河以外的退却是以西罗马帝国的名义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6] 之后，阿提拉率众转向意大利。都灵、帕多瓦（Padua）和阿奎莱亚

(Aquileia) 遭受了梅斯从前经历过的灾难。“后来的人很难再见到阿奎莱亚的遗迹。”在米兰，阿提拉被一幅宫廷壁画所激怒，该壁画所描绘的是锡西厄（Scythia）的国王匍匐于罗马帝国皇帝面前的情景。他命令一个画家将画中的角色做了调换。452年，在博尔塞纳湖畔，罗马宗主教利奥一世不知如何劝服阿提拉撤军。其结果是，阿提拉退回到了蒂萨河一带。据说，阿提拉掳回了一名叫爱尔迪克（Ildico）的妇女，在新婚之夜因动脉血管破裂而亡，“血液由破裂的血管喷出……涌回到胃和肺部，使其窒息而死”。匈奴部落的骑兵们如同当初突然出现一样，又在瞬间散去。在从前盟友背信弃义的打击下，匈奴人被迫将占领的潘诺尼亚驻地让给了格皮德人和东哥特人。[**乔包**] [**流行病**]

阿提拉之死为东哥特人争取完全独立提供了有利时机。从潘诺尼亚出发，他们在东罗马帝国开始了一场劫掠，直到狄奥多里克得到通常的战利品外加意大利军事统帅和大祭司头衔，劫掠才停止。不幸的是，在狄奥多里克进驻意大利时，这里已被另一个蛮族将领占据，而且轻易地就把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废黜了，他就是奥多亚克。奥多亚克是作为西西里、达尔马提亚、甚至阿尔卑斯山南的雇佣军首领而占有这一职位的。两强相遇，一场决战在所难免。经过对拉文纳三年的围攻，奥多亚克被狄奥多里克谋杀，狄奥多里克最终获胜，这已是493年。这为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开辟了道路。

[233]

流行病（EPIDEMIA）

根据记载，在451年被埃提乌斯打败之前，阿提拉所率骑兵中的许多人都已染上重病。一些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说，是匈奴人将天花带到了欧洲地区。[1] 其他一些人则称，天花早在公元165—180年间的罗马大灾疫中就已经非常严重了。较为确切的是，天花在十八世纪曾夺去了大批人的生命。在疫苗发现之前，1719年的疫病大流行使巴黎一地就有14000人丧生。此后，路易十五也于1774年死于天花，约瑟夫二世1790年也可能死于天花。

在最初的时间里，人们都惧怕瘟疫的降临。在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可怕的瘟疫女魔被村民在情急之中杀死的故事。《圣经·启示录》曾谈到，骑在“灰马”上的第四个活物，“他的名字就是死亡”。

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来说，需要搞清楚的最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疾病在悄无声息地伴随了几代人之后，会

突然以毁灭性的毒性爆发。环境的变化、变异体的疲劳、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等都可能构成疫病爆发的因素。以天花为例，这种灾疫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人所共知的，但却没有造成最严重的灾难。但是，当它传到美洲时，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毁灭了整个阿兹特克文明，大批的土著美洲人死亡，使其占人类 20% 的人口减少至只占 3%，“单单这一个因素便在美洲建立并维持了奴隶制”。[2] 反过来，梅毒成了“美洲对欧洲的报复”，这种病毒在美洲只引起皮肤发炎，在欧洲则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或损坏了外貌。[**梅毒**]

疟疾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在古代，作为地方性疾病曾夺去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命，但它从来没有发展成让人谈之色变的流行性时疫。然而，它一直在不断地夺走人们的生命，特别是在罗马附近的坎佩尼亚沼泽地区，此处有适合疟原虫生存和繁殖的温度及长年不流动的死水。日积月累，此处“对大量的人造成极大的伤害”。[3]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有爆发之日，每一个时代也都有特殊的流行性灾疫。麻风病在十三世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十四世纪，黑死病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了出来（见第六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梅毒曾几度肆虐，一直蔓延至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浪漫时期是肺结核疯狂爆发时期，肖邦、济慈等不计其数的人都死于肺结核。欧洲早期工业城市霍乱成灾，二十世纪早期，流行性感冒不时出没。艾滋病作为二十世纪后期的麻风病，使一个对科学自鸣得意的时代感到震撼，充分表明瘟疫并不只是历史上才有的奇事。[**麻风病人**] [**防腐消毒剂**]

同样，墨洛温的孙子克洛维（Hlodwig 或 Clovis 约公元 466—511 年）作为撒利安法兰克人的国王，利用罗马人同盟者（*foederatus*）的地位，在纷争不断的高卢行省扩展了自己的版图。在撒利安法兰克人的早期居住地图尔奈，克洛维打败高卢境内的最后一位“罗马人”将军赛阿格里厄斯（Syagrius），之后，又征服了竞争对手里普利安法兰克人（即现在的“法兰克尼亚”）、阿拉曼人（Alamanni）、勃艮第人，507 年又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克洛维将所有的法兰克人小王处死，娶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克洛蒂尔达（Clotilda），他本人约在 496 年在兰斯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从比利牛斯山到巴伐利亚的庞大的“墨洛温家族的”疆域。据说，克洛维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皇帝处接受了王权和罗马执政官的尊称。克洛维的统治持续了三十年，最后死于新都巴黎。除去以上所述，他还建立了拉维塞（Lavisse）所说的“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这一力 [234]

量注定要产生法兰西和德意志两大帝国。

在公元六世纪，尽管查士丁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一再声称对西欧领土拥有统治权（见下文），蛮族的征服还是巩固了下来。与高卢南部建立的蛮族国家不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日渐兴盛起来。在莱奥维希尔德（Leovigild）统治时期，西哥特王国建都托莱多，且兼并了苏维汇人的领土。东哥特王国则包括了多瑙河沿岸的几个行省和意大利，后来被最后一批迁徙的东部日耳曼人部落伦巴德人接管。伦巴德人或称伦巴底人（Langobardi），有着长长的胡须，在匈奴人解散之后，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控制多瑙河以北的格皮德人和阿瓦尔人。568年，他们折返南下，以帕维亚为中心建立起新的霸权。从此，意大利半岛便成了伦巴德人、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人和不断加强实力的法兰克人之间纷争的舞台。事实上，法兰克人正在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扩张。向北，他们取代了曾在高卢北部沿海一带建立统治的撒克逊人；向东，他们对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形成巨大的压力。法兰克人兼并了巴伐利亚山口的阿瓦尔人之后，又将日耳曼殖民者派往多瑙河中游的“奥士特兰”（Ostland）或“奥地利”（Austria）。正是阿瓦尔人在多瑙河盆地的毁灭，为斯拉夫人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西斯拉夫人溯易北河和多瑙河而上，穿过平原。温德人或者是卢塞舍的索布人占领了奥德河西部和现今的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捷克人部落接管了波希米亚，斯洛伐克人接管了喀尔巴阡山南部斜坡地带。这一切都为繁荣于八世纪和九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奠定了基础。“来自开阔草原地带”的波兰人，首次出现在奥德河的一条支流瓦尔塔河一带。与此相关的部落最终占领了整个维斯瓦河流域。

[235]

维斯瓦河流啊流，
流过了波兰人的土地，
流过了波兰人的土地，
只要维斯瓦河在不停地流，
波兰就将屹立永在，
波兰就将屹立永在。

东斯拉夫人从第聂伯河流域向东、向北逐渐进入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人的活动地区，以及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东斯拉夫人的这一离心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为后来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如果说波兰人曾经歌颂过维斯瓦河是他们的“母亲河”，那么，俄罗斯人则正在唱着伏尔加河是他们的“母亲河”。

六世纪，南斯拉夫人在多处地方突破多瑙河防线侵入帝国境内。540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围攻。他们对伊利里亚、保加利亚、马其顿 [**马其顿**] 和希腊的大部分进行斯拉夫化。在现在波兰南部第一次出现的克罗地亚人，于萨瓦河上游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建立了殖民地。在德拉瓦河一带定居的一支南斯拉夫人发展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则占领了德拉瓦河、萨瓦河和多瑙河三河交汇地区。

迁徙中的部落对他们的邻居抱有何种动机是非常不明确的。他们对征服地区的原住民，不是彻底镇压就是加以同化，而这些被征服地区的原有居民常常是被迫转向流动。在西欧，克尔特人在高卢陷入彻底覆灭，在不列颠则被驱赶进特定区域。只有爱尔兰免于入侵。一支来自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即苏格兰人）迁入喀里多尼亚高地，通过征服当地的皮克特人奠定了盖尔人苏格兰的基础。与此同时，从康沃尔迁出的一支克尔特人在布列塔尼奠定了基础。在其他地方，克尔特—不列颠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进威尔士居留地。

在东方，黑暗时代最黑暗的时候，多瑙河流域持续了近乎三个世纪的混乱并没有结束。斯拉夫人仍然缺乏文字史料，他们与阿瓦尔人和日耳曼人的东进前哨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文献记载。在游牧的马扎尔人于九世纪侵入之前，最后一块拼图板仍没有完成（见原书第296页）。在彭甸大草原，乱作一团的人们纠合在了亚洲冒险家卡扎尔人的另一部落的霸权之下。他们于七世纪早期屈服于来自北高加索的突厥王朝的权力之下。尽管印欧斯拉夫人也出现在这一人群当中，但是直到九世纪基辅国家建立，他们并不是主导力量。[**卡扎里亚**]

[236]

卡扎里亚（KHAZARIA）

在欧洲大草原上转瞬即逝的王国中，没有一个比卡扎尔人建立的王国更能引起争议。从公元630年起到970年止，卡扎尔人在东西方之间的联系方面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公元630年，卡扎尔人为阿希纳（Ashihna）的突厥人王朝所托管，公元970年，卡扎尔人被基辅的斯维雅托斯拉夫大公所征服。

卡扎尔人的行政组织反映了其臣民的多样性。卡扎尔可汗或汗统治着三个主要行省、七个依附国和七个朝贡部落。最主要的行省科瓦利斯（Kwalis）以伏尔加河下游的两个城市阿莫尔—阿提尔（Amol - Atil）为中心（后来的察里津所在地）。特里科河畔的塞门德尔(Semender)是卡扎尔人被驱逐出土耳其斯坦后其王朝较早的

庇护所。萨克尔（šarkel）的中心位于伏尔加河拐弯处西部的顿河流域，其统治中心是拜占庭工程师在九世纪建造的同名城市，该城是由石头建成的。

在几个附属国中，最重要的是地处克里米亚的霍特兹尔（Khotzir），是卡扎尔的新总部。霍特兹尔继承的是哥特人的领土，哥特人则占领了博斯普鲁斯的古老的希腊人王国。[**克索尼索斯**]霍特兹尔的统治中心位于黑海沿岸的富莱（Phullai），即现代的帕莱内斯库（Planerskoe），在黑海贸易中控制着一支强大而活跃的犹太人团体。其他几个附属国包括苏拉克河流域的匈奴人国家（阿提拉后裔的故乡），卡马河流域的奥农加（Onogur），顿涅茨（Donets）河流域的土库伊（Turkoi）或莱维地亚（Levedia，后来的马扎尔人的故乡），以及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三个分部。至于北部森林地带的几个朝贡部落，有三个在种族上属于斯拉夫人，有三个是芬兰人，还有一个身份不能确认。

卡扎里亚以其商业和宗教的宽容性而著称。它也是地中海奴隶市场一贯的支持者（参见原书第257页）；十世纪时，陆地上的商路沿着累根斯堡—维也纳—克拉科—基辅—阿提尔一线开始发展。

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异教徒的宗教，在他们各自的公共法庭上都得以发挥作用。卡扎尔的军队大部分来自东部省份的伊朗穆斯林；737年可汗本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不久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就改信了犹太教并将其定为国教。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信仰的转变在拜占庭、阿拉伯或犹太人的史料中并没有引起反响；但是，此事对阿基坦的修道士德鲁斯玛（Druthmar）来说是知道的，864年他在威斯特伐里亚的科维（Corvey）修道院写道：

"在上帝和雅各的土地上，那些匈奴人和自称卡扎尔人的人，是好战之徒……而且都信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1]

七世纪至九世纪正值阿拉伯人向外扩张期间，卡扎里亚大体上是与拜占庭结盟反对阿拉伯人。[237] 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开辟了波罗的海—第聂伯河的商路，控制了基辅，可能也辖制了整个可汗的领土。[**罗斯**]

对卡扎尔人改信犹太教一事，犹太历史学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朱达·哈拉维（Judah Halevi，1075—1141年）在写于托莱多的作品中，将卡扎尔可汗理想化为信仰的英雄。克里米亚的圣经派信徒则称卡扎尔人为mamzer，意为"杂种"或"假犹太人"。但是，作为学者的圣经派信徒阿伯拉罕·福克维奇（Abraham Firkovich，

1785—1874年）则宣称，卡扎尔人也曾是圣经派信徒。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写于1970年的著作则认为，迁居来的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产生了中欧阿什克纳济犹太人（Ashkenazy Jewry）社团的主体。[2] 卡扎尔人之谜至今仍得不到充分解答。

然而，卡扎里亚仍有其生命力。在希腊，孩子们过圣诞节并不是期盼来自拉普兰的圣诞老人，而是盼望着来自卡扎里亚的圣巴西尔（St Basil）的到来。

民族迁徙对欧洲大陆的种族和语言结构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个别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人口的种族混合局面，并在许多方面引进了全新的成分。如果说在公元400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可以清楚地划分为“罗马人”和“野蛮人”的话，那么，到公元600年或700年的时候，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已是远为复杂得多的半野蛮化的前罗马人和半罗马化的前野蛮人的混合型居民了。

例如在西班牙，罗马化的克尔特—伊比利亚人接受了日耳曼人的富有意义的加入，之后，又有非常重要的摩尔人和犹太人加入。在高卢，高卢—罗马人接受了较为强大的但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的日耳曼人加入，日耳曼人在东北部的影响深一些，在西南部影响就小一些。在意大利也有类似情况，拉丁化的克尔特—意大利人吸收了强大的日耳曼人因素，在意大利北部，日耳曼因素占据支配地位。在不列颠，罗马—不列颠人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取代，留下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即西部的克尔特人社会和东部、中部及南部的日耳曼人社会。在苏格兰，也分成低地日耳曼人社会和高地克尔特人社会。在德意志，西部日耳曼人和东部日耳曼人之间的平衡明显地偏向西部日耳曼人，因为大部分东部日耳曼人都迁移出去了。斯拉夫人不仅牢牢地控制着东欧平原北部，而且控制着巴尔干。在斯拉夫人的新家园里，许多非斯拉夫人也留了下来，其中包括瓦拉几人。*

种族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语言的变化。粗俗的拉丁语曾作为西部帝国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这时，从葡萄牙到罗马尼亚，逐渐分裂出一些对旧有拉丁习语的删节语。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拉丁语中的 *pater*（父亲）变成了 *padre*，在法语中为 *père*，在罗马尼亚语中

---

* 瓦拉几人是一个陈旧的斯拉夫人的用词，用来指拉丁人。由此产生了许多瓦拉几人的国家：古老的瓦拉几人活动于塞尔维亚，大瓦拉几人活动于色萨利，小瓦拉几人地处北部罗马尼亚，瓦拉几国家地处南部罗马尼亚，大摩拉维亚作为尼格罗拉提尼或“黑瓦拉几”的土地，地处阿尔卑斯的迪纳拉山脉。Wlochy 一词在一般的波兰语中仍代表“意大利”。

为 *tata*。

[238] 语言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在法语的发展过程中，通俗拉丁语作为高卢本地的罗曼兹语，在现代法语的变化得到公认之前，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八世纪的罗曼兹语，十一世纪的古法语，十四世纪的中世纪法语。旧拉丁语中格的变化、动词变位以及变音被略去之后，发展出一套新的语法和新的构词法。拉丁语中的 *Bonurri*，*bonam*，*bonas*（好）逐渐发展为 *ban*，*bonne*，*bonnes*。*Rex*（王）变成了 *le roi*；*amat*（爱）变成了 *aime*；*regina*（统治）变成了 *la reine*。在“罗曼语”最早的文本中，《斯特拉斯堡誓言》（Strasbourg Oath）可追溯到843年，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已不再说日耳曼人的法兰克语了。不列颠在此前是罗马众多行省之一，但是在那里拉丁语清除得非常彻底。

希腊语在东罗马帝国仍在使用，既作为官方语言，也作为某些地方的地方用语，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希腊语仍作为本地语言。但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斯拉夫化了，这其中就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此问题上，必须避免过分简单化。但是巴伐利亚学者雅克·福尔摩耶尔（Jakub Fallmerayer，1790—1861年）在其著作《现代希腊的起源》（*Ueber die Entstehung der Neugriechen*，1835年）提出的论点，非常值得关注。福尔摩耶尔的著作在当时的希腊人中引起了极深的伤害，他认为，大部分从希腊化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传承下来的现代希腊民族中，“他们血管中流淌着的很难说有一滴是纯正的希腊人的血”。这或许带有一点夸张，但是，与每一个现代希腊人都是古希腊居民的直接后裔这一观点相比，福尔摩耶尔的观点并不算荒谬。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可以理智地宣称他们是纯粹的“纯净的种族”。**[马其顿]**

斯拉夫人的散布促进了三个主要斯拉夫语族的发展，这三个语族是十几种斯拉夫语的源头。（见原书附录Ⅲ，第1233页）

到八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各种族安定了下来，但这仅是取得持久的种族组合模式的开始。确实，八世纪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产生时期。未来欧洲基本人种的构成，还需另外五次较重要的民族迁徙。在后来五次民族迁徙中，其中之一是海上入侵者维京人（见原书第293页），两次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和蒙古人（见原书第296－298页），另外两次是为一种新兴宗教而战的摩尔人和土耳其人（见原书第253、386页）。欧洲正是从这些最为不同的因素中加以构思的，它的诞生则在痛苦中被延长了。

帝国：从罗马到拜占庭，330—867年

从330年开始，罗马帝国的统治中心已是博斯普鲁斯，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帝国的古罗马精神、“拉丁语文风”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政治的优先地位也发生了改变：此后帝国的中心地带已不是意大利，而是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皇帝最为关心的省区也不再是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而是埃及、叙利亚，甚至亚美尼亚。逐渐地，帝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防御的边境也不再是莱茵河，而变成了多瑙河的下游和彭提斯沿岸。鉴于这一转变，大多数历史学家喜欢将“罗马帝国”的名[239]称改为“拜占庭帝国”。但是无论如何，皇帝及其统治下的人们仍认为他们自己是“罗马人”。君士坦丁除了放弃了一个腐朽的都城外，其他什么都不放弃。帝国东西方之间分歧的发展是缓慢的，当时的人们根本觉察不到。对他们来说，帝国稳定的连续性结构所给予的印象比变化带来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而且，在“罗马”被“拜占庭”取代这一点上，并没有普遍一致的观点。从起源上看，裂痕可追溯到屋大维和马可·安东尼，两者间的对立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暂时分裂。在当时，拜占庭已逐渐凸显出来，东部帝国重要性的加强可以视为对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一种迟到的补偿。是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精心挑选了帝国的东半部，他们可被称为“第一位拜占庭皇帝”。对这一头衔展开竞争的其他较为突出者，应是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查士丁尼以及希拉克略。站在另一极端的角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帝国与西部之间的联系彻底割断之前，不应该贴上“拜占庭”的标签。在这种观点支持下，人们应强调九世纪甚或是十一世纪，此时希腊教会与罗马拉丁教会的伙伴关系最后结束。因此，“拜占庭”并不是晚期古代罗马的陪衬，而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陪衬。

这一转变时期持续了五百年。四五世纪，帝国与西部各省的联系已被削弱到皇帝不得不放弃统治的程度。古代异教残余被镇压。六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的一致目标是恢复与帝国西部的联系，但以失败而告终。随后，伴随着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流入，帝国境内说拉丁语的遗民们受到压制。拜占庭完全为希腊语所占领。七世纪，最有价值的东方行省被阿拉伯人征服。帝国领土大大缩小，缩小到亚历山大征服前的古代希腊世界的程度（参见地图5）。八世纪，阿拉伯人的扩张浪潮正在减退，帝国却为一场令人震惊的延时很长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宗教狂热所震撼，这场宗教运动是东西方基督教大分裂的根源之一。在保加尔人的可汗用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头颅作饮器痛

饮美酒之前，与可怕的保加尔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仍得不到控制。圣像破坏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42—843年才结束。865年与保加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此时，战争的领导者接受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洗礼。五百年的动乱归于结束。此后，罗马帝国用两年的时间建立起强大的马其顿王朝，该王朝的皇帝们将帝国推向鼎盛。在这前五个世纪的时间里，长期的内忧外患毫无疑问改变了帝国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生活。正是到此时，而非此前，拜占庭才在各种意义上真正地继承了罗马人的世界。

[240] 五世纪，帝国对西部各省统治的崩溃是帝国长期衰退的结果。蛮族的入侵是否加速了业已开始的这一进程并不能确定。吉本（Gibbon）等人就曾强调帝国统治阶层的颓废奢侈所起的作用。其他一些人则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如货币贬值和价格暴涨、过重的税收、官僚作风、农业的衰落，由此导致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所称的“等级政体”。与社会阶层的硬化相伴的是“人们心态的大转变”。[7] 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帝国支持不了无限期的军事行动。蛮族士兵和前蛮族将领向帝国的军队渗透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帝国走向崩溃的时刻正在慢慢临近。至少在四世纪，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已受到来自西方的蛮族和东方的波斯人的威胁。花费多年时间在高卢恢复了莱茵河防线的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杀。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64—375年在位）重新划分了帝国，以便继续朱利安在高卢的事业。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8—396年在位）作为一个罗马将领的后代，致力于解决由东哥特人入侵造成的危机（见原书第229页），并为恢复帝国的统一做最后的努力。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东西方之间的分裂便成为永久的了，只好任由西部各省分离出去。在米兰实行统治的洪诺留（Honorius，395—423年在位），起初处于汪达尔人将领斯底里科（Stilicho）的控制之下，据说，除了对饲养的宠物鸡的名字有所了解外，他对罗马一无所知。

476年，帝国在西方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具有建设性的。是年，一个有着象征性名字的男孩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作为最后一个傀儡被纷争不已的军人集团推上了皇帝的宝座。通常，此事须由罗马元老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取得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同意。但是，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东罗马帝国皇帝确认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权力，而是请求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本人接管帝国西方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元老院还授予奥多亚克以贵族称号。蛮族出身的奥多亚克此时已实际控制着意大利。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帝国政府已不

复存在，但帝国的统治原则在理论上仍然保持着。因此，476年之后数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帝仍保持着对帝国西方的最高权力。在前帝国行省的蛮族统治者中，没有一个关心这一要求的。东罗马帝国的这一权力要求的存在，也正是西方最高权力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古文字**]

因此，整个帝国的策略就是接受蛮族提出的要求，而不尝试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解决办法。帝国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大，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皇帝们急需入侵者的献纳，这既包括金钱上的呈献，也包括荣誉上的歌颂。皇帝们将蛮族人尽可能地安置在他们所要求的土地上，或默许他们必需的地方。皇帝们大批雇佣诸如汪达尔人出身的斯底里科、赫鲁利人（Heruli）出身的奥多亚克之类的蛮族将领，招募大批的蛮族士兵，所有这一切一步一步地搅乱了西部各省的政治生活。最后，皇帝是否给予蛮族军队推选的傀儡恺撒或蛮族国王以祝福已非实质性问题了。但是，罗马帝国并不是被蛮族入侵毁灭的，认识到这一点非[242]常重要。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退缩了，并伴随着巨大的损失，既有领土的损失也有影响力的减退。然而476年之后，它仍维持着一个整体近千年，并在几个关键时刻成功地重申了它的权力。其他方面则完全屈从于西方的偏见。[**推克欧斯**]

[241]

古文字（PALAEO）

四世纪，在晚期罗马帝国的书写文字中出现了一种安色尔体字母，或称之为“寸高字母”。总体说来，这种字母比较小、比较圆，与帝国境内曾经存在过的字母相比更适合书写的要求。这种书体与传统的拉丁字母的书写体长期并存，而传统的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曾经是“方的”，后来发展为没有标点符号、单词间没有空格的“不规则的”大写字母。从安色尔体字母或半安色尔体字母阶段开始，拉丁书体便开始了长期的发展进程，经过了加洛林时期的草体字母和哥特体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草写体和斜体。[**卡德摩斯**]

Latin 500 BC	Cursive	Uncial 400 AD	Carolingian 780 AD
A	A	a	a
B	b	b	b
M	M	m	m
N	N	n	n

古文书学（Palaeography）是一门研究古代书体（ancient writing）的学问，是历史学和档案学重要的辅助学科。它是判断一份文献出自何地、何时以及由何人所写的惟一手段。每一时期、每一地方以及每一抄写者都有其特性。[1] 古希腊的、古斯拉夫的、阿拉伯的书体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历程，都是从早期的正规体发展到后来的草书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臣们用古怪的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变体撰写的文献，通常以难于释读而著称。（见原书附录Ⅲ，第1227页）

尽管有印刷术及其打字机的发明，但是对文献的极其便利地译解的古文书学永远不会成为多余的学问。许多信件和日记仍是手写的。1990年，一伙德国骗子几乎使世界相信他们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久已失传的日记。伪造者的古文书学技巧骗过了应聘前往鉴定其作品的杰出的英国教授。[2]

查士丁尼主要是因为对罗马法的编纂以及坚持不懈地重申对失去的西部各省的帝国统治权而令人追忆。他的法律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是从整个帝国的立场来看，他在西方的当务之急则似乎成了从更紧迫事务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娱乐。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斯拉夫人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波斯人出现在利凡特的地中海沿岸。因为瘟疫和赛马场上黑绿两党的斗争，君士坦丁堡丧失了大批人口。540年和562年，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先后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与被称为狄奥多拉的所谓舞女结婚，查士丁尼引起一段早期的绯闻。狄奥多拉是属于绿党的塞浦路斯官员的女儿。据普罗可比的《秘史》所载，狄奥多拉曾哀叹"上帝没有赋予她更多性器官，以同时给予更多人快乐"。但是，她展现出皇后的活泼和聪明，与查士丁尼是极好的一对。（见原书附录Ⅲ，第1237页）

查士丁尼对西方的再征服主要是利用大将贝利撒留来进行。530年，贝利撒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对非洲的远征，令人震惊地一举摧毁了汪达尔王国，这促使他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发起进攻。他率一支拥有7500人的军队挺进号称拥有100000日耳曼战士的东哥特王国。535年，贝利撒留以执政官的身份占领了巴勒莫。536年12月9日，在疯癫主教的邀请下，贝利撒留进入罗马城。537—538年，他抵挡住了强大的围攻，奥勒良（Aurelian）城墙挡住了游牧部落。在关键时刻，防御者把从哈德良陵墓掠来的神像和皇帝的大理石雕像拉倒，以击溃敌人的先头部队。540年，贝利撒留占领了哥特人首府拉文纳。但是，战争持续了十三年。罗马曾两次陷入耗时耗力的围

攻。546年，东哥特国王托蒂勒（Totila）占领罗马，造成了比阿拉里克或亨塞里克（Genseric）所造成的任何一次都大的破坏。哥特人的军队突破城墙，焚烧城门，驱逐市民。最为不幸的是，他们捣毁了导水拱桥。“在四十天的时间里，帝国城市为狼和猫头鹰所占据。”[8] 之后，命运再次发生逆转。553年，年老的宫廷宦官纳尔西兹（Narses）所进行的战役最后完成了贝利撒留开始的战争：意大利恢复为由拉文纳总督统治的帝国行省；东哥特人及其部落消失。554年，帝国拥护者进攻西班牙，将西哥特人驱逐到中部高原，在南方重新建立了罗马行省。

[243]

推克欧斯（TEICHOS）

在里吉恩港（Porta Rhegium）的一块碑铭中，记载了公元447年重建君士坦丁堡土墙一事：最近的一场地震严重毁坏了城市要塞的第三道防线，该防线是三十年前为摄政阿提米斯所修，现在急需维修和重建。在多瑙河边境的匈奴人已成功地对博斯普鲁斯进行了一次出击。结果，狄奥多西二世在位的最后一年，从金门到黄金海角，建起了非常有意义的多级防御体系。阿提莫西亚城墙的主体比周围的农村高出100英尺；在它的前面，以一条有台阶的过道为条件，修建了厚重而结实、带有城垛的防御墙；外环的空旷地带，又以带有城垛的第三条防线作为防护，这一防护线外面就是宽阔的、砖砌的壕沟。整座城市配备有九十六个棱堡、一群较小的眺望塔、迷宫似的陷阱、障碍物、突击点和假通道。尽管城市的防御体系在其他较重要的地点经过了数次扩展和改建，但是，狄奥多西城墙，即伟大的推克欧斯则经受住了频繁的蛮族进攻，存在了千年。[1]（见地图9）

在基督教世界的早期历史中，没有一处比基督教帝国的这一伟大堡垒更耐人回味。与所有进攻者的渺小企图相比，它是无法攻取的坚固要塞。378年是西哥特人、441年是匈奴人、476年是东哥特人，对它的进攻都是空手而归。540年是斯拉夫人、609—610年和617—626年以及781年是波斯人、625年是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取也都以失败而告终。673—678年和717—718年是阿拉伯人、813年和913年是保加利亚人、865年和904年是罗斯人、1087年是佩彻涅格人、1203年是威尼斯人，都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围攻，但都没取得成功。1204年4月，十字军从面海一边

突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防（见原书第360页）。但是，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为止，狄奥多西城墙一直完好无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结束，而且也是近代军事史开始的标志。火药大大地改写了城防技术。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日落时分伫立于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城墙之上，一定是一段最为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起初，在城市的这一边，狄奥多西一世建造的是三重结构的凯旋门，金门（Porta Aurea）并没有包括在417年修建的城墙结构当中；但它仍被作为帝国皇帝巡幸路线的起点。（现如今是伊斯坦布尔的入口处，被称为Yedi Kuleh，即七塔要塞。）在防御者看来，野蛮人就像落日的余晖一样，总是来自于西方。

从表面上看，查士丁尼恢复了此前大部分帝国的荣耀。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人的内海。然而，荣耀是表面的："保持伟大是老朽的表现，甚至是有害的"（Reste une grandeur caduque, même malfaisante）。[9]特别是在意大利，查士丁尼战争破坏之大，帝国总督压迫之深，帝国[244]征税官吏剥削之重，居民们很快就对这一复辟表示悔恨。罗马宗主教悔恨其教会自由受到干涉，不得不考虑与东方教会永久分离。更有甚者，在哥特人的破坏下，意大利已经没有了防御能力。因此，在此后伦巴德人的入侵浪潮中，意大利轻易就陷落了。除了孤立的拉文纳总督区之外，仅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部分地区仍保留在帝国手中。与此同时，其他各类敌人也扑面而来。第五、六、七世纪，君士坦丁堡屡屡遭到攻击。匈奴人、东哥特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作为最终目标。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在西去途中横扫了博斯普鲁斯，于441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476年，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取得了亚德里亚堡战役的胜利后，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从君士坦丁堡的立场来看，斯拉夫人引发的骚动与克尔特人、日耳曼人部落在罗马引发的骚动是一样的。尽管缺乏报道，551年斯拉夫人跨越多瑙河的情景一定与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的情景是一样的，其影响也一定相似。帝国境内的伊利里亚、达尔马提亚、马其顿、色雷斯，整个行省转变成一个庞大的"斯拉夫尼亚"或"斯拉夫王国"。斯拉夫人对说拉丁语的人口来说占如此压倒的多数，说拉丁语的人仅有极少的遗留，如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罗马人（罗马尼亚人）或者是多瑙河以南的散落的"弗拉其人"群落。他们后来构成了从前罗马帝国领土分离出去的三个公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克罗地亚、塞尔维

亚、大保加利亚。他们驾驶着原始的独木船一直深入到希腊各岛屿，540年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从亚历山大继承者们的时代开始，波斯就见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复兴过程。在萨珊波斯王朝统治时期，萨珊波斯始终没有停止对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争夺。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时期（227—241年）和后来的两个科斯洛埃斯统治时期，即科斯洛埃斯一世（531—579年在位）和科斯洛埃斯二世（590—628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的复兴达到要求占有地中海的程度，他们在安条克举行了“大海的庆典”。609—610年和625—626年，波斯人两次兵临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被法兰克人沿多瑙河驱赶出来之后，开始谋求博斯普鲁斯。625年他们伙同波斯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阿拉伯人像一场沙漠风暴般从东方涌出（见原书第253页），673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717年再次呈现此种情况。[**推克欧斯**]

希拉克略（575—641年）是“第一位拜占庭皇帝”称号的最具支持力的候选人。他没有查士丁尼那种对西方的浓厚兴趣，而是赋予帝国以显著的东方色彩。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对付最强大的敌人，发现下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617年科斯洛埃斯二世率领的波斯人进军赫勒斯滂并要求君士坦丁堡投降。此时，波斯人已经占领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614年），并获取了“圣十字架”（True Cross）；通过占领罗马时代的遗产埃及，切断了帝国的粮食供应。这是值得希罗多德关注的欧亚之间的冲突：

> *科斯洛埃斯，最伟大的神和大地的主宰致希拉克略，他的卑贱的愚蠢的奴隶。你为何仍自称为国王？但是，只要你表示臣服，我将原谅你的缺点……不要因基督而以无为的希望来欺骗自己，因基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最终让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你深藏海底，我也会伸手将你擒住……*[10]

[245]

阿瓦尔人进入君士坦丁堡面向大陆的部分，并在城下伏击了须用重金赎买的皇帝。

622年，希拉克略有可能发动一系列巧妙的被称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战役。一支强大的基督徒军队进军耶路撒冷。不顾波斯—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希拉克略率军突入波斯腹地，掳掠了泰西封附近的达斯塔哥（Dastager）的科斯洛埃斯的宫殿，作为628年和平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重新获得了“圣十字架”。希拉克略为此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新斯奇比奥”。如果此时他死去的话，他将是继恺撒之后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

而事实上，因为穆斯林的冲击，希拉克略对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变得温和起来。七世纪三十年代，伊斯兰的军队出现时，他并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638年，从波斯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耶路撒冷又陷入阿拉伯人之手。三年后，随着希拉克略的去世，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埃及也处于陷落的边缘。在拜占庭与伊斯兰教国家八百年的战争中，第一轮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拜占庭自身所具特性的主要轮廓呈现了出来。帝国的领土缩小到希腊的中心地带。希腊语成为文化的惟一载体。在失去了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之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失去了竞争对手，成为希腊教会无可争议的领袖。与阿拉伯人最初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其中有两次对君士坦丁堡的严密围困，每次都是被帝国强大的舰队和“希腊火”所粉碎。在各岛屿和行省发生的小冲突和后卫行动更是不计其数。帝国的亚美尼亚于636年、塞浦路斯于643年、罗得岛于655年、迦太基于698年相继丢失。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和705—711年在位）的撒拉逊战争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混乱。在一次战役后，他命令卫队将没有逃跑的军队全部屠杀，以防止他们在下一次战役中逃跑。罗得岛陷落后，坍塌了的罗得斯巨型雕像的残片作为废料卖给了犹太商人。这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破坏圣像是八世纪和九世纪早期遍及帝国的一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伊斯兰教纯洁价值观的认同。一方面，这是有关基督教信仰中圣像所处地位的纯宗教方面的争论。他们援引穆斯林为例，禁止所有的表象艺术，称他们的反对派为“偶像崇拜者”。726年，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一世颁布法令，将耶稣受难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替换成普通十字架。不久，又有法令要求将所有圣像尤其是童贞女玛丽亚的像粉刷成白色。另一方面，这其中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斗争。通过攻击偶像崇拜者的修道院和没收其相当可观的财[246]产，作为圣像破坏主义者的皇帝加强了国家对教会的控制。这一运动同时也重申了君士坦丁堡对各行其是的各行省，尤其是对欧洲各行省的控制权。头号圣像破坏主义者是被称为“修道士锤子”的烂污货君士坦丁（740—775年在位）。754年，他通过一个自行安排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该会议遭到罗马方面的强烈谴责。在某地，色雷斯的修道士和修女被召集起来，给他们提供两种选择，要么立即结婚，要么流放到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在揭竿而起的叛乱中死里逃生后，致力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行动和公共事务。[圣像]

关于圣像的战争远未结束。女皇帝伊林娜（Irena，797—802年在位）和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829—842年在位）的妻子狄奥多拉是两位激进的偶像崇拜者。狄奥多拉（Theodora）的儿子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842—867年在位）在许多令人震惊的行动中，最突出的是将烂污货君士坦丁的尸体挖掘出来焚烧。圣像破坏运动遭到禁止。

宗教和平持续到867年迈克尔被谋杀和马其顿王朝的建立。那时，大规模的破坏已经过去。圣像破坏应被视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与罗马教皇之间关系破裂和将拉丁教会逼向法兰克人怀抱的关键因素。

那时，保加利亚人作为重要力量已兴起于巴尔干半岛。他们的早期首领库拉特（Kourat）已是希拉克略的同盟者；后来，保加利亚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的黑海沿岸。717—718年，保加利亚人帮助皇帝击退了阿拉伯人的围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七个斯拉夫人部落，却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和习惯。九世纪，好战的克鲁姆（Krum，保加利亚人的国王——译者注）对皇帝和基督教宣战。正是他在811年杀了皇帝尼斯福鲁斯（Nicephorus），并用皇帝的头骨做饮器来庆祝胜利。在他的压力下，拜占庭修建了新的罗马城墙——“伟大的屏障”。他的继承者鲍里斯尽管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洗礼，但仍在忠诚于希腊教会或罗马教会之间犹豫不决（见原书附录Ⅲ，第1245页）。

九世纪确立的拜占庭文明，由于几个独有的特点而与现代西方国家和罗马帝国相区别。国家与教会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皇帝、独裁者（*autokrator*）、大教长被视为世俗界和宗教界神圣权威的支柱。帝国捍卫着东正教会，教会则赞美着帝国。这种“国家权力至上的思想”是西方所无法匹敌的，因为在西方，世俗统治与教皇的权力从来没有合并过。[排序法]

帝国宫廷是由一大批官僚运转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的中心。希拉克略采用波斯的巴西勒斯（*Basileus*）作为头衔，其东方式的宫廷礼节中显露了专制性质。“拜占庭”一词成了完全顺从、遮遮掩掩和阴谋的代名词。古罗马制度的一些外壳仍然存在，但已变得不重要了。元老院成了公职持有者的集会，成了严格的等级组织。国家的主要大臣有主教、首相、首席法官，再以宫廷总管领导下的宫廷官员和全体宦官作为补充。通过阉割宫廷官员，帝国巧妙地防止了宫廷内部权力世袭的可能性，在西方，宫廷内部权力世袭是常见的。军事防卫力量分为皇帝属下的由家臣（*domestikos*）指挥的外国雇佣兵组成的预备军、禁卫军，和由将军指挥的各“军区”部队。

[247]

圣像（IKON）

宗教偶像是欧洲持久不衰的艺术流派。但是，宗教偶像从来没有被描述成艺术作品。它们是信仰的辅助物，是对超越现象的精神世界加以“理解的门户”，是“通往神界的大门”。对他们的

评价取决于观察者的神学知识和感情接受能力。[1]虽然中世纪西欧在随后产生了自己的重要派别，但拜占庭帝国却长期保持着主要中心的地位。

对圣像崇拜者心境的要求用希腊语单词概括就是 hesychia（静修）或者是“静观”。它要求耐心、超然、谦卑和虔诚的专注。五世纪，在一部论“美丽的爱”的教科书中，拜占庭人的一篇题为 Philokalia 文章，将这种心境比作猫捉老鼠时的呆滞状。

根据传说，圣路加是第一位圣像画家，其主题是圣母和圣子。（见图 22）与“全能的创造者基督”一起，圣母始终是首选的保留题材。她有三种标准姿态：抱着圣子相互对视的埃留斯式（*eleus*）；将圣子抱起放在伸开的胳臂上的奥蒂提特里亚式（*odititria*）；双臂举起圣子放在她的腹部的奥拉克塔式（*Orakta*）。[2]

在长期的“圣像战争”期间，大马士革的圣约翰（675—749年）是最伟大的绘画雕刻鉴赏家或“圣像崇拜者”，即“圣像的奴隶”。他强调，圣像崇拜和具有更深远意义的借助圣像对上帝的崇拜之间是有区分的。他同样对有关圣像的神学理论作了三个层次的定义。基督化身为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圣像真正具有神性。

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圣像始终放在中心位置。会众与教职人士的礼拜场所用圣像间壁或“圣像屏风”分隔开来。传统上用四排圣像做间壁，分别代表最高等级的圣徒、教会的十二大节日、十二使徒、十二先知。在中央，是由六块嵌板覆盖的双扇门，六块嵌板分别代表天使长加百利、圣母玛丽亚、《福音书》的四位作者。在希腊，它们被称为“美景门”，俄罗斯称之为“帝国门”。它们由上帝的审判、三位一体、基督受难三大圣像覆盖。在东正教宗教仪式上，圣像往往要在教堂中行进展示，供信徒亲吻。

圣像绘制在可移动的木板上。画家们使用鸡蛋调成的颜料，在白色或镀金的表面作画。程式化的姿态、手势和表情传达着一种必不可少的敬畏气氛。[3]忽视背景是这种画的一大特点。[**鞭笞**]

[248] 东正教的圣像绘画经过了几个显而易见的发展时期。第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于圣像破坏者的论辩。这一时期的圣像极少有保留下来的。第二个时期结束于1204年拉丁人对拜占庭的征服。晚期拜占庭时期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民族画派成长阶段。在近现代俄罗斯东正教会被强加以莫斯科风格之前，诺夫哥罗德、白俄罗斯、普斯科夫，都各自有绘制圣像的传统。此后，东正教的圣像绘制法显然与天主教艺术的发展相隔绝，但仍有一些相互

影响发生。在克里特就曾出现了独特的“复合式的威尼托—拜占庭风格”。也有天主教与东正教圣像绘制方法相混合的情况，在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的艺术（Ukrainian Uniate Art）中就能见到。[4]
[**格雷科**]

尽管发生了东西方教会大分裂（见原书第 328—332 页），东正教的圣像在西方仍受到高度重视。天主教欧洲的所有著名的“黑色圣母雕像”都来自拜占庭。[**圣母玛丽亚像**] 另一特别的耶稣基督的黑色雕像，即皮卡地区的拉昂的“圣洁的脸”也是来自拜占庭。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都灵的裹尸布”、“圣徒的脸”这样一些所谓的非人工所造之圣物。尽管圣像是画在松木板上，但上面所刻的不协调的斯拉夫铭文——OBRAS‘GOSPODEN NAUBRUS’（裹尸布里的上帝）表明其来源地是塞尔维亚。它可能是曾展示于拜占庭的“神圣的裹尸衣”的复制品。所有这些事例是由拉昂的执事长、后来成为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IV）的雅克·德·托尹斯（Jacques de Troyes）收集的，他是从位于意大利南部巴里的塞尔维亚僧侣中的“一些虔诚的人们”那里获得的。根据得以保存下来的 1249 年 7 月 3 日的一封书信，这一圣物不知从何处来到了拉昂大教堂。执事长将它作为礼物寄给他的妹妹西比尔（Sibylle），西比尔此时担任蒙特勒伊（Montreuil）的西多会女修道院的院长。[5]

在所有虔诚的东正教教徒的家中，都供奉圣像。马克西姆·高尔基回忆 1870 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外祖父母家里的情景：

每当外祖母谈起上帝时，她的脸上就焕发出青春的光泽……我抓起她那沉甸甸的长发放在手中，绕在我的脖子上。“人是看不到上帝的”，她说，“即使上帝在他眼前，他也不会看到，因为他是瞎的。只有圣徒能完全地见到上帝。”看她揩去圣像上的尘土、擦干净十字褡是非常有趣的……她会敏捷地拿起圣像，微笑着深情地说“多么可爱的面庞啊！”然后，她画一个十字，吻一下圣像。[6]

[249]

排序法（TAXIS）

641 年，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君士坦斯二世由大教长加冕称帝。古代罗马在跑马场为新皇帝登基欢呼喝彩的习俗被放弃了，在拜占庭帝国保留的仪式中，最重要的政

治一宗教仪式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从此，传统的将项圈戴到脖子上的仪式被加冕仪式所取代。此时也广布施舍，分发钱币。辅帝由皇帝加冕，皇后由她们的丈夫加冕。典礼的传统肖像画表明，皇帝是由基督加冕的。

在拜占庭的生活中，政治典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加强排序观念，即“事物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和谐的、呈现出等级的观念。精心设计的典礼场面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性细节。列队行进和公众游行都以最轻微的托辞加以组织，尤其是在基督教的节日期间。对皇帝的欢呼伴随着《圣经》和政治标语的诵读、对诗和颂词的朗诵、高声的呼喊，这与皇帝出现时所要求的肃静形成了对照。皇帝的新娘露面、婚礼、葬礼都要用适当的管弦乐曲表现兴奋和哀悼。皇帝的召见是根据被召见者的地位加以精心安排的。皇帝的宝座与被召见者跪拜的确切距离事先都做了规定。被召见者只有达到一定的等级标准才能得到皇帝的亲驾迎接，迎接的地点和形式、进城的路线、进行祈祷感恩的教堂以及宴会的菜单都要按照标准做出安排。皇帝的出行，特别是起程出征，是以广布施舍、对真十字军旗顶礼膜拜以及海陆军的献祭为标志的。皇帝的凯旋式继承了罗马传统，包括军队的行进、战俘的展现、战利品的展示、马戏团的表演、竞技场里的竞赛，以及对战败者或篡位者象征性的践踏。毫无疑问，高级官员依据战功加官晋爵。

在所有场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饰、官员的徽章、外貌和姿态上。所有的仪式都是从穿戴礼服开始，以脱去礼服结束。皇冠、珠宝、权杖以及象征死亡人数的“尘土袋”始终摆在显著而突出的地方。紫色是皇帝独享的服装颜色。在肖像画中，紫色是基督和圣母玛丽亚享有的服装颜色。拜占庭的肢体语言强调肖像画要像雕像一般平静。[1]

[250] 在十世纪的一部手稿《拜占庭宫廷礼仪书》（*De Ceremoniis aulae byzantinae*）中，我们发现了最完整的拜占庭礼节纲要。[2] 该书包括153卷，对600多年之久的拜占庭宫廷礼仪习俗和程式做了介绍。从舞会和演讲的规则到皇帝的头发长度等所有细节都有描述。[3] 皇帝的礼仪被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行省长官、将军、主教，以至最终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所效仿和采用。拜占庭宫廷礼仪为帝国以外的君主和教会的各种象征性活动提供了基础，例如，查理曼对拜占庭的模仿恰似西欧君主们对查理曼的模仿一样。[3]［卡尔］

但是，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将处于武力保护之下的皇帝抬高

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日耳曼人那里借鉴来的。361年，朱利安在巴黎首次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做法断断续续实行到八世纪。涂油礼似乎是法兰克人首次采用，十三世纪由十字军介绍到君士坦丁堡。[4] 到那时，基督教化的帝王礼仪在欧洲已普遍推广开来。

无论如何，拜占庭首先是一个海上强国。其海军拥有300艘双排桨战船，船上装备有冲击锤和“希腊火”，能够从任何角度展开攻击。尽管655年与阿拉伯人在利西亚（Lycia）的菲尼克斯（Phoenix）遭遇激战，拜占庭的海上力量仍在爱琴海和黑海上占据优势地位。

拜占庭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一贯奉行家长式统治。商业贸易由国家机构控制，对进出口货物直接索取10%的税。国家条例支配着行会和工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工厂就像古代妇女的闺房，将全体雇工限定在固定的活动范围内。帝国的金币制造工场是东方的主要国际货币供应者，1 *nomisma* = 12 *milltaressia* = 144 *pholes*。正是由于在黑海上有着国家经营的渔业，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工匠能够定期吃到鱼子酱。

在希腊文化外衣的掩盖下，拜占庭庇护着种族差异极大的多民族社会。皇帝的新娘可能是卡扎尔人、法兰克人、罗斯人，其居民则是巴尔干的希腊—斯拉夫人、此前的希腊人和亚洲各省的亚美尼亚人。除了乡村的农奴制田庄外，拜占庭社会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政府为教会学校、国立大学、法律研究会和女子教育提供资金和设备。宗教文学占统治地位。但是，十世纪的《迪格尼斯·阿格里塔斯》(*Digenis Akritas*) 被称为“最辉煌的骑士文学作品”，从普罗可比到安娜·波尔菲罗吉尼塔（Anna Porphyrogeneta，1083—1154年），拜占[251]庭的历史学被称为“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间……最好的历史学派”。拜占庭的艺术和建筑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尽管由于圣像破坏的抑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运动，拜占庭的圣像对欧洲艺术具有持久的贡献。用正式的文化术语来讲，正当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外部黑暗的环境里挣扎的时候，拜占庭则处于文明的状态。[11]

伊斯兰教的兴起，622—778年

622年9月20日，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神秘主义者，抵达位于麦地那城的安全之地。他是被驱逐出诞生地麦加的。

应他的要求，在热切盼望着的信徒们欢迎他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神殿。于是，在新宗教第一年的第一天，建立了第一座穆罕默德的清真寺。

自从在希拉山的山洞中从天使长加百利那里看到自己的命运之后，穆罕默德——此前骆驼商队的牵骆驼者——便开始宣讲他的激进思想，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却未获成功。“穆罕默德，真实的，确实的，尔为上帝的先知。”受命之夜后不久，穆罕默德又经历了另一场神秘的夜游天堂之旅。他骑着一匹神奇的战马，战马将他引入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从那里穿过苍穹踏进了从未见过的无限空间的门槛。624年，穆罕默德对他的300名追随者进行了武装，并击溃了前来镇压他们的一支敌军。628年，骑在他特别喜爱的骆驼上，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率领一万信众进入麦加。他推倒了克尔白神庙里的异教偶像，将其改造成他的追随者的最神圣的圣地。在麦地那传教四年多后，他不止一次去麦加做告别朝圣。在麦地那，先知的至理名言记录在圣书《古兰经》中。在阿拉法特山谷，他发表了最后的预言：

听我说，我的人们，因为我与你们不在一起的日子即将来临……保持你们的物品、你们的光荣和你们的神圣生命……直到你们回到真主那里为止。帮助穷人，给他们衣服穿……记住，当你们来到万能的真主面前时，真主会问询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你们确实有权利关心你们的妇女，她们也同样有权利关心你们。善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你们的支持者……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我将以真主之书（Lord's Book）和先知的范例的形式给你们以指南……只要你们按照指引行事，将不会失败。

当他降临人间时，真主道：

为了你和你的宗教，我选择并完善了吉日，把我的宠爱完全赋予你，并将伊斯兰教选为你的宗教。[12]

回到麦地那，死亡天使进入先知的房间，先知对他说：“哦，死亡天使，执行你的命令吧”。按照基督教的历法，这是公元632年6月7日。

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构成了亚非大陆之间的跳板。在周围的帝[252]国中，它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独立。它西邻埃及和阿比西尼亚，北接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东面与印度相望。尽管地处荒芜之地，贝都因人

仍参与了该地区重大文明的建设。麦加的克尔白神庙是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所到之处，也是亚伯拉罕建立圣殿的地方。麦加本身地处地中海与东非、印度的传统商路要冲，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转站。七世纪早期，它与罗马帝国在埃及有密切接触，与其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有着较近的关系。阿拉伯半岛作为新的世界宗教发源地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但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它有许多优势。

伊斯兰意为“顺从”，从一开始就为世界性宗教。尽管它以阿拉伯语为《古兰经》的宗教用语，但是，它却对所有民族、所有阶级以及男女两性都具吸引力。它的最基本的教义之一便是，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和姊妹。终其一生，穆罕默德都在谴责权贵的经济特权、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闪米特部落的“血腥法律”。他号召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基础。他坚决主张维护被压迫者和妇女的权利，强调人们有施舍和同情的义务，为大众谋取自由。这一革命性的信条，几乎在瞬间便将信徒炽热的忠诚激发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伊斯兰教规定，士兵与将领，国民与统治者，妻子与丈夫都是平等的。“没有宗教的正义优于虔敬统治者的暴政”。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信仰的表白，这往往是信仰者难以付诸行动的；但是，信仰的力量和纯洁则是显而易见的。“以仁慈的、富于同情心的安拉的名义”，伊斯兰教像烈火遇到干柴一般迅速传播开来。

伊斯兰教建立在五大义务之上。第一是信仰的表白，包括对程式化语录的背诵：“除安拉之外别无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任何人在成为穆斯林之前都要说这句话。第二是祈祷仪式，要求信徒在黎明、中午、黄昏和晚间净身后面向麦加匍匐着头触地而拜。第三被称为“扎卡特”，是对穷人的施舍。第四是斋戒，在赖麦丹月，每一个理智健全、身体健康的成年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要戒除饮食和房事。第五是“哈只”，要求每一名穆斯林在他（或她）的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圣一次。首要的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要遵从《古兰经》的教义。《古兰经》有 114 章，是法律的源泉、科学和哲学的指南、神话和故事的汇编、伦理教科书。

先知的继承人“哈里发”，很快便将统一的阿拉伯变成了建立神权政治的世界帝国的跳板。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哈里发支配着无敌的军队，巨大的财富促进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阿布·伯克尔（632—634 年在位）、奥马尔（634—644 年在位）和奥斯曼（644—656 年在位）统治时期，哈里发的军队闪电般成功地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波斯和埃及。为保卫亚历山大里亚，阿拉伯人组建了一支舰[253]队，并很快发展成为地中海上占有优势的海上力量。在先知的堂弟和女婿阿里（656—661 年在位）统治时期，爆发了内战和宗教纠纷。但

是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重又恢复了统一。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建都大马士革。叶基德一世（680—683年在位）统治时期，打败了谋反的阿里的儿子侯赛因。这在什叶派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阿布杜勒马立克（685—705年在位）统治时期，镇压了发生于麦加的反对哈里发的起义。瓦里德一世（705—715年在位）统治时期，倭马亚王朝的势力达到极盛。750年倭马亚家族在扎布河遭到惨败，最终结束了与阿拔斯王朝的长期竞争。此后，在阿尔—曼苏尔（Al - Mansur，“获胜者”，754—775年在位）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奠定了500年统治的基础。一时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成了世界的中心。

耶路撒冷由基督徒转入穆斯林之手是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该城对世界三大一神教来说，过去是、现在也是圣城。自从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出耶路撒冷之后，数世纪以来，基督徒一直为自己守卫着圣城：

638年2月的一天，哈里发·奥马尔乘坐一匹白骆驼进入耶路撒冷城。他身穿破旧而污秽的长袍，身后跟随着同样是衣着粗俗不洁的军队士兵，但是，他们的纪律严明。在他的身边是投降的城市的首席地方官瑟弗罗尼斯大教长。奥马尔径直来到所罗门圣殿，他的朋友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看到他矗立在圣殿前，大教长不由得回想起基督的话，并激动地低语道：“先知但以理说，把荒芜视为可憎之事。”[13]

从此，圣城便由伊斯兰教势力所控制。大教长成为永久的人质。基督教徒到此朝圣变得困难了，于是，逐渐选择罗马作为他们的朝圣地。基督教的重心大大西移。

先知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伊斯兰的军队勇往直前。673—678年和717—718年对拜占庭进行了两次不成功的围攻。但是，东方的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西方的迦太基、丹吉尔被攻占。711年阿勒—塔立克（Al - Tariq）率军渡过“赫拉克勒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将穆斯林带入欧洲，征服了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并突破了比利牛斯山。从此，“赫拉克勒之柱”改称为“阿勒—塔立克之山”（Jebel al - Tariq）或“直布罗陀”。7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一个世纪，阿拉伯人抵达离巴黎只有几天骑马路程的卢瓦尔河上的图尔——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带。

大规模征服的结果是，在哈里发只具有名义上的统治权的边远地区，如西班牙、摩洛哥、突尼斯、埃及、波斯和河间地带（Transoxania），都出现了自治的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在一个世纪里的进展

与基督教在七个世纪里的进展相当。在伊比利亚，穆斯林征服者缅怀该地的历史，将其国家称作厄尔—安达卢西（El - Andalus），即“汪达尔人的土地”，创建了许多公国。在阿勒—塔立克抵达后不久就建立了科尔多瓦酋长国，成为欧洲大陆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穆斯林国家。与其后继者阿勒穆阿维耶帝国和格拉纳达酋长国一起，穆斯林国家在此地持续了近八个世纪，在阿布杜拉·拉合曼（912—961 年在位）[254] 统治时期达到极盛。它覆盖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绝大部分，自称拥有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权位。它带来了高度的文明，也使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犹太人大量涌入。八至十二世纪，这股人流又从北非得到不断补充。[麦泽奎塔]

从那时起，伊斯兰教就长期存在于欧洲。首先是在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后来是在东南部的巴尔干和黑海地区（见第 7 章）。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成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最为持久的特色。从八世纪开始，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宣礼员在清晨和傍晚召集穆斯林做祈祷：

اذان کا بیان

Allāhu akbar ašhadu ‘an lā ilāha illā llāh ašhadu anna Muḥammadu ’rasūlu ’llāh ‘alā ’l-ṣalāh hayyā ‘alā ’l-falāḥ Allāhu akbar ašhadu ‘an lā ilāha illā llāh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اَشْهَدُ اَنْ لَّآ اِلٰهَ اِلَّا اللّٰهُ اَشْهَدُ اَنْ لَّآ اِلٰهَ اِلَّا اللّٰهُ اَشْهَدُ اَنَّ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 اَشْهَدُ اَنَّ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 حَيَّ عَلَى الصَّلٰوةِ حَيَّ عَلَى الصَّلٰوةِ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لَآ اِلٰهَ اِلَّا اللّٰهُ

（最伟大的真主，/我作证，除真主之外别无他神，/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祈祷吧，/快来获得拯救！/伟大的真主，/我作证，除真主之外别无他神。）[14]

在晨祷时，在四句套语之后又附加上一句召唤语 *al - salat khair min*

al – nawm，即“祈祷强似睡觉”。当听到召唤时，所有穆斯林都必须重复这句话，在第四和第五句话之后，他们还要背诵：“除安拉之外别无权利和力量”，和“您诚实而公正地说”。每一个成年而健康的穆斯林每天应做五次礼拜。

与此同时，随着阿拉伯人侵入卢瓦尔河流域，法兰克人必须阻止[255]穆斯林的挺进。墨洛温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688—741年）集结了一支军队，遏制住了穆斯林的入侵势头。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可能被基督教的辩护者所夸大：阿拉伯人被迫从过于漫长的边界线上撤退。这条边界线从直布罗陀开始，总共有1000多英里长。但是，它也开发出一些意义深远的通道：

同样的征服空间再重复一次的话，将会使萨拉森人进入波兰境内和苏格兰高地；莱茵河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相比并不那么难以通过，阿拉伯人可以不经过海上作战扬帆进入泰晤士河的河口。也可能牛津的学校里已在教授《古兰经》的翻译（课程）了，伊斯兰教的布道坛将证明割包皮的人之圣洁，穆罕默德的启示之正确。[15]

从此以后，穆斯林在西欧坚守比利牛斯防线。穆斯林与法兰克人在比利牛斯山的通道权问题上对抗了几代人之久。朗塞瓦尔隘口遭遇战产生了最为著名的类似骑士歌谣的中世纪传奇。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的两个法兰克骑士罗兰和奥利弗，或奥兰多和李纳尔多在向北方的安全地带撤军时，遭到穆斯林军队的猛烈追击。奥利弗力劝他的同伴吹响号角请求援军，勇多智少的罗兰直到战斗已经失败才吹响号角。当他最后吹起号角时，脑部静脉破裂。这在整个法语世界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罗兰昏厥在战马上，被他的同伴——已经失明的奥利弗在混战中误刺：

“朋友，爵士，你真的要给我一击么？
因为我是罗兰，深爱你的罗兰，
你并没有向我挑战。”
奥利弗说：“现在我听到你在说了，
但是，我看不到你；愿上帝保佑你！
我刺中你了吗？如果真的是那样，我请求你的谅解！”
罗兰回答道：“我现在已不再受伤害了。
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原谅你。”
此时，两者互相鞠躬致歉。
看，这是多么感人的分别啊！[16]

"啊，甜美的法兰西人，今天你们将夺走你们最好的臣仆的生命。"

在东方，基督教的防线处于拜占庭军队的控制之中。但是，穆斯林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斯拉夫人腹地。穆斯林世界对奴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骨瘦如柴的斯拉夫人是最好的商品。犹太商人和维京人扮演着中间人和输送者的角色，特别是通过克里米亚［**卡扎里亚**］［**罗斯**］，但是，后来是通过巴尔干和中欧［**迪拉姆**］。

[256]

麦泽奎塔（MEZQUITA）

在欧洲，没有任何建筑能像麦泽奎塔·阿尔杰玛（Mezquita Al-jama）那样更好地表明文明的循环，麦泽奎塔·阿尔杰玛现为科尔多瓦的一座大教堂。它的最古老部分可追溯到拉赫曼一世（755—788年在位）统治时期。然而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建筑材料，来自毁坏了的圣文森特（St Vincent）的拉丁—拜占庭式的长方形教堂，该教堂在原地保存到741年，曾经被用作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会堂。清真寺和教堂都是建在一座罗马神殿的基础之上，而罗马神殿是建在希腊人或许是腓尼基人的建筑之上。如此众多的联系，只有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可与之相比。

麦泽奎塔的规模是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的，其城市的发展超过中世纪的罗马许多倍。麦泽奎塔与城市中心的奥兰治的三重院落一起，面积达到（130 × 180）平方米，周围建有城墙和城垛。但是，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元素的相互结合所产生的许多特点。中央广场上矗立着色彩斑斓的大理石圆柱，支撑起双层拱门。柱头形状各异的圆柱来自古老的会堂。较低的"马蹄形"拱门是由白色石灰石和红砖交织砌成的。圆形拱门的上部是纯罗马式的。作为主门的北门用金属板包着，其中心交替写有神符 AL－MULK LILAH（"帝国和权力只属于真主"）。优美的鸽门有着一个华丽的阿拉伯式的拱门，拱门上环绕着一个中世纪的尖拱。用来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由叙利亚建筑师建造，适时地将其指向南方。用五彩缤纷的马赛克装饰的拱道将人们引入壁龛，拱道前面是配备着三座拜占庭式炮塔的前厅。到处镌刻着波斯风格的阿拉伯文字库法字体，即使在皇家礼拜堂中也是如此。皇家礼拜堂是由十四世纪的哥特式装饰物和家族纹章翻新的。清

真寺内的祭坛、柱上的楣沟，以及印卡礼拜堂（Chapel of Incas）都表现出基督教巴洛克艺术的影响。[1]

在西班牙很少有像科尔多瓦的麦泽奎塔和托莱多的老城那样的地方，表现出强烈的连续性。现代旅游者会被热情地告知，穆斯林的西班牙给欧洲人带去了橘子、柠檬、菠菜、芦笋、茄子、菊芋、面食、牙膏，再加上数学、希腊哲学和纸。[沙提瓦]

但是事实上，连续性是极少的。西班牙的穆斯林文明并不是被取而代之，到处都有被根除的可能（见原书第345页）。只要参观一下埃克斯垂曼都拉（Extremadura）的特鲁希略（Trujillo）那人迹罕至的穆斯林城堡，或者是参观一下卡斯提的瓦斯克斯（Vas-[257]cos）那荒芜的带有城墙的城市，参观者都会获得较为真实的历史感。在科尔多瓦，游览者应该从麦泽奎塔出发前往城外的麦地那—阿兹哈拉（Medina Azahara）。这里曾经是一位哈里发的住地，他能够利用太阳反光镜传递信息，这一信息传递系统使他在24小时以内得到埃及的消息。他还曾要求外国使者进入他那有三英里长的天篷的听政殿，大殿由柏柏尔士兵层层守卫着。殿中曾住有2万人，其中包括6000嫔妃。1010年柏柏尔人起义捣毁了哈里发的宫殿，其遗迹直到1911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2]

当西班牙人呼喊“欧利尔”时，许多人并不会想到，他们是在向安拉发出祈祷。

斯拉夫人与奴隶贸易的联系如此之密切，以致“斯拉夫”与“奴隶”两个词都被广泛地认为是同义词。在阿拉伯词汇中，太监（sakaliba）一词也被认为是起源于“斯拉夫”。不足为奇，保存至今的有关斯拉夫人地区的目击者报道，是来自托尔托萨（Tortosa）的摩尔—犹太商人写的（见原书第454页）。

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能过于夸大。伊斯兰教的征服将欧洲变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欧洲。与此同时，穆斯林控制地区对欧洲形成的包围，最终切断了基督教徒与其他宗教和文明的直接联系。由于好战的伊斯兰教的阻碍，欧洲大陆陷入封闭，较早时期形成的商业贸易、文化和政治的交往都改变了方向。这给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冲突留下了两大任务：与伊斯兰教进行斗争，使残留的异教徒皈依。这一形势迫使拜占庭帝国长期疲于应付东方边境线的防御，从而忽视了帝国在西部的使命。这使距离拜占庭帝国较远的基督教国家不得不进行自卫，逐渐采取措施实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换言之，这构成了西欧封建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霸占地中海

后，地中海对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霸权地位便不复存在了。在伊斯兰教之前，希腊罗马古典世界之后，欧洲虽然被基督教所改变，但在本质上还是完整的。伊斯兰教之后，这一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政治上的主动权就由地中海转向了北方新兴的王国，尤其是转向地处“法兰西亚”（Francia，即法兰克王国——译者）的那些王国中最强大的王国。

在八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当欧洲的基督徒正在消解伊斯兰的征服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时候，新秩序的种子已经撒下了。缺乏拜占庭帝国支持的罗马主教，被迫转而寻求法兰克的支持，开始了“罗马教廷”的事业。法兰克也看准时机支持教皇。间接地讲，查理曼是穆罕默德缔造的伊斯兰教所造就的（见原书下文，第284—290页）。根据亨利·皮朗的观点，“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帝国或许就不会出现，[258] 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也是不可想象的。”[17]就像伊斯兰教摧毁了古代世界一样，他的这一论点也打破了人们早期的一些概念。皮朗的观点在细节上被贬低了，特别是在所谓商业关系的中断问题上。但是，他的研究使得对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但是，仅仅谈及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是不够的。伊斯兰教对东欧的影响比对西欧的影响要直接得多。伊斯兰教的出现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联系紧密的所谓“基督教世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君士坦丁堡是其最强大的中心。这使地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峙的东部边缘地带的异教徒面临挑战，他们从此面临着对两大宗教进行选择的局面。首要的是，它造就了一种文化壁垒，据此欧洲的同一性才能够被界定出来。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与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类似问题一样影响深远。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都被灌输了一种思想，认为对方是异教徒。他们之间的误解、对抗和相互否定的态度长期存在，无休无止，从来没有出现对三大一神教共有观点的强调，在神职人员中尤其如此。结果，在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之间的分裂愈演愈烈。中世纪的欧洲人通常称穆斯林为“萨拉森人”，这一绰号来自阿拉伯语“东方人”（*sharakyoun*）。在那些自认为是较高文明承担者的西方人中，一向以既无知又轻蔑的态度来看待穆斯林的东方。

公会议时期的基督教教会，325—787年

325年第一次公会议在尼西亚召开时（见原书第205页），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境内最大的宗教组织。自《米兰敕令》颁布以来，

基督教得益于帝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并且得到当时在位皇帝的支持。但是，基督教并没有被确立为国教，在帝国的上层还有许多人敌视它。它还遭到来自帝国外部的攻击。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阿塔那修斯所领导的“正统”派的观点出发，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圣像]

在君士坦丁二世统治时期（337—361年在位），出现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短暂复兴。原因是阿塔纳修斯被流放，这并不是阿塔纳修斯遭受的最后一次放逐。340年，仍然居住在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哥特人，皈依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非洲建立王国时，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仍然信仰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在蛮族当中，他们成了正统基督教传播的主要障碍。[《圣经》] 另一次宗教政策的变化来自皇帝朱利安（361—363年在位），他是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皇帝，在基督徒的习惯中以“背教者”[259]而著称。在基督教信仰中，谋害其家族的那些人宣传说，“他（皇帝朱利安）始终宣称自己是异教的鼓吹者”。最终结果是朱利安颁布了一个普遍宽容的敕令，并对罗马人崇拜的神也给予最后的暂缓期。“对于基督徒，他造成的惟一苦难是被剥夺了折磨其同伴国民的权力。”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基督徒（Vicisti Galilaee）的，即“你们已被征服，噢，苍白无力的加利利人。”[18]

这一经历使三位一体派基督教从自满中惊醒。带头反对君士坦丁和朱利安的人中，在东方有阿塔纳修斯，在西方有普瓦提埃的希拉里（Hilary of Poitiers，315—367年）。之后，又有教会最杰出、最有权威的教父们的反对。号称“金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347—407年），是当时最伟大的传教者，对上层社会多有激怒。恺撒里亚主教伟大的巴西尔（Basil the Great，330—379年）来自一个非凡的家族，该家族宣称至少出了八个圣徒。一般认为，他是集体修道制度的创立者。他的弟弟尼斯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5—395年），和他的朋友纳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us，329—389年），都是杰出的神学家，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公会议上（381年），他们左右了局势。在西方，图尔主教潘诺尼亚的马丁（Pannonian Martin of Tours，315—397年）完成了高卢的基督教化。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约334—420年）是早期教会著名的圣经学者。在非洲，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可能是教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教父们的努力在狄奥多西统治时期（378—395年在位）终于有了结果。狄奥多西是最后一位统治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皇帝，他给三位一体派基督教以支持。狄奥多西是西班牙人，是将军之子，有着极

其暴躁的性情。他转而支持信仰三位一体教义的人，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他的前任瓦伦斯被信仰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哥特人所杀。在他的保护下，第二次公会议批准了《尼西亚信经》。三位一体派基督教得到了法律上的支持，阿里乌斯派基督教遭到禁止，异教遭到迫害。正是基于此事，三位一体派基督教从此开始以正统自居，将其过去和现在的对手谴责为“异端”。**[禁书目录] [鲁菲努斯] [宙斯]**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对许多信徒来说，这一次“基督教的胜利”被誉为令人惊奇的成就。狄奥多西也被冠以“伟大的”称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极少对这一精神的和政治的权威做如此紧密的联系。而且，狄奥多西也没有成为具有基督一样的德行的榜样。388年，他刺杀了与其共治的皇帝马格纳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390年，他对胆敢发动暴乱的塞萨洛尼卡城（Thessalonika）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命令官员们将全城的人邀请到竞技场，看来像是观看比赛，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对7000人残酷无情的屠杀。因为这一罪行，他被安布罗斯责令进行当众忏悔。他死于米兰，对他曾经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宗教来说，这多少也是一件好事情。

作为神学家和主教的圣奥古斯丁（354—430年）是一名修辞学家，一度还是一位摩尼教的提倡者。386年，他在米兰皈依了基督教。他对人性弱点的承认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著述家。他的《忏悔录》叙述一位断绝了尘世生活的一切舒适与乐趣的青年人的情感，与他作为一个善辩者同多纳图斯派、摩尼教和贝拉基派的唇枪舌剑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对那些教派的错综复杂的教义做了系统化的分析，其把握程度之高，直到八百年之后的托马斯·阿奎那才对此有所作为。他强调爱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几乎是在介绍自由思想。“热爱并做你想做的事”和“爱有罪的人但要仇恨罪恶行为”是他的两句座右[263]铭。同时，他强调教会制度化的必要性。他写道：“教会之外得不到拯救”，“罗马教廷说话了，事情就结束了”。他最为流行的著作是113卷的《上帝之城》，该书是在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城一事的启示之下写成的，描写了建在物质世界废墟之上的精神的城市。除了《忏悔录》外没有任何一本书更能表达这一时代的。奥古斯丁在故乡非洲担任希波城主教三十年，过着修道者生活。其修道规则对许多后来的修道规章，包括奥古斯丁修会规章、多明我托钵僧团（黑衣修士）规章、普雷蒙特修会规章、布赖吉提修会规章，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汪达尔人围城之时，奥古斯丁去世。

[260]

禁书目录（INDEX）

早期教会的这一传统，应归功于教皇英诺森一世（401—417年在位）颁布的第一个禁书目录，和教皇基拉西乌斯（Gelasius，492—496年在位）颁布的第一个禁书教令。基拉西乌斯教令在正式的基督教法规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推荐的和增补的阅读书目声明。尽管现代学者对这一教令与基拉西乌斯之间的联系表示怀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会始终保护着它对书面文字适当或不适当的判断权。五至十五世纪，从阿里乌斯和博提乌斯到胡斯（Hus）和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86年），教会对个别著述者发布了许多禁令。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尽管对这方面的优先权存在着争论，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发起或巩固了这一规则，即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得到主教的特许。[**印刷业**]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由于书籍像潮水般地涌现，教会统治集团越来越寻求梵蒂冈的指导，并且在特兰托宗教会议上要求付诸行动。结果产生了1557年由保罗四世起草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或称之为“禁书指南”（Guide to Prohibited Books)。由于梵蒂冈方面存在着分歧，所以第一版被禁止发行，最终出版的是1559年的第二版。应宗教会议的要求，“禁书指南”一再被修改，1564年的“特兰托禁书目录”（Tridentine Index）成为后来这方面实践的范例。另外，被教会列入禁书名单的作者及其作品，有十条判断标准。自1564年以来，罗马教廷的“黑名单”不断扩展。其判断规则于1596年、1664年、1758年、1900年和1948年进行了修改。(见原书附录Ⅲ，第1274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书目录”也遭到更多的批评。它始终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被禁止的书目在梵蒂冈鞭长莫及的新教国家中终能找到出版者。更有甚者，越是禁书越受欢迎。“禁书目录”实际上大大促进了禁书的刊行。天主教会的敌人总是快速引用它作为天主教不宽容的证据。自启蒙运动开始，自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对“禁书目录”的个别决定和其实际存在的嘲笑。如果给出出类拔萃的人和畅销书的话，结果会正相反，人们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另一方面，“禁书目录”必须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判断。现代欧洲的每一位当权者，无论是世俗的或是教会的，无论是新教的、

天主教的还是东正教的，他们都有着与梵蒂冈一样的愿望，就是控制出版物。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出版物检查仍没有停止。在谴责教皇的“禁书目录”过程中大声叫嚷者，在他们自己寻求禁止图书出版方法时，许多人则看不到矛盾所在。人们只需看一下某些时候的一些地方，除了梵蒂冈之外，欧洲文学名著也被世俗当局所取缔：[261]

公元35年	荷马	全部作品	罗马帝国
1497年	但丁	全部作品	佛罗伦萨城
1555年	伊拉斯谟	全部作品	苏格兰
1660年	弥尔顿	《破坏偶像者》	英格兰
1701年	洛克	《人类理解论》	牛津大学
1776年	歌德	《少年维特之烦恼》	丹麦
1788—1820年	莎士比亚	《李尔王》	大不列颠
1835年	海涅	全部作品	普鲁士
1880年	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琳娜》和其他	俄罗斯
1931年	玛丽·斯托普斯	全部作品	爱尔兰共和国
1939年	歌德	全部作品	西班牙
1928—1960年	D.H. 劳伦斯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大不列颠[1]

当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完全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所有的出版物都应允许出版，即使有着明显亵渎神明的倾向、有着破坏性、没有根据、猥亵或者失实，也应准许出版。它要求人们容忍所厌恶的东西。1980年，这一观点经受了所谓“修正史学”的考验。“修正史学”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真实性。这一立场还经受了针对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而发布的伊斯兰教追杀令的考验。实际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在运用他们自己的绝对原则时是犹豫不决的。每一社会和每一代人都必须在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中确定自己的立场。[2] 用当代极权主义的审查制度来与教皇的“禁书目录”相对比，这也是不恰当的。在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在1917—1991年的苏维埃世界，在得到明确的认可之前，所有的著作都被官方所严禁。从这一意义上说，英国圣公会的批准制度比起“禁书目录”来，有着更强的压制性。

1966年梵蒂冈的宗教教义大会的领导者宣布，暂缓执行对出

版物的禁令。到此时为止，“禁书目录”包括了大约4000个书目。

上述信息来源于无懈可击的资料，十八卷书每一卷都有教会的赞同决定的标记——NIHIL OBTA（毫无障碍）和 IMPRIMATUR（准许出版）。[3]

[262]

鲁菲努斯（RUFINUS）

阿基莱的鲁菲努斯·泰兰纽斯（Rufinus Tyrannius of Aquileia，约 340—410 年），曾经与圣哲罗姆有联系，他的名字留下了两个相关的记录：一是作为希腊神学著作的拉丁文译者，尤其是奥利金（Origen）著作的译者；二是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书籍的作者。他撰写的圣哲罗姆阐释的《使徒信经》注释本（Expositio Sancti Hieronymi in Symbolum apostolorum）于 1478 年 12 月 17 日由科隆的西奥多里克·鲁德在牛津出版。可是，一开头就出现了印刷错误，在标题页上遗漏了一个“X”，结果出版日期成了（错误的）M CCCC LXVIII（1468 年—译者注）[1]

从此以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录中可以看到上乘与下品工作：

查尔斯·巴特勒的《女性的君主政体或关于蜜蜂的一篇论文》（1609 年）

约翰·史密斯的《弗吉尼亚地图》（1612 年）

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剖析》（1621 年）

《公共祈祷书》和《圣礼的施行》（1675 年—）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1675 年—）

爱德蒙·波科克编，《阿拉伯文历史样本》（1650 年）

——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1655 年）

——格雷格《阿布法拉基王朝简史》（1663 年）

[理查德·阿莱斯特里]《妇女的天职：男性全部职责的作者的看法》（1673 年）

约翰·谢弗的《拉普兰的历史》（1674 年）

H. W. 鲁道夫的《俄语语法》（1696 年）

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格兰法律评注》（四卷本，1765—1769年）

F. M. 马勒的《梨俱吠陀：婆罗门的神圣赞歌》（1849—1873年）

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记》（1865年）

诺曼·戴维斯的《上帝的操场：波兰历史》（两卷本，1981年）

据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14年的功绩最为著名。当时，一批牛津的历史学家以出版书籍来支持英国的战争。《我们为什么而战》一书的手稿，在战争爆发仅三周的时间，就于8月26日交付出版社。编辑一本206页的著作，手工排版、印刷、装订，到9月14日就付诸发行。出版周期大大地缩短了。[2]

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动荡不安必然削弱同周边地区的联系。公元五世纪的不寻常之事发生于“克尔特人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克尔特教会采用来自高卢的隐修的基督教。其主教为逍遥自在的隐修士，通过单独个人的献身修行，最终吸引了大批信众。因为爱尔兰从来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来自不列颠西部的罗马公民圣帕特里克（约389—461年）于432年在阿尔斯特登陆，有步骤地使爱尔兰基督教化。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铺天盖地征服不列颠群岛的时候，爱尔兰得以保全了基督教，爱尔兰人因此能够对基督教世界做出回报。[不列颠人]

[263]

宙斯（ZEUS）

公元396年最后一次奥林匹亚运动会之后，宙斯的雕像就从奥林匹亚神殿迁到了君士坦丁堡。此后八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是由被流放的雅典人菲迪亚斯完成的一座巨大象牙塑像，从王冠到底座约有13米高。菲迪亚斯完成的雅典娜雕像曾使帕特农神庙大为增色。宙斯雕像的一部分曾镀以纯金。这座众神之父的雕像，被装扮成右手握着胜利女神小雕像，左手握着象征权力的鹰头权杖。有关细节在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和斯特拉波（Strabo）的著作中都有描述。按照他们的

说法，如果雕像被移动，雕像的头就会飞出神殿的屋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述，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的工匠们在公元一世纪时曾试图移动雕像，“神发出如此巨大的声音”以至脚手架都被震塌，工匠们被吓跑。正因为如此，雕像在原地待了三个多世纪。462年它被一场偶然的大火毁灭殆尽，当时，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利奥一世的首都奥林匹亚早已荒芜。1958年，德国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奥林匹亚的神殿工场，发现了一个赤土色的杯子，上面有粗糙的刻字“我属于菲迪亚斯”。[1]

[264]

不列颠人（BRITO）

贝拉基（Pelagius，约360—420年）是威尔士人，或者至少是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克尔特人（“贝拉基”曾被认为是他的名字摩尔根的希腊—罗马语的直译）。他的朋友称其为“不列颠人”。作为基督教神学家，他是当时来自西欧的少数参与教义之争的人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因希腊人的系统化阐述，正统教义开始趋于明确。尽管他的观点被认为是异端，但他仍是一位对基督教教义有着重要贡献的人。他与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是同时代的人，在他的推动下，奥古斯丁对上帝的恩典、人类的堕落、原罪、自由意志和先定论等一些重要教义做出了最后的陈述。贝拉基与另一位在罗马相遇的不列颠人塞莱斯蒂乌斯一起，强调人有能力通过自由意志对道德行为负责，换言之，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以人有“相反选择的能力”这句话而闻名，他的主要观念包含在如下这一格式化表述之中 *Si necessitats est, peccatum non est; si voluntatis, vitiari potest*（如果是需要，就不存在罪过；但是，如果有意志，犯罪就是可能的）。他也同样认为，得救的第一步是由自由意志的行动所决定的。

这些观点之所以遭到教会的拒绝，部分原因是它们降低了上帝恩典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它们将罪归之于人的失误而非归之于人的本性。从神学观点来看，贝拉基主义的标志就是否认或减少原罪的作用。十七世纪围绕着阿米尼乌斯和詹森所展开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见原书第492，502页）。

410年，逃出了哥特人包围之中的罗马避难于北非时，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在教义问题上又遭到进一步的指控。在一次迦

太基公会议上宣布了他们六项主要错误：

亚当即使没有犯罪也还是要死的。
亚当损害的是他个人而非整个人类。
新生婴儿像亚当刚出生时一样，是无罪的。
人类的死并不是因为亚当的死或罪。
同福音一样，律法也开启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无罪的人即使在基督降临之前也是无罪的。

仅仅因为发现奥古斯丁在 De peccatorum meritis（《论罪人的美德》）中将他单独列出作为攻击的目标，贝拉基乘船前往巴勒斯坦。他幸免于教会的一次调查，但是，当非洲的主教们取得了教皇索西穆斯（Zosimus）的支持时，他又陷入迷茫。在 418 年 4 月 30 日的法令中，皇帝洪诺留判其有罪没收财产并加以放逐。尊敬的比德对他的“恶毒而可恶的教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赞同：

[265]

伟大的奥古斯丁视其为蟒蛇。
这个卑劣小文人的笔端充满着恶毒的语言。[1]

使贝拉基与奥古斯丁和解的行动围绕着阿尔勒主教霍诺拉图斯（约 350—429 年）的著作而展开。霍诺拉图斯认为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意志是获救的协同因素。这一“半贝拉基主义”在奥伦治会议（529 年）上受到指责。但是在它的故乡，远离蓝色海岸（Côte d' Azur）地处林恩岛的圣霍诺拉特修道院并没有被关闭。林恩的圣文森特创造了著名的“文森特教规”，由此，所有神学主张都会受到三重标准的检验：普世性、古老性和一致性。1977 年，林恩的僧侣们出版了《霍诺拉图斯的圣希拉里的一生》的权威性版本。[2]

当亚美尼亚行省隶属于罗马帝国时，亚美尼亚教会就形成了。像它的对手克尔特教会一样，它也失去了与中心地带的直接联系，因而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古怪了。当克尔特教会转向贝拉基主义时，亚美尼亚教会则转向了一性论（Monophysitism）。330 年，基督教势力扩展到格鲁吉亚，当时，一个卡帕多西亚的奴隶的女儿促使格鲁吉亚的统治家族改信了基督教。由于这一步骤是从亚美尼亚移植来的，所以格鲁吉亚教会极少表现出亚洲政治色彩，却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较为密切

的联系。(格鲁吉亚教会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独立，直到1811年被迫合并到俄罗斯东正教会。）431年，第三次公会议在以弗所召开，从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前七次公会议得到东西方教会的共同承认和遵守：第一次尼西亚会议（325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以弗所会议（431年），查尔士顿会议（451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553年），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680—681年），第二次尼西亚会议（787年）。以弗所公会议宣告聂斯托利派为异端，吉本称之为“教会的骚乱”。同此前与此后的会议一样，以弗所公会议也是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召集的，拜占庭皇帝在教会事务中拥有最高权威。会议局面完全由来自东部教会的主教们所左右。西部的主教们虽接受会议的决议，但却显得越来越不情愿。

在教义问题上，表面的、持久的、基督学上的细节分歧持续不断：在基督的本性问题上、基督的意志问题上、基督在圣灵起源的作用问题上。基督只有一性即神性，或有两性即人性和神性呢？东正教首脑支持二性论，并且在查尔斯顿公会议（451年）的界定中，确认了“毫不混乱、不可改变、不可分割和不可分离地”联合在一起的“一位二性”的表达方式。基督一性论受到指责，却继续活跃于东罗马帝国。因为皇后狄奥多拉是一性论者，所以一性论者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徒中占据多数。基督有一方面意志还是有两方面意志？教皇洪诺留于634年致君士坦丁堡的一封信中无意之中使用了[266]“一意志”。但是，东正教会的首脑支持681年召开的第六次公会议所确认的基督二性论。在这次公会议上，一性论受到指责，教皇阿格索的代表默许会议的裁决。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理论中，圣灵是来自神的惟一源泉圣父，并因此通过圣子呢，或者是来自圣父和圣子呢？君士坦丁堡教会坚持认为是通过圣子来自圣父；罗马教会则坚持认为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一问题首次表面化发生在589年的西班牙，到第九世纪引起了双方决定性的分裂。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修道制度的兴起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成正比。东方的修道制度，无论是个人修道还是集体修道，都传播到了西方。最早的集体修道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消失了。360年，圣马丁建立了利古日（Ligugé）修道院。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努尔西亚的本尼狄克（约480—550年）建的修道院。本尼狄克建立了一套广为采用的修道规章。由于帝国权威的削弱，特别是在前帝国的西部各省帝国权威的削弱，修道院逐渐成为蛮族荒漠中的古典知识绿洲。在东方，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拉丁作家在东方也得到承认，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而在西方，这一切都需要加以培养。在这一方

面，重要的人物是弗拉维厄斯·马格纳斯·奥里略·塞纳特（Flavius Magnus Aurelius Senator，约 485—580 年），他以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名字而闻名，曾在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做过地方官。贝利萨留占领意大利后，他退居修道院，并提倡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开始收集古代文献。在那里，宗教和世俗的主题被认为是可以互补的。他的所作所为真正是恰逢其时。[**纪元**] [**鲍姆修道院**]

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冲击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结束了地中海区域的文化统一，削弱了地中海区域始终在北方前沿地区发挥作用的优势地位。由于穆斯林占领了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基督教五大教区中的三大教区——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处于异教徒的控制下。基督教会组织从一个健全的五边竞技场，简化为只有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基督教与罗马的拉丁基督教之间激烈的双边竞争。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罗马大主教用拉丁教会单一的声音反对四个希腊教会的大主教。伊斯兰教兴起后，这一局面变成了一对一，而且罗马教会享有较大的机动空间。此外，在东方，与基督一性论派之间的争吵仍没有解决。对异端派别来说，新的穆斯林统治者比东正教徒更具宽容性，所以基督一性论派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和科普特的教会从来没有被关闭。

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伊斯兰教切断了基督教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联系。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的福音已经传到锡兰和阿比西尼亚；之后，它被有效地阻止了向亚洲或非洲的进一步扩张达数世纪之久。大多数基督徒在一生之中从未见过穆斯林，但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伊斯兰教的阴影之下。事实上，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外壳，在这一外壳之中，基督教世界得以界定和巩固。从这一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为最终被称为“欧洲”的世界的形成给予了最大的刺激。

[267]

纪元（ANNO DOMINI）

基督诞生后六个世纪的时间里，极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确实，自“基督行走在加利利”以来，在戴奥尼西厄斯·埃克西库斯（Dionysius Exiguus）的著作问世之前，基本的历史年代学尚未建立。戴奥尼西厄斯·埃克西库斯是来自小西徐亚的一个说希腊语的修道士，是大约在公元 550 年死于罗马的卡西奥多勒斯的朋友。以基督诞生作为纪年的基础是戴奥尼西厄斯的创意，它应该开始于天使报喜节——圣母玛丽亚怀胎的那一天。

他将这一时间定为元年的第一日，是12月25日圣诞节前9个月的3月份。在此以前的年份以后退的年代顺序来计算，表达为基督之前 ante Christum（AC）或者‘Before Christ’（BC）。此后的年代则被称为“基督降临第几年”，或 Anni Domini，即‘Years of Our Lord’（AD）“我主第几年”。没有零年。[1]

基督纪元或公元纪元的推广经历了许多个世纪，首先是在拉丁教会中被采用，之后是东正教会。作为编年史书的作者，尊敬的比德（673—735年）在公元八世纪早期撰写《英吉利教会史》一书时，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新的纪年方法。

同时，各种各样地方性的纪年法也盛行过。最为常见的纪年方法是帝王纪年。历史年代以帝王在位时间和统治者的世代来计算，日期以某个皇帝、教皇或国王登基的时间来决定，典型的例子便是《圣经·旧约》中所记：“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七年，亚述王撒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译者注）

基督纪年必须与众多的相互抵牾的纪年方法相竞争。希腊奥林匹亚纪年始于克罗伊巴斯（Coroebus）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的公元前776年7月1日，每四年一次，一直持续到公元四世纪。曾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使用过的那波那撒尔（Nabonassar）的巴比伦纪元，因托勒密的著作而闻名于中世纪。它的起点相当于公元前747年2月26日的星期三。塞琉古王朝的马其顿纪年（Macedonian Era），始于公元前312年伟大的塞琉古对巴比伦的占领，广泛应用于黎凡特。犹太人以“契约纪年”（the era of contracts）而著称，这种纪年方法一直使用到十四世纪。罗马人的纪元以“罗马城建立”的年代为开端［**罗马纪元**］。在西班牙，恺撒纪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9年屋大维对伊比利亚的征服，因被西哥特人所采用，所以在加泰罗尼亚一直使用到1180年，在卡斯提一直使用到1382年，在葡萄牙一直持续到1415年。穆斯林的希吉拉纪元（Muslim Era of Hegira）始于先知自麦加出走的公元622年7月16日星期五。它至今仍盛行于整个穆斯林世界。

[268] 毫不奇怪，因为比较复杂，戴奥尼西厄斯对基督诞生的计算一开始就出现错误。戴奥尼西厄斯将纪元元年定在奥林匹克纪年的195年[1]，罗马建城纪年的754年，但却错误地认为这是“奥古斯都的儿子C.恺撒和波勒斯（Paullus）的儿子L·伊米利厄斯·波勒斯（L. Aemilius Paullus）当选执政官的那一年”。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基督真的诞生于公元1年。无论根据圣路加的

记载还是根据圣马太的记载，基督纪年开始于伟大的希律王统治的最后一年（公元前4年）或罗马人在犹大地区进行人口普查的那一年（公元6—7年）。

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一样，最初的历史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或始于 Annus'Mundi（创世纪）。拜占庭教会将其定于公元前5509年，它一直是东正教世界部分教会历法的基础，在希腊和俄罗斯持续到近现代。犹太学者将其定在公元前3760年，它成了现代犹太历法的起点。科普特教会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一样，将其定在公元前5500年。英格兰教会在1650年由大主教厄舍尔定在公元前4004年。

对东方的、古典的、基督教的年代学进行批判性的对照和调和，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最先开始的。在新教思想影响下，斯卡利杰完成了 *De Emendatione Temporum*（《纪年的改革》1583年）一书，与教皇格列高利八世进行的儒略历改革是一致的。它标志着年代学和标准的历史纪年的开始。[2]

但是，以“新历”（NS）而著称的格雷果里历，1585年被介绍给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大多数新教国家或东正教国家仍使用作为“旧历”的儒略历。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它们才采用了“新历”：苏格兰在1700年，英格兰在1752年，俄国在1918年。只要两种历法同时并存，所有的国际通信都必须在信件上写有两种日期才能处理，如“1734年3月1日或12日”，“1917年10月24日或11月7日”。

纪年不统一导致许多奇怪之事的出现。因为各地历法纪年的差别，到十七世纪时已达到10—11天，所以，由英国的多佛尔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加莱时已是下个月的中旬。同样，因为“旧历”年开始于3月25日，而“新历”年开始于1月1日，所以，今年从加莱出发渡过英吉利海峡，当抵达英国的多佛尔时却是在去年。直到布尔什维克政府放弃旧历，欧洲才能完全同步运转。在俄国，1918年的1月31日（旧历）和2月14日（新历）之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1918—1940年间，苏联共产主义者仿效法国大革命，取消了七天一星期的制度，每天都以数字代替之，并且，以1917年为起点来计算“革命纪年”。[3]［**葡月**］

[269]

鲍姆修道院（BAUME）

《米其林指南》（Guide Michelin）一书说，鲍姆修道院建于六世纪，是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St Colomban）所为。科伦巴的名称带有克尔特人的血统，意为“洞穴”，修道院建在欧洲最为奇特的地方之一，位于一片广大的石灰岩峡谷鲍姆盆地的底部，地处侏罗山的松林深处。与同名的女修院一样，鲍姆修道院离杜布斯河（River Doubs）有50英里，盲人圣奥迪尔（St Odile）在此获得了光明，据说此事发生于高卢—罗马文明被信奉异教的勃艮第人所征服的时候。此时，基督教正在由隐修士团体重新建立于蛮族世界。鲍姆修道院逐渐发展成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组织，掌握着数百个村庄和圣俸。其教士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贵族教士占统治地位的世俗化组织。它一直存在到1790年，被法国大革命解散，纪念碑也被捣毁，城镇名称也由莫伊的鲍姆（Baume－les－Moines）改为莫旭的鲍姆（Baume－les－Messieurs）。[1]

在基督教的修道制度中，像鲍姆修道院这样的勃艮第式修道团体，在保存于爱尔兰的古代世界隐修制度与十一世纪之后的中世纪修道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联系。毕竟是仿效鲍姆修道院，伯尔诺（Berno）和他的同伴才于910年创建了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见原书第315页）。

但是，读过《米其林指南》的人会感到失望，因为从中可以发现，鲍姆修道院历史的许多细节充其量是一些不可靠的传说而已。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鲍姆修道院与圣科伦巴有联系，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建立于六世纪。事实上，第一次明确提到巴尔玛（Balma）修道小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869年，这比地处得米斯的鲍姆的圣奥迪尔女修院（St Odile’s convent at Baume－les－Dames）建立的时间还要晚。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将鲍姆修道院与圣科伦巴联系起来是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们的发明，他们试图借此建立起有关其母修院的世系家谱。[2]

同样令人怀疑的是鲍姆修道院最为丰富多彩的人物德·瓦特维尔（Seigneur de Watteville，1618—1702年）。他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担任修道院院长长达40年。德·瓦特维尔（de Watteville）作为战士、谋杀者和僧侣曾因逃避司法审判逃往君士坦丁堡，在得到教皇的赦免之前，在那里位至帕夏和摩里亚的地方长官。根据圣西门的说法，他是通过真正的悔改而得救赎的一个范例。根据历

史记载，我们可知他是一个惯常的变节者，他的背叛招致了法兰西人对他的家乡弗兰朗什—孔泰（Franche - Comté）的野蛮征服。他的墓碑上刻着：

“此地长眠着一个意大利人和勃艮第战士，一个法国人，
作为一个修士，在其职位上，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教士和修道士。”[3]
（ITALISET BURGUNDUS IN ARMIS
GAKKYS IN ALBIS IN CURIA RECTUS PRESBYTER
ABBAS ADEST.[3]）

[270]

因此，鲍姆修道院既提供了传说，又提供了历史。人们总是从个人目的出发看待过去。学术专题论文的作者们正在玩着一场失败的游戏，传给后代的历史将始终是事实、传说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相互混杂交织在一起。

教皇职位的出现并不能确定一个精确的时间。在宣称拥有至高无上地位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罗马主教们有着极大的自由。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之间日益增加的分歧尽管不断导致暂时的分裂，但并没有导致不可挽回的破裂。奇怪的是，在前四个世纪罗马仍作为罗马帝国的中心时，罗马教会则常受制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利奥一世（440—461年）是第一个强调罗马教会具有拉丁特性的人。同时，拉丁大主教们摆脱了直接的政治控制，在民事权利的斗争中退居于罗马城的背后。结果是，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从此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分离在西欧具有典型性，在东欧对东正教来说则是陌生的。六世纪时，罗马大主教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局面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帝国权力的恢复，接下来要面对伦巴德人的入侵。这些大主教中的两位，西尔维留斯（Silverius，536—537年）和维吉里（Vigilius，537—555年）完全处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之下。在基督一性论问题的争论中，维吉里被残酷地置于屈服于皇权的地位。

第一个以修士身份登上教皇宝座的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常被认为是未来教皇权力的建筑师，他依靠的是管理技能和坚持原则。自称是“上帝仆人之仆人”的格列高利，治理着罗马城的世俗事务，与伦巴德国王们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改组教会的地产和财政，恢复罗马与非洲、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之间的联系。他的《教士守则》很快成为中世纪主教们的指南。他频频使用“普世主教”的称号

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相对抗。到他去世时，权力的天平正倾向于罗马大主教一边。受穆斯林入侵影响，东罗马帝国皇帝对意大利的影响力几乎全部丧失，尽管东罗马帝国皇帝对这一权力曾屡次申明但都归于无望。作为基督一性论事件的一个结果，马丁一世（卒于655年）作为最后一位殉教教皇死于流放地克里米亚。他是被拉文纳总督绑架去的，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法庭上受到鞭笞后被流放。[圣歌曲调]

[271]

圣歌曲调（CAN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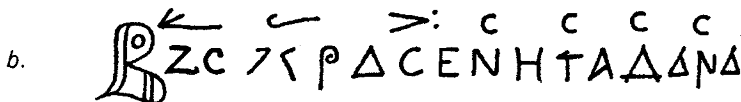
拉丁教会的无伴奏圣歌常被称为“格列高利圣歌”，以纪念这位确定了圣歌的八部曲调并收集了约3000首小旋律歌曲的教皇。根据拜占庭方言判断，圣歌曲调来源于希腊，尤其是来自犹太人的圣歌传统。反过来，它又成为欧洲音乐借以建立的基础。它通常被用于无伴奏自由拍式合唱的圣歌、赞美诗和应答轮唱的赞美诗。它有四种主要的“曲调”：安布罗斯式、罗马式、高卢式和莫扎勒布式，但是罗马式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起初，它并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早期的圣歌曲调形式不可能准确地重现。[音乐]

无伴奏圣歌的记谱法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像希腊人一样，拜占庭人使用字母记谱法，用重音符作为补充，以表示旋律的运动。在它被别的记谱方法取代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会仍保持着这种记谱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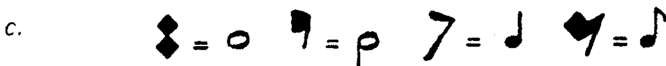
a.



b.



c.



a. 十一世纪没有五线谱的库菲斯马记谱法。b. 十二至十三世纪使用希腊—拜占庭字母的俄罗斯记谱法。c. 十七至二十世纪，

* Cantus 现在作为音乐术语也被译作“定旋律”。——译者注

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礼拜仪式中的音乐记谱法的符号。

(After Machabey.)

在西欧，正像圣阿蒙德的哈克巴尔德在论述法兰克音乐的专题论文 De harmonica institutione 中所表述的，也采用了将重音符号加在拉丁文正文音节之上的做法。圣高尔的诺特克·巴尔布勒斯（Notker Balbulus of St Gall）曾尝试过使用附加句，即“在圣歌的主体部分加上旋律或解释句”。十一世纪，音乐研究家盖都·德·阿雷佐（Guido d' Arezzo，约 995—1050 年）发明的记谱方法是主音首调唱名法的先驱。

在《施洗者圣约翰赞》中，他用首调的第一个音节创立了音阶逐渐升高的六音阶：UT – RE – MI – FA – SOL – LA（do – re – mi – fa – sol – la）。第七个音阶 SI 是后来加上的，代表（S）ancte（I）ohannis。他还发明了带空间的多达十条线的谱表，这是近现代五线谱的先声。它有一个可移动的调号，以及悬挂式的表示“对位乐主题句”和“rods”的一个“方形符号”。但是，音符是否有了固定音长或重音，这一点不能确定。 [272]

（“让圣约翰的榜样带动我们｜啊，我们相应地歌唱你非凡的行为，｜心情必须经受磨炼，束缚我们的枷锁｜砸它一个粉碎。”）[3]

从十二世纪后期以来，格列高利圣歌因复调音乐技巧而丰富了，在平行的音阶中可以唱两个或更多独立的旋律。这一实践大大激发了乐器伴奏的发展。中世纪的听觉只能辨别八度音阶的第四和第五音阶的调合。但是固定小节的引入，可能来自民间音乐和舞蹈。旋律交叉的对位需要，鼓励了对节奏与和声的研究。这[273]一切与悦耳的音调加在一起，构成了现代音乐形式的基本因素。轮唱艺术开始于十三世纪。之后，一个标准的音乐短语词汇能够传达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意义。因此，欧洲的“音乐语言”，从无伴奏圣歌到斯特拉文斯基，有着连续的发展历史。[4]

十九世纪的“蚓螈运动”（Caecilian movement）将格列高利圣歌视为欧洲音乐的真正源泉。勒芒附近索莱姆的本尼狄克修道士承担了复原圣歌的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他们的成果被认为是最主要的现代权威，给包括李斯特的《耶稣基督》（*Christus*）在内的音乐带来了极大的灵感。

八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再也不能上演对西欧的权力要求了。710年，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将罗马宗主教传召至君士坦丁堡，一个叙利亚人——教皇康斯坦丁（708—715年在位），忠实地履行了皇帝的诏令。在会面时（事实上，这是罗马主教与在位皇帝之间最后一次），皇帝礼节性地吻了罗马大主教的脚，作为回报，皇帝接受了赦免和圣餐。但是，康斯坦丁不久后就遭谋杀，与皇帝之间达成的有关拉文纳的协议也成了一纸空文。732年，皇帝利奥装备了一支舰队用来收复已被伦巴德人征服的拉文纳，并逮捕违抗破坏圣像运动法令的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在位）。但是，舰队沉没于亚得里亚海。此后，罗马大主教在实际上实现了完全独立。接下来的罗马宗主教再也没有寻求过东罗马帝国皇帝确认其选举结果的委任书。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官员，再也不能在罗马行使权力了。

从任何意义上讲，罗马大主教已经具备了保持独立的条件。罗马宗主教作为到罗马朝圣的守卫者，其重要性在伊斯兰教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之后日显突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唾手可得的收入。作为法律裁决的一个主体，教令可以在司法中广泛运用，特别是教会法被编纂成法典之后（见原书第349页）。圣彼得遗产（教会的地产）的快速增加，为罗马教廷要求世俗权力奠定了基础。首先是与伦巴德人，之后是与伦巴德人的竞争对手法兰克人的联盟，使教皇获

得了寻求国际保护的手段。在理论上，基督教会的统一仍然存在着，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Papa”称号曾被用来亲切地称呼所有的主教，但是此后便成为罗马主教所独享的称号。这便是教皇职位诞生的时代。[**圣物崇拜**]

第七次公会议（787年），也就是第二次尼西亚会议，主要针对破坏圣像运动。此次会议对来自罗马由哈德良一世提出的观点，做出了有利的决定。圣像可以受到尊崇，但不能像崇拜上帝那样加以崇拜。在信仰问题上，这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次采取共同行动。

[274]

圣物崇拜（REVERENTIA）

六世纪的一天，乔治·佛罗伦（Georgius Florentius，后来的图尔主教格列高利）与母亲旅行于勃艮第到奥弗涅（Auvergne）之间的路上，突然遭遇一场风暴。他的母亲在空中挥动着装有圣物的袋子，乌云散开了，旅行者安然无恙地躲过了这场风暴。起初，这个自以为是的孩子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善行的报答，于是他的马被绊倒，他从马背上摔到了地上。这是他为自负付出代价后得到的教训。另一次是，在参观位于布里尤德（Brioude）的圣朱利安（St Julien）圣地时，格列高利出现剧烈的头痛。他把头伸到被斩首的殉教者曾经洗过头的泉水中，头立即就不痛了。这是从圣物崇拜中得到的教训，这种崇拜来自对神圣化了的事物的仔细观察，来自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疗效。

自从迫害时期结束以来，殉教者崇拜和圣物收集逐渐成为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最初的圣物，与福音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直接关系。与此有着间接关系的次要圣物也同样被接受。君士坦丁堡是收集和散发圣物的中心。除了真十字架的两块残片之外，君士坦丁堡拥有的真品级圣物包括刺冠、神圣的长枪、圣母的腰带、施洗者约翰的。第二次尼西亚会议之后，规定所有新建教堂必须供奉圣物，活跃的圣物交易发展起来了。823年，圣马可的遗体从亚历山大里亚被抢夺至威尼斯。1087年，圣尼古拉斯的遗体运到了巴里（Bari）。西欧的十字军战士是最大的圣物掠夺者。

对图尔主教格列高利在圣物上表现出来如此明显的崇拜，人们常以轻信来加以解释。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圣物崇拜不仅为形成中的个人道德规范提供了手段，而且为微妙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攀比提供了工具。崇拜圣物是一个真正信仰者的

标志。不崇拜圣物就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文盲，或者是一个自满者。对圣物行使解释权的教士的地位得到提升，巩固了他们在教徒中的声望。拥有较高等级的圣物的教堂或城市，在得到神的庇佑方面也得到较高的声望，从圣地朝拜者那里自然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种说法，基督徒相信灵魂是与死者的随身用品一起升入天堂的，并伴随着对尸体和陵墓的特殊敬畏。同时还伴有一些几乎是奇异的感受，这种感受强调不同寻常的死者会散发出百合花和玫瑰花的香味，闪闪发光的光环，以及唱诗班天使般的声音。[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物必然要贬值。当所有的使徒、殉[275]教者、教父都作为崇拜对象时，便会出现每一位死去的主教都可以成为圣徒的危险。里昂主教普里斯库斯（Priscus）于573年提升为主教，就没有做册封圣徒的事。他将前任奈斯提尤斯葬在一流陵墓里，允许他的执事穿戴奈斯提尤斯（Nicetius）的十字褡作为法袍。正是由于此事，普里斯库斯和奈斯提尤斯都被封为圣徒，时间是在1308年。

新教改革向圣物发起了挑战，许多圣殿被毁。但是，新教的狂暴既没有影响到东正教世界，也没有影响到天主教世界。像位于基辅的“洞穴修道院”帕卡斯卡娅·拉夫拉（Pecharskaya Lavra）陵寝一样，在意大利的许多教堂里，也能见到杰出人物的木乃伊。最特殊的圣物收集地之一是瓦尼昂（Oignies）修道院，它收集了十二世纪的宝藏。宝藏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慕尔（Namur）。为防备法国大革命和纳粹占领时期的盗宝者，它曾两次被埋葬起来。其中的无价之宝包括：圣彼得的肋骨（St Peter's Rib），圣詹姆斯的一只脚（St James's Foot），圣母的乳汁（Virgin's Milk）。所有这些都装在耀眼的圣物箱中，每个圣物箱都设计成与其所装圣物的解剖学形式相适合的令人可怕的外形，并饰以金丝和银丝、经过雕琢的宝石和镶嵌用的乌银。作为“比利时的七大奇迹”之一，它们由位于那慕尔的十七名懊悔的朱莉·比利亚特（Julie Billiart）的圣母修道院的修女保管。[2]

基督教的输出 395—785年

从基督宣布“跟我来”开始，基督教就成了信奉福音的宗教。自从圣保罗的思想得到确认以后，基督教便对所有人敞开了大门，对潜在的选民不存在任何限制。但是，一旦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皈依基督教就成了帝国的政策。对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来说，信仰的输出不仅针对个人灵魂，而且针对整个国家：这是一个战略意识问题。对那些想要皈依基督教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接受基督教涉及政治因素。引进基督教能够大大增进文化素养，促进商业交流。但是，从罗马还是从君士坦丁堡引进基督教，还是这两方面的都不予引进，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选择。

爱尔兰之所以较早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原因是贝拉基主义在那里的大力传播。结果，高卢—罗马人主教奥塞尔的哲梅纳斯（Germanus of Auxerre）开始密切关注不列颠诸岛和布列塔尼的传教活动。432年，由“有信仰的爱尔人第一任主教”帕拉迪厄斯（Palladius）率领的传教团在威克洛（Wicklow）登陆，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然而，由圣哲梅纳斯的不列颠籍学生圣帕特里克（约385—461年）率领的第二个传教团，则取得了长久的结果。在米思（Meath）的塔拉（Tara），帕特里克与强大的国王劳格海（Laoghaire）相遇，在斯莱恩（Slane）山上点燃了复活节的火焰，并使德鲁伊教派（Druids）受到压制。444年，在阿马设立了第一个主教职位。

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是与高卢地区的宗教分裂密切相连的。五[276]世纪时，高卢—罗马人已完全改信罗马派基督教很长一段时间了。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阿勒曼人最早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与此同时，北方的法兰克人仍处于不信教的野蛮状态。直到496—506年的某一时刻，克洛维才接受了兰斯大主教圣雷米（St Remi）的洗礼。然而，通过罗马的一位主教接受基督教，使他的墨洛温王朝与高卢—罗马人建立了反对其最初的蛮族统治者的联盟。据说他曾将阿基坦的天主教主教们当成“第五纵队”。因此，法兰克与“天主教的联系”对政治的巩固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建立与罗马之间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对早期法兰克基督教的许多了解来自图尔主教格列高利（540—594年）写的《法兰克人史》。格列高利对墨洛温王朝的赞美之词，并不能掩盖“新一代君士坦丁”克洛维是一个残暴之君这一事实。格列高利讲述了一个作为战利品的苏瓦松花瓶的故事。一个法兰克战士因拒绝与克洛维分享这一战利品而将花瓶砸得粉碎。等到第二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校场阅兵时，克洛维责骂砸碎花瓶的那个战士武器装备保存不佳，当那个战士弯腰拿武器的时候，克洛维抡起战斧击碎了他的头颅，并说“这就是你对待苏瓦松花瓶的行为”。[19]

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仍处于蛮族入侵造成的骚乱之中。爱尔兰传教士则在从事着一系列相反的事情。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西班牙，部分目的是要根除阿里乌斯教派，因此发起了另一场传教运动。前三次传教是由格列高利一世组织的。

563年，圣科伦巴（St Columba，约521—597年）抵达爱奥纳岛，对爱尔兰的传教开始了。这次传教起初是针对不列颠诸岛的，之后又指向了法兰克人统治的地区。20年后，圣科兰巴努斯（St Columbanus，约540—615年）同来自伟大的班戈修道院的同伴们一起出发前往勃艮第。他建立了包括卢克瑟在内的几座修道院，在康茨坦斯湖上的布雷根茨逗留过，因为批判墨洛温王朝国王们放纵的生活而冒犯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最终在热那亚附近的博比奥去世。圣高尔（St Gall，卒于640年）在现今的瑞士传教，他的名字来自伟大的宗教中心圣高伦（St Gallen）。约在635年，来自爱奥纳的圣艾丹（St Aidan，卒于651年）前往圣岛（即林迪斯法恩），促进了英格兰的信仰转变。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爱尔兰僧侣们遵循着与罗马不同的习惯。此后的时间里，在克尔特与拉丁传统相协调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问题。[**爱奥纳**]

554年，东罗马帝国的入侵使伊比利亚基督教的地位受到动摇。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西哥特人与其臣民之间存在着分歧，其臣民经常与南部的皇帝们共谋，西哥特王国只好只身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国外的进攻。其父为阿里乌斯派、其母为罗马派的西哥特国王莱卡雷德（Reccared，586—601年在位），作为一项政策和平地接受了天主教。这一决定由第二次托莱多会议给予了确认（589年）。[**孔波斯特拉**]

几乎是同一时刻，在意大利，信奉阿里乌斯派的伦巴德人，通过国王阿吉卢尔夫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兰克人西奥多琳达（Theodelinda）的婚姻而接受了天主教。在米兰附近的蒙察建立的基督教教堂当中，保存着伦巴德人的铁冠，铁冠上的铭文依稀可见：AGILULF GRATIA DEI VIR GLORIOSUS REX TOTIUS ITALIAE OFFERT SANCTO IOHANNI BAPTISTAE IN ECCLESIA MODICAE。直到689年加冕礼宣告天主教的最后胜利，天主教与阿里乌斯派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麻风病人**]

[277]

爱奥纳（IONA）

597年5月的一天夜晚，在狭小而没有一棵树的赫布里底群岛的爱奥纳岛上，年迈的圣科伦巴在修道院内圣坛的台阶上停止了呼吸。他当时正在抄写《诗篇》，正抄到《诗篇》的第34篇："但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作为一个多尼戈尔人，在563年"德鲁伊德岛"的德鲁伊德河口小岛的12个修士登陆之前，他从伦敦德里出发，在爱尔兰建立了许多教堂。这位"喀里

多尼亚（苏格兰）的使徒”曾在岛上教堂为达尔里厄达（Dalriada）国王加冕，在克尔特基督教和盖尔文明向西部苏格兰扩张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通过向诺森伯里亚的林迪斯法恩传教，他的基督教社团也发起了对北部英格兰的基督教化过程。在他去世的同一年，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在肯特建立了罗马基督教的传教团。

克尔特教会在爱奥纳岛的命运具有启发意义。806年，可怕的维京人入侵，它幸存了下来，但是修道院长和68名修士被杀。大约在1200年，具有圣科伦巴传统的修士遭到驱逐，修道院被该岛领主雷金纳德建立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和奥古斯丁女修道院取而代之。1560年，当改革了的苏格兰教会彻底废除修道制度时，修道院的设施已经荒废或近于废弃。该岛屿落入阿盖尔的坎贝尔公爵（Campbell Dukes of Argyle）之手，1899年公爵将修道院归还给苏格兰教会，以便使其恢复原貌。重建的大教堂于1905年重新投入使用。由乔治·麦克劳德博士（Dr George·Macleod）于1938年重建的爱奥纳基督教社团，主要致力于一般性工作和祈祷。[1]每一时代基督教都有其自己的烙印。

据说，英格兰引起罗马大主教的注意是因为格列高利一世在奴隶市场上发现了等待出卖的一个金发男孩。他说，这哪里是盎格鲁人，简直就是天使。不久之后的596—597年，他派遣一位修士——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卒于605年）出使英格兰，以使野蛮的英国人改变信仰。在较短时期内，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接受了洗礼，并设立了坎特伯雷、罗彻斯特、伦敦主教区。诺森伯里亚的贾罗修道院修士“尊敬的”比德（673—735年）用毕生的精力构筑英格兰基督教的历史，他的《英吉利教会史》是时代的里程碑之一。比德特别感兴趣的是南北传教团之间的冲突、与此相应的约克和坎特伯雷两大竞争中心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惠特比宗教会议（664年）上两者之间的最终和解。他同样也记载了教皇格列高利与奥古斯丁内容广泛的通信：

[278]

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

根据传说，四世纪的某一时期，使徒雅各的尸身和他圣洁的头颅用石船从巴勒斯坦运到了加利西亚。石船停泊处用来拴船的

柱子保存在科伦纳（Corunna）附近的帕德龙（Padrón）一个很小的海港教堂中。这一消息得到广泛传播，约两百年后，在利布莱顿（Libredon）、圣地亚哥的圣徒的圣迹，仍然吸引着川流不息的朝圣者。859年，对雅各的一声祈祷使利昂的基督徒奇迹般地赢得了对摩尔人的胜利。因此，圣徒获得了马塔莫罗斯或“摩尔人屠夫”的绰号，莱昂（Leon）发展成为一个君主国。从899年开始，一座新的大教堂在圣徒的陵墓上建成，这里更是成了朝圣的中心。它的徽章成了朝圣者的通行证和大西洋上的指路明灯。

朝圣者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是出于对著名圣徒力量的相信，相信圣徒能够为他们的灵魂代为求情。一些人是为了治病。许多人是为了结伴同行的乐趣，为了快乐的冒险，或者被欲望、获取利益、逃避等更为低级的原因所驱使。圣地亚哥特别吸引朝圣者的原因是，它是“人们想去而能够去”的地方，并且它还是教会选定的正式的赎罪之地。

前往圣地亚哥有四条漫长的朝圣路线，其中半数里程通过西欧（见原书附录Ⅲ，第1253页）。一条路线始于巴黎的圣雅克教堂，向南经过图尔、普瓦提埃、桑特和波尔多。第二条路线始于勃艮第韦泽莱的圣玛丽—玛德利娜（Ste Marie – Madeleine），向西南途经博格斯和里摩日。第三条路线始于奥弗涅韦莱山的圣母大教堂。这三条路线都汇聚于比利牛斯山的龙西瓦利斯关口。第四条路线从阿尔勒的圣特罗菲姆（St Trophime）出发，向西到达图卢兹，在松波特山口翻越比利牛斯山，在阿尔加河（River Arga）上的蓬特—拉—雷纳（Puente la Reina）与其他三条路线交汇。朝圣路线的最后250英里，穿过曾经有着迷人景色的阿斯图里亚、布尔戈斯和莱昂，所有的朝圣者沿着相同的圣地亚哥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直至格洛里亚的入口处。

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在朝圣的盛期去圣地亚哥是一项横穿欧洲大陆的大事。英国和爱尔兰的朝圣者常常首选去图尔，或者航海去吉伦特（Gironde）的塔尔蒙。德国和瑞士人沿着罗讷河去里昂，再从里昂去往韦泽莱或勒普韦。意大利人则航海去马赛或去阿尔勒。朝圣用的指南书也出现了。朝圣途中的修道院和圣所，如康奎斯（Conques）的圣福爱修道院（Abbey of Ste Foy），从朝圣者的捐献中逐渐富了起来。龙西瓦里斯的避难所一年要准备30000顿饭。沿途的墓地也不断接收那些再也无法向前走去的朝圣者的遗体。

历史学家讨论促使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因素，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1]

[279]

麻风病人（LEPER）

643年，伦巴德国王罗瑟尔（Rothar）发布了一项法令："如果某人患有麻风病……并被驱逐出他所居住的城市或住处，不要他捐献财产给任何人。因为从被驱逐的那天起，他就被认为死去了。"[1] 这项法令本身就足以使麻风病是由十字军带入欧洲的荒诞说法不攻自破。

放逐麻风病人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五世纪，至少有一座麻风病院的拜占庭也持有相同的态度。基督教《圣经·利未记》第13章提供了《圣经》上的依据。麻风病人被迫生活在城外限定的区域内，必须穿着与众不同的颜色的长袍，上面印有字母L；他们走路时要摇着铃、打着响板，或者吹着喇叭，或者喊着"不干净，不干净！"六世纪的里昂宗教会议正式将麻风病人纳入主教的控制之下。事实上，麻风病人是靠乞讨过活的。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制定了管理麻风病人的程序，被怀疑患有麻风病的人必须接受教士或地方官的检查，如果发现确已感染了麻风病，就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埋葬活动将其正式从社团中分离出去。

安格尔（Angers）的圣阿尔金（St Algin）撰写的《隔离麻风病人》中，描述了这种仪式。悔过的麻风病人穿着罩住头部的黑衣服，站在一个挖好的墓穴里。牧师说道："耶稣，我的主……我因你而重生。"然后，教士宣读放逐令：

> 我禁止你进入教堂、修道院、市集、磨坊、市场、客栈……在没有穿着麻风病人服装的情况下禁止离开你的房间，禁止赤脚走路……禁止在溪流或泉水中洗漱或喝水……禁止与你自己以外的女人一起生活。如果在路上要与某人谈话，必须在下风处回话……不带手套禁止接触井水或井绳。禁止与孩子们接触或给他们东西……除了与麻风病人，不得与其他人一起吃喝。[2]

之后，麻风病人就被带入前往流放地的队伍。

一些统治者还批准过更加残忍的做法。1318年，法国国王腓力五世指控法国的麻风病人与"萨拉森人"结盟，在井里下毒。他下令将他们和向他们提供建议与帮助的犹太人烧死。[3]1371年、1388年、1394年、1402年、1404年，巴黎市政当局徒劳地呼吁加

强麻风病管制法。对麻风病人的残忍源自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麻风病是对性堕落的一种惩罚。关于这一疾病带来了严重的道德污染的说法，进一步引起对其传染性的过分夸大。

即使如此，麻风病的侵袭仍是无处不在。它使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伦敦主教休·德·奥利瓦尔（Hugh d' Orivalle，死于 [280] 1085年）染病身亡。医生们对这种病是由细菌所致毫无知晓，也没有缓解的办法。他们相信阿维森纳的理论，强调麻风病虚假的不易把握的以及冲动的心理症状。城市的围墙之外，麻风病院是常见景观。在英国，地处坎特伯雷附近的汉布尔当（Hambledown），作为麻风病人的居留地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居民区。伯顿麻风病院地处有治疗功效的泉水附近，后来泉水被用来酿酒。

中世纪的文学习惯于将麻风病作为耸人听闻的处罚手段。在特里斯坦和埃塞尔德（Isolde）的几个故事中，女主人公避免被烧死的惟一选择是被遗弃在麻风病人之中：

公爵说：我将带她
去我的病人那里。
他们都会爱她的，
她会在那里不光彩地死去。[4]

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麻风病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大大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梅毒［梅毒］。而人们对麻风病的偏见仍没有改变。1933年的《牛津英语词典》将麻风病定义为“一种令人讨厌的疾病”，象皮病。到1959年时，如果重复旧的有关麻风病的观点，一个颇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也会受到批评。[5]麻风病就是中世纪的艾滋病。

奥古斯丁的第八个问题。孕妇能否接受洗礼？生孩子后多长时间才能进教堂？婴儿生下后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多长时间才能接受洗礼？孩子出生后多长时间丈夫才能与妻子发生关系？妇女在特定时期能否进教堂？这时她能否接受圣餐？男子在与妻子发生关系后没有净身能否进教堂？能否接受圣餐？在这些问题上，未开化的英国人需要指导。[20]

格列高利特别关心的是使野蛮人的行为适应基督教的习惯。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偶像崇拜的神庙……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坏

掉。应该捣毁神庙里的偶像，但神庙本身应该撒上圣水，建立圣坛，存放进圣物……由此，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放弃偶像崇拜……仍像以前一样常去这些地方……但是，因为他们有向魔鬼献祭公牛的习俗，我们要用其他庄严的宗教仪式取而代之……他们不能再用牲畜向魔鬼献祭了，但他们可以将牲畜宰杀掉用作食物以赞美上帝的荣耀……如果允许人们有世俗的欢乐……他们将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喜悦。因为，一次性根除顽固头脑中的所有错误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想登上山顶的[281]人都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的……[21]

这种谨慎的态度无疑对传教获得最终的成功做出了说明：但是，传教活动面对的是一个延展开来的时期，其中若隐若现的异教活动与缓慢扩展的基督教并存。总的来说，在福音传播中，教会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努力迎合了“蛮族”的观点。教会使皈依者相信，只有通过洗礼，一个人才能被纳入文明的层次。异教题材对基督教作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史诗《贝奥武夫》中，异教文化生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其突出特征。

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们如此专注于对付穆斯林的进攻，以至无暇顾及非基督教臣民和邻居的灵魂。像保加利亚人一样，大斯科拉维尼亚（Sclavinia）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好暂时任其发展。七世纪和八世纪，君士坦丁堡满足于自身的伯罗奔尼撒及其他岛屿的重新希腊化和重新基督教化。这并不像现代希腊史中评论的那样，是一段小插曲。克里特岛直到十世纪还掌握在穆斯林手中。

尽管有法兰克人作为榜样，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部落还是与基督教保持距离达两个多世纪。这项转变任务留给了来自北方的英国传教士和来自西法兰克的战士。678—679 年，约克的圣威尔弗雷德（St Wilfred of York，634—710 年）通过在弗里斯兰的讲道开始了这项任务。圣威尔弗雷德的天主教诗篇曾被带到惠特比。但是，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无疑还是在美因茨建立了德国的第一个主教座的克雷迪顿的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 of Crediton，约 675—755 年）。他还创建了富尔达修道院（774 年），最后殉教于弗里斯兰的多克姆。卜尼法斯有许多亲密的助手，其中最著名的几位包括：曾在富尔达展开争论的圣斯达姆和拉尔；率先前往圣地朝圣的著名的英国人巴伐利亚的圣威利巴德（St Willibald of Bavaria，约 700—786 年），他的弟弟图林根的圣温巴德（St Winebald of Thuringia，卒于 761 年），他的妹妹海登海姆（Heidenheim）女修院院长圣沃尔博加（St Walburga，卒于 779 年）。

虽说是不光彩的，作为英国传教士和平传教努力的补充，772—785 年，法兰克人在萨克森进行了残忍的军事行动。屈服于基督教完

全是法兰克人征服的结果，对攻守双方来说，屠杀和背叛是典型的手段。神圣的厄明苏尔（Irminsul）森林开始被砍伐，而集体的洗礼仪式则在帕德博恩（Paderborn）附近举行。在奥克尔（Ocker）和易北河一带，此种情形又得以重演。在费尔登（Verden）的大屠杀（782年）中，有4500名萨克森反叛者被砍头，当其领袖威德金特（Widukind）面向洗礼圣水投降时，起义最终宣告失败。在不来梅、费尔登、明登（Minden）、芒斯特（Münster）、帕德博恩、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设立了主教区。

基督教扩展至德意志中部标志着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在此之前，基督教多限于罗马帝国境内，或者是前罗马帝国信奉基督教的公民残存的地区。在较大程度上说，基督教是一种"帝国的宗教"，即[282]使在那些与帝国保持长期重要联系的地方也是如此。现如今，基督教已推进到与罗马帝国没有任何联系的地域。莱茵兰曾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萨克森则不是。与此同时，前罗马帝国的几个行省也处于信仰回归的状态，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基督教正开始缓慢地进入从未触及的异教领土。基督教传播的人群，继德意志之后是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人之后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居民。

基督教化的第一阶段是罗马帝国的信仰转换，用了400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前罗马帝国的行省重新恢复原来的基督教信仰，这一阶段结束时又用了400年。第三阶段是从未涉及的异教地区改信基督教，用了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见原书第321—328页，430页）。[圣经]

初看起来，上述黑暗时代的主导进程之间似乎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来看，这些进程的每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都没有结束。蛮族入侵的漫长历程一直持续到1287年蒙古人的最后一次侵袭（见原书第364—366页）。东西方之间的分裂在皇帝与教会方面都有所反映，但直到1054年才正式决裂。（见原书第330页）。欧洲异教徒改信基督教直到1417年才告完成（见原书第430页）。1354年奥斯曼土[284]耳其人踏上欧洲领土时，伊斯兰战士仍在继续向前挺进（见原书第386页），之后罗马帝国才最终走向灭亡。

这些不同的进程仍然是相互影响的，影响的主要结果可以从穆罕默德的军队对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征服中得到见证。这些进程在君士坦丁之后的四个世纪里，促成了欧洲的诞生。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各个民族的大多数都找到了永久的居留地。在"基督教世界"这一共同体中，罗马帝国的残余变成了众多君主国的一部分，在伊斯兰教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督教世界"越来越巩固。虽然还无人使用"欧洲"这一名称来称呼这一共同体，但是，对它已经存在这一事实则极少有人怀疑。

[282]

《圣经》(BIBLIA)

产生于六世纪的阿金留斯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 Cod. DG 1 fol. 118v)保存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里,是经由布拉格带到瑞典的。用银字写在紫色羊皮纸上的《圣经》,或许是最好的哥特文抄本,是由伍尔菲拉斯(Ulfilas,即 Wulfilla,伍尔菲拉,约311—383年)完成的。伍尔菲拉,或称"小伍尔夫"是一个被俘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的子孙,在多瑙河边境逗留期间被任命为"哥特人的主教"。他将《圣经》翻译成哥特文,开启了圣经本土化和德国文学的漫长历史。

现存于佛罗伦萨的劳伦蒂安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的阿米达圣经抄本(Codex Amiatinus)并不古老,约在690—700年西奥弗里德任修道院长期内,写于诺森伯里亚的贾罗修道院。它是现存最古老的拉丁文圣经抄本,而拉丁文圣经是由圣哲罗姆翻译完成的。阿米达圣经抄本是在更古老的卡西奥多洛斯拉丁文抄本(Cassiodorus)的基础上完成的(见原书第266页),由修道院长西奥弗里德呈送给教皇,由此便留在了阿米达修道院。抄写圣经的精制犊皮纸是由1500头小牛或小羊的皮制成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伍尔菲拉的哥特文圣经译本早于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两者都是以更为古老的希腊文本为基础译成的。希腊文本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文本。现代人重新辑录的早期希腊文本圣经是在众多抄本基础上完成的,这些抄本有: [283] 公元四世纪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梵蒂冈抄本;来自西奈山的公元四世纪的西奈抄本,它由俄国沙皇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同样存于不列颠图书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公元五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抄本;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五世纪的伊弗雷姆抄本(Codex Ephraemi)。

确定一个准确而又可靠的圣经文本,使之适用于历朝历代的人们,这一任务始终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人们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和阿拉姆文写成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写成的。《旧约》之被翻译成希腊文,是为了供亚历山大里亚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使用。因而从理论上讲,完整的《旧约》和《新约》的希腊文本从公元一世纪以后就已经存在了。

由上述这些文本整理成当今的《圣经》,天主教文本和新教文

本在数量上几乎有百种之多。公元四世纪基本的教会法规确立之前，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不可能校订成统一的文本流传。其间，各种各样数目繁多的有关《圣经》的书，连同不合教会法规的匿名作者的书都在流传着。现代学者对它们的了解只能通过古代莎草纸上的一些片段、教父著述中的引文、各种前拉丁文本有关"古老信仰"的教科书、古代犹太人的著作和基督教批评者的著作。在后来的圣经文本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是奥利金的六种语言对照译本，用六个平行的栏目同时列出了旧约全书的六种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本。[**莎草纸**]

即使是系统的拉丁文本圣经也是不存在的。当圣哲罗姆完成其著作的相连各部分时，按不同目的将每一部分进行了分类。但圣经的各部分仍然需要从附以各种内容的圣经汇编中复原。更有甚者，中世纪的抄写员只不过类似于"中国的谣传"（Chinese Whispers）游戏，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错误是复杂的。这就使得为什么希腊语中的 biblia（圣经）一词，在最初的时候只有复数形式这一问题变得昭然若揭了。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统一的圣经文本是不可能产生的。[**印刷业**]

无论如何，临近宗教改革时，新教徒向此前所有的圣经学者发起了挑战。新教学者尤其致力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因而他们需要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权威文本。因此，全新的圣经学时代是以新教—天主教之间的敌对为特征的。

1907 年，罗马教廷的一个委员会授权本尼狄克修士编辑拉丁文圣经的定本。此项工作持续了整个二十世纪。有告成的那一天吗？正如一位不在意苦乐的本尼狄克僧侣所说，"只有上帝知道"。[1]

大约 753 年 11 月 25 日，阿尔卑斯山脉，彭尼内山的埃奥维斯隘口

正值冬季大雪来临前的最后时节，作为罗马主教和教皇的斯蒂芬二世，正忙于在道路被暴风雪封锁之前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从位于波河的伦巴德王国的首都帕维亚出发，正在进入法兰克王国境内。他首先要到达罗讷河上游的圣莫里斯修道院，从那里才能前往位于马恩河上的国王行宫蓬提翁，行程接近 500 英里。平均每天 10—12 英里，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22]

七世纪前修建的两条连接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的罗马大道中，其中一条必须经过乔维斯山脉（Mons Jovis）。该山以彭尼内山或“彭尼内关”而闻名，曾经是通往赫尔维西亚地区的门户，海拔2476米或8111英尺。石铺的路面有四米宽，是为车辆交通而设计的。在过去，从奥古斯塔·普里特里亚（奥斯塔）到奥克托多拉斯（马提基尼）的55英里路程一天就可以走完。但是到八世纪时，这一段路行走起来就困难多了。当地人对这座山的称呼介于其拉丁文的名称朱庇特山（Mons Jovis）和现代名称埃乌山（Monte Iove）或茹山（Montjoux）之间。*

20个月前，斯蒂芬二世出人意料地登上了教皇宝座。作为罗马贵族家庭的孤儿，他是在罗马教皇的圣约翰·拉特兰宫长大的，曾经担任教皇扎迦利（741—752年在位）的助祭。职业管理者的经历使他有充分的资格在743年罗马宗教会议的文件上签名。10年后，他可能步入中年。扎迦利去世后，当一名年龄比他稍长也叫斯蒂芬的教士被选为继任教皇时，他才崭露头角。仅仅四天之后，继任教皇斯蒂芬还没有就职就中风过世，他对此深感震惊；同一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被宣布为教皇。正因为教士斯蒂芬不确定的地位，助祭斯蒂芬的排序也常常变化，出现了称他为斯蒂芬二世、斯蒂芬三世或斯蒂[286]芬二（三）世的情况。[23]

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博学的希腊人扎迦利，一直追随其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确立的政治路线。在抵制东罗马帝国皇烂污货君士坦丁的破坏圣像要求的同时，仍小心翼翼地避免断绝与帝国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密切关注着北方的事务。他任命圣卜尼法斯为特使促成法兰克教会的罗马化，并与之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他应法兰克人的要求发布了一项正式裁决，宣布人们渴望握有实权的人拥有国王的称号，实际上认可了对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权力的剥夺。他代表罗马城与伦巴德人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协定，努力调解伦巴德人与拜占庭的拉文纳总督之间的争斗。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抑制好战的伦巴德新国王艾斯图尔夫的努力归于失败。在751年南下之前，艾斯图尔夫攻占了拉文纳。显然，当伦巴德人的代表向罗马要求岁贡时，罗马城长期以来建立起的自由、罗马教皇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扎迦利继任者的到访就是由这些事件引起的。

---

* 到十一世纪时才采用大伯纳德的名称，当时茹山的圣伯纳德（卒于1008年）在彭尼内山和格莱亚山的山顶建立了旅馆。从这一时期，开始训练圣伯纳德狗营救暴风雪中的游人，此时，距斯蒂芬二世的旅行已有三个世纪了。

[285]



地图 11 教皇斯蒂芬的旅行路线，公元753年

自克洛维一世的祖父墨洛温（卒于458年）以来，墨洛温家族已统治法兰克王国300年。统治范围从比利牛斯山一直延伸到威悉河流域，由三个主要地区组成：以巴黎为中心的纽斯特里亚；罗讷河流域以高卢—罗马人为主的勃艮第；地处东部的法兰克人的发源地，以日耳曼人为主、以兰斯为中心的奥斯特拉西亚。法兰克频繁的分割和重组历经数代。八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君主除了名义上的控制权之外，将其他的一切都给了世袭的奥斯特拉西亚“宫相”阿尔努夫家

族。阿尔努夫家族有效控制着整个法兰克王国。751年，查理·马特的孙子丕平三世派使节会见教皇扎迦利，询问“由现在的国王统治还是另外一个国王进行统治”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剥夺了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的权力，夺取了王位。（见原书附录Ⅲ，第1246页）

当旅行者跋涉到山口的顶端时，对极其严酷的山间路况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曾经平坦的石铺路面已经破裂、凹陷，显得奇形怪状，有些地方已被完全冲毁。铺路的石板弃置一边无人修理，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春秋。帝国时期的路标已失去了作用。在荒凉的、白雾点缀着的山顶下面的谷地，朱庇特神庙的废墟被默默地弃置在冰封的湖泊旁边。身处这衰败的聚会之所，斯蒂芬不由得想起罗马人业已逝去的荣耀。但是，山口的荒芜一定与他的心境是相配的。他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正在从事着一项他的前任从未尝试过的事情。尽管格列高利二世曾经准备进行类似的行程，但最终还是取消了。没有一个罗马主教曾经翻越阿尔卑斯山。当斯蒂芬开始走上通往圣莫里斯修道[287]院的下坡路时，他一定考虑过这一形势的复杂性。他并不是因一时冲动而采取这一行动的。他已经派人请求过君士坦丁堡的帮助，但终归徒劳。他曾访问过帕维亚，亲自向伦巴德人的国王艾斯图尔夫呼吁过，但也归于无效。最后，他只好转向法兰克，精心策划以避免灾难。如果不考虑语言的时代性的话，他正在“为恢复旧世界的平衡而访问新世界”。

罗马教皇试图在其中确立中心地位的基督教世界，比过去缩小了，或者说在将来注定要缩小。上一个世纪，在阿拉伯人的征服下，它已大大萎缩了。但在欧洲大陆，它还没有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718年，拜占庭帝国顶住了阿拉伯人的围攻，它本身却萎缩到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最近，阿拉伯人又赢得了整个西部地中海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尽管大约20年前，阿拉伯人被赶出了罗亚尔河流域，但他们仍拥有南部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在此，哥特人的城市尼姆和贝济耶仍处于反叛的境地。如果斯蒂芬再往西20英里，从邻近的格赖山的关口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话，他将身陷穆斯林的包围之中。

那时，拉丁基督教世界局限于不列颠群岛到意大利中部的一条狭窄的长条地带。介于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和凯尔斯书之间的克尔特手稿装饰艺术也达到了顶峰。在英格兰，尊敬的比德已于18年前去世，他在英格兰的学术衣钵传给了阿尔昆这位闻名法兰西的人物。德国中部此时刚刚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的庇护人圣卜尼法斯在两年前去世，留下了富尔达修道院及其开创不久的唱诗班学校。意大利的伦巴德人统治者在前一世纪改信了基督教，但是他们用怀疑的目光观看罗马的

自由。只要罗马教皇站在罗马市民一边反对帕维亚，伦巴德人便背叛基督教。他们通过托斯卡纳、斯波莱托和本尼凡托公爵领地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控制受到了拜占庭的挑战。拜占庭占领的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几个行省则毫无损伤。

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仍处在异教部落的掌控之中。野蛮的维京人侵略者涌向北部海域时，斯堪的纳维亚正在快速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异教徒控制的弗里斯兰和萨克森被法兰克人一次又一次地蹂躏，但是最终也没有屈服。此时，斯蒂芬正要会见的法兰克统治者矮子丕平（751—768年在位）正驻扎在波恩，刚刚完成对萨克森最近一次惩罚性战役。再往东，斯拉夫人控制着从易北河口到爱琴海全部土地。除易北河以外，他们还控制着几乎所有较大的河流：奥得河、维斯瓦河、多瑙河中游和第聂伯河。基辅作为从波罗的海到美索不达米亚水上运输线的中继站，在新近也出现于史籍的记载之中。

对基督教世界幸运的是，穆斯林世界陷入了骚乱。阿拔斯王朝的早期阶段，哈里发就把统治中心由阿拉伯半岛移到了波斯。哈里发曼苏尔统治时期，中心的转移还在继续。作为《一千零一夜》中的名垂[288]青史的英雄，他的儿子哈龙·拉齐德此时还只是一个孩子。战败的倭马亚王朝的残余踏上了去往西班牙的道路，在西班牙建立了科尔多瓦酋长国家。

教皇斯蒂芬的旅行事件必须依据两方面的主要史料加以重构：一是罗马方面的史料，二是法兰克方面的史料。《斯蒂芬本记》（*Vita Stephani*）包括在卷帙浩大的《教皇言论集》（*Liber Pontificalis*）中。《教皇言论集》由六至九世纪的一系列传记和教令构成。[24]这方面的史料主要从教皇的立场出发来展现事件。与此相应的是《伪弗里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Pseudo - Fredegar）的第三个续编，对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主要历史记载是一个补充。[25]它主要限于对丕平三世统治时期的历史记载，是根据丕平的亲属尼伯龙的指示而编写的。它极力展示的是加洛林王朝的观点。两方面史料的重点和省略各有不同，给了历史学家们以广阔的解释空间。

这些史料并没有直接谈及引起斯蒂芬旅行的政治交易，但是整个事件的轮廓是清楚的。尽管丕平在发动政变之前非常谨慎地征求过教皇的意见，还可能得到圣卜尼法斯的祝圣仪式，但是，其统治权明显地存在着疑问。同样，尽管斯蒂芬二世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伦巴德国王都进行了协商，他对法兰克的请求对东罗马帝国和伦巴德王国来说还是令人不安的。因此，酝酿中的这一行动的本质在于，如果法兰克提供罗马所缺乏的武力，罗马就提供丕平所缺乏的政权合法性。斯蒂

芬二世希望给丕平的统治带来宗教上的认可，以换取丕平对意大利秩序的恢复。

在后来的历史传统中，作为君主的罗马教皇，他的每一项权力的实施都无须征得拜占庭皇帝的同意。但是，我们现在是考察其前期的历史，此时罗马教皇仍在形式上对东罗马帝国保持着忠诚。他在罗马城实际享有的豁免权尚没有法律上的认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怀疑教皇处心积虑破坏罗马帝国的利益，毕竟他在出发时就有东罗马帝国的使节陪同。在他与艾斯图尔夫在帕维亚会见时，东罗马帝国的使节也陪伴在侧。在他向丕平推荐的计划中，他的惯用语是“以圣彼得和罗马共和国的名义”。在教皇国形成之前，“罗马共和国”只能是拜占庭帝国。号召一个蛮族首领攻打另一个蛮族首领，是罗马帝国最初的策略。所以，访问法兰克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算是对罗马帝国的不忠行为。在这段历史结束之前，斯蒂芬二世还没有与东罗马帝国决裂。

斯蒂芬的最初行程在《教皇言论集》中有所记载。他于 10 月 15 日离开罗马去往帕维亚。“邪恶的伦巴德国王”听完了斯蒂芬的叙述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11 月 15 日，斯蒂芬离开帕维亚：

> 从帕维亚出发，在上帝的保佑下神速抵达法兰克王国的边境。他[289]与随行人员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关口后，由衷地赞美万能的上帝。行程的开始阶段是极其困难的，但是神佑的教皇安然无恙地抵达了古老的圣莫里斯修道院，圣莫里斯是一个基督教殉难者。[26]

斯蒂芬在行程中有 12 名高级教士陪伴，有法兰克的外交使节埃夏公爵（Duke Aitchar）和法兰克的宫廷大臣、梅斯主教克洛德冈（Chrodegang）护送。

教皇进入法兰克王国境内，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受到丕平的私人代表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富尔拉德（Fulrad）的欢迎。圣莫里斯修道院建于阿戈恩（Agaunum）的遗址上。五个世纪前，在阿戈恩，罗马的百人队队长莫里斯因为力劝底比利斯军团的士兵违反军令不与基督徒朋友作战而被处死。教皇从莫里斯修道院给赶往蓬提翁会见的丕平送去信息。信使发现，丕平此时从波恩动身到了阿登。丕平给他的小儿子查理发出指令，要他骑马出迎，在路上会见来访者。离开圣莫里斯修道院后，教皇斯蒂芬绕过莱芒湖翻越了汝拉山。12 月下旬，教皇与国王的儿子在勃艮第某地相遇。当时，查理只有 12 岁，从南面的蓬提翁赶来走了有 100 英里的路程。

754 年 1 月 6 日，斯蒂芬抵达蓬提翁。根据罗马方面的记述，国

王出城向教皇致意，下马拜倒在教皇面前，并亲自给教皇执马缰。在这种情形下，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教皇向国王请求帮助：

受神祝福的教皇激动地请求至上的大多数基督徒的国王，以和平的、圣彼得和罗马共和国的名义，他应该同意。[27]

根据法兰克方面的记载，“罗马教皇来到国王面前，……向国王和法兰克人呈送了丰富的礼品，请求国王在双倍交易的基础上，提供帮助对付伦巴德人及其国王。”[28]然后，丕平责成修道院长富尔拉德接待斯蒂芬，在圣丹尼斯修道院度过冬天。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丕平与艾斯图尔夫交换了使节。法兰克使节被派往帕维亚，责成伦巴德人终止对领土的占领及其“异教的要求”。艾斯图尔夫则派出丕平的弟弟加尔洛曼（Carloman）为使节去往法兰克。（加尔洛曼早就退隐于罗马的一座修道院，所以成为伦巴德王国的居民。）3 月 1 日，法兰克人在伯纳球斯（伯尼河，艾纳河）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场阅兵。4 月 14 日复活节时，法兰克人在卡里阿斯库姆（即凯尔西）集会讨论季节性战役打击的目标。在并非毫无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向伦巴德进军。

这里存在着史料上的分歧。弗里德加德编年史的续写者记载了法兰克军队如何在塞尼峰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瓦勒德苏萨给了伦巴德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教皇言行录》谈到，在仲夏时节，斯蒂芬在圣丹尼斯修道院为丕平和王后伯特拉达（Bertrada）[290]重新举行涂油礼，并授予他们“罗马贵族”的称号。丕平的独生子及其继承人也由教皇授予永久的统治权。这些历史过程，在另一份当时的文献中也得到了确认。*Clausula de Unctione Peppini* 这份文献显然是一位目击者叙述的。人们可能会猜测，法兰克人会因为丕平渴望重新施行涂油礼，从而强调先前的加冕礼不当而感到困窘。

这一事件的结果几年后才可能看清楚。法兰克人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艾斯图尔夫向丕平表示顺服，罗马主教得以返回罗马。但是几个月之后，伦巴德人食言，重新发起对罗马的进攻。丕平因此而在 756 年发起第二次对伦巴德人的战役，夺取了帕维亚，粉碎了一切反抗活动。正是在此时，法兰克人将拉文纳总督区从伦巴德人手中夺了回来，并且将它献给了罗马教皇（Patriarch），由此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将拉文纳总督区作为圣彼得遗产的一部分而接受下来，是对拜占庭的权力的挑战，罗马教皇也因此而表明他对拜占庭的效忠关系不复存在了。

但是，留存下来的几宗档案较混乱，似乎许多重要的细节被记载

于事件之后的资料中。在这项事务中，教皇的大法官法庭特别内行。例如 Liber Pontificalis 中说，“丕平献土”并不是发生在756年，而是发生在753年的凯尔西，丕平仅仅是归还了罗马教皇拥有的古已有之的权力。我们现在知道，教皇的大法官法庭正是在这时编造了《君士坦丁的赠礼》。在十五世纪之前，所有忠实的天主教徒都受到了错误的引导，相信罗马教会在丕平之前400年就从第一位基督徒皇帝手中接受了拉文纳总督区。所以，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的出现显然是为了加强“丕平献土”的真实性。在对伦巴德人的惩罚中，也体现出丕平与拜占庭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说，他并不知道在这种友好关系之上发生了什么，只可惜它没有得到发展。[29] 当然，所发生的一切是，拜占庭要求归还拉文纳总督区，却被告知它最近已被送给了教皇。罗马的背叛和对法兰克人的无力反抗，使拜占庭只好寻求与伦巴德人的联合。

历史的远期结果常常是难以预料的。法兰克人不可能将他们自己从意大利解脱出来。罗马主教将自身的地位提高到至上的地步，称为“教皇”，并且获得了建立君主国的领土基础。法兰克与教皇之间的联盟成为国际舞台上长久不衰的特征。通过大胆翻越阿尔卑斯山，斯蒂芬二世亲自建立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带来了北方对南方事务的持久影响。拜占庭帝国在西方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丕平的后代子孙骑马迎接抵达勃艮第的斯蒂芬主教由此而产生了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的观念。

第5章

中世纪

中世纪，约750—1270年

[291] 学术界有一种把中世纪世界描述为静止状态的风气，这是由于强调中世纪技术进步缓慢、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特征、人类生活的固定、神权意识而造成的印象。中世纪的首要象征物是全副武装骑在马上的笨拙的骑士、固定在领主自营地上的农奴、修道院中进行祈祷的修士和修女。这些象征物代表了中世纪的物质、社会和知识的静止状态。

“中世纪”（Medium Aevum）这个词首先由虔诚的基督徒所使用，他们认为自己生活于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时代，此后很长时期，“中世纪”被用于各种目的。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开始把“中世纪”当做古典文化衰落与他们所生活的古典文化复兴之间的中间期。对他们来说，古典世界代表高度的文明，中世纪则代表野蛮、地方观念和宗教偏执。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理性被公开地赞扬为超过宗教信仰的美德，“中世纪精神”变成蒙昧和落后的同义词。当然，从此以后，当中世纪之后的“现代”本身也成为过去时，人们不得不发明新的术语来表示过去的时代。中世纪变成了把欧洲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为了方便起见，中世纪常常又被划分为早期、盛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而把中世纪划分为几个连续的阶段。当然，被后来史学家称为“中世纪”时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划分。

遗憾的是，古代世界的终结与现代世界的开端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当做中世纪的开端，对于那些以自己的封建主义定义作为中世纪标准的人来

说，中世纪可能结束于1453年、1493年、1517年、甚至1917年。因此，几乎所有中世纪史学者都对他们研究对象的定义不满意。许多仅[292]仅以西欧历史为基础得出观点的人将强调中世纪早期的破坏趋势与晚期的建设趋势之间的对比。在这种划分方法中，五至十世纪的“黑暗时代”以罗马世界的不断瓦解为特征，随着所谓“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到来而发生转折，十三、十四世纪时中世纪文明达到了顶峰。这些特点与东方的关系不大，东罗马帝国延续到1453年，而且那里没有经历西欧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中世纪世界的统一性体现在组织严密的基督教会之中。在基督教会中，他们与中世纪欧洲民族合二为一，如果有人问起，那么这些欧洲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基督教徒，生活在基督教时代和地球上的基督教地区。但是基督教世界本身是一个弹性概念，它随着欧洲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战争和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而伸缩，它从来没有精确等同于“欧洲”半岛。753年斯蒂芬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与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城墙时的基督教世界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衰亡而产生的真空被不断增长的基督教世界意识所填补，基督教世界不仅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且是一个紧密的政治实体。虽然罗马帝国衰亡了，但是它的宗教却获得了胜利。基督教的宗教和世俗首脑逐渐地披上了罗马皇帝的斗篷。罗马帝国的西部首先崩溃，正是罗马主教设想了建立以拉丁教会和天主教皇帝的联合权威为基础的新秩序的观念。托马斯·霍布斯写道，“教皇制度只是死去的罗马皇帝的幽灵在坟墓中被戴上了王冠”。[1]被选择的教皇制工具在日耳曼人的新“恺撒”发现了。在东部，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更长，以希腊教会和新的东正教皇帝的政权为基础的替代秩序的观念还得等到莫斯科公国“沙皇”的出现。

因此，如果中世纪的中心主题是把基督教重新组织成为一种新的帝国制度的话，那么一种清晰的时间结构就出现了。第一步是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最后一步则是1493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自称沙皇。

然而，不断扩大的督教共同体内部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分裂。虽然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的基本教义相同，但是它们常常互相把对方看成异己。虽然不带偏见的观察家把它们看成信仰相同的两个派系，就像穆斯林世界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但是它们自己更多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共性。在基督教诞生后的一千年里，它们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但是在第二个千年里，它们抛弃了表面[293]的统一，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它们之间的旧裂痕明显扩大了。

这表明基督教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不断变化的。

750—105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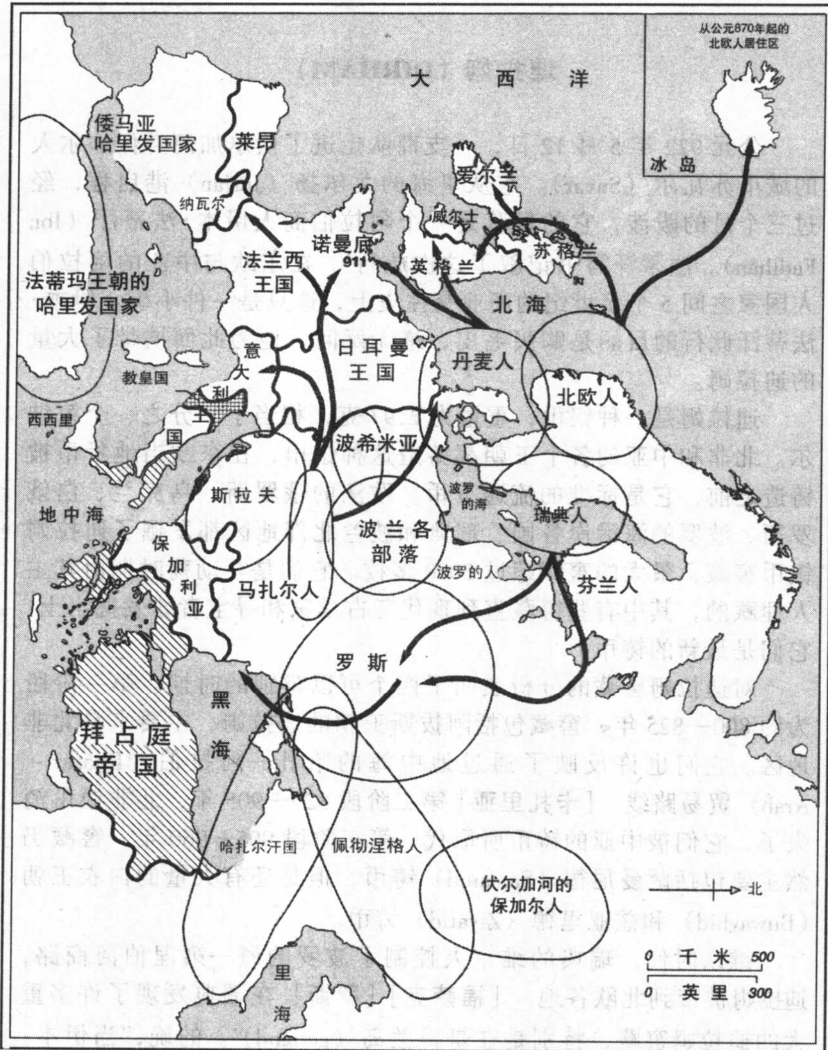
从八世纪起，关于新的政治秩序的思想就受到来自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持续侵袭的刺激。只有与维京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理解800年查理曼帝国、962年后的神圣罗马帝国、沙皇的莫斯科国家的基础。

维京人或“诺曼人”对西欧北部沿海的侵袭持续了200多年。他们是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海湾地区人口过剩的产物，他们的“桨手”乘着长条形船只进行抢掠、贸易、商业和冒险活动。从700年起，一些维京人返航时顺便抢劫不列颠群岛或弗里西亚地区的孤立的居民点。793年，维京人洗劫了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795年，他们又洗劫了爱奥纳（Iona）。但是从九世纪中叶起，为了更长期抢掠活动，维京人建立了大型的营地。这些营地有时变成了维京人的定居点。例如，维京人中的丹麦人就在塞纳河口建立了一个“大营”，他们由此出发抢劫法国北部不设防的城市，还占领了鲁恩和南特等港口城市，航行到葡萄牙（844年）、巴利阿里岛（Balearic Island）、甚至到达普罗旺斯和托斯卡纳地区（859—862年）。851年，丹麦人入侵英国，向英国东部地区不断扩张。从866年起，丹麦人建立了从诺森布里亚到东盎格里亚的“丹麦区”，此后150年英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之间的斗争。911年，在罗洛（Rollo）的领导下，诺曼人永久性地定居于塞纳河口，因而建立了“诺曼底”。

挪威的维京人的扩张集中于更遥远的岛屿，八世纪他们占领了奥克尼（Orkneys）和设得兰群岛，九世纪占领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爱尔兰东部地区。他们的主要定居地冰岛建立于874年，988年建立了都柏林。他们还发现了格陵兰岛，在“红色埃里克”（Eric the Red）的领导下他们完全可能航行到北美洲，他们称之为“温兰”（Vinland）。[埃里克] 瑞典的维京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殖民活动。他们在奥得河畔的沃林（Wolin）、维斯瓦河畔的特鲁索（Truso）和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设防据点，与此同时他们越过里加湾和芬兰湾。九世纪，他们占据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陆上通道。而被称为“瓦兰基亚人”的维京人则控制了第涅伯河，到达君士坦丁堡。[迪拉姆] [福萨克]

在最后阶段，维京人血统的冒险者在采用了当地的大量文化后，[294]建立了许多新的国家。约860—880年，瓦兰基亚的留里克（Rurik the Varangian）和他的儿子们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建立了东斯拉夫人的永

[294]



地图 12 欧洲，约公元 900 年

久性都城。丹麦的“卡努特大帝”（1016—1035 年在位）则成为囊括了英国和丹麦的广大的北海帝国的统治者。1059 年，诺曼人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航行到意大利南部。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在 1066 年征服了英国。诺曼人在西西里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注定要比在诺曼底本身的统治更加长久。**[民众大会]**

[295]

迪拉姆（DIRHAM）

公元922年5月12日，一支商队走进了伏尔加河畔保加尔人的城市苏瓦尔（Suvar）。它从里海的尤尔扬（Jurjan）港启程，经过三个月的跋涉，它的领队是一个阿拉伯商人伊本·法蒂汗（Ibn Fadlhān）。法蒂汗写书记叙了这次旅行[1]。在东欧与中亚的阿拉伯人国家之间5个多世纪的商业交往史上，这只是一件小事。伊本·法蒂汗此行的目的是购买毛皮，毫无疑问，他为此而携带了大量的迪拉姆。

迪拉姆是一种银币，重量为2.97克，相当于十分之一个第纳尔。北非和中亚的各个王朝都铸造这种银币，在东欧当地货币被铸造之前，它是标准的流通货币。欧洲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瑞典和波兰北部地区都发掘了迪拉姆银币窖藏，最大的窖藏超过5000多枚。它们是在动荡时期由其主人埋藏的，其中有些窖藏直到现代考古学家和寻宝者才发掘出土。它们是最新的铸币。

对迪拉姆窖藏的分析表明了四个可以辨别的时期。第一阶段为约800—825年，窖藏包括阿拔斯王朝的迪拉姆，主要来自北非地区。它们也许反映了通过地中海的哈扎—阿拉伯（Khazar－Arab）贸易路线。[**卡扎里亚**]第二阶段825—905年，北非银币消失了，它们被中亚的铸币所取代。第三阶段905—960年，窖藏仍然主要包括萨曼尼德（Samanid）铸币，但是还有大量的白衣王朝（Buwayhid）和兹亚里德（Ziyarid）铸币。[2]

维京时代，瑞典的维京人控制了波罗的海—第涅伯河商路，迪拉姆被带到北欧各地。[**福萨克**][**罗斯**]在瑞典发现了许多重大的迪拉姆窖藏，特别是在哥得兰岛（gotland）[3]。的确，当伊本·法蒂汗遇到一群瑞典人时，占有迪拉姆已经变成瑞典人在公共场所炫耀财富和身份的东西：

"当瑞典人登上伏尔加河岸并安营扎寨时，我看见了他们。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加高大的人。他们像棕榈树那么高，面颊红润，长着红色的头发。他们既不穿短外衣，也不穿长衫，但是男人披着粗糙的斗篷，斗篷被甩在一边，以便双手能够自由地活动……

根据丈夫拥有的财富多寡，妇女的乳房紧紧地贴着两个用铁、铜、白银或黄金制作的帽子。每个帽子里都镶嵌着一个戒指，一把小刀……围绕在她们的脖子上，她们带着黄金或白银的手链。因为

当一个男人拥有 1 万迪拉姆，他就为妻子带上一只手链，如果拥有 2 万，则带上两只，依此类推。"[4]

东欧进口阿拉伯白银在十世纪后期开始下降，十一世纪早期则停止了。在瑞典发现的最晚的萨曼尼德迪拉姆铸造于 969 年，在俄罗斯则是 1015 年。通常认为这是由于中亚的"白银危机"。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阿拉伯从罗斯进口的白银的再出口的结束正好对应于从西欧进口白银的出现。到十一世纪末，阿拉伯银币完全被取代了。这个过程的细节是模糊的，但是钱币学的证据显然支持来自其他源泉的发展，即波罗的海贸易的转移和诺夫哥罗德的兴起。 [296]

马扎尔人是最后对中欧进行殖民的游牧民族。作为芬兰—乌克兰语系（Finno—Ugrian）的乌戈尔语支，他们的发源地位于乌拉尔山东部的额尔齐斯河（Irtysh）和鄂毕河（Ob）流域，公元前 3000 年代，他们与芬兰血统的其他部落分离开来。从此他们占据了乌拉尔山南部的草原，逐渐地适应了游牧生活，首先在卡马河（Kama）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大匈牙利"，后来在亚速海的列别迪亚（Lebedia）北部，最后定居在第涅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在草原的第一个千年里，马扎尔人与斯若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埃兰人、保加尔人、卡扎尔人（Khazars）、乌兹人（Uzi）和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相邻，而且分裂成七个部落：尼克（Nyek）、库雅马特（Kurtgyarmat）、塔扬（Tarjan）、杰诺（Jeno）、克尔（Ker），凯斯兹（Keszi）和马扎尔人——后来以"马扎尔人"来指称这七个部落。拜占庭的史书上记载，他们通过黑海的各个港口与斯拉夫人进行贸易。

九世纪末马扎尔人进行了重大迁徙。草原上的各个民族已经骚乱了几十年。阿拉伯人分散到乌兹地区，盗窃他们的牲口，乌兹人则向佩切涅格人地区迁徙，盗窃他们的牲口。894 年，佩切涅格人与保加尔沙皇共同进攻马扎尔人，马扎尔人所谓"祖国被占领"的危急时刻来到了，由于被邻居打败，马扎尔人不得不向西迁徙。曾经为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充当过雇佣兵的马扎尔骑兵第一次不能返回到埃特科兹（Etelkoz），在阿帕德（Arpad）的带领下，漫长的部落民众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的韦列奇耶（Verecke）山口，直到 895 年春天，大约两万名骑兵和四万名部落民众终于在"匈牙利"平原上找到立足之地。

[乔包] [萨满]

蒙古人或"鞑靼人"控制了一个最强大的游牧帝国，他们以中亚干旱草原为中心，势力时涨时消，但是他们利用两次机会直接干预西方的事务。成吉思汗（1206—1227 年在位）从喀喇昆仑山（Karako-

rum）出发，征服了从太平洋沿岸到黑海沿岸、从高丽到克里米亚的[298]广大地区。（见原书第364页）蒙古帝国的复兴者帖木儿（1336—1405年）从撒马尔罕（Smarkand）出发，控制了比蒙古帝国更广大的领土，从德里到爱琴海地区。正是蒙古人间接地促使了另一个中亚民族开始迁徙。突厥人起源于突厥斯坦，八世纪他们离开故乡，但是其他相关民族仍然居住在那里。他们于十一世纪首次与塞尔柱突厥人出现于西方，十三世纪又与奥斯曼突厥人出现于西方。他们史诗般的迁徙故事发生于从查理曼到十字军这个历史时期。

[297]

民众大会（DING）

日耳曼人部落中召集民众大会的习惯被塔西陀描绘过：这种民众大会无疑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九世纪的《安斯加传奇》(Legend of Ansgar）最早记载了这种民众大会，它在瑞典比约克岛(Bjorko）上的比尔凯（Birka）举行。同一时期，丹麦也举行了同样的民众大会。

冰岛的全国集会于930年根据“岩石法”在廷维里尔(Thingvellir）举行，此后，这种集会每年都在夏天后的第10周举行一次，由36个氏族头领和被选举的代表参加，他们选举“说法者”。集会任命法官，通过法律，作出行政决定，采用1130名成员多数投票的原则。每年5月，冰岛4个区的地区性民众大会先行召开，然后召开“莱德”（Leid），向全体民众通报所作出的决定。正是冰岛的最大岛屿的“自由国家”持续存在到1264年的“旧条约”和被挪威接管。[1]

曼岛的民众大会像法罗群岛上的情况一样，起源比较早。**[法罗]**

北欧人的民主特别强调地方民众大会的作用。与冰岛的地方民众大会一样，瑞典每个省的12个辖区都有自己的民众大会。丹麦有三个兰丁斯（Landings），挪威也有自己的洛廷（Lothings）。冰岛最低级的民众大会是“农民集会”，从十一到十九世纪一直发挥着作用。这些传统是北欧王权野心的极大障碍，也是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统一的障碍。当北欧各国最终进入“卡尔马同盟”时，正是王朝的原因使它不能持久。1282年丹麦国王埃里克·格列平(Eric Glipping）签署的“权利宪章”和1319年瑞典类似的文件，比英国的“大宪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的政治文化渊源比英国更加

悠久。[2]

北欧人的民主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凡是维京人所到之处都受到它的影响——英国、苏格兰、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很可能还包括波兰，那里的民众拥有同样的合法反叛的权利。(见原书第555页) 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经历过绝对君主制时代，但是地方民主的传统有助于解释其现代宪政主义和代议制政府的强大力量。

查理曼帝国圆满完成了罗马教皇与新兴的法兰克王国之间的联盟。它是一个短暂的事件，随着查理曼的去世而结束，在一个世纪里就销声匿迹了。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查理·马特的重孙查理曼或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把祖先王国的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里亚两部分统一起来了，其版图从大西洋到多瑙河，从尼德兰到普罗旺斯。经过53次大小战役和一生的鞍马劳顿，查理曼成功地使帝国向四周扩张：南边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伦巴第王国（773—774年），到萨克森（755—804年）和巴伐利亚（788年），到卡林西亚（Carinthia）（799年），到布列塔尼边区（786年），还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边区（795—797年）。在取得"伦巴第和法兰克之王"的称号和授予罗马教皇拉文纳总督区之后，查理曼显然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部落首领，并且正在寻求对他的事业的适当认可。在这方面，罗马教皇为他提供了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联系的中介，当时教皇正在寻求永久的保护伞。当病态的皇后伊林娜（Irene）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独裁权力后，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倾向于认为帝国的称号是空缺的。此外，由于受到前任教皇亲属的围攻，利奥三世被迫向法兰克的查理寻求避难，为此，他早已把圣彼得的钥匙和罗马城的旗帜送给了查理。[**布里奶酪**]

经过查理曼的早期征服后，法兰克王国的西部边界没有受到严重的骚扰。比利牛斯山成为阻挡穆斯林进攻的重要屏障（见原书第255页），哈里发国家虽然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但是哈里发的主要精力被用于平息内部分裂。法兰克王国由于与伊比里亚半岛北部沿海的一些基督教王国结盟而加强了地位，首先是在奥地利王国，后来又在里昂、卡斯蒂尔和那瓦尔王国。在南部边界，法兰克王国受到扎根于阿拉贡和巴塞罗那边区的基督教王国的保护。西部边界的相对稳定使查理曼及其后继人有机会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特别是东部和意大利。[**圣母像**]

法兰克—教皇联盟在800年查理曼第五次在意大利停留期间圆满

[299]

布里奶酪（BRIE）

774年从对伦巴第人的战场上归来，查理曼在莫（Meaux）修道院附近的布里高原暂时休整。修士用斋盘给查理曼端上了奶酪，他们请求查理曼连面包皮一起吃掉。美餐之余，查理曼立即命令修士每年进贡两炉布里奶酪到亚琛。查理曼的秘书艾因哈德记录了四年后发生在撒拉森战争期间的同样事情。在米迪的洛日（Rouergue）地区停留时，国王（查理曼）很快便喜欢上了当地用羊乳烤制的绿色的奶酪，这种奶酪制作方法自从罗马时代在罗克福尔（Roquefort）的石灰岩山洞里就已为人所知并且成熟了。[1]

查理曼的美味奶酪与他的美味葡萄酒窖是相匹配的。他在勃艮第的阿罗克斯—科顿（Aloxe - Corton）占有许多葡萄园，他最喜欢的"白色大葡萄酒"，"散发出洋葱的气味和打火石的口味"，至今仍然以"科顿—查理曼"的牌子销售。[2]

布里奶酪是法国500种著名奶酪之一，起源于早期修道院农场。反复洗净和晾干后，把凝乳铲到一只平底的稻草模子里，然后放到一个倾斜的石头架子沥水。24小时后轻轻地倒出来，加入食盐，烘干，并且一边烘一边不停地翻身，然后放到地窖里储藏4—7周。最后成型的奶酪的尺寸是37×3.5厘米，重量是3000克，需要耗费来自诺曼底奶牛的全脂牛奶23升。这种奶酪具有玫瑰色的外表，结实而稻草色的主体，中心——被文绉绉地称为"灵魂"——多汁而且呈象牙色。这种奶酪必须夹在切成薄片的硬皮面包中间吃。

长期以来，布里奶酪被装上船从马恩河上运到巴黎，巴黎街头的销售者吆喝"布里来的奶酪！"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亨利四世都很喜欢这种奶酪，但是路易十六为之丧命，他是在瓦伦（Varennes）客栈吃奶酪时被捕的。"维也纳会议"期间，布里奶酪赢得了国际声誉，梅特涅说它是惟一不会被塔列朗（Talleyrand）背叛的主子。

"欧洲共同体"的"公共农业政策"只是扼杀传统的农家奶酪。1985年法国大约只生产了6000吨"国家原产地控制"的布里，而"可怕的"流水线制造的工业的布里却生产了18000多吨。

1792年8月，莫修道院的许多修士在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的恐怖"中被杀，但是戈伯特（Gobert）修士经过诺曼底而逃亡到英国，他在奥恩河（Orne）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停留了很久，向一个农妇传授了奶酪制作方法，这个村庄被称为"卡芒贝尔"（Camembert）。[3]

[300]

圣母像（MADONNA）

我们的蒙塞拉圣母是一个不能确定时间的雕像，虽然供奉她的神殿的加泰罗尼亚的见牙山（Saw - Tooth - Mountain）修道院创建于975年。这个用坐姿的木头雕像的风格可能是拜占庭式的，她头戴王冠，一只手举着一颗宝珠，另一只手抱着幼童耶稣基督。耶稣也头戴王冠，举起右手在祝福，左手拿着一个松树锥。圣母的脸是黑色的，形状是长条形的，显示出娴静的气度。[1]

1384年，圣母子的肖像图被带到波兰西部琴斯托霍瓦附近的“光明山”上亚斯纳戈拉（Jasna Gora）的保罗修道院。根据传说，它是由圣路加描绘的拿撒勒的神圣家族的画像。更加可能的是，它是一幅拜占庭肖像画的复制品。头部被一顶帽边镶金的帽子所覆盖，帽子上绣着一只亮晶晶的金属片的鸢尾，王冠位于一个光晕之下。眼睛似乎由于充满泪水而半开半闭着，划过右脸颊上的两条长长的刀痕显示出一幅悲天悯人的表情。脸部像“黑圣母”（la Moreneta）的脸部一样，也是黑色的。[2]（见图20）

若卡马多（Rocamadour）圣母院有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它是十二世纪建于法国中部乔治·达尔祖（Gorge d'Alzou）悬崖上的一组神殿中的杰作。据说圣母像是由圣阿马多（Amadour或Amateur）所雕刻，根据传说，圣阿马多与基督的一名信徒征税员扎克尤斯（Zacchaeus the Publican）有关。另一尊拜占庭风格的黑色圣母小雕像是用来装饰克里门特港（Du Port in Clermont）圣母院的地下室的祭坛。

在俄罗斯，喀山的黑色圣母像长期被描绘为具有创造奇迹的力量。它于1597年被首次发现，当时它被埋葬在田野里。伊凡雷帝征服喀山后不久，它就被安放在喀山的波哥罗迪茨基（Bogoroditsky）女修道院中。1612年，为了庆祝把波兰人驱逐出克里姆林宫，圣母像的复制品被带到莫斯科，1710年，另一幅圣母像复制品被带到圣彼得堡，以庆祝俄罗斯新都城的落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成一座雄伟的新古典风格的大教堂以安放圣母像，很少有人知道这尊圣母像是复制品。1904年，喀山的圣母像原作被盗，然后神秘地出现于西欧，被美国的东正教会所收藏——因此而避免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圣母像在十月革命中被毁灭或堆积在国家画廊中的厄运。[5]

蒙塞拉圣母、琴斯托霍瓦圣母、若卡马多圣母和喀山圣母只是欧洲无数圣母神殿中的四座。在一个白色面孔的大

陆，黑色圣母像增添了神秘的气息。加泰罗尼亚的保护女神拉蒙伦塔（La Monreneta）见证了伊格纳修·罗耀拉的皈依。拿破仑战[301]争期间，当修道院被破坏时，她变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她在西西里、墨西哥和波希米亚等地都很知名的。帝国的将领沃勒斯坦被暗杀时，正在以她的名义修建一座小教堂。“波兰的王后”或琴斯托霍瓦的“圣母”在胡斯战争期间首次吸引了朝圣的香客，十七世纪，她变成了民族的角色，与她的立陶宛同伴威尔诺（Wilno）的奥茨洛兰斯卡（Ostrobramska）圣母一起，受到了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到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多伊尔斯顿（Doylestown）的波兰人的崇拜。若卡马多圣母像在1245年受到圣路易的崇敬，1324年受到查理·勒贝尔（Charles le Bel）的崇敬，1463年受到路易十一的崇敬。它使弗兰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产生灵感，创作了管风琴协奏曲《黑圣母颂》。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Blachernae）圣母像的俄罗斯同伴、喀山的圣母被罗曼诺夫王朝当做最高的保护女神。与天主教的圣母不同，天主教的圣母在圣母升天节宴会（8月15日）中得到特别的装饰，东正教的圣母升天节宴会在7月8日举行。

圣母玛利亚崇拜在《圣经》中找不到依据。它随着埃菲修斯（Ephesus）宗教会议的“上帝的怀孕者”教义而首次出现。它刺激了罗马对圣玛利亚·玛基奥勒（St Maria Maggiore）的崇拜（432年）、兰斯（Reims）大教堂的建造和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重新献祭。六世纪，拜占庭开始庆祝“圣母领报”节（3月25日）、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和圣母永眠节。圣母玛利亚被描绘成一位圣洁的妇女形象，……新教徒像现代女权主义者一样，激烈地反对这些节日。但是直到1854年“圣灵怀胎说”教义才找到了正式的承认。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承认“共同救赎的圣母”的要求遭到拒绝。

但是死后升天的圣母仍然具有鼓舞力量。她是基督教艺术的永恒题材，神秘的幻想的经常源泉，永不停息的祈祷者的倾诉对象。以她的名义朗诵“150朵玫瑰”。1568年后，“玛利亚万岁”在罗马天主教的祈祷书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玛利亚万岁，充满了优雅，主就与您在一起。

在所有的妇女中，您最应该得到祝福，被祝福的是您的子宫里的胎儿。

神圣的玛利亚，上帝的母亲！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

从现在开始，直到我们死亡。

地完成了。一个贵族委员会宣布免除利奥三世的所有罪行，在圣诞节的弥撒大会上，当查理在圣彼得墓前祈祷起身时，教皇把一顶王冠戴到查理的头上。参加弥撒的人群顿时高呼查理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教皇也跪倒在地，向他行臣服礼。查理曼传记的作者艾因哈德说，加冕行动过于迅捷，因此很可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它完全不符合传统：教皇利奥没有授予帝国称号的权力，查理曼也没有接受它的权力。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因此西方出现了一位独立于拜占庭皇帝的天主教皇帝。蛮族人的法兰克王国被升级了，它的新地位依赖于教皇。（见原书附录Ⅲ，第1239页）[鹰][女教皇] [302]

查理曼的王国和帝国由宫廷管理，宫廷从一个领地巡游到另一个领地，此外还有分别设立在纽斯特里亚、阿基坦和伦巴第的附属宫廷，以及大约300名“宫相”，每个宫相都是帝国“伯爵领”的首领。皇帝宫廷的工作由一群教士监督，起初是大主教福拉德（Fulrad），后来是皇帝宠信的顾问、诺森伯里亚的阿尔琴。各地的主教也经常被用于监督作为“皇帝代表”的伯爵，组成固定的巡回法庭巡视全国。国王掌握着法律、秩序和所有官吏的任命。查理曼帝国还实行了统一的货币，即由中央政府铸造的银币，240第纳里为1镑。通过赏赐和联姻，查理曼帝国出现了一批国际行政人员。查理曼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力图促进教会与国家的统一。什一税成为臣民的强迫义务，谋杀教士将被处以死刑。教士只能由伯爵和主教联合组成的法庭审判。异教的火刑被禁止了。新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秩序似乎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实际上地方首领掌握了许多权力。

查理曼的宫廷自然是欧洲大陆的权力和影响力的中心。798年的皇室年鉴中的一条内容揭示了它的广泛联系：

“来自加里西亚和奥地利的国王阿方索的使节福洛亚（Froia）进贡了一个极其优美的帐篷。但是在复活节时，易北河以东的诺德留迪（Nordliudi）发动了叛乱，逮捕了负责调节纠纷的国王的代表……国王调集军队，一举平息了叛乱，俘获了人质。在亚琛宫殿里，查理曼接见了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一个希腊使团。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火星从天空中消失了。巴利阿里群岛遭到摩尔人和撒拉森人的抢掠。国王阿方索已经攻占了里斯本，冬天派遣使节福洛亚和巴斯里库斯（Basiliscus）向大王进贡了盔甲、骡子和摩尔人俘虏，以证明他取得了胜利。查理曼在亚琛庆祝了圣诞节和复活节。”[2]

正是在查理曼的宫廷里，“欧洲”的古代名称被复兴了。加洛林王朝需要一个名称去称呼所统治的地区，以便与异教地区、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共同体区分开来。因此，“第一个欧洲”是一个短暂的西方概念，还没有查理曼的寿命长。

[303]

女教皇（PAPESSA）

根据中世纪稳固的传统，圣彼得的王位曾经被妇女占据过。按照最通常的说法，教皇利奥四世（卒于855年）的继位人是朱安娜·安格里库斯（Johannes Anglicus）。利奥的继位人以学识渊博的演讲给教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曾经在雅典学习过，但是由于两年后在罗马街头死于生孩子而引起巨大的丑闻。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特罗波普的马丁努斯·波洛努斯（Martinus Polonus of Troppau OP，约1200—1278年），他把这个事件当做铁证如山的事实。他的《教皇大事编年记》（Chronicon summorum pontificum imperatorumque）是一部被人广泛参考的著作。另一种说法是，"朱安娜教皇"是死于1087年的维克多三世的继位人。在这个故事中，她是由于骑在马上生孩子时被发现性别的。结果她立即被吊在马尾被乱石砸死。这个说法出现在美因茨（Mainz）的《大编年史》（Universal Chronicle）中，也出现于十三世纪中期另一个有创造性的多米尼克修士让·德·梅里（Jean de Mailly）的记载之中。

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说出这种奇怪的故事并非不寻常的，但是不寻常的是他们的虚构能够经历许多世纪而不被人怀疑。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相信这些故事。教皇朱安娜的雕像就位于锡耶纳大教堂的历代教皇雕像旁边。当约翰·胡斯在康斯坦茨公会议引用她作为教会腐败的例证时，他是不正确的。罗马圣克雷芒教堂附近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纪念碑被认为是教皇生孩子的现场，据说这个纪念碑直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还矗立在那里。直到1554年巴伐利亚的"年鉴"发表，没有学者怀疑过这些故事。1647年和1657年，法国新教徒大卫·波隆德（David Blondel）写作的论文中明确否定了这些故事的历史真实性。

中世纪史的教材如果涉及的话，也只把教皇朱安娜当做一件小小的奇谈怪论。事实上，她表明了一种性别图像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后来的模式。这个故事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可能它的确有某些一直使人相信的东西。朱安娜本人可能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但这个故事肯定是历史事实。[1]

但是查理曼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建设者。他在奈梅亨（Nijmegen）、恩格海姆（Engelheim）和亚琛都修建了宫殿。他在美因茨修建了跨越莱茵河的桥梁，他修建凯瑟格拉堡（Kaisergrab）运河，把莱茵河支流

与多瑙河连接起来。他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地区修建罗马式建筑的先驱。从名义上说，查理曼也是伟大的学术赞助人，虽然他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但是他不识字。他延聘了一批著名学者——约克的阿尔琴、比萨的彼得、里昂的阿戈巴德（Agobard）等。查理曼命人收集古代手稿，修订《圣经》的版本，出版语法书、史学著作和民谣。修道院长艾因哈德撰写的《查理大帝传》被称为“第一本世俗传记”。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被这些现象所感动：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查理曼“给我们套上了来自书本知识的文学传统的枷锁，这种传统是悬挂在我们的教育制度脖子上的一副磨盘。”[3] **[阿戈巴尔德]** **[温泉]**

查理曼毫无顾忌地把教会当做帝国的一部分而统治。在794年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查理曼反对尼西亚宗教会议的信纲（第七条）。主教区和修道院都被当做封建采邑，受叛逆罪法的管辖。虽然查理曼禁止主教参加战争，但他是通过火与刀剑来传播福音的。他是否掌握了《登山训众》的含义还成问题。查理曼为基督教所做的一切因最终被封为圣徒而得到了回报，尽管这个过程被推迟了351年，因为据说他对异性的征服之广泛与对领土征服之广泛不相上下。

814年1月28日，查理曼去世。他在亚琛的墓碑（已经损坏了）上刻着：

“躺在这里的是伟大的正统信仰的皇帝查理曼的遗体，他显著地增强了法兰克王国的实力，并且卓有成效地统治了47年。他于814年去世，享年70岁。”[4]

[304]

阿戈巴尔德（AGOBARD）

所有的预兆都表明，800年将是查理曼的最凶险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两次日食和两次月食，而且在法兰克王国境内都能观察到。更加可信的是，哈里发送给皇帝的礼物——一头幼象死了，牲畜瘟疫到处爆发，本尼凡托公爵发动了叛乱。

所有这些和其他的事情都被里昂主教阿戈巴尔德（Agobard，约779—840年）记录下来了。而且阿戈巴尔德发现普通的民众正在从这些天灾人祸中得出迷信的结论。他们认为，牲畜是死于本尼凡托公爵的间谍撒播的毒气。他们还认为，法兰克王国正在遭受乘坐“腾云驾雾的飞船”的“天空战士”的入侵。据说入侵者从天空中用冰雹使法兰克人的庄稼倒伏，在他们把冰雹带到遥远的“玛格尼亚”(Magonia)之前。阿戈巴尔德不会轻易地被这些故事迷

惑，经过调查之后，他认为它们都是无稽之谈。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天主教会正在遭受犹太人的入侵。当他收集的著作于1605年被发现时，它们证明他至少写作了五篇关于犹太人危险的论文。[1]

但是阿戈巴尔德最著名的新工作是要求为广大的基督教共同体制定一部普遍适用的基督教法律。他写道，“如果上帝遭受这种痛苦，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他的‘身体’中调节好关系，难道这不是不可相信的法律的多样性……以反对这种统一的神圣工作吗?”阿戈巴尔德是欧洲第一个主张鼓吹中央集权化的人。

[305]

温泉（PFALZ）

亚琛（Achen）的名字来源于阿奎格兰纽姆（Aquisgranium）的罗马温泉，意为“阿波罗—格兰努斯的水”。它温暖而有疗效的泉水解释了查理曼选择它作为他喜欢的居住地“恺撒温泉”(Kaiserpfalz)。法国名字艾克斯拉沙佩勒（Aix - la - Chapelle）是一座著名礼拜堂的标志，这座礼拜堂现在是亚琛大教堂的一部分，而礼拜堂是查理曼为他的宫殿所扩建的。

查理曼的礼拜堂完工于805年，是一座三层的八边形建筑，但是采用了拉万腊的圣维塔尔（San Vitale）的拜占庭建筑风格，查理曼曾经见过并推崇圣维塔尔。据说礼拜堂的比例是遵循《圣约翰启示录》中的第七种感觉的神秘数字。它是当时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石头建筑。八边形内部装饰成圆形，在罗马式拱顶的第一层上，刻着由阿尔琴撰写的著名献词：

由于带有生命的石头被加入了和平之中，
所有的数字和尺寸都一致
建筑这堵墙的主人的事业是辉煌的。
被完成的大厦将使人民变得更加虔诚
人民的工作将永远是一座美丽的纪念碑
如果“造物主”保护并统治它。
愿上帝因此而注视这座神殿
查理国王把它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礼拜堂的装饰体现了浓厚的帝国象征，查理曼和他的后继者在

新的和早期基督教的背景下恢复了这些象征。大圆顶内部的马赛克壁画上绘着“羊羔的崇拜”。讲道坛上镶嵌着罗马瓷器、玻璃碎片和一只浮雕的雄鹰。绿色的埃及式柱子和玫瑰色的斑岩支撑着拱顶的第二层。祭坛嵌板用古典罗马浮雕和纯金描绘了“激情”。罗塔尔十字架是用黄金锻打而成的最豪华的基督教装饰品，外面还包裹了古代宝石，只有中间有奥古斯都皇帝浮雕的十字架才能超过它。帝国的宝座是由一块白色大理石切割而成的，从第一层走廊中往下看，它经历了700年32次加冕而未变化。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查理曼建立的帝国既是神圣的又是罗马的。

十二世纪，在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的命令下，这座礼拜堂变成祭祀查理曼的神庙。1165年，刚被封为圣徒的查理曼的尸体被转移到一个纯金制作的灵柩之中，收集的圣物包围着灵柩，这些圣物包括基督的缠腰布、圣母的腰带、查理曼尸骨的碎片等，放在一个珍贵的圣骨盒里。巴巴罗萨捐赠了一个圆形的铁制大吊灯——“灯的王冠”，悬挂在八边形的中央，象征着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它还刻着另外一篇长铭文：

“耶路撒冷，天堂的锡安山；得救的先驱圣约翰看见了你……弗里德里克、罗马帝国的天主教皇帝把这盏‘灯的王冠’作为一件珍贵的礼物……啊，圣母，他把它献给您。啊，圣母玛利亚，海洋之星，请把谦卑的弗里德里克纳入您的保护之下吧……还请您保护皇后贝亚特里斯。”

今天，亚琛的帝国礼拜堂被列为罗马式建筑艺术中的奇迹。但是它不仅仅是如此。它还提供了任何书籍所不能提供的生动的历史教训。当参观者进入礼拜堂时，他们就穿过“狼门”——根据狼欺骗恶魔占有这座礼拜堂的传说而得名。没有被蛮族与古典、基督教与异教的强大混合抓住的心情是压抑的，这种心情是当时的精神动力。这里是西欧对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记忆，当时罗马式建筑艺术是一种创新，文明的中心仍然在东方。[1]

查理曼的力量来自王国的稳定。他的遗产很快被儿孙们互相争[306]夺。多次分裂导致它很快解体。817年，亚琛发生了派系内战，843年，随着持续的家族杀戮，《凡尔登条约》使查理曼三个孙子瓜分了帝国。秃头查理获得西部领土，包括纽斯特里亚、阿基坦、西勃艮第和西班牙边区。意大利王洛泰尔一世继承了皇帝的称号和“中部王国”，包括奥斯特拉西亚、东勃艮第、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日耳曼人路易获得帝国东部广大领土，主要是日耳曼人地区（见地图12）。

《凡尔登条约》奠定了未来德国和法国的雏形。“中部王国”则成为德国和法国长期争夺的一根骨头。查理曼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脆弱的统一的例子，而是不断分裂的前景。[查理]

[307]

查理（KRAL）

查理曼至少在四条战线上给予斯拉夫人重创。789年，他把阿伯特里特斯人（Abotrites）和索布人（Sorbs）驱赶到易北河以东。805—806年，他迫使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萨瓦河（Sava）和德拉瓦河（Drava）之间的卡林西亚的斯拉夫人纳贡。为了表示对伟大的征服者的尊敬，斯拉夫人采用查理曼的名字作为他们表示“国王”的词汇。Karol在捷克语中变成了Kral，在波兰语中变成了Krol，在俄语中变成了Korol。法兰克人给予了斯拉夫人的第一个基督教王统。(Kral在土耳其语中意思是“国王”)

在西方，查理曼成为许多中世纪传奇中的统帅其他国王的君主，是《查理曼武功歌》[1]（chansons de geste）中的超级英雄。九世纪，圣高卢的一个修士就创作了一部神话般的编年史《查理曼的伟业》（De Gestis Karoli Magni)。查理曼很快就被游吟诗人描绘成基督教世界的无所不在的胜利者，他挥舞着神圣的宝剑“约尤斯”(Joyeuse)，沉重地打击异教徒，骑在他的随从的头上——这些随从是罗兰（Roland)，加隆（Ganelon)，巴伐利亚的奈梅斯(Naimes)，丹麦人奥吉尔（Ogier)，图卢兹的圭拉姆（Guillaume)，好战的兰斯大主教特平（Turpin)。

在法国的传统中，查理曼的“12个随从”包括诺曼底、勃艮第和阿基坦三个公爵；香槟、图卢兹和弗兰德尔三个伯爵；以及六个主教：兰斯、劳恩、夏龙、博韦（Beauvais)、朗格勒（Langres）和努瓦永（Noyon)。

在德国的传奇中，查理曼常常被说成是一个睡意蒙眬、等待被人叫醒、拯救他可爱的臣民于水火的人。在巴伐利亚地区的童话中，查理曼坐在翁特（Untersberg）的一张椅子中，就像他坐在亚琛礼拜堂的宝座上一样。当他的胡子长到可以绕过他面前的桌子三圈时，世界的末日就即将来临。在德语中，查理曼的名字被给予了“大熊”星座。在古英语中，“查理的四轮马车”就是“北斗七星”星座的代名词。

后来，在法国和德国，查理大帝被尊敬为民族的王权的先驱。

对法国来说，“查理曼”，对德国来说，“伟大的查理”，他不是被当作一个法兰克人，而是当做一位爱国的法国或德国领袖。查理曼的例子在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被复活了。在1838—1852年绘制的法兰克福历代皇帝画廊中，查理曼的肖像放在首位。

二十世纪，查理大帝更多被当做法国—德国和解的象征。1943年，当纳粹为了武装党卫军（Waffen SS）组织一支新的法国志愿师时，1955年，当“欧洲委员会”设立“促进欧洲统一奖”时，组织者都使用了同一个名字——“查理曼”。

加洛林人的分裂为维京人提供了可乘之机。841年夏，维京人就航行到塞纳河抢劫了鲁恩城。843—844年，《凡尔登条约》签订不久，维京人就在诺姆提尔（Normoutier）过冬。854年，新兴的城市汉堡被维京人烧毁，巴黎被洗劫，秃头查理逃到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避难。847年，古代城市波尔多被勒索赎金。852年，秃头查理在塞纳河口附近的热福塞（Jeufosse）被维京人扣为人质，不仅支付了黄[308]金，还授予他们永久性的土地，这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后来维京人反复抢掠法国各地，只有奥尔良能够抵抗。

864年，根据《皮特勒敕令》（Edict of Pitres），秃头查理终于下令各地建立城堡以防御维京人。加洛林王朝内部年复一年的战争随着国王的去世、暂时的分裂和维京人的入侵而加剧了。867—878年，丹麦人专注于入侵英格兰。880年，丹麦人抢掠了易北河流域。885—886年，4万维京人乘坐700艘长条形船只溯河而上，到达今天的马斯河畔的肯普（Champ de Mars），围攻巴黎达11个月之久。奥多（Odo）伯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皇帝“胖子查理”向维京人支付了价值700英镑的白银，诱使他们进入了勃艮第。

在曾经逃避了查理曼注意的不列颠群岛，维京人的危害特别严重。丹麦人的入侵带来了持续200年的分裂。828年，威塞克斯王国的国王埃格伯特（Egbert）被承认为不列颠的霸主。但是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丹麦人就向威塞克斯的霸主地位发起了挑战。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王（849—899年在位）毕生与丹麦人进行斗争。878年，阿尔弗雷德被迫退到萨默塞特（Somerest）的阿瑟尼（Athelney）沼泽地里躲避丹麦人的追杀。但是同年的战争使他能够建立一个国家。《韦德摩尔（Wedmore）条约》创立了“丹麦区”——受丹麦人统治的广大地区。直到1066年，英格兰陷入威塞克斯王朝与丹麦人之间的不断战争之中。十世纪，在最后一位约克的丹麦人国王埃里克·布拉多（Eric Bloodaxe）被驱逐后，维京人发动了复仇性的侵略。994

年，伦敦遭到丹麦人和挪威人的联合围攻。1017—1735年，卡努特大帝统治着囊括了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庞大的北海帝国。在修建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统治时期，英格兰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但是1066年“忏悔者”爱德华的去世立即引起了三个自称拥有王位继承权——挪威的哈罗德·哈拉达（Harold Hardrada）、威塞克斯的哈罗·戈德温森（Harole Godwinson）和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之间的战争。

当英格兰人与丹麦人进行斗争时，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区则展开了凯尔特人与维京人之间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不断变化的北欧人联盟与不断变化的凯尔特王公之间互相争夺。在爱尔兰，凯尔特人在反对沿海设防的维京人中处于下风。经过一个世纪的大混乱，在布莱恩·博鲁（Brian Boru，1002—101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他们终于占了上风，但是布莱恩·博鲁死后，他的王国陷入了奥布莱恩（O' Brians）、奥尼尔（O' Neills）和奥康诺（O' Connors）家族的互相争夺之中。此后150年里，爱尔兰人再次牢固地统治了整个爱尔兰地区。埃林（Erin）的“高个子国王”取得了对较小的米斯（Meath）、曼斯特（Munster）、伦斯特（Leinster）、阿尔斯特（Ulster）和坎诺特（Cannaught）等五个国王的控制权。起源于史前时代的布立吞（Brehon）法被抄写下来了，以便为行政实践和社会习惯提供牢固的基础，[309]“氏族”生活的传统受到民众大会和司法官的影响，也受到不断制度化的教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威尔士，凯尔特人王公受到来自沿海的维京人和内陆边境的英格兰人的双重压力。从八世纪起，他们被控制在麦西亚国王奥法（Offa）修筑的大堤之后，他们在斯特拉斯克（Strathclyde）与康沃尔的同胞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从强大的罗德里克大帝（Roderick the Great，卒于877年）和格里菲斯（Griffith，卒于1063年）那里寻得到了暂时的保护。[兰法尔]

在不列颠群岛北部，金泰尔半岛（Kintyre）的盖尔人国王肯尼斯·麦克阿尔宾（Kenneth MacAlpin，卒于860年）首次联合了皮卡特人与苏格兰人，形成了统一的“苏格兰人”概念。此后，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低地的英格兰人、沿海岛屿上的北欧人之间展开斗争。1040年，摩莱（Morlay）的领主麦克白（Macbeth）决心谋杀苏格兰人国王邓肯（Duncan），据说麦克白曾经到罗马朝圣：

“明日复明日，
用这种缓慢的步伐日复一日地爬行
直到地老天荒，
我们所有的昨天都使傻瓜变得聪明，

走向死亡的道路。烛光快要熄灭了！
匆匆而逝的生命，一个愚蠢的祈祷者
大步朝前走，把他的时光消耗在舞台上
然后杳无音信；这是一个痴人诉说的童话，
充满了狂叫
这表明一事无成。"[5]

游吟诗人和编年史家如马里努斯·斯各特（Marianus Scotts，约1028—1083年）记载了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的历史。对于威廉·莎士比亚那样的英国人来说，它没有一点趣味。

在混乱之中，五个法兰克人的王国正在逐渐地走向分裂，为了自己的利益，各个王国互相猜忌。在纽斯特里亚，国王的权威下降到最低点，每个重要的伯爵领都出现了世袭的采邑，图卢兹（862年）、弗兰德尔（862年）、普瓦提埃（867年）、安茹（870年），还有加斯科涅、勃艮第和奥弗涅（Auvergne）。它们都是后来法国各省的核心地区。911年，法国国王"头脑简单者"查理通过与老兵"海王"若罗（罗洛）签订《圣卡莱尔条约》而抵制了维京人的威胁。"诺曼底"的起源可能是英国的"丹麦区"在法国的翻版。在东部王国，卡林西亚的阿努夫（Arnulf）清除了德国的北欧人，但是通过引进马扎尔人。上勃艮第王国围绕圣莫里茨（St Moritz）的鲁道夫伯爵的宫廷而兴起，下勃艮第王国则在阿尔勒（Arles）的博索（Boso）伯爵领导下形成。在意大利，来自西西里的"摩尔人"扮演了维京人的角色，874—895年，它遭到拜占庭的持续入侵。877年纽斯特里亚、894—896年奥斯特拉西亚都陷入了政治分裂之中。到900年，弗留里（Friuli）的贝伦加（Berengar）伯爵由于遭到血腥清洗而只剩下一块领地。西方史学家常常把九世纪最后几十年描绘成"黑暗时代的'最黑暗时刻'"。

[310]

兰法尔（LLANFAIR）

除了奇妙的表达外，中世纪威尔士的地名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如有文献记录之前的定居情况。这些地名既提供信息又极其古怪。

英国征服前的几个世纪里（见原书第408页），当地王公、盎格鲁—诺曼边区长官、教会僧侣互相争夺爱尔兰的管辖权。完全是威尔士文化的王公统治着五个公国。与英国和法国都有联系的

边区长官则控制了东部和南部。接受过教会拉丁教育的主教以四个主教区为基础。通过分析威尔士和非威尔士地名的相互影响，世俗与教会权威的交叉点，史学家可以建立一幅如何、何时、由谁和为什么定居点被创立或扩大的图画。[1]

例如，威尔士的一些地方的地名只以威尔士语的形式存在，而且显然它们的起源与教会有关。其中最常见的是“兰法尔”，意思是“圣玛利亚的”。这种地名还有“森林中的礼拜堂”（Betws - y - Coed）或“圣玛利亚的教堂”（Eglwys Fair）。更常见的是那些显然起源于教会但是有两种语言形式，如“兰贝德/圣彼得的”（Llanbedr/Lampeter），安格尔西郡的卡吉比/霍里希德（Caergybi/Holyhead），或格拉摩根郡的 Llanbedr Fynydd/Peterston - super - Montem。第二类是那些起源于世俗但是有两种语言形式的地名。如 Abertawel/Swansea，Cas Gwent/Chepstow 和布雷克诺克郡的 Y Gelli Gandryll/Hay - on - Wye。现代的“Hay”起源于中世纪诺曼语中省略一部分发音的“篱笆”（La Haie Taillée）。

最后一类是两种语言形式而且混合了教会与世俗两种起源的地名，包括蒙茅斯郡的 Llanfihangel Troddi/Mitchell Troy 和格拉摩根郡的 Llansanffraid - ar - Ogwr/St Bride's Minor。

但是，最著名的威尔士地名并非起源于中世纪。当伦敦—霍利黑德（Holyhead ）铁路在 1850 年通车时，位于梅奈（Menai）海峡恩格尔西（Anglesey）一边的第一个火车站就设在兰法尔村。为了提高知名度和吸引游客，火车站的站长决定更改车站的名字，虚构一段古代威尔士饶舌的话，使车站的名字比月台还长。英国邮政局所谓的兰法尔 P.G.“琼斯邮局”被称为“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erndrowllllantysiliogogogoch”。游客们被告知，它的意思是“靠近急流和圣泰斯里奥教堂的白色榛木山谷中的圣玛利亚”。[2]

[311] 在西部各地，灾难导致封建主义的形成。人们难以把封建主义形成的原因与后果区分开来。但是政治权威的瓦解和地方防御的放弃刺激了一系列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这些发展共同形成了后来理论家所谓的“封建政权”。实际上，封建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制度，它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影响的现代结论是《什么是封建主义》：

“从字面上说，封建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套制度，用于创立和规

范臣服和服役的义务……一个自由民（附庸）与另一个自由民（领主），领主有保护和维持的附庸的义务。”[6]

关键因素是重骑兵、附庸、封地、豁免权、私人城堡和骑士精神等。

西欧重骑兵需要高大的马匹承载，是从波斯和拜占庭引进的。查理·马特不仅引进了重骑兵，而且使大量教会土地世俗化，以便维持重骑兵制度，因此他被称为“封建主义的创立者”。[7] 与此同时马镫被发明，它有助于骑兵牢固地站立于马上，佩带长剑，使骑兵从轻快、机动性的散兵变成了重装防御力量。[8] 因此，主要问题是提供一种社会结构，它能够长期维持大批骑士的物质、训练、昂贵的战马、装备和随从的开支。骑士阶级的维持是封建社会关系的核心。

附庸产生于罗马帝国后期的“庇护”制度，当缔结庇护关系时，庇护人用手掌包住被庇护人的手掌，表示已经答应提供保护。加洛林时期，领主开始与他的附庸或“从属人员”缔结这种关系，附庸口头表示效忠，并行臣服礼，领主则亲吻附庸。领主与附庸互相拥抱，附庸单膝跪地，被领主授予象征新身份的方形旗帜、长剑、协议书、一撮土。从此，他们就结成了终生具有相互义务和责任的关系。附庸宣誓为领主服役，领主则答应保护和维持这种关系：

“蒙迪迪耶（Montdidier）的贝拉德（Berard）来到查理曼面前，单膝跪地，变成他的人。皇帝搀扶他起来时，亲吻他的额头，通过一面白色的方形旗帜而给予保护的承诺。”[9]

“封建主义”的名称来源于“封地”或“采邑”，它产生于较早时[312]期的“庇护”，主人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礼物，期望未来得到一定的回报。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土地授予活动开始被明确作为换取军役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关系被延伸和加强。起初是以一定的骑兵军役来计算，即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为了换取一定数量的骑士服役。但是这种义务被变相地包括守卫城堡、陪同主人，出席领主法庭的司法义务，为领主提供一定的建议，以及各种形式的“帮助”。领主后来把帮助解释为一定意义上的财政“资助”，包括相当于一年收入的分期付款，和“四种协助金”，即领主的赎金、领主的长子被封为骑士、领主的长女出嫁、领主参加十字军。领主还保留了对附庸年幼继承人的监护权、寄宿权、婚姻权（允许结婚）、和继承金（重新购买契约）。作为这些义务的交换，附庸收取土地的收入，对土地上的全体居民拥有司法管辖权。如果附庸不履行义务，那么他的土地就被收归领主所有。

从理论上说，采邑是不可分割和转让的。如果缔结契约的双方有一方死亡，那么契约就算自动终止。但是实际上，附庸越来越成功地获得了继续契约关系和分割或处置土地的权利。领主谨慎地控制妇女和未成年人继承土地。特别的关系和古怪的条款比比皆是。巴黎主教的主要附庸都按照契约规定，当主教献祭时，附庸们必须用肩膀架着主教走。肯特郡的一些采邑的领有条件是，在渡过英吉利海峡时，“附庸必须在船上抬起国王的头”。领主进行财政榨取的机会很多。1212年，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为了弗兰德尔而与法王签订契约，为了获得同意与女继承人结婚而交纳5万英镑的“继承金”。

因此毫不奇怪，法律纠纷是无休止的。在较早的时候，通常所有的主权领土都创立单独的封建法律和法庭体系以解决封建争端。习惯上领主主持法庭，他的主要附庸充当陪审员。一般认为，当次分封的土地变成可以世袭的土地，封地与附庸制度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时，封建主义就形成了。“正是附庸的地位与封地的占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组成了封建制度。”[10]但是作为最后一种手段，附庸制度和次分封制度是不协调的。作为附庸，骑士家族的成员必须追求领主的利益，作为封地占有者，他们被迫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使封建社会的关系呈现出紧张和背信弃义的特点。

封建社会由一张紧密的契约关系网组成，这种契约关系连接着王国境内封建主的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在最高等级，次分封涉及国王[313]与他的“总佃户”之间，即国王与占有大封地的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但是通过次分封，总佃户可以分封自己的附庸，次附庸又可以进一步分封自己的附庸，依此类推，直到最低一级。绝大多数附庸与主人的关系犹如领主与他们的附庸的关系。

封建契约都以特许状和个人契约的形式而被记录下来，虽然早期的契约只有少数保留下来了：

“谨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我，路易，在法国国王的恩典下，向所有在场的人宣布，香槟伯爵亨利把萨韦尼（Savigny）的封地授予博韦（Beauvais）主教巴塞罗缪及其继位人。为了上述封地，主教答应为亨利伯爵提供一名骑士军役、司法服务……还同意未来的主教也履行同样的义务。契约缔结于曼蒂斯（Mantes），1167年……中书令休记录。”[11]

在地方一级，诸侯和贵族的封地被反映在庄园地产的安排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庄园的主人授予一块土地给他的农奴家庭，以换取农奴在主人的自营地上不付报酬地服劳役。作为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的一种

协商，农奴化缺少次分封中的许多相互义务。但是它包含了为了劳役而授予一块土地，忠于主人而受到主人的保护，这是建立在相同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它将不会与一般的奴隶制度混淆。在欧洲一些地方，如意大利北部，农奴须向主人宣誓效忠，像骑士对他们的主人一样。

由于这张契约关系网络，所以封建社会等级森严。843 年《凡尔登条约》已经提出了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主人"。至少在理论上，享有绝对独立的只有教皇和皇帝，但他们也是上帝的附庸。为了描绘这种状态，人们发明了"封建等级"和"封建金字塔"等概念，高高在上的是国家的统治者，下面是附庸、次附庸、次次附庸……直到最底层的农奴。这种模式由于人为地纯洁和对称而容易引起误导。实际上，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许多互相冲突的依附和忠诚基础之上，充满了例外情况，曾经明确的义务由于几代人互相竞争的特权、有争议的权利和逐渐淡忘而变得模糊。封建社会当然是等级制的，但它不是纯洁而规则的。

幸存的自主地的多少在各地不一致。有些地区，如未来的瑞典，自主地是常见的，而在其他地区，如法国北部，自主地从根本上消失了。封建地产与自主地、以封地形式占有的家庭土地与完全占有的土地通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于具有封建意识的人来说，自主地是非正常的。它有时被称为"太阳的封地"。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后[314]果是简单的。几乎每个人都以他们的社会等级为条件，被他们的法律和感情依附关系所排除。这些关系给予他们一种安全的保障措施和不容置疑的认同基础，但是它们也使个人难以抵制剥削、压迫，容易遭到忽视。 "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典型差异在于中世纪缺乏个人自由。"[12]

人们也许会认为，对个人生命无能为力的感觉增加了中世纪的人注重宗教——特别是他们对死后生活、对死亡的不健康的仪式。

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是指授予免除中央政府各种税收或其他榨取的权利。在早期，教会是豁免权的主要受益者，但是各种豁免权也逐渐地授予各种个人、组织和团体。豁免权来源于这样一个观念：由于统治者再也不能履行全部职责，因此导致政治、司法和经济权力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不承担统一的义务，而是通过修道院、地区或城市的特许状来进行统治。地方主义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

用石头建造的城堡和重装骑兵是最终抵制维京人、撒拉森人和马扎尔人入侵和抢掠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座坚固的城堡往往建筑在悬崖峭壁或海岸，它为该地区的居民提供避难的场所，并统治着它的卫兵所能保护的地区。城堡的修建始于九、十世纪，当时国王和诸侯的权

力下降到最低点。打败入侵者后，城堡长期被贵族用于抗衡国王或诸侯。这样私人城堡就变成了地方和封建权力的基础，也是中央集权国家复兴过程中的长期障碍。许多世纪以后，当诸如红衣主教黎塞留着手消灭封建贵族时，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摧毁贵族的私人城堡。

起源于“骑士阶层”的骑士精神在最狭义的意义上是指约束每个骑士的“荣誉规则”，包括道德价值，如诚实、忠诚、谦逊、殷勤和刚强。骑士精神要求骑士保护教会、救助弱者、尊重妇女、打击异教徒、维护真理和公正、信守诺言。从广义上说，骑士精神是指与骑士制度有关的所有习惯和行为——因此也指他们的头衔、等级、仪式、纹章、词汇等。但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骑士精神是指整个封建社会盛行的时代精神，即骑士在封建社会中完全处于支配地位。骑士精神与基督教是“中世纪思想”的两大支柱。

虽然早期封建主义的许多因素在加洛林时代就出现了，但是它们直到后来才开始完全融合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一般把“封建主义的典型时代”定为十至十三世纪。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学者把封建时[315]代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中期，军人与农民之间盛行小规模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关系；第二阶段是十一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中期，封建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世袭贵族得到发展，[13]特别是骑士制度逐渐出现：它的趋势直到“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才开始明朗。(见原书第348—350页)

从加洛林王朝崩溃中产生的封建主义仍然是西欧的一个重要现象。拜占庭帝国把世袭土地授予士兵，早期东斯拉夫人各个王国的“军功地产”(pomest'ye)制度与此相似。但是东欧的封建主义缺乏封建主义的许多基本因素。至于中欧各国，史学家强烈反对强调那里的封建制度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封建主义是社会等级的基础，其他的史学家一般反对这种观点。[14]一切都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封建主义定义。

封建主义给教会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的教会的权威，给予地方豪强巨大的权力，使教士置于地方豪强的控制之下。伯爵和诸侯习惯于自行任免主教。较小的封建主则控制较低级的教士。“主教处于变成男爵的危险之中，国王们期望教士们担任官职为他们服务，封建主把(教会)圣职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15]教皇也未能幸免，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有限，不得不忍受变成罗马贵族、意大利诸侯、或更大程度上复兴的帝国的玩偶。

多亏勃艮第的本尼狄克式的克吕尼修道院，西欧的修道院才适应了这种变化了的形势。离群索居的修道院和隐修院特别容易遭到入侵者和地方贵族的袭击，他们强烈要求共同努力加强自己的地位。910

年，奥弗涅伯爵圭拉姆·勒·皮奥（Guillaume le Pieux）创立的克吕尼修道院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改革的策源地。克吕尼修道院以本尼狄克修道院规则为蓝本，但是包括更严厉的不近人情的服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修道院长提高到对所有女修道院也拥有管辖权的地位。实际上，他们建立了第一个修道团。他们的铁的纪律和独立于地方贵族的做法使他们在教会政治中具有强硬的发言权。首先，由于得到教皇对他们改革的支持，他们坚决提倡教皇至上的理论。910—1157年，7位长寿的克吕尼修道院长——贝尔诺（Berno）、奥多（Odo）、阿马德（Aymard）、马约洛斯（Majolous）、奥迪洛（Odilo）、圣休（St Hugh）和“年高德劭者”彼得——建立了314所修道院，分布于从西班牙到波兰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教皇君主国”的重要奠基人乌尔班二世就出身于克吕尼修士不是偶然的。（见下文）

封建主义给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塑造了西方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决定了西方人对财产、法律原则、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态度。通过强调契约、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封建主义导致西方人对相互[316]信任和信守诺言的永恒重视。这些态度远远超过了狭隘的军役和土地占有方式的意义。

当恐怖的马扎尔骑兵在九世纪末期出现于西欧历史舞台时，封建社会的军事特性受到了考验。虽然与匈奴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马扎尔人与匈奴人一样掠夺成性，也定居在“匈牙利”平原上。895—955年，马扎尔人每年都在从前的加洛林帝国境内纵兵劫掠，他们像维京人一样烧杀抢掠，而且更加快速机动。他们是敲诈勒索的高手，榨取大量的贡金或赎金。899年，马扎尔人在布伦塔（Brenta）河畔粉碎了意大利军队的进攻。944年，他们肆无忌惮地到达阿普里亚（Apulia）、阿拉贡、阿基坦等地。955年，德国诸侯和贵族在巴伐利亚联合起来，马扎尔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8月10—12日，萨克森的奥托率领日耳曼人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西费尔德（Lechfeld）平原经过残酷的激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马扎尔人被驯服了，其残余势力四处溃散，变成从事牧业和农业的民族。[**布达**]

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史学家贬低马扎尔人的影响，认为他们“不是西欧的一支创造性力量”。[16]（所有这些意味着马扎尔人没有到达剑桥）。的确，马扎尔人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通过消灭大摩拉维亚（见原书第321页），他们改变了多瑙河流域的民族和政治结构，决定了中欧未来的政治版图。他们的出现不仅是匈牙利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波希米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马扎尔人还设置了阻断北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人为障碍，同时为德国殖民者向多瑙河流域迁徙和巩固

他们对奥地利的统治铺平了道路。马扎尔人还促使德国诸侯走向统一，承认莱西费尔德战役的胜利者（指萨克森公爵）为他们的皇帝。这是德国军队把萨克森的奥托举起在盾牌上并当场拥立他为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可能不是马扎尔人的初衷。至于越过喀尔巴阡山脉逃难的7个游牧部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兴起了欧洲地图上6、7个永久性的国家是一个不平凡的成就。只有脱离实际、漠视历史事实的史学家才会认为这种发展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962年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不完全归功于他在莱西费尔德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他的父亲"捕鸟者"亨利已经使萨克森公爵领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亨利以位于哈茨山（Harz）的曼里本（Mamleben）宫殿为中心开始建立东部边区，建立设防城市，组织德国移民抵抗丹麦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317]的侵袭，奎德林堡（Quedlinburg）、迈森（Meissen）和梅泽堡（Merseburg）等城市都是在亨利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因此奥托的权力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东部边区因得到教会的帮助而巩固，马德堡大主教区（968年设立）、勃兰登堡和哈弗尔贝格（Havelburg）主教区、新建的汉堡港现在可以安全地拓殖。951—952年、961—965年和966—972年的三次意大利战役恢复了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通过一系列内战和政治联姻活动，亨利重新统一了反复无常的法兰克尼亚、洛林、士瓦本、巴伐利亚公爵领。

因此，复兴的帝国长期存在下来了，直到拿破仑灭亡了它。萨克森家族的领袖地位自然导致他们把重心转向东部，尽管它的经济生活中心仍然在莱茵河流域。萨克森公爵的选帝侯首府在亚琛，萨克森王朝对古老的"中部王国"洛林的占领为它干预西部事务提供了一个永久支柱。1024—1125年，萨克森王朝之后的萨里安（Salian）王朝从血统上说也属于法兰克人的后裔，但是他们不再统治法兰克人的帝国，而是统治着一个人为创造出来的国家，这个国家将发展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德国"的起跳板。

972年，在奥托一世最后一次意大利战役结束时，他采取了关键性的步骤。在征服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后，他把它们还给拜占庭，以换取双方对各自头衔的互相承认，如果他们承认他的帝国具有平等的身份，那么他将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奥托一世的儿子与拜占庭前皇帝罗曼努斯二世（Romanus Ⅱ）的女儿提奥菲诺（Theophano）的婚约标志着双方达成了协议。从此，欧洲出现了两个帝国。一个普遍的欧洲帝国的梦想一去不复还了。提奥菲诺的儿子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的确怀有更庞大的梦想，他到亚琛朝圣，并掘开了查理曼的坟墓，他正式访问了东部邻国波兰，但是他的理想既没有

得到德国的支持，也没有得到拜占庭的支持，而且他没有留下后裔。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002—1024 年在位）是萨克森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很快便面临着变成帝国正常负担的所有问题：内战、边境上抵抗斯拉夫人的入侵、对意大利的战争、与法国偶尔发生的冲突。

奥托一世曾经相当蔑视罗马教皇。他命令所有的教皇在宣誓效忠帝国之前不能就职。在绞死罗马城的保民官和行政长官后，奥托一世诱使教皇约翰八世（965—972 年在位）为自己举行加冕典礼。拉丁教皇一度比希腊正教的大教长更依附世俗政权。一般说来，萨克森王朝的历代皇帝都使"西法兰克"的统治者符合自己的设想。九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后裔陷入了敌对者的反复争夺之中，并且依赖巴黎伯爵罗伯特的后代，特别是依赖传统上的选帝侯"法国公爵"大雨果。他们因而失去了在洛塔林基亚（Lotharingia，洛林的古称——译者注）中的支柱，因此也失去了旧法兰克王国腹地中的支柱。987 年，当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死后无嗣，争夺王位的斗争以有利于公爵的儿子雨果·加佩（987—996 年在位）而结束，加佩成为一个统治近 400 年之久的王朝的创立者。

因此法兰西王国注定能够持续地存在下去。加佩家族的统治地位[318]导致他们把重心转向西部。当然，对查理曼帝国的梦想和对洛塔林基亚的主权要求仍然保留着，但是这个王国失去了法兰克王国的根本特征。与后来的观点相反，它没有卷入与德国无休止的战争之中，但是它与重新建立的帝国之间的明确分离成为它取得新的认同的强大动力。它是法兰西民族的起跳板。

当法兰克帝国衰落而萨克森帝国变得强大时，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达到了鼎盛时期。驯马师出身的巴塞尔一世（867—886 年在位）通过谋杀皇帝而夺取了皇位，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他的统治标志着拜占庭进入了"恢复和巩固时期"，他的后继人智者利奥六世（886—912 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七世（913—959 年在位）都是学者出身，他们的漫长统治标志着君士坦丁堡商业的高度繁荣。武士出身的皇帝约翰·提米西斯（John Tzimisces，969—976 年在位）和"屠杀保加尔人的刽子手"巴塞尔二世（976—1025 年在位）向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女皇佐伊（Zoe，约 978—1050 年）通过操纵三个丈夫而维持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她的马赛克肖像画保留在索非亚大教堂中，画的一旁是基督画像，另一旁是一位皇帝的画像，皇帝画像的题字适宜的湮没了。她的诡计多端的妹妹提奥多拉（1055—1056 年在位）的独裁统治只是昙花一现。[**阿索斯圣山**]

在马其顿王朝统治下，拜占庭帝国内外局势稳定，东正教会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帝国宫廷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把皇帝的

政策推行到各个行省。军队被改组成由职业骑士充任，各个贵族派系都为国家服务。国家掌管着贸易和物价，以便获得最大的财政收入。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增长了六倍，成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心，远远超过当时欧洲其他城市。拜占庭的领土得到了扩大。巴塞尔一世重新占领了塔兰托（880年），恢复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势力。拜占庭帝国包括两个大主教区，一个在卡拉布里亚，一个在兰戈巴迪亚（Langobardia），还有一个在巴厘（Bari）的卡塔潘纳图斯（Catapenatus）。在帝国东部，随着对叙利亚、塞浦路斯、克里特、西利西亚（Cilicia）、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统治的恢复，九世纪拜占庭军队每年的战役都得到了回报，阿拉伯人的进攻得到了遏制，由巴格拉提德（Bagratid）王朝统治的亚美尼亚现在也向拜占庭称臣纳贡。924年曾经围攻过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尔人向西推进，但是，逐渐被东正教的洗礼和宝剑所驯服。

[319]

阿索斯圣山（ATHOS）

在885年的一个“黄金诏令”（Chrysobull）中，皇帝巴塞尔一世正式承认阿索斯的“圣山”是一块保留给修士和隐修士的领土。从此以后，所有的平民和雌性（无论人类还是动物）都不许进入哈尔基季基半岛（Chalkidikes）的三面环海的360平方公里的岬角上东部“圣洁的花园”。第一座永久性的修道院大劳拉（Great Laura）修道院创建于936年。特许状颁布于972年。海拔2033米的阿索斯半岛将由一名大主教统治，协助他进行管理的是设立在半岛的中心城镇卡里埃（Karyes）的修道院长会议。[1]

圣山修道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在集体修道与个人隐修两种传统之间进行妥协。建于十至十六世纪的20座比较大的修道院中，13座实行集体修道，修士共同参加所有的活动。而另外7座修道院则实行严格的个人隐修，修士们单独饮食和祈祷，其中包括3座最古老的修道院——大劳拉，瓦托佩迪（Vatopedi）和乔治建立的艾弗隆（Georgian - founded Iveron）。每个修道院都与偏远的农场、礼拜堂、隐修密室等相连。隐修士最大的避难所是卡鲁里亚（Karoulia）的令人晕眩的住所，它位于半岛的陡峭的悬崖上，每个隐修士的小屋通过一系列悬崖小道、石级台阶和绳梯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阿索斯圣山不断受到入侵的威胁，包括阿拉伯海盗、勒克（Lakh）牧羊人、加泰罗尼亚的入侵者。拉丁帝国期间（1204—1261年），十字军曾经力图使这些修士皈依天主教——因此

他们坚决反对后来所有统一东西方教会的运动。此后，他们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兰西亚的君王中找到了保护人。当1430年土耳其人攻占了萨洛尼卡后，修士们从土耳其苏丹那里获得了特权。

十八世纪，阿索斯圣山是与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相联系的重要的泛东正教运动的中心。瓦托佩迪修道院的研究院成为一个国际学术中心。十九世纪，圣彼得堡把阿索斯圣山当做施加俄罗斯影响的目标。5000名俄罗斯修道士定居在那里，特别是定居在圣潘特雷蒙（St Panteleimon）的鲁斯孔（Roussikon）和圣安德鲁的斯格特（Skete）。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修道院都转变成各自国家的教会。1917年俄国革命后，阿索斯圣山失去了最后一位伟大赞助人。它现在的机构是根据1926年与希腊签订的条约而建立的。

经过几十年的衰落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索斯圣山迎来了大约1500名修道士，他们酝酿着进行改革。修道院的建筑被重新修缮了，商业性的林业被开发了，到达半岛的道路被修建了，并欢迎男性游客去观光旅游，并讨论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建立关系。阿索斯圣山的一名修士向各国表示了自己的不满。[2] 一位观察家发表评论说，"虽然圣山修道士都是著名的宗派主义者和爱说长道短的人，但它毕竟是拜占庭世界遗留下来的重要遗产。"[3]

政治稳定奠定了文化复兴的基础。巴塞尔一世和哲学家利奥六世下令编定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帝国法令。拜占庭的教堂建筑取得了和谐的统一。文人墨客云集在皇帝的宫殿中。教会长老和教授菲提奥斯（Photios，约810—893年）恢复了对古典学术的研究。西蒙·梅塔菲拉[320]斯特斯（Simeon Metaphrastes，约卒于1000年）创作了《蒙洛吉昂》（Menologion），是一部标准的基督教圣徒列传。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约翰·基米特里斯（John Geometres）创作了许多赞美诗、讽刺短诗和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散文。宫廷哲学家和博学家迈克·皮萨罗斯（Michael Psellos，约1018—1081年）出版了大量有关历史、神学和文学的著作。"马其顿文艺复兴"的批评者认为它的成就是百科全书式的，而不是创造性的。

由于没有遭受西欧那样的灾难，享受着安全和自信，所以拜占庭不断地得到发展。当奥托一世的历史学家和意大利王的大使克雷莫纳的留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949年访问君士坦丁堡时，他被所见所闻震惊了，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接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皇帝的御座前站立着一棵镀金的铁树，铁树的枝叶上镶嵌着镀金的各种鸟类，这些鸟能够发出各种鸣唱。御座本身制作得十分巧妙，以致初看上去它显得很低……过一会儿它又上升得很高。御座两旁站着镀金的金属或木头雄狮，尾巴拖地，张开血盆大嘴，伸出舌头，高声嗷叫。

两名太监把我带到皇帝的面前，当我跨进宫殿的大门时，镀金的狮子嗷叫，镀金铁树上的小鸟鸣唱……三次跪拜之后，我才敢抬起头，向皇帝致意，我第一眼就看到他的御座正好在我的头顶上，然后迅速升到大殿的顶上，皇帝身穿大袍，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7]

留普兰德的谦卑感反映了当时西欧对东方的态度。

拜占庭的主要敌人是穆斯林，而且拜占庭是基督教世界反对穆斯林的前线堡垒。但是在它的巴尔干侧翼，两个世纪以来，拜占庭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对手。从特贝尔（Terbel）、克鲁姆（Krum）和奥马塔格（Omartag）等部落冒险家演变而来的第一保加尔帝国占领了拜占庭在多瑙河地区的几个行省。皈依东正教使第一保加尔帝国进入了拜占庭文明世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的内部分裂趋势。在自称"保加尔人和希腊人的沙皇"的西美昂（Simeon，893—927年在位）统治下，保加尔力图在巴尔干地区取代拜占庭的势力，但是924年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遭到了重大失败。十世纪，在保加尔派异端、马扎尔和基辅雇佣兵的协助下，拜占庭军队重新征服了保加尔的东部腹地。966—967年，基辅的Svyatoslav攻占了古代保加尔的首都普雷斯拉夫（Preslav），掠夺了价值1800镑拜占庭的黄金。

在沙皇塞缪尔（Samuel，976—1014年在位）统治下，保加尔帝国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奥赫里德（Ochrid）的新都城变成了强大的修道院运动和独立的保加尔教会的中心，保加尔教会在拜占庭的再征服中幸存下来了。1014年，随着拜占庭在马其顿的塞尔（Serres）取得胜利，保加尔帝国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巴塞尔二世下令刺瞎了[321]14000名保加尔战俘的双眼，然后遣返给保加尔沙皇，不久沙皇就含羞而死。拜占庭千方百计度过了1071年的危机，当西西里的诺曼人、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和佩切涅格人（Pechenegs）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拜占庭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逆转了。**[保加尔派]**

查理曼之后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世界的边界被大量地延伸了，先后皈依基督教的有摩拉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和基辅罗斯。在北部，撒克逊人稳定的推进迫使当地的居民皈依基督

教，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直到十一世纪，基督教化才取得重大的进展。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是希腊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都把传教工作看成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任务。

摩拉维亚——它的名称与德语 Mahren 有关，意思是“边境地”——位于查理曼帝国东部的多瑙河北岸。它最初是斯拉夫人的一个公国。七世纪，在萨摩（Samo）的统治下，弗里德加（Fredegar）的编年史中提到，摩拉维亚是拒绝服从法兰克人统治的地区。八世纪，从巴伐利亚来的爱尔兰传教士萨尔茨堡（Salzburg）的弗吉尔（Virgil）向摩拉维亚人传播基督教。九世纪，一名来自德国的主教为摩拉维亚的统治者施行洗礼，并在尼特拉（Nitra）建立了教堂。

然而，862 年，摩拉维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请求派遣传教士来传教，结果以马其顿人两兄弟迈克尔（Michael）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为首的拜占庭传教团来到摩拉维亚，这两兄弟分别被称为“美多迪乌斯（SS Methodius，815—885 年）和西里尔（Cyril，826—867 年）”。美多迪乌斯曾经担任过拜占庭的斯拉夫行省总督，而西里尔作为一名外交使节曾经出使过伊斯兰教世界和卡扎里亚。他们被邀请到摩拉维亚的目的显然是抵制德国教士的强大影响，使摩拉维亚能够崇拜自己的偶像。为此，西里尔发明了格拉哥里字母表（Glagolitic）和斯拉夫式的礼拜仪式，并翻译了《圣经》。

创立摩拉维亚传教团之后，这两兄弟到罗马旅行，就在罗马期间，西里尔去世，被葬在圣克里门特教堂的地下室。但是美多迪乌斯返回摩拉维亚担任潘诺尼亚和摩拉维亚主教，885 年，他可能在现代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附近的韦莱拉德（Velehrad）去世。摩拉维亚的拉丁教士与希腊教士之间肯定发生了许多摩擦和冲突，但是“斯拉夫人的使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享有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教长的恩宠，因此树立了一个既罕见又普通的例子。他们的名字受到捷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特别是保加利亚的崇敬，传教团的残余势力最终就在他们那里找到了避难所。美多迪乌斯死后 20 年，马扎尔人灭亡了摩拉维亚，但是保留了对“欧洲的共同赞助人”的记忆。

在保加利亚，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之间的敌对最后朝着有利于希腊教会的方向得到解决。九世纪中期，保加利亚的统治者鲍里斯一世[323]（Boris，852—888 年在位）正考虑与法兰克人结盟，862 年，他与日耳曼的路易在多瑙河畔的图尔恩（Tulln）会晤，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865 年，鲍里斯与拜占庭缔结了和约，他接受了来自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洗礼，但是鲍里斯继续与罗马密谋，他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对罗马教会的教义和礼拜仪式提出了 106 条质疑，结果导致了教皇尼古拉斯二世著名的“回信”。拜占庭又派遣以圣克雷芒·斯拉文斯

[322]

保加尔派（BOGUMIL）

975年，皇帝约翰·兹米西斯（John Tzimisces）把一批亚美尼亚的异教徒迁徙到保加利亚的色雷斯（Thrace）的腓力普波利斯（Philipopolis）普罗夫迪夫（Plovdiv）。他们就是“保罗派”，是较早时期被拜占庭人镇压的一场较大运动的残余。与此同时，东正教会正在注视着一位保加利亚教士保加尔的信徒，保加尔的行为疑似为保罗派。他们都是二元论者，是诺斯替教派和（非基督教的）摩尼教徒传统的继承人。保罗派和保加尔派混合起来将创立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的信徒将分布于“从黑海到比斯开湾”的欧洲各地。[1]

保加尔斯塔沃（Bogumilstvo）呼吁巴尔干半岛受压迫的斯拉夫农民反对希腊或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保加尔派将发展为两个支派，其中主要的支派是保加利亚派，较小的支派是达拉格夫提派（Dragovitsan），得名于马其顿边境的一个村庄，那里是保罗派二元论教义的发源地。这种新信仰被“保加尔人巴塞尔”传播到君士坦丁堡，他的许多忠实信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十二世纪中期它再次出现了，当“错误的主教”被开除，和一位同情保加尔派的主教被迫辞职时。

保加尔派在关于原罪等问题上与东正教出现分歧。保加尔派拒绝接受《旧约》中的创世记故事，认为世界是由上帝的长子撒旦创造的。他们也反对基督的奇迹，只把它们作为含有寓意的故事，他们反对圣餐礼、圣像、斋戒节和东正教的全部礼拜仪式。他们特别憎恨十字架，因为它是谋杀基督的刑具。他们认为上帝通过允许撒旦保持被创造的世界而显示自己的愤怒，他们还认为上帝派遣第二个儿子耶稣而引起了各种疾病。作为“圣经”化身的耶稣“通过圣母的耳朵而进入童贞女的腹中，在腹中变成肉身，又从圣母耳朵中诞生出来。童贞女没有觉察到这些，但是在伯利恒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他。他长大成人并教导人们，通过表面上的死亡而能够堕入地狱并束缚撒旦。”

对当时的人来说，保加尔派的宗教活动是很怪异的。保加尔只诵读《圣经》的部分内容，特别是赞美诗、先知书、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启示录等。他们惟一的祈祷词是“我们的天父”，每天念诵120遍。他们实行禁食和消极的婚姻，奉行“选民”的精英等级制度的传统。“赤脚西里尔派”（Cyril the Barefoot）实行裸体，希望以

此重返伊甸园。另一派则遵循布道者提奥多修斯（Theodosius）的教导，沉迷于饮酒作乐，故意体验原罪，以便获得忏悔的资格。在政治事务方面，所有的保加尔派教徒都消极而冷漠地对待国教。

虽然十三世纪拜占庭和保加利亚都力图消灭保加尔派异端，但是它已经传播到西欧（见原书第 361—363 页），并在巴尔干其他地区扎根。十四世纪，它甚至渗透到阿索斯圣山。但是最大的成功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封建小国中，它们的统治者选择宣扬保加尔派信仰作为抵制匈牙利天主教和塞尔维亚东正教的解毒剂。1199 年，波斯尼亚的巴恩（Ban）和他的宫廷自称为“帕塔伦尼”（Patarene），这是波斯尼亚的保加尔派对自己的称呼。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直到 1463 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为止，波斯尼亚都是以帕塔伦尼派为主，到这时，波斯尼亚贵族很快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因而避免了再次陷入天主教或东正教。[**萨拉热窝**]

有些学者曾经认为斯拉夫人由于异教的二元论思想而倾向于保加尔异端教派。十二世纪吕贝克的赫特莫德（Hetmold）报告说，德国北部的斯拉夫人崇拜一个善良的神和一个凶恶的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现象完全是地方性的。异教的斯拉夫人更加可能受到保加尔派教义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巴尔干的民间传说也是如此。

二元论的保加尔派有许多名称，除了保加尔派，达拉格达拉格夫提派和帕塔伦尼派外，还有 Phundaites 或 scrip - bearers’，Babuni（在塞尔维亚），Runcarii 或 Runkeler（在德国），Kudugers（在十五世纪的马其顿），Poplicani（在法国北部），Bougres，Textores 或 Tisserands 或“纺织工人”，阿尔比派，在朗格多克则被称为纯洁派或卡特里派（Cathars）。[3]

保加尔派的教义被称为“毫无希望的信仰”。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它的信徒将用特别顽强来代替希望。

基（St Clement Slovensky）为首的传教团到保加利亚传教，最终使保加利亚倒向了东正教。马其顿人克里门特曾经跟随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到摩拉维亚传教，是西里尔对斯拉夫人传教事业的接班人，可能是他把旧斯拉夫人礼拜仪式的语言与西里尔字母系统化。他是保加[324]利亚教会的第一任主教，死后被埋葬在奥赫里德（Ochrid）的圣潘塔莱尼昂（St Pantaleinion）修道院。893 年，镇压了反对基督教的异教徒后，沙皇西米恩在普雷斯拉夫的宫廷开展了对基督教学术的真正探讨，旧斯拉夫教会现在变成了重要的学术场所。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

拥有7个主教区：奥赫里德、普里斯卡（Pliska）、内塞伯尔（Nesebar）、撒尔底迦（Sardica）、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和普雷斯拉夫。

与摩拉维亚一样，拉丁教会和东正教会在波希米亚的影响长期势均力敌。九世纪，波希米亚王子的拥护者分裂为两股敌对势力——亲法兰克派和亲摩拉维亚派。波里沃伊（Borivoj，855—891年在位）及其夫人卢德米拉（Ludmila）在布拉格城堡山建造了拉德康尼（Hradcany）小教堂，接受了摩拉维亚礼拜仪式的洗礼。波里沃伊的后继人斯普泰内斯普泰内（Spytygner，893—915年在位）在巴伐利亚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接受洗礼而成为拉丁基督教的信徒。瓦茨拉夫（Vaclav，900—929年在位）更以圣瓦茨拉夫（St Wenceslas）著名，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拉丁人和斯拉夫人史书的称赞，他在位时正是马扎尔人杀戮的高峰，他被弟弟波里斯拉斯一世（Boleslas Ⅰ，929—967年在位）所谋杀，波里斯拉斯一世谋求发展与德国萨克森公爵更紧密的关系。作为一个适合时宜地成为不断增强的德国影响的殉道者，圣温切斯拉斯成为捷克民族的圣徒。当967年设立布拉格主教区时，它附属于美因茨大主教区，因此反映了新建立的奥托帝国的实力。圣阿德尔伯特（Adalbert，956—997年在位）成为它的第二任主教。

但是在普雷迈斯里德（Premyslid）王朝的保护下，在一个多世纪里，波希米亚的斯拉夫礼拜仪式一直与拉丁教会的礼拜仪式并存，特别是在萨赞那（Sazanar）修道院，斯拉夫学术团体十分活跃，他们与基辅和克罗地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091年，作为一种挑战，国王拉提斯拉夫二世（Vratislav Ⅱ）按照斯拉夫教会的仪式，由萨赞那修道院最后一任院长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加冕仪式。因此，波希米亚的拉丁化基本上完成了。作为帝国的一块封地和德国教会的一个附属行省，波希米亚是被牢固地纳入德国势力的斯拉夫人国家。

波希米亚的东部邻国波兰也是经历了同样复杂而长期的皈依基督教过程。九世纪，当“维斯杜拉部落”效忠于摩拉维亚时，他们就与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的传教团接触过，875年，维斯杜拉部落的头领似乎接受了斯拉夫礼拜仪式的洗礼，考古人员也发掘了这个时期的几座基督教教堂遗址。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上维斯杜拉地区直到990年仍然是波希米亚的一部分，1086年才最终与捷克发生联系。有的学者不重视波兰与斯拉夫礼拜仪式的早期接触，但是正如在波希米亚一样，他们认为直到十二世纪波兰才采用斯拉夫礼拜仪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18]

北部地区的大多数部落将成为波兰第一王国的核心，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直到十世纪中叶，他们仍然是异教徒，此后他们被直接纳入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对斯拉夫人异教徒最后阶段的最完整

描述是北非犹太人易卜拉欣—伊本—贾克布（Ibrahim - Ibn - Jakub），大约965年，他被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派遣出使中欧地区，他访问过布拉格，还可能到过克拉科夫：

“斯拉夫人的土地从叙利亚海延伸到北部的大海……现在那里有[325]四个国王：保加尔人国王；福拉加（Faraga）、波希米亚和卡拉科（Karako）的国王波雅斯拉夫（Bojeslav）；北部国王麦斯科（Mesko）；西部边区的国王纳康（Nakon）。

一般说来，斯拉夫人性格暴烈，好勇斗狠。如果不是内讧，那么没有哪个民族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农业生产……他们的陆地贸易路线到达吕腾尼亚（Ruthenians）和君士坦丁堡……

斯拉夫妇女结婚后就不会被判处通奸罪。但是如果一个姑娘与一名男子坠入爱河，那么她就必须设法满足他的性欲。如果一个男子与一名姑娘结婚后发现她还是处女的话……那么他就会对她说，‘如果你有什么优点，那么你就肯定已被人夺去了贞操’，然后打发她回娘家。

斯拉夫人地区非常寒冷，当月亮皎洁和白昼出太阳时，那就一定会出现最严重的霜冻……当人们呼吸时，他们的胡子就会冻成冰柱，好像玻璃丝一样……

斯拉夫人没有浴室，但是他们建造了一种石头火炉，加热后，他们就往炙热的石头上泼水，然后拿着一束草驱散水蒸气，直到他们的毛孔张开，多余的物质从体内排出，这种简陋的小屋叫做‘阿里斯特巴（Al - istba）’……

斯拉夫人的国王乘坐四轮大马车到处巡游，马车上用绳子悬吊一张躺椅，以便国王不受颠簸劳顿之苦……

斯拉夫人与拜占庭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民族经常交战……”[19]

有趣的是，易卜拉欣—伊本—贾克布似乎认为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可能因为罗斯人仍然被当做“北方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位来自穆斯林西班牙的使者用现代人类学家观察巴布亚部落的眼光观察了这些欧洲内陆的民族。

965年，易卜拉欣—伊本—贾克布访问的同年，居住在瓦尔塔河（Warta）畔的波兰王子梅什科一世（Mieszko Ⅰ）与捷克结盟，作为盟约的一部分，他与捷克公主杜布拉维卡（Dubravka）结婚，并接受基督教洗礼。迫于打败了马扎尔人后的萨克森帝国的压力，梅什科一世承认来自德国的基督教。在桑多梅日（Sandomierz）建立了一个斯拉

夫礼拜仪式主教区之后，又在波兹南（Poznan）建立了一个拉丁传教区，从而避免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依赖。30年后设立了基督教“波兰”行省与迅速巩固的波兰国家联系在一起。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于1000年访问新建立的格涅兹诺（Gniezno）大主教区，并把波兰王子当做他的“盟友”时，梅什科的“大波兰”已经与南部的“小波兰”统一起来了，缅济热奇（Miedzyrzecz）和泰尼克（Tyniec）已经建立了本尼狄克修道院。1003年，“勇士”波勒斯劳·克罗布里（Boleslaw Chrobry，992—1025年在位）攻占了布拉格，1018年，他用宝剑切开了基辅的“金大门”，罗马教皇为他戴上了波兰的第一顶王冠。103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异教徒叛乱标志着旧秩序的终结，波兰的首都被迫迁移到克拉科夫，皮亚斯特（Piast）王朝逐渐使波兰成为天主教的东部边界。

[326] 匈牙利的历程与波兰极其相似。它首次接触的基督徒是拜占庭人。大约950年，被俘的希腊修士被任命为“土耳其主教”。但是莱希费尔德战役开始带来了德国的影响。马扎尔王子泽加（Geza，972—997年在位）在975年率领全家按照拉丁教会的仪式接受了洗礼。泽加的儿子圣斯蒂芬（St Stephen，997—1038年在位）通过与巴伐利亚公主联姻和接受来自罗马教皇赐予的王冠而巩固了帝国的边境。就在奥托三世访问格涅兹诺一年后，1001年斯蒂芬就在新设立的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主教区举行了加冕典礼，同年，潘诺哈马（Pannonhalma）修道院就开放了它在缅济热奇的修女院。

所有这些原始王国都是长子继承制国家，一切权利和财富都属于国王。皈依基督教带来了有知识的教士，这被认为加强了这些早期君主制国家的统治。

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基辅罗斯于988年皈依了东正教，罗斯与拜占庭已经保持了一个世纪的紧密关系。第聂伯河贸易、瓦拉几亚人抢掠、草原地区的战争等都为双方提供了接触的机会。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olodymyr或Vladimir，980—1015年在位）是一个“铁石心肠、弑兄篡位、妻妾成群的人”。但是皈依东正教、与拜占庭皇帝巴塞尔二世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等都是说服皇帝雇佣6000名著名的“瓦拉几亚人卫队”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位王子的祖母圣奥尔加（St Olga）曾经皈依基督教，但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前进行过反复比较，他派遣使节到国外了解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互竞争的情况。这些使节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接见，就像当年留普兰德一样，他们对圣索非亚大教堂留下了深刻印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直到这时基辅王子才接受了基督教。他命令全体臣民来到第涅伯河进行集体洗礼。他把贵族的孩子集中到宫廷，用新的基督教信仰教育他们。后

来传教士被派遣到基辅罗斯，教授各种在保加利亚被圣克雷芒通俗化了的东正教教义，还利用旧斯拉夫教会的礼拜仪式、西里尔字母以及忠于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教堂被建立了，异教徒的神龛被捣毁了。十世纪早期，基督教传播到诺夫哥罗德、明斯克和波洛茨克（Polotsk）。因此，罗斯人成为基督教世界中坚定的成员。[**诺夫哥罗德**]

[327]

诺夫哥罗德（NOVGOROD）

古代诺夫哥罗德位于冰冻地区的中心，因此完全是用木头建造起来的城市——木头房子、木头教堂、木头铺设的街道、木头下水道、甚至白桦树皮制作的书写体系。诺夫哥罗德起初是伏尔加河畔的一个贸易据点，位于里海—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的最北端。木材一直是它的大宗商品之一。

当诺夫哥罗德城于1951—1962年被完全发掘出来时，在一件中世纪考古展品中，一种“树木年轮断代法”的科学提出了重大的挑战。长期积水的土地保存的木材出奇的好，由A·V阿提科夫斯基（A. V. Artikhovsky）和B.A.科尔钦（B. A. Kolchin）带领的考古队在第13个季节时发掘了一个9000平方米的遗址，出土了1150座木头小屋。最令人惊奇的是，至少有28层木头街道楼梯被找到了原来的街道中心，从1462年的第一层到最早的953年的第28层。总体上看，五个世纪里，每18年道路就被更新一次，把新一层松木放在旧的被车轮碾压和滑雪橇者磨损造成的木头上。大量的货币窖藏——其中两个来自八世纪中亚——表明，诺夫哥罗德的长途贸易联系从未中断过，即使在蒙古人入侵时期。

在400个白桦树皮写的信件中，只有一块保存得最好的是用早期俄罗斯文字形式写成的。在第五层（1409—1427年）中发现的编号为第17号信件中，诺夫哥罗德城外的地产管家给他的主人写道：

“米哈伊尔（Mikhail）向主人蒂莫西（Timothy）致敬。土地已经整理好了，我们必须播种。主人，请您来吧，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有您的命令，我们就不敢播下裸麦种子。”[1]

在第12—13层（1268—1299年）之间发现的编号为第37号文

献残篇中，有一个提亲的建议：

“尼基塔（Nikita）致乌尔扬察（Ulyanitsa）。请娶我吧，我想要你，你也想要我。伊戈纳提奥（Ignatio）将作为媒婆来提亲。”[2]

走在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的木头街道上，它的居民是被莫斯科的代理人所屠杀的，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俄罗斯在这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的领导下发展起来，那么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显然，一个诺夫哥罗德式的俄罗斯将大大地不同于一个战胜了竞争对手的莫斯科人的俄罗斯。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无论如何，中世纪考古学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线索。

人们常常把基辅王子弗拉基米尔与查理曼相提并论，查理曼是另一个广大而短暂的王国的创建者。[20]这种类比是恰当的，因为他们后来都被尊崇为民族史诗中的英雄。当然，罗斯人的弗拉基米尔不是俄罗斯人，正如法兰克人的查理曼不是法国人一样。“俄罗斯”这个名称在当时并不存在，正如“法兰西”在查理曼时代也不存在一样。遗憾的是，当俄罗斯东正教教会500年后登上历史舞台时，它武断地声称自己全盘继承了基辅罗斯的遗产；现代俄国大肆宣扬自己的力量高于其他[328]民族，尤其是乌克兰民族的传统。与此同时，正如查理曼在《查理大帝传》中被美化为民族英雄一样，神圣的“弗拉基米尔王子”也被美化为中世纪罗斯“壮士歌”（Byliny）中的主要人物。罗兰、奥立佛、特平主教在阿廖沙·波波维奇（Alyosha Popovich）、多勃雷纳·尼基季奇（Dobryna Nikitich）和勇敢的农夫伊利亚·波波维希（Ilya Popovich）——“我们可爱的小太阳”中的次要人物——中都有自己的原型。没有人敢比假圣徒那样大声地嘲笑这个称号了。（见原书附录Ⅲ，第1249页）

斯堪的纳维亚也经历了长期斗争才被纳入基督教世界。从八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个被派遣到斯堪的纳维亚传教的主教就在不来梅（Bremen）积极地传教。但是维京人的生活方式与《福音书》格格不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三个王国的每个宫廷里都有强大的异教徒派系。大约960年左右，丹麦的哈拉尔德·布鲁图斯（Harald Bluetooth，940—986年在位）接受了基督教，设立了奥胡斯（Aarhus）和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两个主教区之后，他被人民赶下了台。他的儿子斯威因·福克布拉德（Swein Forkbrard，985—1014年在位）以前是抵制基督教派系的领袖，现在变成了使丹麦人基督教化的首领。在统治着丹麦和英格兰的卡努特大帝（1016—1035年在位）时期，盎格鲁—撒

克逊的传教士开始到斯堪的纳维亚传教。

在挪威，故事也是由两幕组成。第一幕是奥拉夫·特里格维森（Olaf Tryggvason，995—1000年在位）犹豫不决；第二幕是奥拉夫·哈拉尔德森（Olaf Haraldson，1016—1028年在位）通过贿赂、威胁和狂热等手段而获得了成功。第二个奥拉夫在反对丹麦人入侵时被杀，葬在特隆赫姆（Trondheim）大教堂，很快就被称为民族的圣徒。在瑞典，奥拉夫·斯库孔隆（Olaf Skutkonung，约995—1022年在位）于1008年接受了洗礼，但是由此引起的异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分裂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像圣奥拉夫、圣埃里克和被暗杀的丹麦的圣卡努特三世一样，圣埃里克（1160年战死疆场）终于被尊崇为基督教信仰的殉道者。十二世纪四十年代，红衣主教的特使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在特隆赫姆、乌普萨拉（Uppsala）和隆德（Lund）都建立了大主教区，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是后来当选为教皇的惟一英国人。[**埃里克**]

从瓦茨拉夫到埃里克等民族圣徒国王的非神圣特征也许表明了皈依基督教的表面性，但是它也确实展示基督教被用于加强民族感情的过程。在这些新信徒国家中，只有波兰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位圣徒或殉道者国王，但是波兰产生了一位殉道的主教。克拉科夫脾气暴躁的主教斯坦斯劳·斯泽潘诺斯基（Stainislaw Szczepanowski，1030—1079年）蔑视国王的骑士，这些骑士在一座祭坛前把他乱剑分尸。他的死为英国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树立了一个离奇的榜样，标志着拉丁基督教会势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后来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后来，这件事被当做罪孽深重的波兰王国分裂成互相争斗的封建领地的象征。

[329]

埃里克（EIRIK）

1075年前的某个时候，卡努特大帝的侄子、国王斯维因·乌尔夫森（Svein Ulfsson）接待了一个从格陵兰到丹麦来的名叫“奥登”（Audun）的人，他给乌尔夫森进贡了一头北极熊。这个插曲被记载在《奥登的故事》的传奇中。此后不久，国王接见了日耳曼教士不来梅的亚当，亚当正在为写作汉堡大主教的传记而收集材料，当时斯堪的纳维亚正处于汉堡大主教的统治之下。根据亚当的记载，国王告诉他说，“这个海洋中还有另一个岛屿，许多人已经发现了它，并称之为‘温兰’（Vinland），因为那里生长着野葡萄，能够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此外，那里还有大量的野生谷物。”[1]

这是欧洲人最早提到北美洲。大主教的证据，尤其是来自北部纽芬兰群岛的证据证明了一个事实，北欧人确实建立了大西洋彼岸的居住地。[2]

对“结冰的海洋”的探索持续了几个世纪。八世纪爱尔兰人就已经知道了冰岛，大约870年，北欧人开始在那里定居。格陵兰群岛在约985（6）年接受了它的第一批殖民者前80年就被发现了，这个时间也被作为发现温兰的时间。[3]

这些探险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是“红色的埃里克”（约940—1002年）。埃里克在一系列谋杀活动后离开故乡挪威的杰德伦（Jaederen），当他的奴隶们成功地毁坏了邻居的农场时，埃里克在冰岛开始结下了冤仇。在索恩斯（Thorness）的冰岛民众大会宣布放逐埃里克，他向西海岸航行去寻找一个可以定居的岛屿，他“称之为格陵兰，以便吸引其他人前往那里”，这发生在公元1000年冰岛正式皈依基督教的前15年。1001年，埃里克的幼子“幸运的”利夫·埃里森（Leif Ericsson）从格陵兰出发以验证西边土地的报告，返航时，他描绘了“厚厚的土地”（可能是巴芬岛）、“森林覆盖的土地”（可能是拉布拉多）和令人困惑的“葡萄之地”。正是利夫的水手、日耳曼人泰克尔（Tyrkir）发现了葡萄，正是埃里克的儿媳妇的富有的第二任丈夫索芬尼·卡尔瑟夫尼（Thorfinn Karlsefni）和格特里德（Gutrid）两次组织了探险，以便在美洲海岸寻找永久的定居地。埃里克的私生女弗雷迪斯（Freydis）也两次光临温兰。第一次，据说她用双乳阻挡击退了印第安人的进攻，第二次她谋杀了所有的同伴。1009年秋，卡尔瑟夫尼的妻子格特里德，埃里克的长子索尔斯坦（Thorstein）的遗孀在温兰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斯诺里（Snorri），这是第一个在美洲出生的欧洲人。

温兰的准确位置引起了无休止的学术争论。现在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它是纽芬兰群岛和朗索草地（L'Anse - aux - Meadows）之间的一 [330] 个地方。泰克尔发现的“欧洲越橘”可能是野生的曼越橘，“野生的小麦”可能是欧宾麦草。这个问题产生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在这些轰动一时的事件中，人们必定列举公元1001年古代北欧文字的碑刻，它是1920年被某个爱开玩笑的人刻写在玛撒（Martha）葡萄谷的一块大石头上的，1965年耶鲁大学绘制了温兰的地图。[4]

主要史料仍然来自北欧的传说，特别是格陵兰丁（*Graenlandinga*）传说（1190年左右）、埃里克的传说（1260年左右）和艾兰丁布克 *Islandingabòk*（1127年左右）。后者是一个主教撰写的冰岛人历史，这位主教是斯诺里·卡尔瑟夫尼森（Snorri Karsefnisson）

的长孙。[5]

除了冰岛外，北欧人最远的定居地都没有保留下来。温兰在几十年后就被废弃了。格陵兰群岛一度靠海象、毛皮、猎鹰的贸易而繁荣，但是在十四世纪也衰落了。软骨病和不断恶化的气候夺取了他们的生命。1410 年，最后一艘从格陵兰群岛来的船只到达冰岛。不久，最后一个格陵兰群岛的北欧人也消失了，“没有丧钟，没有棺材，没有人知道”。[6] 他的冰冻的尸体或他的最后一个同伴的尸体于 1586 年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探险家约翰·戴维斯（1550—1605 年）在格陵兰海岸附近发现。像 600 年前的“红色埃里克”和利夫·埃里森一样，戴维斯正在向西北航行，在“大通道”之外的神秘土地上寻找自己的幸运。[7]

在漫长的第二次皈依基督教过程中，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处于对峙的状态中，双方既很少合作，也没有出现正式分裂。但是十一世纪中期，分裂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043 年，迈克·克鲁拉里奥斯（Michael Kerullarios）当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与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行省总督发生了争端，他下令关闭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拉丁教堂，并写信给各地的拉丁主教，谴责他们的分裂行为，特别是在圣餐礼中使用不发酵的面饼的做法。与此同时，罗马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 年在位）已经实行了五年的铁腕统治，他当选教皇前的俗名为布鲁诺·冯·伊格谢姆（Bruno von Egisheim），是图勒（Toul）的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堂兄。教皇利奥九世被自己强烈的使命感所驱使，他宁可容忍西欧的主教和国王滥用权力，也不能忍受希腊教会大教长的辱骂。1054 年 1 月，教皇派遣以红衣主教亨伯特·德·摩因穆提尔（Humbert de Moyenmoutier）为首的代表团出使君士坦丁堡，授意他们取得希腊教会对罗马教皇至高无上权力的承认。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拒绝承认这个代表团的权力，并发表了挑衅性的声明，向代表团施加压力。不久，教皇利奥九世去世。7 月 16 日，代表团把一封教皇通谕放在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祭坛上，宣布开除大教长的教籍。这种侮辱是不可饶恕的。希腊教会的一位长老受命谴责拉丁异端，并宣布开除教皇代表团的教籍。[弥撒]

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从来没有弥合过，这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大丑闻。1054 年后，不仅存在两个自命为普遍的基督教帝国，而且存在两个自命为普遍而正统的基督教会。300 年前，欧洲的主要分界线是南部的基督教地区与北部内陆地区。1054 年后，欧洲的分界线为西部的天主教地区和东部的东正教地区。（见地图 3）

[331]

弥撒（MISSA）

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从五世纪起，圣歌、赞美诗、宣讲、讲道、应答歌、雅歌、短祷为形式的礼拜活动就开始使之具体化。圣本尼狄克使“礼拜活动”制度化，它使修士们能够背诵150首赞美诗，每天一首。特鲁瓦（Troyes）主教普鲁登休斯（Prudentius，卒于861年）被委托总结早期的礼拜仪式文献。

基督教最神圣的圣餐礼弥撒晚些时候才有了确定的形式。弥撒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圣餐礼”或“感恩仪式”，“领圣餐”或“主的晚餐”的纪念等，习惯上弥撒与其他的礼拜活动分离开来。最早的弥撒起源于十世纪，教士为面包和葡萄酒——基督的肉体和鲜血——祝圣并分发给参加弥撒的信徒是领圣餐礼的中心环节。十三世纪到1965年，罗马教会规定只能由主持弥撒的教士才能拿葡萄酒杯。但是现在，像起初一样，它提供“两种领圣餐仪式”。宗教改革时期，圣餐礼的神学含义，特别是托马斯主义者的“转体说”引起了重大的争论。

使弥撒的关键部分伴随音乐进行的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后果。语言根据场合而变化的特定礼拜仪式通常是被背诵或唱出来的。它们包括圣餐礼前唱的歌曲、赞美诗歌、奉献歌曲和领圣餐圣歌。但是礼拜仪式次序书是各不相同的，从而打开了精心的音乐发明的道路。礼拜仪式次序书包括：“上帝拥有怜悯之心”，这是从太阳神崇拜借鉴过来的古代祈求仪式；“光荣属于至高无上的上帝”，这是一首在四旬节期间省略的圣歌；“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这是一首崇拜的赞美诗；圣餐礼的序曲，“赦免人间罪行的上帝的羔羊”，最后是“走进和平，弥撒结束”。

先是用两种或更多的声部，后来用带乐器伴奏的唱诗班来宣唱宗教仪规，这是对中世纪复调音乐的一个重大挑战。完整的弥撒组曲是由圭劳姆·德·马肖特（Guilaume de Machaut，卒于1377年）创作的，相似的组曲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常见的。超级大师当然是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卒于1594年）及其同时代的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1543—1623年），后者是一个为安立甘教会服务的天主教徒。帕莱斯特里纳高度原创的《教皇马塞二世弥撒书》（*Missa Papae Marcellae*，1555年）是遵照特兰特宗教公会议的指示而创作的，使歌词获得最大限度的阐发。[**圣歌曲调**]

弥撒对音乐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正如魔法改变了祈祷仪式的精神和审美效果一样，弥撒的合唱和乐器演奏深刻地影响了欧洲 [332] 音乐传统。“祈祷文是音乐进入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史的大门。”

J. S. 巴赫创作的伟大的B小调弥撒曲（1738年）开创了弥撒的音乐演奏与宗教仪式分离的新时代。海顿创作了14首这种弥撒曲，其中包括《鼓号弥撒曲》（Drum Mass，1796年）和管弦乐弥撒曲（Wind - Band Mass，1802年）。莫扎特创作了18首弥撒曲，包括《庄严弥撒曲》和未完成的《安魂弥撒曲》（1791年）。贝多芬的《D大调庄严弥撒曲》被认为是一系列弥撒曲中的巅峰之作，后来李斯特、古诺（Gounod）、布鲁克纳（Bruckner）和雅那切克（Janáček）等浪漫主义大师创作的弥撒曲就是追随贝多芬。二十世纪，弥撒曲从基督教信仰淡化和传统音乐形式分化中幸存下来。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以尼采的反宗教词句为基础创作了合唱的《生命弥撒曲》（1909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合唱和管乐弥撒曲（1948年）模仿马肖特而利用了新的复调技巧。

但是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里每天都能够听到唱和不唱的弥撒曲。来自弥撒曲的宗教传统和音乐风格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二、1054—1268年

在维京人和马扎尔人时代，西欧和中欧经历了动荡和骚乱，东部则经受了塞尔柱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破坏。的确，从十一世纪后期起，拉丁基督教世界进入了一个改革和复兴的时代。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时期。正如十字军东征所表明的，这两种趋势不是没有关联的。

东西方教会分裂时期，拜占庭帝国被边境战争所引起的动荡和宫廷阴谋所折磨。将军们的叛乱、大教长的野心、皇后的阴谋等不比诺曼人在意大利、多瑙河的佩切涅格人和亚美尼亚的塞尔柱突厥人所造成的分裂少。1057年，年迈的皇后提奥多拉去世，马其顿王朝的统 [333] 治终结，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帝国感到不安。

1301年，塞尔柱突厥人渡过奥克苏斯河（Oxus，也称为阿姆河），到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就占领了波斯地区，六十年代则占领了亚美尼亚，1070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并且几乎要攻陷巴格达。塞尔柱突厥人的苏丹、号称“伊斯兰教复兴者”的图夫里尔·贝格（Tughril Beg，1038—1063年在位）和阿尔普·奥斯兰（Alp Arslan，1063—1072年在

位）激发了好战精神，调动了各种追随者的力量。他们的随从包括波斯的行政官员、希腊顾问和许多哲学家、数学家和诗人：

"醒来吧，黑夜已经过去
清晨的石块已经使星辰转动；
看啦！东方的猎人已经
点燃了苏丹的塔楼。

树枝下的一条面包，
一瓶葡萄酒，一册诗集，
坐在我身旁的你，在旷野中歌唱，
旷野就是天堂。

在昼夜的棋盘上
人们的命运行走着，
来回移动，或结成伙伴，或互相杀戮
一个接一个躺进了棺材。"[21]

奥马尔·卡雅姆（Omar Khayyam，1048—1131年）的波斯诗歌被翻译成英语文学，是受人喜爱的作品之一。阿尔普·奥斯兰统治时期，奥马尔是塞尔柱宫廷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制定者，也是塞尔柱人最大的胜利的谋划者。1071年8月19日，塞尔柱人在凡湖（Lake Van）附近的曼兹克特（Manzikert）与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展开激战，拜占庭军队被彻底打败，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Ⅳ）被俘，帝国的小亚细亚地区被塞尔柱人占领，从此成为突厥人总督的基地。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和经济资源急剧减少。

拜占庭从此一蹶不振，皇帝全力保卫日益缩小的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塞。塞尔柱人也遭到了失败，他们很快便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转移到埃及法蒂玛王朝的什叶派手中，各个总督之间的争斗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喘息之机。康尼努斯王朝年轻气盛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在位）依靠勇气和值得怀疑的财政手段如没收教产等而维持了帝国。他驱逐了盘踞希腊的诺曼人，恢复了对庞廷（Pontic）到爱琴海沿岸一带的统治。但是恢复原来的实力是不可能了。在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1143—1180年在位）统治下，出现了"康尼努斯王朝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学术研究、神学和建筑艺术方面。但是重新统一罗马或征服埃及的计划化作了泡影。在曼努埃尔的宫廷中，拉丁人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大的摩擦，特别是与威尼斯人之间的摩

擦。荒淫无度的安德罗尼卡·康尼努斯（Andronicus Comnenus，1183—1185年在位）被暴民折磨而死。拜占庭帝国表面上仍然是伟大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基督教世界最富庶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它的对[334]外贸易、它的庆典活动、它的宗教虔诚仍然保持下来了，直到1204年，拜占庭帝国才遭到致命的一击。

拜占庭的灾难给斯拉夫人国家的东正教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罗马教皇在西欧实行的政策不同，希腊教会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控制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或基辅人。曼兹克特战役后，巴尔干人再次陷入骚乱之中。1090年，佩切涅格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直到1122年才撤兵。为了在西北部的塞尔维亚抵制马扎尔人的进攻，拜占庭必须进行长期的战争。1186年，保加尔人重新创建了他们的“第二帝国”。

基辅罗斯倒可以自行其是。圣弗拉基米尔的继承人“智者”雅罗斯拉夫（Jaroslav，1019—1054年在位）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红罗塞尼亚（Red Ruthenia），打败了佩切涅格人，并派遣海军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当他去世时，基辅罗斯分裂成许多好战的封建领地——西部是哈里茨（Halicz）和沃里尼亚（Volhynia）；南部是基辅、特洛夫（Turov）和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北部是诺夫哥罗德、波罗茨克、斯摩棱斯克；伏尔加河上游是特维尔（Tver）、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Vladimir - Suzdal）和梁赞（Ryazan）。拜占庭在基辅罗斯的分裂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波兰王国不在1138年后也走向长期内部分裂的话，那么它一定也会趁火打劫。斯拉夫人的原始王国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很久就已经陷入混乱之中。

东斯拉夫人之间的分裂现在变得明显了。基辅仍然是商业和宗教中心，但是它经常容易受到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和波洛维茨人（Polovtsians）的袭击，完全失去了政治控制能力。十二世纪，“乌克兰人”的名称（意思是在边界上或边境）首次用来指基辅周围地区。1140年，哈里茨（Halicz）首次和沃西尼亚（Volhynia）被归并于罗曼诺夫（Romanowicz）王朝。丹尼尔·罗曼诺夫（Danil Romanowicz，1235—1265年在位）接受了教皇特使送来的王冠，但是后来他又宣布脱离基督教。根据编年史记载，他教促人民反对波雅尔（boyars）贵族。人们告诉他：“要想吃到蜂蜜，必先杀死蜜蜂。”

罗斯东北部的封建领地吸引了大量农民迁徙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区，这有助于城市的发展。莫斯科河畔的莫斯科城居民于1146年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中。1169年，弗拉基米尔王子安德列·波雅斯基（Andrei Bogulyusky）势力强大，足以攻陷基辅城。1185年，塞维尔（Sever）的伊戈尔（Igor）王子率领大军发动了著名的反对波洛维茨人的远征。诺夫哥罗德城从1126年起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它的自由市民集会“维赫”（Veche）选举主要的行政官员和大主教，制定法律限制王子的权力，北方地区的广大领土，远至北海的大天使圣迈克尔修道院都臣服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弗拉基米尔（Vladimir）和诺夫哥罗德的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220—1263年在位）在涅瓦河（Neva）战役驱逐了瑞典人（1240年）和在佩普西湖（Lake Peipus）的冰面上打败了条顿骑士团。**[诺夫哥罗德]**

[335] 拜占庭衰落的另一个受益者是新兴的匈牙利王国。由于受到北部喀尔巴阡山脉天然屏障的保护，又远离君士坦丁堡和神圣罗马帝国，所以匈牙利能够在不招致严重反对的前提下巩固对多瑙河流域的占领。1004年，匈牙利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1089年后，又控制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打开了一条通向海洋的重要通道。十二世纪，匈牙利兼并了风景优美的山地行省波斯尼亚。在所有周围领土中，包括上匈牙利（Slivakia），信仰拉丁基督教的马扎尔贵族被安置在居住着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广大土地上。在东部边境，漫长的军事防御地区居住着大量被征服的库曼人（Cumans）。异教被根除了。“战士国王”圣拉迪斯拉斯（1077—1095年在位）和他的侄子科尔曼一世（Coloman Ⅰ，1095—1116年在位）统治时期，他们都与君士坦丁堡保持了紧密的联姻关系，圣斯蒂芬的任务被完成了。早在1222年，在安德列二世的“黄金诏书”中，匈牙利国王确认了贵族和高级教士的豁免特权，他们都是全国集会的成员，并被赋予拥有反抗的权利。

拜占庭的撤退也导致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的重大变化。以九世纪以来就繁荣的卡尔斯（Kars）附近的安尼（Ani）为基础的大亚美尼亚的巴格拉提德（Bagratid）国家被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许多亚美尼亚人被迫逃亡，一些人甚至到达遥远的波兰。在南部，以前的西利西亚行省兴起了一个不重要的国家“小亚美尼亚”，它存在了三个多世纪。[22]但是格鲁吉亚（Georgia）获得了自由：在革新者大卫（David the Renovator，1089—1125年在位）统治下，驱逐了在第比利斯（Tbilisi）的塞尔柱突厥人。在女王塔玛拉（Tamara，1184—1213年在位）统治时期，宫廷文化十分繁荣，当地的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文化互相交融。在希腊受过教育的诗人肖·鲁斯塔维里（Shot'ha Rust'aveli）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他的史诗《虎皮武士》题献给女王塔玛拉，被乐观地称为“第一缕文艺复兴气息”。[23]

中世纪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乡村的。人们的生活以封建地产和领主与农奴的永久关系为中心。虽然城市的出现无法改变这种总体景象，但它是重要的，不仅对于未来，而且对于商业组织和文化的传播。

修筑了城墙的城市像修筑了围墙的城堡一样，反映了乡村地区治

安混乱。城市的堡垒、城门和钟楼都设计成为避难所。但是城市也培养了不同的社会团体，他们力图取得独特的法律和政治认同。他们在港口和河流的交汇处、市场或伯爵和主教的驻地附近联合起来。许多新兴的城市衰落后退回到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但是到十二世纪，欧洲几个地区正在显示出城市化的活力。意大利的海港城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就是首先城市化的地区。不久，伦巴第、莱茵河流域的许多城市，以及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纺织业城市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弗兰德尔地区的伊普尔、布鲁日和根特等也兴起了。伦敦和巴黎发展成为政治和经济中心。这些城市中人口最多的达到五万或更多，而且[336]还在不断增长。[**节日**]

城市社会标志着市民阶级的形成，市民阶级自发组织起来，反对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重要的是西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摆脱了当时城市之外盛行的封建关系。“自由成了市民的法律身份……不再是个人的特权，而是领土的特权，在城市的土地上世袭。”[24]但是，穆斯林模式的奴隶制度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意大利。各国颁布了特殊的令状处理流动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由地中海贸易带进来的。[**犹太人居住区**]

许多畅通的商路决定了贸易的类型，威尼斯和热那亚从拜占庭帝国取得了与黎凡特（Levant）贸易组织者的地位。北海商路是为了从英国进口羊毛。伦巴第和莱茵河谷地是阿尔卑斯山南北贸易商路的两端。从1180年起，历代香槟伯爵建立了早期自由贸易区，香槟集市成为国际商业的集散地。[**哥特哈德**][**汉萨同盟**]

十一世纪下半期，在西欧许多地区，一系列表面上不相关的革新开始了漫长的历程。各种组织机构正开始成型，权宜之计变成长期计划。

1059年4月14日，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法令，只有红衣主教团才能选举教皇。教皇的目的是坚决维护教皇的独立，避免以前的事情发生，当时两个敌对的派别分别任命了两个敌对的教皇。长期以来，“罗马人民和教士”选举教皇的传统使教皇受到罗马当地政治的严重影响。近来德国皇帝已经声称拥有任命红衣主教的权力。现在教皇正采取必要的步骤摆脱外部的干预。罗马的枢机主教团、罗马教廷和教皇国政府将在后面论述。[**教皇选举会议**]

1059年8月，在阿普里亚的梅尔菲（Melfi），坦克雷德·达特维里（Tancred d' Hauteville）的第四个儿子罗伯特·圭斯卡德被教皇授予了阿普利亚区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公爵和“未来的”西西里公爵的封号，作为交换条件，如果罗伯特公爵能够攻占授予给他的土地，那么他将每年向教皇交纳每普劳兰（ploughland，约合八头牛一年中的可耕面积——译者注）12便士的租税。当时这个协议只是教皇复

杂的外交计划中的一部分。自1017年来到卡拉布里亚后，诺曼冒险者一直遭到罗马的反对。在1054年与拜占庭教会的大分裂中，教皇利奥四世带领一支德国军队成为诺曼人的俘虏。但是现在尼古拉二世决定与诺曼人进行交易。他没有料到达特维里会如此迅速地把计划付诸实施。1060年，他们渡过墨西拿海峡，开始从撒拉森人手中逐步征服西西里的计划。不到10年，他们就占领了巴勒莫，把拜占庭军队从[339]他们在意大利的最后据点巴里（Bari）中驱赶出去。南部的诺曼征服者及时地被合并到“两西西里王国”，它一直存在到加里波第时代。

[337]

节日（FIESTA）

公元1000年，当攻占了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在库佐拉（Curzola）和拉哥斯塔（Lagosta）的军事据点后，威尼斯总督采用了“达尔马提亚公爵”称号，这是威尼斯变成海上强国的第一步。“总督与大海的婚礼”仪式于同年开始举行，在这个仪式上，装饰一新的“刚朵拉”鱼贯而入大运河，这是威尼斯一年一度的“耶稣升天节”庆典的高潮，现在它是每年九月的赛船节的组成部分。

欧洲的历法书中充满了各种节日，这些节日都要举行游行、假面舞会、舞蹈、展览会或游戏。其中许多节日，如荷兰哈勒姆的花车游行，瑞典的仲夏节或慕尼黑的啤酒节等，都是庆祝季节的结束。德国和奥地利各地举行的狂欢节，波兰的焰火节，都是异教遗留下来的传统。法国的葡萄种植者节就是葡萄种植者收获葡萄的节日。

其他许多节日则与宗教有关。在四旬斋前最后一天举行的“狂欢节（谢肉节）”或“星期二烤薄饼”就是尼斯地区家喻户晓的节日，它标志着“大斋期”的前夕。塞维利亚的复活节就举行忏悔者戴着黑色尖顶帽的游行。圣体节（Corpus Christi）是另一个全体基督教证人的节日，像圣灵降临节和圣母玛利亚节（8月15日）一样。在阿尔勒（Arles）附近举行的“大海的圣玛利亚节”，来自许多国家的吉普赛人带着他们的圣母像下海。布鲁日的“圣血节”和布鲁塞尔的“奥梅冈节”（Ommegang）游行就是为了炫耀当地的圣物。

许多节日采取公共竞赛的方式举行。如苏格兰高地的游戏，阿尔勒和尼姆（Nîmes）的罗马竞技场举行的戴帽子游行，潘普洛纳的奔牛节，锡耶纳的赛马节则举行场面壮观的赛马。

但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经常着手纪念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像婚

礼一样，这些历史事件为他们的城市的历史增色：

节日名称	城市	历史事件
摩尔人和基督徒节	阿尔科伊（今西班牙阿利坎特）	1227 基督教的征服
骑士节	克拉科夫（波兰）	蒙古人的袭击（十三世纪）
萨拉森马上比武	阿雷佐（意大利）	撒拉森战争
贞德	奥尔良（法国）	1428 年围攻
皇家婚礼	兰茨胡特（巴伐利亚）	1475 年巴伐利亚—波兰联姻
梯子节	日内瓦（瑞士）	1602 年击退萨伏依的进攻
福克斯日（烟花节）	英国	1605 年的“火药阴谋”
火节	勒维克镇（设德兰群岛）	751 年维京人的统治
豪饮大赛	罗滕堡（德国）	1631 年的围攻
海盗游戏	腓特烈松（丹麦）	1950 年维京人船只的发现

无论古老的还是新设的节日，它们都加强了当地人对过去若干世纪历史的自豪感。[338]

但是没有任何节日可以与伴随军事胜利的节日和游行的规模相媲美。1940 年 6 月，德国纳粹党卫军象征性地穿过巴黎凯旋门，5 年后，在莫斯科红场，纳粹德国党卫军的旗帜高高地堆积在斯大林脚下。几十年来，反法西斯同盟国，而不是德国，每年 11 月 11 日都是民众的“战争纪念日”。

[338]

犹太人居住区（GHETTO）

在许多意大利城市，建筑了围墙和大门的犹太人保留区至少自十一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城市行政官员的观点与犹太人的

宗教律法的一致的结果，因为行政官员要求犹太人单独居住，而犹太人的律法禁止犹太人居住在非犹太人中间。在威尼斯，犹太人社区被称为“希托”（Ghetto），这是“小城市”一词的缩写，或者那里曾经出现过的“铸造厂”一词的缩写。后来欧洲各地都采用了这个名称。主要的犹太人居住区创立于布拉格、法兰克福、的里雅斯特和罗马，1536—1870年，那些城市都维持着犹太人居住区。[1]

但是，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的主要避难所中的正式犹太人居住区不为人知，自1265年起，波兰—立陶宛国王保护犹太人的特许状就开始执行。几个波兰城市，包括华沙都实行不容忍犹太人的法律，这些法律把犹太人排除在城市政府管辖的地区之外。（贵族、农民和国王的官吏同样被排除在外。）结果是引导犹太人居住区到城门附近的近郊的贵族占有的土地上。小规模的犹太人“小城镇”也在庄园周围的贵族保护下发展起来。波兰—立陶宛的犹太人享有地方自治权，在他们居住的四个地方委员会中，他们设立了中央议会。[2]

在波兰被瓜分之前，犹太人不许居住在俄国。波兰被瓜分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俄国的前波兰各省变成庞大的“犹太人居住区”的核心（见原书附录Ⅲ，第1311页）。但是封闭的西欧式的犹太人居住区直到1939—1941年纳粹时期才在东欧建立。

从犹太人居住区逃离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准备逃离的人必须不顾非犹太人和犹太社区的法律和习惯，而且还要冒可怕的惩罚的风险。直到现代为止，正式改宗其他宗教常常是犹太人惟一可行的出路。

在西西里被完全征服之前，教皇决定支持另一个诺曼冒险家。1066年，教皇给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送来了圣彼得的旗帜，并为他远征英国祝福。在罗马看来，这是教皇独立于帝国的另一个支持者。在威廉看来，这是鼓舞他带领军队走向战场的号角。（他后来拒绝了教皇对英国像对西西里那样的要求）。但是幸运再次垂青了冒险家。在等待几个星期后，威廉率兵渡过英吉利海峡，诺曼人在哈斯汀斯向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发动进攻，英国国王哈罗德在北方打败了他的对手挪威的哈罗德，立即返回南部，他对自己再次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但是9月28日，哈罗德在一场战役中阵亡，诺曼人的箭头刺穿了他的眼睛。1066年圣诞节，征服者威廉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称王。像西西里一样，英格兰王国脱离了诺曼骑士之手，转变成一个标准的封建王国。（英国人声称从此以后，英国再

也没有被人征服过。)

1075年3月，新当选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在“教皇至高无上”通谕中宣布了27条主张。他声称拥有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既有世俗权力也有宗教权力废黜所有的国王。不久，在一次宗教集会上，格列高利七世正式宣布开除那些不经过教会批准就擅自把自己的候选人任命为神职人员的国王的教籍。格列高利七世当选为教皇前，俗名为“希尔德布兰”，是托斯卡纳地区的一名修士、前任教皇的主要顾问，他就是按照新的方法由红衣主教团选举出来的教皇。但是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既没有得到通知，更不要说与他协商。皇帝与教皇之间的重大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是“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前奏。

虽然争论中使用了夸张的法学和神学语言，但是“主教授职权之争”实际上就是权力之争。是皇帝控制教皇还是教皇控制皇帝？大家接受的理论是简单的：拉丁基督教世界被两大权威支撑着——以皇帝为首的世俗权威和以教皇为首的宗教权威。但是这两大权威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解释。在帝国看来，教皇应该专注于宗教事务，在教皇看来，正如地球位于天国之下一样，皇帝应该臣服于教皇的意志。希尔德布兰的“教皇通谕”中公开提出了以下观点：

2. 只有罗马教皇才有权利使用“天主教的”或“普遍的”头衔；
3. 只有罗马教皇才能免除主教的职务；
12. 罗马教皇有权废黜皇帝；
16. 只有罗马教皇才能召集全体主教会议；
20. 任何人都不能谴责罗马教廷做出的决定；

[340]

汉萨同盟（HANSA）

当德国殖民者和十字军战士向东到达波罗的海沿岸时，商业利益自然跟随而来。同样，在一个“维京时代”出现的地区，定居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各个港口的商人惟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团结起来以求自我保护。第一个这种“汉萨”或“商业协会”于1161年在戈特兰岛的维斯比（Wisby）成立，称为“戈特兰神圣罗马帝国旅行家协会”。此后一个世纪里，“大海的自由城市”的边远联盟在从大西洋到芬兰湾的港口中发展起来。

汉萨同盟的影响在十四世纪达到顶峰。它包括一系列内部联盟，

它们的代表定期集会以制定共同的政策。最重要的内部联盟是以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维斯马(Wismar)和罗斯托克等城市为基础的 Wendish - Saxon Quarter。威斯特伐利亚集团以科隆为首,立沃尼亚集团起初以维斯比(Wisby)、后来以雷维尔(Reval)为首。这三大集团成为汉萨同盟的核心"三角"。同盟的每个成员城市都有称为"郊区"的依附城市,而汉萨同盟建立了一系列"对外办事处",所有的成员都能从中获得益处。五个关键的办事处被维持着:布鲁日——这是到威尼斯的阿尔卑斯山南北贸易路线的主要终点站;诺夫哥罗德的彼得霍夫(从1229年起);伦敦的"秤街"(1237年);卑尔根(Bergen)的"日耳曼桥"(1343年);斯卡尼亚(Skania)的法尔斯特布(Falsterbo)每年的鲱鱼市场。

汉萨同盟的成员既不局限于德国,也不局限于沿海地区。在不同时期里,先后有200多个城市加入汉萨同盟,它们分布于从西边的迪南(Dinant)到北部的奥斯陆和东部的诺尔瓦(Narva)。主要内陆成员包括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布雷斯劳(Breslau)和克拉科夫。

汉萨同盟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和中央政府,但是它有一大堆法律和习惯,从1373年起,帝国自由城市吕贝克被确定为上诉法庭和召开同盟的"全体成员大会"的地点。许多同盟城市也都采用吕贝克的法律。

汉萨同盟早期的目标是取得停泊商船、储藏货物、商人居住和当地豁免权的合法权利,这是它的成员从事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条件。它还关心稳定币值,简化支付手段。[英语单词"标准纯银"就起源于"东方国家的人"(Easterling)这个词,是汉萨同盟商人广泛采用的表示银币成色的词。]

但是商业利益的追求很快便涉及政治。汉萨同盟最初的斗争武器是对敌人的"商业联合抵制",但是它逐渐地被迫征税以设立海军,首先用于镇压海盗,其次用于与一些王国竞争,特别是与丹麦竞争。1361年,丹麦劫掠了维斯比,这促使汉萨同盟与挪威、瑞典结盟。在第一次丹麦战争中,汉萨同盟被丹麦打得大败。但是在1368—1369年的第二次丹麦战争中,汉萨同盟的军队占领了赫尔辛堡(Helsingorg),破坏了哥本哈根,占据了松德海峡。通过1370年的《施特拉尔松条约》,丹麦被迫承认,没有汉萨同盟的同意,丹麦的任何国王都不能加冕,并认可了汉萨同盟的特权。[**松德海峡**]

[341]

因此汉萨同盟的逐渐衰落既是经济因素也是政治因素的结果。十五世纪,波罗的海的鲱鱼群神秘地重新栖息于北海。与此同时,北欧的商业中心正在转移到尼德兰。在反对诸如英国、普鲁士和

莫斯科公国等新兴的现代国家中，汉萨同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1494 年诺夫哥罗德的彼得霍夫办事处的关闭就是困难时代来临的一个信号，1598 年伦敦"秤街"办事处的关闭也是如此。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只能给予汉萨同盟微弱的支持。"三十年战争"中，汉萨同盟下降为只有三个活跃的成员——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它们于 1669 年举行了最后一届全体成员大会。从此，汉萨同盟的名字只与这三个城市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直到 1889 年，它被并入"德意志关税同盟"。[1]

汉萨同盟的遗产比它的灭亡持续得更长。经过几个世纪，它创立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纯正品德被融入了它的建筑物的每一块石头和优美的城市之中。汉萨同盟属于一种以共同的价值和优先权为基础的独特的、国际的文明。虽然大城市如汉堡、但泽（格但斯克）、里加的政治命运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共同起源的强烈感情。汉堡的市民仍然自豪地用古代市政府的符号"HH——汉萨同盟的汉堡"来登记汽车牌照；不来梅人展示"HB"，吕贝克人使用"HL"，罗斯托克人则使用"HRO"。

纳粹的意识形态自然不遗余力地擅用汉萨同盟的传统。例如，在 1942 年格罗特迈耶尔（Grotemeyer）创作的一幅著名绘画中，一辆中世纪的四轮马车从汉堡出发开往易北河，仿佛到东部去为德国开拓"生存空间"。但是这是一种粗俗的歪曲。在德国历史上，汉萨同盟的传统与普鲁士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截然不同，尽管它们将取代汉萨同盟传统。在欧洲历史上，汉萨同盟传统像一座灯塔，照亮着那些寻求以坚定的地方自治、国际合作、共同繁荣为基础的未来的人的前程。

22．正如《圣经》所证明的，罗马教会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今后[342]也不会犯错误；

23．任何反对罗马教会的人都不能称为天主教徒；

27．罗马教皇能够解除附庸对其不公正的领主之间的效忠关系。[25]

初看起来，由于教皇没有掌握强制手段，皇帝的地位似乎更加强大。但是实际上，由于许多主教反对依附世俗统治者，许多贵族不想依附国王或皇帝，所以封建秩序的离心力量发挥着有利于教皇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妥协告终，但是在第一回合中，皇帝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希尔德布兰的挑战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皇帝的操纵下，帝国境

内的主教宣布开除教皇的教籍。教皇则立即宣布开除皇帝的教籍，并宣布解除了全体臣民对皇帝的效忠关系。德国贵族因此发动叛乱，选举士瓦本的鲁道夫作为他们的“对抗的恺撒”（“Anticaesar”）。亨利四世选择了忏悔之途。他在冬天带领妻子和孩子越过塞尼山（Mont Cenis），找到居住在孤独的卡诺莎城堡的希尔德布兰。亨利四世一家身穿褴褛的衣裳，赤脚站在雪地里请求教皇的宽恕。第四天，希尔德布兰赦免了亨利四世的罪行，亨利四世跪倒在地说，“神圣的教皇，赦免我的罪行吧！”但是卡诺莎的表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亨利四世很快就回到了任免神职人员的习惯。经过长期内战，亨利四世第二次被开除教籍，帝国的主教会议在布里克森（Brixen）举行，选举了一位“对立的教皇”克雷芒三世。现在西欧出现了两个教皇和两个皇帝。1083—1084年，帝国的军队攻占了罗马，把希尔德布兰围困在圣安杰罗（Sant'Angelo）城堡中。罗伯特·圭斯卡德看到教皇在撒拉森军队的掩护下离开了罗马，留下罗马城遭受帝国军队的抢掠。希尔德布兰死于流亡途中。1106年亨利四世去世，但是临死之前，亨利四世遭到他的第二个妻子阿德莱德（Adelaide）的公开指责。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定”带来了斗争双方之间的休战，教皇和皇帝都享有一部分主教授职权。[马斯东]

[343]

马斯东（MARSTON）

旧马斯东正好位于本书正在写作的最接近中世纪教区的地方，它已经拥有900多年连续的历史。1122年，这个地方的一座礼拜堂被赠给了牛津的圣福莱德威德（Frideswide）的奥斯汀女隐修院，十三世纪它上升为教区的地位，1451年，教皇通谕把它与邻近的黑丁顿（Headington）教区合并，这种合并持续到1637年。现代大多数时间里，奥斯汀隐修院的生计依靠黑丁顿领主的捐赠。

在它漫长的历史中，马斯东见证了少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距牛津城三英里的“沼泽村”最有趣的特征就是马斯东渡口，从1279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一直摆渡过往查韦尔（Cherwell）河的行人。在现代城市郊区兴起前的顶峰时期里，马斯东村居住着40到50户居民，他们耕种600英亩的耕地，拥有200头牛和马，放牧800只绵羊。1655年后，当两种主要的土地都被圈成牧场时，村里的人口减少了。英国内战期间，攻打国王设在牛津的总指挥部的议会军队占领了马斯东村。1643年，议会军的指挥官

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Sir Thomas Fairfax）投宿克罗克（Croke）家族的马斯东庄园，并在那里接待了来视察的奥立弗·克伦威尔。1816年前，马斯东村没有学校，之后为学生建立了一所寄宿房屋。1851年，马斯东小学开学，这个教区惟一的慈善基金是1671年根据寡妇玛丽·布雷特（Mary Brett）的遗嘱而成立的，她当时遗留了一所房子和一块价值22先令6便士的土地，以便为穷人提供面包。这个教区里惟一获得国家名声的居民是叫做“喇叭”的猎狐的小母狗，它是1815年从埃斯菲儿德（Elsfield）小村庄买回来的。“喇叭”的新主人是爱好运动的杰克·拉塞尔牧师（Revd Jack Russell），他利用她寻找带有他的名字的犬种。[1]

教区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马斯东是用垂直的后期哥特式风格建成的，被形容为“简朴的”。[2] 西边低矮的钟楼带有枪眼的胸墙，但是最初的结构只有少量幸存下来了，大多数石头建造的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1883年重修过。而内部装修的朴素的栎木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或詹姆士一世时期。

从大约1210年到1991年主持过仪式的教士名单悬挂在教堂正中的匾额上。除了1529—1637年马斯东教堂由不住的助理教士主持外，这份名单传递了一种强烈的连续感。被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教士是奥斯伯特（Osbert），他是赫里福德（Hereward，大约死于1210年）的儿子；约翰·德·布拉德里（1349年）死于“黑死病”；罗伯特·肯尼（Robert Kene，1397—1398年）是第一个加上了姓的教士；多米尼克修士托马斯·菲尔达（Thomas Fylldar，1529年）是宗教改革前的最后一名天主教教士。由劳德大主教任命的约翰·艾伦（1637—1685年）在这个经过了改组的教区担任了48年教士，[344] 他的爱德华时代的继承人约翰·汉密尔顿·摩提麦（Jhon Hanmilton Moutimer，1904—1952年）也是如此。

欧洲成千上万的教区形成了一张领土权力网络，它常常比世俗权力更古老更连贯。教区对主教负责而反对王权。在英国，教区比郡的设置更早。在很多情况下，教区与村庄重合，无论政权或土地占有制度怎样变化，教区教士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和有影响力的中心人物。最近，教区会议已经提供了地方民主的一种因素，教区水泵房和教区礼堂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中心场所。

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记录——在英国，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保留下来了——是研究家谱和人口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它们为研究地方史敞开了天然的大门。

最为重要的是，教区是欧洲乡村井然有序的生活的基石。村民

们终年辛劳使他们从农奴制、黑死病、饥荒、战争、贫穷和共同农业政策中幸存下来了：

远非狂乱的人群的小争论，
他们的严肃的愿望从未学会堕落；
沿着冷酷的生活山谷
他们保持了前进道路上的无声的要旨。

1075年，比萨寻求教皇批准它的城市法典《大海的法律》（the consuetudine di mare）。六年前，这些法典曾经得到帝国的特许。作为协定的一部分，当地的托斯卡纳公爵宣布放弃对比萨城内居民的司法管辖权，不经比萨的同意，他不再任命比萨侯爵。当时比萨小心翼翼地避免激化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但是它开辟了城市自治的重要道路。比萨在反对西西里和撒丁尼亚的撒拉森人的战争中致富，正如带有倾斜的洗礼塔的比萨大教堂（大约1089年修建）中的大理石雕像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但是比萨很快就被它的海上竞争对手热那亚所征服，被它的陆上临国佛罗伦萨所吞并。但是富裕、拥有自制宪法、军事力量和市民自豪感是后来城市发展的特点。到十一世纪末，法国的勒芒（Le Mans）、圣康坦（St Quentin）和博韦等都变成了半自治的城市。在弗兰德尔，圣奥梅尔的特许状（1127年）为布鲁日和根特等城市起了带头作用。在德国北部，吕贝克的自治政府（1143年）就成为汉堡（1189年）的先导。在这些城市中，商人公会和手工业行会开始形成。

1082年5月，拜占庭皇帝授予威尼斯自治的特许状，允许威尼斯商人自由运输，免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帝国领土经商的税收和关税，还在"黄金角"为威尼斯商人保留了三座码头，这是威尼斯舰队在拜占庭皇帝的诺曼战争提供援助得到的回报。从七世纪穆斯林征服以来，意大利与利凡特之间的贸易受到严重的限制，威尼斯商人既是皇帝的臣民又是皇帝的盟友，但他们还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1082年的"黄金诏书"事件成为威尼斯发展的里程碑。由于它在十字军前夕被批准，并且随着东地中海的重新开放，威尼斯的泻湖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与君士坦丁堡对应的航运中心。威尼斯附近的托奇洛（Torcello）岛曾经超过了它，828年，圣马可的遗骨埋葬在里亚托（Rialto）。像以前伦巴第人的入侵把第一批难民驱赶到[345]泻湖一样，马扎尔人的抢掠打破了威尼斯与德国之间的联系。因此，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贸易将走向繁荣。由于建立了一系列军事要塞和贸

易商站，以及后来在拉古萨（Ragusa）、科孚（Corfu）、克林斯湾（Corinth）、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地建立了殖民地，所以威尼斯舰队能够保护商船运输丝绸、香料、白银和奴隶、木材、谷物和食盐。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并非融洽，1182 年，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全部被屠杀。但是威尼斯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比拜占庭帝国更长，直到 1797 年才被拿破仑灭亡。[**犹太人居住区**] [**风俗**]

1084 年，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附近的夏特尔斯（Chartreuse），科隆的圣布鲁诺创立了天主教加尔都西修会（Carthusian Order）。它的严格的修道规则指导修士整日在密闭的小屋里苦思冥想，从表面上看，它是克吕尼修道院院规的翻版，但实际上它是拉丁教会正在进行系统的组织制度化的标志。1098 年，在勃艮第的西多（Citeaux），历史悠久的西多修道会正式创立，它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克莱尔沃（Clairvaux）的圣伯纳德（1090—1153 年）。在其他地方，世俗的教士或“正式的教士”也变成有组织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指导原则是圣洁、贫穷和服从。大多数修道团体采用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规则，因此被统称为奥古斯丁修道会。1120 年由圣诺伯特（St Norbert）在里昂附近的普里蒙特（Premontre）创立的了普里蒙特修会或诺伯特修会，广泛传播到东欧和西欧地区。与此同时，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正在建造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在五个世纪里一直是西欧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教堂。

1085 年夏，卡斯蒂尔—里昂的阿方索六世攻占了穆斯林盘踞的城市托莱多，它很快就变成基督教徒—穆斯林边界的偶然事件之一：阿方索与塞维利亚的埃米尔结盟，并且使埃米尔的女儿成为他的情妇。实际上它是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第一步，“再征服运动”是为了占领伊比里亚半岛而进行的 400 年斗争。托莱多是前埃米尔领地分裂形成的大约 25 个“小”王国中最大的一个，也是这些小王国的中心。这些小王国的分裂给基督教统治者提供了机会。不到 10 年，阿方索的勇士罗德里戈·迪亚斯·维瓦（Rodrigo Diaz Vivar）和埃尔·熙德（El Cid）就攻入了瓦伦西亚。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就变成了各条战线上的实力消耗战。1212 年，摩尔人在托洛萨关口（Las Navas de Tolosa）遭受了重大的失败。随着 1236 年科尔多瓦的占领、1248 年塞维利亚的占领、1266 年穆尔西亚（Murcia）的占领，伊比里亚半岛的大部分土地都转移到基督教徒手中。[**埃尔·熙德**]

1095 年 11 月 27 日，在奥文的克勒芒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全体基督徒为解放耶路撒冷而战斗。乌尔班登上设在巴黎圣母院下一座山丘的讲坛，向一群主教、骑士和普通信徒发表了演说。他

当时正在力图促进所谓“上帝的停战”，阻止封建社会中无休止的战争。他还追求重新调和与拜占庭大教长关系的政策，希望分担土耳其人带给拜占庭的痛苦。但是他的祈求引起了大众的共鸣：人群高呼“上帝希望如此！”一名红衣主教甚至跪在乌尔班二世面前，以多种名义，痉挛性地颤抖着，默诵了“忏悔经”，然后人们拥挤着加入了他的行列。

[346]

风俗（MORES）

十一世纪后期，一位拜占庭公主嫁给威尼斯总督，人们发现公主用黄金餐叉吃饭，主教指责她违反社会行为习惯。中世纪西欧人用手指从公用饭盘中抓饭吃，普遍使用餐叉要到文艺复兴时期，而且餐叉只用来取一点食物放在自己的碟子里。[1] 餐桌上配套的刀、叉、调羹是十八世纪的革新。

从教导人们如何举止恰当的一系列手册，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欧洲人的行为举止。最早的这类手册是休·圣维克多（卒于1141年）为教士写作的《新风俗》。十三世纪，被归于坦豪沙（Tannhäuser）名下的巴伐利亚的《宫廷举止》是为了指导廷臣的粗野举止，十五世纪约翰·拉塞尔的《礼仪之书》也是为此目的。这种类型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1530年），它被印刷了130版。200年后，当彼得大帝力图使他的宫廷“文明化”时，《男孩的礼貌教育》被翻译成俄文出版。[2] 鲍达沙尔·卡斯蒂里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侍臣论》（1528年）和卢卡斯·高尼基（Lukasz Górnicki）的同样类型的拉丁文论文（1566年）长期享有国际盛誉。因此，许多“高层社会”行为指导手册，特别是论述法国礼仪的，被用于把礼貌培养推广到更广的社会阶层。

史学家一度把行为举止当做一个赶时髦的研究题目，但是严肃的分析家认为，它们提供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变化的外在证据。对每种行为的态度可以被规划，而且与长期的趋势有关。

例如，吐痰的禁令就反映了许多基本的变化：

不要把痰吐过餐桌或吐到餐桌上。（英国，大约1463年）

不要像猎人那样吐痰穿过餐桌。（德国，十五世纪）

当吐痰时，应当背过身。不要让你的唾液落到别人身上。如果化脓的东西落到地面，应当用脚踩掉。（伊拉斯谟，1530年）

如果可能的话，你不应该把痰吐到餐桌上。(意大利，1558 年)

以前允许人们当着高贵的人向地上吐痰……现在这被认为是无礼。(法国，1572 年)

经常吐痰是不允许的。在一所重要的房屋里，应当把痰吐到手帕里……千万不要用力吐痰以致必须寻找落在地上的唾液。(列日，1714 年)

吞咽应该被溅落的东西是不雅的举止……把痰吐到手帕里后，应当立即折叠起来，而不要观看它，并把手帕放进自己的口袋中。(《餐厅》，1729 年)

儿童在伙伴面前吐痰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失。(《餐厅》，1774 年)

任何时候随地吐痰都是一个讨厌的习惯。除了粗鲁和讨厌外，它对健康相当不利。(英国，1859 年) [347]

你注意到我们现在掩藏我们父辈毫不犹豫地公开展示出来的东西吗？……痰盂是现代家庭再也找不到的家具了。[卡本内斯(Cabanès)，1910 年][3]

直到十八世纪吐痰才被限制，虽然对何地、何时、如何吐痰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十九世纪，随地吐痰已经不受欢迎，也许是由于害怕结核病。但是矫饰与优雅举止规则和痰盂的广泛使用是不相干的——痰盂是咀嚼烟草的习惯所必需的容器。只有在二十世纪，随地吐痰才被有效地禁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伦敦的公共汽车上还张贴着“禁止随地吐痰”的告示。但是当时有些摇滚乐队正在劝告歌迷把吐痰当做蔑视社会的一种标志。随地吐痰也许返回到了受人尊敬的习惯。

正如“文明化进程”被逐渐地当做在整个社会内部自我约束的加强一样，培养儿童树立自我约束也就是成年人的责任了：

因此在许多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羞耻和冒犯的标准逐渐提高了，而且在个人生活中以缩写的形式重新规定……作为生物续生规律的相似物，人们可能会谈论社会续生和心理续生的根本规律。

对这种“文明化”理论的批评可能不同意对文明的这种狭窄定义。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德国理论——所有的人都讲究卫生，但是大脑空虚。许多人坚持认为，生活知识的艺术不仅仅是人们控制唾沫、肛门括约肌和使用银制餐具的能力。诺伯特·伊莱亚斯（Nobert Elias）的“文明曲线”和文明直线发展的理论并不能

使每个人都信服。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所谓“西方文明人”与中世纪行为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世纪的行为方式中，现代的卫生、个人尊重、隐私和“个人空间”的观念从根本上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要考虑一下中世纪的各种禁令就知道：

穿着盔甲为女士服务是不礼貌的行为。
当你用手指抓肉的时候，不要用手指触摸你的鼻子。
如果你不得不摩擦你的喉咙，用你的外套礼貌地掩饰。
放屁声可以用咳嗽来掩盖。
落座之前，先确信你的位置没有被弄脏。
向正在大小便的人打招呼是不礼貌的。
当你用餐时，别忘了还有穷人。上帝会奖赏你的。

[348]

埃尔·熙德（EL CID）

骑士罗德里戈·迪亚斯于1099年在瓦伦西亚去世。在历史上，迪亚斯的一生既为摩尔人作战，也参加反对摩尔人的战斗。但是在传说中，阿拉伯人尊称他的外号“阿尔·萨义德”或“埃尔·熙德”，意思是“主人”，他的形象被转变为基督教事业的完美无缺的勇士、卡斯蒂尔的民族英雄。这个传说在一个世纪后的浪漫史诗《埃尔·康托·德尔·密俄·熙德》（El Canto del mio Cid）中被广泛流传。[1] （见原书附录Ⅲ，第1241页）

历史人物转变成民族英雄的特殊地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赋予著名的男女以光辉的形象，它是寻求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这种民族认同只能被定义为与敌对的邻国或压迫者相区别。在英国，由于其历史上独特地缺少外部入侵者，所以它惟一可能的民族英雄候选人就是罗宾汉，他是神出鬼没的不法之徒，他保护普通人民，反对盎格鲁—诺曼贵族。[2] 在英国的邻国中，无论李韦林·格鲁菲德（Llywelyn ap Gruffydd）、“勇敢的心”威廉·华莱士、休·奥尼尔，还是贞德，都只能是反对英国的人物。在后来的不列颠历史中，民族英雄只能是军事人物，如海军上将纳尔逊或威灵顿公爵，他们从外敌手中拯救了大英帝国。在阿尔巴尼亚，乔治·卡斯特里奥塔（George Castriota）被称为“斯肯德堡”（Skanderberg，1403—1467年），就像埃尔·熙德被看成是抵抗奥斯曼人

侵的象征一样，虽然他也曾经加入然后脱离了奥斯曼和穆斯林的事业。

当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见原书第815页），民族英雄的崇拜就变成了强行的义务。缺乏古代勇士的民族就崇拜更近时代的民族英雄：科修斯柯（Kosciuszko）、沙米尔（Shamil）反对俄国人；安德列斯·霍弗在蒂罗尔反对法国人；“鞑靼人的罗宾汉”扬诺斯基（Janosik）反对奥地利人。在塔特拉山的北麓，扬诺斯基是波兰高地的英雄，而在其南麓，他是斯洛伐克的英雄。如果考虑到欧洲没有民族英雄，那么就会知道，这是对欧洲民族认同状态的一个公允的评价。

发动十字军的建议被整个拉丁教会采纳了。“隐居者”彼得等在布道中都宣传教皇的号召。因此，在大约六七代人的时间里，伯爵、国王、普通人、甚至儿童都“举起十字架”在圣地与异教徒作战。

所有这些革新都有助于学者们所谓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是一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在自信心提高、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有意识地把它的理想付诸实施的时刻。“主教授职权之争”和十字军运动不是新力量的表现，而是“意识形态的”。新的思想中继承了对知识的渴[349]求。作为公认的知识中心的图书馆的抄写和收集图书活动显著增加。拉丁古典作品被奉为珍品，拉丁语变得更加优雅，拉丁语诗歌也开始到处流行：

我决心醉死在酒馆，
但愿葡萄酒流淌在我临死的唇边。
天使的唱诗班将快乐地歌唱：
“愿上帝怜悯这个贪杯的人吧。”[26]

人们在尝试各种历史撰写方法，从简单的年鉴和圣徒行传到复杂的论文，如吉伯特·德·诺根（Guibert de Nogent）的《神圣的保证》（De pignoribus sanctorum，约1119年），威廉·马姆斯伯里（William of Malmesbury）的《英格兰列王事迹》（1120年），奥托·冯·福莱辛（Otto von Freising）创作的记述腓特烈一世皇帝的远征事迹（约1156年）。在充满离奇故事的《不列颠列王史记》（约1136年）中，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描述了许多想象力丰富的故事和来自凯尔特人的历史传奇，这些传奇由许多诗歌和游吟诗人所流传和修饰。教会法的系统化，特别是波伦那大学格拉先的《教令集》（1141年），

追随了从伊纳留斯（Irnerius）开始的一系列注释学派对罗马法研究的传统。把阿拉伯和古代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活动盛行，著名的翻译家有巴思（Bath）的《阿德拉德》（Adelard）。法学、医学和一般的学术在萨勒诺（Salerno）、蒙彼利埃（Montpellier），特别是在波伦那大学十分活跃。阿尔卑斯山以北大教堂的附属学校，如巴黎的沙特尔大教堂的附属学校，与早期的修道中心展开了学术竞争，在这些修道中心，奥斯托（Aosta）的圣安瑟伦（St Anselm，1033—1109年），贝克（Bec）修道院院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都是半学者型的人物。在西西里的巴勒莫和西班牙的托莱多，阿拉伯学者保存了古代著作，它们被介绍到基督教世界。科尔多瓦的阿威罗伊（也叫伊本·拉什德，Ibn-Rushd，1126—1198年）的注释使亚里士多德哲学转化为中世纪的哲学。穆斯林西班牙还把阿拉伯数字和数学技术传播给欧洲。[**沙提瓦**]

宫廷文学的创作是为了反对贵族粗野的生活方式和沉闷的教会气息。起初，宫廷文学有两个中心——北方的法国宫廷，它流行《查理曼武功歌》和歌颂法兰克人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的作品，另一个是普瓦提埃的阿基坦宫廷，它以歌颂“宫廷爱情”为特色。1120年后创作的丰富的法国宫廷文学主要依靠对查理曼的祭祀活动，特别是《罗兰之歌》的史诗及其素材——《查理曼朝圣》（The Pelerinage de Charlemagne）或《奥兰治家族赞歌》（La Prise d'Orange）。阿基坦宫廷文学在1170年后成就突出，精心培养了一种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被记录在由安德列·卡佩兰努斯（Andreas Capellanus）创作的31章“诚实爱情的艺术”。这些规则开创了骑士爱情的“情妇”的先河，反对当时接受的性别角色，嘲笑当时的婚姻习俗。安德列说，“婚姻不是爱情的樊篱”。这种作品的题材可能起源于穆斯林西班牙，但是被南部的游吟诗人所采纳，然后传播到北部的叙事诗人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特里斯坦》的作者之一写道：“爱情比法律更强大。”但是公认的宫廷浪漫文学大师是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etien de Troyes，1135—1190年），他是香槟人，是亚瑟王三部曲——《狮子骑士伊凡》、《朗斯洛（又名坐刑车的骑士——译者注）》和《佩瑟瓦尔（又名圣杯的故事——译者注）》的作者。[**特里斯坦**]

德国皇帝与教皇的斗争由于意大利的政治局势而复杂化。但是十二和十三世纪，问题变得更加无可挽回，卷入冲突的各派的势力都被削弱了。除了历代教皇的希尔德布兰意识外，德国皇帝被迫与封建公[351]国，特别是与萨克森公国的离心趋势作斗争，与德国境内的王朝争夺者，特别是与归尔夫派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作斗争，与伦巴第顽强的独立城市作斗争，与任性的罗马城作斗争，与遥远的西西里王国作斗争。因此通往帝国权力的道路充满了荆棘。王位争夺者首先要赢得德

[350]

沙提瓦（XATIVAH）

欧洲最早的有记录的造纸技术和行业是1144年瓦伦西亚附近的摩尔人的小城市沙提瓦（Xativah）。造纸技术历经千年才从中国经过撒马尔罕和开罗传播到欧亚大陆各地。重要的造纸技术，如浸渍模具和水印直到一个世纪后才首次出现于意大利，很可能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法布里亚诺（Fabriano）。现在已经知道的第一个水印符号是一个大写的字母“F”（表示法布里亚诺）。

造纸技术正是从那里广泛地传播到其他地方，逐渐取代了比较古老的纸草、羊皮和革纸的书写材料。

早期的造纸厂分布在阿维尼翁的昂贝尔（Ambert）（1326年）、特鲁瓦（Troyes）（1338年）、纽伦堡（1390年）、葡萄牙的莱里亚（Leira）（1411年）、英国的赫特福德（Hertford）（十四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1453年）、克拉科夫（1491年）和莫斯科（1565年）。随着印刷术的到来，对纸张的需求增加了。

1389年，波伦那首次使用了纸张尺寸标准：大号（22英寸×30英寸）、王室号、中号和小号。书籍页数通过对折纸张来计算，分为对开、四开、八开等。1783年，蒙特戈菲尔（Montgolfier）兄弟——他们在阿诺奈（Annonay）开办了一家造纸厂——用纸制造了一只热气球。但是纸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传播知识。赫尔德（Herder）写道，“向纸的发明者致敬吧，他对文学的贡献比任何君主都更大。”

今天仍然有人钟爱手工制造的纸张，德国设立了国际造纸史学家协会，并创办了期刊，有些国家还建立了造纸博物馆。在法布里亚诺、法国的穆兰莱卡登巴斯（Moulin Recard - en - Bas）、尼德兰的科赫安登赞（Koog aan den Zaan）、德国的下茨翁尼兹（Niederzwonitz）、瑞士的巴塞尔的圣阿尔本、西里西亚的杜斯泽尼基洛耶（Duszniki Zdroj），古代的造纸厂仍然开设。[1]

国贵族和主教的支持，才能争取当选为德国的国王。此后，赢得意大利的王位也同样是一种挑战，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寻求教皇的加冕。一个多世纪里，三代皇帝耗费了大量心血才克服了这些障碍，从霍亨斯陶芬·冯·韦林根——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到亨利六世，再到举世无双的腓特烈二世。

士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公爵与属于归尔夫派的巴伐利亚公主的儿子

巴巴罗萨（1155—1190年在位）与弗朗什—孔泰（Franche - Comte）的女继承人结婚，并且在弗朗什—孔泰加冕为王。因此，由于享有广大的个人权力基础，所以巴巴罗萨能够充当好战的德国公爵之间的仲裁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属于归尔夫派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最终受到帝国法庭的审判而毁灭，他的领地被法庭剥夺。1157年，教皇特使蔑称帝国的王冠是教会的"恩赐"，于是双方在贝桑松会议发生了冲突，从而重新点燃了"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导火线。1158年在贝桑松会议双方发生了第二次冲突，帝国派强调"帝国的总督"高于所有帝国城市的官员，从而导致了与伦巴第联盟的长期战争。巴巴罗萨重尝了他的祖先的所有艰辛——被教皇开除教籍，选举敌对的教皇，德国封建主叛乱，在罗马的冲突，6次远征意大利。1177年7月24日，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走廊里，卡诺莎事件100周年的时候，巴巴罗萨匍匐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请求教皇的赦免。但是像卡诺莎事件一样，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巴巴罗萨通过外交手腕使他的儿子和继位人亨利（1190—1197年在位）与西西里的诺曼女继承人康斯坦茨·迪·阿普里亚（Constanza di Apulia）联姻。1186年，巴巴罗萨看到了他们在米兰完婚，18年前，巴巴罗萨曾经围攻过米兰。在成功地拆散了教皇与西西里的联盟后，巴巴罗萨踏上了第三次十字军的征途，走上了不归路。[共谋]

巴巴罗萨的孙子腓特烈二世（1211—1250年在位）是西西里世系的后裔，他继承了父辈建立的西西里与帝国的统一，而且十分重视西西里王国，以致忽视了对其他地区的治理。作为十字军战士、语言学家、哲学家、鸟类学家、艺术的赞助者、犹太人的保护者、伊斯兰教女教徒闺房的主人，腓特烈二世由于不服从教皇而两度被教皇开除教籍，作为异端，他遭到宗教大会的正式谴责。他在意大利南部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把高效而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管理强加在教会和国家身上。他甚至鼓励帝国的臣民对他实行个人崇拜仪式。他在巴勒莫主持一个混合了拉丁、日耳曼、希腊和撒拉森因素的豪华而又充满文化气息的宫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腓特烈二世是"时代的奇迹"。

但是，利用专制手段统治一个封建帝国是不可能的，除了那不勒[353]斯和西西里以外，腓特烈二世被迫不断作出让步，以保持帝国派系的团结。在德国，在授予教会享有自由的特许状（1220年）后，腓特烈二世放弃了对教会土地的直接控制，希望通过如科隆大主教恩格伯特（Engelbert）等高级教士进行统治。结果，他的确成功地使他的儿子亨利七世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在1231年的沃尔姆斯会议中，腓特烈二世宣布了《诸侯特权法》（Statutum in favorem principum），授予世俗封建诸侯与主教同样的自由权利。在东部，腓特烈二世授予曾经

[352]

共谋（CONSPIRO）

“神圣法庭同盟”具有欧洲高级秘密协会——除了那些仍然保密的协会以外——的特征。在帝国禁令下达给十二世纪后期归尔夫派的领袖“狮子亨利”之后的混乱岁月里，它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神圣法庭同盟”的目的是管理帝国权威崩溃地区的司法，而且通过由“秘密法庭法官”（Francs - Juges）主持的森林法庭管辖着惊恐万状的民众。“神圣法庭同盟”内部存在一个精英等级，他们是它的创始人，被称为“贤哲”，还有一套复杂的宣誓、签名、仪式体系，和以“首席头领”（Oberststuhlherr）为首的等级制度结构，第一任首席头领是科隆大主教。十四世纪，“神圣法庭同盟”拥有1万成员，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活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十五世纪，在接纳皇帝西吉斯孟德为成员后，“神圣法庭同盟”的影响持续到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法律改革时才开始下降，它的最后一次集会是1568年举行的。

森林法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听取原告和被告的目击者的证词，但是处死是对他们的惟一判决。已经被定罪的人被吊在树上，树上悬挂一把大刀，大刀上刻着神秘的字母“SSGG”（分别表示“石头”、“绳索”、“青草”和“绿色”。）

秘密协会包括政治、宗教、社会和犯罪等类型，虽然这些类型经济交叉重叠。十七世纪初，神秘的“玫瑰十字会”就公开表明自己的存在，英国人落泊特·弗拉德（1574—1637年）系统地论述了它的神秘的通神术。“玫瑰十字会”引起了许多欧洲人的兴趣，从培根到笛卡儿，而且对早期的“共济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776—1785年，亚当·韦夏普（Adam Weishaupt）组织的短命的“名人协会”在巴伐利亚提出了先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它的成员与“共济会”，甚至于雅各宾派都有紧密的联系。十九世纪早期，烧炭党、黑手党、爱尔兰秘密协会兴起。（见原书第823页）其中有些秘密协会存在至今。[1]

历史的共谋理论是不流行的，但是欧洲的历史从未缺少过共谋协会、共谋或共谋者。

跟随他参加十字军的条顿骑士团第一任首脑赫尔曼·冯·萨拉兹（Hermann von Šalaz）几乎无限的权利，赫尔曼·冯·萨拉兹为了腓特烈二世

的利益而多次试图在罗马进行斡旋。在意大利北部，腓特烈二世企图巩固齐伯林派的优势，但是遭到教皇特别是格列高利九世和伦巴第城市同盟的反对。

腓特烈二世生活在一个大漩涡之中，尽管这个大漩涡不完全是由他自己搅动的。他年轻时曾经受教皇的监护，所以他只被授予了以教皇名义租借的西西里，在德国历经20年贵族内战后登上帝位，当时教皇在德国的附庸是不伦瑞克的奥托。当法国军队打破奥托的反教皇联盟时，腓特烈二世并没有出现在弗兰德尔的布汶战场上。教皇因此而反对他，这真是一出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政治闹剧。1235年，腓特烈二世在德国凭借武力恢复了秩序，流放了他的儿子亨利，以便有利于幼子康拉德继位。1236—1237年，他在科腾努瓦（Cortenuova）打败了伦巴第城市同盟，率领一支庞大的战象队伍通过克里莫纳。1241年，在热那亚附近海岸击沉了教皇的舰队后，腓特烈二世扣押了一群敌对的大主教和修道院长作为人质。但是1248年，在围攻帕尔玛失败后，腓特烈二世丧失了伊斯兰教徒的闺房。看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消除归尔夫派与齐伯林派之间的怨恨。

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康拉德四世（1250—1254年在位）和孙子康拉丁（卒于1268年）不能继承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位，帝国再次陷入大空位时期（1250—1273年）。教皇迅速重申对西西里的最高宗主权，并把西西里王位转交给法国的安茹家族。教皇虽然名义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被迫更加依赖法国。教皇格列高利十世（俗名泰达多·维斯康提，Tedaldo Visconti，1271—1276年在位）时期，确保迅速而有效地选举教皇的协议被最终签订了。

法国是帝国动荡的最大受益者。十一世纪，卡佩王朝只占有巴黎附近“法兰西岛”的小块王领，其他地方实际上不受王权的节制。但是从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起，连续几位长寿的国王极大地增强了法国的实力，此外，人口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北部各省，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发展，以及重要的领土的获得，特别是在米迪（Midi）地区，这些因素提高了法国的实力。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时期，王权强大，他能够统领法国全体贵族去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后来在他前往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和坎特伯雷朝圣期间，[354]法国境内仍然保持着和平局面。路易七世与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离婚后，埃莉诺下嫁路易七世的封臣、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路易七世眼睁睁地看着敌对的英国金雀花王朝的领土从苏格兰边境延伸到比利牛斯山。但是危机终于过去了，卡佩王朝的后继国王们能够恢复王权的最高权威。（见原书附录Ⅲ，1244页）[**哥特式建筑**]

这个时期，英国与法国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英国的安茹或金雀花

王朝是由征服者威廉的孙女、盎格鲁—诺曼王朝的玛蒂尔达与安茹伯爵、金雀花家族的杰弗里联姻而形成的。他们的儿子亨利二世结束了斯蒂芬统治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与王后埃莉诺维持了长期的婚姻，他们生育的后代形成了一个君主世系，这个世系保持英国王位到1399年。亨利二世的统治以司法改革、入侵爱尔兰、在诺森伯兰与加斯科涅之间不断巡游、以谋杀大主教贝克特（1170年）为顶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著称。亨利二世幸存下来的长子"狮心王理查"(1189—1199年在位)一门心思参加十字军。理查的弟弟"无地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由于多次实行独断专行的法令而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在布汶战役中被法国军队打败（1214年），失去了诺曼底公国，由于签署《大宪章》（1215年）而丧失了英国政治中的主动权。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统治时间漫长，被但丁列为"地狱边缘的灵魂。"（见原书附录Ⅲ，第1252页）

金雀花王朝早期，英国就开始入侵爱尔兰。1169年，由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和"强弓手"理查德率领的一群盎格鲁—诺曼冒险家阴谋扶植伦斯特省的被废黜的国王，全副武装的英国骑士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登陆，并迅速向前推进，亨利二世觉得必须跟随这些骑士的步伐，接受爱尔兰国王的宣誓效忠。从此，英国人就没有离开过爱尔兰。"无地王"约翰在他父亲寿终正寝时获得了"爱尔兰领主"的称号。1210年，约翰王在都柏林建立了一个正式的英国殖民地，划分了一系列由英国法律和法官管理的郡。亨利三世制定了第一个种族隔离法令，明确把英国人与爱尔兰人分离，排除爱尔兰人在掌权之列。

阿基坦的埃莉诺（1122—1204年）也许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她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是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和艺术赞助者，她性格坚强，继承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公国，15岁结婚，由于蔑视国王丈夫，她在第二次十字军的路上被捕押回。28岁时，埃莉诺离婚，不到两个月就再婚，这是出乎十二世纪的人意料的举动。40多岁时她与第二个丈夫离婚，嫁给了"漂亮的罗莎蒙德"（Fair Rosamund），重新统治普瓦提埃。在她的儿孙中，出了一位皇帝、三位英国国王、耶路撒冷和卡斯蒂尔的国王、一位布列塔尼公爵、一位法国王后。在普瓦提埃，[355]她成为一群贵妇的领袖和"游吟诗人歌颂的王后"：

"尊敬的夫人，
我现在和将来都是您的仆人，
我愿意为您效劳，
这是我的海誓山盟，

我发誓将把一生都献给您，
我最大的快乐都在于您，
我最后的快乐也在于您，
只要我一息尚存。”[27]

敌视埃莉诺的法国人试图以投毒和乱伦来污蔑她的名声，但她仍然是她的敌人将要消灭的那个国家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因为阿基坦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地区的中心，这个地区现在称为奥塞坦尼亚（Occitania）。在朗格多克语中，“oc”的意思是“是”，朗格多克语不同于北部高卢的“法语”。从加泰罗尼亚到普罗旺斯的米迪地区说朗格多克语。它超越了从阿拉贡王国到勃艮第王国的阿雷拉特（Arelate）的政治边界，阿雷拉特仍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早期，在法国进攻前夕，阿基坦文明是欧洲最灿烂的文明之一。

菲里普·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为法国君主制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他充分地利用了帝国与教皇斗争带来的有利时机，使王领扩大了三倍。菲里普奠定了法国民族军队的基础，通过国王的行政官僚体系，菲里普奠定了中央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他能够抵制总佃户的长期叛乱，打败了英国金雀花王朝的挑战。通过指控英国“无地王”约翰违背封建义务，菲里普剥夺了约翰在法国的合法权利，他用宝剑维持法庭审判秩序。从1202年起，菲里普轻易地兼并了诺曼底、安茹、都兰（Touraine）和普瓦提埃的大部分土地。1214年，在布汶战役中，虽然菲里不慎失足落马被奴仆所救，但是他打败了帝国和金雀花王朝的联军。

菲里普的孙子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为法国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是军事和经济成功所不能带来的胜利。由于继承了路易八世通过征服阿奎丹和朗格多克后扩大了的王国，所以路易九世无须对邻居发动战争。他体现了基督教国王的最高理想，若因维利勋爵让（Jean, Sire de Joinville）对路易九世的生活做了出神入化的描绘：路易九世告诫他的长子说，“我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爱护子民……说实话，因为与其子民认为你实行弊政，还不如让一个苏格兰人忠诚地实行仁政。”[28]当路易年轻时，法国出现了封建贵族反对王权，他的母后埃莉诺的孙女、卡斯蒂尔的布兰奇（Blanche of Castile）摄政。但是他[357]的正直品格和众多的姻亲关系使许多大封建主都成为国王的支持者。在一个争端日趋激烈的时代，他被拥戴为许多王室或封建争端的仲裁

[356]

哥特式建筑（GOTHIC）

来到巴黎附近的圣丹尼斯修道院的游客都会被告知，修道院的尖拱顶点是1143年或1144年由苏格尔修道院长完成的，而且据说它开创了哥特式建筑风格。圣丹尼斯工程是否预示了桑斯（Sens）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还是有争论的，因为这座大教堂也是同期建成的。但是作为许多国王加冕和葬礼举行的地方，以及法国红色王旗的诞生地，法国古老的罗马式教堂将是这种著名事件的首选之地。圣丹尼斯修道院的确早于巴黎圣母院和雄伟的夏特尔大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Amiens）大教堂。

法国哥特式风格很快便传播到整个天主教世界，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中世纪教会建筑的典型风格。从西边的塞维利亚到东边的多尔帕特（Dorpat），从北边的隆德（Lund）到南边的米兰，修建了一批哥特式大教堂。成千上万的教区教堂也模仿哥特式风格。

许多专家认为，最有审美价值的教堂是巴黎的圣沙佩尔教堂（Sainte - Chapelle），它是1248年4月25日根据圣路易的命令而修建的。尽管它的规模不如大教堂，但它是一座精美绝伦的建筑，它高耸而狭窄的窗户镶满了大块熠熠生辉的彩色玻璃。

与法国相距遥远的维斯瓦河与布格河（Bug）之间的卢布林（Lublin）圣三一城堡小教堂就是这种文化趋势的结果之一，正是这些文化趋势使人们把欧洲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圣三一城堡小教堂是国王弗拉迪斯拉夫·雅盖隆（Wladyslaw Jagiello，卒于1434年）为了从未发展的波兰—立陶宛的首都而兴建的，采用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是圣沙佩尔教堂遥远而质朴的余音。与此同时，像它毗邻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的哥特式教堂一样，圣三一城堡小教堂的内部墙壁也是用金碧辉煌的拜占庭壁画装饰，它们可能是来自日桑尼亚（Rythenia）或奥斯曼统治下的马其顿艺术家所设计的。圣三一小教堂成为西欧建筑风格与东欧装饰风格相结合的典范，根据记载，它是在1418年圣劳伦斯节完工的。

但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并未随着中世纪教会建筑而结束。浪漫主义时代，它再次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建筑风格，当时人们力图恢复哥特式风格值得尊敬的审美魅力，并把它应用于所有的世俗建筑。曼彻斯特的市政厅、路德维格（Ludvig）国王在巴伐利亚的新赫文斯泰因（Neuschwanstein）修筑的奇妙的城堡、奥地利在格拉科夫“地铁13线”终点修建的供水系统都是苏格尔尖顶的后裔。

现代对哥特式风格的所有解释都受到十九世纪热心人的影响。施莱格尔（Schlegel）、拉斯金（Ruskin）和伏勒拉杜克（Viollet - le - Duc）的理论都是粗糙的，正如他们倾向于“修缮”中世纪的哥特式起源建筑，包括圣丹尼斯修道院。用拉斯金的话来说，从一个表示被人蔑视的“野蛮”的术语，哥特式风格变成一个不受限制地被吹捧的对象。[1] 歌德的论文《论德国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把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及其建造者欧文·冯·斯坦巴克（Erwin von Steinbach）神化为哥特式风格的源泉，这是对其他许多人的鼓舞，很快就唆使德国学者声称哥特式风格起源于德国。事实上，哥特式是最国际化的建筑风格之一，各地又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是欧洲文化能够轻易地实现统一的理论基础之一。[2]

人，在万森园的橡树（Oak of Vincennes）下伸张正义。他对犹太人和米迪地区的人民却不像圣徒。但是到他漫长统治的末期，圣路易无疑是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位国王。

在英国，正常的贵族战争产生了异常的结果。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是“无地王”之子，由于宠信他的普瓦提埃、萨伏依和路易斯南（Luisgnan）亲属，对法国战争没有获胜，再加上他大兴土木，如修缮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所以亨利三世不得英国贵族的人心。1258年，在莱斯特伯爵、十字军战士阿尔比教徒的儿子西门·德·孟福尔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要求改革的贵族派系。通过拒绝批税解决国王的财政困难，改革派提出了“牛津条例”，规定国王的行政将由改革派任命的人监督。当国王拒绝时，孟福尔就发动了内战，并且在刘易斯（Lews）战役中成功地俘虏了国王、王太子、国王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和德国的国王。次年，国王重整人马，在伊夫舍姆（Evesham）杀死了孟福尔（1265年）。在内战期间，1265年1月，一种新的议会被召开了——不仅有贵族和教士代表参加，而且有郡骑士和城市的市民代表参加。对于宪政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先例，是迈向立宪君主制——下议院的首次出现——的决定性步伐。

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或法国真正具有它们后来的民族认同感。十三世纪，英格兰王国仍然与它的欧陆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统治阶级仍然与他们的法国亲属的文化和政治野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刚刚取得了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的领土基础，未来法国的命运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英国的许多事情比新法国的许多地区更加“法国化”。

夺回“圣地”的梦想持续了200多年，而且以失败告终。1096—[358] 1291年间，西欧一共组织了7次较大和多次较小的十字军活动。第一次十字军（1096—1099年）成功地攻占了耶路撒冷，屠杀了大量居民，并且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第二次十字军（1147—1149年）由圣伯纳德发起，法国的路易七世、德国的康纳德三世共同率领十字军，但是取得的成就很小，只有英国舰队偶然从摩尔人手中夺取了里斯本。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年）由德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法国的菲里普·奥古斯都和英国的狮心王理查率领，但是没有攻下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中，贪婪的威尼斯总督使它偏离了原来的目标，十字军成功地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大量居民，在拜占庭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这不是十字军的终点。第五次（1218—1221年）、第六次（1248—1254年）和第七次（1270年）十字军结束于埃及或突尼斯，法国国王圣路易在那里死于黑死病。当1291年“圣地”最后一个基督教军事据点亚克失守时，西欧再也没有做出共同的反应。

十字军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不仅对现代多愁善感的人来说，而且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圣伯纳德自己也不得不谴责它。十字军抢掠经过的各个国家——波希米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拜占庭。1096年，他们经过莱茵河地区时就杀戮了8000多名犹太人——这是欧洲计划中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十字军的海军远征破坏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港口。十字军内部的争夺不少于他们对异教徒的战争。参加十字军的国王榨取臣民的钱财以中饱私囊。狮心王理查说：“如果能找到买主，我连伦敦也敢出售。”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一个德国皇帝在西利西亚的一条河中溺水身亡，另一位德国皇帝则扣押英国国王以勒索赎金，还有一位德国皇帝航行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被教皇开除教籍。为了传播福音，谋杀和大屠杀是家常便饭。第一次攻占耶路撒冷时，据说有7万平民死于血腥屠杀。“那些被埋葬于东方的成千上万的生命和劳动力本来可以用于改善他们本国的状况。”[29]“有争议的是，基督教徒保持的十字军的惟一果实是杏树。”[30]

但是十字军沿途的恐怖常常掩盖了他们更深刻的动机。宗教狂热与遭受饥荒、瘟疫和人口膨胀打击的社会不满情绪混合在一起。参加十字军是改善贫穷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丰衣足食的骑士及其随从的人数远不如跟随他们出征的穷人多。“人民的十字军”和“牧人的十字军”在主要的十字军活动之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启示录》中的梦幻城市，基督在那里吸引着他们。十字军是“一种武装朝圣”，是“对基督的集体仿效，是以在耶路撒冷集体封神为回报的集体牺牲”，是“穷人的救世主即将降临

信仰”的灵感。[31]骑士等级中成功的十字军战士的名字将被镌刻在家[359]乡教区的石碑上。他们双腿交叉成十字而死。他们的绝大多数同伴都没有返回故乡，一般认为是死亡了。当然。十字军的观念并不局限于“圣地”，拉丁教会同样重视在波罗的海（见原书第362—364页）的北方十字军活动和在西班牙的“第三侧”“再征服运动”（见原书第345页）。

十字军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1099—1187年）是第一个“欧洲海外国家”。[32]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旅行被重新开放。意大利城市，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繁荣起来。在教皇的领导下，拉丁教会的集体认同感得到了加强。十字军提供了大量英雄主义事迹和传奇，它们为中世纪浪漫史诗、哲学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十字军也有助于强化西欧的基督教共同体意识、封建主义和尚武精神。十字军导致军事修道团体的产生。由于拉丁人的倒行逆施和见证了这些暴行的希腊人的厌恶，基督教世界从根本上说不可能重新统一了。首先，它们加深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恶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西方人在这种关系中既是侵略者又是牺牲品。总之，十字军战士使基督教走向分裂。

军事修道团，特别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是关于十字军道德争论的焦点。“耶路撒冷的圣约翰的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创立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之后。他们包括军事、医疗和牧人式的教友。亚克失守后，医院骑士团逃到塞浦路斯，统治罗德岛（1309—1522年），最后统治了马耳他（1530—1801年）。“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穷骑士”是为了保护到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而于1188年建立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经营金融和房地产业，从所有基督教徒的财富中榨取了巨额财富。1312年，法国国王以实施巫术、同性恋和异端的罪名而镇压了他们。圣殿骑士团的徽章是两个骑士共骑一匹马，这可以追溯到它的第一任首领雨果·德·帕扬（Hugues de Payens），他因为太贫穷而不得不与朋友共骑一匹马。中世纪的人有一种奇怪的倾向，他们能够把修道的誓言与作为战士的行为调和起来。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都是国际性的组织，在西欧各国都有据点。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条顿骑士团很早就把注意力转向波罗的海。而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阿尔肯塔拉（Alcantara）等军事修道团只在西班牙活动。

1203—1204年对君士坦丁堡令人怀疑的征服足以使人对十字军运动的性质产生怀疑。第四次十字军的军队在威尼斯集结，但是很快便成为威尼斯年迈的总督恩里科·唐多洛（Enrico Dandolo）和德国国王士瓦本的菲里普的阴谋的牺牲品。菲里普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伊琳娜

(Irene)，威尼斯总督则看到了利凡特扩充领土的机会，而德国国王则看到了恢复他侄子的拜占庭王位的机会。因此，为了雇佣威尼斯船队，十字军战士不得不同意与威尼斯人分享战利品，支持亚历克谢四世恢复王位。此外，当他们不能支付船只费用时，十字军被迫攻占匈牙利在达尔马提亚的港口扎拉（Zara）作为抵押品。1203 年 7 月，十[360]字军的船队没有遭到抵抗就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对君士坦丁堡的海防城墙发起猛攻。但是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宫廷政变绞死了亚历克谢四世，因此使十字军的胜利化为泡影。1204 年 4 月，十字军不得不再次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并彻底洗劫了这座名城，教堂被抢劫，居民被屠杀，圣像被砸碎。弗兰德尔伯爵鲍德温被一个威尼斯主教在圣索非亚教堂加冕为“巴塞勒斯”。拜占庭帝国被瓜分为威尼斯的殖民地和拉丁封地。1205 年 4 月，十字军在亚得里亚堡被保加利亚人所消灭。他们从未到达耶路撒冷 1000 英里范围之内的地区，他们犯了“重大叛逆罪”。[33]

第四次十字军在东方留下了两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海峡帝国”和从小亚细亚的尼西亚进行统治的拜占庭帝国残余，前者存在了 60 年，直到 1261 年威尼斯舰队的暂时中断为止，后者恢复了它的地位。从长远来看，威尼斯是十字军运动惟一的受益者。

但是，第四次十字军的完全失败正值许多人所说的拉丁教会的政治顶峰——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期。英诺森出生于洛塔里奥·登纳尼(Lotario d'Anagni)，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投机家，他在位期间，实现了几乎使所有的统治者都服从“神的政权”理想。在德国，英诺森三世玩弄手腕使帝国王位的争夺者不伦瑞克的奥托当上皇帝，然后又出尔反尔地废黜了他。在法国，英诺森三世拒绝批准菲里普·奥古斯都的婚姻安排，通过停止法国的宗教活动，迫使国王在离婚 20 年后又恢复了王后的地位。在英国，经过与约翰王的长期斗争，英诺森三世再次使用停止宗教活动的办法，迫使约翰王屈服。英国、阿拉贡、西西里、丹麦和保加利亚都成为罗马教廷的附庸。1215 年 11 月，教会的第十二次公会议在拉特兰举行，来自所有基督教国家的 1500 名高级教士谦恭地听从教皇的安排。

实际上，拉丁教会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大于对普通男女生活的影响。僧侣统治集团常常不与普通人民接触。异端、皈依异教、疯狂的迷信活动、对教会财富表示强烈不满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克服危机，英诺森三世为两个新的乞丐教友修道团祝福，这些修道团树立了互相帮助的生活榜样。传道修会，黑衣修会或多米尼克修会是由卡斯提尔人圣多米尼克·古兹曼（1170—1226 年）所创立，多米尼克把他们的修道规则写进了 1220—1221 年的两份特许状中。从此他们

特别致力于宣传和研究福音书。小行乞修会、小修会或灰衣修会则由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约1181—1226年）创立，1223年得到了教皇的特许状，从此，他们特别致力于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都接受男女修士，修士们发誓过集体生活，个人不拥有任何财产。1274年，由于其他行乞修会的加入，他们得到进一步[361]的发展，这些新加入的修会包括“可怜的克莱尔”修会、托钵僧团或白衣修会以及奥斯汀修会等。与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修道院的修士的虔诚有时遭到人们的怀疑，而“快乐的托钵僧”受到俗人的欢迎，但是不受高级教士的欢迎。

圣弗兰西斯无疑是最令人怀念的中世纪基督教人物。他出生于翁布里亚（Umbria）的阿西西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经常与乞丐交换衣服穿，并宣布放弃遗产继承权。他是“贫穷小姐的丈夫”，曾经在阿西西的一个山洞里隐修，1219年，他跟随一支十字军达到埃及。他对创立“可怜的克莱尔”修会的影响大于对创立弗兰西斯修会的影响。1224年，圣弗兰西斯在韦纳（Verna）山上祈祷，他的身体在山上的轮廓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疤痕相吻合。他对自然的传奇般的思索能力从他所创作的“太阳雅歌”和后来的“圣弗兰西斯与相伴的小鲜花”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深入每一个基督教徒心灵的赞美诗和祈祷文的作者：

“主啊，让我成为您的和平的工具吧；
哪里有怨恨，就让我到哪里播种友爱，
哪里有伤害，就让我到哪里播种原谅，
哪里有怀疑，就让我到哪里播种信仰，
哪里有绝望，就让我到哪里播种希望，
哪里有黑暗，就让我到哪里播种光明，
哪里有悲伤，就让我到哪里播种欢乐。
神圣的主啊，请允许我寻求
安慰他人，而不是寻求被他人所安慰，
理解他人，而不是寻求被他人所理解，
爱他人，而不是寻求被他人所爱；
因为我们在给予他人中获得，
在原谅他人中被原谅，
在死亡中永生。”[34]

托钵僧在欧洲大学的兴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已经形成了一条原则，认为除了神学以外，世俗学术也有价

值。但是没有教会的批准而设立的教育机构不被承认的。因此“大学”被划分为4到5个系：神学、法学、医学、艺术或哲学、音乐，大学的观念由特许状形成，由自治的学术团体管理。在欧洲的高级大学中，紧接着波伦那大学（1088年，1215年重建）之后创办的是巴黎大学（大约1150年），然后是牛津大学（1167年）。到1300年，一批大学兴起于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后来越来越多。（见原书附录Ⅲ，第1248页）

对阿尔比派的讨伐（1209—1229年）展示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另一面。1199年，英诺森三世宣布异端是“上帝的背叛者”。他谴责的对象是朗格多克的阿尔比派。作为古代诺斯替派、摩尼教和保加尔派的精神后裔，阿尔比派最早出现于波斯尼亚，曾经成为米兰宗教会议异端审判的主要对象。然后他们迅速传播到阿尔比、阿让（Agen）、卡[362]松卡松（Carcassonne）和图卢兹的一些纺织业城市，并得到这些地方的伯爵的保护。阿尔比派认为，普遍存在的邪恶与惟一的造物主的仁慈并存是矛盾的，因此，善良和邪恶一定是各自分离的创造物。阿尔比派遵守素食、禁欲、道德严谨的教规，实行男女平等，维护一个“完人”等级，这些完人负责管理宗教仪式。1167年，阿尔比派在图卢兹附近的圣费利克斯·德·卡拉芒（Saint Felix de Caraman）成立了“背教者委员会”，与小亚细亚的背教者联系。1179年，教会召开第十一次公会议，讨论阿尔比派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出结论，圣多米尼克的布道也对它不起作用。1209年教皇的特使被谋杀，教皇以此为借口全面攻击阿尔比派。[**保加尔派**]

英诺森三世以与十字军相同的理由宣布发动一次十字军，反对罪不可赦和掠夺成性的伊斯兰教。在第一阶段，即1209—1218年，来自法国和勃艮第的12000名骑士在老西门·德·孟福尔的带领下，与盘踞在图卢兹的雷蒙德（Raymonds）六世和七世领导下的异端教派展开激战。在第二阶段，即1225—1271年，法国国王的军队介入了这场冲突。卡特里派教徒（Cathars）面临着放弃信仰或死亡的两难选择。由卡特里派的背教者、同性恋者罗伯特率领的宗教裁判所到处实行严刑拷打的恐怖措施。1224年，在“完美者”的圣地蒙塞库（Montsegur），200名顽抗者被押到一个巨大的柴堆上活活地烧死。通过武力和审判，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年复一年地持续着铲除异端的行动。1255年，奎里巴斯（Queribus）城堡被攻陷。到十四世纪，卡特里派发现自己处于罗马天主教的包围之中。卡特里派的朗格多克也被兼并为法国的一个省。法国的统一是建立在米迪的悲惨遭遇基础之上的。[35]

但是，十字军运动还有其他作用。既然十字军可以用于反对异教

徒，那么它也可以用于反对更靠近家门的非基督徒。1147年，圣伯纳德发现，萨克森贵族更热衷于进攻斯拉夫人，而不是到圣地去打击穆斯林。于是教皇发布了名为 *Divina dispensatione* 的通谕，圣伯纳德敦促北方的十字军战士“反对非基督徒，直到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皈依基督教或被消灭。”[36]温迪什（Wendish）十字军的目的（1147—1185年）就是萨克森人、丹麦人和波兰人强迫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卢萨提亚（Lusatia）的各个部落皈依天主教。

1198年，不来梅大主教哈维格二世（Hartwig Ⅱ）在立沃尼亚（Lionia）发动了另一次“持续的十字军”，由于得到德国武装修会“宝剑兄弟会”的支持，他创立了一个组织，逐渐使波罗的海东北部地区都被天主教所控制。立沃尼亚被骑士团征服，爱沙尼亚被丹麦人征服，芬兰被瑞典人征服。一位无名作者在《立沃兰纪年诗》（Livlandische Reimchronik，约1295年）中记载了这些人以上帝的名义烧杀抢掠的情况：

[363] “第一把大火燃烧了一天
它是由隐修士格雷点燃的，
一名黑衣修士点燃了另一把大火。”[37] [国旗]

“普鲁士十字军”始于1230年，自从圣沃特捷赫（St Vojtech）以来，普鲁士人就保持了独立，但是他们担心当地的波兰王公对他们发动袭击。波兰王公马佐维亚的康拉德（Conrad of Mazovia）决定引进一个小规模的军事修道团“条顿骑士团”来解决这个问题，自从被逐出圣地后，条顿骑士团就无所事事，马佐维亚的康拉德正在播下互相斗争的种子：条顿骑士团不仅没有履行他们的契约，反而从皇帝和教皇那里取得了永久进行十字军活动的特许状，并扎根于此。通过与各种资助人的巧妙周旋，条顿骑士团逃避了外界的控制。1234年的教皇通[364]谕（Pietati proximum,）宣称普鲁士是教皇的封地，它仍然是一个硬性的条文，正如1245年帝国颁布的法令一样，后者声称拥有库尔兰（Courland）、塞米加里亚（Semigalia）和立陶宛的主权。兄弟会骑士团身穿白色外套，高举黑色十字架，当他们走过托伦（Torun，1231年）、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克维曾（Kwidzyn，1233年）、埃尔宾（Elbing，1237年）时，他们肆无忌惮地压迫当地人民。到1295年镇压了一次非基督徒叛乱后，普鲁士变成了条顿国家，成为欧洲腹地的一个独立的十字军基地。

条顿骑士团的方法和动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波兰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邻居强烈地抱怨教皇，后来还把这个问

[363]

国旗（DANNEBROG）

1219年6月15日，远征爱沙尼亚的军队遇到了灾难。当地的爱沙尼亚人已经臣服了“胜利者”弗拉基米尔国王，弗拉基米尔正在准备让爱沙尼亚人接受洗礼，但是他们半夜里冲进丹麦人的军营，杀死主教，把十字军战士赶入大海。根据传说，当天空落下一面绣着白色十字架的红旗并传来敦促丹麦人集合的声音时，战局才发生了逆转。弗拉基米尔取得了胜利。丹麦人建立了塔林（Tallin）或“丹麦人的城堡”，并且采用“红布”（Dannebrog）作为国旗。

从此以后，每个独立的国家都采用自己的国旗，像丹麦国旗一样，绣上十字架——英国国旗上有圣乔治的红色十字，苏格兰是蓝色的圣安德鲁斜形十字，瑞典是蓝底黄十字，采用丹麦人的颜色，但是十字的形状不同。联合王国的“杰克联盟”旗则融合了圣乔治、安德鲁、帕特里克十字，在爱尔兰联盟之后于1801年元旦首次在天空中飘扬。

除了国旗外，欧洲所有的君主国都用王室旗帜。丹麦的王室旗帜中心是红色，绣着三只天蓝色的狮子，站在田野中，它可能比国旗出现得更早。

追随尼德兰人的榜样（1652年），许多现代共和国的国旗采用三色或两色。有些国家的国旗颜色是竖条的，如法国（1792年）、意大利（1805年）和爱尔兰（1922年）。其他国家的国旗颜色则是横条的，如德国（1918年）和俄国（1917年）。大多数国家的国旗不得不与敌对政权的国旗展开竞争。国旗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被采用的国旗的顺序与欧洲各民族共同体成熟的先后不无关系。

题提交给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没有看到这种差异：

“像所有的十字军战士一样，条顿骑士团的主要动机是通过牺牲来赎罪。他们选择的方法似乎是奇特的，特别是与弗兰西斯修会所使用的爱的方法相比……但是条顿骑士团和隐修士……使用的方法其实是相同的：他们都试图在不脱离现实世界的前提下实现灵魂的救赎和圣洁……他们都是用非修道院的生活方式献身于修道活动。”[38]

这样一来，文明就取得了进步。

十三世纪，东欧遭受了大规模的入侵，与这些入侵活动相比，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旋风般地横扫亚洲大草原，1207年，成吉思汗的儿子兀赤征服了南西伯利亚；1223年，他又掠夺了外高加索，在加尔加（Kalka）河畔打败了基辅军队。1236—1237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脉，掠夺了梁赞和弗拉基米尔的封建公国，把莫斯科夷为平地。1240年，拔都的军队围攻基辅，然后向西挺进。1241年，加里西亚遭到抢掠，克拉科夫被夷为平地。1241年4月9日，大胡子亨利（Henry the Beard）率领的波兰王公的军队在西里西亚的莱格尼察（Legnica）原野被蒙古军队打败，溃不成军。据说，作为胜利的证明，蒙古军队割下被杀死的人的右耳，装了9个大袋。另一支蒙古军队打到了匈牙利，贝拉（Bela）四世率领的马扎尔诸王公在蒂萨（Tisza）河畔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后拔都班师向东，在伏尔加河口的撒拉伊（Saray）驻扎下来，1259和1287年，拔都的军队再次发动了毁灭性侵略。**[海吉纳特]**

蒙古人的侵略改变了几个国家的面貌。拔都汗的骑兵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建立了“金帐汗国”，取代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并抢掠了保加尔人豪华的都城。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可汗（1552—1556年最终被莫斯科公国兼并）把亚洲人口安排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现代“鞑靼斯坦”（Tartarstan）的基础。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建立以巴克什撒莱（Bakshishsarai）为中心的繁荣国家，它脱离“劫掠伙伴”而存在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出现导致了后[366]来第涅伯河和顿河的哥萨克的兴起，并且延缓了邻近的乌克兰人的定居。

被剥夺了很多人口的波兰和匈牙利只得尽力恢复。在这两个国家，由于神圣罗马帝国为他们提供了殖民地，所以蒙古的入侵加速了已有的移民和殖民过程。德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个时期也迁徙到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当地的王公以优惠的土地占有条件提供土地，引诱大批农民经过艰苦跋涉向东迁徙。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复兴了，并且得到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式的特许状，还有少数城市得到了吕贝克式的特许状。那个时期的城市——如布雷斯劳（Breslau，1242年）、布达（1244年）、克拉科夫和其他城市——都受德国法律的管辖，并且充斥着德国商人。除了汉撒同盟和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活动外，这些变化还极大地增强了德国的影响。**[布达]** **[汉萨同盟]**

蒙古人的入侵打破了东斯拉夫人的统一，蒙古人已经征服了东斯

[365]

海吉纳特（HEJNAŁ）

海吉纳特（HEJNAŁ）起源于匈牙利语，意思是“黎明”，引申为“起床号”，到波兰语中，意思是“集合号”，表示敌人即将到来的警报。



今天，“圣玛利亚集合号”是古老的克拉科夫城的奇闻轶事之一。它是从一座俯瞰城市广场的教堂钟楼上吹响的，每小时正点吹响一次，一年四季，昼夜不停，每次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重复一遍。号声是由简单的和弦曲调组成，每个方位吹完之后有短暂的停顿。“圣玛利亚集合号”是为了纪念1241年，也许是1259年吹号报警时被蒙古人的箭头刺穿咽喉的号手，当时他的报警虽然被中断了，但是城里的人还是逃走了。幸存者决心募捐基金永久地纪念这位城市号手。

这种仪式持续了700多年，只有十九世纪和1939—1945年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暂时中断过，它比所在的教堂还古老。现在的号声曲调是十七世纪定型的。1945年后，波兰广播电台用它作为正午12点报时的序曲，提醒千百万听众波兰文化的古老谱系和波兰容易遭受外族入侵的地理位置。它是成吉思汗及其铁骑突然入侵欧洲腹地的少数遗物之一。

1405年10月25日，瑞典的洛桑城发生重大火灾，主教立即颁布了11条防火令。其中第5条规定：“夜晚每小时，大教堂的敲钟人必须大声地报时，并唤醒其他城区的守更人……漏报一次重罚6第纳尔。”600年后，每晚从10点起，守更人的报时声仍然在四个方位回响：“10点啦！”

在约克郡的里彭（Ripon），人们都说，自从886年以来，他们的“特许号”每晚都吹响。

1987年，在丹麦的埃伯尔托夫特（Ebeltoft）成立了“欧洲地面和钟楼守望协会”，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现代复兴守更的城市。克拉科夫、洛桑、里彭、安娜贝格（Annaberg）、策勒（Celle）、德国的讷德林根（Nordlingen）、瑞典的于斯塔德（Ystad）等都是能够声称“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守更习惯的特选城市。

拉夫人的土地。罗斯的一些王公通过转向立陶宛而最终得以幸免。但

是在东部的那些王公，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被迫“低下了高昂的头颅”，由于定期被召唤到金帐汗国的大营，所以他们被迫行走于篝火之间，弯腰于牛轭之下，在主人面前卑躬屈膝。它是一种仪式上的侮辱，目的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屈辱身份。罗斯王公的臣民必须交纳贡金，由驻在当地的蒙古“巴思基基”（Baskiki）或总督负责征收。但是东正教教会不受压迫，这是一个“鞑靼牛轭”的时代。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描绘了这个时期罗斯省的情况：

“这个省的面积广大……它的北部边界被称为‘黑暗的地区’。它的居民都是基督徒，但是实行希腊教会的礼拜仪式……男人的容貌英俊，身材高大，皮肤光滑；女人身材适中，浅色的长头发。这个国家向西鞑靼人进贡……其中包括大量的貂皮、紫貂皮、貂鼠皮、狐狸皮……还加上许多蜡。它有几个银矿……它是特别寒冷的地区，我觉得它的边界延伸到‘北海’，那里的猎鹰被大量地捕捉。”[39]

[367]

布达（BUDA）

1244年，匈牙利国王贝拉（Bela）四世颁布特许状，授予多瑙河畔的“自由城市”布达自治权。他的决定构成了鞑靼人入侵后更广泛的城市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从此，布达城就按照马格德堡法律管理内部的事务，国王只保留了少数管辖权。同样的自治权也授予了与多瑙河对岸的布达城堡的周围地区，从而在一个城市内创立了两个单独的管辖单位。[1] 布达，在德语中称为“奥芬”（Ofen），1361年后继埃斯特冈（Estergon）成为匈牙利的首都。

创建城市的特许状中授予的权力性质对一个城市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国王和诸侯授予城市特许状是最常见的事，但是在德国，许多主教也积极地参与。贵族势力强大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自治城市也就能够大量地涌现，成为逃避教会和国家压迫剥削的绿洲。城市的发展加强了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分裂倾向。在匈牙利，它补充了封建伯爵领地和贵族自由的现有体系。

采用马格德堡模式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居民都是德国人。马格德堡法律被东欧和中欧所有的德国城市和非德国城市所采用，但是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佩斯和布达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德国人社区，直到1872年，匈牙利再次宣布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二元君主国之后不久，佩斯与布达才联合成一个市政府。1896年，

佩斯和布达举行了一次大型庆典活动纪念匈牙利立国1000周年。

匈牙利的千年庆典自然集中于圣斯蒂芬和教皇赐予的王冠。像佩斯城的建立一样，这件事被认为巩固了匈牙利与西欧的长期联系。斯蒂芬的王后吉斯拉（Gisella）是巴伐利亚亨利（后来当选为德国皇帝，被封为圣徒）的姐姐。1001年，斯蒂芬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这有助于他驱逐得到保加利亚和东正教会支持的王位竞争对手。从此，像波兰一样，匈牙利牢固地加入了西欧天主教阵营。

带有圣斯蒂芬名字的王冠现藏于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成为匈牙利顽强的生存能力的象征。从阿帕德王朝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匈牙利国王都戴过它，是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加冕活动中的必要附属物。它多次失踪或被隐藏，但是从未被损坏。1405年，当卢森堡王朝的西吉斯孟德非法把它盗运出境时，它因不小心而被掉入了奥地利的一片沼泽地里，因为王冠发出耀眼的光线而被找到了。1945年，圣斯蒂芬王冠再次被走私到美国，秘密的存放在诺克斯堡（美国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备地）。1978年，圣斯蒂芬王冠重返布达佩斯，尽管当时匈牙利还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 [368]

因此，人们不禁会怀疑，“圣斯蒂芬的王冠”是否属于圣斯蒂芬。虽然它后来属于圣斯蒂芬，但是它不可能起源于罗马。根据最近的学术研究观点，王冠上主要的黄金条纹是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制作的，可能是为了盖扎一世（Geza Ⅰ，1074—1077年在位）的王后辛奈丁（Synadene）制作的。在传统观点中，这顶“希腊王冠”是按照旧的教皇斯蒂芬一世戴过的“拉丁王冠”的模型制作出来的。[2] 在现代观点中，这顶王冠与圣斯蒂芬惟一可能的联系是它最初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现在已经遗失的“真正的十字架”的残骸，“真正的十字架”曾经安放在拉丁王冠的拱形条纹顶上。

无论它们起源于哪里，王冠的希腊和拉丁组成部分共同表明，它不仅是匈牙利与西方的联系，而且是中世纪匈牙利就位于基督教共同体的核心的最恰当的遗物。希腊王冠镶嵌着一圈宝石和一小块珐琅。王冠的正前部是耶稣基督（Christ Pantokrator），背部相应地是带着绿色光环的皇帝迈克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ukas，1071—1078年在位），迈克七世两旁分别是王子康斯坦丁和国王盖扎的肖像。盖扎的徽章上刻着希腊文铭文：“土耳其的虔信者国王盖扎。”王冠边缘上装饰着拜占庭的大天使和圣徒像。相反，拉丁王冠上装饰着八个使徒像，在他们的中间加冕。一个倾斜的黄金十字架正好遮掩了整个画面，1551年，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个皇帝加

冕时，这个黄金十字架取代了原先王冠上的十字架。[3]

可以肯定的是，这顶王冠被赋予的恰当品质——即“它的不可能永远失踪的能力”。[4]

与以前的看法相反，中世纪的经济生活不是停滞的。有一个学派的人认为，这个时期的北欧发生了“农业革命”，它的历史后果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后果是一样的。[40]这种观点强调新的动力来源，例如水磨和风车，强调采矿活动的扩大以及铁铧犁和马匹作动力的影响，强调作物的轮种方法和土地肥力的提高。有时新技术要经过几个世纪才得到广泛应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连锁后果是决定性的。农业转移到更肥沃的河谷地区。食物供应的增加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涌进城市，增添了新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用于采矿和纺织等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城市增多了，海上贸易也急剧地扩大了。[犁] [穆拉诺]

[369]

穆拉诺（MURANO）

穆拉诺是威尼斯礁湖中的一个小岛，有一座罗马式教堂——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 e Donato），始建于999年，它是以前威尼斯共和国的玻璃制造地。

欧洲古代就制造玻璃，但是希腊和罗马的玻璃质地粗糙而且不透明。只有在穆拉诺，在十三世纪之交，玻璃制造者才制造出既结实又透明的玻璃。这种玻璃制造的配方保密了几十年，但是它被泄漏给纽伦堡，然后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

透明玻璃使光学成为一门科学，而且在精密仪器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到1260年，透镜和光折射原理已经被人们掌握，罗杰尔·培根被委托设计了第一幅眼镜。[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一扇彩色玻璃上有帝国皇帝亨利七世（死于1313年）戴着一幅眼镜的肖像画。] 十四至十六世纪，玻璃窗逐渐流行，首先是教堂和宫殿后来越来越多地用于下层人的住宅。热水瓶、蒸馏器、试管促进了炼金术和后来的化学实验的发展。园艺用的钟形玻璃和温室花房改变了园艺市场。显微镜（1590年）、望远镜（1608年）、气压计（1644年）和温度计（1593年）等以玻璃为基础的仪器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穆拉诺首先制造的镶银玻璃镜使我们

观看我们自己的形象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玻璃的社会后果是深远的。眼镜的使用延长了修士和学者的阅读寿命，加速了知识的传播。玻璃窗增加了室内工作的时间和效率，特别是在北欧地区。工作场所的采光和加热条件都更好。温室花房极大地改善了花卉、水果和蔬菜的种植，给人们带来了以前只有地中海地区才知道的更健康和更丰富的菜肴。防风灯、封闭式的马车、表玻璃都出现了，精密仪器促进了广泛的科学领域，从天文学到医学。

玻璃镜具有重大的心理后果。能够看见自己的清晰面部的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觉意识，他们更加注意外表，从而注意衣着、发型和化妆品。他们还导致思考外表形象与内心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导致对人的性格和个性的研究。他们促进了对肖像画、传记和时尚的追求。例如，内省的非常非中世纪的习惯被强烈地反映在伦伯朗的绘画中，特别是在小说中。凡尔赛宫的"镜厅"于1684年11月15日开放，它是当时的一个奇迹。跨过中央大厅的全面墙壁并俯视花园，它的巨大的玻璃镜反射了17面大窗的和17盏枝形吊灯的光线。"镜厅"是沙特尔教堂的世俗对应物。 [370]

古代人透过玻璃只能模糊地看到外面，而现代人透过玻璃能够清楚地看到外面，用令人震惊的、发光的光线的瀑布，这种光线直透他们最内心的生活。[1]

其他史学家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与前面的条件相比，城市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城市的活动被看成欧洲经济"起飞"的证据。[41]这也许是一种夸张。1180年后，香槟、拉格尼（Lagny）、普罗旺斯、特尔瓦的旷野上每年举行的大型集市的确是一种重大的发展。它们位于伦巴第、莱茵兰、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城市之间，为商人和银行家提供了国际贸易的场所。人们可以说，这些集市如果不是整个欧洲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欧洲范围的经济体系的中心。

城市的财富奠定了许多政治问题的基础。城市正在取得向地方主教或伯爵权威挑战的手段，正如行会和商人公会能够向城市长老施加压力一样。(第一次被记载的罢工是1245年都埃纺织工人罢工。[42]) 城市里的封建等级制度正在削弱。在德国，科隆和纽伦堡等城市自治有助于解释教会和贵族都不能重新对城市强加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权威。在意大利，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的巨额财富是导致归尔夫派与齐伯林派之间斗争如此激烈、教皇或皇帝都无法调停的原因。在弗兰德尔，城市的过剩人口为向东迁移提供了重要的来

源。东欧与西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反差——但是这种反差并不是互相依赖的明显标志。欧洲正处于变化之中。

1262年12月5日，荷兰伯国的斯希丹（Schiedam）。乌得勒支主教亨德里克在圣尼古拉斯节前夕授予一座教堂特许状，这座教堂是由荷兰和泽兰的摄政、女伯爵阿莱黛·冯·亨戈雯（Aleida van Henegouwen）在斯希丹的“新土地”上建造和捐赠的。

[371]

犁（PLOVUM）

沉重的、铁制的三件组装犁比简单的木制“刨犁”复杂得多。装上了一片垂直的犁头铁，一个水平的犁头，一块倾斜的犁壁，通常还装有一个轮子，这种重犁能够翻起沉重的泥土，但是它需要一种古代世界很少能够获得牵引力量。从普林尼第一次在波河流域见到它，到十一、十二世纪它被北欧各地普遍采用，历经了1000多年。在此期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牵引它。中世纪早期，通常使用牛队。土地根据普劳兰（ploughland）或牛帮来丈量，即一个牛队所能够耕种的单位面积。但是公牛的牵引速度太缓慢，购买和饲养一个8头公牛的牛队都是十分昂贵的，马匹饲养快，但是力气小，而且繁殖力不强。

铁犁能够被使用之前必须具备5个条件。第一是健壮的农业马匹——加洛林时代的战马的后裔——的饲养。第二是马颈圈，它在800年之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能够使适合负重的动物在不被勒死的情况下拖拉最大量的重量。第三是马蹄铁，它于900年左右被采用。第四是耕地马匹的主要食物燕麦的种植。最重要的是作物轮种的三田制。从两田制转变为三田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至少提高了农民家庭的劳动生产率50%。它使农田可以种植四种谷物，有效地分配了农民春播与秋播之间的辛勤劳动，但是它对犁的耕地能力的要求有显著的提高。

最迟到十二世纪，从法国到波兰的北方农业革命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史学家将修改这个课题的一些比较简单的等式，如梅提泽（Meltzen）的“刨犁+十字犁=方形田”，或马克·布洛赫的著名的“三件犁+轮子=条田=开田制=公共农业”。但是主要观点还是被人们接受了。方形的山地田需要十字犁，常常被废弃，而长方形的开田常常出现在难以耕作而肥沃的山谷之土地。欧洲的自然景观永远地被改变了。田野点缀了熟悉的沟垅形状。从犁地

中节省的时间能够被用于扩大耕地面积。森林被砍伐了，沼泽地被排干了，围海造田的土地也被开垦了。山谷里建起了比较大的村庄，条田的耕作被新的公共管理的方式规划了。村民委员会和庄园经济都在发挥作用。欧洲从中获得了更有营养的食物供应，这些食物维持了工业革命前相应的人口增长。

两年以后，女伯爵阿莱黛命令在斯希（Schie）小河注入莱茵河三[372]角洲的地方修筑一座堤坝和水闸拦断河水。它的目的是控制连接附近城市代尔夫特与代尔夫夏文（Delfshaven）的内河小港口的水道，也是为了与上游两英里的罗特（Rotte）小河的另一座堤坝和水闸相连。3年以后，1270年8月11日，年轻的伯爵弗洛里斯五世授予鹿特丹市民特权。[44]大约与此同时，在鹿特丹以北35英里的阿姆斯特尔（Amstel）河上开始建造一座堤坝。莱茵河三角洲正在逐渐被控制。

虽然不是该地区最早的人工建造堤坝，但是这些堤坝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有助于在危险的海滩上进行商业航行，这些海滩从斯海尔德河（Scheldt）到埃姆斯河（Ems）（见地图13）延伸成一个大约25000平方公里（10000平方英里）的巨大扇形。从事后来看，这些堤坝对该地区发展成为欧洲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世界最大的港口、欧洲最独特的民族之一都起了关键作用。当时看起来也许不是这样。

荷兰乡村是神圣罗马帝国中比较遥远而且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荷兰”是“沼泽地”的意思，这表明它是完全被海水淹没的荒地的事实。它是低地国家中海拔最低的地区，即所谓“尼德兰”。在面向大海的环形沙滩与内陆的硬地之间，尼德兰至少有2/3的面积低于海平面，它的绝大部分是由潮湿的平地、盐碱地、被淹没的海岸、盐湖和浅滩组成，一般只能依靠小船才能通行，除非在冬天，当浅滩的海水结成坚硬的冰块时，冰面上才成为可以通行的道路。

莱茵河三角洲是欧洲形成最晚的地形，因此它的形状是不断变化的。它形成于最后冰川期之后的几千年，是由三条从南向北流动的河流——斯海尔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的河水与海潮相互冲击而形成的。因此，它明显地处于不断变化和迁移之中。海岸的沙滩形成了一道高70米、宽4—5公里的巨大沙丘界线。在沙丘之外，河床的淤泥堆积成曾经移动的轮廓，河流的淡水不断冲破抵抗最小的地点，从而形成新的出海口。在罗马时代，许多海岸要塞屹立在内陆大泻湖之外的沙滩上。“旧莱茵河”的主要河水经过现代莱顿的一条水道注入大海，而“旧马斯河”则改道向南约20英里处单独入海。

但是1000年里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839年，大洪水曾经使莱茵

河主流改道进入马斯河，形成了与莱克河和“新马斯河”相通的水道。到北部的淡水泻湖由于缺水而淤塞了。十二和十三世纪，更加温暖的气候导致海平面逐渐上升。沙丘被海水冲垮，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被分成几处，打通了安特卫普与大海的交通联系，岛屿也增加了。海水倒灌使北部的泻湖变成一个宽阔的海——须得海（Zuider Zee），[374]它把弗里西亚分成两部分。高涨的潮水正在越过主要河道的支流，威胁着位于它们岸边的城市的生存。这是刺激修筑堤坝的力量。

十三世纪中期以前，人类被局限于居住在三角洲地区的三种地方。大陆的边缘有一条古代城市带。奈梅亨附近的阿纳姆和乌得勒支

[373]



地图13 低地国家，1265年

都是罗马时代建立的城市。安特卫普是围绕着七世纪在斯海尔德河畔的圣阿曼德（St Amand）教堂发展起来的。还有少数人居住在沙丘上，例如从1120年起，瓦尔赫伦（Walcheren）河畔修建的米德尔堡（Middleburg）修道院，或1242年居住在海牙的猎户。许多渔村建立在沙丘的背风处，并获得了城市身份的特许状，如多特雷赫德（1220年）、哈勒姆（1245年）、代尔夫特（Delft，1246年）、阿尔克马尔（1254年），但是它们的人口都没有附近的弗兰德尔纺织城市那么多。几个世纪以来，乌得勒支主教行使着重大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而三角洲地区的港口长期成为沿海贸易的中转站。

开垦土地是一种古老而不断提高的技术。荷兰"人工围垦"的特点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在这些人工围垦的土地上，可以安全地建造房屋。普林尼就提到过荷兰的人工围垦。最早的"海防堤"修建于八、九世纪。十一世纪后，内河大堤的水闸遍布各地。围海造田取决于一套复杂的排涝系统，这种排涝技术直到1150年左右才被掌握。堤坝的修建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木桩被深深地打进松软的土地，然后填进瓦砾和石头，种上固定地皮的草。一旦土地被围垦了，那么土地就必须反复地用淡水淹没10—15年，并多次排干，直到分解了它的盐分，肥沃的淤泥才能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土地的肥力是相当好的：出产肉、毛和皮的绵羊和牛群可以在海滩草地上放牧，这些海滩草地为稠密的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出口到其他城市的大量农牧业产品。

十三世纪，荷兰的围海造田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只能将沼泽地的边缘小块地围拢。在风力驱动的排水器发明之前，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排除大面积的海水。1421年爆发的可怕的"圣伊丽莎白洪水"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淹没了72个村庄和一万人口，毁灭了两个世纪围海造田的成就。直到1550年带小塔的风车发明后，位于海平面以下需要永久排涝的更多土地才能开垦，因为这种风车可以不停地排水，无论风向如何变化。直到1918年制定"土地开垦法"前，荷兰没有全国性的围海造田计划。另一场灾难性的洪水发生于1953年，此后荷兰政府制定了伟大的"三角洲计划"（1957—1986年）管理全国的内河，并使河道直通大海。800年顽强改造自然的历程必然会对荷兰[375]人产生影响。有些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荷兰人性格的决定因素。

大坝的修建标志着荷兰悠久的围垦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它改造了一系列内河水道，这些水道由水闸管理员控制。由于海上航行的船只不能轻易地通过这些狭窄的闸门，所以港口就在这些大坝两岸发展起来，大船运载的货物在这些港口由较小的内河船只转运。斯海尔德—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都是从这些海上贸易与内河贸易的中转中

发展起来的城市。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导致竞争对手崩溃的外来因素，那么这些城市就不可能得到如此突出的发展。在这些外来因素中，最重要和出现较晚的是安特卫普的彻底毁灭，这是由于1648—1863年强大的围海造田计划所引起的。

荷兰位于帝国东部边界的战略位置使它深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荷兰曾经是"罗退尔"中部王国的北部边界，十世纪时，它曾经归属西法兰克，925年才完全归属于东部帝国。此后300年里，作为"下洛林公国"的一部分，荷兰卷入封建诸侯的长期斗争、帝国与新兴的法兰西王国的争夺之中。

荷兰伯爵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德克一世（Dirk Ⅰ），他是十世纪早期在莱茵河三角洲地区建立军事据点的维京人的后裔。922年，德克一世被授予哈勒姆附近的土地，他们称这块土地为肯尼姆兰（Kennemerland），德克一世在那里创建了埃格蒙特（Egmont）修道院。1018年，德克三世在一次著名的堤坝战役中驱逐了洛林公爵，在莱茵河下游设立了通行关卡，德克家族的地位正式确立，德克三世首次在他的头衔中使用了"荷兰"的名称。因此，在获得了哈勒姆的城堡后，伯爵卷入了不断的封建纠纷之中。荷兰是许多利益跨帝国边界的小伯国之一。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都不能对它施加长久的影响，除非通过从伯爵的附庸中寻找代理人的手段。"低地国家"，即尼德兰的封建领主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他们因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地区，它既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法国。

在这个过程中，荷兰只是一股较小的势力。强大的乌得勒支主教、列日主教、洛林公爵、布拉班特公爵和相邻的弗兰德尔伯爵的实力都很强大。荷兰与弗兰德尔之间围绕泽兰争夺了几个世纪，直到1253年《布鲁塞尔和约》方才解决。荷兰伯国对邻居弗里斯兰——查理曼时代仍然信奉异教——的征服更多地依靠大海的洪水，而不是成功的战争。由于弗莱芒地区密集城市的人口过多，所以悲伤的弗里斯兰人形成了最大的移民潮，他们只得垦殖德国东部边区的土地。

[376] 但是，荷兰的伯爵都是具有相当政治资本的人。威廉一世（1205—1222年在位）在布汶战役中站在帝国一边，结果被法国俘虏。像他从撒拉森人手中夺取了里斯本的祖先一样，威廉一世也是一名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参加围攻埃及的杜姆亚特（Damietta）的战役中阵亡。威廉二世（1234—1256年在位）决心在帝国内取得最高尊严。由于未成年，所以威廉二世由监护人、乌得勒支主教抚养长大，被迫卷入教皇英诺森四世废黜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政治斗争之中。1247年，在教会的支持下，威廉二世在亚琛加冕为罗马人的国王。与一个教皇派女公爵结婚后，威廉二世与莱茵河地区的城市结盟，并很快就

在德国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优势。1256年1月，他回到荷兰处理弗里斯兰的一些问题，然后前往罗马加冕称帝。但是由于马匹陷入冰窟，他的锦绣前程也被葬送了。由于偶然事件，一个荷兰人差点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弗洛里斯五世（1256—1296年在位）是威廉二世之孙，他将成为荷兰第一王朝的倒数第二个统治者。他最终解决了弗里斯兰问题，赢得了最下层臣民的拥护。面对联合了乌得勒支暴民的农民叛乱，他决心遏制地方司法官的专横，制定了一部成文法典。他在传奇中被尊称为“农民的上帝”。他长期与英国的爱德华一世保持结盟，把儿子和继位人送到英国宫廷接受教育，并与英国公主联姻。这个继位人就是弗洛里斯伯爵，荷兰的“编年诗”《Rijmkronik van Melis Stoke》中的英雄：

> “年轻的伯爵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 他是历史的奇迹。”[45]

阿莱黛·冯·亨戈雯是弗洛里斯五世的姑妈和监护人，伯爵未成年时，她是荷兰的摄政，是尼德兰地区掌握国家大权的几个妇人之一。其他几个掌权的妇人中，最著名的是弗兰德尔特殊的女伯爵玛格丽特，被称为“黑色的玛基”。玛格丽特女伯爵（卒于1280年）一生陷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封建幸运和不幸之中。她是鲍德温九世伯爵的幼女，鲍德温九世是第四次十字军的首领，在东方建立了拉丁帝国。像她姐姐朱安娜一样，玛格丽特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父亲去世后才被带回弗兰德尔，后来又与朱安娜一起被押作英诺森三世的政治人质。童年时代，玛格丽特见到姐姐朱安娜与法国国王的外甥、葡萄牙的费尔南多成婚，而她自己则作为娃娃新娘许配给埃诺领主布沙尔·达维尼斯（Bouchard d'Avesnes）。布汶战役后，费尔南多被囚禁在卢浮宫地牢中，玛格丽特看到了姐姐再婚，嫁给了萨伏依的托马斯，在[377]教皇的干预下，玛格丽特被迫离婚，改嫁法国的骑士盖伊·德·丹皮尔（Guy de Dampierre）。1224年她成功地继承朱安娜而成为埃诺和弗兰德尔女伯爵时，她已经是结过两次婚、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了，是当时子女幸存较多的女人。她无法阻止大儿子与二儿子围绕继承她的遗产而发生内讧，被迫接受法国圣路易的著名调解，圣路易把埃诺授予让·达维尼斯（Jean d'Avesnes），把弗兰德尔授予圭拉姆·德·丹皮尔（Guillaume de Dampierre）。但是玛格丽特比他们更长寿。

虽然弗兰德尔被布鲁日和根特这两个城市的斗争所削弱，但它仍然是尼德兰政治斗争中最富庶的战利品。弗兰德尔的命运与荷兰没有

什么两样。弗兰德尔伯爵曾经在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的斗争中采取中立政策，从两边都接受了封地，创立了被称为克隆弗兰德（Kroon - Vlaanderen）和雷克斯弗兰德（Rijks - Vlaanderen）的领土。但是布汶战役后，法国对弗兰德尔的影响急剧增强，最后法国占领了它。1265年，教皇与皇帝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腓特烈二世死后，教皇阻止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事业。威廉伯爵的事故被悬置起来，帝国大空位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1257年，帝国举行了两次皇帝选举：一次是帝国选帝侯的集会，做出了有利于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的决定，第二次集会则决定选举卡斯蒂尔国王阿方索为皇帝。与待在家乡托莱多的阿方索不同，理查伯爵的确进行了加冕为罗马人国王的活动。但是这两个敌对的皇帝候选人都不能对德国发号施令。

康沃尔的理查（1209—1272年）是当时最富有和联系最广泛的贵族之一。[46]他占有康沃尔锡矿，其价值相当于他拥有了第二个伯爵领地，他还主管英国铸币厂，控制了英国的铸币改革，这些活动都给他带来大量的现金收入。通过他的金融顾问伯克汉姆斯特丹（Berkhamsted）的阿伯拉罕，他能够贷款给国王和红衣主教，他轻松地用2.8万马克贿选德国皇帝。作为科斐（Corfe）、沃灵福德（Wallingford）和伯克汉姆斯特丹等地的领主，理查在英国勾结贵族反对派。作为名义上的普瓦提埃伯爵，理查对加斯科涅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是英国国王任命的加斯科涅总督。理查还率领十字军到阿卡，但是他把远征作为结交两个妹夫——在巴黎与圣路易会面，在西西里与腓特烈会面——的机会。理查与低地国家的关系也很融洽，弗罗里斯五世曾经亲自到伦敦向他宣誓效忠。在伊莎贝拉·马歇尔（Isabella Marshal）和普罗旺斯的桑奇雅（Sanchia）之后，理查迎娶了第三位妻子，即布拉班特的法尔肯贝格（Falkenburg）的女伯爵贝特里斯。

但是1265年，理查处于命运的低潮。他三次访问德国而一无所获。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参加了王兄与贵族的战争，理查被西门·德·孟福尔俘虏，被关押在肯尼沃斯城堡。在刘易斯战役后，理查躲藏在风车房里的耻辱行为成为英国最早的政治讽刺文章的内容之一：

[378]

阿勒曼尼的国王他做得很好，
他躲进磨坊当城堡。
用他的利剑磨铁条，
他说石磨能帮助温莎当攻城机把石抛。
理查，你曾是个玩诡计的人，
可诡计你再也玩不了。[47]

就在这时，国王亨利三世的处境有所好转，但是的确遭到英国人的憎恨。西门·德·孟福尔，“英国的保护者”，被认为是反抗压迫的英雄，大受欢迎：

他叫德·孟福尔，
是我们的强大保护者，
他具有伟大的骑士精神。
啊，我完全同意
他热爱正义憎恨邪恶。
因此具有领袖的魅力。[48]

当1265年8月4日西门在伊夫舍姆战役中被杀死时，他被当做圣徒和殉道者而被人们哀悼。

1265年还进行了教皇选举。克雷芒四世是一个法国人，像盖伊·福克斯（Guy Foulques）一样，他也曾经娶妻生子，担任过圣路易的法律顾问。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仍然很同情霍亨斯陶芬家族，以致克雷芒——他曾经作为教皇特使出使英国——被迫返回故乡，住在佩鲁贾，假装修道士，从那里策划安茹的查理继承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为进行推翻皇帝的私生子曼弗雷德及其侄子、年轻的康拉丁的重大战争筹措经费。克雷芒还从佩鲁贾给荷兰的埃格蒙特修道院送去教皇通谕，重新确定它的古代权利和豁免权。[49]

像内战中的英国一样，帝国大空位使德国陷入了混乱之中：

“无政府状态的大门打开了，高级教士和贵族通过战争而扩大他们的领地，骑士强盗以拦路抢劫和扰乱河流通航为生，弱者的不幸，豪强的专横和暴力是几个世纪以来见所未见的……罗马帝国现在正忍受着灭亡的痛苦。”[50]

不太传统的史学家并不认为帝国的灾难是如此严重。皇位的虚悬是几个地区性和城市国家兴起的标志，而这些地区性和城市国家注定要在欧洲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尼德兰和其他地区就是在帝国虚弱的阴影中走向繁荣的。

但是荷兰既不是尼德兰政治也不是荷兰语言的主要焦点。低地国家，甚至远至西边的库特赖（Courtrai）和里尔（Lille），都说着各种前中古荷兰语。法语在埃诺、列日、那慕尔地区和全体贵族中占统治[379]地位。下德意志的东部边界与盖德尔（Guelders）重合。但是说荷兰

语的人无疑主要分布在弗兰德尔的各个城市中。弗拉姆方言（Vlaams）与荷兰方言差别不大。荷兰语本身还处于同化弗里西亚方言、法兰克方言、萨克森方言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在荷兰北部地区，仍然有很多人说弗里西亚方言，它是日耳曼语系中最接近英语的方言。荷兰变成标准的荷兰语或尼德兰语故乡还须假以时日。

大部分荷兰文学作品也是用弗兰德尔语写成的。十三世纪荷兰的确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包括《埃格蒙特修道院编年史》和叫做“威廉”的人写作的动物寓言《列那狐》（van vos Reinarde，约1270年）。但是重要的作家，如《亚历山大的节日》的作者雅各布·冯·梅伦特（Jacob van Maerlent，1235—1271年）是出生于布鲁日的弗拉芒人。

荷兰的对外贸易还很微弱。多特雷赫德是惟一比较繁忙的港口，那里修建了一座城堡，以便威慑来往于莱茵河与北海之间的船只。多特雷赫德与英国有贸易联系，它希望有利可图的英国大宗货物从更加繁荣的弗莱芒沿海港口转移过来。荷兰与波罗的海或罗斯没有什么正常贸易联系。[51]荷兰的社会状况与“封建主义时代”的标准结构不同。事实上，荷兰的封建制度是虚弱的。除了教会地产外，农奴制度比较少，自由农民和独立渔民比较普遍。虽然贵族被融合进骑士和地主的行为和习惯之中，但是他们没有系统性地臣服于封建领主。城市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它们仿效附近莱茵兰的城市，起着重要的作用。荷兰的宗教生活也不太典型。乌得勒支主教正在失去以前的许多权力，不能像邻近的列日主教那样行使很多世俗和法律权力。尽管成立了许多新的修道团体，但是托钵僧和新的修道团都没有对荷兰产生强大的影响。弗里西亚是异教幸存者的一个著名避难地，反叛的神秘教派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任何对荷兰早期历史的叙述都掩饰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欧洲后来的民族一定萌芽于中世纪。十三世纪是区分当代与古典世界的废墟中的所谓“欧洲的诞生”的标志。人们也许希望最终将支配故事结尾的民族共同体至少是可以辨认的，虽然仍然处于半形成的发展阶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就低地国家来说，熟悉的名称如“荷兰国”、“荷兰语”和“尼德兰人”等的含义都后来不同。现代人虚构的[380]关于“民族”及其“领土”的永久统一是不切实际的。十三世纪，荷兰还不是荷兰民族发展的核心。的确，三四百年后成为荷兰民族意识的中心领土基础在当时还没有被围垦出来呢！

1265年，欧洲绝大多数地方同样缺少可以辨认的民族共同体。在基督教“再征服运动”中期，伊比里亚半岛上的国家葡萄牙、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等只有点滴的共同的西班牙民族意识。但丁诞生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失败就打破了意大利统一的梦想。在蒙古人入侵和

“大分裂时代”，一个统一的波兰也只是一种记忆而已。当时也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更不用说俄罗斯民族感情。在金雀花帝国的废墟上的确存在着一个英格兰王国，但是它与欧洲大陆，特别是与加斯科涅和阿奎丹的联系比与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联系更紧密。在英国，说法语的盎格鲁—诺曼贵族阶层与英国人民根本没有共同的文化，英国贵族反对派的领袖也是欧洲大陆的冒险家，如德·孟福尔。无论如何，英国没有不列颠意识。苏格兰王国仍然与挪威发生领土争议，挪威曾经入侵过苏格兰北部群岛。在圣路易统治下，法兰西王国的领土从英吉利海峡向南延伸到地中海，但它是许多不同因素的混合体，在再次被整合成为一个更加融洽的整体之前，这些因素呈分离状态。正如大空位所显示的，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它被阿尔卑斯山南北的意大利领土和德国领土的互相争夺所分裂。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的，哈布斯堡王朝将转移到奥地利。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还处于最早阶段，但是它与后来霍亨索伦家族（1265 年，该家族仍然在士瓦本故乡的城堡里享受着舒适的生活）的普鲁士没有共同之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已经摆脱了丹麦人的控制，但是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像立陶宛人一样，瑞典卷入东部的多国征服战争中。奥托卡尔二世（Ottokar Ⅱ，1253—1278 年在位）统治下的波希米亚正处于辉煌的顶峰，它兼并了奥地利和施泰尔（Styria）。蒙古人两次入侵后，匈牙利陷入崩溃状态，当地的阿帕德王朝正在走向寿终正寝。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拜占庭帝国在 1261 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把拉丁人侵者赶到了希腊据点。这些政治实体都注定不能幸存到现代。

因此，任何时候谈论十三世纪的民族国家都是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当时各地都在有效地发展民族认同感的话，那么它只存在于一些小国中，因为它们都成功地将自己与邻国分离，除了葡萄牙外，还有丹麦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十二世纪八十年代，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摆脱了拜占庭的统治而再次获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创立了本民族的东正教教会及其教长——保加利亚在 1235 年、塞尔维亚在 1346 年。这为它们形成民族认同、教育全国的贵族、政治宣传、国家机构的神圣化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拉丁基督教世界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迈出这一步，而莫斯科的[381]俄罗斯则直到 1589 年才迈出这一步。创立本民族的东正教会加强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斯拉夫民族联系的纽带，它们的凝聚力将经受奥斯曼人 500 年统治的考验。

欧洲正处于奥斯曼人来临和穆斯林第二次大发展的最后几十年。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仍然畅通。基督教的旅行家正在宣传他们到达鞑靼路上的见闻。当“北方的威尼斯”在阿姆斯特尔（Amestel）建立

时，马可·波罗开始从里亚托前往中国。

· 像其他国家的史学家一样，荷兰的史学家也不得不与追溯历史的习惯作斗争。民族国家史学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形成的，当时，低地国家刚刚明确地分成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当时公认的说法是，从最早的时候起，弗拉芒社会与荷兰社会就各不相同。人们费很大的力气证明，例如，在斯海尔德河一边的中世纪的斯勒伊斯城（Sluis）的教堂是荷兰风格的杰作，而在斯海尔德河另一边的丹姆城（Damme）的教堂则是弗拉芒的宝贵遗产。对于史学家来说，必须有跳跃式的想象力，才能去证明各自不同的荷兰传统与比利时传统并不早于1566—1648年荷兰革命，是荷兰革命武断地打断了共同的尼德兰意识的发展。更为困难的是，向人们提示，更早时候的人几乎没有认同意识，荷兰并不是荷兰意识的中心。这个故事中有许多曲折情节，在勃艮第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经济和人口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水坝的土地"能够承担它的现代形式和作用之前。别忘了，直到1593年，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卡洛斯·克鲁修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年）从土耳其接受了第一批郁金香的球茎，把它们种植在莱顿与哈勒姆之间肥沃的花田里。

所有这些有关民族性问题中，民族意识关键因素。正如一位荷兰史学家所解释的，民族性既不可以在血统，也不可以在土地，甚至不可以在语言中观察到：

> "民族性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表现在人的意识之外的惟一可以识别的习惯不可能是民族性，因为民族性是人们自省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共同的感情能够发现它，人类能够描述和分析民族性的惟一学科是心理学……这种民族意识和感情不仅是民族的性格特点，而且是民族本身。"[52]

下述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在十三世纪封建分裂时代，荷兰的地方爱国主义就开始具有把低地国家当做一个整体的任何感情。在动荡的[382]荷兰革命的前300年里，可以肯定的是，半形成的北方各省，如荷兰，不可能拥有许多共同的意识，南方各省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只能断定，荷兰民族当时还不存在。这是对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客观教训。

因此人们可能忍不住要问，如果十三世纪的自觉意识不存在于民族之中，那么它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惟一的答案是"它存在于它存在的地方"。中世纪欧洲人只意识到自己属于他们生长的村庄或城市，属于说同一种方言的一个集团，他们无须借助拉丁语或希腊语就

能进行交流。他们意识到属于承认同一个领主的男女团体，属于一个享有同样权利的社会等级，最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属于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共同体。除此之外，正如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儿子不久将描绘的，人们只有到了死亡和末日审判时才最终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个真正重要的社会集团——属于被堕入地狱的过客，还是属于前往炼狱的忏悔者的陪客，或者属于天堂的唱诗班。

第6章

危　机

危机中的基督教世界，约1250—1493年

[383]　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弥漫着一种宿命的气息。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会已如疾病缠身，对上帝福音的幻想在现实中也不再流行，但是人们对如何医治教会之疾却束手无策。老牌的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已沦落到悲惨境地的边缘。神圣罗马帝国已无法操控其内部的强大封臣，更毋论对其外部势力实施领导了。教廷日益沦为世俗政权的附庸。封君封臣制度发展到了令所有城市和诸侯都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的地步。强盗、迷信、瘟疫横行于世。当黑死病肆虐之时，人们认为显然是愤怒的上帝在惩罚基督教世界的罪恶。“据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认为，自东西教会大分裂以来，没有人进入天国。”[1]

同时，中世纪生活的“冲动性”，以及“强烈的悲剧感”，使得生活的痛苦和快乐更为剧烈，据说凭现代人的感知能力对此几乎无法理解。“强烈的反差和壮观的仪式，赋予日常生活一种兴奋与激情的色彩，常常制造那种在绝望与虚无缥缈的快乐之间、在野蛮与脆弱的虔诚之间永远摇摆不定的场景，这正是中世纪的特征。”[2]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他不仅论述了人们面临接踵而至的灾难时的危机感，还描述了“傲慢或残忍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中——呻吟的麻风病人，教堂里的乞丐，公开执行的死刑，关于地狱之火的说教，游行的队伍，巫师和奇迹，盛大的仪式，色彩阴郁的纹章，教堂尖塔上的钟和街头的公告牌，臭味和香味：

当阿马格那克人（the Armagnacs）的屠杀达到高潮时……（1418年）巴黎人民在圣尤斯塔克（Saint Eustache）教堂建立了圣安德鲁（Saint Andrew）兄弟会：所有的教士和教徒都戴着红色的玫瑰花环，使教堂充满香味……就如同被玫瑰露洗过一般。[3]

浪漫主义后期哥特式的热情可能也来源于这种“中世纪极度亢奋[385]的心灵”。它是在重新体验中世纪历史这一艰巨任务中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赫伊津哈的理论。像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他把研究局限于地处西欧一隅的法国和尼德兰；在对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概括的时候，难免有牵强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走向衰落的中世纪精神如此生动的描述中，可能会忽视变化与革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确实存在。文艺复兴的研究者们在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追本溯源时，自然而然就回到了十四世纪早期（见第7章）。这是因为历史发展进程中总会存在一个新旧事物共存的较长时期。历史学家强调哪一个，取决于他们研究的主题。赫伊津哈指出，人文主义最终确实出现了，但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文艺复兴的“推动”。他以所有历史学家惯用的隐喻——“潮流是滚动着的”，结束了对反复出现的时代特征的研究。[4]

在这种背景下，拒绝接受这种对衰落的中世纪末期的隐喻或许是明智的。将这一时期与当时人们长期未能解决的危机联系起来考虑或许更为准确。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新的一天即将来临。更准确地说，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是脱胎于灾患的婴儿。

拜占庭帝国在拉丁帝国的皇帝（Latin Emperors）迁都之后重建，势力微不足道。在欧洲的沿海地带，它仅仅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和毗邻的鲁米里亚（Roumiliya）省。在小亚细亚，它控制着黑海附近的一些城市和爱琴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则落入一些独立的王国如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十字军骑士建立的王国还有威尼斯统治者的手中。安那托利亚则落入伊科尼翁（Iconium）的突厥苏丹，即所谓的特里布松（Trebizond）帝国和小亚美尼亚王国手中。从1261年到1453年最终解体，拜占庭帝国处于帕里奥洛加斯（Palaeologus）家族的迈克尔八世（Machael Ⅷ，1258—1282年）的后裔——帕里奥洛基（Palaeologi）王朝统治之下，迈克尔八世曾经乘威尼斯船队离开之机策动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对于这个帝国的昏聩，有人写道：

[384]



地图 14 欧洲，约 1300 年

希腊人以自称罗马人为自豪。他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支撑着帝国政府的统治形式；他们没有系统的司法机构，却坚持着罗马法；他们自诩为正统教会，在这个教会里，教士……处于对皇帝的依附地位。这样一个社会只能走向衰落，尽管它的衰落可能会缓慢一些。[5]

绝望中的帕里奥洛基王朝到处寻求帮助。为了阻止威尼斯，它转而向热那亚求助——热那亚曾在不同时期控制着亚摩斯特利斯、佩

拉、士麦那和里斯博斯岛、开俄斯岛、萨摩斯岛。它同阿拉贡(Aragon)结盟，还曾几次以结束教会分裂为条件拉拢教皇。1321—[386] 1354年的内战时期，拜占庭曾一度将统治区域恢复至伊庇鲁斯地区(Epirus)。直到1382年，一位分庭抗礼的皇帝在摩里亚（Morea）的米斯特拉（Mistra）另立宫廷。那时，约翰五世（John Ⅴ，1341—1391年）不仅已成为天主教徒，也成了土耳其人的封臣。1399年，他的继承者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Ⅱ，1391—1425年）曾到罗马、巴黎、伦敦求助，但于事无补。[音乐]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一个新的土耳其军事部落的出现，这一部落最终将取代拜占庭。奥斯曼人——因奠基者厄尔图格鲁尔（Ertugrul）之子奥斯曼一世（Osman Ⅰ，1281—1326年在位）而得名——进入蒙古击败塞尔柱人（Seljuk）之后留下了占领地带。厄尔图格鲁尔在安那托利亚的腹地建立了前哨。在此基础上，他们向四周拓展，蚕食拜占庭帝国的边境，派遣海军舰队进入爱琴海，并跨海进入巴尔干地区。他们第一次进入欧洲是在1308年，当时，一股土耳其雇佣军由拜占庭自己的雇佣军势力——加泰罗尼亚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引入，后者已经背叛了拜占庭。这一年，他们占领了以弗所（Ephesus）；1326年取得布尔萨（Bursa），并在此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都城；1329年取得尼西亚（Nicaea）；1337年取得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Orkhan，1326—1362年在位）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桥头堡，并自称苏丹。他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Ⅰ，1362—1389年在位）在亚得里安堡（今埃迪尔内）建立了奥斯曼的第二个都城，并且公然以古代塞尔柱人的名号“罗马的素丹”自居。继任者巴耶塞特素丹（Sultan Bayezit，1389—1403年在位）尽管被跛子帖木尔（Tamerlane）打败，但他仍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并以穆斯林移民取代了希腊居民，同时向伯罗奔尼撒和瓦拉几亚发动进攻。在他去世的时候，奥斯曼人控制的地区已达到一个世纪前的四十倍，实现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见原书附录Ⅲ，第1259页）。

在奥斯曼人进行征服的一个世纪里，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界得以重建。原先拜占庭在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领地，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独立而混乱的时期之后，也被战无不胜的突厥人征服。奥斯曼人统治着一个伊斯兰勇士（ghazis，音译：加齐）的王国，并且他们深知它的伟大。在布尔萨一个古老的清真寺里，一篇关于奥斯曼的碑文写道：“致苏丹，加齐苏丹之子，勇士，人间的统治者，世上的英雄。”[6]

中世纪的希腊处于拉丁世界和奥斯曼征服者之间，分属若干个地

方诸侯。伊庇鲁斯的统治区，雅典的公爵领地，南方亚该亚（Achaea）侯国和诺克萨斯（Noxas）岛屿公国，都在这种状态下经历了两个世纪。他们的商业利益被意大利城市控制着；统治他们的是拉丁人；人们普遍信仰东正教。[吉普赛人]

保加利亚也远离了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形成于十二世纪晚期的第二保加利亚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伊凡·阿森一世（Ivan Asen Ⅰ，1186—1218年在位）这位“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沙皇”，将其统治范围从都城特尔诺沃（Trnovo）延伸至贝尔格莱德和斯科普里。他的继承者伊凡·阿森二世（Ivan Asen Ⅱ，1218—1241年在位），取得了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马其顿和色雷斯。接下来的两个王朝都出自丘门（Cuman）家族。但是1330年6月28日，沙皇迈克尔·西什门（Michael Shishman）被塞尔维亚人杀死，塞尔维亚人由此建立了他们的霸权。

[387]

吉普赛人（ROMANY）

1378年，伯罗奔尼撒那布莱昂地区（Nauplion）的威尼斯统治者确认了此前已经授予名为atsingani的地方团体的特权。这是第一次关于生活在欧洲的吉普赛人（Romany gypsies）的文献记载。1416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布拉索夫城（今喀琅施塔得）以银器、谷物和家畜为礼物，送给一位“埃及首领和他的120个同伴”。1418年，一个同名的部落到达汉堡。1427年8月，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流浪队伍出现在欧洲，这些可能来自下埃及的难民被巴黎拒之城外，因而只得驻扎于圣德尼（St Denis）。据《一个巴黎市民日记》的无名作者描述，他们皮肤黝黑，穿着破烂，妇女紧裹围巾，儿童佩带耳环。当他们的杂耍和占卜活动遭到教会禁止时，他们只得继续迁徙。[1]

尽管关于吉普赛人的早期活动只能从语言学上寻求证据，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从印度迁往欧洲的。吉普赛语属印欧语系，与印地语相近，并在从中东到欧洲的广大地区被普遍使用着。带有吉普赛语成分的欧洲方言中，含有明显的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的混合成分，表明吉普赛人曾在巴尔干地区旅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人们对吉普赛人的多种称谓，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希腊语中的atsingani一词，在其他语言中分别为：gitans（法语），zingari（意大利语），gitanos（西班牙语），zigeuner（德语），tsigan

（俄语）。这个词语来源于中世纪小亚细亚摩尼教一个教派的名字，但这显然是个错误的称呼。“波希米亚人”（“Bohemians”）和“埃及人”（“Egyptians”）——即 gyfti（希腊语）、gypsy（英语）和 faraoni（匈牙利语）——这两种称呼也是普遍的。“Romany”一词可能源于他们中世纪隶属拜占庭帝国，而不是隶属罗马尼亚。他们自称 Rom（单数）或 Roma（复数）。

为了限制吉普赛人的流动，各国制定实施了多种法律。1596年，英国议会制定的一项法令对吉普赛人和一般流浪者作出了详细区分。[**流浪汉**] 在约克郡，一个吉普赛人团体被关押，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行巫术而被处决。但这项法令允许守法的吉普赛人流浪，允许他们从事一些小修小补的行当，以此换取生活必需品。法国在1683年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奥地利在1761年颁布法令，试图将吉普赛人安置于固定的居留地，但没有产生长远的作用。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保护吉普赛人而给予他们“皇家奴仆”的地位，此前他们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也获得了这一称号。但是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不得进入圣彼得堡。尼德兰和德意志的一些地区也对吉普赛人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政策。

整个十九至二十世纪，欧洲的吉普赛人竭力保持他们流浪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特有的行业、语言和音乐 [**弗拉曼柯**]。他们的文化强调对神明的信仰，注重他们的社会组织以及“酋长”和家族的法官对部落的领导。他们一年一度地在固定的地点举行集会，互相交流。例如，卡玛格（Camargue）的圣玛利·德拉梅尔（Saintes-Maries-de-la-Mer）就是一个吉普赛人举行庆典和朝圣的场所，每年5月他们在那里朝拜他们的保护神撒拉（Sara）的坟墓。传说撒拉是抹大拉的玛丽娅（Mary Magdalen）的同伴，曾经将耶稣的亲人和门徒救离灾难，并带他们到普罗旺斯（Provence）避难。 [388]

浪漫主义时期，吉普赛人出现在大量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雨果、梅里美和贝娄都写过以吉普赛为主题的书。亨利·莫哲尔（Henri Murger）的《波希米亚的生活》（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1849年）获得了巨大成功。李斯特撰写了一篇关于吉普赛音乐的学术论文，掀起了一场影响上至高雅戏剧、下至通俗娱乐的新潮流。比才的《卡门》（1875年）依据的是梅里美作品中讲述的故事，而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1895年），则是以莫哲尔的戏剧为蓝本的。这两部歌剧都属不朽作品之列。

吉普赛人一向与骚乱和周期性爆发的暴力事件有关。[2] 但是，纳

粹对吉普赛人的灭绝性屠杀，跟他们对犹太人设立集中营一样，是史无前例的。战后民主政权曾试图将法律制度与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结合起来。但那些漂泊的、无国籍的吉普赛人的古老传统不断地重新浮现，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3年德国排斥移民的丑恶运动中。习惯定居生活的欧洲人，对于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始终怀有一种憎恶与迷恋相混合的复杂感情：

来吧，让我再次跟你讲那熟悉的故事。
那个可怜的牛津学者，
满腹经纶，多才多艺，
却厌弃了他所拥有的这一切。
在一个夏日的清晨离家而去，
跟他的朋友们去学习吉普赛风俗，
与那些放浪不羁的同伴们四处流浪。[3]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奥斯曼人开始强占马里查河（Maritsa）流域。到1366年，最后一位保加利亚沙皇伊凡·西什门三世（Ivan Shishman Ⅲ）被迫将他的妹妹送至苏丹宫廷作为女眷，并宣布臣服于奥斯曼。特尔诺沃被摧毁。此后保加利亚开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并延续了五百年之久。

塞尔维亚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邻近的匈牙利王国，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已皈依了天主教。在该王国的挤压下，塞尔维亚人周旋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塞尔维亚在斯特凡一世内马尼亚（Stefan Ⅰ Nemanya，1114—1200年）统治下首次实现统一，并迫使拜占庭承认[389]了它的独立。内马尼亚的幼子圣萨瓦（St Sava，1175—1235年）是一位阿索斯修道院（Athos）的修道士。他把塞尔维亚教会从位于奥基德（Okhid）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手中解放出来，并劝说兄长斯特凡二世（Stefan Ⅱ）接受由教皇授予的王冠。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在暴虐的斯特凡四世杜尚（Dushan）的统治下达到了极盛。1346年杜尚加冕为沙皇时，塞尔维亚在南方控制了几个原先属于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的行省，塞尔维亚大教长驻跸于佩奇（Pec，即Ipek），帝国依据法典实行统治。杜尚对新兴的弗拉其（Vlach——阿尔巴尼亚以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一部分——译者注）诸侯国行使着宗主权，甚至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但塞尔维亚不是日益强大的奥斯曼人的对手。1389年6月15日，在科索沃的“黑骊之地”，塞尔维亚军队遭到挫败。最后一位塞尔维亚国王被杀，而奥斯曼苏丹也被反叛者杀死。塞尔维亚

并入保加利亚，共同成为奥斯曼的一个行省。[大家庭]

[390]

大家庭（ZADRUGA）

大约在1349—1354年之间印行的斯特凡·杜尚法典的第70款，明确提到了大家庭和父系血缘家庭的问题。“父子或弟兄，居住在同一所房屋并共同拥有一个炉灶，”法典规定，“但拥有各自的食物与财产，那么他们就应该各自属于单独的家庭。”很显然，这位塞尔维亚沙皇试图确保每个农民家庭都同等地纳税。

不过，这项条款却被用来证明“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巴尔干斯拉夫社会组织的标准模式这一命题。今天，学者们往往过于热衷于讨论“大家庭”在从史前到当代欧洲各个时期的斯拉夫家族模式中的作用。现已证实，“大家庭”一词是1818年一本塞尔维亚字典首次收录的一种新的术语。有人设想这个词曾被人使用过，事实上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语言中流行。因此，在斯特凡·杜尚的法典文本中，它自然也没有被提及。尽管人们可以根据第七十款得出结论，认为某种父系大家庭确实在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中存在过，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大家庭”就是这个王国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典型形式。

进入现代，“大家庭”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分布极不均匀。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门的内哥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中心地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山区、牧区，“大家庭”是很普遍的。在罗多普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它也很常见；但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它则不为人所知。在十六世纪由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移民建立的古老军事边区和非斯拉夫人的公国里，“大家庭”也是存在的；而在从希腊到罗马尼亚的广大地区则鲜有其踪迹。

最为严重的是，一项对于有关该课题的最新学术成果的粗略统计表明——主要是在西方——人们可以为了论证相互矛盾的命题，都使用了“大家庭”这个词。在几乎没有事实和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大家庭”被用来证明一些站不住脚的论断，这些论断或者是论证所有斯拉夫民族的集体主义倾向，或者是论证一个（实际上是虚构的）泛斯拉夫社会的统一结构，再者就是用来论证巴尔干半岛这一欧洲的人种博物馆之落后。一言以蔽之，这种结论有制造又一个种族神话之嫌。所谓“斯拉夫精神”不过是西方人凭借想象力创造的又一个神话。[1]

多瑙河以北讲拉丁语的瓦拉几亚人，因吸纳了特兰西瓦尼亚山区的移民而力量增强，得以创建他们自己独立的公国。此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成为基督教在巴尔干统治的前沿地区。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困境再次唤起了西方世界十字军的传统。1344年，一支由威尼斯和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the Hospitallers）领导的海军联队一度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格利博卢（Gallipoli），并解救了被保加利亚人关押的皇帝。1396年，一支由匈牙利的西格蒙德（Sigismund of Hungary）率领的十字军在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遭到彻底失败。1402年，一支十字军的卫队，在法国骑士伯西科（Boucicault）的率领下协助君士坦丁堡守卫城墙，准备抵抗苏丹即将发起的进攻。黑海以外，前罗斯的东正教徒们逐渐挣脱了鞑靼人的控制。在此期间，他们得到兴起于东北方的两股势力——莫斯科大公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协助。[尼科波利斯]

[391]

尼科波利斯（NIKOPOLIS）

1396年9月25日傍晚，伟大的法国十字军战士科塞爵士（Sire de Coucy）被带到在尼科波利斯战场获胜的素丹巴耶塞特（Bajazet）面前。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富有的十字军骑士，其中包括未来的勃艮第公爵让·德·纳瓦尔（Jean de Nevers），他被作为人质扣留，目睹了素丹的士兵用他们的弯刀将几千名基督教世界的下层俘虏斩首的过程。（十字军方面旋即以同样的方式处置了穆斯林俘虏。）科塞爵士锁链缠身，囚行350公里至格利博卢，之后又被带到亚洲的布尔萨。他在那里留下了遗言并无嗣而终。

人们总是将尼科波利斯与十字军最后这场突发的灾难性结局联系在一起。作为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城堡，尼科波利斯扼守多瑙河下游。奥斯曼人夺取此地，激起了由匈牙利国王发起的远征。一队拉丁骑士在布达汇集，准备对素丹施行报复，并扬言要“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秣马”。他们携带着酒和丝绸衣物，却没有准备石弩。在对尼科波利斯的围攻失败后，他们不得不与奥斯曼人在旷野里短兵相接。法国人发起的仓促进攻，就如同在百年战争中的克勒西（Crécy）战役一样，被素丹的塞尔维亚同盟的骑兵瓦解。十字军主力被包围了。匈牙利的西格蒙德逃跑，一名波兰骑士全副铠甲，得以全身退出多瑙河地区，但大部分幸存者被俘。他们

的失败使得保加利亚落入穆斯林手中长达500年，并结束了拉丁人对东方的威胁，预示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有关尤格兰·德·科塞七世（Euguerrand de Coucy Ⅶ，1340—1397年）——即苏瓦松伯爵（Count of Soissons）——的传记，被认为是对“基督教世界的灾难”的描述。作为位于皮卡尔迪的科塞（Coucy）的欧洲最大城堡的领主以及傅华萨（Froissart）和乔叟（Chaucer）的恩主，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不幸时期的几乎所有灾难。他的父亲可能是在克勒西战役中被杀的。他的母亲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死于黑死病。普瓦提埃战役之后，他作为人质在英格兰停留了五年，并与国王的女儿成婚。在萨伏伊，他与霍克斯伍德（Hawkswood）雇佣军团一同与入侵法国的“自由军团”作战，并参加了1375—1376年的瑞士战役。他是第一个登陆突尼斯的人（1390年）。在所有的帝国争斗与教会分裂事件中，他忠诚地效力于腐朽的法兰西君主。当匈牙利使节到达巴黎号召“以同胞和上帝之爱的名义”东征时，他迫不及待地响应了。[1]

莫斯科大公在蒙古人入侵后的两个世纪里，从默默无闻而逐渐开始崭露头角。第一，凭借其武力和手段，他们建立了凌驾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Vladimir—Suzdal）周边地区众多王公之上的至高权威。从1364年起，他们世代拥有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Prince of Vladimir）的头衔。第二，通过讨好金帐汗国的大汗，他们获得雅力克（yarlyk）的头衔，成为蒙古人贡赋的首要征集者，负责向所有其他的公国收取赋税。“钱袋”伊凡一世（Ivan Ⅰ，1301—1340年在位）一生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前往萨莱（Sarai）的路上而不是莫斯科。卡尔·马克思写道，他的“性格是集鞑靼人的刽子手、谄媚者和奴隶监工于一体”的。[7] 第三，通过慷慨资助东正教会，他们为其政治权威披上了一层宗教色彩。1300年，基辅大主教迁到弗拉基米尔，从1308年起驻跸于莫斯科。修道院在更广大偏远的范围内建立起来，形成了新的商贸和领土扩张中心。尽管有蒙古人的阻挡，中间还有一段为期两个月的河海路程，他们仍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保持着紧密联系。莫斯科是一个教会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国王和封臣及其财产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对各世袭公国财产的掠夺使得莫斯科霸权的加强势[392]不可挡。1327年，“钱袋”伊凡（Ivan Kalita）帮助蒙古人镇压了一次由他的主要对手、伏尔加河畔的特维尔（Tver）城发起的叛乱。但在1380—1382年，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Prince Dmitri Donskoy，1350—1389年在位）首次向蒙古军队发起挑战。1380年9月8日，迪

米特里在库利科沃（Kulikovo）的一场著名战役中战胜了骁勇善战的蒙古兵，但两年后莫斯科遭到了报复性焚毁。1408年，迪米特里之子瓦西里一世（Vasili Ⅰ，1389—1425年在位）试图拒绝纳贡，但由于蒙古人兵临莫斯科而被迫妥协。莫斯科大公正在渐渐强大起来，但仍然只是蒙古人的附庸。

正是在这一时期，莫斯科人开始以希腊文名字罗斯（Rus'），即俄罗斯（*Russia*）称呼他们的国家，并称他们自己为俄罗斯人。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从来没有统治过基辅，但他们坚持认为莫斯科是基辅国家的惟一合法继承者。在当地东斯拉夫语的变种基础上，现代俄罗斯语言形成了。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莫斯科—俄罗斯就是整个罗斯，但这一看法没有被其他那些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坚持独立于莫斯科统治以外的东斯拉夫民族接受。

立陶宛人是欧洲最后的异教徒。在偏远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森林里，他们躲过了条顿骑士团和蒙古人征服的最初进程。他们处于沿波罗的海地区军事王公的统治之下，这些王公瞄准了基辅国家解体后的历史性机遇。在莫斯科兼并罗斯北方和东方残余部分的同时，立陶宛开始了对西部和南部残余的征服。在这场国家建构运动中涌现出三位杰出的首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为甚至超过了莫斯科大公。这三位领导人是：格迪米纳斯大公（Grand Duke Gediminas，约1275—1341年），他的儿子奥里格尔德（Algirdas，1345—1377年在位）和约盖拉（Jogaila，1377—1434年在位，即雅盖隆Jagiello——译者注）。约盖拉实现了与波兰的历史性联合。一个世纪的掠夺、修建城堡和聚敛贡赋，使得整个第聂伯河流域面貌一新。白罗塞尼亚（White Ruthenia，今天的白俄罗斯）被完全合并。红罗塞尼亚（Red Ruthenia，即加里西亚）在1349年被波兰人分割。1362年，奥里格尔德在第聂伯河流域的蓝水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lue Water）中击败蒙古军队后占领了基辅。1375年，他占领了波罗茨克（Polotsk）。直到1399年在遥远南部的沃克斯拉（Vorksla）河畔被鞑靼人击败，立陶宛人才受到遏制。此时，立陶宛的领土终于扩展到了“从海洋到阳光灿烂的海洋”，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空间。从1386年起，立陶宛的统治阶层开始改宗罗马天主教（见原书第430页），天主教开始在立陶宛扩张。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量人口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自称“罗塞尼”（rusini，即“Ruthenes”）。在立陶宛大公国的东斯拉夫人的罗塞尼语（Ruthenian）变种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语。1700年以前，这个大公国由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治理时，其官方语言不是立陶宛语而是罗塞尼语。

从表面上看，东正教会肯定比天主教会消极。它的首领——君士

坦丁堡大教长与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它的角色并非无足轻[393]重。在蒙古人和突厥人进攻下的东方，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会的坚强核心，为现代民族的形成撒下了种子，如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还有莫斯科俄罗斯，立陶宛的罗塞尼亚。

在欧洲另一端的西班牙，“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最终被延缓。（见原书附录Ⅲ，第1241页）1248年以后，摩尔人（Moorish）的军队退却至西班牙南部山区，格拉纳达酋长国在该地区得以维持两个多世纪的繁荣。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惟一的穆斯林统治的国家。在其边境以外，当地的穆斯林首领，特别是伊本·胡德（Ibn—Hud），征服了他们的非洲摩尔人宗主并自己在“阿尔—安达鲁兹”（“Al—andaluz”）建立了卡斯蒂尔（Castile）的属国。结果出现了一个宽阔的边际地带，其乡村主要由拥有军事力量的大庄园控制，而城镇则因穆斯林和犹太移民而得以扩充。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与他们的宗教信仰颇不一致。葡萄牙王国自1179年开始独立，控制着大西洋沿岸，并于1250年征服了阿尔加维。横跨于比利牛斯山北部巴斯克地区的纳瓦尔（Navarre）王国，自1234年起臣服于法国统治者，并保持独立至1516年。

得胜的莱昂和卡斯蒂尔王国，在横扫了从北到南的海岸并在南部完全包围格拉纳达之后陷入内乱。征服者（*conquistadores*）中的一等阶层通过对南部的掠夺和建立大庄园而富有起来。圣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Ⅲ the Saint，1217—1252年在位）因其在再征服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而最终被封圣，他的后代则陷入种种麻烦之中，如争夺继承权，贵族斗争，议会动乱，城市武装争斗等。阿方索十世（Alfonso Ⅹ，1252—1284年在位）在德意志未能争得皇位。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Ⅺ，1312—1350年在位）取得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卡斯蒂尔对摩尔人的第一次胜利，并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到达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残暴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1350—1369年在位）无愧于他的称号。亨利三世（Henry Ⅲ，1390—1406年在位）不仅有非凡的行政能力，而且还与英格兰的兰开斯特王朝结盟。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卡斯蒂尔转而处于禁卫军和圣詹姆斯集团首领阿尔瓦罗·德·卢纳（Alvaro de Luna）的残暴统治下。由于用结实的非洲美利奴毛纺织品敲开梅塞塔（Meseta）高原的商贸之门，卡斯蒂尔成为欧洲首要的羊毛出口国，它的羊毛由毕尔巴鄂（Bilbao）和桑坦德（Santander）运往佛兰德斯（Franders）。

形成反差的是，阿拉贡王国则转向海上发展。（见原书附录Ⅲ，第1251页）通过阿拉贡的比利牛斯地区与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联

合，阿拉贡在海边初步获得了立足之地。征服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 the Conqueror，1213—1276年在位）在摩尔战争中占领了梅诺卡（Minorca）和马洛卡（Majorca），而将木尔西亚（Murcia）慷慨地交给了卡斯蒂尔。在法国人被驱逐之后，彼得三世（Peter Ⅲ，1276—1285年）于1282年获得西西里王位。1326年阿拉贡从热那亚手中夺得撒丁岛。阿方索五世（Alfonso V，1416—1458年在位）于1442年从安茹家族手中[394]夺得意大利南部。阿拉贡凭借在西地中海的霸权，缔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海上集团，主要成员是巴塞罗那、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加泰罗尼亚语为通用语言。贵族们享受到一种极为宽松的制度。君主与封臣之间的争论诉诸议会（Cortes）裁决，通常由下层骑士在他们当中选出一位作为仲裁官。1287年的《联盟特权》(the Privilege of Union）规定，贵族有权以武力反对侵犯他们利益的国王——实际上这项权利只在波兰才享有。这样，阿拉贡成为一个空前团结一致的国家。费迪南德五世(Ferdinand V，1479—1516年在位）说："拆散阿拉贡贵族，就如联合卡斯蒂尔的贵族一样困难。"在十五世纪，阿拉贡不仅控制了伊比利亚最大的城市巴塞罗那，也控制了欧洲最大的城市那不勒斯。

中世纪西班牙的文化融合是极其独特的。在五个王国里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通行六种语言：卡斯蒂尔语、加莱戈语（Gallego)、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巴斯克语。在基督教人口中，中央高原的大农场主和士兵占统治地位，总的说来他们的文明比起富饶的南部更为城市化、更为文明的穆斯林地区来说要落后得多。但是他们正从孤立的世纪中走出来，开始在商业和知识方面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部分有了全面接触。西班牙的犹太人因为穆斯林统治者的宽容而获得立足之地，他们扩散至整个半岛，并且在行政、医学、文学、商业和财政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扮演着多种角色。生于科尔多瓦（Cordoba)、迁移至埃及的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年)，作为《迷惑者指南》(Guide to the Perplexed）的作者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缅怀。萨穆埃尔·哈利维（Samuel Halevi，卒于1361年）——残暴者佩德罗的首要征税人并死于佩德罗的酷刑——是一位艺术的赞助人。改宗者圣玛利会的巴波罗（Pablo de Santa Maria)，即所罗门·哈利维（Solomon Halevi)，生于1350年，是一位外交官，也是布尔戈斯（Burgos）的大主教，同时也是一位声名狼藉的反犹主义者。起初，宗教之间的争论是普遍的。后来，特别是在1348—1351年和1391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在十五世纪，新基督徒中的一大批——卢纳派（Lunas)、瓜曼派(Guamans)、门多萨派（Mendozas)、恩里克派（Enriques)——占据了教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没有什么比西班牙建筑艺术更能表达这种结

合的了，它将地中海的罗马风格，天主教的哥特风格和东方的装饰艺术进行了优雅的融合。[8] [喀巴拉]

在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地带，政治上依然以神圣罗马帝国、教廷和法兰西王国三者间的较量为中心。在十四世纪，三支主要力量都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因而没有一个能脱颖而出。1254—1273 年的大空位时期过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专注于德意志的内部争斗，以至丢掉了意大利。教廷被淹没在意大利战争中，教会分裂之前于法国南部避难近七十年。法兰西王国在百年战争中险些被英国占领，直到十五世纪中期才恢复过来。到 1410 年时，出现了三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三个教皇和两个法兰西国王，天主教世界的首领者们陷入了绝望之中。[395] 在中心地带出现这样的混乱，为强有力的新兴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除了阿拉贡以外，新出现的国家有瑞士、勃艮第、波兰—立陶宛。

神圣罗马帝国随着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的衰落而永久地衰落了。大空位时期是帝国的最低弥时期，也是那不勒斯处于康拉丁（Conradin）统治的时期，这几十年帝国处于混乱之中（见原书第 353 页）。更为糟糕的是，帝国几乎没有重新振作的可能。由于沉迷于对意大利的野心，霍亨斯陶芬家族一直把德意志放在次要地位。由于帝国财政空虚，领土分散，因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属必然。结果是，德意志的选帝侯们享有永久性特权，而帝国的选举法也变得僵化起来。1338 年，选举团拒绝了教皇为皇帝洗礼的要求；1356 年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将选举程序永久地确定下来。此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获得了候选权。七个所谓选帝侯中的多数选票将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波希米亚国王、享有王权的莱因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选帝侯。* 制定《金玺诏书》的查理四世（Charles Ⅳ）正在向现实让步。布赖斯（Bryce）的著名说法是，“他整顿了混乱局势并称诏书为宪法。”[9]

从 1273 年以后，这个衰弱的帝国竭尽全力试图复兴。在从鲁道夫·冯·哈布斯堡（Rudolf von Habsburg，1273—1291 年在位）到卢森堡的西格蒙特（Sigesmund of Luxemburg，1410—1437 年在位）的九位皇帝中，仅有三位举行过完整的皇帝加冕礼。其中两位——阿道夫·冯·拿骚（Adolf von Nassau）和卢森堡的文采尔（Wenzel of Luxemburg）——分别

* 这一制度完整地保持到 1623 年巴伐利亚取代莱因伯爵的时候。1648 年莱因伯爵继巴伐利亚之后恢复了选帝侯地位，1708 年，汉诺威成为第九个选帝侯。后来拿破仑扩充选帝侯的方案根本未付诸实践。

[396]

喀巴拉（CABALA）

1264年到1290年前的一段时间，一本希伯来文著作《光明之书》（"the Book of Splendour on the Law"，希伯来文为 Sepher ha—Zohar al ha—Torah），开始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中流传。该著作自称是公元二世纪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西蒙·本·约卡伊（Simon ben Jochai）所作。实际上它很可能是一位当地学者莫塞索夫·莱昂（Moses of Leon，1250—1305年）的著述。它对摩西五经（the Pentateuch）进行了复杂而冗长的注释，并很快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学家们所知。最具权威的三卷本于1558—1560年在意大利的曼图亚（Mantua）刊印。时至今日这种三卷本一直是喀巴拉的经典教科书。

"喀巴拉"（Cabala）这个词本意为"传统"，通常是指几百年中用于发现隐藏在经典文本里的深意的神秘信条和技能的集子。喀巴拉的基本教义可能源于古典时代后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摩尼教思想。它的教义关注的是光明和黑暗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由上帝统治，另一个由魔鬼统治。上帝和魔鬼都由父性部分和母性部分组成，父性部分表现为白色，天性活跃，母性部分为红色，具有接纳性。上帝的形式可以是"父亲"（*abba*）（父亲/国王）或者是母亲（*imma*）（母亲/王后）；魔鬼的形式可以是恶毒的死亡天使，或者放荡的妇人（Great Harlot）。这些对立面的相互作用造成和谐与混乱无休止的转换。

因为上帝和魔鬼是无处不在而又不曾与人谋面的，所以只能根据他们的十种具体表现形态来理解他们。每一种形态对应亚当·凯德蒙（*Adam Kadmon*，即世上第一个男人）或亚当·比勒（*Adam Belial*，堕落天使）的十个主要成员中的一个。这十种具体形态分别是：头（*Kether*），头脑（*Chochma*），心智（*Bina*），这三种构成"思维世界"；怜悯（*Chased*），正义（*Din*），上肢和乳房（*Tephereth*），这些构成了"道德世界"；光荣（*Nezach*），尊严（*Hod*），下肢和生殖器（*Jesod*），这些构成了"物质世界"；最后是国王（*Malchuth*）。他们可以被看做是犹太神秘主义之树（"the cabbalistic—tree"）的十个分支，分为如下三竖行：

理解（Comprehension）	冠（Crown）	智慧（Wisdom）
正义（Justice）	美（Beauty）	怜悯（Mercy）
光荣（Splendour）	生殖器（Foundation）	尊严（Majesty）
	王国（The Kindom）	

信仰喀巴拉的人相信上帝是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尝试后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相信真实的事物是不朽的，相信灵魂是从一个肉体转向另一个肉体的。他们要寻找一个在拒绝了魔鬼的诱惑之后到来的救世主。

解释《圣经》的技能包括 notarikon，gematria 和 temurah。notarikon 是用其他词语的首字母来合成词语的方法；gematria 是通过计算有关名字和日期的数字来推断事件；temurah，即“换算”。 [397]

对于 notarikon 可以举例说明。比如 AdaM，即“亚当（Adam），大卫（David），弥赛亚（Messiah）”，又如著名的希腊基督徒埃克索斯（ICHTHOS），“鱼”（“the Fish”），意为“耶稣基督，上帝之子”（“Jesus Christ，God's Son”。）

Gematria,是从名字和日期中计算总数。十九世纪的时候,这样的计算曾被用于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他生于 1797 年 3 月 22 日,算式为:

22 + 3 + 1797 + 7（名字的字母数）= 1829（他的婚期）:

1829 + 1 + 8 + 2 + 9 = 1849（镇压革命）

1849 + 1 + 8 + 4 + 9 = 1871（加冕礼）

1871 + 1 + 8 + 7 + 1 = 1888（去世）

Temurah 是运用希伯来字母表的二十四个字母排列顺序。例如，把它用于“亚卫”（YaHVeH，即“上帝”）（“亚卫”是以色列神祇的拟人化名称。——译者注）的四个字母，就可以得到 2112 个关于上帝名字的变化来。

犹太神秘主义对犹太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大大加强了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面，而削弱了对托拉（the Torah）的理性研究。它对后期的犹太教神秘主义（Chassidim）尤其具有吸引力。神秘主义学家一边念经书里的咒语一边手舞足蹈，并认为现实会按照扎迪克（zaddiks，犹太民族的首领，意为正义者——译者注）的玄机和预言发展。

从雷纳德·卢尔（Raymond Llull）到皮科（Pico）和卢辛（Reuchin）的很多基督教学者，也都对喀巴拉着迷；它成为欧洲巫术的普遍成分。1677—1678 年在德意志的萨尔兹堡（Sulzbach）由洛森罗特（Rosenroth）男爵印刷的《神秘律法书》的拉丁版本，使它的秘密为更多的人所知。它的思想、形象和词汇遍布于欧洲的语言和文学，而且经常被人信手拈来。[1]

（CABALA：犹太神秘哲学，基于对圣经作神秘主义的解释以认识奥秘预卜未来。约发展于七至十八世纪期间，十三世纪达到顶峰。——译者注）

于1298年和1400年被选帝侯废黜。亨利七世（Henry Ⅶ，1308—1313年在位）是但丁寄托的最后希望，他效仿祖先，在意大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终被拒之罗马城外并因伤寒而在比萨含辱死去。亨利七世的继承者——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Ludwig of Bavaria，1314—1347年在位）与教皇发生冲突，于1328年发动突袭并攻占了罗马；但是他的行为再次引发一系列另立教皇和另立国王的问题。卢森堡的查理四世（Charles Ⅳ of Luxemburg，1346—1378年在位）制定了一套稳定局势的措施。在一个新登基的国王成为皇帝后，他运用帝国的力量巩固他心爱的波希米亚。这段时间德意志皇帝在卡尔斯泰因（the Karlstejn）进行统治。四个主要家族对高层政治争论不休。这四个家族是：以巴伐利亚为中心的维斯特尔斯巴赫家族，它还控制着埃诺和荷兰；卢森堡家族，它控制着卢森堡、布拉班特，并从1310年起控制着波希米亚，从1333年起控制着西里西亚，并在1415年以前控制着卢萨蒂亚和勃兰登堡；萨克森的韦廷家族；还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它的领土由松德高（Sundgau）延伸至卡尔尼奥拉（Carniola），贯穿了整个德意志南部。地方政治控制在各地贪婪的教士、帝国的强大城市或者激进的下层骑士团体手中。这是一个以贵族强盗和武力横行的时代。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缺乏像它两侧的法国和波兰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

到1438年、1440年、1486年三个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者分别当选德意志皇帝的时候，他们开始使用准世袭君王的装束。即便到这个时候皇帝也几乎没有行动自由。如果分裂主义是封建制度的标志的话，德意志就是最典型的封建国家。

在意大利，霍亨斯陶芬家族也留下了苦果。在北部，地区间的战争取代了德意志的压迫。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所有城市都被三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中的某一个统治。这一时期商业和文化开始繁荣，但是冲突也没有休止。剑客和罪犯在艺术家和诗人的作品中极为流行。在意大利的中心地带，1275年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签订的一份协议取消了帝国对教皇国的宗主权。教皇国的领土除罗马外，还包括罗玛尼纳（Romagna），彭塔波利地区（Pentapolis），[398]安科纳边区（March of Ancona）和康帕尼亚地区（Campagna），它完全独立但是没有军事防御力量。不安分的罗马市民使它永远不得安宁。在南方，教皇的代言人安茹家族（House of Anjou）进入并取代了霍亨斯陶芬家族。人们对这一变化难以接受。在1282年3月30日的“西西里晚祷”战争（“Sicilian Vespers”）中，满怀愤恨的巴勒莫（Palermo）人杀死了大约4000名统治他们的法国人。这一事件揭开了阿拉贡在西西里统治的序幕，致使在那不勒斯的安茹统治者被围困，并引发了一场长达20年的战争。[**教皇选举会议**]

佛罗伦萨城位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风暴和光芒的中心，依靠亚平宁半岛城郊出产的精美羊毛，在十三世纪成为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繁荣城市。它的货币佛洛林（florin）成为在意大利以外到处流通的标[399]准通货。城市的中产阶级自称平民（popolo），他们有着远大抱负，与传统的城市贵族——多纳蒂（Donati）、乌贝尔蒂（Uberti）、切尔契（Cerchi）、亚尔贝蒂（Alberti）——相对抗。大大小小的行会都要求在城市选举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轮流担任法官。这场争论形成一

[398]

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

罗马天主教会并不实行民主制。但是选举教皇的程序却相当繁琐。选举会议的程序是格列高利十世（Gregory X）为避免使他的继任者提名陷入僵局而制定的。那次会议于1268年在维特尔博（Viterbo）召开，枢机主教团为此争论了三年。当地的当权者被他们行事的拖沓激怒，便将主教团住所的门从外面锁上，然后揭去屋顶，并减少饮食供应，使他们不得不忍饥挨饿。

此后，在现任教皇去世后的十五天内，枢机主教团要到罗马的梵蒂冈宫集合。（在电报和铁路出现以前，这项规定实际上将意大利以外的多数枢机主教排除在外了。）教皇的内臣受命将主教们锁进一座合适的房子，通常是在礼拜堂，让他们拿着钥匙待在里面，直到他们作出决定。投票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委员会表决，或者按照已有的习惯进行秘密投票。在从早到晚的投票过程中，每位主教将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投到祭坛上的一个杯子里。在没有得出结果的选举轮次中，内臣每天将选票焚掉，从火炉的烟囱里冒出一缕黑烟。直到有一位候选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选票成功当选，选举才算结束。这时候，内臣将以白烟作为选举成功的信号放出，主教团按照宗教仪式向新教皇宣誓效忠，以确认选举的结果。

格列高利十世创立的选举程序基本原封不动维持下来，仅有过一次修订，就是《使徒圣座的空缺》（Vacantis apostolicae sedis，1945年）的制定。在二十世纪，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Francis—Joseph）于1903年对选举会议的结果提出了否定，但并没有为教会所采纳，在1939年还创造了只召开一天选举会议的记录。1978年10月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当选，可能是在第八轮投票中以109票中的103票赞成最终当选。[1]

股激荡澎湃的潮流。市政官一度由神圣罗马帝国指派，处于市政府控制之下。1266年、1295年和1343年通过的宪法都没有能够平息骚乱。

从传统意义上讲，佛罗伦萨是与神圣罗马帝国权威相对抗的归尔甫派（Guelph，教皇派）城市。没有皇帝的介入，该城得以向新的方向发展。城市与教廷关系紧张，归尔甫派自己分裂成多个派系。在1289年6月11日的堪帕尔迪诺（Campaldino）战役中，吉伯林派的阿伦佐（Ghibelline Arezzo）的军队又一次被击败——此前他曾在蒙塔波蒂（Montaperti）被锡耶纳人（Sienese）击败过（1260年）——之后，佛罗伦萨建立了地方霸权。但接下来就出现了“黑”“白”两党间的世仇。1301年，在教廷的代表瓦罗亚的查理（Charles de Valois）失败后，就像此前的吉伯林家族一样，白党遭到放逐。这种分裂无疑是专制统治的前兆，接下来就出现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佛罗伦萨到处是恶毒和仇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个居民说：“佛罗伦萨充满了邪恶……来自地狱的三种邪念——贪婪、妒忌、傲慢——在所有人的胸中埋下了愤怒的种子。”[10]

然而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似乎对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三位伟大作家——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都是佛罗伦萨人。城市的建筑反映出它正一步步走向极度的自信：城市的护卫官邸（始建于1254年），新建的城墙（1384—1310年），维奇奥宫（始建于1298年），重建的维西奥大桥（1345年）以及城市统治者的敞廊（1381年）；羊绒行会的会堂（1300年），归尔甫党的会堂，帕奇、比蒂、斯特洛奇、安蒂诺里、美第奇—里卡尔蒂（1444年）诸家族的宅第（1444年）；还有最重要的宗教艺术——圣明尼亚托·阿尔蒙特会的诺曼式教堂，哥特式的圣克罗奇教堂（1294年），圣约翰施洗堂的大理石八边形（1294年），乔托的钟楼（1339年），布鲁奈莱契的大教堂穹顶（1436年），吉贝尔蒂的施洗堂门（1452年），还有多明我会的圣马可女修道院和安格利科兄弟会的壁画。

但丁·阿里吉耶利（Dante Alighieri，1264—1321年）是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他曾经深深卷入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当该城最好的纪念性建筑处于修建过程中时，他就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他曾在堪帕尔迪诺（Campaldino）战役中担任过前线指挥官。他是归尔甫白党政权的领导人之一，结果被黑党终身流放。经历了二十年流放生活的折磨，他在拉文那（Ravenna）死于堪格兰德·拉·波伦塔（Can Grande da Polenta）的宫廷里，也正是波伦塔将诗人桂冠戴在了但丁业已衰老的前额上。他的《新生》（Vita Nuova）在中世纪人的精神世界里作了一次奇特的旅行。他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里为帝国统治的恢复作了热

情的辩护。在《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中，他提倡使用方言的合理主张使得他成为欧洲现代文学之父。

但丁的代表作《神曲》(*Commedia*) 共一百篇，被推崇它的读者[400]授予"神曲"("Divine") 的称号。它描述了诗人在来世历经三重世界的旅行——"地狱篇"中的地狱之谷，"炼狱篇"中的忏悔之巅，"天堂篇"中天国的光环。在第一层，像《奥德赛》一样，描写的是一次虚构的惊险旅行。一开始维吉尔 (Virgil) 是但丁的向导，使但丁虚构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背景，在那里可以见到古往今来人们的灵魂。在第二层，作者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因对上帝的顶礼膜拜而由罪恶转向得救的精神旅程。在第三层，他精心制造了一个道德建构，那里的居民根据他们品行的恶与善被精确地划分为该下地狱者、拥有希望者和圣徒三种。《神曲》的语言因优美、精练而备受赞许。其故事因诗人奇遇的有趣细节和壮观的道德景观而引人入胜。确切地说，人类经验的最低目标就是要找到失去爱的地方——犹太所在的冰冷的地狱深处。人间的天堂就在炼狱之巅 (Mount Purgatory) 的芳香树丛中，"在那里痛苦带来希望"。最高的地方超出了宇宙的顶峰 (Primum Mobile)，在天堂的光明的玫瑰心中，在言语难以形容的狂喜中。这就是"让太阳和星斗转动的爱"的源泉。

但丁同样是丰富的想象力的源泉。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他听到一个骑驴的人唱他的一首歌，中间夹杂着嗷嗷的驴的嘶叫声，诗人大怒，就要对那个骑驴的人动手，他嚷道："驴的叫声不是我写进去的！"[11]

但丁的壮年正值弗朗西斯科·彼得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年) 的青年时期。彼得拉克的火热的情诗《歌集》(*Canzonieri*)，正好与《新生》的精神相呼应，正如他对劳拉 (Laura) 的深爱与但丁对贝雅特丽齐 (Beatrice) 的深爱相呼应一样。两人都曾回顾过"新文体"(dolce stile nuovo) 的创立者们，如博洛尼亚 (Bolognese) 诗人圭多·圭尼切利 (Guido Guinicelli, 1230—1276 年)，但丁称他为自己文学上的"父亲"；他们"优美的新文体"仅仅是从游吟诗人那里往前迈出的一步。只有那些迂腐的批评家们会把但丁归为"中世纪精神的最深刻体现"而把彼得拉克说成是"文艺复兴之父"：

我的思绪翻山越岭
爱领我前行，因为路已被做好标记
我找到通往宁静生活的路
河流和小溪点缀寂寞的旅途
山与山之间藏着幽静的山谷
在那里，不安的灵魂会静下来；

因为有爱
笑容，泪水，恐惧，皆溶于心。
面容随着心的历程饱受折磨复又宁静，
如此变化，永不停息。
如是，看到它的人学到了这样的生活
他说：也许会燃烧，却不知在何时。[12]

[401]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同时为城市家族间的世仇和欧洲第一批商业银行家提供了生长土壤。前者加剧了自由兵团造成的不断破坏——大部分是外国雇佣兵，如康拉德·冯·沃尔弗特（Conrad von Wolfort）雇佣兵集团，莫里亚兄弟会的医院骑士团（ex—hospitaller Fra Moriale）雇佣兵集团，波希米亚的约翰（John of Bohemia）游侠集团，还有英国爵士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集团。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利凡特地区的贸易而长期在海上作战。没有了教皇的罗马因贵族的派系斗争和市民的起义而苦不堪言，特别是在1347—1354年由著名的独裁者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统治的时候。乔安娜一世（Joanna Ⅰ，1343—1382年在位）和她的四个丈夫的统治使安茹家族统治下的那不勒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意大利银行家学会了如何利用冲突牟取利润。他们发明了现代金融手段的一切形式，从汇票到保险业和会计业；利用教会等级关系网，他们将其活动扩张至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1339—1349年佛罗伦萨几大家族的破产造成了巨大震动，过度的贷款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但很快就恢复如常。在财富的增长与破产的痛苦之中，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了。[计算]

中世纪晚期的教廷，在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试图振作的短暂努力之后，很快又重新陷入依赖他人和流放的状态。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被称做“中世纪最后一位教皇”。他被选举接替可怜的隐修士皮耶特罗·德·莫洛尼（Pietro del Morrone），即塞勒斯廷五世（Celestine Ⅴ）。他曾劝塞勒斯廷五世退位并在随后对他施以终身监禁。为了他的家族加埃塔尼（Gaetani）的利益，他削弱其对手科朗纳（Colonna）家族，并使安茹家族在西西里重新陷入长期的“晚祷战争”中。尽管如此，他还是主持制定了教令集第六卷（1298年）——《圣经》法律汇编的第三部分；1300年他发起一次大赦，对抵达罗马的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施以特赦。他的诏书《至一至圣》（Unam Sanctam，1302年）包含一项加强教会权威的极端说法，声称没有它任何人都不能得救。该诏书本为法国利益而制定，但他与法国发生了争执，结果只能失败。他在家乡安纳尼（Anagni）被法国国王

计算（COMPUTATIO）

1494 年，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的《算术总论》（Summa de Arithmetica）在威尼斯印行。书中还附有作者的一篇论文“账目记录详论”（Particularis de Computis et Scripturis）。这部著作是现代会计行业的第一部教科书。

帕乔利（1447—1517 年）的教名圣塞伯尔克罗会的卢卡·迪·伯尔戈（Fra Luca di Borgo san Sepolcro）也颇为有名。他是一位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位在佛罗伦萨巡回授艺的杰出教师。他最著名的论文《论神圣比率》（1509 年）由列昂纳多·达·芬奇作了图示。近年的一些著述尊称他为“会计行业之父”。[1]

早在帕乔利描述这种方法之前，意大利城市采用所谓“威尼斯方法”即复式记账法（double entry book keeping）已经相当成熟。它需要三本账簿——一份存根（memorial book），一本流水账和一本分类账。存根收入所有交易的记录。流水账根据存根作出，按时间总结每天的交易，它由两竖行构成，左边记录支出，右边记录收入。分类账对每项数据都存储两页，支出在左，收入在右，还有一份数据的索引。其中还有收支平衡的记录、商人资产的总结和收入与支出的各类目的表格。每一份账单做完，最终的利润和损失被录入主资金账簿中，从此账簿的总收支平衡中可以看出业主的赢利情况。[2]

系统的记账方法经常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这些方法传播至欧洲各地，可以通过帕西奥利著作以后的出版物追寻其踪迹。这些出版物包括：扬·伊姆平·克里斯托弗尔（Jan Ympyn Christoffel）的 *Nieuwe instructie ende biwijs de der loofelijcker conster des rekenboecks*（Antwerp，1543）；瓦伦丁·曼赫（Valentin Mennher）的 *Practique brifue pour cyfrer et tenir livres de coupte*（Antwerp，1550）；詹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保持准确计算的方法》（*The maner and fourme how to kepe a erfect reconying . . .*，London，1553）；克拉斯·彼得斯（Claes Pietersz）的 *Boeckhouwen op die Italienische maniere*（Amsterdam，1576）；西蒙·斯泰芬（Simon Stevin）的 *Vorsteliche Bouckhouding . . .*（Leyden，1607），最后这部著作是为拿骚的莫里斯王子（Prince Maurice of Nassau）所作的。

历史学家经常很健忘。即使最平凡的职业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3] 并且正是这些平凡的职业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包括推动学术的发展。

的人绑架而死于冲突中。但丁在代表佛罗伦萨出使罗马时可能私下里会见过卜尼法斯八世，最终他没有原谅教皇，并称之为“新法利赛人的王公”。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因其买卖圣职而将他放入地狱。在“天堂篇”中他借助圣彼得的话谴责说：

[403] 他总是出现在我眼前
然而现在，在上帝之子面前
却没有了他的踪影。
他合上我的坟墓
那里充满脓和血，邪恶的人
将从此坠入……

披着羊皮的豺狼
出现在牧场上，啊，为什么
上帝的守护者会堕落至此？
加斯康和加荷尔赛因
准备吸我们的血。啊，落得如此的可怕下场
岂不是罪有应得？[13]

最终教廷落得“可怕下场”，从克雷芒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即加斯康，亦即伯特郎·德·高特（Gascon，Bertrand de Got）开始，教皇长期被囚禁于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之囚从1309年持续到1377年。对教皇的囚禁开始于美男子腓力普（Philippe le Bel）的推动，他对克雷芒五世的压迫毫不留情；结束于锡耶纳（Sierna）的圣凯瑟琳的推动，她使得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年）下定决心重返罗马。这段时期，七位教皇都是法国人，由法国人主导的枢机主教团选举产生。位于罗讷（Rhone）河畔的阿维尼翁并不在法国境内，而是在维涅森（Venaissin）的一块飞地内，按规定它归教皇所有，由安茹家族代理，1348年由安茹家族用80000克朗一次性购得。但是法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政治行动如圣殿骑士团的分裂，就是由法国策动的。阿维尼翁教皇的权威没有被所有国家接受。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公开分裂达到了顶峰。

教会权力的公然滥用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之一就是神秘主义的隐修盛行，强调宗教激情和直接与上帝交流的体验（见原书第436—437页）。另一个反响就是大众化的教派迅速增多——所有这些教派的宗教理论与传统神学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感到被当前的教会出卖了。这些教派是：反对教会灵魂得救说

的方济各性灵会（Franciscan Spirituals），被称为“托钵僧和慈善修女会”（“Beghards and Beguines”）的流浪团体，自由灵魂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宣扬泛灵论的德意志光明宗（the German Luciferans），上帝之友会（Friends of God）以及英国的罗拉德派（Lollards）。所有这些教派都受到异端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由于政治混乱和对宗教裁判所的惧怕，教会改革不可能被广泛讨论。它包含理论和组织两个方面。曾担任过巴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的英国人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 1330—1384 年）对教会的财富提出了谴责，拒绝承认教会的最高权威，并否认有关圣餐化体的教义。他死后被作为异端焚尸，但异端的罪名是在死后才追加的。捷克的约翰·胡斯（Jan Hus，约 1372—1415 年）曾担任布拉格大学的校长，深受威克里夫的影响。他强调先定论和教会的选举。在波希米亚他成为捷克人反对德意志等级制度的焦点人物。在被放逐出[404]教会后，胡斯设想建立一个教会的大法庭。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新教这个名字，但威克里夫和胡斯是新教徒的先驱。[巫术]

[405]

巫术（MAGIC）

1395 年罗拉德派的“十二条论纲”直接攻击中世纪的英国教会与巫术同流合污。新教改革的一个强烈动机就是“将巫术从宗教中清除出去”，下面这段新教言论第一次确切地阐明了这一动机：

> 教堂里进行的驱邪与封圣仪式，使用酒、面饼和蜡、水、盐、油、香、祭台上的石头、法衣、主教冠、十字架、朝圣者的诗篇，这些行为恰好是巫术而不是宗教神学的体现。因为……我们在这些东西中看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它们却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只能说明它是错误的信仰，是邪恶骗术的手段。[1]

尽管如此，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仍继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巫术。充斥其中的有炼金术士、占星术士、占卜者、行咒法者、行医者和巫师。[炼金术] [女巫] [诺查丹玛斯]在乡村，鬼、神仙、妖精、精灵的观念很流行。罗拉德派的领袖威克里夫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以便为大众所接受。但 300 年后，在克

伦威尔统治下的清教英格兰，威廉·利俐（William Lilly）的《占星术年历》和《古今预言集》却成为市场上最畅销的书。[2] 巫术和宗教经常是难以截然分清的。崇拜基督教圣徒的人们也信仰精灵、仙女和占星术。整个宗教改革期间巫术都是存在的。

因此在这方面，新教对巫术的进攻只取得了部分胜利，甚至在新教后来取得名义上胜利的国家也是这样。但是激进分子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威克里夫之后，路德抨击教会出售赎罪券（见原书第484页），加尔文指责化体教义为“巫术”。宗教生活中凡与哪怕是最轻微的超自然倾向有关的内容都遭到了怀疑。新教徒痛恨宗教中的诅咒、奇迹、献祭、象征、偶像、圣水、圣徒日、宗教仪式以及朝拜圣地。而且，既然新教理应完全清除巫术，新教的对立者天主教相应地应该被认为是邪恶的巫术，教皇应该被看做是巫师，而天主教的弥撒礼则是一种对邪恶的崇拜。

实际上这些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真实的。除了各种形式的法令和改革措施以外，新教派教士又不得不与巫术作一时的妥协。英国圣公会和路德派新教比起加尔文派、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和其他福音教派更接近天主教。但事实证明很难革除诸如十字架标志、宫廷宣誓和妇女生产后的“洁净礼”这些内容。最终的事实证明，很多仪式是不可能革除的，如教会建筑、建筑规范、[406] 领圣餐、出海仪式、坟地。新教希望创造一种新形式的基督教，强调精神上的信仰，但是巫术始终没有被完全革除。

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巫术才真正开始衰落。其原因已被归结为：自然科学革命（见原书第507—510页），紧随其后的理性主义的兴起，现代医学、数学和概率论的发展，还有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劳埃德**] 然而对巫术的信仰以及巫术与宗教的相互依存，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在二十世纪，占星术仍然普遍存在。在罗拉德派占统治地位的英国，1953年英王新奇的加冕礼上，天主教巫术的复活达到了顶峰。[3] 在天主教国家如波兰和意大利，教士为一切事物如汽车、足球吉祥物祈祷。梵蒂冈仍然信守着信仰疗法和预言。[**伯纳黛特**] [**法蒂玛**] 甚至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大大削弱了东正教，而对占星术和方术的信仰仍不能根除。

对巫术和宗教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偏见和爱好的色彩。自弗雷泽（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出版以来，科学的人类学家们一直试图做到毫无偏见。但是学者们一直未能做到不对他人的巫术进行诽谤。这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迷信。[**阿利西亚**]

瑞士（*die Schweiz*）的名字来自卢森湖畔的施维茨地区（Schwyz），这个地区从十三世纪末开始是自称独立于德意志以外的三个州之一。1291 年，施维茨、乌里（Uri）和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签订条约组成了一个自卫性的“永久联盟”，承诺共同对付外来侵略。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摆脱当地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伯爵，而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该湖谷的自由民中安插听命于它的法官。1315 年，在莫尔加腾（Morgarten）战役中，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大败，这个联盟成了其他想要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地区的中心。第一个是卢恩（Luern，1331 年），它的加入使得“四森林州”（the Vierwaldstaette）得以产生。在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城市苏黎世（1351 年），格拉鲁斯（Glarus，1351 年），楚格（Zug，1352 年）和强大的伯尔尼城邦（1353 年）纷纷加入。1386 年哈布斯堡家族在曾帕赫（Sempach）又一次落败，落马的骑士被瑞士的长枪兵斫成碎片。这次战役后，这些州在政治上得以独立。（见原书附录Ⅲ，第 1257 页）

十五世纪中期，哈布斯堡家族因支持苏黎世反对它的邻邦而挑起一场内战。1474—1476 年，当镶着白色十字的红旗第一次举起的时候，瑞士对勃艮第取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从而使瑞士又多了一群成员——弗赖堡（Fribourg）和索洛图恩（Solothurn，1481 年），巴塞尔（Basle）和沙夫豪森（Schaffhausen，1501 年），以及阿彭策尔（Appenzell，1513 年）。至此，瑞士的领土从西边的汝拉（Jura）延伸至东边的提罗尔（Tyrol）。其中有大片“不独立的”和“受保护的”领土，包括日内瓦湖周围的沃州（Vaud），罗尼河上游的瓦莱地区（Valaís），一直往南延伸到卢加诺湖的提契诺（Ticino），往东还有格劳宾登地区的“灰色联盟”格里松斯（Grisons）。居民中有说德语的，法语的，意大利语的，还有说罗曼语的。除了制约联盟内部关系的《斯坦斯协约》（Compact Of Stans，1481 年）以外，瑞士还没有统一的宪法。尽管神圣罗马帝国通过 1499 年的条约承认了瑞士联盟的存在，但没有一部正式的独立宣言。瑞士人证明了他们是欧洲最好的士兵，作为雇佣兵他们有着广阔的市场。梵蒂冈的瑞士警卫队建立于 1516 年，其服装由米开朗基罗设计。

在瑞士的南部和西部，古老的萨伏依家族正在巩固在阿尔卑斯山的领土。阿马迪厄斯五世（Amadeus Ⅴ，1285—1323 年在位）实现了环绕尚贝里（Chambéry）的萨伏依郡与都灵的皮埃蒙特王国的重新联合。阿马迪厄斯六世（Amadeus Ⅵ，1343—1383 年在位）又称“绿伯爵”（the Conte Verde），曾是一名十字军成员，他提出了一套国家支持的济贫系统。阿马迪厄斯八世（Amadeus Ⅷ，1391—1440 年在位）住在日内瓦湖畔的里派尔（Ripaille）修道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他

为公爵，巴塞尔会议选举他为最后一任敌对教皇，是为菲力克斯五世（Felix Ⅴ，1439—1449年）。

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的混乱，使法兰西王国迎来了使它成为欧洲主导力量的第一个历史性机遇。作为圣路易的继承人，卡佩王朝的最后三代国王——腓力普三世勒·哈迪（Phillipe Ⅲ le Hardi，1270—1285年在位），美男子腓力普四世（Phillipe Ⅳ le Bel，1285—1314年在位）以及腓力普四世的三个儿子：路易十世（Louis Ⅹ，1314—1316年在位），腓力普五世（Phillipe Ⅴ，1316—1322年在位）和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22—1328年在位）——统治时期，人口众多且财富日盛，国家管理井井有条。他们没能保住自身的优势，主要有三个原因：对继承权的争夺，与英国的战争以及瘟疫的泛滥。

美男子腓力普为圣路易之孙，为人表面公正，实则内心奸诈。他因铸造成色不足的货币和巧立名目勒索税收而臭名昭著。他的一次成功扩张领土的行动——1312年与里昂城的合并——是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在意大利期间秘密进行的。他与教皇的冲突导致了安纳尼（Anagni）丑闻事件（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被绑架一事，见原书401页——译者注），这次冲突也是因金钱而起的。教皇卜尼法斯希望通过《教士不纳俗税》（Clericis laicos）诏书阻止他向教士征税。面对这一法令，腓力普干脆下令禁止一切货币外流。他与教职界的积怨源于嫉妒，而且是蓄意制造的，这种积怨终于导致教职界被剥夺了权利。1307—1312年他组织对教职人士的审讯，给教会精心捏造的罪行是教会与邪恶势力即不信教的人结盟，接着就是严刑逼供，最后是合法的谋杀和全国性的抢劫。最后一位骑士团大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i），在推翻所有的供词之后，死于巴黎的火刑柱，这给王国留下了一个永久的污点。[祈祷钟]

[407] 但美男子腓力普是一些长效制度的创立者。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他找到一切借口敲诈他的封臣，以使他的破坏性行动合法化，并以要求举国一致地掩盖他的行动。他的指导思想来自一句罗马箴言：任何使国王高兴的事情都具有法律效力（*quod principi legis habet vigorem*）。从前的国王宫廷分为三个部门：御前会议治理王国，财政署管理王国财政，议会负责王国的司法，并负责起草国王的一切法令（这不是真正的议会）。1302年第一次召开三级会议，召集贵族、教士和平民制定王国的政策。美男子腓力普死的很是时候，恰好避开了一次全国性暴动；不过他设立的大部分管理机构一直延续到1789年。

[407]

祈祷钟（ANGELUS）

在鼓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曾提倡忠实的信徒每日背诵三遍圣母祈祷文（Angelus）。圣母是十字军的保护神。祈祷以"上帝的天使告诉玛利亚"开始，这已经成了向圣母祷告的标准程式。教皇的提议被很多人忽视了，但波瓦图（Poitou）的桑蒂斯（Saintes）的圣皮埃尔大教堂是个例外。桑蒂斯的教士不仅按规定背诵晚祷文，还定下了一个仪式，每天在日出、正午和日落时鸣钟，以示虔诚。

根据地方传统，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1318年重申了他的前任的要求，下令各地教会都要接受桑蒂斯的习惯。[1] 有些权威人物则认为这一习惯是在1456年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listus Ⅲ）任职期间确立的。总之，祈祷的钟声开始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城乡的一道独特风景，就如同伊斯兰世界中宣礼的声音一样。中世纪是一个没有背景噪音的世界。那时候没有工厂、机械、汽车、收音机，也没有音响，声音是不会受到干扰的。在狭窄拥挤的小镇上，小商贩的吆喝声与手工作坊里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但是在广漠空旷的乡村则涌动着大自然的声音。真正可以和教堂钟声相和鸣的仅有树梢的风声、牲畜的低鸣和远处铁匠铺里传来的金属撞击声。[**声音**]

1316年，卡佩王朝因继承权问题陷入了混乱。美男子腓力普的三个儿子共有六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当路易十世·勒·胡丁（le Hutin）（爱争吵者）突然驾崩时，只留下一个女儿，一位已身怀六甲的王后和一个遗腹子，即死后被追谥的简一世（Jean Ⅰ）——他只活了、也只在位不到一个星期。最终路易兄弟的律师们制定了所谓《萨利克法》（Salic law），旨在将他们的妹妹（和此后所有法国王室的女性）排除在外。但是在1328年，当王位传至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者[408]瓦卢瓦家族的腓力普（Philippe de Valois）时，他的继承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美男子腓力普的惟一一个活着的外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蒙塔尤**]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的三位爱德华——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72—1307年在位）、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307—1327年在位）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1327—1377年在位）——统治下的英格兰，在一个多世纪里只经历了三代君王。没有大贵族的叛乱和

对外战争。同时，金雀花家族继续占有加斯科尼（Gascony）和盖内（Guyenne）两块在法国的飞地，王国的领土并不稳固，但与佛兰德斯的羊毛贸易日益繁荣，城市也在兴起。特别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采取了多种政策加强政府的建设，并确保了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的霸主地位。1295年的“模范国会”，遵循三十年前德·孟福尔（De Moutfort）的先例，召集城市中的市民和各郡骑士出席，由此奠定了下院的基础。大宪章（Magna Carta）重新得到确认。1297年在斯特普尼·格林（Stepney Green）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修正案，确立了“不得无故征税”的原则。此后，威斯敏斯特大厅一直成为英国议会的场所。《爱德华的特权依据调查令状》（*Quo Warranto*，1278年）曾对国王直属封臣的土地占有权构成威胁；但是《威斯敏斯特二号法令》（1285年）支持地产的继承，同时有利于王室和大土地所有者。他与教会在关于《教士不纳俗税》（Clericis laicos）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最后他干脆宣布教士不受法律保护，冲突才得以控制。1277—1301年他对威尔士的征服被证明是永久性的。但是他对苏格兰的侵略则使苏格兰人奋起争取独立。爱德华二世几乎完全不懂他父亲的座右铭：“信守承诺”，在伯克利（Berkeley）城，他被王后的党羽谋杀。爱德华三世则陷入与法国无休止的百年战争中。

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要比英格兰迅速得多。苏格兰在诺曼征服中没有被直接占领；在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达成协议之前，他们早就与盖尔诸部族达成了临时性妥协。苏格兰王室与贵族长期以来一直被卷入英格兰的事务中，正如英格兰人总是卷入法国事务中一样。但他们在近两个世纪以前就争得了自由。关键时刻发生在爱德华一世干涉一桩继承纠纷之后的战争期间。争夺的一方是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卒于1313年），他先被囚禁于英格兰，后被流放到法国。另一方是布鲁斯家族的罗伯特（Robert the Bruce，1306—1329年在位），1314年6月班诺克本（Bannockburn）战役的胜者，他起先是英格兰的封臣，后来却成了苏格兰人的救星。但是影响最大者当属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270—1305年），他唤起了苏格兰人民的起义。华莱士最后被人出卖，在伦敦作为土匪被处以绞刑，他是苏格兰历史上的殉道英雄：

> 苏格兰，你的土地上流淌着华莱士的血，
> 苏格兰，布鲁斯带领着你，
> [409] 要么流血
> 要么胜利。[14]

“我们决心永远不向英格兰的强权屈服，”苏格兰的领主们在《阿尔布罗斯宣言》(1320年)中向教皇陈述道，“我们正在为自由，而且也只为自由而战。”[15]他们的努力在1328年最终被证明是有效的。

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战争对爱尔兰具有直接的影响。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都柏林的总督约翰·沃甘（John Wogan）伯爵仿照伦敦的“模范国会”建立了爱尔兰议会。但是英格兰人在班诺克本的战败给了爱尔兰的封建主们一次反抗的机会。1315—1318年这三年里，他们接纳了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名叫布鲁斯的人作国王。此后的几十年一直动乱不断，直到《基尔肯尼法令》（1366年）规定都柏林遵守英格兰法律，周围的居民必须说英语。

1347年至1350年的“黑死病”使得欧洲的这些小吵小闹立刻停止下来。这是一场自六世纪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瘟疫，而且也没有人料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将再度出现。三种相关的破坏力极强的疾病——腺鼠疫、败血症和肺炎一起使这场灾难变得更为严重。前两种疾病由黑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第三种在空气中传播，速度尤其地快，并且更为致命。腺鼠疫最普遍的症状是，病菌导致生殖器或腋下出现淋巴肿块，同时因内出血导致皮肤上出现黑色斑块。如果肿块没有提前破掉，患者就会在经历三到四天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死去。

尽管中世纪的医学已经普遍注意到了传染病，但没有完全掌握这种疾病传播的具体途径。医生们只能在痛苦中观望。尤其在城镇里，拥挤的房屋和糟糕的卫生条件为黑鼠提供了极佳的生长环境，结果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薄伽丘（Boccaccio）记载说仅佛罗伦萨就有10万人死亡。在巴黎，一天就得埋葬八百具尸体。一位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愤愤地写道：“在马赛，一百五十位方济各修士没有一个活下来向世人编造谎言。这倒是一件好事。”[16]

这种传染病始于中亚，以极为骇人的速度传播。最初它向东传播，止于中国和印度。在欧洲的记载中最早是在1346年夏天，地点是热那亚在克里米亚（Crimea）的殖民地卡法（Caffa）。当时此地已处在鞑靼人的包围之中，围城的人将染上病菌的尸体抛入城中，以图摧毁该城的反抗。抵抗者们为了逃命只得跳上战船逃走。1347年10月黑死病传到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1348年，它通过一艘被确认是从卡法驶来的战船传到热那亚。在家乡的港口，由于遭到惊恐的市民的驱逐，这艘已被击伤的战船只得继续向马赛和巴伦西亚（Valencia）航行。这年冬天，黑死病袭击了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沿海的其他城市，然后向比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中部推进。夏天的时候到达巴黎，到年底已经穿过了英吉利海峡。1349年，它向北穿过了不列颠诸岛，向东

[410]

蒙塔尤（MONTAILLOU）

1318—1325年，比利牛斯半岛上富瓦伯国（Foix）的帕米埃（Pamiers）主教雅克·弗涅尔（Jacques Fournier）对辖区内重新兴起的异端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审讯。在370次审讯中他审判了114名疑犯，其中有48名是女性，25名来自蒙塔尤。审讯的所有问答在主教的记事簿中均有记录。

蒙塔尤是一个由250人组成的村落，他们来自26个被称为"奥斯忒尔"[ostal，即多姆斯（domus）]的宗族，分成50个独立的家族生活着。它的范围从山顶的城堡延伸至山脚的教堂，居民主要是农民和工匠。其中还有一批人是强悍的牧民，被组织起来在通往加泰罗尼亚的牧场上和道路边劳动。从官方方面看，他们信仰天主教，但他们大部分是秘密的清洁派（又译"卡塔尔派"）教徒（Cathars），是在谷仓和地窖中藏匿云游的"完美者"（Perfecti，清洁派中的杰出者）。1308年的审讯和逮捕活动将该村变成"只剩下绵羊和孩子的沙漠"，对这场审讯的恐惧使得原先就有的仇恨和对抗更为严重。这本主教记事簿如同一架"历史显微镜"，揭示了该村村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蒙塔尤仅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研究它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写道，"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原生动物在游动。"[1]

克勒格（Clergues）家族的22名奥斯忒尔成员控制着村庄。老彭斯·克勒格（Pons Clergues）是个顽固的异端分子，他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儿子皮埃尔（Pierre），是蒙塔尤的牧师，也是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最后死于狱中。还有一个儿子伯纳德（Bernard）是一个庄园的管家，他千方百计试图为他的兄弟作伪证，结果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彭斯的遗孀曼加德（Mengarde）是蒙塔尤异端的女首领，却被葬于堂区教堂的祭坛之下。皮埃尔的众多情妇之一贝特丽丝·德·布兰尼索尔（Beatrice de Planissoles），是个贵妇人，她先嫁给富瓦伯爵的监城官和代理人贝伦吉尔·德·洛克弗特（Berenger de Roquefort）。第二次丧夫之后，她遭到皮埃尔的私生子帕萨德（Pathard）的强暴并成为他的情妇。她有过无数的情夫，甚至在年老时还生过四个女儿。她在审讯中招供了这一切。1322年，她被处以佩带惩罚异端的黄色十字架进行忏悔。[避孕]

清洁派的宗教活动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清洁派

显示出双重道德标准——对完美者极端严厉而对俗人极为宽松。完美者在临死之前，必须以绝食来结束生命。俗人则追求成为“异端”，也就是说，接受赦免仪式。

这个半清洁派、半天主教的社区具有一种矛盾性。这体现在希比尔·皮埃尔（Sybille Pierre）的女婴赦免事件中。完美者不让这个生病的女婴进食牛奶和肉。“当他们离开房子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孩子的母亲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我眼前死去。所以我就给她喂奶。当我丈夫回来时……他感到极为悲痛。”[2] [411]

中世纪西欧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氛围。人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哭泣。他们不觉得为了彼此快乐而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罪恶；他们不为任何已有的道德规范所束缚；而且他们对财富有着强烈的憎恶感。因为婴儿死亡率极高，他们以同样高的出生率来弥补；但他们并非对利益得失漠不关心。他们生活在一个巫术和习俗、天主教和异端并存的复杂世界，而且他们随时都面临着死亡。

富尔尼耶（Fournier）主教在帕米埃（Pamiers）表现出的宗教热忱并没有损害他的前程。1327 年他被擢升为大主教，1334 年又成了教皇，是为本笃七世。他的记事簿被收进梵蒂冈图书馆。他最持久的纪念物是位于阿维尼翁的教皇行宫。

穿过德意志，向东南进入了巴尔干半岛。1350 年进入苏格兰、丹麦和瑞典，又通过了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诸城市和俄罗斯。只有极少数的地方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波兰、比利牛斯半岛的伯恩郡和列日主教区。

很多人对这场灾难作了形象的描述，其中有一位威尔士诗人尤安·盖亭（Ieuan Gethin），他在 1349 年 3 月或 4 月目睹了灾难的爆发：

> 我们看见死神如同黑色的烟雾一样来到我们中间，这场灾难夺去了年轻人的生命，它像虚无缥缈的幽灵一样，对无辜的人们没有丝毫怜悯。腋下的肿块令人痛不欲生……它的形状像苹果，像洋葱头，皮肤上还会起水泡。等水泡要破的时候，皮肤就像被烧过一样，呈现出肉红色，令人疼痛难忍……他们就像黑豆的种子从豆荚里爆出一样……像破碎的贝壳，如同很多东西混在一起沾在皮肤上一样，皮肤上会出现黑色的痕迹……[17]

这场灾难在人们中间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恐慌，因而也不能把人们

的表现说成是渎职和对道德的无视。很多能逃走的人都逃走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的就是一群灾难期间在乡村城堡里避难的男人和女人。其他的人干脆放弃了自我约束，纵情于酒色之中。教士们因照看教区居民而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而在有些地方他们则任凭病人独自忏悔，黑色的旗子在被遗弃的堂区教堂上空飘着，破败不堪。人们相信这是上帝在惩罚人类的罪恶。

[412] 统计这场灾难中的人口损失是一项极其困难并且技术含量相当高的工作。当时的统计很多被证明是夸张的。薄伽丘说佛罗伦萨的死亡人数为1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所知该城人口的总数，5万可能更准确一些。一般说来，城镇受到的打击比乡村严重，穷人比富人严重，年轻力壮的人比年老体衰的人严重。没有教皇和国王染上这种病症。由于没有人口普查，历史学家只能以一些零碎的记录作为统计的依据。在英格兰他们以宫廷的花名册、行效忠礼的账目、主教区的登记簿作参考。一项专题研究表明当时的死亡率极高：牛津郡的库克汉姆庄园失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18]英格兰的堂区神甫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但是很难推断出一个普遍适用的数据。精确的统计表明，人口总共损失了三分之一。“在黑死病泛滥期间，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丧失了生命……这种说法与事实不会偏差太远。”[19]英格兰损失了140万到200万人口，由此可以推出，法国损失了800万，整个欧洲约损失了3000万人口。

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必然会造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事实上，历史学家习惯将黑死病看做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决定性因素。十四世纪下半叶的显著特点是，庄园陷入混乱，商业衰落，劳动力短缺，城市贫困。但是，当今的专家们认为，很多变化早在1347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甚至是最基本的特征即人口下降，至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意味着，黑死病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并非其根源。无论如何，农奴的劳役地租正向货币地租转变，因此产生出一种更为灵活、依附性更小的劳动力。封臣的军事和司法义务正在向支付现金的方式转变，因此产生了一种在英格兰被称做是“变种的封建制度”现象。尤其是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工资肯定会因需求的上升而提高。货币经济得以扩展；社会等级差异受到了威胁。[**娼妓**]

人们的心理遭到了很深的创伤。尽管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被削弱了，但大众的宗教虔诚却加深了。慈善组织激增，极度的宗教虔诚流行起来。人们感到上帝的愤怒必须得以平息。在德意志，庞大的修道团体兴盛起来，直到遭到驻跸于阿维尼翁的教皇圣谕的压制。人们在寻找替罪羊。有些地方的麻风病人遭到了攻击，还有些地方的犹太人被指控在水里施毒。1348年在夏兰(Chillon)进行了一场对犹

[413]

娼妓（PROSTIBULA）

从1350年到1480年前后，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极端时期，"是娼妓业的一个黄金时期"。[1]公开的妓院在大多数城镇是凭执照经营的。像塔拉斯康（Tarascon）这么一个只有500到600户人家的小地方，就有10家妓院。教会对此并不反对：既然罪恶存在，就必须对它进行疏导。有执照的皮肉生意缓解了街头的混乱，让年轻的男子不再沉迷于鸡奸甚至更糟糕的事情中，并教会他们如何尽夫妻之道。1480年以后，事情有了变化。高级妓女侍奉富人们，而许多低级妓院则被关闭。在新教国家，风尘女子则开始接受再教育。[2]

在整个历史中，娼妓问题以三种状态循环着：借助执照实行控制、无效的禁止、非官方的默认。

太人的审讯，而其证据是通过酷刑得到的。这只是一系列迫害中的一例：在巴塞尔，所有的犹太人被关进木制的建筑中活活烧死；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斯图加特、乌尔姆、斯佩耶尔和德累斯顿。在斯特拉斯堡，两千名犹太人遭到屠杀；在美因茨被杀戮的犹太人达到12000人。德意志境内活下来的犹太人逃到波兰——波兰因此而成为欧洲犹太人最主要的聚居区。**[阿尔特马尔克广场][高利贷]**

[414]

阿尔特马尔克广场（ALTMARKT）

1349年的忏悔节（大斋首日的前一天，人们曾常在此日忏悔请求赦罪——译者注），德累斯顿这座古老城市的阿尔特马尔克广场弥漫着焚烧尸体的浓烟。迈森（Meissen）侯爵下令烧杀全城的犹太人，原因可能是认为他们传播了黑死病。这次名副其实的宗教迫害在《德累斯顿编年》（*Chronicum Parvum Dresdense*）中有记载。[1]

六百年后的1945年4月13日，又一次的忏悔节晚上十点，英国皇家空军第83中队的一架高空导航机放出的信号弹将古老的德累斯顿城照耀得五彩缤纷。阿尔特马尔克广场被选定作为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突袭式轰炸的首要目标。

官方宣布这次行动只将军事和工业目标作为打击对象，但除此之外，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一直将德国的防空武器划入大规模“区域轰炸”的战略范围。在关于盟军这次空中打击行动的激烈争论中，以空军副元帅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为首的“区域轰炸”的鼓吹者们最终胜出。行动的办法是向一个城市派遣载有重型轰炸机的航空母舰，以此对目标实行逐渐加强的毁灭性打击。[2] 哈里斯自吹自擂道：“我们将如同拔牙一样将德国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拿下。”1942 年 5 月 31 日，一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了第一次轰炸。但是直到 1943 年 7 月 27—28 日晚对汉堡进行了突袭，原先的预定目标才得以实现。此时突袭的风暴已夺去了 4 万多人的生命。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的首府。直到 1945 年时仍然保持着原貌。中世纪的老城四周环绕着宽阔的广场和马路，有着众多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遗迹：建于 1535 年的乔尔根斯赫洛斯王宫，为纪念萨克森选侯改宗天主教而建的天主教堂霍夫基克（1751 年），以及为谴责这次改宗而建的新教教堂弗劳恩基希（1742 年）。

现在德累斯顿被选为主要的打击目标，是应苏联对盟军空中支援的请求而决定的。该城聚集了成千上万被苏联的攻势驱赶到此的难民，还有他们的救援队伍，主要是年轻女子。

信号弹发出 10 分钟之后，第一批的 529 架兰开斯特号轰炸机开始从西南部的一个 68 度飞行跑道上起飞，到达目标，在没有遭到高射炮和战斗机阻挡的情况下，他们投下巨型炸弹和燃烧物。在 45 分钟内，战火迅速蔓延。德累斯顿古老的市中心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被吞没。[3]

第二天上午，当救援队伍赶到时，由美国战略空军第一师的 450 架战斗机发起了第二波攻击。战斗机向任何移动的目标进行扫射。

[415] 对这次突袭造成损失的统计存在巨大分歧。英国的调查组织报告说总共有 1681 英亩地区被完全破坏。战后的《德累斯顿计划报告》统计说有 3140 英亩土地遭到程度为 75％的破坏。当地的死亡人数统计署（“Death Bureau”）称截至 1945 年 5 月已证实的死亡人数为 39773。这个数字不包括失踪和未登记的人，也不包括没有登录在案的墓地和大量的集体墓地。这个数字应该是一个最小值。后来该署的负责人作了一个大胆的估计，认为死亡人数总共有 135000 人。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在 120000 到 150000之间。[4]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阵亡的军人没被统计在内，所能

知道的就是为在阿尔特马尔克的无数次火葬中运送燃料的手推车排成看不见尾的长队。

这次突袭造成的战略影响似乎不是太严重。两天之后火车就可以在德累斯顿通行。重要的战争工业，如位于德累斯顿—纽西德利兹（Dresden—Neusiedlitz）的电厂，没有遭到破坏。苏军直到5月8日才到达。

接下来就是一场笔墨官司。一家后来脱离了纳粹政府的联合公报称，“盟军空军将领长期拖延才作出决定，是为了对德国居民中心进行恐怖性轰炸。”一家纳粹公报表示同意这种说法：“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犯下令对无辜的德国公民进行血腥大屠杀。”1945年，里查德·斯托克斯（Richard Stokes）议员在英国议院质问：“恐怖性的轰炸现在已成为官方的公开政策了吗？”官方的回答是：“我们不会为纯粹的恐怖行动浪费时间和战斗机。”[5]

1946年4月13日晚10点10分，德国苏占区的所有教堂鸣钟致意。德累斯顿的所有教堂中，只有弗劳恩基希教堂破落不堪的穹顶和架子仍然耸立着。同一天，前空军元帅哈里斯头带圆顶礼帽，登船准备出国开始他的平民生活。尽管在1953年他被授予早就应该得到的爵士头衔，但直到1992年5月31日他的纪念馆在伦敦河畔揭幕，他才获得与他的同僚们同样的荣誉。这一天是突袭科隆的50周年纪念日。科隆市长表示了公开的抗议：“尽管阿瑟·哈里斯的行为有着正当的立场和理由，”他写道，“但我认为纪念像他这样的战争英雄是毫无意义的。”[6]

1995年在德累斯顿准备进行自己的纪念活动时，德国总统赫尔佐克（Herzog）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他说，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是人类战争中野蛮行径的一个例子……只选择自己国家的正面史实作为材料的历史书不应该再编写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统一欧洲，也必须统一书写欧洲历史。”[7]

[416]

高利贷（USURY）

1317年初在马赛，有一个叫本德维·德·德拉圭南（Bondavid de Draguignan）的人被指控在已经向借款人劳伦修斯·杰拉迪（Laurentius Girardi）收回资金后，还继续索取款项。本德维是个犹太放债人，他被怀疑触犯了反高利贷法。很多事件使中世纪的人将

犹太人视为没有良知的骗子，本德维的故事是其中具有完整记载的一件。本德维是两个世纪后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原型，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对他进行了丑化。[1]

高利贷——借出钱然后收取高额利息——在基督教的欧洲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和犯罪。教士们强调基督的教诲："但是你们应当爱你们的仇人，要行善事，借出了东西不要期待回报……你们要仁慈，因为你们的父也是仁慈的。"（路加福音 6:35—36）教会一再禁止利息，后来将它限制在每年 10%以内。

犹太人的做法是，他们之间禁止高利贷，但允许向犹太人以外的人收取利息："向异族人收取利息；但不可向同族人收取利息。"（申命记：23:20）这种差异使犹太人在中世纪的金融市场和信贷行业中取得了优势，同时也加深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以下内容节选自夏洛克对他的竞争对手安东尼奥的愤恨的旁白：

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
借钱给人不取利钱，
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
他憎恨我们神圣的民族，
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
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
说那些都是盘剥来的肮脏钱。
要是我饶过了他，
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37—47 页

（译文采用人民出版社 1978 年朱生豪译本——译者注）

实际上，关于高利贷的法律没有得到执行。基督徒银行家可以通过不记录借出的金额而只记录归还的金额来隐藏实际收取的高额利息。[2] 犹太人银行家则因为与广大平民进行小规模的贷款交易而招致咒骂。伪善和一定程度的敌对情绪或许是在所难免的，资本主义的最基本手段之一就这样被禁止了几百年。尽管如此，犹太人在欧洲银行信贷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个历史事实。

黑死病以后的一段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起义的流行。对幸存下

来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而这时又有一些企图降低劳动报酬的措施出台，如英格兰的“雇工法令”（1351 年），引起本已极度减少的劳动力的愤怒。扎克雷起义（jacquerie）摧毁了法国伊利和香槟省的城堡和贵族家庭，之后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 1378 年至 1382 年，确切地说是在黑死病过后的一代的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起义，看起来确实像是某些社会骚动的征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这些事件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永恒特征”。其他学者则将之归结为“因前途渺茫而导致的愤怒总爆发”。[20]

不过当城镇的地方性动乱与乡村范围更广的暴乱同时爆发的时候，当时的人势必会感到惊恐。1378 年，佛罗伦萨的羊毛梳理工暴乱持续了几个月。1379 年，根特和布鲁日的纺织工人掀起了一场反对佛兰德斯伯爵的猛烈起义，这使人联想到此前的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曾发生过的一次起义，两次起义的最终结局都是起义者与国王的军队对峙。根特的两次起义都持续了六年。1381 年，英格兰的几个郡被卷入农民起义中；1382 年，巴黎也爆发了起义。

当时一位在法国宫廷的佛罗伦萨商人伯诺科索·比蒂（Buonocorso Pitti）记录了起义的一些片断：

根特人起义反对他们的领主佛兰德斯公爵，也就是勃艮第女公爵的父亲。大量根特人前往布鲁日，占领了该城，废黜了公爵，并劫杀了所有军官……起义的领导人是腓力普·范·阿特维尔德（Philip van Artevelde）。由于佛兰德斯反叛者的数量激增，他们派密使到巴黎和鲁昂（Rouen）的民众中间……于是这两个城市也起义反对法国国王。巴黎人民的第一次起义由一个小商贩引发，当一位官员试图对其贩卖的水果和蔬菜征税时，他开始大吼，“打倒盐税”。随着这一声喊，集市上的所有人一起冲向税务官的房子，将他们劫杀……城市有产者（肥人，The popolo grasso），在法国被称为布尔乔亚，因为害怕民众可[417]能洗劫他们，于是也拿起武器准备镇压起义。[21]

英格兰的农民起义不能归因于贫民的绝望和愤怒。编年史家夫傅华萨说，这场起义的领导者是过着“轻松而富裕”生活的人。他们要求结束受奴役的地位，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对四年里征收三分之一的人头税极为愤怒；他们的反抗是正义的，与罗拉德派时期的反抗是一样的。他们的愤怒指向教士和绅士。普通的传教士，如起义教士约翰·玻尔（John Ball），一直宣传平等主义观点：“亚当躬耕，夏娃纺织之时，孰为士绅？”

因而在 1381 年 6 月的一段时间里，似乎整个统治阶级都在遭受攻击。瓦特·泰勒（Wat Tyler）率众从肯特涌进伦敦。杰克·斯特罗

(Jack Straw) 从埃塞克斯开进伦敦。他们焚毁了冈特的约翰 (John of Gaunt) 在萨瓦宫的家，烧掉了希伯里庄园和伦敦桥附近的一家佛兰德斯人的妓院。他们绞死了大主教，处死了大批市民。在斯密茨菲尔德 (Smithfield)，他们与年轻的国王极其随从短兵相接；混战中瓦特·泰勒被杀。此后起义者内部发生混乱。他们的首领被逮捕处死。逃散的余众如被追捕到，则由各郡进行审判。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以自己的成就为荣。生活在当时的乔叟从来没有触及这一主题；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理查二世》中也没有提到。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人对这场起义表示了同情和理解。[22] [纹章]

[418]

纹章 (TABARD)

理查二世 1393 年的一项法令强制要求英格兰所有小客栈都要有一个图案标志，结果出现了一系列别致的名称和标志牌并组成了一个大型的露天画廊。[1]

中世纪的客栈通常与朝圣有关。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Pilgrims) 就是从萨瑟克 (Southwark) 的盾徽讲起的。"耶路撒冷的朝圣" (TRYPPE TO JERUSALEM) 至今仍在诺丁汉保存着，这个名字在 1189 年就有了。1666 年的大火烧毁了大批伦敦客栈，位于阿尔德盖特 (Aldgate) 的建于十三世纪的"圆环和葡萄" (HOOP AND GRAPES) 被认为是幸存的最古老的一座。

许多客栈得名于资助者的盾徽。"白鹿"来源于理查二世的盾徽。"旭日"是为了纪念爱德华三世；"蓝色的公猪"是约克家族的象征；"绿色的龙"代表彭布洛克 (Pembroke) 伯爵；"灰猎犬"代表亨利七世。其他很多是由手艺人或他们的行会打造的，因此成为铁匠或纺织工的盾徽。"槌子和锲子"或"人和镰刀"代表手艺人的工具。以人群为内容的盾徽与交通有关。"群马"、"车马"和"铁路客栈"反映了交通旅行手段的进步。伦敦 SW1 区圣詹姆斯教堂的"蓝色驿站"代表的是十八世纪的一种轿子的停靠站系统。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也很多。如"野兔和猎犬"和"猎鹰"代表狩猎，还有像"狗和鸭"、"斗鸡"和"公牛"代表现在早已被禁止的一些粗野运动。

靠近现代的客栈纹章通常是代表一些著名的英雄和文学形象。这些形象包括从"莉莉·郎特利"和"汉密尔顿女士"到"阿特弗尔·多特格尔"、"伊利莎·杜利特"和在布罗姆利的"邦特"的所有

人。有些纪念有历史性意义的战役如“特拉法尔加”（特拉法尔加角，位于西班牙西南海岸，直布罗陀以西，英国海军于1805年在此战胜了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译者注。），经常会给人以鼓舞；还有“皇家橡树”，1651年查理二世曾隐藏于其中。相应的也有一些事件不那么有戏剧性，如“枢机主教的过错”（指1540年对汤桥修道院的镇压），“向下延伸的世界”（指1683年发现澳大利亚）和“温布利的火炬”（指1948年的奥运会）。

衍生的名字很多。“受骗的猫”即所谓的“加腾·勒·费德勒”，一位曾为英格兰掌控加莱的骑士。“装钉子的口袋”（BAG O' NAILS）是从拉丁语的“Bacchanales”演变而来的，意为“酒鬼”；“山羊和指南针”（GOAT AND COMPASSES）来源于一句清教的口号——“上帝与我们同在”。与爱国者有关的名字极为流行——如“阿尔比顿”，“老布利顿”，“布列塔尼亚”，“维多利亚”。“安蒂加利堪”是一艘拿破仑时代的著名战舰的名字。

但是其他的国家也没有被忽略。“丹麦国王”是为了纪念1606年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的来访；“瑞士英雄”纪念的是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安格尔斯泰因”（ANGERSTEIN）是为了表彰建立劳埃德保险社（Lloyd's）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独立者”是为了纪念匈牙利人的领袖科苏特（Kossuth）。兰贝特的“西班牙爱国者”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创立的。[**前进**] [419]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名字是无法弄清其含义的。“象鹊和便桥”，伯克斯特的假发和烦恼的“山羊和靴子”，这些名字的意思可以任由人们自己去猜想。

教皇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后，教会的分裂从1378年持续到1417年。当然，此前也曾出现过敌对教皇；但这次的两位教皇都是由同一个枢机主教团选举出来的，他们鼓动战争攻击对方，相互开除教籍，演出了一幕丑剧。两位教皇即乌尔班六世（Urban Ⅵ）和克雷芒七世（Clement Ⅶ），他们几乎都难以被看做是圣徒。前者被证明是一个虐待狂，他一边在梵蒂冈的花园读日课经，一边监督他的主教团拷打犯人。后者，也就是日内瓦的罗伯特（Robert of Geneva），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塞西纳（Cesena）大屠杀。1409年，乌尔班和克雷芒两派都拒绝参加一次旨在调和两派的会议，于是选举团选出了第三位教皇。直到康斯坦茨会议解除了三位在任教皇的职务并一致拥立枢机主教奥多·科罗纳（Odo Colonna）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e Ⅴ，1417—1431

年）取代他们，教会的分裂才告结束。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417年）结束了宗教会议运动。巴黎大学的教授们在半个世纪里一直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会议由德意志国王——卢森堡的西格蒙特（Sigismund of Luxemburg）召集，会议传召令发送给所有枢机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诸侯、托钵修士、教师（teachers）。一万八千名教士，背负统一教会的使命，聚集于这座湖畔小镇。另外，他们还打算限制教皇的权力。他们选出了马丁五世（Martin Ⅴ）为惟一的教皇，结束了教会的分裂。

但是他们烧死了约翰·胡斯，因为他们认为由一个异教徒掌管德意志帝国的安全通行证是靠不住的；不过教会没有改变滥用权力的状况。原定在康斯坦茨进一步召开的会议，最终于1431年在萨伏依公爵的保护下在巴塞尔召开，会议持续了几年。但是会议与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发生冲突，最后拥立萨伏依公爵本人作为教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宗教会议运动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使这样一个观念得到了加强，即教会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教皇。

意大利避开了所有外国的干涉。在十五世纪，意大利经历着高度的繁荣、极度的混乱和剧烈的文化震动。城市共和国、城市僭主统治、雇佣兵队长的为所欲为和早期文艺复兴（见第7章）都达到了顶峰。城市间无休止的冲突破坏了城市的寡头统治，给地方的专制君主提供了机会。米兰经历了十二位维斯孔蒂（Visconti，1277—1447年）和五位斯福扎（Sforzas，1450—1535年）的统治，佛罗伦萨由科西莫（Cosimo）和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i Medici，1434—1494年）统治，从这两个城市看不出政治的低潮与艺术的高度发展有不和谐的地方。威尼斯的力量和财富达到了顶峰，在大陆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其中就包括帕多瓦（Padua）。那不勒斯陷入内战之中。但罗马在一些既有远大抱负又有涵养的教皇和佛罗伦萨的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1447—1455年在位）手里，又获得了新生。意大利独自经历着它的混乱与繁荣，直到1494年法国再度介入。

“百年战争”——通常认为从1337年进行到1453年——并非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一场正规而持续不断的战争。它是历史学家的一个标签，1823年首次使用，以表示一个较长的忧患期（le temps des malheurs），它经常被英国人用作发动袭击、远途游猎和军事征战的借口。（有时它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是为1152—1259年早期英法之间冲突的延续。）百年战争的特点首先是漫无节制，正如后世的浅薄之辈对“中世纪特征”所评判的——无尽的杀戮、愚昧的迷信、不忠不

义的骑士制度以及不顾公共福祉而追求不计其数的个人利益。这一场景中遍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杰出的骑士，诸如法兰西王室总管布雷顿·伯特兰·迪盖斯克林（Breton Bertrand Duguesclin，约 1320—1380 年）以及他的对手威尔士（Wales）和阿基坦（Aquitaine）亲王——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黑太子”爱德华（1330—1376 年）；有叛逆的贵族，如纳瓦尔的查理·莫韦（Charles le Mauvais）；有粗鲁的冒险家，如约翰·法斯托尔夫（John Fastolf）爵士；有厚颜无耻的主教，[420] 如博韦（Beauvais）主教皮埃尔·科雄（Pierre Cauchon），他曾为谋杀做出神学论证。很少有人以较好的声誉出现。主教科雄的主要受害者贞德（Jeanne d'Arc）无疑是这场战争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贞德是一位清白的农家女子，她听从神的呼唤，全副武装地奔赴战场，后来却被谬判为异端和魔女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到 1430 年她殉难之时，关于这场灾患的起源已被人们忘却了。在英国监狱羁押 35 年之久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查理（Charles d'Orléans）这样为他的故国哀叹：

> 和平是无价的，
> 我痛恨战争：人本不应对战争怀有敬意。
> 我已被久久困扰，毋论正当与否，
> 望兮法兰西，我心本爱之。[23]

法兰西的灾患部分起因于瓦卢瓦家族（the House of Valois）的王位继承问题，部分起因于大采邑的各自为政，其中包括著名的佛兰德斯、布列塔尼、基恩（阿基坦）和勃艮第，同时还部分起因于巴黎的反复无常。英格兰的兴趣在于金雀花王朝不断提出的对法兰西王位的要求；在于金雀花王朝持有的领地，尤其是基恩；还在于它同佛兰德斯的商业联系；更在于四五代英国人素有的以为名誉和财富都在海峡彼岸等待着他们的信念。法兰西总是其潜在的较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但英国对海洋的主导使这个岛国安全远离除作为法兰西盟友的苏格兰之外的一切国家，同时英国军队的技术优势也一次次使法兰西难以作出进攻决断。结果，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英国人不断肆无忌惮地尝试着他们的运气和勇气。甚至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远征之后，人们真要怀疑，如果英国不是经历了一次内战，他们可能仍然游离在外。

综观这场战争人们会注意到，英格兰国王发动的六次主要的远征——始于 1338 年 7 月爱德华三世在安特卫普登陆，终于 1422 年 8 月亨利五世在樊尚去世——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及那些规模较小却频繁发生的局部战争更为典型，同时人们还应重视战斗双方各自的流动

性。英格兰人在克勒西（1346年）、普瓦提埃（1356年）、阿金库尔（1415年）一系列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尽管轰动一时，却不及那些永无休止的小规模战斗和攻占城堡的斗争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大。这些胜利同黑太子（Black Prince）1370年对里摩日（Limoges）居民进行的可耻屠杀，以及他的兄弟——兰开斯特（Lancaster）公爵、冈特（Gaunt）的约翰——1373年从加莱到波尔多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侵袭形成了反差，这些胜利当然也不如斯柳伊斯（L'Écluse/Sluys）海战更具决定性，1340年的这场海战中，有20000法国人阵亡。与战斗双方的[421]雇佣兵相比，短命的皇家军队可能没有造成更多的破坏或屠戮。像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1360年）或阿拉斯会议（Congress of Arras，1435年）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同无足轻重的条约和零散的停战协定一样毫无成效。

法兰西灾患构成了重要的军事外交事件的基本背景。促成第三次停战协定的1347—1349年间的瘟疫就是这些灾患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亦是如此。巴黎布商艾田·马赛（étienne Marcel）领导的起义一度控制了三级会议，1382年瓦特·泰勒起义将国王的收税官逐一击杀，让·卡博什（Jean Caboche）领导的肉商暴动，勃艮第同阿马尼亚家族（Armagnacs）之间的派系战争等，都是这种背景的构成因素。凶杀事件司空见惯：马赛在卢浮宫当着国王之面将王家卫队统帅杀害，而他自己也遭到暗杀；1407年阿马尼亚家族的创始人奥尔良公爵路易被杀，家族总管、也是阿马尼亚家族主要对手的原十字军将士——勃艮第的无畏者约翰（Jean Sans Peur）在蒙特罗（Montereau）桥上被杀。不幸的瓦洛亚王朝统治维艰。除了智者查理五世（Charles V le Sage，1364—1380年在位）这位能干的君主之外，其他很少有人得享安宁。好人约翰（Jean le Bon，1350—1364年在位）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被俘，之后在英国羁押期间死去。查理六世（Charles Ⅵ，1380—1422年在位）则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了三十年。而查理七世（Charles Ⅶ，1422—1461年在位）在作了多年的皇太子和不幸的“布尔日城之王（King of Bourges）”之后，又在阿马尼亚人和勃艮第人的阴影下苟且度过数十年，直到法兰西王政系统重建后，他才成为位居其首的“至尊者”（“the Well—Served”）。[狩猎]

双方的冲突在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进入关键阶段。这是以英国的猛攻为开端，而以法国的重建为终结的十年。阿金库尔战役后，年轻的亨利五世忙于组建一个新的英格兰—法兰西王国。通过1420年特鲁瓦（Troys）条约，他实际上控制了洛林以北的整个法兰西。作为法兰西国王的女婿，他又被公开指定为瓦卢瓦王朝的继承人。亨利五世在樊尚（Vincennes）猝然去世后，他年幼的儿子亨利六世（Henry Ⅵ）被宣布

[422]

狩猎（CHASSE）

加斯顿·腓比斯（Gaston Phœbus）著的《狩猎之术》（*Le Livre de la chasse*）——全称 *Les Deduits de la chasse des bestes sauvages et des oiseaulx de proye*（1381 年）——是一部著名的社会学文献，一些装裱精美的书稿正是在这部书的启发下面世的。这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编号 MS 616 的法文译本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作者加斯顿三世（Gaston Ⅲ）被称为“腓比斯”（Phébus）（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译者注），他是富瓦伯爵（Count of Foix）兼贝阿恩领主（Seigneur of Bearn，1331—1391 年），是一位来自加斯科尼的阅历丰富的探险家。他在克勒西战役中为法国作战，在普鲁士战役中为条顿骑士团作战，他还经常在奥尔泰兹（Orthez）的比利牛斯山城堡中接待编年史家夫瓦萨。此书概述了所有猎物的种类：狼、牡鹿、熊、野猪和獾、猎犬、灵提、獒和猎。同时书中介绍了狩猎方法，有潜步跟踪、以犬追猎、埋设陷阱、设网捕捉、射杀、诱捕甚至偷猎等，从嗅知气味直到发出猎杀成功的号角，该书对每一步都做了精深而详细的描述，并附有插图。[1]（见地图 30）

十四世纪，狩猎依然是整个欧洲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野味为人的饮食提供了一种必要补充，在冬季尤其如此。狩猎武器（弓、剑和矛）、马术、追猎及捕杀心术，共同构成军事技能的一种基本要素。处于严刑酷法保护下的森林储备为皇家和贵族提供了一项重要特权。

在东方，森林和猎物的数量更大，农业生产更无保证，故而狩猎技能更显重要。历史学家马辛·克罗默（Marcin Kromer）在 1557 年完成的作品中以极为怀旧的笔触描写了在德涅斯特河畔的波多利亚捕猎鬃牛的场景，使人联想起西班牙斗牛：

> 与此同时，其中一个猎人在强壮猎狗的帮助下接近鬃牛，并绕树不断追赶、戏弄它，直到它因伤痛或精疲力竭而倒毙。如果猎人……受到生命威胁，他的同伴便会抖动大红披肩分散鬃牛注意力，因为红色是一种能激起它暴怒的颜色。受此搅扰，鬃牛便舍弃第一个人，转而去进攻下一个能立即毁掉它的捕猎者。[2]

火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渐改变了狩猎技术及其具有的社会

职能。例如在英格兰，最后一匹狼在十八世纪被杀掉后，狩猎对象便集中到了农夫的主要敌害狐狸身上。古代身着“猎狐红衣”、头戴兽角并“嘀嘀”吼叫的仪式保留了下来。但这种仪式最初的实际作用已经失去。1893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诙谐地把英国乡村绅士骑马追逐一只狐狸的场景描述为“不会说话的正全力追逐不能食用的”。[3] 狩猎和射击已降为一种娱乐形式。在[423]反流血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即使钓鱼也被列为残忍野蛮的项目。[4] **[科诺普什蒂]**

在东欧，狩猎作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存留时间稍久一些。它被塑造成共产主义国家高层人士的地位象征。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射杀髼牛是最高奖赏，也是对封建贵族的最大效仿。

为国王，由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约翰摄政。巴黎在1418—1436年间仍处于英格兰—勃艮第联军的掌握之中，英国在巴士底狱（Bastille）还设有驻军。1428年，贝德福德围攻法兰西王室在阿马尼亚克的最后一个北方据点——奥尔良。瓦洛亚王朝的命运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然而没人在意过那位农家女——“奥尔良姑娘贞德”，这位少女骑士促使犹豫不决的皇太子自感羞愧而开始采取行动。1429年5月8日，贞德冲过大桥，解除了奥尔良之围。随后，她引领不情愿的国王穿越英格兰—勃艮第联军的占领区，并在兰斯举行了加冕典礼。到1431年她在卢昂市场被烧死在英国人的火刑柱上时，英国的进攻浪潮实际上正在迅速消退。**[地租]**

此后，双方冲突之势日渐缓和了。1435年的阿拉斯会议使勃艮第断绝了同英国的联盟，英格兰的好运至此一去不复返了。1439年的精兵骑士团敕令（*Ordonnance sur la Gendarmerie*）使法兰西王国最终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常备骑兵团和弓箭手。对布拉格里（Praguerie）叛乱的镇压结束了阿马尼亚人和贵族的反抗。最后的战斗发生在1449—1453年。1453年7月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公爵在卡斯蒂永（Castillon）被炮火击溃，波尔多敞门接纳了法兰西的统治，到此时，只有加莱还处于英国人的掌控之中。1475年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指望得到勃艮第党人支持的英国军队在法兰西登陆。但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每年50000克朗的补助金和75000克朗的现金，并寻求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对法兰西皇太子同其女儿婚事的允诺。

对于法兰西，百年战争是一场严重浩劫。人口减少了50%，国

家的复兴将从一个至低点起步。在路易十一（Louis Ⅺ，1461—1483年在位）这位以消除勃艮第威胁而闻名的“世界蜘蛛”和外交能手的统治之下，国家才开始迅速复兴。

对于英格兰，百年战争在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甫初，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是一个王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充其量仅是法兰西文明的外围。在被剥夺了大陆领地之后，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最终成为一个岛国，远离欧洲大陆而得以自保，在新建英语民族中怡然自信。盎格鲁—诺曼时代的建制已被彻底英国化了。这一漫长过程以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年）的英语文学为肇端。在理查二世（Richard Ⅱ，1377—1399年在位）和兰开斯特的三位国王——亨利四世（Henry Ⅳ，1399—1413年在位）、亨利五世（Henry Ⅴ，1413—1422年在位）、亨利六世（Henry Ⅵ，1422—1461年在位）统治时期，法兰西陷于内战，这为英格兰保存从君主和贵族间的暴力斗争中遗留下来的国力提供了一个安全阀。理查二世被废黜，后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被杀。冈特约翰的儿子——篡权者亨利四世借助一份错误的家谱夺得王位。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兰西的努力中罹难。幼主亨利六世最终也遭到废黜。但是在政治舞台浸满鲜血的表面之下，一种坚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正在兴起。200年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作品中借助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法掠夺的冈特约翰之口，颂扬了英格兰光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无疑是犯了时代性错误，但他的确表达了在早年那场冲突中产生的一种情感：

> 这国王的宝座，这权力的红岛，
> 这至尊的土地，这战神的座椅，
> 这一处伊甸园，可比天堂
> 这自然女神亲建的堡垒
> 要抵御战争触手的侵扰，
> 这欢乐的人群，这小小的世界，
> 这镶嵌于银海中的宝石，
> ……这福佑的乐园，这热土，这王国，这英格兰。[24]

[425]

正是在法兰西，英国人建立了辉煌业绩，并巩固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是莎士比亚号召“最高尚的英国人”团结起来的演说应放在阿夫勒（Harfleur）战役之前，还是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呢？

[424]

地租（RENTES）

计量史学（Cliometrics）是借助计算机盛行起来的。以前，历史学家常常因现存数据的浩繁和研究方法的不当而陷入困顿。统计抽样少，历时短暂，结论也就不确切。对数据加以处理的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便克服了诸多此类弊端。

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 Paris）成立于1947年，该学院第六部是计量史学的先驱之一。他们的计划之一便是力求确认从中世纪后期到大革命之间巴黎地租的增长。第一阶段，要运用23000组公共机构记录和私人记录，计算出以图尔城里弗（livres tournois）为单位的年平均地租。第二阶段，是将货币数据转换为代表实际购买力的数组，以抵消通货紧缩带来的影响。这就要将预收地租同以三年为周期的小麦价格联系起来，小麦以塞提尔（Setier，法国古斗，1塞提尔约合150—300升——译者注）为单位。第三阶段是绘制出下降的“地租曲线图”，与第二阶段得到的样例相对照，在此过程中，它是一项同公证人记录相独立的史料（这些史料从1550年起就可以使用了），而结论较为接近（见原书附录Ⅲ，第1263页）：

计算所得的平均地租			公证人记录保管处的地租记录		
	里弗	塞提尔		里弗	塞提尔
1549—1551	64.24	16.77	1550	63.72	16.64
1603—1605	168.39	17.81	1604	229.00	24.23
1696—1698	481.96	23.41	1697	531.00	25.79
1732—1734	835.55	55.70	1734	818.35	54.55
1786—1788	1281.04	58.63	1788	1697.65	77.69

巴黎的“地租曲线”同时反映着政治事件和经济走势。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地租下降的低点出现于1420—1423年“圣女贞德时期的萧条”、1564—1575年间“圣巴托罗缪夜造成的低迷”、1591—1593年“围攻期间的萧条”以及1650—1656年间“投石党运动带来的低谷”。1445—1500年的“文艺复兴”时期，1500年后价格革命的数十年间——当时“实际地租”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名义地租的增长之势，路易十四统治稳固时期到1690年间，十八世纪中叶的逐步上升时期，以上这样的恢复期趋向于变得越来越

长。根据计算机的计算结果，最高点出现于 1759—1761 年（69.78 塞提尔）和 1777 年（65.26 塞提尔）。根据公证人记录，最高点出现于 1788 年（77.69 塞提尔）。

这项数据的最终价值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从地租曲线图难以看出影响巴黎住宅市场的诸多关键因素，更不用说法国总体经济形势了。它也不能说明人口压力、地产规模和优劣以及新住宅的建筑。然而在前现代时期，历史学家仅仅能够对有关价格、工资、消费和收入等数据的总体变化加以揣测，如今计量史学则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指标，不同的信息资源可以与之相对照加以测量。它首先显示了以满腔热忱投入到确认经济局势中去的经济结构学家的希望及其所蕴含趋势的整体模式。在他们看来，经济局势是其他全部历史事实赖以存在的基础。

[425]

在英格兰王国岛内，威尔士成为惟一无法被完全同化的区域。在 1400—1414 年对法战争处于高潮之时，威尔士暗结英格兰国王在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爱尔兰（Ireland）、苏格兰（Scotland）和法兰西的敌人，发动了一场志在必得的叛乱。在格林杜尔（Glyndyvrdwy）勋爵欧文·阿普·格里菲斯（Owain ap Gruffydd）——英国人称之为“格林杜尔·欧文”（Owen Glendower）——的率领下，叛军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获得解放的威尔士的憧憬，并很快重建了一个独立的威尔士。1404—1405 年，威尔士最高议会在马汉莱斯（Machynlleth）召开。然而不到十年，这场运动便渐趋瓦解。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国人的胜利使这场运动的命运走向终结。此后，国王在威尔士的城堡逐渐得以恢复，格林杜尔的儿子也被迫投降。从那以后，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独特性，威尔士还是成为英格兰统治区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 1450 年起，英格兰为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大伤元气，它不禁令人想起了勃艮第人同阿马尼亚人之间的同室操戈。国王（亨利六世——译者注）的精神疾患和有关王位继承问题的争执，导致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之间互相攻伐。玫瑰战争——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理查三世（Richard Ⅲ）和亨利七世（Henry Ⅶ）这三位王位觊觎者之间的争斗，最终以都铎家族的胜利而告终，此后英格兰才得以自由自在安享其日益增长的繁荣成果。

莎士比亚再一次不恰当地描述了“英格兰的鲜血”怎样“浸染了那片土壤……那耶稣的蒙难之地，淹没了死人的头颅”。如果最近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那么这场战斗事实上应是相当缓和的。[25]除了 1471 年图克斯伯克战役之外，在其他战役中，俘虏并没有遭到大批

屠杀。许多战斗发生在克尔特人（Celtic）居住的边缘地区，包括康沃尔（Cornwall）的圣·米迦勒（St Michael）山以及威尔士的登比（Denbigh）、哈勒赫（Harlech）、卡雷塞南（Carreg Cennen）、彭布罗克（Pembroke）——最后的胜利者亨利·都铎（Henry Tudor）的出生地。[426]1485年8月22日发生在博斯沃斯（Bosworth）战场的一幕——理查三世丢弃的王冠挂在荆棘丛上，他绝望地驼着背，高喊着"愿以我的国土换一匹马"——已成为艺术作品中陈旧的题材，但它给英国中世纪的历史画上了恰当的句号。

百年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勃艮第作为一个光荣的半独立国家的崛起。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促使了"中王国"的出现，它们在欧洲政治中扮演过强有力的角色，但由于缺乏内在的凝聚力，最终归于昙花一现。法兰西王室的地位还要迁就于瓦卢瓦王朝时期的四位勃艮第公爵——鲁莽者腓力普（Philippe le Hardi，1342—1404年）、无畏者约翰（Jean sans Peur，1371—1419年）、善人腓力普（Philippe le Bon，1396—1467年）和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1433—1477年），他们的财富和威望都在许多国王之上。他们最初的领地——环绕第戎（Dijon）的古老的勃艮第公爵领地——于1361年通过法兰西国王授予了鲁莽者腓力普。从那时起，通过从法德边界内外获得大量领地，这一区域逐步扩展。（见原书附录Ⅲ，第1281页）腓力普和他的兄弟贝里（Berry）公爵和安茹（Anjou）公爵一样，其实是法国"百合王子"（百合花徽是法国王室的象征）之一。幸赖其英国盟友的帮助，腓力普的儿子和孙子才得以从家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腓力普的曾孙——性急者查理企图诡秘地扩张自身势力，以取得对周边贵族的优势。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繁荣的北部城市——布鲁日、阿拉斯、伊普雷、根特和安特卫普。他们依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巡回审判，但巴黎的阿图瓦和第戎的公爵府邸除外。他们继续保有在里尔、布鲁日的普林森霍夫、布鲁塞尔的古腾堡以及在阿图瓦的埃丹城堡所建的重要居所。（见原书附录Ⅲ，第1260页）

勃艮第宫廷是风靡一时的骑士奢侈文化的中心，这尤其体现在金羊毛骑士团宗教仪式的奢华和十字军运动发起人的狂热上。各种马术比赛、长枪比武、宴会、展览会及列队仪式都是这种狂热的体现。公爵是各类艺术的慷慨赞助者，雕刻家如克劳斯·斯鲁特（Claus Sluter），画家如简·范爱克（Jan van Eyck）和罗杰·范德尔·威登（Roger van der Weyden），还有诗人、音乐家、传奇作家以及著名的挂毯商，都曾得到他们的支持。公爵及其廷臣身着锦衣貂皮，珠光宝气，一切都使人叹为观止，印象深刻。他们首先都是婚姻外交的高手。善人腓力普曾为其堂兄弟——即后来的路易十一提供避难，但这

仅仅是为提防这位暂时的落难者变成自己的死敌。查理公爵逐渐落入路易的政治圈套，在莫拉特（Morat）被路易的瑞士盟军击败，后在南希（Nancy）同洛林人的交战中被杀。“勃艮第的战利品”（Burgunderbeute）一直到今天都充盈于瑞士的博物馆。[26] **[男裤口盖]**

1477年查理之死使勃艮第陷入了衰退和分裂。路易十一恢复了原来的公爵领地。狮心王的领地则落入了查理的女儿玛丽（Mary）之手，后来又转给了玛丽的丈夫马克西米连·冯·哈布斯堡（Maximilian von Habsburg）。他们在勃艮第的那部分遗产，包括佛兰德斯、布拉邦特、泽兰（Zeeland）、荷兰和盖尔德斯（Guelders），构成了后来尼德兰的基础，成为他们的孙子——“最后的勃艮第人”查理五世的财产。勃艮第政府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甚至连第戎附近位于尚莫（Champmol）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charterhouse）宏伟的公爵陵墓都没有保存下来。[27]

[427]

男裤口盖（CODPIECE）

1476年莫拉特（Morat）战役获胜之后，瑞士军队劫掠了勃艮第人的营房，抢走大箱的华丽衣物，将其剪成碎条，并身着敌军残破的服饰进行嘲弄性游行。这一事件不仅可用以解释十六世纪流行的“开衩马甲”的起源，还可以说明中世纪普通男装款式的军事起源。[1]

当时显然还存在另外两款男士装束，都带有明显的情爱色彩。人们已完全不再穿尖长的翘头鞋（*poulaine*）了。这种鞋的上翘部分是为了便于在马镫上踩踏而发明的，后来被认为是为了显示脚趾的作用。男裤口盖则逐渐流行起来。拉伯雷（Rabelais）认为，它是为在战斗中保护生殖器官而发明的，更有可能是为身着盔甲的骑士便于如厕而设计的，另外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穿戴者的衣服免受油脂和抗梅毒药膏的污染。但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种裸露款式竟流行上百年。在《如愿》（As you like it）中，莎士比亚描写赫尔克勒斯（Hercules），说他的男裤口盖像他的棍棒一样多。

直到最近，许多内衣尤其是贴身内衣都被归于“内衣类”。斯文的历史学家曾忽略了它们，如今它们却是学术论文和艳俗展览的主题。[2]

多年以后，一位修士向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出示了无畏者约翰的颅骨，据传他还说道：“那里有英国人开道进入法国的门户。”人们同样可以指责性急者查理不计后果的野心，正是这一野心给哈布斯堡家族进入西欧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目前哈布斯堡家族仍然野心勃勃。尽管自1438年以来他们在德意志一直拥有皇帝称号——腓特烈三世冯·哈布斯堡（Frederick Ⅲ von Habsburg，1440—1493年）是在罗马加冕的最后一位皇帝——从未中断过，但他们的发展依然未超出对手。事实上，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他们位居该地区其他强有力的家族之上。最后，仅仅是由于偶然因素，哈布斯堡家族才在雅盖隆家族（Jagiellons）失败之后得以坐享成功。

两个世纪以来，争吵不休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贵族在他们的王国都有问鼎王位继承的权利，他们都会跳一种精巧的加伏特舞，[428]代表着中欧四大家族。他们非常类似于早期建立的企业的股东，都寻求同一个或更多较为强大的综合企业进行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既可以确保继续掌控自己的事务，同时可以使本国得到熟练的治理和有效的保护，免于被占领或合并。这三国的合作是因本国统治家族的覆灭而开始的。阿尔帕德家族（Árpád line）于1301年在匈牙利覆灭，波希米亚的普尔米塞（Přemyslids）卒于1306年，波兰的皮亚斯特则死于1370年。（见原书附录Ⅲ，第1261页）

结果中东欧进入了一个较长的王朝纵横更迭时期，哈布斯堡、卢森堡、金雀花和雅盖隆等家族都涉足其中。起初，卢森堡似乎占据上风，于1308—1313年和1347—1437年间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1310—1437年间控制着波希米亚，1387—1437年间控制着匈牙利。十五世纪中叶，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与此相当的势力范围，但意外地竟使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重新回到当地统治者手中。到1490年时，雅盖隆家族控制了波兰—立陶宛、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但未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叙述这一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如果不谈及这些广泛的联系，那么就缺少了一项本质内容。

波希米亚在国王成为世袭选帝侯之后就成为一个享有特殊地位的地区。在其最后阶段，普尔米塞控制了奥地利—斯提里亚—卡林西亚（Austria—Styria—Carinthia），但在1278年迪尔恩克鲁特（Dürnkrut）战役中失之于哈布斯堡家族。后来，瓦茨拉夫二世（Vaclav Ⅱ，1278—1305年在位）同时登上波兰和匈牙利的王位。在普尔米塞退位后，波希米亚经历了卢森堡、哈布斯堡和雅盖隆家族的统治。在十五世纪，波希米亚诸侯卷入了一场同贵族和胡斯派进行的持久战争。最后一位波希米亚国王伊日·兹·波杰布拉德（Jiří z Poděbrad）（乔治·波杰

布拉德：George of Podiebrady，1458—1471 年在位），使他的王国维持了 20 多年的脆弱独立。

建立了捷克民族教会的胡斯派在不断的镇压之中幸存了下来。胡斯派的出现适逢罗马天主教会的分裂达到顶点之时，波希米亚因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冲突、国王同贵族之间的冲突大学和布拉格大主教之间的冲突以及教士同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关头。胡斯派的要求迅速超越了胡斯所提出的神学和政治主张。胡斯罹难的消息，加之康斯坦茨宗教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突然向捷克人民抛出的开除胡斯派教籍的公告，使胡斯派愤怒万分，他们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民族起义，同时也是"第一次宗教改革"。胡斯派分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派为圣杯派（the Utraquists），从大部分都为德国人的天主教统治集团那里接管了既有的教会组织；另一派为激进的塔博尔派（Taborites），他们建立了独立的福音派团体，并以设防的营帐即"塔博尔（Tabor）"为中心。

1419 年 7 月 30 日，布拉格事态已到危急关头。胡斯派的行进队伍在新镇（New Town）遭到石块袭击，德意志的市长从市议会的窗户被扔向人群。教皇作出回应，宣布向异教徒发动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随即，主张在圣餐礼上兼领面饼和酒的圣杯派迅速在布拉格条款（Articles of Prague，1420 年）中阐明了他们的教义，而塔博尔派则在[429]神奇的独目将军扬·日什卡兹·托恩科瓦（Jan Žižka z Torncova，1376—1424 年）率领下开赴战场。年复一年，入侵的德意志十字军遭到重创。胡斯派还将斗争引向深受内部分裂之苦的萨克森、西里西亚和匈牙利地区。1434 年圣杯派在利帕尼（Lipany）对塔博尔派的决定性胜利，使得胜利者同天主教会得以缔结和平。通过巴塞尔条约（Compacts of Basle），他们得以在波希米亚将圣杯派主导的教会秩序维持到 1620 年为止。在随后的政治格局中，捷克贵族试图选举一名哈布斯堡家族的婴童继承卢森堡家族的统治，二十年后他们又选举了一名强有力的圣杯派将军伊日·兹·波杰布拉德。借助这类手段，他们经营着自己的事务。伊日去世后，议会接受了弗拉迪斯拉夫·雅盖隆（Vladislav Jagiellon，1471—1490 年在位），以期使他们从匈牙利人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解脱出来。

匈牙利则重蹈波希米亚历史的覆辙。在经历了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s）短暂统治后，匈牙利又被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Angevins）接管。查理·罗伯特［Charles Robert，即卡罗贝特（Carobert）1310—1342 年在位］和路易（1342—1382 年在位）被称为大拉约斯（Lajos the Great），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最高统治，仅次于卢森堡和哈布斯堡的势力。最后一位来自安茹家族的杰出国王马赛厄

斯·科尔瓦伊纳斯（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从1458年统治到1490年。第一位国王雅盖隆应邀统治匈牙利，瓦尔纳（Varna）的拉迪斯拉斯（Ladislas，1440—1444年在位）则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被杀。第三任国王路易二世（Louis Ⅱ，1516—1526年在位）也在莫哈奇（Mohács）战亡。

波兰向着更为辉煌而独立的目标前进。在历经182年的封建割据之后，弗拉迪斯拉夫·洛基泰克（Wfadysfaw Tokietek，1320—1333年在位）将波兰重新统一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王国，他在大赦之年访问了罗马，受到教皇加冕。洛基泰克之子大卡西米尔（Casimir the Great，1333—1370年在位）是皮亚斯特（Piasts）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royal Piasts），他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政府管理系统，颁布法典并确立了一系列连贯的对外政策。他使波兰的西部省份特别是西里西亚顺从于卢森堡，借此得以放手向东方扩张。1349年他对加利西亚（Galicia）和利沃夫（Lwow）城的攫取便是波兰挺进东方斯拉夫地区的首要步骤。同年，他接纳了来自德意志的犹太难民，这奠定了波兰作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基础。安茹家族路易的统治以科希策律法（the Statute of Košice，1374年）为标志，该律令赋予波兰贵族与其匈牙利兄弟平等的权利。此后贵族（Szlachta）的权力持续增强。然而最重要的事件还是路易之女、已被接纳为波兰国王的娅德维加（Jadwiga）同立陶宛大公约盖拉（Jogaila）的婚姻。

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蕴涵广泛的国际意义。将两个都处于发展强势阶段的大国结合在一起，将使这种民族融合加速进行，甚至生成一种新的文明。这种联合的直接原因在于条顿骑士团的威胁，他们在维尔纽斯的所作所为和在克拉科夫一样令人发指。但其原因还不只这些。波兰从蒙古人的侵略中恢复了元气并幸免于黑死病的侵扰，正热切展望着东方的广阔天地。立陶宛依然处于非基督教集团的统治之下，近邻莫斯科的兴起也使其深感忧虑，因此急切希求融入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之中。波兰和立陶宛都在寻求彼此间的支持。因此，这次联[430]姻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两人的个人范围。娅德维加这位失去父亲的12岁姑娘履行了她承担的职责。约盖拉是位40岁的尚武的单身汉，波兰人称之为雅盖隆，他意识到这是历史的契机，无法拒绝。

在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前，立陶宛在拉丁教会和东正教这两种抉择之间徘徊了数十年。约盖拉的父亲阿尔吉尔达斯（Algirdas）大公（1341—1377年在位）奉行一种“动态平衡”政策。在其全部统治过程中，他都以宗教皈依的许诺为诱饵，在阿维尼翁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左右逢源。在十四世纪七十年代，看起来他似乎要选择东正教以取代莫斯科而成为东正教斯拉夫人的领袖。1375年他劝说君士坦丁堡大

教长建立独立的“基辅罗斯和立陶宛”大主教区，以对抗古老的被莫斯科人控制的“基辅和全俄罗斯人”大主教区。约盖拉也曾倾向于选择皈依东方。1382年阿尔吉尔达斯被推向了莫斯科——因为此时他悖逆的兄弟开始同条顿骑士团同流合路了。1384年，身为基督徒的约盖拉的母亲——特维尔（Tver）的尤利亚娜（Juliana）订立了一份暂时协约，根据这项约定，约盖拉将同一位莫斯科公主订婚，立陶宛将同东正教联姻。这些计划大概被鞑靼人所粉碎，他们夷平了莫斯科，破坏了同莫斯科联盟的价值。这样，当同尊奉天主教的波兰进行联合的意向明确之后，这种联合便迅速成行。约盖拉同波兰和匈牙利—安茹的使节于1385年8月在克雷瓦（Kreva）达成协议。1386年2月15日，他在克拉科夫接受洗礼，并领受了基督教名字弗拉迪斯拉夫（Wladyslaw）。三天后，他同娅德维加成婚，3月4日被加冕为波兰人共同的国王。[28]（参见原书附录Ⅲ，第1262页）

说来也怪，当1387年在维尔纽斯砍伐圣橡树之时，立陶宛并不是欧洲最后皈依基督教的王国。此时，下立陶宛地区被条顿骑士团占领。他们无意采取以上的步骤，因此该地区没有接受基督教洗礼——直到1417年立陶宛人恢复统治为止。[29]自君士坦丁时代起11个世纪之后，欧洲长期的异教时代终于走到了末路。

雅盖隆家族迅速崛起为一支主要势力。1440年条顿骑士团在格伦瓦尔德（Grunwald）战役中的行军路线一旦确定，雅盖隆家族的命运就已成为定数。雅盖隆家族的一支统治着维尔纽斯，另一支统治着克拉科夫，借此，这一家族统治了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王国。尽管罗马天主教是居主导地位的文明力量，波兰语正日渐成为居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的语言，但他们统辖的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全部波兰人、罗塞尼亚人、犹太人利益的有力代表。（立陶宛文明则融入了东北方的农业群体。）约盖拉之子拉迪斯拉斯/弗拉迪斯拉夫（Ladislas/Wladyslaw）四世（卒于1444年）曾统治匈牙利和波兰，后在十字军运动中死于遥远的瓦尔纳。约盖拉的孙子卡齐米日·雅盖隆兹克（Kazimierz Jagiellończyk，1445—1492年在位）同哈布斯堡家族实现联姻，并被誉为“欧洲的祖父”。事实上，在1492年卡齐米日去世时，他的后人着手继承的似乎是整个地球。命运阻止了土耳其国家的形成。当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路易·雅盖隆兹克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无嗣而终时，他拥有的一切便转归哈布斯堡家族了。正是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对中欧的统治。即使如此，雅盖隆人促进文明发展的时间比其带来的黑暗时期更为长久。[**细菌**]

在中世纪晚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三个君主国（瑞典、挪威、丹麦）因暴躁的贵族阶层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汉萨同盟的商业活动而黯然 [431]

[431]

细菌（MICROBE）

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雅盖隆兹克于1492年7月葬于克拉科夫（Cracow）瓦韦尔大教堂的圣十字礼拜堂。481年后的1973年5月，克拉科夫的枢机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fa）允许一个自然资源保护学家队伍重新打开了墓葬，同时打开的还有卡西米尔的皇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的墓。这样的事并不罕见，大卡西米尔（卒于1370年）之墓就曾于1869年被打开，其重新安葬引起了一场浩大的波兰爱国游行。圣亚德维加（St Jadwiga，卒于1399年）的墓1949年也曾被打开。

然而1973年的墓葬开掘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少于十六位直接参与此事的人都因不确知的原因而死去。世界舆论界想起了"法老的咒语"，推测是否是500年之久的细菌在作祟。一位克拉科夫的记者曾写了一部有关"咒语、细菌和学者"的畅销书，以十足的中世纪风格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了有关人类厄运的话题。

失色。到十三世纪时，北欧海盗抛弃了海上劫掠生活，而定居下来开发低地农业，采伐木材和铁矿，开发富裕渔场，如斯堪尼亚著名的鲱鱼渔场。汉萨同盟的商业网络以吕贝克和维斯比为中心，使斯堪的纳维亚同西欧和俄罗斯都联结起来。

1397年杰出的玛格丽特（Margaret）女王（1353—1412年）——她通过继承权获得对丹麦的统治，通过婚姻赢得对挪威的统治权，又通过选举取得对瑞典的统治权——成功促成了这三国的有限联合。但这个卡尔马联盟（卡尔马是瑞典东海岸的城镇，是事件发生地——译者注）只是一种拼合，而非融合，注定要分裂成几个民族国家。正如玛格丽特女王的父亲沃尔德马四世（Waldemar Ⅳ）阿特戴（Atterdag）的名言，"明天是另一天"。

中世纪文明通常被称为是"神权的"——就是说它被无处不在的基督教上帝的观念所笼罩。上帝的意志足以解释一切。服务上帝被视为全部人类事业的惟一合法目标。神学思辨是智力活动和创造性努力的最高形式。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大量关于中世纪的知识都已被传播信息和撰写编年史的教士涂上了宗教理念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研究者或许被误导了，误以为"中世纪的文明并非仅从表面

上看是基督教文明，而在本质上讲更是如此”。[30]即使这是一种误解，[432]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位依然无可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讲，拉丁基督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不断出现的分裂对此影响甚微。如果说西方看起来主要是神权的，那么东方几乎也完全如此。事实上，东正教世界从十四世纪以来就免受了诸多新的影响，这使得很多宽泛的结论都难以站得住脚。

然而，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的“高雅文化”同普通民众的“低俗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别。新近的学者曾将“教会文化”与“民俗文化”作过对比。由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阶层是由教士或教士的学生组成，因此，可以说文化圈的正统文化完全从属于传统的宗教学说。同样，由于大部分人没有文化——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和不识字的贵族，因此他们中间存在着异教传统、异教观点或明显的非宗教观念就不足以为奇了。传统的中世纪学者大部分着眼于高层文化圈。正如新一代的中世纪史学家所提出的，大众文化也是“新中世纪”的主题之一。

其实关键问题是需要对中世纪加以构想。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着重构想中世纪的场景中包括什么，还要构想其缺少什么。在当时的物质环境中，它缺少许多后来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景致、声音和气息。没有工厂的烟囱，没有往来交通的喧嚣，没有人造污染和除臭剂。孤寂的村庄零星散落于广袤的荒郊野岭之中，万籁俱寂，教堂的钟声和牛的低吼混杂于粪堆和柴火散发出的自然而刺鼻的气味之中，可以传出数英里之外。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看法缺少较强的辨别能力，难以对后来所谓的自然和超自然、事实和虚构、现在和过去作出区分。男男女女们几乎无法改变他们凭感觉获取的信息，因此各种各样的感觉都同样为人们深信不疑。天使、魔鬼和精灵就像一个人的邻居一样真真切切。昔日的豪杰或圣经里的英雄就好像人们本国的国王和王后一样炙手可热。但丁笔下离奇怪异的故事最恰当地反映了这一点，故事中一个活人能够穿行于天堂和地狱，能和不同时代人的灵魂相见，而自身却不会损坏、变异或肢解。

中世纪的时空观念同我们今人大相径庭。时间是以昼夜交替、四季轮回、耕种收获等不规则的人事运作加以度量的。固定的小时和历法则仅为圣洁的教堂所独有。人们远足旅行十分缓慢，因此他们无法验证传统的地理知识。耶路撒冷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中心，这三大洲被分派给了诺亚的儿子：闪、含和雅弗。在大洲之外围绕着海洋，海洋之外是海平线，天地在那里自然融为一体。[**时间**]

中世纪对于人体的兴趣正如对人体的认知水平一样微不足道。人[433]体的内部器官还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对神经、骨骼、循

环、消化及生殖系统机理的认识了。相反，人体被认为是由四种元素、四种体液和四种情绪构成的奇异结合体。土、火、气、水对应着黑色和黄色的胆汁、血液和黏液，象征着人类的抑郁、躁怒、乐观和冷漠的性情。在十四世纪，有医生进行过解剖实验，解剖学著述也得到相应发展，尤以蒙迪尼·迪鲁兹（Mondini di Luzzi）所著的《解剖学》(1316 年)和维杰瓦诺的吉多（Guido da Vigevano）的同名著作(1345 年）为代表。外科学也因新著述——如盖伊·德·肖利亚科(Guy de Chauliac）著的《外科医生手册》的问世而受益匪浅。在经历了黑死病之后，设立了对于疫病国家的船只进行检疫的机构，1377 年首先出现于拉古萨（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市），1383 年马赛也建立了这类机构。

这首先表明中世纪的人生活在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心理环境之中，这便抑制了大胆而独立的思想。面对自然力量时的无助，连绵不绝的战争，波及广泛的盗匪活动，北欧海盗的劫掠行为，流浪者、异教徒、瘟疫、饥馑以及社会的混乱无序等，这一切都使人们深信，人是脆弱的，而上帝是伟大的。只有在修道院的庇护所，有创造力的头脑才可能发挥天赋，有所作为。

因此，中世纪的哲学本质上依然只是神学的一支，其中心任务是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适应宗教学说，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使理性和虔诚相协调。多明我会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 1225—1274 年）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宣称人的理性是神赐予的，虔诚就是理性。这似乎合理地解释了理性与虔信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的关系，从而完成了这一中心任务。三位方济各会的修士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三人都来自不列颠，分别是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 年），约翰·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5—1308 年）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约 1285—1349 年)。培根这位天才博士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在监狱中完成了《疑新》(suspect novelties）一书。邓斯·司各特——有些离奇的是英语中的 Dunce（意为“傻瓜”、“低能儿”——译者注）一词正是据他而得名——并不认同阿奎那的观点，他认为理性只能应用于可以被立即感知的领域。他是“无玷成胎论”的倡导人。奥卡姆是唯名论的领袖，被誉为“不可战胜的博士”，但他付出的代价是被开除了教籍。奥卡姆对于盛行一时的柏拉图式的一般概念——指不依赖于特定物体而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抽象本质——的否定，从根本上破坏了许多中世纪的固有传统（包括社会秩序）的基础。“奥卡姆的剃刀”——即主张事实应由最简洁的道理来解释的原则——证明是一种逻辑思维的有力工具。他将人类理性和宗教虔诚彻底分离，从而开启了科学和世俗研究

[434]

时间（TEMPUS）

乔万尼·达·东迪（GIOVANNI DA DONDI，1318—1389 年）是帕多瓦的天文学教授，但他绝非制造钟表的第一人。但丁在他的《天堂》中提到过一座钟表，现在还存有关于 1286 年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钟表和 1309 年米兰钟表的记录。但东迪的论文《追踪时辰》（Il Tractus Astarii，1364 年）则对钟表的内部构造作出了最早的详细描述。它介绍了一种七表盘天文钟，这种钟是由冠状轮和摆轮心轴构成的擒纵轮控制的。它启发了几种现代摹制品的灵感，其中一件陈列于肯辛顿（Kensington）科学博物馆，另有一件陈列于华盛顿的史密斯学会。[1]（参见原书附录Ⅲ，第 1250 页）

钟表装置的最初发明通常归功于八世纪的中国人梁令瓒，但直到十三世纪末才在欧洲得到实际应用。最初的钟表只是每间隔一小时敲钟报点。这种装置建于 1386 年，如今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依然使用这种装置。后来有了表盘，不仅可以显示一天的时辰，而且可以反映月相、行星的运行甚至圣日日历和宗教节日。最精彩的是在米兰（1335 年）、斯特拉斯堡（1354 年）、隆德（Lund，1380 年）、卢昂（1389 年）、韦尔斯（Wells，1392 年）和布拉格（1462 年）建造的钟表。机械表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各类时钟，诸如投影钟、日晷、沙漏和滴漏等。对于日光照射没有保证的北方国家来说，机械钟尤其具有吸引力。它们被建在所有的大教堂、城市广场、城门尤其是修道院中。

运行时间固定的二十四小时钟表实现了日常计时习惯的革命。大多数人曾依靠日出日落这种显而易见的节奏生活着。在时间系统已被认识和使用的地方，时间的长短因季节轮回和国家不同而改变。白天的“时间”既不同于夜间的“表”，也不同于教堂的“标准时间”，而是依据申正经、赞美经、晨经、辰时经、午时经、申初经、晚课和晚祷各自相对应的时间划分。世俗人士都持有这种源自于中世纪修士日常作息规律的时间观念，并以相应的时段加以规范。这些都为后来的城市生活模式和工业社会的人定纪律提供了序曲。钟表是一个“极权工头”，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牛顿物理学遵奉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天体钟”的观点，它也促使最伟大的现代思想家（包括爱因斯坦和普鲁斯特在内）力图说明有关时间的机械论观点实际上是多么不符合自然规律。[2]

［贡布雷］［$e = mc^2$］

钟表装置演进的里程碑包括：小型钟表、钟摆（1657 年）、航海钟（1761 年）和发条装置（1823 年）。小型钟表促进了十五世纪家用钟表和十六世纪个人挂表的出现；钟摆极大地增强了钟[435]表运行的可靠性；航海钟解决了在航海中如何测定经度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发条装置则导致了广为使用的袋表和腕表的出现。最近发明的钟表是一种精确到三千分之一秒的原子表，是 1955 年不列颠国家物理实验所制造的。

几个世纪以来，钟表制造从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艺发展成为一种大众生产工业。其早期制造中心建于纽伦堡、奥格斯堡、巴黎和布洛瓦。瑞士因胡格诺派工匠的流入而大获其益。在十九世纪，以日内瓦和汝拉的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为基地的瑞士工业在高质量机械表制造领域位居世界鳌头。

制表人的工艺是从早期锁匠行会和钟表匠行会中发展起来的。著名人物包括第一块腕表（出现于 1551 年）制造者布洛瓦的雅克·德·拉·加尔德（Jacques de la Garde），钟摆和螺旋摆轮游丝的发明者、海牙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1629—1695 年），精通航海测时法的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托马斯·厄恩肖（Thomas Earnshaw）和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 年），来到凡尔赛的制表人朱利安·勒鲁瓦（Julien Leroy，1686—1759 年），自旋永动钟的发明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鲁盖（Abraham—Louis Bréguet，1747—1823 年），大本钟的设计者爱德华·约翰·登特（Edward John Dent，1790—1853 年）。华沙的安东尼·帕特克（Antoni Patek）和伯尔尼的艾德里安·菲利浦（Adrienne Philippe）1832 年因创建了当时瑞士一流的帕特克—菲利浦公司，也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人士。

到那时，时钟和手表已成为文明的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东欧的农民适应得偏慢一些。对于数百万的苏维埃士兵来说，1944—1945 年红军进军欧洲则为他们提供了“抢夺”和占有一块手表的良机。

的大门。他的名言是“若无必要就不应该增加实体的数目”。当他被带到德意志皇帝——巴伐利亚的刘易斯（Lewis）面前时，据传他曾说：“如果陛下您用剑保卫我，那么我将以笔保卫你。”

中世纪的科学也不可避免地同神学紧密相关。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的将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区分开来的意识，因此考察“自然的秘密”常常被视为如同到“母教发源地”祈祷一样是对神的不敬。譬

如，中世纪德语中“气”（gas）和“精神”（spirit）就没有区别。这两者都是 Geist（灵魂），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ghost”（灵魂）。科学实验常常要冒着被视为巫术进行审判的危险。炼丹术的发展长期超过物理学和化学，占星术的发展长期超过天文学。有人曾将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 1170—1253 年）任校长时的牛津大学视为科学传统的发源地。

然而大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均来自于分散的个人努力。罗哲尔·培根进行的光学和机械实验，成为他抨击教廷腐败和迷信之风的部分内容。培根试图对一切知识都加以验证，他坚持主张采用希腊语，这虽然不合时宜，但同样是为校验拉丁文典籍的准确性而作的一种努力。培根的老师陌生人彼得（Pierre de Maricourt）发表了一篇关[436]于磁力学的奠基性论文，这显然是在 1269 年卢切拉·迪·卡拉布里亚（Lucera di Calabria）对安茹省进行围攻期间为消磨时光而完成的。西利西亚人维泰洛（Witello 或作 Vitellon，1230—1280 年）完成了一篇有关光学的论文《透视的原理》（the Perspectiva），该文将眼睛的机械运动同眼与脑协作的功能分隔开来，从而开创了现代心理学。利济厄主教尼古拉·奥雷姆（Nicolas Oresme，约 1320—1382 年）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财经学专著，还有一部天文学著作《论天与地》（*De Coelo et Mundo*）。作者在后一著作中提出了地球自转理论。尼古拉是一位对理性的热情倡导者，是一位走在时代之前的启蒙者，他曾痛斥占星术和奇异学说的散布者。他认为“福音书中所包含的一切”都“是理性主义的”。一个世纪后，来自摩泽尔库伊斯的枢机主教尼古拉斯·库塞努斯（Nicholas Cusanus，1401—1464 年）重复了地球自转这一观点，他预言了历法改革，并预言 1734 年世界将走向末日。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自然奇迹与教会奇迹。

知识的逐渐积累，产生了编纂百科全书概要的需要。传播最为广泛的是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编纂的《大知识宝鉴》（Speculum Maius，1264 年）和罗哲尔·培根的《大著作》（Opus Maius，1268 年）。

然而宗教信仰依然为各种形式的非理性和迷信的东西包围着。中世纪晚期，宗教信条仍然处于形成和系统化的阶段。要求人们不加疑虑地接受信仰的地区不断扩大。1215 年的拉特兰会议制定了强制性的忏悔和苦修制度。1439 年制定了从洗礼到终傅礼七件圣事的教义。化体教义（认为圣餐中的酒和面饼神奇地转化为基督的血和身体）也规定只允许神父喝下圣杯中的酒，俗界教徒则只能领受面饼。这一条款强调了普通教徒同神异的教士阶层之间的差别。弥撒礼可在任何场合下进行。对童贞玛利亚这一基督的神圣中保人的崇拜被正式接受，

诵读“万福玛利亚”被正式纳入了弥撒仪式之中，在念诵主祷文之后进行。各种组织——从行会到骑士团——都有其庇护圣徒。对圣徒遗物的尊崇之风无处不在。朝圣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仅对教会人士如此。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因官方对复杂的天使优劣等级之制的说教和人们对魔鬼所普遍怀有的恐惧心理而得以增强。撒旦这位堕落的天使长曾经在天国中坐在加百列旁边，如今都堕入了黑暗力量所控驭的世界。对地狱的极度恐惧使教士和艺术家都获得了一种津津乐道的主题。

神秘主义传统使宗教直觉更优先于理性信仰，十二世纪巴黎圣维克多的奥古斯丁修道院首次出现了神秘主义传统的明确表现形式。后来它主要在普通民众中深深地扎了根。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圣·波拿文[437]图拉（St Bonaventura，约 1217—1274 年），他曾是方济各会的主事神父，也是颇有影响的《论通向神之路》(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一书的作者。其次是斯特拉斯堡的“名人”约翰·埃克哈特（Johann Eckhart，1260—1327 年），他是波希米亚的代理主教，因声称世界是他的小指创造的而名噪一时。再次是《论爱的七个阶梯》（*De Septem Gradibus Amoris*）的作者、“迷幻之师”——佛兰德斯人简·范鲁伊斯布罗克（Jan van Ruysbroeck，1294—1381 年)。此外还有英国人沃尔特·希尔顿（Walter Hilton，卒于 1396 年)，他以方言著成《通向完美的阶梯》(the Ladder of Perfection）一书。最突出的是托马斯·汉莫肯(Thomas Hamerken)，他来自毗邻科隆的肯培，被称为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约 1380—1471 年)，是《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一书的作者。《无知的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一书未署名的作者也是风俗画派的代表人物。许多神秘主义的倡导者都是思辨哲学家，但他们提倡基督徒加强内心精神修养，规避自己无法控制的邪恶世界。他们的作品煽起火种，最终燃起宗教改革的烈焰。

巫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并行发展起来。正如对精细鬼（pixies)、侏儒精（elves）和鬼怪（sprites）的坚定信仰一样，黑白巫无疑也是基督前时代乡村清教泛灵论的一种遗留物。然而将巫术系统地付诸实践却似乎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此外，通过与巫术的公开竞争，教会不经意间造就了所谓巫术和巫师日渐兴盛的有利土壤。1484 年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发布决定性训令《最高的愿望》(*Summis Desiderantes*)，由此教会发起正式反击。1486 年多名我会修士刊印了为政治迫害者编著的权威手册《罪人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如果说以前教会对于巫术的所作所为还有所容忍的话，那么现在则荡然无存了。随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知道众多恶魔都由恶妇引领着，这些恶妇身上涂满从未接受过洗礼的孩童身上抽取的油

脂，赤身裸体，僵直骑在飞行的扫帚柄上或公山羊背上，参加夜间"聚会"，施行咒语，和魔鬼交欢。妇女被归入柔弱、下等、无法抵御诱惑的人之列。一旦教会公开证实此类事情，巫术的力量就会极大增强。毁坏邻居庄稼或使仇人妻子流产的人常常可以获得大量钱财。真相和错觉、谎言和幻觉之间的界线就彻底模糊不清了。

英诺森八世宣告："最近我们耳闻……许多人——无论男女——都已自甘堕落、腐化和滋生罪恶，他们借助咒语、咒符、咒文和其他妖术使婴儿胎死腹中……他们摧毁农田的作物、藤蔓的葡萄、树上的果实……这些卑鄙的人甚至侮慢地悖弃通过受洗而形成的对上帝的虔诚，在人类敌人的煽动下，他们不加收敛地犯下最污秽的罪行，后果之危险足以使其灵魂遭到毁灭。"[31]

从那以后的3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巫术和政治迫害一直都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流行。[女巫]

教会阐释的中世纪道德观同时受到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中等级观[438]念的支配。一切原本低等的人和物应从属于他们的上级，奴仆应遵从他们的主人，妇女应由男子统治。小的过失应当同七种当诛之罪加以甄别。在还存留着古老的"悬赏"做法的国家，贵族身份的杀人犯或强奸犯都会受到较出身卑微之人更为严酷的审判，因此代价更高。赎罪价目表就突出了小过失不应受与重大罪过同等惩罚的理念。圣奥古斯丁在性问题上曾做出过限制性教导，但性过失并不受到严厉审判。但丁所称的"错位的爱"不能与为仇恨或背叛之心所驱使的犯罪同日而语。奸夫将被钉在地狱的最高层，叛徒则将堕入地狱深渊。背叛上帝是最严重的罪恶。亵渎神明和信奉异端会带来最大的耻辱。1414—1417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将约翰·胡斯烧死在火刑柱上，这次会议引起了约700多名妓女的关注。[娼妓]

中世纪的法律也受等级观念的支配。至少从理论上说，人制定的法律从属于教会制定的上帝之律，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则往往相反。教会法庭施行教会法，城市法庭或庄园法庭施行地方习惯法，国王法庭遵行国王敕令，这种多种司法体系并存的复杂状况是同法律渊源、法律实践和法律惩处方式繁多的状况相适应的。罗马法的主要源头仍存留在南欧，德意志和斯拉夫的部落习惯法的源头依然保留于北欧和东欧。

不过，我们不应把习惯法仅仅视为原始司法实践的残存。它是封君同封臣之间长期妥协的产物，通常书写成精致的法律条文。譬如，《判例汇编》(The Weistümer) 就曾传播到整个奥地利和部分德意志地区，在奥地利被称为 *Banntaidingen*，在瑞士称为 *Öffnungen*。逾600种在阿尔萨斯幸存下来，在那里它们被称为 *Dingofrodeln*。它们的存在

极大加强了“庄园制度”（*Gutherrschaft*）的观念，以反对易北河以东盛行的大地产制度（*Grundherrschaft*），同时又在乡村保持了农村公社自由民的地位。它们为解释西部德意志缘何避开了后来在东欧德意志出现的“农奴制再版”潮流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因。（见原书第583—584页）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等东欧一些地区，日耳曼定居者的涌入造成了德意志习惯法与当地习惯法的融合。

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古典著作的复兴促使罗马法取代习惯法，影响范围大为扩展。例如1495年，习惯法被允许在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中施行。习惯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帝国内部各统治集团分裂之势不断增长，所有的诸侯都将自己视为法律体系的惟一源泉，并按照一定方式以法律规范生活的各个方面。德意志帝国中“以法律规范的国家”都将如巴登（Baden）一样可以树立起那著名的路牌：“此路允许通行”。[32]

[439] 唯独英格兰对普通法情有独钟。正如莱茵河以西的其他国家一样，在英格兰，哪里法律陷于沉寂，哪里的民众就更自由。在法兰西，尽管国王敕令的作用不断增长，但法兰西依然被分为北方的习惯法区和南方的罗马法区。

许多国家在早期都进行过广泛的法典整理和编纂工作。在卡斯提尔，《法律七书》（*the Leges de las Siete Partidas*，1264—1266年）构成后来西班牙法律的内核。波兰的卡西米尔大公的法规（1364年）和《法学阶梯》（*the Dygesta*，1488年），以及立陶宛的卡西米尔·雅盖隆的《法庭审判》（*the Sudiebnikr*），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缺少警察队伍的情况下，执法机构往往是孱弱的，逃犯比比皆是。因此对被捕者的惩罚往往极度残忍，以期杀一儆百。绞刑通常伴随着墨刺和车裂，炮烙、断肢之刑也是作为一种社会威慑的刑罚加以设置的。伴随成文之法而发展起来的监禁和罚款，致使贫穷囚犯的生活陷于严酷的境遇之中，因为他们很少得到或根本得不到维持生存所需的供给。

中世纪的教育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已经奠定了基础。最初级的字母和数字的学习主要在家庭或村庄的神父指导下完成。中级学习则由主教座堂——后来越来越多地由市政机构资助完成。讲授的内容依然是为培养教会人员而设，但门生却很少是为成为教士而学习。语法、修辞和逻辑这三门学科是基本教学内容。像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1382年）、德文特（Deventer）的拉丁学校这样建制精良的教育基地，即使不是饮誉海外，也是在全英国享有盛名。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几个大城市还开办了商业学校。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有六所学校，超过一千两百名学生。十五世纪，创办大学之风席卷拉丁基督教

世界的所有国家，莱比锡（1409年）、圣安德鲁（1413年）和卢万（1425年）等地也都纷纷建立大学。

中世纪的文学依然具有宗教虔诚的特点，不过由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和“业余作品”（byliny）发起的世俗传统依然在发展。大部分书籍都是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作的。许多著作仍限于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环境之中。十五世纪时对甘德谢姆的赫罗茨维察（Hrotswitha of Gandershaim）——这是一位德意志修女，在五个世纪前曾写过一系列拉丁语喜剧——的作品的发现就表明中世纪文学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也许从未进入过大众传播范围。然而人们逐渐发现，广义上的大众文学——如圣徒的民歌和传记——是用方言写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妇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缘故。公共剧院开始上演由教会编演的奇迹剧。新事物尚处孕育时期，其发展只限于狭小的范围内。

中世纪修史工作依然属于编年史家的领域。他们通常是修士，只寻求记录过去，并不寻求作出解释。上帝的意志被视为解释问题的充分理由。中世纪的编年史书包括几百个主要条目。其中，如英格兰早[440]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基辅的涅斯托尔（Nestor）十一世纪著的《早期编年史》(Primary Chronicle)，都是以方言写成。法兰西编年史家对历史事件所持有的成见，都极力迎合于教会或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君主的观点。维拉尔德万（Villehardouin）总结说：“上帝意欲帮助的人，没有人能够伤害他。”史籍中的政治思想都集中体现在有关规定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问题上。加洛林王朝的思想接近于拜占庭帝国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强调契约观念。封土仪式之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为维护教皇至高权和但丁《论世界帝国》中为维护国家至高权而争辩的卫道士。君主政体中的罗马观和罗马法研究结合了起来，在法兰西尤其如此。但没有什么论述比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Marsilio，1270—1342年）的反教皇论著《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更富革命性。马尔西利奥曾是巴黎大学校长，他勇敢地提出了控制世俗国家的最高权威应由一位君主行使的观点。

国际关系由圣奥古斯丁关于公义战争的理念所主导。在理论上，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战争才是符合公义的。按照雷蒙·迪·佩尼亚福特（Ramón di Peñafort）的观点，这些条件是：出于弥补损失的愿望，已用尽其他方法，动用职业士兵，挑起战争者有良好的信仰，赞成君主制。实际上，战争都有区域性色彩。随军的教士总是申明每一个从军者作战理由的正当性——无论这种理由是出于私利还是出于公义。主导局面的正规战斗不时被短暂和平所打断。战争都伴随着军队的肆无忌惮。中世纪的军事后勤和技术力量都难以使争端得到迅速解决。军队很小，而战斗区域十分广阔。一支战败的军队可以轻易撤退，重整

旗鼓。军事行动是在各地城堡或设防据点中进行指挥的。军事包围比实际战斗更为普遍。战争掠夺比纯粹的战争胜利更令人向往。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城市首先建立雇佣军，以作为对操控不灵的封臣军役的补充。长弓和弩自十二世纪出现以来得到极大改进，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火药在十四世纪首先使用，后来发展成为火炮，在胡斯派教徒和突厥人手中变成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但武装骑兵依然是所有主力作战队伍的支柱。

中世纪的建筑主要受两类石材建筑——教堂和城堡的建筑风格所支配。中世纪晚期的教堂风格在十九世纪时被称为“哥特式”，通常认为这类建筑在启迪人类灵感方面具有本质的美感——高耸入云，恰似直通天国一般。因此，通常与城堡的塔楼、碉楼和堞眼的军事实用风格形成对比。事实上，所有主要的哥特式特色——从尖拱到飞垛——其实际功能并不比它的美感逊色，这种设计目的正是为便于快[441]捷攀登，窗户也显得更加宽敞。从圣丹尼斯的阿博特·絮热（Abbot Suger）的发明开始，哥特风格便传遍了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哥特式大教堂从塞维利亚到多尔帕特（Dorpat）以及在这中间的各地方都建立起来。相比而言，东正教世界则依然忠诚于罗马—拜占庭传统。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水岭以东，既没有哥特式教堂，也没有私家城堡。新发现的城市精华使钟楼、市政厅和布厅显得更为华美壮丽，最好的例证就是建于布鲁塞尔（1402 年）、阿拉斯、根特、伊普雷（1302 年）和克拉科夫（1392 年）的建筑。[**哥特式建筑**]

中世纪的艺术大多是在教堂或主教座堂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绘画者都热衷于绘制圣像、祭坛画或教堂壁画中的宗教场景。书籍装裱工艺开始用于装饰圣经和祷告诗篇。主教座堂正面的法典和宗教场景，墓葬和追思礼拜堂的雕像，都显示着石雕艺术的辉煌。木雕装饰着唱诗班席位和唱诗班的围栏。哥特式教堂宽大的窗户上安装着彩色玻璃。“所有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实用艺术。”[33]

不过，中世纪艺术中从未泯灭的世俗因素日益增长。君主乃至富裕的市民都委托他人给他们绘制肖像或塑造雕像。彩饰艺术被应用于《武功歌》各卷本以及关于时间、植物和动物寓言等书籍的装帧。中世纪晚期的服饰进入一个追求极端奢华艳丽的时期，为达到这种效果，人们不惜采用昂贵的面料、奇异的风格和艳丽的色彩进行设计。绿色代表爱，蓝色代表忠诚，黄色代表敌意，白色代表纯洁。荣誉勋章也从最初具有的军事意义转至用作社交装饰的领域。

中世纪的音乐也结出宗教性与世俗性相互交融的硕果。主流音乐依然是从教堂中传出的音乐，但俗界恩主的影响也日益增长，在勃艮第和佛兰德斯市尤其如此。十四世纪的“新艺术”（ars nova）风格如

同哥特式建筑一样享有国际盛誉。约翰·邓斯泰布尔（John Dunstable，约1390—1453年）是效力于法兰西贝德福德公爵的宫廷乐师，他像吉尧姆·迪费（Guillaume Dufay，约1400—1474年）一样极富创造性和影响力。复调音乐和乐器都得到了发展。1400年已有关于扬琴的记载，1404年击弦钢琴、1450年手风琴、1495年萨克布号或长号等都分别有所记载。

“中世纪的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概念。个体的人严格地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主要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动向。但是我们必须尝试着克服许多世纪力作都存在的对作品中人物不加署名的问题。个人主义还不盛行。诸如简·范爱克（Jan Van Eyck）这样的艺术家也许有时会为其作品署名——JVE FECIT，但作品中不重要的人物通常不加署名。因此现代作品极为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力求重塑普通人的琐细生活。[**商人**]

[442]

商人（MERCANTE）

在1348年或1349年，年轻的梅瑟·弗朗西斯科·达蒂尼（Messer Francesco Datini）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镇（Prato）继承了一小块土地。卖掉这块土地后，他用这笔收入在阿维农教皇城从事商业。他从意大利进口丝绸、香料、武器和盔甲，生意兴隆。他又适时地将商业转向佛罗伦萨，在比萨、热那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略卡岛（Majorca）和伊维萨岛（Ibiza）设立商业分支。他在羊毛贸易中实力尤为雄厚，从英格兰、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的生产商那里直接购买羊毛。当他在佛罗伦萨经商的时候，曾在普拉托指导建筑了一座豪华宅第，并指导亚平宁山麓下乡村庄园的经营管理。这座宅第至今犹存，环绕一处带有拱廊的庭院而建，正面为大理石门板。宅第由他的妻子蒙娜·玛格丽塔（Monna Margharita）管理，他的私生女吉娜拉（Ginevra）和包括家奴在内的一大批家丁协助管理。因信使往来不绝，骡马也随行其间，这座宅第显得生机盎然。1410年8月16日，当梅瑟·弗朗西斯科因患胆结石无嗣而终时，他将庄园、票据和70000金佛罗林都遗赠给了普拉托镇的穷人。门上镌刻着这样的词句：

弗朗西斯科济贫院，马可之子，
基督的济贫商，

普拉托镇
是其托管者。
1410年遗赠。

弗朗西斯科的遗嘱中还安排了释放奴隶、免除所有债务、向高利贷利息偿还者支付一定金额等事宜。[1]

达蒂尼的档案中包括逾150000封书信、500本账簿、400份保险契约和300份合伙契约。这些显示了梅瑟·弗朗西斯科如何凭借明察秋毫的非凡精力维系着跨国业务的经营。它们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幅有关中世纪公司和中世纪家室的无与伦比的画卷。[2]一份典型的兑换清单上写道：

以上帝的名义，1399年2月12日。在汇票兑现期限内，[3]通过这首次兑换，巴托洛梅·加松尼（Bartolomei Garzoni）向乔万尼·阿萨帕多（Giovanni Asapardo）支付306镑13先令4便士，在巴塞罗那相当于400佛罗林，以每佛罗林兑15先令4便士计算。款项已支付并记入我们的账目，彼此已予回复。上帝将维持你们的约定。弗朗西斯科和安德里在巴塞罗那致敬。3月13日承兑。登记于红书（Red Book）B，f 97。[4]

这种交易使资金和贷款毫不费力地在欧洲流通。但它们却无法消除梅瑟·弗朗西斯科难以释怀的忧虑：

[443] 昨晚，我梦到一座房子土崩瓦解……这使我思虑万千。因为还没有得到两个多月前从威尼斯驶往加泰罗尼亚的商船的消息。我已为她投保了300佛罗林……但我还是这样烦躁……我追求越多，得到的越少。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5]

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富有而实力雄厚的"远程贸易商"不得不从小型贸易和小规模地方市场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凭借出众的智力资源和对大量现金的掌握得以避开市场竞争的法则。通过致力于单一的大宗贸易，这"一小撮巨贾"持续获得巨额利润：

从一开始，［这些人］就超越了国界……［他们］谙知上千种手段依自己的意愿操控胜局——包括控制着信贷业务和以大钱胜小钱的有利可图的游戏……他们攫取了一切值得攫取的东西——

土地、房产、地租。[6]

一般说来，资本家尚未成为阶级，他们也并未投资于制造业。他们将资金短期投入最富商机的地方。银钱业是可以集中获利的一个领域。“但成功从来不会持续很久，似乎已到这一高度的经济大厦还不能汲取到足够的养分。”因此，从十四世纪起，一批极为富有的资本家——巴迪、美第奇、富格尔、内克和罗思柴尔德等家族获取了欧洲经济中最为可观的利润。

显然，资本家的成功和灾难有赖于欧洲经济的普遍状况。十五世纪“经济生活的‘有利地位’恢复了”，在城市中尤其如此。十六世纪当大西洋贸易得到扩展时，“驱动力在安特卫普、法兰克福、里昂和皮亚琴等国际市集层面上发生了作用”。十七世纪往往被描述为一个停滞期，但依然出现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在十八世纪的“经济普遍快速增长期”，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不受约束的私人市场超越了管理规范的公众市场。最后，金融资本主义继1830—1860年时期之后出现了，当时银行攫取了工业和商业。此时，经济总势能够长久支撑起这座大厦。

大约在1870年前后，梅瑟·弗朗西斯科的账簿在普拉托镇住宅台阶下面的一大堆麻袋中被发现了。每一本账簿中都写有他的名言：“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坚持不懈地传教过程中，没有人比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的医生、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具有传奇色彩的旅行家和殉教者——雷蒙·卢尔（Ramon Llull，约1235—1315年）更具中世纪的色彩，也更易迎合时代潮流。他出生在被阿拉贡人征服不久的帕尔马的马乔卡。他对阿拉伯语的了解不亚于拉丁语，他是在摩尔人[444]（Moorish）和犹太人哲学著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兰德山的米拉马尔（Miramar on MtRanda）方济各会修道院劳作多年之后，他开始不归的远游，力劝教皇和君主采用东方语言教学。他曾在不同的时间里到蒙彼利埃、巴黎、帕多瓦、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墨西拿讲学，行程远至格鲁吉亚和阿比西尼亚。在1311年维也纳会议上，他目睹自己寄予厚望的提议得到了原则上的认可。他多次到穆斯林北非传教远游，尽管在那里费尽心力，但最终悲惨地被石块砸死。他的《异教徒和三圣人之书》（*Libro del Gentil*，1272年）最初是以阿拉伯文刊印的，描写了这三种宗教之间没有结果的一次争论。他的《主要艺术》（*Ars Major*）和《总艺术》（*Ars generalis*）都包含大量的推理哲学，这些著作给思想家们留下了这样一种深刻印象，即它们同乔达诺·布鲁诺和

莱布尼茨的学说一样标新立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容易被人们忽视。卢尔对宇宙知识有独到见解：

> 它呈现出只能被描述为是一种计算机器的模式，通过一种由以半径分割出的同心圆和几何符号组成的机械装置，将所有知识的基本原理或“基本概念”都结合起来。它似乎是那种可以称之为自动控制机的东西，随时准备解决每一个问题、每一种科学，甚至宗教虔诚本身……[34]

他的《白色》（*Blanquerna*，1283年）有时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小说，或第一部乌托邦宣言书。他在 *El Desconort* 或《拉蒙之歌》（*Lo Cant de Ramon*）中的诗简洁优美，富有真情。卢尔被称为“一位伟大的欧洲人”。

十五世纪通常被视为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世纪。在某些领域中，加速进行的变革造成中世纪传统的一次决定性中断。在学术、艺术领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贯穿民族国家兴起全过程的政治学领域都是如此。（见第7章）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旧秩序都已发生动摇。当然巨大的变革依然有待进行。尽管中世纪晚期一些城市——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提前得到发展，但乡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受影响。新旧秩序并行存在。[印刷业]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东正教世界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扩大。

[445]

印刷业（PRESS）

大约在1450年，约翰·根西弗莱斯·苏姆·古腾堡（Johann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制造的印刷机在美因兹的莱茵兰城（Rhineland city）开始使用，但这并非印刷术的创新，而只是对中国古代木版、金属刻版和平版印刷方式的延承。尽管如此，它依然在信息技术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正如其他许多发明一样，它通过对几种现存工艺包括罗马榨酒机、金匠的打孔机和可塑纸等工艺加以综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工序。而且，它在复制模具中使用了金属活版模块，这是对“通用件理论”的首次应用——这一理论成为后来机械时代的一项基本原理。这种印刷机具有难能可贵的灵活性，它使一部文本在复制千万册之前可以排版、编辑和校改。

古腾堡（Gutenberg）也许主要因为他印制的43行和36行圣经而

为人铭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印刷的“宇宙知识全书”代表了一个更具特色的里程碑。这部百科全书是由热那亚人乔万尼·巴尔博（Giovanni Balbo）在十三世纪编纂而成的。古腾堡印刷的版本开创了世俗文学在大众中流行的先河。它含有一篇刊印者的简短序言：

在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帮助下，依其意愿，不成熟的语言改成了更有说服力的语言。这部杰作的印刷完成没有借助芦苇、刻笔和鹅毛蘸笔，而是通过压印器和与模块之间神奇的配合、平衡和协调，于耶稣纪年的1460年在名望卓著的德意志民族的著名城市美因兹完成。

在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时期，印刷术还处于襁褓之中，罗马、意大利和哥特式的模板风格出现了。印刷业迅速传到了巴塞尔（1466年）、罗马（1467年）、波希米亚的皮尔兹诺（Pilzno，1468年）、巴黎（1470年）、布达（1473年）、克拉科夫（1474年）、威斯敏斯特（1476年）和门的内哥罗的采蒂涅（Cetinje，1493年）。1555年，印刷术传到了莫斯科。

印刷文字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们对宗教权威的敬畏感。印刷业的摇篮——亨斯美因兹也成为印刷品审查制度的发源地。1485年，美因兹大主教（选帝侯）要求毗邻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市政当局检查在兰顿市集上展出的书籍，并协助查禁危险的印刷商。这样，欧洲最早的审查机构便于翌年由美因兹选帝侯和法兰克福市联手建立起来了。法兰克福审查者针对印刷书籍而发布的第一部法令取缔了圣经的方言译本。[2] **[禁书目录]**

与基督教世界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印刷业实行的全面封禁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结果，伊斯兰教和一般知识的传播难以推广。

十五世纪，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对峙中出现了一种重大转变。1400年，欧洲半岛仍然处于700年来一直居于此地的穆斯林的钳制之中。这一巨钳的一支延伸至格拉纳达，一直不太稳定；另一支则直扼君士坦丁堡，一向较为稳固。然而到1500年时，这种钳制之势失去了平衡，对峙局面的主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伊斯兰教在西方最终遭到失败，但在东方却赢得了胜利。当摩尔人最后陷于举步维艰的境遇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却取得了胜利。在西欧打破穆斯林封锁而获得自由的同时，东欧却面临着穆斯林更为强势的挑战。1400

[446]年，穆斯林世界的主要势力在传统的南部沿线都有存在，可是到1500年时，尽管先知的绿色旗帜依然沿着非洲海岸线飘扬，但他们的主要势力已集中于东方。拉丁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徒可以感到欣喜；而东方东正教的基督徒却欣喜不起来。[**婚姻**]

这种战略上的转换以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标志，其一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土耳其人手中，另一个是1492年格拉纳达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这两个事件影响重大。这种转变在宗教领域引发了将基督教世界两个分裂的部分统一起来的最后一次尝试；在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寻求新商路的努力。这两种努力均无功而终。在地缘政治领域，这一转换使新兴的西班牙王国坚定了天主教必胜的信念，而新兴的莫斯科公国则由此沉浸于对东正教败绩的愤懑之中。西班牙率领解放了的西方准备发动对新世界的征服，而莫斯科领导的严阵以待的东正教东方则正在其精神围栏后构筑工事。每一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准备寻求构筑一个基督教世界的未来的圆。

面对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见原书第386页），基督教的领袖们被迫重新考虑修复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局面。其结果便是1439年产生了命运多舛的佛罗伦萨联盟（Union of Florence），它在基督教世界分裂的耻辱史中是最值得同情的插曲之一。

希腊曾向罗马天主教请愿达数十年之久，一位威尼斯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1431—1447年在位）最终认识到了事态的紧迫。事实上，

[447]

婚姻（MATRIMONIO）

十五世纪拉古萨贵族西吉斯蒙德·德·佐尔齐（Sigismund de Zorzi）和他的妻子有十二个孩子——六子六女。按照出生顺序（约1427—1449年），分别是约翰尼斯、弗朗西斯科斯、维基娅、朱尼厄斯、玛格丽塔、玛丽亚、马里纳斯、安东尼厄斯、赫利撒贝、阿洛伊修斯、阿图利纳和克拉拉。

其中三子一女没有成婚。尽管如此，为其他八个孩子寻觅合适的婚姻一定也使他们的父母至少忙碌了二十年。玛格丽塔（老五）是于1453年第一个订婚的人，紧接着是玛丽亚（老六，1455年）和长女维基娅（1455年）。长子直到1459年才成婚，当时他至少已32岁了。次年他的妹妹赫利撒贝（老九）成婚，她比约翰尼斯小16岁。弗朗西斯科斯（老二）则等到1465年36岁时才成婚。

1471 年 24 岁的阿图利纳（第 11 个孩子）和年约 38 岁的朱尼厄斯（老四）都订了婚。

这个家庭的婚姻模式并不特殊，不仅符合拉古萨其他贵族家庭的婚姻模式，也符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相关研究结果。它符合历史人口学家所说的“地中海婚姻模式”（MMP），其特点是已届婚龄的子女独身率很高，且结婚年龄有明显差异。[1]

拉古萨（Ragusa）是一个城市共和国，依靠亚得里亚海上贸易和巴尔干陆上贸易生存。[英文“argosy”（大商船）一词正是得自“拉古萨”] 人口大约 20000 人，由一批近亲通婚的显贵家族统治，控制着所有市政机构。在中世纪的拉古萨，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新娘的父亲和未来的女婿之间拟定详细的婚约。从订婚到举行婚礼和最后完婚，在这一约定时期内，对于没有践约者的标准惩罚是 1000 达卡金币。订婚通常比结婚提前两到三年进行，订婚平均年龄为女方 18 岁，男方 33.2 岁。正如德·佐尔齐的例子所反映的，男子通常等到他们的姐妹订婚后才成婚。

拉古萨“婚姻文化”的潜在因素是经济学、生物学、数学和民俗学的内容。男子要等到足以能支撑起一个家庭并有望分得父亲的一份遗产以补充妻子的嫁妆时，方才结婚。许多人久久等待，结果终身未婚。妇女走入婚姻生活要早得多，但并非是为了尽量增加她们的育儿率。她们不得不一厢情愿地为赢得同新郎的联合事业而展开竞争。家庭中更喜欢成熟、并为他们女儿的“荣耀”较早承担义务的女婿，他们通常会成为其家庭商业的合伙人。

历史上，联姻战略的后果十分复杂。事实证明，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宏观推理不如实验式的个案研究令人满意。有理论将整个欧洲简单分成两个区域，一个为晚婚的“欧洲 [**原文如此**] 婚姻模式”，一个为早婚的“东欧婚姻模式”，但这一理论远不如对中世纪佛罗伦萨或文艺复兴时期拉古萨的婚姻进行微观分析更令人信服。[**大家庭**] [448]

拉古萨的独立维持到 1805 年被法国占领为止。在经历了哈布斯堡家族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它于 1918 年被并入南斯拉夫，称为杜布罗夫尼克，1992 年又被并入克罗地亚共和国。德·佐尔齐生活过的这个中世纪城市曾两次遭遇灾难——一次为 1667 年地震，一次为 1991—1992 年间遭到塞尔维亚海军炮轰。在斯塔里格拉德（Stari Grad，克罗地亚地名）众多的文艺复兴建筑中，遭到直接袭击的便是斯旁泽宫（Sponza Palace），那是城市档案和婚姻登记簿的保管地。

由于主张改革的巴塞尔宗教会议（Council of Basle）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压力，他已看出修复同东正教的关系可以加强其个人地位。1438年1月开始于费拉拉（Ferrara）、继续于佛罗伦萨的谈判，是在教皇、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佩里奥洛格斯（Palaeologos，1425—1448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以及巴塞尔宗教会议上离开同僚而加入的二十二名主教的共同指导下进行的。渴望已久的希腊人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作出让步，准备接受罗马教义的教皇至上、炼狱、圣餐及"和子"句（Filioque，指中世纪罗马教会在《尼西亚信经》圣灵"发自圣父"一句中增加的"和子"短语。一般认为它是东西方教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观念。以教皇的名义恢复教会统一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在1439年7月6日的《愉悦天主》（*Laetantur coeli*）教令中，教会的合并得以正式签印核准。枢机主教朱利安（Julian）和大主教尼西亚的贝塞里恩（Bessarion of Nicaea）分别以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圣克罗齐（Santa Croce）讲坛上诵读了合并文本，这两位教职人士还象征性地互相拥抱。

但不幸的是，联合的双方没有一方真正有办法将合并付诸实行。教皇受到了残余的巴塞尔宗教会议的严厉谴责，会议转而迅速选举了最后一位反教皇人士菲利克斯五世（Felix Ⅴ，1439—1449年在位）为教皇。德意志主教退避三舍。法国主教们则因《布日尔反教皇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的新近制定而感到得意，他们倾向于支持巴塞尔宗教会议。结束同君士坦丁堡分裂的努力却引发了罗马教会内部新的分裂。东正教会不再热衷于此了。在君士坦丁堡，签署合并文件的人受到了批判。"我们不需要拉丁人，"暴民们叫嚷，"曾将我们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那里解救出来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如今还会把我们从穆罕默德手中解救出来。"在亚历山大里亚，由东方大主教召集的一次宗教会议对教会合并进行了公开谴责。在莫斯[448]科，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戴着拉丁十字架从佛罗伦萨刚一返回，即立刻被囚禁起来。他属下的主教们起事反对"希腊人的叛逆"，进而未经征询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同意就选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这就是独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肇端。

奥斯曼人加紧扩张。在黑海海岸的瓦尔纳，1444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消灭了最后一批由教皇资助反对他的十字军士兵。1448年他越过多瑙河挫败了最后一支匈牙利远征军。只有阿尔巴尼亚在斯坎德培（Skanderbeg）的率领下，抵挡住了苏丹势如破竹之势。衰弱、无助但依然目空一切的君士坦丁堡等待着命运的劫数。[**弗拉德**]

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攻从1453年4月2日东正教星期一开始，历时八周。21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1451—1481年在位）相貌英俊，性情诡异，进攻心切。他在孩提时期曾经受过挫折，

当时他的一项关于发动一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战斗计划遭到拒绝。单

[449]

弗拉德（VLAD）

瓦拉几亚（Wallachia）大公（1431—1476年）弗拉德三世以“恐怖者”和“尖桩弗拉德”而著称，并作为“残忍”的代名词载入传说。他变态的性倾向最近时期又使他获得了许多恶名。然而，他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Sighişoara）以及他在普纳里（Poenari）和布兰（Bran）的城堡，依然供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参观。他的瓦拉几亚公国位于下多瑙河左岸，夹处于强大的匈牙利王国和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前者将其视为臣属，对于后者他也要缴纳贡赋。在1443—1444年瓦尔纳十字军运动时期，他还是个少年，被作为人质送到了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的宫廷。他在此经常遭受鸡奸，这被认为很可能是他后来心理疾患的精神根源。

使用尖木桩在土耳其人看来是一种惩罚方式。但在弗拉德三世手里，却完全变成一种真正的恐怖工具。经过特殊的削尖、涂油，将犹如细针一般的木杆刺进受害人的直肠里，并顺此一直从嘴里伸出，这种痛苦在受害者临死前能持续数天之久。弗拉德三世是在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仅三年后的1456年掌握权力的，他将自己视为基督教王公中对抗异教徒的斗士。一次跨越多瑙河的远征就给他带来了号称23883名囚徒供其施以刺刑，更不用说那些被仁慈地斩首或活活烧死的人了。在国内，他的统治以大批杀戮瓦拉几亚贵族作为开端，也许有两万男子和妇孺在城堡的窗口下被林立的木桩刺杀。[1]

匈牙利国王马塞厄斯·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推行恐怖式的逮捕和监禁政策，致使1463年一名德意志人在维也纳出版了讲述其罪行的《*Geschichte Dracole Wayde*》一书，这为紧随其后的所有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1488年的一部俄文版本一定为伊凡雷帝所知晓，他似乎曾对此书加以利用。这部书中记录的内容可以提示我们，在东方和西方都长期存在的宗教狂热和病态迫害之间存在着奇怪的联系。正如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殉教者传》（Book of Martyrs，1563年）中所讲到的，对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记录和英国玛丽女王实施宗教迫害的记录和这位瓦拉几亚吸血大公的恐怖一样同属病态类型。[2] [**赛会**] [**酷刑**]

身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佩利奥洛格斯（Palaeologos，1448—1453年在位）此时还在乐观地寻觅一位正等待着他的未戴面纱的新娘。围攻的准备工作十分周全。色雷斯和黑海海岸的城市都已被毁灭，以断绝军事援助。一支由三桨战船和运输驳船组成的舰队集结于格利博卢（Gallipoli），一座碉堡在鲁梅利希萨（Rumeli Hisar）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最狭窄处建立了起来。苏丹的匈牙利技师专门铸造了一尊26英尺（7.9米）长、每发可投射12英担（609公斤）石弹的铜炮，并用60头牛从阿德里安堡运来。在城中，向部队供应的武器和饷钱已筹集起来。在城外，壕沟已加深，由布拉切纳闸门（Blachernae Gate）引来的护城河水溢满沟渠。使节已被及时派往威尼斯、梵蒂冈、法兰西和阿拉贡。一支由700人组成的部队在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格（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的率领下已经抵达。[450]乔万尼是一名热那亚的军事统帅，他奉命登占城墙。在第一支土耳其先遣部队出现的那天，一队迁徙的鹤群从海峡上空飞过。城门关闭了。一个巨大的铁锁链横亘于金角湾（Golden Horn）的出口。只有7000名防卫军坚持抵御80000敌军的冲击。

围攻的进程起初鼓舞了防卫军，但是城墙上出现了囚禁的基督教徒被钉死的场景，这迅速造成了恐慌。4月12日，在横江铁索上进行的海上进攻遭到失败。大炮从日出到日落每七分钟发射一次，日复一日，将大部分外围城墙击为碎石。但是鸿沟在夜间被栅栏填平。4月20日一支皇家运输舰披荆斩棘进入海港。土耳其的摧城工事暴露了。

然而，苏丹后来采取巧妙举措，命令大型舰队通过陆路撤到佩拉（Pera）后面，进入金角湾。君士坦丁堡失去了港湾。从那时起，防卫军就面临着三种选择：胜利、战死、皈依伊斯兰教。4月27日，一次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也是为东正教和天主教而召集的全基督教大集会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这一刻，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出现了联合。”[35]

决定性的进攻于围城的第53天——即5月29日星期二大约凌晨一点半发起。非正规军率先发起进攻，安纳托利亚军和土耳其苏丹的禁卫军接踵而至：

> 禁卫军跑步前进，而非疯狂突进……但他们的队列保持完整有序，并未被敌军的投掷器打散。激励他们前进的行军乐雄壮嘹亮，其声音在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传来的轰隆的枪炮声中都听得到。穆罕默德亲自率领他们进至护城河处，他站在那里大声鼓舞军心……攻势如潮，英姿勃发的武装士兵冲过屏障，戳碎上面覆盖的栅栏、砍掉支

撑的横梁，把他们的梯子搭在城墙上，每一轮进攻后都毫不混乱地让位于下一轮。[36]

就在日出之前，朱斯蒂尼亚尼被重炮击中胸铠，浑身鲜血，被迫撤退。一名叫做哈桑的魁梧的土耳其士兵在爬上围栏后被杀掉了，但是这说明围栏是可以攀越上的。一个突围小港科克波特（Kerkoporte）是希腊人在退却时留下的，土耳其军蜂拥而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从他的白色阿拉伯母马上跃下投入战斗，消失了踪影。

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一空。接着便是大屠杀和掠夺。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为清真寺：

穆安津（*muezzin*，在清真寺尖塔上报时间者，原意为“宣告者”——译者注）登上最高的塔楼，宣读邀聚礼（ezan）……阿訇讲道；穆罕默德二世在大祭坛上作感恩祈祷，而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不久前就曾在这个祭坛上参加过基督教圣餐礼。他从圣索菲亚大教堂行进到后来属于君士坦丁家族上百位继承者的威严而空寂的宫殿……一种关于人事物力兴衰变迁的强烈悲怆感在他的脑际萦绕，他重复着波斯诗词中的一段名句：“蜘蛛在皇宫里结了网，猫头鹰在阿夫拉西亚布（Afrasiab）的塔上唱着守望的歌。”[37]

罗马帝国不复存在了。

在征服东地中海的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在该地区建立了[451]贸易关系，控制了连接欧洲同利凡特（Levant）和印度的商路。实际上，土耳其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商人较为宽容，威尼斯和热那亚对于援助君士坦丁堡之事态度冷淡，只能归因于他们已在奥斯曼王国从事有利可图的商业贸易。但这一时代远离家乡的人也许对形势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人们传统上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同西方基督教国家统治者开辟到达印度新航路的努力联系起来。葡萄牙首开远航之先河。当然，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葡萄牙人也许和土耳其人一样不受欢迎，他们也是在非洲奴隶和美丽岛屿的诱惑下试图开辟新航路的。

无论如何，被称为“航海家”的葡萄牙亲王亨利（Henry，1394—1460年）四十年里接连派出探险队，沿着早年阿拉伯航海家的路线到达非洲西海岸。他的船队发现了圣港岛（Porto Santo，1419年）、马德拉群岛（Madeira，1420年）、加那利群岛（Canaries，1421年）——后来又让给了卡斯蒂尔（Castile）王国、亚速尔群岛（1431年）、卡沃布兰科（Cabo Blanco，1441年）和佛得角（Cape Verde，1446年）。加那利群岛当地的关切人（Guanche）在西班牙统治下被消

灭了，加那利群岛的命运预示了后来欧洲开辟殖民地过程的本质。1437年第一个殖民机构——殖民和海军协会成立。到1471年葡萄牙人力量已十分强大，足以将丹吉尔（Tangier）从摩尔人手里夺取过来。1486年，巴塞洛缪·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从葡萄牙人在黄金海岸的殖民地出发绕行到查波托尔曼托索（*Cabo Tormentoso*，风暴角），随即将其重新命名为好望角。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完成了从里斯本（Lisbon）到卡利卡特（Calicut）的连续航行，从而绕开了奥斯曼统治范围。[**贡萨尔维斯**]

在毗邻的西班牙，这一时代以一次著名的政治联合而结束。卡斯蒂尔和阿拉贡这两个相互对抗的王国长期以来通过王朝联合和联姻来调和对抗局势。卡斯蒂尔国王特拉斯马拉（Trastámara）的胡安一世（Juan Ⅰ，1379—1390年在位）同阿拉贡埃莉诺拉（Eleanora）的婚姻为下个世纪卡斯蒂尔和阿拉贡两大家族树立了典范。他们的长子亨利三世（1390—1406年在位）在卡斯蒂尔统治，次子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于1412年在巴塞罗那无意中被选任为阿拉贡的君主。亨利三世的孙女卡斯蒂尔公主于1469年在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成婚。这一婚姻并非史无前例，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新娘和新郎是深受相互敌视和对立局势困扰的王国和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堂兄妹，深知如果允许他们的亲属或家族成员获得控制权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正直虔诚的伊莎贝拉（Isaballa）在孩提时代就在葡萄牙、英格兰和法兰西许配了婚姻，但由于一位不受欢迎的求婚者在奔赴婚庆路上死去，才将她从圣坛上挽救回来。她在将自己的侄女非法驱逐后，提出了对卡斯蒂尔的王位的要求。1474年她登上卡斯蒂尔王位，这引发了一场国内战争和一场同法兰西和葡萄牙的国际战争。狡猾而虔诚的费迪南将寻求她的支持作为逃避个人悲惨境遇的一[453]种手段。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对加泰罗尼亚人长期起义的惊恐中度过的。他对阿拉贡王位的要求是通过驱逐他的私生堂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Ferrante）和毒害其维也纳同父异母的兄弟——纳瓦尔（Navarre）亲王查理而提出的。伊莎贝拉的兄长亨利四世（1454—1474年在位）被描述为“一个可怜而反常的人”。费迪南的父亲约翰二世（1458—1479年在位）曾残酷毒杀了一子一女。因此毫无疑问，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这两位“天主教国家的君主”都是强力政府和有序政府的鼓吹者。

当时，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联合还只是一种个人联合。这两个王国依然保留着各自独立的法律和政府系统。伊莎贝拉没有更多选择，只得拿卡斯蒂尔贵族开刀。费迪南也别无选择，只能同阿拉贡的议会

[452]

贡萨尔维斯（GONCALVEZ）

1441 年安塔姆·贡萨尔维斯（Antam Goncalvez）从里斯本乘坐小船起航，沿着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向南缓缓行驶，经过加那利群岛，绕过了博亚尔多角。自从北方的盛行风将这一部分从非洲海岸吹掉以后，只在七年前有一位同样的葡萄牙船成功通过了这个令人恐惧的海角，并安全返回欧洲。

贡萨尔维斯曾出海接取一艘装有鲸鱼和海狮皮的货船。但当他一登上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海岸，脑际就萦绕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带几个当地居民回去，作为对主人亨利国王的献礼。次日晚，约由十名水手组成的一队人便向内陆行进。黎明时分当他们越过沙丘空手而归时，发现了一个赤裸的柏柏尔人（Berber）带着两支矛跟在一头骆驼后行走。尽管该男子拼命反抗，但还是很快受伤，被制服后俘获。他被捆绑带走。同时被俘的还有一名不幸的黑人妇女，可能是当地一名女奴，是同被俘男子一块出现的。他们是记载中欧洲人到撒哈拉南部进行奴隶掠夺的第一批牺牲品。[1]

随后不久，贡萨尔维斯就同努诺·特里斯唐（Nuno Tristao）率领的另一只船联合起来。他们的船员联手向当地一处营寨发动了一次夜袭。伴随着“葡萄牙”和“圣地亚哥”的狂呼声，他们降临在正熟睡的村民头顶，杀死三人，俘获十人。他总共携十二名俘虏返回了里斯本。编年史家茹拉拉（Zurara）对他们的业绩作了记载。亨利亲王向罗马派出一名使臣，寻求教皇对这种新的十字军行动的支持。教皇对于“上述战争中涉及的全部罪过……都给予彻底宽恕”。[2]

奴隶掠夺和奴隶贸易是非洲人生活中不堪回首的一页，但正是在这一刻，欧洲人首次闯进了非洲人和穆斯林商人之间迄今仍在从事的营务之中。奴隶掠夺和奴隶贸易大约在欧洲人尚未接触美洲的五十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使欧洲的创业商在利用新的机遇进行开发方面处于一种有利地位。1501 年，西班牙发布一项法令，限制越大西洋向驻防地妓院输出信奉基督教的女子。1515 年西班牙从非洲直接向美洲输送了第一批黑奴，同时收到第一船由奴隶种植的美洲糖。

贡萨尔维斯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此时英国的海上船队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垄断权。1562 年 10 月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带领三艘舰船——

"所罗门"号、"燕雀"号和"约拿"号从普利茅斯出发驶向基尼海岸。霍金斯有时被描述为海盗，有时被描述为舰队司令，他建立了"大环形"（Great Circuit），英国的货物在非洲出售，获取三倍的利润，非洲奴隶在印第安人地区出售，美洲的产品则在英格[453]兰销售。在首次航行中，霍金斯因在海上援救一艘葡萄牙的运奴船而使利润稍有削减。在1564年的第二次航行中，他从英国女王那里获得了财政支持，女王还授予他骑士称号，并赐予一枚盾形纹徽，图案是"带锁链的半个锚"。在1567年第三次航海中，他将船员献给了塞拉利昂和卡斯特罗斯（Castros）的国王做雇佣兵，获得了470名奴隶作为奖赏——当时这两位国王正与他们的敌人扎西纳（Zacina）和塞特卡马（Zatecama）进行战争。[3] **[乌斯考克]**

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商人同非洲供应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罪恶之源"，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就在于一方有对奴隶的需要，而另一方非洲首领那里，又存在获取欧洲消费品特别是火器的垄断利益。"[4] 在十九世纪这种贸易停止之前，大约有1500万非洲人被掳掠走，服役于西半球的奴隶制度。在这其中，大约只有1100万或1200万人真正得以活着登陆。[5]

合作，甚至当他要求关闭辩论厅的一扇窗户时，常常还要加上一句"如果习惯法允许的话"。一方面随着通行货币传入，商业屏障消除，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的天主教思想体系的不断强化，卡斯蒂尔和阿拉贡才显示出具有共同目标的意味。1476年伊莎贝拉设立了一个险恶而有效的法律执行机构，最初是针对卡斯蒂尔的贵族匪帮圣兄弟会而设立的。1483年卡斯蒂尔和阿拉贡都被责成接纳统一的西班牙的首设机构，该机构是女王的忏悔神父、多明我会僧侣托马斯·托尔克马达（Thomas Torquemada，1420—1498年）所主持的宗教裁判所在王室的翻版。此后，叛逆和异端事实上就难以区分了。对国王不遵从者、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都受到了严酷迫害。格拉纳达酋长国也不能被容许继续存在了。**[反常]**

对格拉纳达的最后征服于1481年开始，历时十年。在财富和人口上，格拉纳达在西班牙各省中的地位就如同君士坦丁堡在东方城市[454]中的地位一样难以匹敌。格拉纳达外环七十层城墙，靠富饶的乡村供给，借此进行无限期的抵抗。然而摩尔统治者内部的纷争给了统一的西班牙力量一个切入口。当格拉纳达陷于包围之时，一座被称为圣菲（Santa Fe）或"圣菲斯"（Holy Faith）的木城建立起来，专供攻城者居住。1492年1月2日格拉纳达投降。在基督教狂热分子的眼里，君

[454]

反常（DEVIATIO）

从中世纪后期起，没有其他机构像宗教裁判所那样受到如此众多的非议。对于许多现代评述者来说，它在追捕异端、犹太人或女巫［女巫］的过程中引发的暴行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审查者完全是癫狂的。"正常"和"不正常"的定义总是主观的。如果不合传统的行为威胁到了既得利益，那他们就会被轻易地宣布为"疯子"或"危险分子"。有人曾将宗教裁判所和当代医学组织对"精神健康运动"的反对态度加以对比。[1] 它也可以同苏维埃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对待方式进行比较，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依然常常被交付精神病诊所，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以药物强制致残。

士坦丁堡之仇得以昭雪了。

对格拉纳达的征服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对宗教虔诚的摧残。宗教宽容的承诺没有得到信守。据说当女王伊莎贝拉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宗教大裁判官托尔克马达拿出一枚十字架，说道："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出卖了他的主人。为了这个十字架，你将得到多少?"犹太人当时面临一项法令，要么强行改信，要么将被放逐。[38]大约 20000 名犹太家庭选择被流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家庭都选择流放到士麦那和伊斯坦布尔，苏丹派船到那里收容了他们。[39]改信基督教的人大大增多，不过许多人依然暗中忠信于犹太教。1502 年法令使穆斯林面临同样的选择。许多人移徙到北非，其余者留下来形成了另一个不坚定的皈信者群体——摩里斯科人（*Moriscos*）。只有在阿拉贡，议会阻止了国王强制穆斯林农奴——莫德哈尔人（*the mudejares*）改易宗教信仰的举动。在宗教仇恨和猜忌的氛围中，宗教法庭的审判官难以应对。"宗教法庭判决"引发的烈火燃遍了整个西班牙。西班牙人开始为"血液的纯洁"问题所困扰。

碰巧的是，一名到圣菲亚营地寻求天主教君主资助的热那亚水手目睹了格拉纳达 1492 年的陷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 1446—1506 年）被称为克里斯托巴尔·科隆（Cristobal Colon），长期以来为实现横渡大西洋寻找亚洲的航海计划而寻求他们的支持。在格拉纳达陷落之后，他实现了这一计划。8 月 3 日，他作为"大洋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Ocean"），乘坐三艘小船——"圣玛丽亚"号、"凭塔"号和"尼娜"号从巴罗斯港起航。十个星期后，[455]

即10月12日（或21日）凌晨两点，一名海员发现了陆地。哥伦布在黎明时分登陆，他亲吻了那片土地，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并代卡斯蒂尔和莱昂宣布对它的所有权。1493年3月15日，他经由亚速尔群岛（Azores）和里斯本返回了巴罗斯港，声称他发现了通往（东方）“印度”（“Indies”）的航路。[40]

就在同一年，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烈请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同意在这两国各自的海外势力范围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西、亚速尔群岛以外的面积大约100里格的所有新发现的土地都划归西班牙；分界线以东则全属葡萄牙。世界根据教皇的惟一权威被齐整地分为两部分。1494年，通过托得斯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这一分界线又向西移了250里格。这一事件是典型的中世纪式的。然而，如果伊比利亚岛的王国没有从他们对伊斯兰的专注中解脱出来，那么这一事件大概也不会发生，当地也就依然无从得到开发。毕竟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固执地拒绝同哥伦布谈判，直到格拉纳达陷落为止。[国家]

在基督教世界以东300英里之遥的另一端，基督教—穆斯林分界线的变动同样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到1452年，几乎整个东正教世界都臣服于外国统治者。除拜占庭帝国及其附属国之外，希腊教派的东正教都落入奥斯曼统治之手。斯拉夫派的东正教除个别地方外，其余均落入鞑靼、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的统治之下。这样，当君士坦丁堡投降之时，欧洲的东正教似乎就开始承受一如十七世纪以来亚洲和非洲的东正教曾忍受过的无限期的压制。只有在一个地方——莫斯科城，还存在走向另一种命运的迹象。

十五世纪中叶，莫斯科尽管名义上臣属于鞑靼可汗，但依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大公瓦西里二世（Vassily Ⅱ，1425—1462年在位）统治。瓦西里双目失明，主要依靠他的儿子——也是王位继承人——进行统治。伊凡三世（Ivan Ⅲ，1462—1505年在位）因此在即位时就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了。一度强大的鞑靼部落实力大为削弱，莫斯科自1452年起免于向其交付岁贡。结果，伊凡产生了永远摆脱“鞑靼人枷锁”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他显然应当着重强化自己作为东正教斗士的角色，反对南方穆斯林和西方波兰—立陶宛天主教。只要能够赢得世界对其统治权的认可，他将成为地球上惟一独立的东正教君主。

奇怪的是，伊凡的野心竟得到了罗马教皇组织的极大帮助。1453年劫难后，教皇接手了对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的侄女——佐伊·佩利奥洛格斯（Zoe Palaeologos，生于1445年）的监护权。摩里亚的专制君主

[456]

国家（STATE）

1493年——即哥伦布返回卡斯蒂尔王国之年，从葡萄牙到阿斯特拉罕，欧洲版图至少包含三十个君主国。五百年后，如果有人忽视安道尔和摩纳哥、卡尔马联邦和瑞士联邦（这些地方与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三十个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单独维持君主统治政体。在1993年欧洲地图上的这些君主国中，有四个国家在十六世纪形成，还有四个形成于十七世纪，有两个形成于十八世纪，还有七个形成于十九世纪，有不少于三十六个国家形成于二十世纪。国家的兴衰体现了现代欧洲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见原书附录Ⅲ，第1268页）

人们曾经从许多方面对欧洲国家的形成做过分析。传统的分析方式以宪政法和国际法为基础，目的是描绘出某种法律框架——正是在这种框架内，帝国、君主国和共和国得以组织政府，控制其附属国并赢得认可。最近，人们更为关注长期性因素，注重对国家维持的长短进行数据统计。[1]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将国家的形成视为文明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从伴随王权逐步增长而出现的封建分裂时期就已开始进行了。[2]

另有人更为注重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种观点认为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征敛贡赋的帝国、分裂割据的君主国体制、民族国家。它们的内在生命力或者得自于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如威尼斯或联省共和国，或者得自于高压政治的聚合力——如俄罗斯，或者得自于双方面的聚合力——如不列颠、法兰西或普鲁士。金钱和暴力是原动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有赖于他们在更复杂的多边力量联合体中的参与状况，文艺复兴以后的100多场欧洲重要战争中经常组建或重组这样的联合体。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如何造就战争”和“战争又如何造就国家”。[3] 许多这样的问题都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较经验化的方式所分析的问题很相似。[4]

建立民族国家作为根本目标，曾经多次得以实现。但是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却极为多样。作为最终手段，一切都归结为实力。黎塞留写道：“力量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实力。”[5] 简而言之，“力量决定一切”。这使人们质疑是否建立民族国家的确应当是根本目标。

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出生于希腊，在罗马监护人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

育。1469年她还是一位24岁的聪明少女，渴望摆脱监护人的束缚。教皇保罗二世是一位威尼斯人，他原以为自己能够重现佛罗伦萨联盟，并缔结一个同莫斯科人的联盟以反对土耳其人。因此，当他得知[457]伊凡三世新近为鳏夫时，便提出了理想的妻选。教皇的使者抵达莫斯科，促成了这桩婚事。佐伊跟随着他们远行，经过了波罗的海的雷维尔（Reval）港。她重新接纳了东正教信仰，并于1472年11月12日与伊凡成婚。伊凡同一位拜占庭公主成婚，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应夸大。此前，莫斯科曾是基督教世界备受压制的一支中最外围之省，大公们并不知名。但如今，他们正触摸着"恺撒的披风"，距披上帝国的外衣只有一步之遥了。

1477—1478年间，伊凡采取行动反对大诺夫哥罗德（Novgorod the Great），它有五个省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边界。诺夫哥罗德新近承认了立陶宛的世俗君主权威以及都城基辅的宗教权威，这被伊凡视为一种对自己的侮辱。伊凡的军队迅速迫使这一无力抵抗的城市屈服易主。伊凡又通过二度巡视平定了暴乱，随之处死和流放了大批人员。普斯科夫（Pskov）和维亚特卡（Vyatka）也遭到同样的境遇。1480年夏，金帐汗（Golden Horde）的可汗艾哈迈德（Ahmad）发动第三次远征，以迫使莫斯科缴纳贡赋。他曾指望得到波兰—立陶宛的帮助，但没有能够实现。当阿合马因受到伊凡的坚决抵抗而空手返回时，莫斯科依属于金帐汗国的历史走到了末路。此时，伊凡已开始自称为"沙皇"和"萨摩德杰"（Samodyerzhets）——这是俄语音译的"恺撒"和"独裁者"。正如700年前的查理曼一样，一位半野蛮的君主不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创立者形象，而更像是给老化、僵死、刚为人哀悼过的罗马帝国重新赋予生命的人。

主显节盛宴，1493年1月6日，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对这一宗教节日的庆祝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的主教座堂——报喜节大教堂辉煌壮丽的氛围中进行的。主显节在圣诞节后的第12天，是圣诞节期的最后阶段，以纪念基督向（东方）三王（the Three Kings）显身的时刻。洪亮的声音伴随着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在拜占庭式的宗教仪式上吟诵着，其音绕梁入壁，久久回荡。用来隔挡礼拜堂的圣像屏风比教堂还旧得多。屏风上布满一排排的圣像，它们出自莫斯科伟大的中世纪画家——希腊的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安德烈·鲁布列夫（Andrei Lublev）和格罗杰茨的普罗霍尔（Prokhor of Gorodets）之手。身着黑袍并蓄着胡须的神父在圣坛上来回走动，忙于挂布、燃香、遮盖祭品等准备工作。

这便是主显节，是圣大巴西勒派（St Basil the Great）的另一种圣

餐仪式，取代了更为常见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式（St John Chrysostom）的圣餐仪式。[41]在斯拉夫版本中，它本质上同巴尔干地区东正教采用的方式一样。尽管似曾相识，但对于耐心站立于屏风前的俄罗斯众教徒来说，它毕竟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一样难于理解。诸如感恩祭或宗教集会之类的公共宗教仪式在主持神父进入圣坛[459]中央时开始，一位执事朗读祈祷和平的祷文："为了来自上天的和平，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向主祈祷。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宁……"接下来唱赞美诗、礼拜日圣歌、诗篇、八福词等来自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中的篇章，继而做祈祷、连祷，诵唱对于三位圣洁天使的赞美诗。由普通序祷引领的福音书祷文是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中选取的：

神父躬身拿起《圣经》，由烛火引领着走出圣门，面转西方，说道：

"智慧之书亘古长青，让我们聆听圣福音书。和平将与你们同在。"

唱诗班："将与你们的精神同在。"

执事："圣福音书日课来自圣马太福音。"

唱诗班："光荣属于你啊，主。"

神父："请留心。"

随后执事诵读日课：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42]

宗教仪式的第二部分：奉献仪式以大行进仪式开始，此时神父和执事列队围绕祈祷者、香炉和蜡烛所在的中央圣坛行进。然后是诵读宗教信条、准备面饼和酒，向主祷告并领受圣餐。在领受圣餐时，唱诗班诵唱"请接受基督的身体，品尝这不朽的生命源泉"。按照东正教的传统，神父将点名让各人领受圣餐。"上帝的仆人伊凡，分享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稣圣洁珍贵的身体和血，直到宽恕他的罪过，直到生命的永恒……"在感恩祈祷之后，神父分发神圣的面饼，将十字架伸到人面前，让其亲吻，然后重又进入圣坛，随后大门关闭。解散仪式的结束语——"主啊，现在让你的仆人在宁静中离开吧"——伴随着赞美诗以"第六音短歌"结束：

您亲自显示出教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460] 建立在全体人类基础之上，他们世代相传着确定不移的最高权威，

您的圣谕标志着这种权威，

采自天国的罗勒是最为圣洁的，

二者永恒，世界无尽。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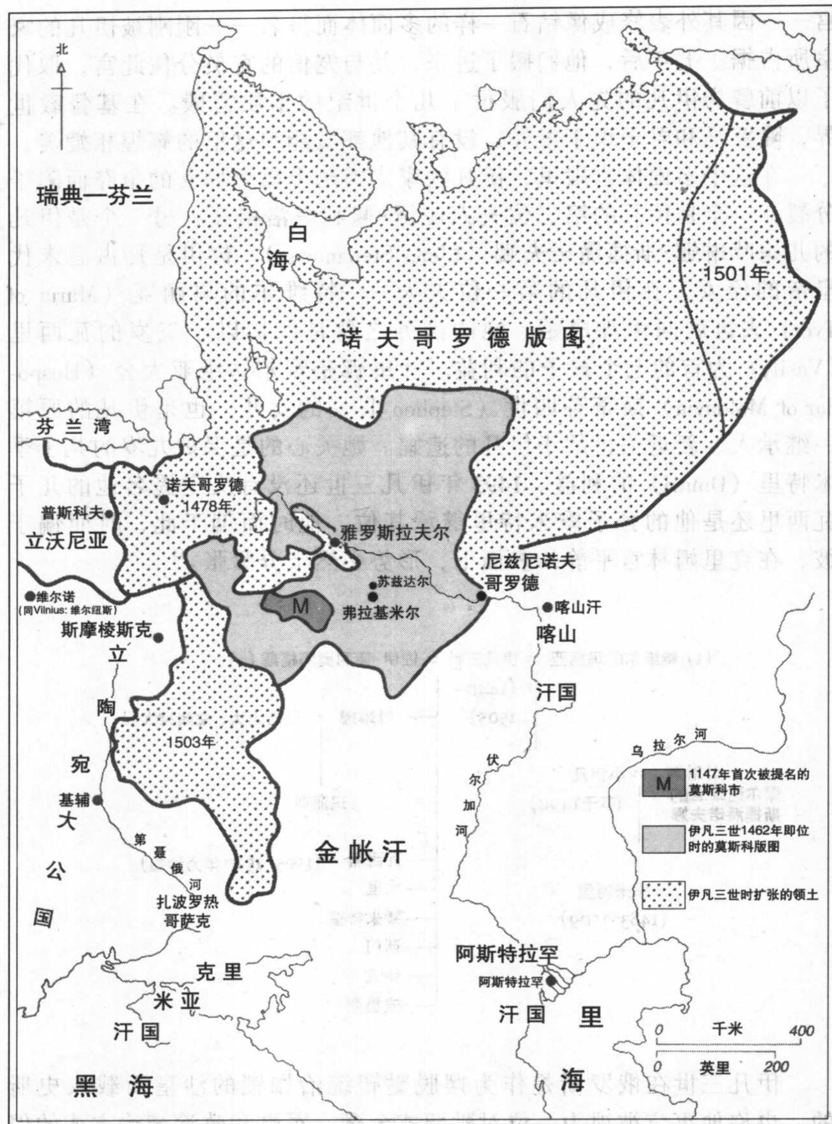
就在那时，万里之外为莫斯科人所不知的“大洋海军上将”（指哥伦布），在返航西班牙的最后阶段正同冬至时节的飓风搏斗。他将于当周在巴罗斯（Palos）登陆。

那一年，莫斯科的圣诞节庆祝活动蒙上了十分特别的感情色彩。博学的修士曾预言没有人能活着见到年终。按照东正教的预计，1492年8月——也正是哥伦布远洋航行出发之月——标志着创世纪以来第七个千禧年的结束，它也正是广为传知的世界末日。事实上，在随后的数年中没有人着手计算教会历法。尽管东正教使用的是和拉丁教会现行历法相同的罗马儒略历法，但他们在计算创世纪年代时却采用一种不同的计算系统。正如拜占庭一样，他们也习惯以9月1日作为教会历法中一年的开始。因此，如果他们相信创世纪的“七天”正是对七个千禧年的一种隐喻，而他们推算出的创世纪时间为公元前5509年，那么公元1492年正相当于他们纪年历法中的第7000年（7000 AM），而末日审判最有可能的时间8月31日便是关键性的日期。由于这一预测未成事实，所谓的末日审判就可能被推迟到了世俗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适值圣诞节庆期的中点。当主显节平安无事地到来时，莫斯科松了一口气。[43]

事实上，莫斯科处在一条崭新道路的边缘。大公伊凡三世在末日审判的那天未被计入受审之列。他行将完成改建国都“固防之城”的宏伟计划。通过象征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手法，他正准备创造有力的俄罗斯神话，这种神话后来成为构筑莫斯科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斯的大部分城市都有城堡。但伊凡三世重新设计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则胜过其他各地城堡。1493年1月，以红砖墙构筑的广阔围墙和高耸的圆形塔提前数月竣工。其占地为一个周长2.5公里的不规则三角形，足以围住半个伦敦城。中心位置是一个建有广场的空旷地带，周围排列着四座大教堂和大公的寝宫。报喜节大教堂还处于始建时的状态，只是在三年前做了最后一点修饰。在邻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当时的大主教座堂——圣母永安大教堂已有十三年的历史了。它是由波伦亚的建筑师亚里士多德·菲拉凡提（Aristotle Firavanti）建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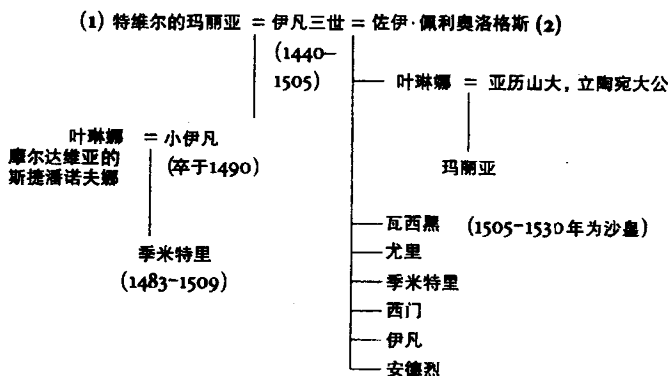


地图 15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

造的。他将古代弗拉基米尔的简约风格应用到了当时的建筑中，成为莫斯科教堂建筑的一个典范。在搭配和谐的穹拱顶层之下，内设一方没有拱廊的开阔空间。教堂的湿壁画依然着以独特的亮色，绘制着希腊狄奥尼修斯王的修长形象。在另一边，圣衣祭典教堂已有七年历史。大天使教堂外观为文艺复兴风格，但依然在修饰之中。由马尔科·鲁托（Marco Rulto）和彼得罗·索拉诺（Pietro Solano）建造的多棱

宫——因其外表修成像钻石一样的多面体而得名——刚刚被伊凡的家室所占据。七年后，他们搬了进来，并与宠信的官员分住此宫，取代了以前曾为伊凡的先人们服役了几个世纪的木质宫殿。在基督教世界，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外，没有其他都城能与这里的辉煌相媲美。

在这个多面体宫殿里，伊凡的家室因两个强势妇女的争夺而陷于分裂，一个是伊凡的第二位夫人佐伊·佩利奥洛格斯，另一个是伊凡的儿媳叶琳娜·斯捷潘诺夫娜（Elena Stepanovna）。佐伊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在伊凡的第一位夫人——特维尔的玛丽亚（Maria of Tver）去世后同伊凡成婚。她的当务之急是保护以十三岁的瓦西里（Vasily）为首的七个孩子的利益。叶琳娜是摩尔达维亚大公（Hospodar of Moldavia）斯蒂芬四世（Stephen Ⅳ）的女儿，也是伊凡的原第一继承人、新近去世的小伊凡的遗孀。她关心的是保护九岁的儿子季米特里（Dmitri）的利益。1493年伊凡三世还没有决定提名他的儿子瓦西里还是他的孙子季米特里继承其位。他时而偏于此，时而偏于彼，在克里姆林宫平静的表面下，形势必然十分紧张。[44]



伊凡三世在俄罗斯是作为摆脱鞑靼统治枷锁的沙皇而载入史册的。也许他更应被视为一位对鞑靼式金融、军事和政治统治方式的倡导者，他通过同可汗和大公轮番结盟之策，取代鞑靼人而将俄罗斯人羁为一体。在同金帐汗进行斗争并于1480年后坚决抵制住其霸权的过程中，伊凡最密切的盟友是克里米亚可汗，他帮助伊凡攻打追随金帐汗的基督教公国自治团体，达到了鞑靼人从未企及的程度。从俄罗斯人的立场上看，“伟大的伊凡”（Ivan the Great）是“俄罗斯”霸权的复兴者。从诺夫哥罗德人或普斯科夫人的立场上看，伊凡是反基督[462]者，是俄罗斯人优秀传统的破坏者。在伊凡立遗嘱之时，正如他的父

亲那样，将自己描述为“上帝负罪累累的奴隶”。[45]

伊凡三世在二十年前首次自称沙皇（Tsar），即“恺撒”（“Caesar”）。他是在与普斯科夫（Pskov）共和国缔结的一个条约中开始使用这个称号的，可能是想向其他大公显示他的特殊地位；十五世纪八十年代他又在几个场合使用这一称号。沙皇虽然意味着地位比大公高，却并不能与拜占庭的皇帝（Basileus）头衔相当。只有具备所有其他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影响，才能被看做是真正的皇权。恺撒一词原本是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奥古斯都的副皇帝的称号。

1489年，伊凡三世又有了新的目标。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交往，使他有机会在教皇的引荐下获得一个王位。他在西方的地位必然会因这顶王冠而得以提高。但 *rex*（*rex* 为拉丁语，意为国王——译者注）这一称号有点冒犯莫斯科公国的尊严。[查理] 接受这一王位就意味着是重蹈希腊人曾在佛罗伦萨犯下的背叛上帝（the True Faith）的覆辙。因而伊凡拒绝了这一王位。“我的祖先们，”他解释说，“对曾将罗马赠与教皇的皇帝们是友好的。”[46]但是他却将哈布斯堡家族的象征借用了过来。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像维也纳、君士坦丁堡一样，双头鹰也成了莫斯科国家的标志。[鹰]

除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外，莫斯科教会还要忍受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期。莫斯科教会已经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决裂（见原书第446—447页），但仍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与驻跸于立陶宛的基辅大教长不同，莫斯科大教长由主教们选出，领导一个没有公认的最高权威的教会团体。因为没有皇帝，也因为拜占庭的政教分离传统，这种状态持续了四十年而没有改观。正如没有真正的忠诚就没有皇帝一样，没有皇帝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忠诚。有些人将希望寄托在一位能收复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皇帝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伟大梦想”。还有些人则希望能与拉丁人的日耳曼皇帝达成协定，但是遭到了拒绝。留下来可供莫斯科选择的，就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以往的做法——寻找一位他们自己的皇帝。

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编写一本新的复活节年表（paschal canon），计算出第八个千禧年的复活节日期。1492年秋莫斯科都主教佐西姆（Zosimus）已经在考虑这项任务。“我们等待主的降临，”他在《序言》中写道，“但是无法确定他到来的时刻。”接着他又加上了一个扼要的历史性概括。君士坦丁建立了新罗马，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对罗斯施洗。现在伊凡三世将成为“新的君士坦丁——莫斯科的君士坦丁大帝”。[47]这是莫斯科当时套用的世系家谱第一次被间接提及。

同样是在1492年，也同样是第一次，“新的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更熟悉的名字“第三罗马”。这一年诺夫哥罗[463]

德大主教根纳德斯（Gennadius）可能得到了一份罗马传说《白僧帽》（White Klobuck）的译稿，译稿序言解释了传说的原稿是如何在罗马被发现的。学者们对这个文本的年代有争议，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在后来被篡改过。但是《序言》很清楚地暗指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这一点是很确切的。有人认为《序言》的作者是当时正在翻译《以斯拉启示录》（the Apocalypse of Ezra）的一位有名的翻译家。根纳德斯大主教计划使莫斯科教会拥有一部完整的《圣经》版本，与通行的拉丁文《圣经》版本相对应，获得这部译著是计划的一个部分。[48]

一旦俄罗斯王公们受到了控制，莫斯科的称帝野心很明显地与西边的邻居立陶宛大公对立起来。蒙古人的扩张为立陶宛带来了好处，像莫斯科一样，它以北部边境为基地吞并前罗斯的残余地区。到十五世纪末，同样如莫斯科一样，立陶宛也控制了极为辽阔的领土——主要是第聂伯河流域——从波罗的海岸延伸到黑海海滨。但与莫斯科不同的是，立陶宛对西方影响的态度是开放的。因为与波兰的联合，立陶宛大公国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见原书第429—430页）。到十五世纪九十年代，位于维尔诺（Wilno）的立陶宛宫廷与天主教的统治阶层在语言和政治文化上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立陶宛王朝不仅掌握着波兰和立陶宛，还拥有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与莫斯科不同，立陶宛奉行宽松的宗教政策。虽然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但这并不妨碍东正教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和犹太人的大量涌入。与莫斯科不同的还有，立陶宛的东正教会既没有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也没有放弃对古老的拜占庭的忠诚。基辅大教长有充足的理由反抗莫斯科的分裂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就是分裂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会，并致使俄罗斯（Russian）东正教会分裂。

1493年1月，莫斯科与立陶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六个月前，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雅盖隆兹克（Casimir Jagiellonczyk）去世，王国由他的次子和第三子分而治之。波兰王国由约翰·奥尔布莱特（Jan Olbracht）统治，立陶宛由尚未成婚的亚历山大统治。（其长子已成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机会已经出现在伊凡三世面前。一方面，他准备派遣使节前往维尔诺，促成大公亚历山大与伊凡的女儿叶琳娜（Elena）的政治联姻。同时，他又为暗中破坏两国先前达成的临时条约制造条件。在莫斯科历史上，他首次指使他的使节要求他国承认他当时尚不为人知的称号——“全体俄罗斯人的主人”[49]。这是一次经典的外交双重手腕——表面上友好，暗地里[464]搞破坏。伊凡处心积虑与立陶宛订立这个婚约，从而使整个东斯拉夫民族的未来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

为了申明他的想法，伊凡进行了一场轰动性的实验。圣诞节前他

逮捕了两个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供职的立陶宛人，控告他们企图毒害他。对约翰·卢克霍姆斯基（Jan Lukhomski）和波兰的麦西耶（Maciej the Pole）的控告听起来并不可信，但很难讲他们是有罪的还是清白的。他们被关在置于冰冻的莫斯科（Moskva）河上的一个笼子里让人们围观；在伊凡的使节即将启程前往立陶宛之际，他们被活活烧死在笼子里。[50]随着河里的冰在火焰的高温下融化，沉重的铁笼沉入水中，带着烧焦的尸体一起吱吱作响，人们很可能会想到那两个人一定说了某些关于立陶宛政治前途的话。

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现实中，"全体罗斯的大公"这一名号都不具备牢固的基础。这与英国国王自称为法国国王是类似的。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原先罗斯的痕迹消失殆尽的两个世纪以后，如果说法国国王曾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宣布为"全体法兰克人的主人"，那么伊凡三世应该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此时，罗塞尼亚人（"Ruthenes"）已经认定他们与莫斯科罗斯人（"Russians"）不同且相互独立，因而这一名号与立陶宛人的观念发生了冲突。实际上，立陶宛人并不是为了迎合伊凡才接受这一名号的。他们是在向将要延续500年的领土扩张野心让步，不过当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因而到1493年，"第三罗马"的一切重要意识形态因素都已具备了。一个东正教的独立支派在寻找一个皇帝；一位与拜占庭末代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王公已自称沙皇；而且全体罗斯人要求有一位领袖。惟一缺少的是一位合适的、别具匠心的理论家，能将这些因素融合成一种神学理论，以满足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神权政治色彩的国家的需要。这样一个人已经出现。

普斯科夫的菲洛修斯（Philotheus of Pskov，约1450—1535年）是位于普斯科夫的伊利萨尔（Eleazar）修道院的一位饱学之士。他通晓《圣经》的以斯拉和但以理预言，熟知此前的塞尔维亚和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历史，精通《伪美多德书》、《玛拿西纪》以及白僧帽（the White Klobuck）的传说。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并不稀奇。菲洛修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愿意用这些学问为莫斯科的王公们服务。普斯科夫与诺夫哥罗德一样，对莫斯科心有忌惮。普斯科夫的大多数僧侣是强烈反对莫斯科的。他们在编年史中对"尼布甲尼撒之梦"和"但以理的幻象"一段中的四种兽作注解时，倾向于将尼布甲尼撒与莫斯科相提并论。但是菲洛修斯打算用这一题材为莫斯科服务。1493年，在他年逾四十的时候，在他后来将成为院长的修道院里他尚未担任有权之职，也还没有写出后来让他成名的公开的使徒书信。但是教会的[465]动荡不安对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最终他决定鼓动所有基督教徒彻底归顺沙皇，反对拉丁教会。在他写给伊凡的继承人的书信中，他表示

拥护沙皇的合法统治，因为此时世界正在进入历史的终极阶段：

现在我愿听从您，虔诚的沙皇，对您说：所有基督教世界的皇帝权威集于您一身。因为两个罗马已经沉沦，而第三个已经出现；第四个不会再出现了。据那位伟大的神学家所言，这个基督教帝国将不会再消失。还因为这个教会将按圣大卫（the blessed David）的话成为现实："她是我永久安息的地方"……[51]

后来，菲洛修斯在写给穆内克辛（Munexin）的书信中强烈斥责"占星术士和拉丁教会"：

现在只有东方神圣的普世的使徒教会的光耀胜过天上的太阳；只有伟大的东正教罗马的沙皇，像洪水中的诺亚方舟一样指引这个教会……[52]

此时虽然伊凡已经去世了二十年，但很明显他是受了伊凡政策的激励，这是一个关于教会和国家的坚定构想，不容半点妥协。

后来俄罗斯的传统就是坚持认为莫斯科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实际上，拜占庭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但本质已经已不复存在。莫斯科的神学家们对东罗马教会的普世理想没有兴趣。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位杰出史学家指出，"第三罗马"的理念只是"徒有其表的替代品"而已。"拜占庭的基督教普世主义被转化和扭曲成了狭隘的莫斯科民族主义。"[53]

伊凡三世后期出现了两起相互关联的争端，对争端的解决加强了上述这些最坚定的因素。莫斯科的神学深受这两起争端的影响。争端之一集中在一个被看做是"犹太教徒"的派别或倾向的观念上。另一争端集中在被认为是丑闻的一个现象上，即基督教的修道院正通过占有土地而富有起来。沃洛汉斯克（Volokhamsk）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是"反犹太教"和"反土地占有者"运动的组织者。

土地占有权与莫斯科教会的权力是分不开的。但是这遭到了一个苦修僧侣团体的反对，这个团体由奉行东正教隐修主义古老传统的"外伏尔加长老会"（"Elders beyond the Volga"）领导。伊凡三世可能原已打算使教会财富世俗化，但因遭到劝阻而作罢。伊凡死后事情刚开了个头，原先他最宠信的帕特里基夫（Patrikeev）现在做了修士，印行了新版的《东正教总则手册》（*Nomocanon*）。帕特里基夫的同伴，希腊人马克西姆（Maxim）针对教会的土地所有权提出了一个"教会不得占有土地"的主张，幸运的是他并没有遭到教会的攻击。

犹太化者燃起了更大的激情。他们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在诺[466]夫哥罗德，那里的人们称他们建立了一个反莫斯科的组织。他们的思想很可能受到了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的影响，据说其成员是犹太教的秘密拥护者。他们的活动看来没有令沙皇（伊凡）担忧，他派遣一个不是很信任的诺夫哥罗德人出任乌斯彭斯基（Uspensky）大主教区的大祭司（archpriest）；他们可能还获得了埃雷纳·斯特潘诺夫纳（Elena Stepanovna）的支持。他们不顾1490年召开的审判反三位一体主义和破坏圣像的会议，继续在上层社会进行宣传。但是约瑟夫修道院长没有放弃。1497年，约瑟夫在他的著作《启蒙者》（*Prosvetitel*，即"Enlightener"）中，称都主教佐西玛（Zosima，据［462］及索引即Zosimus佐西姆——译者注）为头号犹太教徒和邪恶者，"一头邪恶的狼"。[54]约瑟夫院长和他的同僚根纳丢斯（Gennadius）大主教都很欣赏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最终他们的热忱通过一次火刑收到了效果。他们说服了同胞，使他们相信在俄罗斯历史上将多次重复出现的观点——邪恶来自西方。在当时，这个"西方"首先指诺夫哥罗德，其次是再往西的波兰—立陶宛。

伊凡三世的外交政策同样也指向这一目标。[55]当时他的外交进展极为缓慢。莫斯科的使节从国外搜集各种情报，为此常常会花费大量时间。伊凡派出的使节经常刚到一个国家就发现那里的情况跟伊凡给他们的指令不符。即便如此，到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对立陶宛的包围显然已经成为莫斯科的首要目标。伊凡的父亲与立陶宛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临终之时伊凡和他的母亲被托付给"我的兄弟，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56]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到1493年，伊凡三世长达二十年的扩张性外交活动开始进入尾声。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抑制和包围雅盖隆家族。他通过儿子的婚姻巩固了与斯提芬四世（Stephen Ⅳ）即摩尔达维亚的霍斯伯达尔（Hospodar）的协约，但摩尔达维亚仍然向波兰国王效忠。他原计划与匈牙利达成一项反雅盖隆的条约，但由于马提亚·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的暴卒，以及接下来弗拉迪斯拉夫·雅盖隆（Wladyslaw Jagiellon）当选为匈牙利国王，这一计划破产。他甚至还与马佐维亚（Mazovia）的一些独立的公爵们有过联系。从1486年起，伊凡三世频繁调换驻哈布斯堡王室的使节，而在此之前，哈布斯堡王室一直误以为莫斯科是立陶宛的封臣。1491年，一位奥地利使臣荣格·冯·图恩（Jorg von Thurn）提出一项建立一个反雅盖隆大联盟的计划，这一联盟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条顿骑士团、摩尔达维亚和鞑靼。1493年1月，伊凡的使节尤里·特里汉尼奥特（Yuri Trakhaniot）跟踪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至科尔马（Colmar），结果发现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与雅盖隆家族媾和，

它现在更想做的是发动一次圣战。伊凡三世与克里米亚加强联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共同反对立陶宛。不过他最主要的是想结成一个反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同盟。1491年6月，他派遣三支军队驱散了金帐汗国在第聂伯河口建立的营地。同时他注意到，得到莫斯科好处的鞑靼人将他们的大多精力用在了对波兰和立陶宛的侵扰上。

[467] 1492年至1493年间的冬天，莫斯科与立陶宛在它们的边境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边界的一些王公改变了立场。梁赞（Ryazan'）的王公们准备反抗由立陶宛在斯摩棱斯克的总督发起的旨在惩罚它的入侵。莫斯科刚刚与维尔诺（Wilno）缔结和平，很快就受命出发攻取第聂伯河源头的维亚兹玛（Vyazma）城。很明显，是和是战伊凡心里是有数的。

所以，在这一拓展的年代里，莫斯科尽管地处偏远，但并非与世隔绝。所有莫斯科的使节都从国外带来工程师、建筑师和枪手；德意志和波兰商人每年都来此购买大量皮毛。莫斯科的确与都铎英国、瓦洛亚法国以及西班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王朝没有直接联系。波罗的海与尼德兰的贸易交往在立沃尼亚（Livonia）止步，绕过北角（North Cape）的路线还没有打开。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打通了通往欧洲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在北方，“德意志之路”经诺夫哥罗德至雷维尔和里加，然后通过海路到达吕贝克。在陆地上，山林小径向西延伸至边境的斯摩棱斯克，然后通向维尔诺和华沙。伊凡三世建立了一套驿站和驿马系统，由莫斯科王室负责运营。[57]在南方，从前的旅行者沿着古老的河流可以很快到达黑海，然后乘船到达地中海的任何地方。尽管奥斯曼崛起了，但莫斯科与古老的拜占庭世界——也就是与巴尔干地区，与希腊特别是阿素斯地区（Athos）以及通过希腊与意大利——仍保持了紧密联系。

总之，莫斯科在为自己开拓道路。1466—1472年，特维尔商人阿凡纳西·尼基丁（Afanasii Nikitin，1472年卒）花了六年时间到达波斯和印度。他从巴库和赫尔姆兹出发，由特里布松和卡法返回。他的冒险经历被记载在一部早期旅游著作——《三海游记》（Khozenie za tri moria）中。十年后萨尔泰勒（Saltyle）和库尔布斯基（Kurbskii）的远征越过乌拉尔山，到达了额尔齐斯克河和鄂毕河的源头（这项功绩可以等同于300年后美国的刘易斯和克拉克）。1491年，两名匈牙利勘探者到达伯朝拉（Pechora）通向北冰洋的支流，在那里发现了银和铜。或许是因为这一发现，1493年1月，一名奥地利勘探家斯努普斯（Snups）来到莫斯科，他持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的信件，要求他获得沙皇允许后去勘探鄂毕河。但由于

伊凡与哈布斯堡皇族的联系不再必要，斯努普斯的请求遭到拒绝。

至于大洋海军上将（哥伦布——译者注），他探险的消息被延迟了25年之后才由希腊的马克西姆修道团带至莫斯科。希腊的马克西姆（Maxim Grek），即迈克尔·特里沃利斯（Michael Trivolis，约1470—1560年）生于正在衰亡但其残余仍构成一个文化区域的拜占庭世界。他出生在奥斯曼治下的伊庇鲁斯的阿尔塔（Arta），他的家从那里迁到威尼斯的库尔弗（Corfu）。1493年，他在佛罗伦萨与柏拉图主义者一起学习，并接受了萨翁纳罗拉（Savonarola）的启示。在威尼斯和米兰多拉（Mirandola）一同深入学习注解希腊文本之后，他在萨沃纳罗[468]拉（Savonarola）本人所在的圣马可修道院宣誓加入多明我会。后来，他成了马克西姆修道团修士，在阿索斯山（Athos）上的瓦托贝蒂（Vatopedi）修道院翻译经典达十年——该地区流行的是泛东正教和希腊—斯拉夫主义，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影响不大。然后他应邀至莫斯科整理那里的学者已不再注释的希腊和拜占庭文稿集子。很快他就与莫斯科教会的强硬派发生了冲突，他们控告他行巫术，搞间谍行为，并且还尊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但是在度过漫长的牢狱之灾后他活了下来，并直接见到了伊凡四世，还得到了他的恩惠。他是“他那一类人中的最后一个”。[58]

出现于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克西姆的著作，提到了“一个名为古巴的大岛屿”。[59]毫无疑问，到那时候他已确切地知道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登陆。他的生平年表极为重要。因为他被关押在莫斯科的监狱里长达三十年，由此可以推测出在1518年他首次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就带来了这个消息，此时已是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二十五年之后。

现代“俄罗斯”和现代“美洲”都是在公元1493年开始纪元的，这是一个精妙的历史巧合。欧洲人开始了解一个“新世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它了。与此同时，莫斯科人却知道，他们的“旧世界”还没有走到尽头。

第7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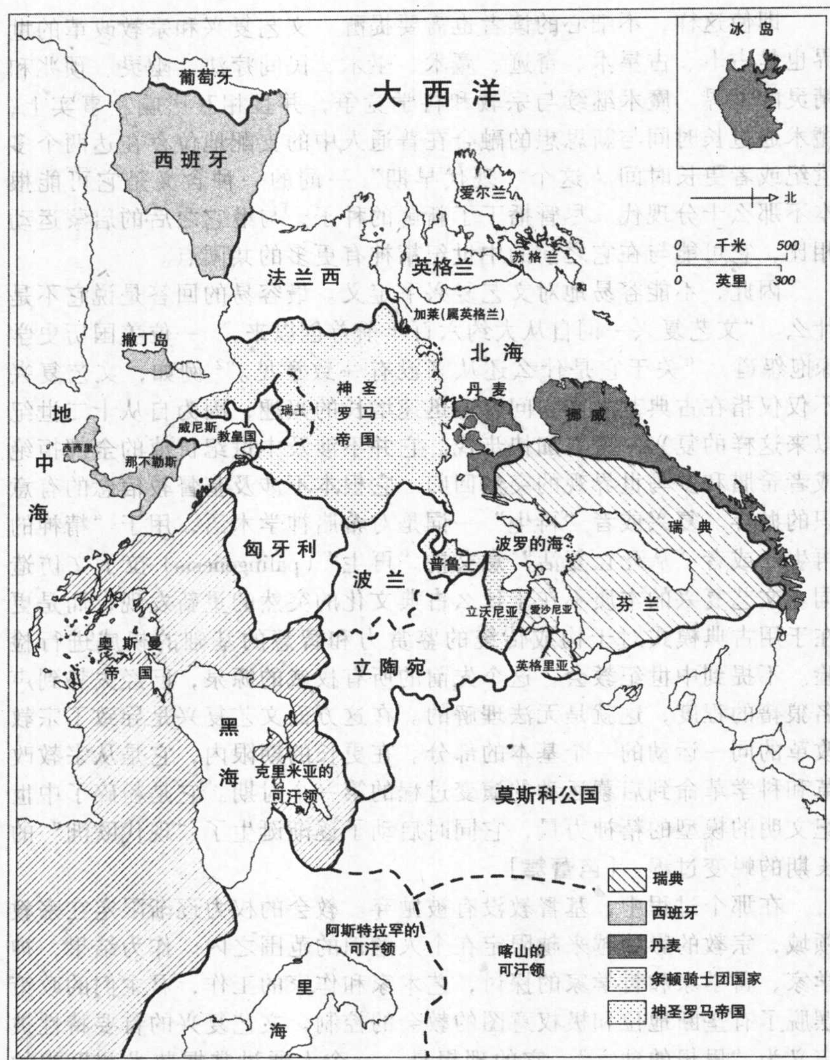
再　生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约1450—1670年

[469]　关于文艺复兴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的意识。在人们看来，把现代欧洲文明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和像伊斯兰一样的其他非欧洲文明区别开的这种思想运动没有清晰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一小部分知识精英的独享事物，并且不得不与各种新旧思想的挑战倾向进行斗争。传统上认为开始于大约1450年的所谓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只能把它说成是少数人的兴趣所在。在欧洲社会的大部分，和欧洲版图的广大地区，它同样都没发挥任何的影响。由于某种原因它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并且还设法与日常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分离。它不是典型的并且不是具有代表性的，然而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像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杰出的形象一样——他们在它的最有影响力的表现之中，无论是精致的《春》（Primavera，1478年）还是优雅的《维纳斯的诞生》（Venus Rising from the Waves，约1485年），它的双脚都没有以任何方式触及地面。它漂浮在它从中升起的世界之上，脱离现实的抽象之上，新的充满活力的精神之上。

面对这种问题，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抛弃了他们较早时期所关切的事。关于少数人的兴趣所在著述的许多书已不再流行。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科学发现和海外探索已不得不让位于物质条件的研究，中世纪连续性的研究，和与上层文化相对立的大众的信仰（和怀疑）的研究。专业人士现在喜欢令魔术、流浪、疾病，或者殖民地人口的大批屠杀突出醒目。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矫正药；但是它

[470]



地图 16　欧洲，1519 年

忘记列奥那多或者路德如同它曾经忽视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或者弗留利的磨房主（Miller of Friuli）* 一样是奇怪的。希望知道为什么欧洲在十七世纪与它在十五世纪时那么不同的人，没有人能承受得起回避这些传统主题的损失。

---

* 诺查丹玛斯是十六世纪法国预言家；弗留利的磨房主是人类学家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中描述的人物。——译者注

即使这样，不细心的读者也需要提醒。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世[471]界也是占卜、占星术、奇迹、魔术、巫术、民间疗法、幽灵、预兆和精灵的世界。魔术继续与宗教和科学竞争，并且相互影响。事实上，魔术通过长时间与新思想的融合在普通人中的支配地位存在达两个多世纪或者更长时间。[1] 这个“现代早期”一词的一种含义是它可能根本不那么十分现代。尽管播下了新鲜的种子，与继它之后的启蒙运动相比，它可能与在它之前的中世纪精神有更多的共同点。

因此，不能容易地对文艺复兴下定义。最容易的回答是说它不是什么。“文艺复兴一词自从大约六百年前首创以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抱怨道，“关于它是什么还从来没有一致意见。”[2] 例如，文艺复兴不仅仅指在古典艺术和学问方面迅速增长的兴趣，因为自从十二世纪以来这样的复兴一直在加快步伐。它并不涉及中世纪价值的全部拒绝或者希腊和罗马世界观的突然回归。它根本不涉及基督教信念的有意识的抛弃。复兴或者“再生”一词是对希腊神学术语，用于“精神的再生”或者“从死亡复活”意义的“再生”（palingenesis）拉丁文仿造词。文艺复兴的本质不在于什么古典文化的突然的重新发现，而是更在于用古典模式对于构成传统的鉴赏力和智慧的基础的权威进行检验。不提到中世纪教会，这个先前的所有权威的源泉，已经失势到声名狼藉的程度，这就是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文艺复兴是导致了宗教改革的同一运动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在更长的期限内，它是从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的演变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它是粉碎了中世纪文明的模型的精神力量，它同时启动了逐渐诞生了“现代欧洲”的长期的蜕变过程。[**芭蕾舞**]

在那个过程中，基督教没有被抛弃。教会的权力逐渐限定在宗教领域，宗教的影响越来越限定在个人意识的范围之内。作为结果，神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探讨，艺术家和作家的工作，君主们的政策摆脱了有垄断地位和极权意图的教会的控制。文艺复兴的首要特性被定义为“思想的独立”。它的理想是，一个人通过掌握艺术和思想的所有分科，而不需要依靠外部权威来形成知识、鉴赏力和信念。这样的一个人是“完美的人”（l'uomo universale）。[3]

新思想的主要产物在于人类能掌握他生存的世界的信念在不断增强。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人物充满了自信。他们感到天赋的灵感能够，也应该用来揭示上帝的宇宙的秘密；并且，扩展到人在世界上的[473]命运能够得到掌握和改变。中世纪的笃信宗教和神秘主义正是由于与它相反的信念而加强——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是上帝的无助的马前卒，被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本性的无法理解的作为而压倒，这种中世纪思想在这里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中世纪的态度由关于人的无知，无能，

[472]

芭蕾舞（BALLETTO）

舞蹈——它一直在异端的宗教仪式中扮演中心角色，除了乡村的娱乐外它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忽视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于1489年在托尔托那（Tortona）米兰公爵的婚礼上由博塔（Bergonzio di Botta）表演的世俗舞蹈场面，是文献记载的现代风格舞蹈的最早的范例。芭蕾舞在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时期从意大利传播到法国宫廷，在那里，在路易十四统治之下，它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吕利（Lully）的《爱神的凯旋》（Triomphe de l'Amour，1681年）奠定了芭蕾舞剧的有长远影响的风格的基础。

芭蕾舞剧的现代理论和实践主要发展于十八世纪中期的巴黎，尤其是在皇家芭蕾舞大师让·乔治·诺维尔（Jean Georges Noverre，1727—1810年）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像玛利亚·卡玛戈（Marie Camargo）或者维斯特里斯（Gaetano Vestris）一样的舞蹈家——他们适度地称自己为舞蹈之神（le dieu de la dance），这是基于他们在五个古典姿势的基本原理方面的训练和表演。在后来的时期，古典技巧和像雷奥·德立勃（Leo Delibes）的《葛蓓利亚》（Coppella，1870年）或者基于肖邦（Chopin）曲调的《仙女们》（Les Sylphides，1909年）的罗伊·道格拉斯（Roy Douglas）幻想曲一样浪漫主义音乐的结合，证明是有巨大吸引力的。

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时期就从法国和意大利引进了芭蕾舞，而在十九世纪迅速地从模仿走向有创造力的出色表演。柴科夫斯基为《天鹅湖》（1876年）、《睡美人》（1890年）和《胡桃夹子》（1892年）创作的音乐，奠定了俄罗斯权威地位的基础。在和平时期的最后年代，俄罗斯人的芭蕾舞以获得了一系列无比的成功的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年）为代表。福金（Fokine）的舞蹈设计，尼金斯基（Nizinski）和卡尔萨温娜（Karsavina）的舞蹈，还有，最重要的是，斯特拉文斯基（Strvinsky）的配乐，借助《火鸟》（Firebird，1910年），《彼特卢什卡》（Petrushka，1911年）和《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1913年）把芭蕾舞带到了它的顶峰。在1917年革命之后，俄罗斯人的芭蕾舞依旧发展，苏维埃的大芭蕾舞团（Bolshoi）和基洛夫（Kirov）芭蕾舞团相结合以僵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赢得了令人吃惊的技术优势。

现代舞蹈，与芭蕾舞正相反，可能比大家想到的更古老。它的

基本原理，把音乐节奏相应地转变成人体的动作的原理，由音乐教师弗朗索瓦·德尔萨特（Francois Delsarte，1811—1871年）提出。德尔萨特（Delsarte）鼓励了两位这种艺术的主要从事者，瑞士的雅克·达尔克罗茨（Jacques Dalcroze，1865—1950年）——韵律体操的先驱——和匈牙利的拉班（Rodolf Laban，1879—1958年）。在中欧的现代舞蹈遭到纳粹的干涉之后，艺术重心转移到北方。

无力——简而言之，普遍的罪的概念，无能为力的忧虑而支配。文艺复兴的态度，恰恰相反，由人的潜力的不断觉醒而产生的自由和新生的信念孕育产生。思索、创新、经验和探索一定能带来成功。理性的历史学家从新思想和新形式的角度去考察文艺复兴；心理学家可能更多地看到克服长期阻碍新思想发展的支配作用的恐惧和习性。（见原书附录Ⅲ，第1269页）

没有简单的年代框架能加在文艺复兴之上。文献的历史学家在十四世纪的诗歌和为了人自己的缘故而观察人的情感的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中寻找它的起源（见第6章）。艺术史学家求助于画家乔托（Giotto）和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年），建筑学家腓力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dlleschi，1379—1446年）——他为了给佛罗伦萨的教堂建造一个更有胆略的圆顶而测量了罗马万神殿的圆盖，或者求助于雕刻家吉尔贝蒂（Ghiberti，1378—1455年）和多那太罗（Donatello，大约1386—1466年）。政治史学家求助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他首先解释了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政治技巧。这些先驱者中的每一位都是佛罗伦萨人。作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家园，佛罗伦萨能当之无愧地宣称自己是“现代欧洲之母”。[鞭笞]

在这些无法比拟的多才多艺的佛罗伦萨的几代人中间，没有人能超过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年）。这位画家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可能是焦孔达（La Gioconda）（蒙娜丽莎，1506年），他看上去拥有无限的天分去满足他无限的好奇心。他的笔记本包含从解剖学图画到直升机、潜水艇、机关枪的设计的每一样事情。甚至在更早的时期，这样的机械发明在德国就曾风行一时。[4] 他的声望由来自于丢失的作品的神秘性所环绕，也由魔术的声誉的神秘性所环绕。据说，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从佛罗伦萨的街道市场买回装在笼子里的鸟，为的是把它们放掉。对于艺术和自然的秘密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在法国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他在那里为弗朗西斯一世服务。他去世

[474]

鞭笞（FLAGELLATIO）

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大约1415—1492年）在从1447—1460年之间的某一段时间绘出了流传很广的被称为《鞭笞》的那幅小习作。这幅画，现在收藏于乌尔比诺（Urbino）的国家画廊，由于它的可折叠的结构，建筑物的细节，令人惊叹的透视法的应用，并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它的不可思议的喻言（见图39）[1]而成为卓越的画。这幅画分为两个具有区别性的区域。在左边，一个夜间的鞭打场面出现在明亮的古式院落的内部。在右边，三个高大的男人在一个空旷的花园里交谈。左边黯淡的月光由从右边溢出的日光所驱散。

建筑物的基本结构令人奇怪地模糊不清。执政官的庭院是庄严的古典风格。沉重的房顶的嵌板由从大理石的路面耸起的两排有凹槽的科林斯风格的柱子撑起。在中心，饰有金色雕像的象征耶路撒冷的古罗马神殿的柱子上绑着一个囚犯。还有带有一个突出的观景楼的两座中世纪的房屋呈现在旁边。远处是一片绿地和一片蓝色的天空。这样，这幅画的一部分设置在过去，另一部分设置在现在。

两群不同的人物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联系。庭院中的鞭打场面由戴着一顶尖角的“帕里奥罗加”式样帽子的坐着的官员，一个戴头巾的阿拉伯人或者土耳其人，一个穿着短的罗马宽外袍的随从注视着。前景中花园里的人群由一个戴着圆帽子，穿着栗色长袍和柔软的靴子的留着胡子的希腊人，一个穿着红色的罩衫戴着月桂花环的赤着脚的年轻人，和一个穿着一件佛拉芒风格的皮边的锦缎衣服的富有的商人构成。

彼埃罗（Piero）运用透视法的图画确保了囚犯这个小的形象保持在中心的焦点上。光线，房顶的嵌板和柱子的会聚的线条，和按照透视法缩短的路面的大理石的正方形，构成了强调内部动作的建筑物背景教科书的实景部分。[2]

至于喻言，彼埃罗的艺术的突出特色已经表明相互冲突的解释太多了以至于令人无从论及。[3]传统的观点认为《鞭笞》描绘了在彼拉多（Pilate）之前耶稣的鞭打之苦。许多评论家把赤脚青年看成蒙太费尔特罗（Oddantonio di Montefeltro）。然而拜占庭的风格也是强烈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一定数量的与主导了那个时代新闻的土耳其的围攻和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有关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

囚犯不可能是耶稣，而是圣马丁，七世纪在拜占庭人的手中殉难 [475] 的罗马教皇。指挥的官员可能不是彼拉多，而是拜占庭皇帝。三位居于画面前景中的人物可能是曼图亚会议（1459 年）的参加者。在曼图亚，一位希腊大使请求西方君主发动十字军营救东方帝国。

然而，一个主要的英国权威人士坚信这幅画代表圣哲罗姆的梦。哲罗姆曾经梦到他由于阅读异端的西塞罗的著作而被鞭打。这可以解释两部分之间的不一致。三个前景中的人物——两个男人和一个赤脚天使——“正在讨论古典文献和体现于圣哲罗姆的梦中情节的基督教兴起初期教父文献之间的关系”。[4]

直线透视法标志着这个时代的艺术感觉。[5] 它使彼埃罗的同时代人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非常兴奋，以至于他叫醒床上的妻子来讨论它。它是一种用于在平的、二维的表面上创造出三维世界的现实图像的绘图的方法。它开始表现通过人眼看到的世界，并且它标志着对中世纪艺术的等级化的比例的根本的拒绝。它首先由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从他对古典建筑的研究中发现，然后由以阿尔贝蒂（Alberti）的《论绘画》（De Pictura, 1435 年），彼埃罗本人的《论透视原理》（De Prospettiive Pingendi, 1475 年之前），和丢勒（Durer）的专题论文《论测量》（on Measurement，1525 年）为代表的许多理论性的论文详细论述。它的规则包括平行线朝着一个产生错觉的“消失点”和“水平线”方向的绘图法上的会聚，物体缩小的尺寸和它们与“消失点”的距离有关，并且包括沿着视觉中心线伸展的相貌的缩小。[6] 这种画法的开拓时期的典范发现于佛罗伦萨大教堂洗礼堂青铜双扉大门上吉贝尔蒂的“天堂之门”（1401—1424 年），和圣玛利亚教堂中殿的马萨乔（Masaccio）的壁画（约 1427 年）三位一体图（Trinity）。其他有水准的例子包括乌切洛（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Battle of San Romagno，约 1450 年），曼坦那（Mantegna）的《哀悼基督》（Lamentation over Dead Christ，约 1480 年），和列奥那多的《最后的晚餐》（1497 年）。透视法一直支配随后 400 年的表现艺术。列奥那多称它为“绘画的缰绳和船舵”。一位现代批评家称它为“一种惟一的欧洲观看方法”。自然而然地，当现代艺术家最终开始解构传统的方法时，直线透视法成为他们的目标之一。如同克利（Paul Klee）在他的《透视法的幻象》（Phantom Perspective，1920 年）中所做的一样，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年）和他的超现实主义画派（Sculoa Metafiaica）探讨了《不

安的九女神》(The Disquieting Muses, 1917年)的画中使物体离开原来位置的透视法的影响。留给荷兰人埃歇尔(M.C. Escher, 1898—1970年)的是探求最后所有纸上的线都涉及错觉的视觉谜语。**[印象派]**

于卢瓦尔靠近昂布瓦斯(Amboise)的克鲁城堡(Chateau de Cloux)——被称为“比意大利本身更为意大利化”的世界的一部分。[5] **[列奥那多]**

文艺复兴从来没有被限定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的风格之内,它的影响持续地波及全部拉丁基督教世界。现代学者有时忽视这种事实。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巴塞尔,1860年)的影响是这样大,以至于许多后来人没能意识到更宽的层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思想骚动在北欧的早些时代就能看到,尤其是在勃艮第和德意志的城市。在法国,除了引进意大利的风尚外,它展现出许多民族的特色。它的影响也并没限定在与意大利接[477]壤的邻居之间:例如,它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影响深于对西班牙的影响;并且在它触及东正教世界的领地之前它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奥斯曼帝国吞并的国家里文艺复兴的痕迹是轻微的;在莫斯科公国它们限定在少数的艺术模仿方面。事实上,通过给予拉丁西方世界新生,文艺复兴只是加深了东方和西方的鸿沟。

文艺复兴的原因既深刻又广泛。它们可能与城市的成长和晚期中世纪的贸易有关,与富有的和有权力的资本主义扶植者的兴起有关,与影响了经济和艺术的生命的技术的进步有关。但是,精神发展的源泉必须首先从精神领域寻找。在这里,教会的堕落,和对教会的传统教义的失望,成为主要因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根源同样地发现于思想的王国并非偶然。

[476]

列奥那多(LEONARDO)

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年)是一个左撇子,同性恋的工程师,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副业绘画。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和一位来自芬奇村庄的农村姑娘的私生子。他被普遍认为是所有欧洲“天才”中最多才多艺者。他的绘画中仅有一打左右流传下来,其中一些作品没有完成。但是它们包括一定数量的非凡的杰作,包括现存巴黎的《蒙娜丽莎》,现存米兰

的《最后的晚餐》和现存克拉科夫的《女士与水獭》。他的左撇子使他倒着书写，文字只能通过镜子阅读。他的性倾向使他供养了一个叫做萨莱（Salai）的寄生的伙伴，并且生活在长久的对陷害的恐惧之中。他的最有价值的遗产可能在于他的多卷的科学笔记，包括从来没见过天日的成千的设计和发明的草图和解释。[1] 毫不奇怪，他一直吸引着试图去测出他的天才的组成要素的人的注意力。他的名字具有被认为拥有他的特点的所有类型的杰出的欧洲人的清单中的特点：

左撇子	**大脑射线法测量容积**[2]（**根据** Brunler Scale 500＝“**天才**”）	**同性恋**
提比略	列奥那多，720	萨福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688	亚历山大大帝
巴赫	切罗（看手相者），675	尤里乌斯·恺撒
乔治二世	海林那·布拉瓦茨基，660	哈德良
纳尔逊	提香，660	狮心查理
卡莱尔	腓特烈大帝，657	波利齐亚诺 学者
智商估计值	拉斐尔，649	波提切利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90	弗朗西斯·培根，640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
歌德，185	伦勃朗，638	卡拉法红衣主教
T. 查特顿，170	歌德，608	亨利三世
伏尔泰，170	拿破仑，598	弗朗西斯·培根
乔治桑，150	肖邦，550	詹姆士六世和一世
莫扎特，150	格列柯，550	让—巴蒂斯特·吕里
拜伦爵士，150	拉斯普廷，526	克里斯蒂娜皇后
狄更斯，145	毕加索，515	腓特烈大帝
伽利略，145	墨索里尼，470	亚历山大·冯·洪堡
拿破仑，140	爱因斯坦，469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瓦格纳，135	弗洛伊德，420	柴科夫斯基
达尔文，135		王尔德
贝多芬，135		普鲁斯特
列奥那多，135		凯恩斯

在列奥那多去世之后，有人做实验再造他的天才。他的异母兄弟，巴托洛梅（Bartolomeo），从列奥那多的母亲的那个村庄选出一个姑娘，和她生下一个男孩，然后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最出色的画室中养育他。皮耶里诺·达·芬奇（Pierino da Vinci，1530—1553年）显示出了伟大的天赋：他年少时的画已经非常好以至于被错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但是在他的天才成熟之前他就去世了。[3]

十五世纪的新知识拥有三个新颖的特点：第一个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古典作家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过去没有吸引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的像西塞罗和荷马一样的人的影响。第二个是古希腊语教养作为拉丁语必不可少的伙伴的影响。第三个是基于原始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的批判性研究的圣经知识的增长。最后一项活动在世俗的文艺复兴和把重点放在《圣经》上面的宗教改革之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纽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基于古典原文的博学的考订迅速增长。在这里，领导地位再次地被授予了彼特拉克。薄伽丘（Boccaccio）、瓜里诺（Guarino）、费立尔弗（Filelfo）、布鲁尼（Bruni）、奥里斯帕（Aurispa）和那个不懈的收藏家和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G.F. 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都极力仿效他。波焦的对手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年）发表了《论拉丁语的逻辑性》，建立了西塞罗式拉丁文的权威，另外还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的历史虚假性。希腊传统，由拜占庭的前佛罗伦萨的希腊文教授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与诗人和《荷马史诗》的翻译者安吉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提倡，在1453年后随着希腊避难者浪潮和他们的手写稿的出现而得到促进。有影响地位的后代学者，在意大利是研究希伯来神秘哲学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和东方学专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和马尔西利奥·菲齐诺（Marsilio Ficino）。在法国是雅克·勒菲弗尔（Jacques Lefevre d'Etaples，1455—1437年）和纪尧姆·比代（Guillayme Bude，1467—1540年）；在德国是希伯来语言学家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年），云游骑士乌尔希里·冯·胡登（Ulrish von Hutten，1488—1523年），和腓力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年）。与科学的未来特别相关的是菲奇诺（Ficino）对亚历山大的炼丹术始祖（Alexandrian Hermes Trismegictus）著作的翻译。当这场运动顺利进行的时候印刷机获得了它的入场权。**[喀巴拉]** **[印刷业]**

这样的人文主义的活跃的圈子在所有重要地区扩散，从牛津到萨拉曼卡、克拉科夫和利沃夫。他们的扶植者从枢机主教博福尔（Beaufort）到枢机主教奥勒斯尼茨（Olesnicki），通常是显赫的教士。所有人，在他们对古代作家的研究方面，都是对他们的一个地位较低的教友安科纳的西里亚克（Cyriac of Ancona）的"内心的呼声"的回应："我要唤醒死者。"所有人都对他们之中最伟大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表示敬意。

[478] 盖哈尔托·盖哈尔茨（Gerhard Gerhards，约1466—1536年），一个来自于鹿特丹的荷兰人——他更为众人所知的是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笔名"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和"伊拉斯莫"（Erasmus），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最主要的实践者。在德文特（Deventer）的学者，在乌得勒支（Utrecht）的唱诗班歌手，坎布雷（Cambrai）的主教的秘书，伦敦和剑桥大学的经常的访问者，和巴塞尔的长期居民，伊拉斯莫"使自己成为神学院科学研究的中心……古典知识的博学和文学品位的试金石"[6]。印刷时代早期最流行的作家之一——他的愚人颂（Moriae Encomium，1511年）在他生前发行达43版——在把新人文主义同天主教传统结合方面他比任何其他人贡献都多。他的《基督教士兵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1503年）是再次的成功。像他亲密的朋友托马斯·莫尔一样，他如同柏拉图主义者那样是一个保罗派。他的希腊文《新约全书》（1516年）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的前言包括以下著名的话：

> 我希望每一位妇女都能阅读福音和圣保罗的使徒书。但愿能把他们翻译成每一种语言——不仅被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理解，而且被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理解。但愿农夫在他耕地时能够吟唱《圣经》的片段，织布工可以和着他的梭声哼唱《圣经》的词句……[7]

最具有吸引力的，也许是他多彩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教权主义特色的教士，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学者；一个伤害国王和君主感情的王室和帝国养老金的领取者；一个没有参加任何宗教改革活动的真正反对教会弊端的异议者；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书列在教会的禁书目录中达多个世纪，但是在英格兰、瑞士和荷兰自由地印刷。他既炫耀适度的文雅精神也卖弄粗浅的机智。"什么灾难会降临"，他问罗马的尤里乌斯二世，"如果至高无上的教皇，基督的代理人，试图效仿贫穷而辛苦的生活？"答案是"成千的抄写员，拍马屁者，赶骡人……和干坏事的人"将成为失业者。[8]"基督也是"，关于宗教法庭的暴行他写道，"制造出

来的一个傻瓜，为的是帮助人类的傻瓜。”[9]

伊拉斯莫极大地影响了时代的语言。他的带注释的《格言》(Adagia，1508 年）是全世界的早期的畅销书，为大众的生活圈子带来了 3000 多个古典的谚语和短语：

(to pour) oil on the fire	火上加油
(to send) owls to Athens	多此一举
to cut the throat of corpses	卡死人脖子
you are flogging a dead (horse)	打死马
(to put) an ass to the lyre	对牛弹琴
to plough the seashore	在海边耕地
to belch before the deaf	在聋子面前打嗝
to milk a billy goat	对公山羊挤奶
wise as far as the beard	有胡子一样多的智慧[10]

人文主义是给予更加广泛的理性运动的一个标签，这种理性运动[479]的新知识既是先驱者又是催化剂。它以从中世纪神学的或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向从人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的或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世界观的基本的转变为标志。皮科（Pico）所写的专著《论人的尊严》可以看做是它的宣言书。最后，它渗透到科学和艺术的所有分科。它的产生与人性的概念有关，与重新强调个人的惟一性和价值有关。它的产生与历史学的诞生有关，历史学是对变化过程的研究，并且由此产生了进步的观念；它与科学思潮的变动有关——也就是说，除非能对它进行实验和论证，不能把任何观念接受为真理的原则。在宗教思想方面，它是强调个人道德感的新教的先决条件。在艺术方面它与重新开始的对人体和对人的相貌的个性的兴趣相伴。在政治方面它强调反对基督教共同体的主权国家思想，并且从此开始强调现代民族观念。拥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独立存在的人的集体主义的对应物。**[国家]**

在对异端的古代传统的珍视方面和对必要的才能的重视方面，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同基督教实践活动的主导的方式和假定相抵触。不管它的意图如何，传统主义者相信它是宗教的破坏力量，应该受到限制。五百年以后，当基督教世界的瓦解更深入地进行时，许多基督教神学家把它看成所有退化的根源。根据一位天主教哲学家的话：

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增加的不同而在于减少的不同。文艺复兴……不是中世纪加上人，而是中世纪减去神。

一位美国新教徒更不宽容："文艺复兴正是那种反基督教观念的真正的摇篮：独立自主的个人。"一位俄国东正教徒是所有人中最不宽容者：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肯定人的独立性，和他在文化创新、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自由。此中包含着真理，因为最基本的是人的创造力应该跨越中世纪基督教加在它的道路上的障碍和限制。然而，不幸的是，文艺复兴也开始维护人的傲慢，并且开始在他和基督教的永恒真理之间制造了一条裂缝……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现代历史悲剧的源泉……上帝成为人的敌人，人成为上帝的敌人。[11]

由于同样原因，在近代有许多并不隐藏他们对基督教的蔑视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还有他们中间的无神论者——把文艺复兴赞誉为欧洲自由的开端。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恐惧。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看到他们的人文主义和他们的宗教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的现代基督徒也同意这一观点。[480]所有来自于文艺复兴的发展，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原教旨主义者把它们都鉴定成为与宗教相对立；然而基督教世界已经适应，并且包容了它们。留给人文主义自身的是，它将能一直在无神论中找到它逻辑的终点。但是主流的欧洲文明并不沿着那条极端的道路前进。通过所有接踵而来的冲突，在真理和理性、传统与创新、常规与信念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和不断变化的综合现象。尽管世俗主题的支配地位不断增长，欧洲艺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体一直热衷于宗教的主题；并且所有的杰出的大师都是宗教的信仰者。十分恰当的是，在漫长生命的尽头，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4—1564年）——佛罗伦萨《大卫》（1504年）的雕刻者，西斯廷小教堂的画家，圣彼得教堂圆顶的设计者——转向祈祷诗寻求安慰：

我生命的旅程已经开始，/乘着脆弱的船穿过暴风雨的海洋，/到达共同的港口，一个人在那里呼喊/给出我们所有的罪恶和虔诚的行为的讲述。/从那里，美好的梦想，/它使艺术成为我的偶像和君主，/我现在知道它是一船的错误，/并且看到了每一个人由于他受的伤害而发出的渴望。/那些爱的思想，曾经是轻松和快乐的，/如果现在双重死亡困扰我，它们会是什么？/我知道一个确切答案，而另一个却令我困扰。/绘画和雕刻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平静；/我的灵魂转向

热爱神灵/他，拥抱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十字架。[12]

在文艺复兴的思想方面教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人文主义者知道创造一个新人必须从儿童和学生时代开始。教育的专题论文和实践激增——从费尔特雷的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到伊拉斯莫的《王公的教诲》(Instruction of a Prince)。他们的理想，在坚持基督教教育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是发挥青年大脑的和身体的天赋。为了这个目标，体育同希腊文和拉丁文一起教授。人们把维多里诺（Vittorino）在曼图亚的学院看成是第一所新型的学校。较后的实例包括重新建立的伦敦的圣保罗学校。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以世俗合唱音乐和弥撒的复调配曲的同时出现为标志。杰出的大师，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s pres，约 1445—1521 年）和克雷芒·雅内坎（Clement Jannequin，1485—1558 年）——他们的作品在意大利和法国同样受到很高的评价，用声音描绘出风景[481]的全貌。像雅内坎的《鸟》(Les Oiseaux)，《巴黎的呼声》(Les Cris de Paris)，或者《马里尼安之战》(La Bataille de Marignan）一样的作品充满了快乐和活力。小曲艺术得到广泛发展，由古琵琶（lutenists）国际学派不断完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科书倾向于把这一时期分成三个简洁的时期。十五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创新”由十六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盛期的“达到的和谐”所跟随，并且此后由模仿性的过分强调的样式主义所跟随。伟大的创新人物包括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 年)，透视法的征服者，安德烈亚·曼太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10 年)——现实主义情节的大师，和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lotticelli，1446—1510 年)——风景画和人体形态天才的融合者。普遍公认的三位杰出的大师是列奥那多、拉斐尔·山蒂（Raphael Santi，1483—1520 年）和非凡的米开朗基罗。当然，模仿者也是大批的。但是模仿是一种谄媚的形式；人的相貌和身体的处理，场景和光线地的处理，都被改变了。拉斐尔的《圣母像》是与中世纪的圣像在精神上相分离的世界。

然而过分简洁的分期必定会遭到驳斥。一个原因是，创新在继续。在形式和颜色的运用方面没有比安东尼奥·阿莱格里（Antonio Allegri）（柯勒乔 Correggio，1489—1534 年)，威尼斯人提香（Titian，1477—1576 年)、雅各布·罗布斯提（Jacopo Robusti）［丁托列托(Tinoretto)，1518—1594 年］的大胆奔放的油画更具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或者比克里特人多明尼可·狄奥托可普利（Cretan Domenico Theotocopuli）［格列柯（El Greco)，约 1541—1614 年］——他经过从威尼斯

到托莱多，更具有创新能力。另一个原因是，北欧的艺术最初在勃艮第流行，强劲并且独立地发展。围绕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年），纽伦堡的卢卡斯·克拉那赫（Lucas Cranach of Nuremberg，1472—1553年），风景画家累根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菲尔（Albrecht Altdorfer of Regensburg，1480—1538年），和肖像画家奥格斯堡的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of Augsburg，1497—1543年）而形成的德意志画派，与南方有联系，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派生的画派。最后，人们不得不接受与延续的中世纪的传统有紧密联系的画家权威性的和有独到见解的观点。这要包括杰出的圣坛雕刻师法伊特·施托斯（Veit Stoss）或者维特·斯陶茨（Wit Stwosz，约1447—1533年）——他在德国和波兰工作，有神秘色彩的大师格吕内瓦尔德（Grunewald，约1460—1528年），富有想象力的荷兰人博斯（Hieronymus Bosch，卒于1516年）——带有对地狱的幻想，还有佛拉芒的"农民流派"画家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约1525—1569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通常情况下以对于哥特式风格的反动为特征。佛罗伦萨的"古典风格"有很多的倾慕者，这种风格的最早的典范发现于帕齐（Pazzi）小教堂（1430年）。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kkdio，1518—1580年）的古典别墅使欧洲的贵族着迷。他的精美的有插图的《建筑四书》（Quattro Libri della Architecture，1570年），出版于威尼斯，收藏于所有有声誉的图书馆。当火药使城堡成为过时的事物时，建筑资金用于宏伟的宫殿上面，显著的是在卢瓦尔的贵族的住所；也用于使自由民的家庭荣耀的市政纪念性建筑和德国和荷兰的四面临街的房屋区的有拱顶的建筑；并且用于从阿姆斯特丹到奥格斯堡，莱比锡到扎莫希奇（Zamość）的意大利风格的市政厅。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地方语言的发展为特征，它以各种方式见[482]证了世界的复兴。人文主义者探索性的著作在十六世纪让位于成熟的民族文学的兴起。事实上，在方言中通俗的文学传统的保存成为对现代民族特性的关键性贡献之一。这种传统在法国由七星诗社（Pleiade）的诗歌所发扬，在葡萄牙由路易斯·卡蒙斯（Luiz de Camoens，1524—1580年）所发扬，在西班牙由塞万提斯（Miguel Gervantes）所发扬，在荷兰由安娜·拜恩斯（Anna Bijns，约1494—1575年）和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kl，生于1587年）所建立，在波兰由扬·科哈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1530—1584年）所建立，在英国由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和戏剧家斯宾塞（Spensor）、马洛（Marlowe）和莎士比亚所发扬。在意大利——在那里传统更加悠久和强大，它由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年）和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年）所巩固。[个人主义]

不是所有的欧洲语言社区都产生了严肃的文学。那些落在后面的地区，尤其在德国、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仍旧专注于宗教追求。除了路德的著作和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1457—1527年）的《愚人船》（1494年），西里西亚人安德烈亚斯·格里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9年）和马丁·奥皮茨（Opitz，1597—1639年）——波兰国王史官——的诗歌，和冯·格里梅尔豪生（H.J.C. von Grimmelshausen，约1625—1676年）的流浪传奇式的小说《痴儿奇遇》(Simplicissimus)，加之宗教小册子和像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1657年）一样的流行的民间珍本之外，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德国出版物。在中欧，重要的文学流派仍旧用拉丁文写作。新拉丁诗歌的代表者包括德国的康拉德（Conrad Pickel），别名“采尔提斯”（Celtis）(1459—150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桂冠诗人；雅努斯·潘诺尼乌斯（Ianus Pannonius，1434—1472年），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弗拉卡斯多罗（Fracastorius，1483—1553年）阿尔恰蒂（Alciati，1492—1550年)；和普罗斯·丹提斯库斯（Ploes Dantiscus，1485—1548年）和亚尼斯库斯（Ianicius，1516—1543年)。

明显地，文艺复兴与早期的教会改革运动有某些相同之处。人文主义者和自命的改革家们厌烦僵化的教会观点，并且都遭到了来自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的怀疑。而且，通过提倡对新约的批判性研究，两者都引导年轻的一代梦想失去的早期基督教的美德，当然还有相当一些人梦想失去的古典时期的古老岁月。根据这种联系，而不是根据最恰当的比喻，过去有人说“伊拉斯莫生下蛋，然后路德孵化它”。

[483]

个人主义（SINGULARIS）

个人主义被普遍地宣称为“西方文明”的内在特征之一，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可能被宣称为个人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知道如何归属自己。每一个人都看他们前面的东西。但是我从内心观察自己，我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断地反映我自己；控制我自己；品味我自己…我们部分地归属社会，但是更大部分地归属自己。帮助别人是必要的，但是使自己归属自己也是必要的。[1]

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在柏拉图主义，精神上的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哲学中的唯名论里鉴别出来。[2] 但是主要的浪潮与布克哈特把卓越的个人描写为时代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一起到来。对于人的文化上的影响，对于个人道德的宗教上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上的影响，都把个人放在中心舞台上。从洛克（Locke）和斯宾诺莎（Spinoza）开始，启蒙运动详尽阐述了这一主题，直到“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进入欧洲人谈话的普通词汇之中。

在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理论沿着几条背道而驰的轨迹发展。康德曾经说过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是不道德的；留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y，1850 年）的是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调和。在《社会主义和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1898 年）中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用社会主义的术语进行了相似的工作。然而一直有人试图追求极端的事情。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Individual and His Property，1844 年）中，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谴责所有形式的集体，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社会”。在《社会主义之下的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 年）中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捍卫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绝对权利：“艺术是世界上知道的个人主义的最强烈的形式。”

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对个人主义进行蔑视。甚至在民主国家里，膨胀的政府官僚机构也经常压制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新自由主义的回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时期加快了步伐。它的领袖人物——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生于 1902 年），路德维希·冯·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03 年）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生于 1899）——都进行了移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1944 年）和《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Individual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1949 年）教训了战后的新保守主义者。一个热情的门徒曾经愤慨地宣布：“没有像社会那样的东西。”[3]

这样的过分行为倾向于把市民描述成商品、服务和权力的纯粹的消费者。政治有堕落成“抱怨的文化”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抗倾向由于同样历史悠久的责任的传统而使它再度加强。[4]

宗教改革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把宗教改革视为文艺复兴之

扩展。与人文主义不同，宗教改革借助中世纪最深刻的虔敬主义传统，以及对学者和大众都产生深刻影响的宗教复兴潮流。它的发动者是一群竭力维持大公教会完整性的人。最初他们加强这一运动，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统一的宗教。后来，其中的一支开始脱离这一运动。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的宽容精神毫不相干。因此，绝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同出一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来成为发展方向迥异的潮流。类似的分裂也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内部：最初是广泛的宗教复兴，但是后来却渐渐分裂为两股互相分离且彼此敌视的运动——后[484]人称为天主教改革和新教改革。

十五世纪末开始显明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神职人员的堕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厌恶。尽管名义上规定每 10 年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然而，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起，大公会议就一直没有召开过。冗长的圣徒队伍，圣·文森特（St Vincent Ferrer OP，约卒于 1455 年），锡耶纳的圣·伯纳迪诺（St Bernardino of Siena，卒于 1450 年），波兰的圣·卡西米尔（St Casimir，1458—1484 年）等人，都不能对教会整体极端缺乏圣洁的景况有丝毫改变。全欧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职人员——买卖圣职的主教、裙带关系的教皇、私生活极不检点的教士、闲懒的僧侣——最致命的是教会充满世俗的财富。

这时，在佛罗伦萨也出现了改革的先驱者。狂热的托钵修士杰罗拉姆·萨沃纳罗拉（Fra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 年）关于地狱之火的可怖的说教，引起了 1490 年的起义。这次起义暂时赶跑了美第奇，但结局却是这个修士被烧死。在西班牙，在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ardinal Cisneros）带领之下，宗教纪律同生机勃勃的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1498 年，在阿尔卡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cala）新成立的神学院中，诞生了多语圣经（1510—1520 年）。在意大利，在枢机主教加姆皮埃特罗·卡拉法（Cardinal Giampietro Carafa，1476—1559 年）——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神爱奥拉托利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1511 年）创建者之一——的领导之下，一批在罗马有重大影响的教会人士致力于热切的敬虔操练，他们建立慈善团体，从中产生了新的天主教会友组织——其中既不包括隐修院僧侣，也不包括托钵修士——如提阿提拿会（Theatines，1523 年），巴拿比会（the Barnabites，1528 年），耶稣会（Jesuits，1540 年），奥拉托利会（Oratorians，1575 年）。

宗教复兴运动的兴盛是与教会声誉的最低点——在教皇罗德里戈·德·鲍尔吉亚（Rodrigo de Borgia）（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92—1503 年）和焦里亚诺·德拉·罗瓦拉（Giuliano della Rovere）（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1503—1513 年）时期达到顶点——联系在一

起的。亚历山大的热情在于金子、女人和为其私生子谋权位。尤里乌斯"天生即热爱战争和征服"：他作为全副武装而参战的教皇、圣彼得教堂的重建者、教皇国的重建者而被人们纪念。1509年，为了偿还战争费用和修建圣彼得教堂，他到德意志发行赎罪券——一种为减轻人们在炼狱中所受刑罚的通行证。这时，正值一个来自萨克森维登堡之奥古斯丁隐修院的修士访问罗马。马丁·路德（Mathin Luther）对所见所闻极为震惊。"即使堕落者，"兰克（Ranke）写道："也可以达到圆满。"[13]

10年之中，马丁·路德（1483—1546年）成为第一次新教（Protestant）起义的领袖。路德维登堡神学教授资格的讲演显示出他"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已经孕育良久。路德是一个与自己内心的罪感激烈斗争的人，对当时温和的人文主义没有丝毫耐心。他脾气暴躁，极度粗鲁。他的话常常不能重复。对他而言，罗马即是所多玛的座位和启示录中的大兽（the seat of Sodoma and the beast of the Apocalypse）。

路德的愤怒由于兜售赎罪券的托钵修士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在德国出现而火上浇油。萨克森选帝侯不愿看到民众把大量金钱[485]送入教皇的口袋，于是禁止台彻尔在他的领土上兜售赎罪券。通过驳斥台彻尔的神学信条，路德支援了选帝侯的政策。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路德采取了他的致命的措施——在维登堡城堡教堂的门口钉上了《95条论纲》（a sheet of 95 Theses），或称反对赎罪券的论争。传统上认为如此。

这个著名的挑衅行为带来了一连串后果。首先，路德被卷入一系列公共论争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莱比锡（Leipzig）与冯·厄克博士（Dr. von Eck）的辩论（1520年7月）——这导致他后来被逐出教会。在准备过程中，他写下了路德主义的著名论纲——《解答》（Resolution）、《基督徒的自由》（*Liberty of a Christian Man*）、《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German Nation*）、《教会的巴比伦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of God*）；他公开烧毁了教皇把他赶出教会的教谕《主啊，求你兴起》（Bull of Excommunication, *Exsurge Domine*）。其次，德意志的权贵因支持和反对惩罚路德而分为两派。1521年，沃姆斯帝国会议（Imperial Diet at Worms）召开之前，在采取了保证措施的情况下，查理五世皇帝传唤路德。如同胡斯在康斯坦茨，路德坚定地为自己辩护：

> 我被我所引证的经文所征服，我的良心依从上帝的话语。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诚实…… *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之后，他被萨克森选帝侯的手下劫走，并被藏匿于沃特堡（Wartburg）城堡之内。帝国会议制定的对路德的禁令根本无法实行。宗教抗议变成政治暴动。

1522—1525 年，德国由于两次不满运动的爆发而产生震荡：特里尔（Trier）的帝国骑士的斗争（1522—1523 年）以及始于巴伐利亚瓦尔茨胡特（Waldshut）的农民战争造成的暴力的社会混乱（1524—1525 年）。路德违抗教会或许是政治权力分离的一个因素。但是，他对克里斯多夫·沙佩耶尔（Christoph Schappeler）和门明根的赛巴斯蒂安·洛策尔（Sebastian Lotzer of Memmingen）在士瓦本制定的农民《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s）毫无同情心。新的叛乱在图林根（Thuringia）发生时，路德发表《反对这些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Against the Murderous and 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s*），坚决维护社会秩序，拥护王公的权力。农民起义被镇压在一片血泊之中。

路德教派叛乱（Luthran revolt）在稍后的三次帝国会议中成型。皇帝的政敌们趁他被反对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困扰之时巩固了他们的地位。1526 年，在施佩耶尔（Speyer）帝国会议的协定宣言中，他们设法通过了著名的王公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谁统治，谁决定信仰）。1529 年，在第二次施佩耶尔帝国会议上，他们不满于协定，正式接受“抗罗宗”。1530 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他们发表了深思熟虑之后的信仰声明——由梅兰希顿（Melanchthon）起草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n of Augsburg）是抗罗宗的信条。之后，强硬派皇帝把 1531 年 4 月定为他们投降的最后期限。作为回应，新教的王公们组成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军事联盟。至此，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正式形成。[**歌曲**]

与此同时，路德派抗议运动被一系列相关事件推动着，它们拓宽[488]了新教主义的范畴。1522 年，瑞士的乌尔里希·慈温利（Huldrych Zurich，1484—1531 年）起来挑战天主教会的教义，同时也抨击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他是希腊主义者伊拉斯莫（Erasmus）的朋友，苏黎世的“人民牧师”。与路德一样，起初他谴责赎罪券，赞同路德因信称义的观点，同时拒绝承认主教的权威。他教导说，圣餐只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性仪式。他打着新教的旗帜，发动了反对天主教森林五州的战争，这导致瑞士联邦的分裂。1531 年，慈温利被害于卡佩尔（Kappel）。他开创了新教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方向，使得本地的堂会和组织争取到了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整体论**]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激进的布道者及其派别在德国扩展。曾经与路德

[486]

歌曲（GESANG）

马丁·路德对诗篇46篇的改编《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于1529年首次被克拉格（J.Klug）谱成音乐（《歌曲集》）。这表明"维登堡的夜莺"不仅是宗教改革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诗人和作曲家。这或许是最伟大的基督教赞美诗：

EIN' FESTE BURG 8 7 8 7 6 6 6 6 7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上帝依然是我坚固保障；
ein gute Wehr und Waffen,	是可信赖的盾牌和武器，
Er hilft uns frei aus aller Not,	他必救助我们脱离一切恶，
die uns jetzt hat betroffen,	这恶使我们受到攻击，
Der alt böse Feind	古老的地狱之王
mit Ernst er's jetzt meint,	为了永远沉沦而兴起；
gross Macht und viel List,	虽然现今他已经
sein grausam Rüstung ist	全副武装，充满诡诈与权力，一时猖狂；
auf Erd ist nich seins gleichen.[1]	在尘世却无人可与其相等。[2]

作为一个修士，路德对教会音乐非常熟悉。他有着优美的男高音，渴望所有的人都来分享音乐带给他的快乐。用音乐敬拜是他的礼拜仪式的组成部分，这和他的所有的信徒都可联合的神学观点一致。他花费很多时间来制作音乐。他的《弥撒规范》（Formula Missae，1523年）改革了拉丁弥撒，为以后瑞典的公祷文打下了基础。1524年，他的学生J.沃尔特（Walter）发表的《灵修歌本》（*Geystliche Gesangk Buchlein*）为人们提供了一本多语赞美诗诗集。1525年，路德把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出版社迁到维登堡（Wittenberg）。他的《德国弥撒和礼拜秩序》（*Deutsche Messe und Ordnung Gottesdienst*，1526年）创立了通用语弥撒的模式，以胡斯派的赞美诗《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Jesus Christus，unser Heiland'）结束。海因里希·卢夫特的《指南》（Heinrich Lufft's Enchiridion，1526年）是第一本新教团体赞美诗集。沃姆斯帝国会议

结束之后五年内，路德的追随者都已被音乐武装起来。

路德派的音乐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要求每个教区必须有自己的指挥、风琴弹奏者、唱诗班，及一支训练歌手和演奏乐器者的队伍。结果，这对使德意志成为欧洲音乐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欧洲最丰富的世俗音乐之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才的 J.S. 巴赫发现路德主义是产生音乐最丰富的土壤。[487]

有这样一种假说存在：德语及其韵律植根于德国卓越的音乐。这种说法可能对，也可能错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路德在 1525 年说过："不管是课文还是笔记，音调，悦耳的旋律，抑或是演奏，都应从正确的母语和对它的反映中产生。"路德重点强调本国语言的应用，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德国的教育事业。许多人与赞美诗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如路德、瓦尔特（Walter）、罗（Rhaw）和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utz，1585—1672 年），以及后来著名的巴赫（Bach）、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舒伯特（Schubert）和勃拉姆斯（Brahms）。

毫无疑问，赞誉路德宗传统的独立，是对天主教的音乐的损害，并且对各种教会传统带来了富有成果的影响。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加尔文宗的贫瘠的音乐——禁止"教皇式的复调音乐"，使日内瓦赞美诗集（1562 年）成为一个韵文齐唱的集合——就能看到路德对音乐的创造性贡献。[3]

英国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路德的音乐，由泰利斯（Tallis）、吉本斯（Gibbons）和伯德（Byrd）发动，形成了令人惊叹的传统。以极度的简朴著称的泰利斯的《正典》，由一个沃尔瑟姆修道院的僧侣后来成为皇家小教堂卫士的修士作曲，是安立甘宗的"坚固保障"（*Ein' feste Burg*）。它由八部分组成：



我的神啊，今夜，荣耀归于你，
因你所有光明的赐福。
万王之王啊，保护我，保护我
用你大能的膀臂覆庇我。[4]

[488]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东正教悠久伟大的音乐传统，他们和路德同样，把复调音乐应用得异常灵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禁用乐器反倒促进了合唱重唱技艺的发展。天主教通常允许使用乐器，1320年以来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教堂乐器，至今仍在瓦莱（Valais）的锡昂（Zion）堂使用。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复调音乐仍然仅靠人的声音而发出形成，因此，培养了一种欣赏音乐同时也制作音乐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巴赫一样，柴科夫斯基（Tchaikovsky）并不是偶然产生的。

发生过争论的安德烈·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1480—1541年）到了巴塞尔。“慈维考（Zwickau）的先知”——施托黑（Storch）、施图布纳（Stuebner）和托马（Thomae）——是旧式的千禧年论者。神秘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entzer，1490—1525年）身兼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双重特征，模仿捷克的塔波尔派（Taborites）组建他的团队。流浪许久之后，因他曾经在农民战争期间作过劫富者的领袖，在图林根（Thuringia）被捕，并被处决于米尔豪森（Muhlhausen）。在沮丧的慈温利主义者之中涌现出一些再洗礼派（Anabaptists or Rebaptists）信徒。他们拒绝一切已有的权威，宣称以前所有的洗礼都为无效。他们还试图建立一个建立在福音原则之上的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国，戒除誓言、财产和一切暴力（仅仅在理论上）。1534—1535年，在两个荷兰人——哈莱姆的简·马赛厄斯（Jan Matthijs）

[489]

整体论［HOLISM］

1528年2月，神奇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Dr. Paracelsus）丧失了巴塞尔城市医师的短暂职务。之前他已经被从大学赶出，他得罪了药剂师公会，还曾经因未付他全额教授费用而控告过一个高级教士。他公开指责地方官员有偏袒。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时，他逃走了。无论是当时的经院医学，还是后世公认的科学医学，

都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腓力普·奥若路斯·提奥弗若斯特·鲍姆巴斯特·冯·霍恩海姆(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41年),一般称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出生于施维茨州的艾恩西德尔恩(Einsiedeln in the canton of Schwyz)。他和路德、伊拉斯莫(Erasmus)、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处于同一时代。1524年,他毕业于费拉拉的医学院,后来,他放弃了进一步学习,花了七年时间旅行,学习关于草药医生、吉普赛人和魔术师的知识,以庸医身份谋生。他访问过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可能还去过埃及。他曾经是个天主教徒,和激进派别如再洗礼派(Anabaptists)、自由圣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保持经常的联系。1525年,由于支持农民暴动,在塞兹堡(Saizburg)被捕,当时他几乎难以逃脱死刑。离开巴塞尔后,他长期停留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纽伦堡(Nuremberg)、圣加仑(St Gallen)的罗尔的麦兰(Meran in Tyrol)、圣莫里茨(St Moritz)、巴特普法伊弗尔(Bad Pfeifers)、奥格斯堡(Augsburg)、摩拉维亚的克里茂(Kromau in Moravia)、布拉迪斯拉发(Brastislava)、维也纳(Vienna)和维拉赫(Villach)。从神学到魔术,他在每个领域都是多产作家——其代表作《超越奇迹之作》(*Opus Paramirium*),是他作品中的奇迹。

帕拉塞尔苏斯抛弃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观念——医学知识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巴塞尔,他和一些学生一起烧毁了阿维森纳(Avicenna)的作品。然而,他也主张,一方面应从实际观察中学习,另一方面,也应当从"四支柱"——自然哲学、占星术、炼金术和品德(这里指人、植物和矿物天生的力量)中学习。他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他在截肢、消毒、顺势疗法、浴疗学的技术和实际治疗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另外一个领域,他发明了基于硫、盐和汞的可选择性生物化学系统,这也使他永远背负了巫师的名声。欧洲医学界花费了超过400年的时间来接受他的整体论观点——好医生寻求影响病人整个身体健康之所有因素的和谐,包括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和超自然因素。

帕拉塞尔苏斯生活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了解消化、循环、神经和生殖系统的功能,更不用说基因和染色体了。尽管如此,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仍然是贯穿数世纪的:

男人和女人各有半个种子,这两半组成一个完整的种子……子

宫里有一种吸引力（像琥珀或磁铁）……一旦意志决定，子宫就会将女人种子和男人种子的心脏、肝脏、脾脏、骨骼、血液……（所有这些都在人身体之内）各部分结合在一起，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种子，但当所有这些种子结合在一块儿时，它们仍然只是一个种子。[1]

和莱顿的简·白克兹（Jan Beukelz）领导下，他们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Munster）建立了“被拣选者王国”，后来，被残酷镇压。装载他们领袖遗体的牢笼，至今仍悬挂在拉姆伯特（Lambert）教堂的尖塔上。再洗礼派是基督教最激进的基要派信徒，不仅受到天主教的镇压，也受到新教的迫害。他们在弗瑞斯兰德（Frieslander）和门诺·西门（Menno Simons，1496—1561年）领导下，重组为门诺会（Mennonites），它撒下了浸信教徒（Baptists）、惟一神教派信徒（Unitarians）和教友派信徒（Quakers）的种子。另一方面，基督唯灵论派信徒（Christian Spiritualism）则得到巴伐利亚迪肯派（Bavarian Denckians）、士瓦本弗兰克派（Swabian Franckians）和西里西亚斯昆克菲迪安派（Silesian Schwenkfeldians）的支持。

[490] 152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颁布命令，宣布英国教会同罗马分离。这一行动的初始动机是亨利无男性后嗣而教皇又不准他离婚。先前，亨利曾因谴责路德而获得“信仰保护者”（Fidei Defensor）之誉。他缺乏宗教感情，但他通过打击教会特权和没收教会财产，取得了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巨大的物质利益。《初税法案》（Act of Annates，1532年）切断了罗马的财源。《上诉法案》（Act of Appeals）削弱了罗马对英国的司法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1534年）则完全废止了教皇的权威，使英国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由于拒绝承认这一权威，托马斯·莫尔（Thonas More）和枢机主教约翰·费舍尔（Cardinal John Fisher）等人以叛国罪被处死。《十条信纲》（Ten Articles，1536年）和《六条信纲》（Six Articles，1539年）宣扬罗马弥撒和传统信条的神圣不可侵犯。教会和国家的联合——后来被称为国家全能论——使得安立甘主义（Anglicanism）在实际上更接近东正教而非天主教。**[乌托邦]**

1541年，宗教改革的第二阶段，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被说服掌管日内瓦的教会。加尔文是一个逃亡的法国人，比路德更为激进。他建立了新教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分支。他受过勒费弗·戴塔普尔（Lefèvre d'Étaples）的影响，做过天主教的律师，还曾经受到昂古来姆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Angoulême）的保护。在听过

[491]

乌托邦 [UTOPIA]

乌托邦意指"不存在的地方"，是1516年托马斯·莫尔爵士为他的书起的名字。这本书描写他如何寻找一个理想的政府形式。1551年被译成英语。作者殉难之后，《乌托邦》成为一本有成果的、令人愉快的、机智的、公共福利的国家的著作。《乌托邦》同时也被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这本书非常畅销。在书中，莫尔描写了这样一片大陆：财产共有，男女普遍受教育，所有的宗教都被允许存在。[1]

乌托邦主义是人们深切向往理想世界的反映。这种理想曾吸引过很多实践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哈林顿的《大洋国》(*Oceana*)。这些想法可能都来自于对"迪斯托邦"(*Distopia*)或坏地方的恐慌的想象。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年）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年》(*Nineteen Eighty—Four*, 1949年）中也有类似的意图。二十世纪，乌托邦主义通常与左翼思想联系在一起。苏联被其崇拜者广泛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乌托邦，没有资本主义专制的罪恶。一个美国的拜访者在1919年说过："我曾经预测未来，现在它实现了。"此种观点由于许多人以"社会主义"和"进步"为口号实行大肆杀戮而失去市场。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则转向更多平凡的工作，来促使更多人有更好的生活。[2] **[收获]** **[沃尔库塔]**

有人说法西斯主义也有它的乌托邦，这不易为人接受。最初的野蛮的征服之后，如同许多共产主义者一样，许多纳粹党人梦想一个和谐而美好的未来。例如，法国作家魏科尔（Vercors）详述了占领法国的一位德国军官的沉默，他梦想法兰西—德国联邦的辉煌的未来。"它是美女与野兽的较量。"[3] 战后，在东欧共产主义者的监狱内，许多因反对共产主义而被捕的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演与他们同狱的已被定罪的纳粹同伙的破灭梦想。[4] 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一样，法西斯的乌托邦，是荒谬的，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确有一些人诚心梦想过它。**[拉脱维亚]**

巴黎大学校长尼考拉·克普（Nicholas Cop.）的一篇关于圣经权威的布道之后，他接受了新思想。由于惧怕受到镇压，他辞去了出生地努瓦荣（Noyon）的带薪圣职，逃至巴塞尔，在此处发表他的神学著作

《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在书中，加尔文表述了他最初关于神学、教会与国家关系、尤其是有关个人道德问题的思想。在圣餐礼仪上，他更接近于路德而非慈温利，但他重新发展了预定论的教义，这是振聋发聩的。他认为人类分成两部分：被遗弃者和被拣选者，并以此教导他的弟子，视他们自己是一群被敌视他们的世界包围的公义的弟兄，少数的精兵，“罪人中的异类”：

Ainsi les Bourgeois du Ciel n'aiment point le Monde, ni les choses qui sont au Monde...il s'écrient avec le Sage: 'Vanité des Vanités; tout n'est que vanité et rongement d'Esprit'.(天国的子民不爱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他们与先知一起呼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和灵魂的毁灭。”)[14]

在教会组织上，加尔文的改革也远远超过慈温利。他不仅主张政[492]教应分离，而且还强调地方信徒联合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期望通过强化宗教观念、由教会实施审判来取代现世的权力。因此，在宗教容忍的问题上，他并不比亨利八世的宗教法庭（Inquisition）更灵活。[**糟浆**]

在伦理方面，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独一无二的规则，这使得他的追随者们可以毫不费力的被辨认出来。一个良好的加尔文主义家庭厌恶一切形式的欢乐和轻率——跳舞、唱歌、饮酒、赌博、调情、艳丽的服饰、娱乐书籍、高声谈话、哪怕仅仅是活泼的姿势。他们生活以严肃、自制、努力工作、节俭——最重要的是圣洁——而著名。其选民身份通过外表、行为、教会活动和属世的成功而得到证实。在原来天主教罪的束缚之外，他们又增添了新的束缚——保持良好的外貌。艺术上，他们禁绝一切对上帝的直接刻画、所有神秘的记号和寓言。他们只是在每日的读经中寻觅快乐感并作为日常行为的指导。在英语世界中他们被称为清教徒。

直到 1559 年版《基督教要义》出版和 1566 年 H. 布林格(Bullinger, 1504—1575 年)（慈温利在苏黎世的继承人）起草的《第二次海尔维希信条》（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发表，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才最终完全形成。

泰奥多尔·比札（Theodore Beza, 1519—1605 年)——加尔文的学生、希腊学者、神学家——介绍了一种严格的预定论。这种预定论遭到杰克伯·赫曼斯（Jakub Hermans)、荷兰莱顿的教授阿米纽斯(Arminius, 1560—1609 年）的追随者的激烈反对。阿米纽斯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基督死亡之功效达至全体信者，并非仅为选民而设立。

[493]

糖浆 [SYROP]

1553年8月12日，星期六，一个逃亡者从宗教裁判所逃至日内瓦法语区内一个叫路易赛（Louyset）的小村庄。四个月之前，他曾因异端罪在里昂被捕，经过日内瓦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被判处死刑。他从监狱逃跑，从此一直颠沛流离。他打算乘小船从日内瓦穿越湖泊，去往苏黎世。日内瓦是加尔文的根据地，苏黎世则是慈温利主义者的天下。

被捕之前，这个逃亡者曾经是维也纳大主教的私人医生。他是纳瓦尔人，曾在图卢兹、巴黎、卢万和蒙彼利埃学习过。他曾写过好几本医学论著、《托勒密地理学研究》和两本反对三位一体论的神学著作——《论三位一体论之谬误》(1521年）和匿名的《基督教的恢复》（1553年)。过去的八年，他一直有些怨恨地与有一面之交的加尔文通信。[1]

星期天，他出售了自己的马之后，步行进入日内瓦。他发现在拉罗斯（La Rose）教堂有一个房间在进行下午敬拜，于是走进去参加。在教堂，他被人认出，旋即被送交宗教裁判官。次日上午，他面临从一个加尔文主义的审讯者而来的、与当初从天主教的宗教裁判官而来的相同的问题。他就是维拉诺瓦的修士米格尔·塞尔维都（Fr. Miguel Serveto de Villanova)，又叫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年)。

加尔文对待塞尔维特的行为温和地说不是基督徒应作的。他曾经警告他不要到日内瓦，甚至向市政当局告密，提供给里昂宗教法庭塞尔维特与他通信的样品。现在，他把日内瓦宗教宽容的法令抛在脑后，宣布塞尔维特应被斩首。但是，由于法院的命令，他于12月27日在卡佩尔（Champel）被烧死。

激进的思想者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安全之地。俄国的东正教会烧死了"犹太教徒"，拜占庭也有宗教裁判所。焦耳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r，1548—1600年)——哲学家、多米尼克修会的背教者，还可能是英国的间谍，在罗马的火刑柱上被烧死。[2] 波兰—立陶宛（Poland—Lithuania）是与世隔绝的避难所，在那里，自从1565年以来，主教法庭一直不能执行他们的判决。反三位一体论者在迁移至波兰之前，滞留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他们的领袖、经常被同塞尔维特对比的西奈斯·福斯特·索兹尼（Siennese Fausto Sozzini，1539—1604年）也曾经住在日内瓦。在那

里，他登记加入意大利教会，并保持缄默。

塞尔维特死后很久，他仍被认为是新教和天主教的相互依赖的偏执的牺牲品。在马德里（1876年）、巴黎（1907年）、维也纳（1910年），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假如他能活得更长一些，他将会欣慰地发现，他的药用糖浆著作《一般比例的糖浆》（*Syroporum Uinversa Ratio*，1537年）已成功地出版了四次。

新教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影响的加深。

路德教派直接导致独立自主的王公的出现，它肯定维持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的合法性。这个原则在一些州很快得到实行——最著名的是在符腾堡（Wurtemberg）、黑森（Hesse）、安哈尔特（Anhalt）、萨克森选帝侯区（electoral and ducal Saxony）、诺伊马克（Neumark）和波莫瑞（Pomerania）——从不来梅到里加的绝大部分北德城市。1540年，路德建议以这位新信仰的主要保护者"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的形式，赦免了黑森的腓力普（Philip of Hesse）的重婚罪，这使宗教改革运动陷入长久的危机之中。直到颁布《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1580年），长达数十年的严格的原初路德宗和比较自由的梅兰希顿宗之间的分歧才暂告一个段落。在丹麦和挪威，经过"丹麦的路德"汉斯·托森（Hans Tausen）的布道，路德宗于1537年成为国教。这也使瑞典永远脱离了丹麦——在瑞典，直到1593年，路德宗的国教地位才完全确立。同时，这也加速了普鲁士和立沃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国家（Teutonic States in Prussia，1525年；and in Livonia，1561年）的崩溃。

相比之下，加尔文主义则与特定的社会团体关系密切，与国家政治联系较少。在西欧，加尔文主义通常有助于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在法国，对划分出来一部分贵族的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东欧，对[494]土地乡绅和地主都有影响；在英格兰王国，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之后，加尔文主义开始发挥作用；男孩国王爱德华六世的统治给英国带来许多混乱；极端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大批新教徒殉难，在牛津尤其明显；之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教会事务部通过了《信仰划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1559年）和《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1571年），使教会解决办法神圣化，对埃拉斯特主义者（Erastian）、路德派（Lutheran）、慈温利派（Zwinglian）、加尔文派（Calvinist）和传统的天主教慎重地进行综合。从此，安立甘宗经常为两种主要的政治神学倾向——盎格鲁天主教的"高教会"（High Church）和加尔文福音主义的"低教会"（Low Church）——撑

起保护伞。尽管伊丽莎白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但是不遵从国教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还是被秘密保存下来了。后者在十七世纪得到重新复兴，1649—1658 年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苏格兰，由于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1572 年）的努力，1560 年，采用长老制（Presbyterianism）形式的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惟一合法的宗教。但是，尽管有安立甘宗的影响，苏格兰教会（Kirk）仍保持独立。

在法国，加尔文主义者被称为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先前他们在原先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地区西部和南部所有省的市民中迅速传播。宗教战争中，他们成为波旁党（Bourbon Party）的中坚，并成为法国宗教场景的基本象征。直到 1685 年，他们被完全驱逐。

在尼德兰，加尔文主义的兴起，尤其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莱顿的市民之中，是西部天主教省和东部联合省分裂的关键因素。自从 1622 年被确立为国教以来，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在国家中担当了关键角色。

在德国，长期以来，加尔文主义受到路德派和天主教的联合反对，它主要从帕拉丁选帝侯（Elector - Palatine）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1563 年，他要求他的全体属民使用《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 萨克森的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卒于 1591 年）、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1613 年皈依新教）得到支持，勃兰登堡—普鲁士对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浮士德]

在波兰—立陶宛、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加尔文主义促进了土地贵族——它在一些地区，如特兰西瓦西亚（Transylvania）和切申公爵领地（the Duchy of Cieszyn）被证明非常牢固——的广泛分裂。从此，匈牙利的德布勒森（Debrecen）成为“加尔文派的罗马”。在立陶宛，加尔文主义得到许多大土地贵族的支持，其中包括欧洲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拉兹威利家族（the Radziwills）。

在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发现新教的影响。新教强调阅读圣经的必要性，这对他们国家的教育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也提高了民众的欣赏能力；经济方面，新教对发展积极进取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政治上，它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家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是主要争端；它把天主教世界一分为二，促使罗马天主教不得不进行已经拖延良久的改革。最重要的，它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理想主义予以致命一击：1530 年之前，基督教世界[496]已经分裂为两部分——东正教和天主教；1530 年之后，它正式分裂

为三部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内部则分裂成更多相互竞争的派别，他们竭力互相攻击，分裂也越走越远，以致人们不再谈论基督教而开始谈论“欧洲”。

[495]

浮士德 [FAUSTUS]

浮士德博士在现实生活中是流浪汉、江湖医生和露天市场表演的魔术师，1541 年在布瑞斯高的斯托芬（Staufen in Breisgau）去世。他宣称和哥白尼一样是克拉科夫大学的学生，经常出入德国众多大学，自称是教师乔治·萨贝里科·小浮士德。他因亵渎神明、变水为酒的“神迹”、声称能与魔鬼联盟等变得臭名昭著。他的“成就”激发了一股所谓浮士德书的潮流。第一本浮士德书于 1587 年在法兰克福编辑成册，1588 年被译成丹麦语，1592 年被译成法语和荷兰语，1594 年之前被译成英语，1602 年被译成捷克语。

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浮士德在 1594 年由克里斯托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主演的剧作中首次与观众见面。在这部剧作中，他以一个有着翻天覆地之野心，梦想成为“伟大的世界皇帝”的人物出现。魔鬼收回自己的权力之前他一直享有权力。在德国，他是莱辛编写但已失传的剧作和克林格尔（F.M. Klinger）于 1791 年写的小说之中的角色；之后，被歌德的两大部诗歌悲剧（1808 年，1832 年）和费尔普奇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未完成的歌剧《浮士德博士》选定为主角。

歌德的《浮士德》不能予以简单的概括。浮士德同答应让他回春的靡非斯特立约，他可以活到 100 岁。还给我的青春！第一部分是关于浮士德的个人感情的“小世界”，他被卷入对恶魔的责任与对甘泪卿的爱之间的角斗之中。第二部分是关于对待社会和政治的“大世界”。他是骄奢无能的皇帝的大臣。他死亡之时，甘泪卿出面干预，恶魔被骗；天堂的乐队欢呼增添了一个得救的灵魂，爱胜利了：

> 很久以前就已经相爱的人啊，
> 不要再疑惑，回来吧！[1]

歌德的杰作激励了古诺（Gounod）和柏辽兹（Berlioz）的两部歌剧和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1857年)。近代，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的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年) 复兴了对现代德国严厉批判的做法。受瓦格纳 (Wagner) 和尼采 (Nietzscher) 蛊惑的音乐家阿德里安·利沃昆 (Adrian Leverkühn),从一个致命的女人那里传染了梅毒,在创作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清唱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叹》之后死去。清唱剧的结束之处,渐弱的大提琴独奏《黑暗中的光》,暗示着德国文明或许毕竟没有完全衰落。[2]

反宗教改革 这是新教徒给予的名称,他们认为它是由于反对新教宗教改革而产生的。天主教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将其看做一个教会改革运动的第二阶段,它从十四世纪晚期的宗教会议派 (conciliarist) 到特伦特宗教会议 (Council of Trent) 有着连续的历史。然而必须强调,反宗教改革不是某种孤立运转的自给自足的历史发动机。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它与这个时代的所有的重大现象是相互作用的。

在天主教会中心软弱的统治在保罗三世 (Paul Ⅲ)(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 Alessandro Farnese, 1534—1549年) 任教皇时期更为松弛。以"穿裙子的枢机主教"而闻名,保罗三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任人唯亲者,一位教皇姘妇的兄弟,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的慷慨赞助保护人。在同时他也看到改变的紧迫性。他恢复了教廷枢密院 (Sacred College) 的活力,委任了对教会改革的关键调查的"教会纠正委员会"(Consilinm de emen dunda ecclesia, 1537年),保护赞助耶稣会,建立宗教法庭 (Holy Office),发起了特伦特宗教会议。直到1530年代教廷枢密院由枢机主教们组成并选举教皇,是教会传统软弱的支柱之一。但是随着它预算的削减,和它的数目由于几次明智的任命而增加,它成为梵蒂冈 (Vatican) 改革的发动者。它杰出的人物包括枢机主教卡拉法 (Caraffa, 后来的保罗四世 [Paul Ⅳ], 1555—1559年),切尔维尼 (Cervini, 后来的马尔塞勒斯二世 [Marcellus Ⅱ], 1555年) 和英格兰人雷金纳德·波尔 (Reginald Pole),他在1550年以一票之差没能当选教皇。下一轮教皇属于一种不同的类型。庇护四世 (Pius Ⅳ, 1559—1565年) 毫不迟疑地将他前任有罪的侄子们处以死刑。严厉而狂热的庇护五世 (Pius Ⅴ, 1566—1572年),以前是 (西班牙的) 宗教法庭庭长,他赤脚在罗马走路,后来被封为圣徒。格列高利十三世 (Gregory ⅩⅢ, 1572—1585年) 欢庆圣巴托罗缪之夜 (St Batholomew's Eve) 的大屠杀,完全是政治性的。

耶稣会被称做是天主教改革的"精兵"(corps d'élite)。它结合了狂热的虔诚和军事生活方式,是来自它的巴斯克人创立者伊尼戈·洛

佩斯·德·里卡尔德（Inigo Lopez de Recalde，1491—1556 年），后称圣伊格纳修斯·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精神训练》（1523 年）的作者。在 1540 年由保罗三世的训谕《教会的军事管理》（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批准了它，它在教皇的直接命令下行事。它的成员在将军领导之下按等级组织起来，并被训练成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同伴”，他们的目标是使不信教育者皈依，使步入歧途者重新皈依正确信仰，并首要的是进行教育。在他们成立的头几十年中，他们的传教者就出现在从墨西哥到日本全世界各地。他们的学院出现在信天主教的欧洲的各个角落，从布拉甘扎（Braganza）到基辅。伊格纳修斯说：“我没有留下军队，我只是支持为上帝服务。”在另一处又说：“给我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将永远是我的。”在他被封为圣徒时的说法是：“伊格纳修斯有一颗大得足以掌握宇宙的心。”[15]

[497] 尽管他们有这些成功，耶稣会士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厌恶，无论在天主教徒中还是在新教徒中，他们以在争论中的诡辩术而闻名，并广泛被认为主张“目的决定手段正确”，他们被看成是教会的秘密思想警察，不对任何人负责。在 1612 年的克拉科夫就已经出版了伪造的《秘密训条》（Monita Secreta），意在揭露在可怕的将军阿夸维瓦（Acquaviva）“黑教皇”领导下他们世界范围阴谋的训念。耶稣会在 1773 年被取缔，但在 1814 年又恢复起来。

宗教法庭作为异端事务的上诉最高法庭，在 1542 年建立。它由主要的枢机主教组成，它对异端裁判所进行监督，并在 1557 年发布了第一个《禁书目录》。在 1588 年它成为罗马教廷九个重组的常设委员会或行政部门之一。它与传信部（Offic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即担负转变异教徒和异端信仰的部门一道工作。**[禁书目录] [宗教裁判所] [宣传]**

特伦特宗教公会聚会了三个会期，1545—1547 年，1551—1552 年及 1562—1563 年，它是教会改革者们几十年来一直祈求的全体宗教公会。它提供了各个教义上的定义和各种制度的结构，使罗马教会得以复兴并应付新教的挑战。它关于教义的信条大部分是保守的。它确定只有教会能够解释《圣经》，宗教的真理既源自《圣经》，也源自天主教的传统，它确认原罪、释罪、善功的传统观点，拒斥新教对于“圣体”变化的各种其他说法。它关于组织的信条改革了教会的僧团，调整了任命主教的原则，在各主教区建立了神学院。它关于弥撒形式的信条，包含了一个新的教理问答和一个新的《祈祷书》，最直接地影响到普通天主教徒的生活。在 1563 年后同样的特伦特信条的拉丁语弥撒在全世界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堂都能听到。

特伦特宗教公会的批评者们指出，它忽视了实际的道德，它没能

[498]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

十六世纪的塞维利亚，耶稣基督回到尘世，被逼着展示奇迹。他立刻被逮捕了。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亲自对囚犯进行审讯。“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惹是生非？”他没有得到回答。

在许多反控诉中，宗教裁判所法官指控基督以“自由意志”作为赠礼误导人们。人在本质上是个反叛者，若给他选择他会选择下地狱的道路。他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好，人们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由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你忘了一颗平静的心和一种平静的死亡，对人比知道善与恶的自由更宝贵吗？”

并且，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宣称，历史的事实支持他的主张。人们在抵抗诱惑上太软弱，因为一千五百年来，他们陷在罪恶和不幸中，不能够紧跟基督的指示。“你许诺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在软弱、邪恶和常常是无知的人类眼中，它怎能与地上的面包相比呢？我们比你更讲人道。”

宗教裁判所法官指控基督没有击退魔鬼的挑战，没有能证明他的神性。他没能经受秘信、奇迹和权威的三重考验。教皇在事实上是秘密地站在魔鬼一边的。宗教裁判所法官表示：“我们一直和他在一起，而不是和你。”并指出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Schism）“已经八个世纪了”。

宗教裁判所法官痛苦地预言没有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你知道许多世纪过去后，人类将会宣告……没有罪行，因此也没有罪，只有饥饿的人们？”先让人们吃饭，再来要求美德！“这就是他们写在旗帜上，将举着它去毁掉你的神殿。”

在宗教裁判所法官的地牢里，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他告诉基督：“你已从地狱中被赶出来。你是个异教徒。明天我将烧死你！”

在最后一刻，基督的宽恕胜利了。基督亲吻了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面颊。被爱的力量所征服，宗教裁判所法官变宽厚了，监狱的门打开了……

这样一个摘要可以作为一个学生对“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的按语。这个“传说”的创造者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作者伊凡·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他与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生活在1860年代。卡拉马佐夫家族自己的家世故事像这个“传说”，构成它的中心情节之一，提出了善与恶的永恒问题。父亲卡拉马佐夫是一

个下流放荡的人，而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已经反叛了。德米特里的同父异母兄弟伊凡和阿辽沙，分别是怀疑论的无神论者和信任乐观主义的人。但是第四位是个私生子斯米尔狄亚可夫或“讨厌家伙”，在父亲要杀他自己之前杀死了父亲。在审讯中，伊凡为唆使这个行为的罪恶所折磨，企图承担责任。但是在一次残忍的错误判决中，无辜的德米特里被判有罪。在最后一个场景中，这个家庭的孩子们显示他们的长辈们是怎样和睦共处的。[1]

[499]

《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的创作者是费奥多尔·陀思妥也夫斯基[2]，在其中他重写了许多这类题材，并贯穿了他终生的写作。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观点，它是“已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对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造物主，陀思妥也夫斯基是没有怀疑的。

陀思妥也夫斯基创造了这个宗教裁判的大法官的传说，用以表达欧洲文学中对基督教会最深刻的批判。在其中他预感到对极权主义道德上的反对。他想象了一个虚构的事件。它很好地描绘了作者反天主教的偏见，但也有他对基督教世界实质上的统一的信仰。

在表面上，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不喜欢“冷酷无情的”犹太人，他藐视天主教徒，特别是波兰人，他经常将他们描写成罪犯，并且他憎恨社会主义者。他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看作如它的名字所宣称的，即惟一真实的信仰。他宣称，“在西方不再有任何基督教，天主教本身已转变为偶像崇拜，而新教迅速地变为无神论和各种伦理”，[3] 据称他的公式是：“天主教=统一而没有自由，新教=自由而没有统一，东正教=统一中有自由，自由中有统一。”

许多批判者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使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论证比基督的更为有力。在教会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中，信仰看来会失败。这也许是他的意图。因为他将逻辑看得比信仰要低得多。他曾经写道：“甚至如果向我证明基督处于真理之外，我仍会与基督在一起。”[4]

陀思妥也夫斯基对西方的批判是坚持不懈的。（这可以解释他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声望的评价）而他认为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是恶的一个例子，最终将被克服。罪和不幸在救赎之先。教会的丑行是基督徒和谐的必然前奏。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恐怖是基督教最终胜利的征兆。在他内心深处，古老的反应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徒，而在精神的意义上，是一个虔诚的欧洲人。

毕竟陀思妥也夫斯基相信信仰的痊愈力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封面上，他加上了这首诗："真的，真的，我向你们说，除非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并死去，它就仍是孤独的。但是如果它死去，它就会带来许多的果实。"[5] 同样的话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500]

宣传 [PROPAGANDA]

宣传是斗争的信仰的孩子，也是人们决心传播他们自己的信条以反对所有其他人信条的产物。它的起源无疑是在宗教领域。它在本质上是偏执的，当它唤起仇恨和偏见时就是最成功的。它是所有诚实的教育和信息的对立物。

宣传要最有效就需要审查制度的帮助。在一个封闭的信息领域内，它能够动员所有的交流手段——印刷的、讲话的、艺术的和可视的——并推动它的主张达到极大的优势。为达到这个目的，罗马的信仰宣传部（Officium de Propaganda Fidei）（"宣传"这个名词由此而来）与宗教裁判所一同工作。在 1622 年它成为梵蒂冈的永久常设委员会之一。

宣传在新教和东正教国家也同样盛行，在那里教会从属于国家权力，政治宣传也一直是存在的，虽然没有这个名称。它由印刷品，后来由报纸和传单鼓吹。它在战争时期最明显，特别是在内战和宗教战争中。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士兵被派到敌军营地前，只以传单作为武装。

在二十世纪，宣传的能力与范围由于新媒体的出现而急剧扩大了，如电影、无线电和电视；靠销售技术、大规模说服诱导、商业广告和"公关"（PR）；靠着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极权国家的残酷无情。"总体宣传"和"大谎言"的艺术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首倡的。列宁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之后，将高级有权力的宣传家策划战略和实行它的低级鼓吹者之间区分开来。哪里有苏联的宣传鼓动引导，法西斯主义者们就很快跟上来。

宣传理论家们定出了五个基本规则：

1. 简单化规则：将所有资料缩成为一种简单的"善与恶"，"朋友与仇敌"之间的对抗。

2. 丑化的规则：用粗鲁的侮辱和拙劣的模仿败坏反对者的名誉。

3. 灌输的规则：巧妙地操纵受众对象的共同价值达到其自己的目的。

4. 意见一致的规则：宣传其观点仿佛是它所有正确思想的人一致的观点，引导怀疑的个人由于明显表演家的呼吁，社会的压力和心理上的感染而表示同意。

5. 合奏的规则：用不同的变化和组合无尽地重复相同的信息。

[501] 在这方面，这类超级大师之一承认他的先行者。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 说："天主教会保持着运行，因为它两千年来重复着同样的事。国家社会主义党必须像这样做。"[1]

但是，宣传更狡猾的形式之一是在那里信息的真正来源对于接受者和宣传者都同样被隐藏起来。这种类型所谓的"隐藏地导向的宣传"的目标是动员一个不受怀疑的"影响代理人"网络，以他们好像是自发的行动来坚决推广所希望的信息。靠伪装与作秀为目标的社会的那些人观点一致，来企图颠覆这个社会，靠诱导关键人物的倾向，它能够秘密地收买观点制造者的一个主导精英群。

看来这样做是斯大林的宣传头目所选择的方法。他们从 1920 年代起在这主要西方国家的文化圈中组织了网络。这个领域的主要控制者是一个看来无害的德国共产党员，一位从前列宁在瑞士的同事，以前与戈培尔博士在帝国议会（Reichstag）熟识，维利·蒙曾堡（Willi Munzenberg，1889—1940 年）与苏联间谍一同工作，他完善了将秘密事务公开去做的艺术。他建立了进行一系列"反军国主义"，"反帝国主义"，首先是"反法西斯主义"战役的日程，系统地导致在柏林、巴黎和伦敦有着一小部分乐于接纳的中心。他主要的被蒙蔽的人和成员，被怀疑者称为"同路人"，很少加入共产党，并愤怒地否认受人操纵。他们包括作家、艺术家、编辑、左翼出版商和精心挑选的知名人士——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Set）的一半成员。因为所有这些吸引新参加者的团体被称为"天真者俱乐部"，他们得了一种波浪式的效果，被恰当地称为"兔子一样快的繁殖"。最终的目标被很好地确定了：

"创造一个正确思想的、非共产主义的西方来主导这个时代的政治偏见；相信出现的任何观点都有益于……苏联是由人类正当行为最本质的国家而产生的。"[2]

这样的犬儒主义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可以由"伟大领袖"为所有他最热心的宣传者们所准备的命运来判断，例如卡罗尔·拉狄克（Karol Radek），也许还有蒙曾堡本人，他被发现神秘地被绞死在法国的山中。布莱希特对斯大林罪行的评论绝非他所以为的笑话，他写道："他们越是清白无辜，他们越应当被枪毙。"[3]

给予天主教徒一部可以与新教徒相媲美的道德法典。"它给教会这个不容忍时代的标签打上了印记。"一位英格兰天主教徒写道："并且使一种严厉的不道德精神……长久持续下去。"[16]新教徒历史学家兰克（Ranke）强调了这个矛盾，即一个宗教公会本来计划对教皇进行整顿，结果却用效忠的誓言，详细的规章和惩罚，将整个天主教教阶制从属于教皇。"宗教纪律被恢复了，但是所有指导它的权力机构都集中在罗马。"[17]几位天主教的君主，包括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Phihip Ⅱ），如此害怕特伦特公会的信条，以致不让它们印行。

被反宗教改革促进的特有的宗教精神，强调信徒的宗教纪律和集体生活。它反映了赋予教士等级强制推行的广泛权力，和信仰者现在需要展现的外部一致性。它主张以经常的忏悔作为顺从的一个标志。它由范围广泛的公共宗教仪式所支持——朝圣、典礼、宗教游行，还[502]伴随着艺术、建筑、音乐的有意识地戏剧化。这样制造的天主教宣传无论在理性论证上，还是在影响意识的手段上都是强有力的。这个时代的巴罗克式教堂，充满了祭坛、柱子、雕像、有翅小天使、金叶、圣像、圣体匣、枝形烛台和香烟，设计得没有给教会会众的个人思想留下余地。不像新教布道者们强调个人的良心与个人的诚实，所有的天主教教士通常看来劝导他们的教徒要盲目服从。

反宗教改革经历了天主教圣徒的一次大丰收。尽管，其中有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者：阿维拉的圣特蕾莎（St Teresa of Avila，1515—1582年），和克罗斯的圣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年）；还有一长串病人和穷人的服务者：圣腓力普·内里（St Philip Neri，1515—1595年），圣卡米洛·德·莱利斯（St Cammillo de Lelliis，1550—1614年），圣文森特·德·保罗（St Vincent de Paul，1576—1660年），圣路易丝·德·马里亚克（St 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0年）；还有耶稣会的圣徒和殉教者：圣弗朗西斯·沙维尔（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圣斯坦尼斯瓦来·科斯特卡（St Stanislaw Kostka，

1550—1568年)，圣阿洛伊修斯·贡萨加 (St Aloysius Gonzaga，1568—1591年)，圣彼得·卡尼修斯 (St Peter Canisius，1521—1597年)，圣约翰·贝希曼斯 (St John Berchmans，1599—1621年)，圣罗伯特·贝拉尔米纳 (St John Bellarmine，1542—1621年)。他们赢回了许多已经丧失的领域。

反宗教改革的冲击在欧洲各地都真实地可以感到。对教会的传统支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强有力，甚至在那里小部分零散的新教徒也必须清查出来。西班牙属尼德兰夹在法国与联合省之间，变成了天主教好战精神的温床。在那里，卢万 (Louvain，Leuven) 大学和在杜埃 (Douai) 的耶稣会学院起了带头作用。而由伊普雷 (Ypres) 主教科内利乌斯·詹森 (Cornelius Jensen，1585—1638年)，一位耶稣会士的激烈的批评者发动了一种重要的反对这种盛行的狂热的运动。在他对圣奥古斯丁著作的汇编《奥古斯丁》中，他抨击那个时代他认为的神学诡辩术与浅薄的道德，特别强调信仰者对“神恩”和精神上再生的需要。虽然他从未动摇过对罗马的忠诚，并反对因信仰称义的新教教义，他关于神恩问题的几个定义接近于新教的立场，并正因此而被定罪 (见第8章)。

瑞士被天主教州和新教州的敌对所分裂。苏黎世和日内瓦的教义深入到周围地区的许多阿尔卑斯山村庄中。它们被枢机主教、米兰大主教圣查尔斯·博罗梅奥 (St Charles Borromeo，1538—1584年) 以粗暴的手段扑灭在意大利边界。在萨伏依，它们受到圣弗朗西斯·德·萨莱斯 (St Francis de Sales，1567—1622年) 更为温和的劝导的挑战。他是畅销书《虔诚生活指导》(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 的作者。**[梅诺齐奥]**

在法国，许多天主教徒对这种新的战斗精神敬而远之。部分是因为符合高卢教会 (Gallican) 的传统与1516年法国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协约，部分是由于法国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敌意。但是一个亲罗马的“教皇至上主义”(Cultramontane) 党在吉斯 (Guises) 家庭有联系的圈子中崛起。他们干下的最狠毒的行为是1572年8月22日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当时有2000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杀，此后教皇以一曲《赞美颂》来庆祝，西班牙国王则“开始笑起来”。在十七世纪詹森主义 (Jensenism) 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一副斗争着的极端派与胡格诺教徒党派偏见的解毒剂。

英格兰王国是重新皈依的目标，这造成了以耶稣会士圣爱德蒙·坎皮恩 (St Edmund Campion SJ，1540—1581年) 为首的四十名天主教殉教者和许多其他牺牲者。爱尔兰遵奉了它的天主教信仰，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 (Elizabeth) 1598年残暴的远征之后。但是，爱尔兰

[503]

梅诺奇奥 [MENOCCHIO]

在 1599 年，一个弗留利（Friuli）的蒙特雷亚尔（Montereale）的身份低微的磨坊主，康曼尼科·斯坎德拉（Comenico Scandella），因异端罪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如两年前乔尔丹诺·布鲁诺在罗马遭到的惩罚一样。他的案子的文件留存在乌迪内（Udine），为历史学家们敞开了难于深入的非正规信仰世界。在两次审讯，长期的审问、监禁和拷问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认定，他否认“圣母玛丽亚的贞洁，基督的神性和上帝的神意”。

这位蒙特雷亚尔的磨坊主被称为“梅诺奇奥”（Menocchio），从来是一位村长，十一个孩子的父亲，放肆的闲话者，直言不讳的反教士者，和饥不择食的阅读者。当他被逮捕时，他的屋子里有：

一本俗语意大利文圣经；

一部加泰隆（Catalon）圣经文选译本（// Fioretto della Bibbia）；

《圣母玫瑰经》，阿尔贝托·达·卡斯特罗著，已绝版。（// Rosario Madonna by Alberto da Castello，OP）；

一本《黄金传说》（Legenda Aurea）一译本；《圭迪奇奥（Giudicio）历史》十五世纪韵文；《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一译本（// Cavalier Zuanne de Mandavilla）；《卡拉维亚的梦》，（威尼斯，1541 年），（// Sogno di Caravia）；

《福斯蒂（Foesti）编年史》的一个版本（// Supplemento delle Cronache）；

一本意大利式年历（Lunario al Modo di Italia）；

一本未删节的薄伽丘的《十日谈》；

一本没有名字的书，被一位见证者识别是《可兰经》。

梅诺奇奥详细地与一位叫西蒙（Simon）的犹太人谈话，对路德教感兴趣，不承认《圣经》的创世故事。他附和但丁（Dante）[1] 和许多古代的神论，主张天使们是由自然产生的，“就像蛆虫由乳酪产生那样”[2]。

宗教的统一遭到破坏，其原因是于 1611 年在阿尔斯特（Ulster）移植了一个苏格兰人长老会教徒（Prebyterian）殖民地，以及盎格鲁一爱

尔兰人乡绅的倾向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

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反宗教改革变得与王朝和它的政治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确实，天主教的特殊品牌“奥地利的虔诚”（Pietas austriaca）在十七世纪到来时出现，成为一个广泛的文化共同体的首要组成部分。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更长久。它曾经被称为“忏悔派绝对主义”。在罗马的日耳曼学院起着战略性的作用。耶稣会[504]士通过荷兰人卡尼修斯（Canisius）的努力，无可竞争地掌握了维也纳与布拉格的教育。匈牙利西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里西亚、波希米亚，还有在较晚的时候，加里西亚西部，都属于这同一领域。巴罗克文化如前所述就好像常春藤，它不只覆盖着这座摇摇晃晃的哈布斯堡大厦，并且有助于将它结合在一起。（见原书第529页）

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一个来之不易的临时妥协协议，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于1555年达成“奥格斯堡和约”：每个王公将决定他的臣民的宗教；路德教是惟一被认可的新教教派，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路德教徒被容忍。德意志变成了一个宗教的拼凑国。然而在那里，天主教的王公们和皇帝们害怕新教的进一步推进，当从1550年代起，“西班牙教士们”在科隆、美因茨、因戈尔斯塔特（Ingolstadt）和慕尼黑建立了耶稣会中心，在莱茵地区和巴伐利亚创建了持久的天主教堡垒。加尔文教徒零星分布在帕拉丁、萨克森和其他地方，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还没有被确保。在1607年12月，巴伐利亚公爵挑衅性地夺取了士瓦本的多瑙沃尔恩（Donauwürth）城，以阻止新教徒干涉天主教的宗教进展。十位新教王公因此立刻聚合为“福音同盟”来保卫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与一个天主教联盟的敌对活动对抗。因而很难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在1618年还是在这之前。

在这个宗教不宽容在增长的世界中，波兰—立陶宛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在有着非常多样的人的广大领地上，甚至在路德教赢得波兰的普鲁士城市或加尔文教赢得了贵族中相当一部分之前，它就已是包含了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信仰的镶嵌画。实行统治的贵族会议的态度是如此，每个庄园都像德意志的公国那样有同样的自由处理它的宗教事务。从1565年起宗教法庭的判决就不能在贵族的私人领地上执行。就在特伦特宗教公会的主席、枢机主教与瓦尔米尔（Warmia）主教霍兹约什（Hozjnsz）引入耶稣会士的时候，波兰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异端和宗教流亡者——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徒，捷克的兄弟会员（Brethren），荷兰的再洗礼教徒（Anabaptists），或是像弗斯都·索兹尼（Fau stus Sozzin）（Socinius）那样的意大利一位论派（unitarians）。在1573年，随着加尔文教徒在贵族院掌握了大多数，波兰议会通过了一个永久的和普遍的宽容法案，只将索兹尼派

(Socinians) 除外。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 (Sigismund Ⅲ Vasa, 1587—1632 年在位), 一位耶稣会士的狂热学生的统治下, 教皇至上派逐渐重新确立了天主教的至上地位。但是进展很慢, 并只能使用非暴力方法。在这个时期波兰可以确实为它的角色自豪: 既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堡垒, 又是欧洲宽容的首要避难所。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 反宗教改革的影响遥远广泛。梵蒂冈在格列高利十三世时期 (1572—1585 年) 不只对网罗瑞典和波兰, 甚至对莫斯科公国抱有希望。在瑞典这种希望一直很大, 直到 1590 年代新教徒在内战中的胜利, 永久地粉碎了耶稣会的计划。在莫斯科, 罗马教皇的大使波塞维诺 (Possevino) 受到伊凡雷帝的接见, 只发现沙皇对[505] 天主教主要兴趣在于教皇轿辇的制作。天主教方面专横拙劣的压力可能促使伊凡的儿子费多尔 (Fedor) 在 1589 年建立了莫斯科牧首区 (Patriarchate), 由此完成了分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演化。

莫斯科的措施在相邻的波兰—立陶宛的东正教徒中引发了危机, 他们到那时一直依靠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随着新的莫斯科牧首宣称对他们有跨越边界的管辖权, 这些东正教徒中许多人现在寻求罗马的保护。1596 年在布列斯特 (Brest) 联盟中的大多数主教选择了建立一个新的与罗马联合教派——斯拉夫礼仪的希腊天主教会。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礼仪、结婚的教士, 而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多数东正教会, 包括在基辅古老的圣索非亚天主教堂都转入与罗马联合派的手中。在一段时间内的"非联合罗马派"残余被国家官方禁止。

然而, 莫斯科是不会与这些新趋势妥协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愤怒地决心惩罚和强迫与罗马联合派恢复原信仰, 这在整个近现代史时期一直在持续。这种卑劣的、诡计多端的耶稣会士的翻版没有什么地方保留得比这更强有力。俄罗斯—波兰战争, 当 1610—1612 年波兰短暂地占领了克里姆林宫时, 只起了强化这种宗教仇恨的作用。在靠近莫斯科的扎戈尔斯克 (Zagorsk) 的俄罗斯大修道院, 一个纪念碑强调了通行的俄罗斯人对反宗教改革的观点: "斑疹伤寒——鞑靼人——波兰人: 三大灾祸。"

在匈牙利, 一个类似的与罗马联合派同盟从乌日戈罗德 (Uzhgorod) 联盟演化出来 (1646 年)。在这种情况下, 外喀尔巴阡山地区的东正教罗塞尼亚人, 选择遵循相邻的乌克兰人采取的路线寻求与罗马联合。(他们的决定在美国于 1920 年代仍引发罗马天主教徒与罗马合并教派的罗塞尼亚人之间的骚乱)

在整个欧洲, 宗教狂热深刻影响到艺术的发展。新教教义较严厉的形态对艺术家努力的真正合乎礼仪性表示怀疑。造型艺术通常被引

导到世俗题材中，因为宗教题材变得受到怀疑。在一些国家如荷兰与苏格兰，音乐缩减为圣歌与韵律赞美诗。在英格兰则相反，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约 1505—1585 年）和其他人创立了英国国教主教堂音乐的美妙传统。在天主教国家中，艺术的所有分支都服从豪华而夸张地发展教会的光荣和权力的要求。这种潮流以“巴罗克”而知名。在音乐上，它与扬·彼得佐恩·斯韦林克（Jan Peterzoon Swe elinck，1562—1621 年），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utz，1585—1672 年），特别是乔瓦尼·特莱斯特里纳（Glovanni Palestrina，1526—1594 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特莱斯特里纳是圣彼得的教堂监督，他的九十四首现存的弥撒曲显示出巨大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克劳迪奥·蒙特瓦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 年），作为相对于复调音乐的单旋律乐曲的先驱，不协和音的重新发现者，意大利“新音乐”的支持维护者，在欧洲世俗音乐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大部分时间为威尼斯所雇用，它总是罗马艺术的一个对照点。巴罗克绘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Caravaggio，1573—1610 [506]年），一位被赦免的杀人者，一位佛拉芒人保罗·鲁本斯（Paul Rubens，1577—1640 年），西班牙人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zquez，1599—1660 年）。在建筑方面，无所不在的巴罗克教堂通常是以耶稣会在罗马的耶稣教堂为模式的。

宗教狂热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战争中发作出来。曾经在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积蓄的热情和仇恨现在在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中燃起，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统治的恐惧在 1531—1548 年的施马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战争中表现出来；它以奥格斯堡（Augsburg）和约结束。在 1562—1598 年的法国宗教战争中，在 1598—1604 年的瑞典内战中，在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中都是如此。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统治的恐惧激起了许多事件，如英格兰的“求恩巡礼”（Pilgrmage of Grace，1536 年），爱尔兰人对蒙乔伊（Mountjoy）与克伦威尔（Cromwell）的抵抗，波兰人在 1655—1660 年对瑞典人的抵抗。在东欧，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的长期战争：1561—1565 年，1578—1582 年，1610—1619 年，1632—1634 年，1654—1667 年，采取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一场圣战的所有装饰。宗教狂想热可以用来激励军队。在十六世纪无敌的西班牙人受到的教育是他们正在为惟一正确的信仰战斗。在十七世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唱着赞美诗的军队，或克伦威尔神奇的新模范军，完全受的是同样的教育。

法国的宗教战争明显是非基督教的。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开始于亨利二世（Henri Ⅱ）时期的“火焰法庭”（chembre ardente），但是国

王在1559年突然死亡以及安茹（Anjou）公爵的突然死亡，引起了王位继承的长期不确定性。[诺查丹玛斯]这依次激起了由吉斯家族领导的天主教派别，和由纳瓦尔国王领导的波旁一胡格诺派别的野心。帕西（Passy）会谈（1561年）作为宗教调解的一次徒劳尝试，被夹在两次暴力挑衅之间，一次是由新教徒1560年在安布瓦斯（Amboise）挑起，第二次是天主教徒1562年在瓦西（Vassy）挑起。此后敌对的派别尽力压倒对方，而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Catherine d'Medici）的阴谋诡计起了煽动作用。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系列事件中最大的一件。令人回想起较早时期的与英国人战争的可恶的散兵战很少形成战役，但有许多机会给像新教徒阿德雷男爵（Baron d'Adrets）和天主教徒布莱兹·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tluc）这样鲁莽的冒险家。在三十年中八场战争中间点缀着零碎的休战和卑鄙的谋杀。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吉斯家族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的权力达到如此程度，看来企图镇压宽容派和控制同性恋的国王，使国王下令暗杀了吉斯公爵和枢机主教（1588年）。[他们的父亲弗朗索瓦·德·吉斯（Francois de guise），著名的将军，于1563年在奥尔良被杀]作为报复，1589年8月1日在圣克卢（St Cloud），国王本人被一位狂热的僧侣雅克·克莱芒（Jacque Clément）刺杀。这留下那瓦尔的亨利（Henri of Navarre）作为王位的惟一的竞争者。当天主教教士拒绝为一位误入歧途的异端涂圣油，他玩世不恭地答应重新皈依天主教。他于1594年在沙特尔（Chartres）被加冕，并胜利进入巴黎。"为了巴黎，值得做场弥撒"总结了这种道德状态。作为结果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也并不更好些。在一生以宗教自由的名义而斗争之后，亨利四世（Henry Ⅳ）现在允许把对胡格诺教徒的容忍限制在贵族家庭、每个地区的两个教堂和120个指定的要塞。强烈的恐惧和[507]怀疑仍然存在着。

既然宗教多元化在不列颠，法国，尼德兰和波兰一立陶宛长期存在，依据简单的"新教的北方"与"天主教的南方"的划分看待这个时期的欧洲是错误的。爱尔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还有其他人，有权认为北方不是一致信奉新教的。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充分理由反对将南方归类于一致信奉天主教。新教一天主教的划分是中欧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德意志。但是它不能在任何准确意义上应用于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或韦伯试图将它与后来基于社会或经济标准的划分联系起来，看来是过分德意志中心论了。人们也许同样可以问，为什么新教的上帝会如此成功地赠与他的追随者以煤田。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以宗教名义丧失理智的流血，不可避免在明智的人们心中激发出一种逆反作用。宗教战争为理性与科学的脆弱种

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科学革命 它普遍被认为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之间，被称为“自从基督教兴起以来欧洲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18]它是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自然发展出来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新教徒态度的帮助。它的长处在于天文学，还有如数学、光学、物理学这些需要用来收集和解决天文学资料的科学。但是它改变了人类关于人类本质和人类境况的观点。它始于十六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在波兰的普鲁士的弗罗姆博尔克（Frombork，弗劳恩堡 Frauenbur）教士会教堂一座塔楼上做的观察，于 1686 年 4 月 28 日在伦敦格雷厄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王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达到高峰。

论及科学革命的困难，如同论及人类思想的任何根本转变那样，在于它的认知范围与当时通行的思想与实践不一致这个事实。所谓的“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时代”是个误称：在大多数方面这仍然是一个炼金术士、占星术士和魔法师的时代。现代历史学家也不应嘲笑那些他们的理论最终证明是错误的人的成就。公平地说炼金术士们误解了物质的性质。要说看到炼金术的建设性方面的研究者们“被他们企图描述的疯子的气味感染了”就不公平了。难于找到对科学史比这更为“辉格派式的解释”了。[19]

米科莱·哥白尼（Mikolaj Kopernik，Copernicus，1473—1543 年），曾在克拉科夫和帕多瓦学习，证实了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太阳系的中心。他的日心说思想与通常占星术用太阳作为和谐的象征的习惯相一致。但是其特点是，他用详细的实验和测量证明了这个假说。他是[508]从托伦（Thorn，Toruń）来的一个德意志商人家庭的儿子，波兰国王的一位忠实臣民，他积极地捍卫其反对条顿骑士团，他作为瓦尔米亚（Warmia，埃尔梅亚 Ermeland）教会的一位教士团成员，他被国王雇用进行货币改革。他的论文《货币铸造策略》(1526 年)，关于“货币驱逐良币”的“格雷厄姆法则”阐述，要比格雷厄姆早 30 年。他的日心说理论首先在 1510 年提出，在《论天体运行》（De Revohitionibus orbium coelestinm，1543 年）中用统计资料得到充分支持。它的出版是由于从路德教的维登堡的数学家同事 G.J. 冯·劳申（G.J.von Lauchen）（雷蒂库斯，Rheticus）的提议，题献给教皇保罗三世，交到躺在临终的床上的作者。它一举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宇宙概念，粉碎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一个不动的、位于中央的、不像行星的地球的观念。它当时的影响被大为减弱了，因为恐惧的编辑将哥白尼的导言换成了他自己一篇误导的前言。

哥白尼的理论酝酿了几乎一个世纪。丹麦人第谷·布拉赫（Pycho

Brahe，1546—1601年）反对日心说；但是通过观察彗星的路线，粉碎了另一个古代的错误概念，即宇宙是由洋葱头似的水晶球体组成的。布拉赫在布拉格的同事约翰·开普勒（Johann Kepler，1571—1630年），证实了行星轨道的椭圆形状，阐明了哥白尼奠定的运行法则。但是佛罗伦萨人伽利略·伽利莱伊（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第一批自己应用新发明的望远镜的人之一，真正将哥白尼介绍给更广泛的公众。对后代而言幸运的是，伽利略既大胆又敏锐。在发现"月亮既不光滑也不均匀一致，而是粗糙并布满凹穴的，像地球那样"后，他推翻了流行的"完美球体"理论。并且，他用尖刻的语言评论他的对手的圣经依据来捍卫他的发现。他对托斯坎纳的寡居公爵夫人说："《圣经》的天文学语言，是为无学识的人的理解力设计的。"这使他在1616年被传唤到罗马，受到教皇的训诫。而伽利略对哥白尼的赞扬使哥白尼的作品上了《禁书目录》。然而伽利略仍然坚持并出版了他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 dei duo missimi Sistemi del mondo，1632年），阐述了哥白尼体系比起托勒密体系的优越性。他被宗教裁判所正式审讯，并被迫收回其主张。据说他对宗教法庭法官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它确实在运动"，是不可信的。[**女同性恋**]

在哥白尼的理论处于争论中时，实践科学仍处于其幼年时代。但是，担任过英格兰大法官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科学方法之父作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在他的《学问的促进》（1605年）、《新工具》（1620年）和《新大西洋岛》（1627年）中，培根提出的主张是知识应当来自有规则的和系统的实验，并由实验资料为基础归纳出来。在这方面他大胆地反对传统的演绎方法，在那种方法里知识只能依据被教会准许的某些被接受的原则建立。重要的是，培根主张科学研究必须与《圣经》研究互为补充。科学应保持与基督教神学不相矛盾。"科学家变成上帝的自然之书的教士。"培根[509]的热心追随者之一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年），担任过切斯特主教和皇家学会的创始会员，写出了奇妙的《在月亮上发现一个世界》（1638年），包括了月球旅行的思想。"其他世界里的居民们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得到拯救，即基督的血。"[20]

重要的进步也是由有着数学能力的哲学家作出的。特别是两位耀眼的法国人，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和他们的继承者贝内迪克·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年）。笛卡儿曾是一位士兵冒险家，经历过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见原书第564页），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在荷兰过着流亡生活。他主要与以他命名的笛卡儿主义那种不妥协的理性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方法

[509]

女同性恋［LESBIA］

在1622年，在一次小规模公开的教会审讯中，一位名为贝纳代塔·卡利尼（Benedetta Carlini）的佛罗伦萨女修道院长，被指控有不正当的活动。她夸口说有神秘的幻觉，她自称拥有圣疤，并且她通过某种形式的性侵犯引起怀疑。她随后被撤职，并在监禁中度过了四十五年。

在1985年，在大得多的公开情况中，一位主要的美国出版同意发表这次审讯的叙述，包装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位女同性恋修女”。[1] 不幸的是，这次审讯的资料不能与这个标题的含意符合。后文艺复兴的宗教裁判所法官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告的宗教信仰上。他们不只没有强调一种女同性恋“生活方式”过分渲染的细节；他们的确不感兴趣。一位失望的书评者评论说，在现在这个世纪之前没有时代男人能够了解“女同性恋行为”的概念。在同时，“这个明显地矛盾式的修饰词汇‘女同性恋修女’很容易引起好奇心……并保证了相当数量的书的销售。”[2]

强调过去的标准与现在的标准之间的差异，确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人有意识地履行了这个职责，有些人则是偶尔为之。

论》（1637年）中作了详尽阐述。在反对任何一点通过他的意识到达他那里的信息，或是其他人的权威，他推断如果他能思想，他就至少必然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是近现代认识论的发射台。在同时，在一种探讨从医学到道德的一切方面并将物质与精神区分开来的哲学中，笛卡儿强调对甚至那时所了解的世界的机械论观点。例如动物如同人类一样，被看作是复杂的机器。

[510] 帕斯卡出生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在巴黎与詹森主义者波特·罗亚尔同住。他将机械论的理想发展到这种程度，使他能做出第一台“计算机”。他的“外省人信札”（Letters provinciales）在耶稣会的文献中仍被视为一杯毒药。而他的文集《沉思录》（Pensèes）（1670年）是流行的理性主义和合理的常识的一种美妙的混合。他说：“心灵有理性不能知道的自己的理由。”（Le coeur a ses raison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oint.）他还说：“人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任何试图创造一个天使的人创造了一个野兽，坏运气就来了。”在关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增长着的暗流之中，他建议做有利于信

仰的著名赌博。他认为，如果基督教的上帝存在，信仰者将继承永恒的生命，如果不存在，他们也不比不信仰者更糟。在任何一种情况中，基督教信仰都值得冒险。

斯宾诺莎是西班牙犹太人后裔（Sephardic Jew），一位以磨镜片为专业的人，被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犹太人社团作为异端驱逐。他赞同笛卡儿的对于由本原构成的宇宙的认真的数学和逻辑学观点，和霍布斯（Hobbes）社会契约的概念。他是一位泛神论者，将上帝与自然看作不可分的。最高的美德在于由充分理解世界和自己所指导的规范。恶源自理解的缺乏。盲目的信仰是卑鄙的。"上帝的意志"是无知的借口。

在英格兰，"实验哲学"的提倡者在1640年代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一个由威尔金斯博士与罗伯特·波义耳博士（Robert Boyle，1627—1691年）领导的一个内部圈子，于内战时期在牛津组织了一个"无形学院"。他们联合在一起于1660年建立了"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他们的第一次会议由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作演讲。他们的早期成员包括许多魔法师，他们的影响在其后二十年中没有被科学家的新学派，如伊萨克·牛顿（Issac Newton）超过。与牛顿一起，现代科学的时代来到了（见第8章），而王家学会的榜样扩散到全欧洲。

如通常那样，旧的观念与新的混在一起。到十七世纪后半期，欧洲的主要思想家们大部分同意宇宙的运行的原则类似于钟表结构的机械论观点。伽利略发现了力的定理，这是机械论的基本元素，力可以应用到从波义耳的气体定律到牛顿的天体运行定律的一切事物，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看来最终宇宙和所有它包含的一切能够得到解释和测量。并且，自然的定律现在正向科学家们交出它们的秘密，可以作为上帝意志的例证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已经被阿奎那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则"，现在被等同于"伟大的钟表结构"。这使在后来近两百年里科学和宗教之间不再有斗争。[**魔法**] [**猴**]

欧洲在海外 这不是始于哥伦布（Columbus）或加勒比海（Caribbean）的一个题目。一个十字军诸王国在"圣地"的实验，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另一次在加那利群岛（Canaries）一直进行了七十年。但是一旦与遥远的岛屿进行了接触，欧洲人向海外航行的次数就一直在增长。他们航行的理由是为了贸易，掠夺，征服，和越来越[511]多的为了宗教。对于许多人，它提供了第一次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们的机会。为使他们对这些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居民的权利合法化，西班牙的君主们首先认为非欧洲人是人类。根据1512年的《规定》，西班牙征服者们被命令对所有土著居民宣读："我们的主上帝，活着的和永

恒的，创造了天与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和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他们的后代……"[21]为确定这点，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的敕令说："所有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只能够理解天主教信仰，而且……格外地渴望接受它。"[22]［**贡萨尔维斯**］

探险的较早期航行在继续和扩展。在西方有一个巨大的第四块大陆的存在通过不断的尝试与错误，在哥伦布第一次回到帕洛斯（Palos）二十年后左右逐渐被认定了。对这个成就应归功于谁有热烈的争论。哥伦布自己又进行了三次航行，也没有知道他真正到了什么地方。另一位热那亚人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1450—1498年），从亨利七世（Henry Ⅶ）得到特许状，在1497年5月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登上"马太"（Mattew）号出航，他在不列颠岛角（Cape Breton Island）登陆，他认为那是中国的一部分。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1—1512年），曾经是美第奇家族在塞维利亚（Seville）的代理人，在1497年到1504年间进行了三次或四次跨大西洋航行。他此时得到了西班牙首席领航员（Piloto Mayor）的职位。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不管是对是错，这第四个大陆应以他的名字命名。在1513年，一位随船偷渡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走过巴拿马地峡看到了太平洋。1519—1522年，一支西班牙远征队在葡萄牙人船长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约1480—1521年）领导下环球航行了世界，它无疑地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太平洋与大西洋是分离开的大洋，南北美洲位于它们之间。［**梅毒**］

在对是否存在一个第五大陆在下个世纪就没有疑问了。在1605年一只西班牙船驶离秘鲁，一只荷兰船驶离爪哇（Java），都航行到卡彭塔里亚湾（Carpentaria），庞大的"南方大地"（Zuidland）（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轮廓被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年）于1642—1643年绘在航海图上。

葡萄牙人最快地利用了这些新陆地的商业机会。他们在1500年宣称占有巴西，1505年在毛里求斯，1509年在苏门答腊，1511年在马六甲和"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也这样做。为保护他们的贸易，他们建立了一连串设有要塞的驻地，从印度的果阿延伸到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则相反，毫不犹豫地运用他们的军事威力。被埃尔多拉多（El Dorado）（黄金国）之梦所诱惑，这些新近刚征服了伊比利亚（Iberia）的"收复失地者"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征服美洲。他们于1511年在古巴定居，以它作为进一步作战的基地，在1519—1520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1485—1547年）血流成河地夺取了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帝国。在1520年代和1530年代在哥斯

[512]

梅毒［SYPHILUS］

许多年来它没有一个官方的名称。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波兰人和英格兰人都称它为“法国病”，法国人称它为“那不勒斯（Neapolitans）病”，那不勒斯人称它为“西班牙病”，葡萄牙人称它为“卡斯蒂尔（Castilian）病”，土耳其人称为“基督教徒病”。第一批治疗它的人之一是西班牙医生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博士（Dr. Ruy Diaz de Isla），称它为“伊斯帕尼奥拉的毒蛇”（Serpant of Hispaniola）[1]。

梅毒可能于 1493 年在巴塞罗那（Barcelona）初次出现。迪亚斯·德·伊斯拉后来宣称他治疗了“尼亚（Nina）”号的船长文森特·平松（Vicente Pinzon）。它被认为是随着哥伦布的船员横越大西洋的。无论如何，不管是水手或奴隶还是两者都包括带来的，它在 1494 年到达那不勒斯，正好迎接入侵的法国军队。当法国国王的雇佣兵在下一年解散时，他们将它一同带到了每个欧洲国家。在 1495 年马克西米连皇帝发布一个反对“恶痘”的敕令，看作是上帝对亵渎者的惩罚。在 1496 年，日内瓦这个城市企图清除所有有梅毒的妓院。1497 年在遥远的爱丁堡，一项法案命令患者到英奇凯思岛（Inchkeith）去，违者将打上烙印。关于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战争，伏尔泰（Voltaire）后来写道：“法国没有失去所有她赢得的东西，她留下了痘疮。”[2]

由于不清楚由螺旋体菌（Treponema pallidum）所引起的梅毒，它到达欧洲时具有了一种特别有毒害的形态。它侵犯人类的生殖器，利用那时不清洗的胯间通常有的粗糙裂缝，形成有高度传染性的下疳，在几个星期内它在身体上布满小脓疱，袭击中枢神经系统，并毁掉所有的头发。它在几个月中使人充满痛苦地死去。医生采用水银对付脓疱，无意中毒害了他们的病人。经过六七十年，螺旋体菌创造了它自己的抗病性并缓和下来。此后，它就是一种常见的三阶段生殖器疾病的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使它的宿主变为畸形和丧失生育力。到此时，数百万受害者中包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亨利八世和伊凡雷帝。直到青霉素出现才将它制服。梅毒对于“性纯洁主义”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这种“性纯洁主义”控制了除贵族之外的所有阶级；与禁止那时流行的淫荡的澡堂以及握手的礼仪取代公开亲吻都有关系，还有从 1570 年起假发时尚的发展。

1530年，意大利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ro）作了一首一位牧羊人患上“法国病”的诗。它及时地被有学识的人给这种病冠以学名，这位牧羊人的名字是西费鲁斯（Syphilus）。[3]

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建立了永久殖民地。从1532年起，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co Pizzaro，约1476—1541年）在秘鲁夺取了印加人（Incas）的帝国。

[513] 欧洲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开始于1536年，由不列塔尼（Breton）海员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491—1557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建立的。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Pedro Menendez）在佛罗里达建立了圣奥古斯丁（St Angustine）。在那里，他绞死了美洲“作为路德教徒”的第一批宗教流亡者。三年后，胡格诺派教徒的同国人多米尼克·德·古尔格（Dominique de Gourgues）到达同一个地点，将西班牙驻军“作为抢劫犯和杀人犯”绞死。西方文明开始发展了。

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殖民上是相对后来者，但是在十六世纪后期他们都获得了收益，于1597年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后，荷兰人开始从葡萄牙人那里夺取东印度群岛。英国人于1598年发现了弗吉尼亚（Virginia），于1607年在詹姆斯敦（Jamestown）接受了第一批成功的移民。“五月花”号（Mayflower）载着120名清教徒“朝圣之父”和他们的家庭，于1620年12月11日（21日）在他们的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登陆。马萨诸塞湾（Masschusetts Bay）殖民地在10年后跟着建立。虽然他们是来自英格兰的宗教流亡者，却没有变得宽容。罗得岛（Rhode Island）殖民地是由从马萨诸塞被驱逐的持不同宗教观念者建立的（1636年）。到那个时候欧洲殖民地一个世界范围网络和他们的海上交通线的存在，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

海上国际贸易由飞跃发展而成倍增加。在西方，跨大西洋航路长期被西班牙控制。到1600年，每年有200只船从“新世界”进入塞维利亚。在1591—1600年这处于高峰的十年间，1900万克黄金和将近三十亿克白银随着这些船只到来。途经好望角的南方航路首先由葡萄牙进行，然后由荷兰人进行，荷兰人也提供了北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主要商业联系。在东方，荷兰人也是波罗的海巨额贸易的先驱。西欧城市对食物增长的需求因波兰生产者供给能力的增长而满足。这种波罗的海粮食贸易在1618年达到高峰，当时有11.8万拉斯特（lasts，英国谷物容量单位，1拉斯特等于80蒲式耳。——译者注）从但泽

(Danzig)驶向阿姆斯特丹。英国人对低地国家呢布贸易达到创纪录水平要早一些，在1550年。英国冒险家们创办了莫斯科公司、利凡特(Levant)公司(1581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

所有这些活动的联结点位于低地国家。安特卫普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在1557—1560年崩溃之前有超级的统治地位，此后中心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在1602年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可以看作商业史一个新时代的标志。[童年]

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张，欧洲广泛地接受了一批新的常用食物，还有外来的"殖民地"产品，包括胡椒、咖啡、可可、蔗糖和烟草。欧洲的食物、烹调和食物爱好与以前再也不同了。扁豆在法国于1542年首先见于记载，西红柿在这同一时期通过意大利传播得遥远广泛。还有辣椒在巴尔干遍地生长，所有这些都来源于美洲。

欧洲与美洲这个到那时为止还是一个大部分封闭的生态地带的交

[514]

童年 [INFANTA，小公主]

在1572年，马丁·德·福斯(Martin de Voos)为安特卫普(Antwerp)的一位行政官安东·安瑟尔姆(Antoon Anselme)画了一幅家庭肖像。他画的丈夫和妻子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位抱着他们的儿子，另一位抱着他们的女儿。这幅画上面有一个卷轴式的铭刻，表明这个家庭的主人生于1536年2月9日，他的妻子约翰娜·霍夫特曼(Johnna Hooftman)生于1545年12月16日，他们的埃吉迪乌斯(Aegidius)生于1565年8月21日，他们的约翰娜生于1566年9月26日。它描绘了家庭由明确的个人，包括成人和儿童组成这种现代观念的出现。[1]

在1579年，桑切斯·科埃略(Sanchez Coello)为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的女儿、十三岁的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画了一幅肖像。她完全是一位小贵妇。装饰着宝石头饰，卷发，高皱领，正式的长袍，和戴着戒指的手指。这种传统在西班牙宫廷延续到1650年代，表现在委拉斯开兹(Velazquez)给另一位公主，奥地利的玛格丽塔(Margharita)，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的女儿所画的有名的系列画上。又是表现出一位优雅的七八岁小型贵妇，穿着胸衣和有衬架的裙子，头上是一个贵妇发式的卷环。儿童们仍被认为是较小身材的成人，没有完全长成，但在性质上与他们的父母没有区别。[2](见图51)

在较早的时代，无论核心家庭还是儿童年代都不被承认是明确的实体。所有各代人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在一起。儿童从襁褓直接过渡到成人衣服，他们参与所有家庭的游戏和活动，除了最富有的阶级外，所有人只有很少或没有的学校教育。如果他们即使受教育，也是一块儿受教育。他们通常七八岁时就作为家仆或学徒去工作。他们死得那么多，使得每个人都极为希望他们快快长大。家庭存在着，但它们是“沉默的存在”，童年也存在，但没有给予它以特别的地位，并且它结束得越快越好。

“童年的发现”是一个过程，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形成。这可以从那个时代的衣服和画像中，从特别为儿童发明的玩具、游戏和娱乐中，从道德和行为的变化中，尤其是从对教育的根本上的新观点上寻找到。

中世纪的儿童大部分靠与长辈们一起生活、吃饭、睡觉中学习。他们直接观察到长辈们的一切活动。他们不被孤立或得到成人世界的保护。只有上层社会的男孩子们进学校，而他们在学校是以通用的目的和所有年龄的群体学习的。分为班级的学校有记载的最早一个例子是1519年伦敦的圣保罗（St Paul School）学校。[515]随着分年龄群体和学校教育的延长，强加的纪律也大为增加。基督教道德、行为准则和屈辱性的惩罚自上面颁布施行。学校的男孩子们首先被引入一种延长的、分阶段的步入成年期的进程。女孩们有的早在十三岁就结婚，更多地像是被忘掉了。

童年意味着天真，而儿童中和与儿童的关系中的粗鲁无礼长期被认为是自然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1601年生）的童年被宫廷医生埃罗阿尔博士（Dr. Hèroard）观察了每一个细节。王太子（Dauphin）没有因为在床上摸他的女保姆受到训斥，例如显示他的第一次阴茎勃起，上下摆动“像一座吊桥”。他在十四岁结婚，被他的母亲放在婚床上，“在大约一小时并干了两次后”回到母亲那里，“他的‘小鸡’全红了”。[3]

这个“男人的时代”像这句“如你所愿”（As you like it）中的独白总结的，对莎士比亚时代清楚地构成了一幅合适的图解。但是每个世纪都对世代的概念作出了它的贡献。如果说童年是在早期近代欧洲发现的，青春期是被浪漫主义者们（Romantics）发现的，来自歌德（Goethe）的维特（Werther），而后工业时代则是“退休的老人”（Senior citizens）。

往，导致了人民、疾病、植物和动物的巨大交流。这种“哥伦布式交流”的作用明显地有利于欧洲。欧洲殖民者们冒着艰苦和丧命的危险，在一些地方要遭遇敌对的“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损失比起他们和他们的枪炮造成的种族灭绝的灾难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与他们一道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和掠夺。欧洲承受了梅毒，但是它的损害不能与天花、脑膜炎、斑疹、伤寒这些确实使土著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的传染病相比。欧洲人重新引入了马，反过来接受了有首要重大意义的两种食物——马铃薯和玉米，还有家禽中个头最大和最有营养的火鸡。马铃薯在较早时候被爱尔兰引种，不断地移过北欧，变成德意志、波兰和俄罗斯的日常食物。玉米被有“美洲谷场”或“美洲不种作物”的各种名称，它使耗尽地力的土壤肥沃，有利于庄稼轮种和畜牧。玉米于十六世纪在波河（Po）流域很好地移植过来。直到几百年后气候状况改进了，它才被移植到阿尔卑斯山（Alps）另一边，但是它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有充足理由认为美洲对食物供给添加的贡献是近代之末欧洲人口急剧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23] [梅毒]

对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描述近来经历了根本的修正。它们已被“非[516]哥伦布化”。曾被称为“发现”的现在被称为“遭遇”或“文化的相遇”。[24]诚实些并将它称为一种征服会更好些，哥伦布的地位也被降低了。他的航行的首创地位被让给北欧海盗（维京人，Vikings）、爱尔兰人，甚至在一条柳条船中的一位威尔士人。他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华特林岛 Watling Island）的登陆，被重新定位在巴哈马（Bahamas）的萨马纳·凯（Samana Cay）。[25]这位“无双的航海家”现在被说成是一个无情的和贪婪的“殖民主义海盗”，或者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犹太人，航海去寻找失落的以色列部落。[26]甚至说他从已经在欧洲的美洲妇女那里听说关于其他大陆的事。[27]哥伦布活动的资料是贫乏的，而传说是丰富的。[28]美洲的真正发现者是那些步“征服者”后尘的人，通常是像贝尔纳迪奥·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un）；“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学家”那样的修道士，和那些努力理解发生着什么的人们。[29]与美洲的交往对欧洲的文化有深刻影响，一道鸿沟开始在那些随时可以进入新世界的国家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之间形成。“哲学出自商人，科学出自商业。此后欧洲几乎被切成两半。西方专注于海洋，东方专注于它自身。”[30]

早期现代社会 早期现代社会不是依据阶级来表述的，那是更晚的发明，而是依据社会等级（Order）或 estates，（在拉丁文中是 status，德文中是 Stände，法文中是 état）。这些基本的社会群体由他们的

职能，他们的法律限制，为便利他们的职能所赋予的特权，和他们的合作机构所界定的。财富和收入只起着次要的作用，继承是决定任何特定家庭会属于哪个等级（除教士外）的主要标准。

例如，贵族是中世纪身份的传留，是由于他们的军事职能和法律给予他们拥有土地和对他们的财产进行行政管理的特别权利而确定的。随着常备军的增长，他们专有的军事职能或多或少被削弱了，但是他们作为统治等级的中坚的地位保留了下来。通过他们的地区会议支配乡村中的当地政治，并且他们对他们土地上的居民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由一个上层社会领导，如英格兰的封爵贵族（peers）或西班牙的高层贵族（grandees），或者在其他地方，如在德意志，他们被划分为众多的等级。市民等级是建立在自治城市和城市行会的自由权利之上的，它也在显贵、自由民和无财产的平民之间划分阶层。它通常受到国王特许状的保护，在城墙之内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农民由被农奴化的大多数人和仍保有自由或摆脱了农奴制的少数人组成。农奴的地位依据他们是生活在教会、国王或是贵族土地上有很大不同。

众多分离破碎的司法权的存在是与国家专制主义不相容的，更不[517]用说莫斯科公国的沙皇统治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了。这就是使得西方绝对主义与东方专制制度有相当不同的社会基础。它建立在大量从较早时期继承下来的实践上，除了一些革新外，本质上仍是中世纪的。在西方与在东方一样，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依现代标准而言是非常繁多的。不只是农奴，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属于一个团体并遵守它的规则。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曾被布克哈特（Burckhardt）这样的历史学家赞美，正是因为他们乐于见到打破盛行的社会束缚与隔离的首次薄弱的尝试。当出现一个例外的话，如当米开朗基罗要脱离他的手工业者行会时，需要一个教皇来处理。[31]

价格革命 欧洲第一次遇到通货膨胀时，首先被认为是高利贷者的恶行造成的。从1550年代起，通过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研究，其原因是西班牙金银的流入。一位评论家写道："使西班牙贫穷的是她的财富。"[32]虽然当时人的观点被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各国政府一再企图用降低货币值来应付而弄混乱了，但很清楚的是整个十六世纪的总趋势是持续的物价上涨。例如在法国，那里货币供应相对短缺，粮食价格在1600年比1500年高了七倍多。

生活费用特别是在西欧急剧上升（见原书附录Ⅲ，第1263页）。对比的解释，近来的学者们较少强调金银，较多的强调人口增长，土地占有的狂热和租税的提高。在十六世纪，欧洲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

市大概由五个增加到十四个：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巴黎、罗马、巴勒莫、墨西拿、马赛、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农民涌入增长着的市镇；工资落后于物价；乞丐人数激增；各国政府不断受到他们收入价值下跌的打击而提高了税收。直到十七世纪早期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

价格革命的社会后果是个有广泛争论的题目。货币经济的扩张鼓励了社会流动，特别是在英格兰与荷兰。商业资产阶级实力大增，资本主义达到了起飞点。而在西方城市的增长与东方"新农奴制"的相应增长是密切联系的。德意志、波兰和匈牙利的贵族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而更西方的贵族们却陷入了混乱。英国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没能就乡绅是兴起还是衰落取得一致意见。英国内战被不同地归因于自信的乡绅阶层反对衰败的贵族阶层的逞强行为，或是因价格革命而贫困的乡绅阶层的绝望行为。[33] [**资本主义农业**]

特别有兴趣的是经济与宗教发展之间的联系。新教宗教改革通常是以宗教和政治上的说法予以解释。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到"新[518]教伦理"和商业进取精神的相互关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 年）和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 年)，虽然在细节上受到许多批评，却产生了整个注释学派。资本主义毕竟如需要技术家一样需要思想家。在这点上，新教作家在反对关于高利贷根深蒂固的态度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要比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时间要晚得多才这样做。托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格兰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资料证据。韦伯则犯了时代错误，依据的是十八世纪的美洲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直到 1658 年，荷兰国家才规定，不应该因银行家实行高利贷而被拒绝参加圣餐礼。因而，理论正是落后于实践的。[**高利贷**]

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天主教城市和在新教城市同样繁荣。奥格斯堡的富格尔（Fugger）不是清教徒，他的兴起是因为扩张的贸易和工业，还在因为战争，由于它的破坏刺激了对货物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新教的神学家们作为资本主义技术的鼓吹者不如涌入新教国家的众多流亡企业家那么有效。

正是通过这些移民，中世纪资本主义的种子散播到整个欧洲。在日内瓦最大的实业家弗兰切斯科·图里蒂尼（Francesco Turrettini，1547—1628 年）是从卢卡（Lucca）来的流亡者。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1587—1652 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来自列日（Liège)。马库斯·佩雷斯（Marcus Perez，1527—1572 年)，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的最初资助者，是

从西班牙来的一位犹太人改教者（converso）。[34]

军事上的变革 这个时代军事上的变革，像现在归类为“革命”的大多数事情那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大体上，它们包括引入新的武器，主要是长矛、滑膛枪、改进的大炮；建立需要专业干部和教官的系统训练和常备军的增长，而这只有最富有的王公才担负得起。

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而来。16英尺的瑞士步兵长矛提供了阻止骑兵冲锋的长期寻求的手段。但是它只能在一个长矛手移动的方阵中才能有效地展开发挥，长矛手必须转变方向并机动地精确面对弯曲的进攻阵线。当西班牙人发现它最好与滑膛枪结合使用，滑膛枪的火力确实能够打垮进攻者。然而滑膛枪的准确性，和它重新装弹的速度，还有许多缺点。只有当一个滑膛枪手团被训练得能一齐开火，灵巧地在齐射之间从长矛方阵中进出移动才能有效。虽然它于1512年首次在拉文纳（Ravenna），从1560年代起在低地国家的战争中才被广泛使用。长矛和滑膛枪的结合需要精巧的操练技术，并且还要求有纪律的专业人员的规则和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

应付长矛方阵的一个办法通过密集炮兵的发展找到了。榴弹炮很[519]快使得中世纪的堡垒过时，现在在战场上广泛使用，以在敌方阵地上打开缺口。而扩大的炮兵队伍需要综合的技术支持，一个有效率的制铁工业，高质量的火药，扩展的运输和专业的炮手。

在海战中，榴弹炮口径的增大促进了船只的体积、吨位和操纵灵敏的迅速增长。战船必须转变为浮动的炮台座。船只种类的增加促进了航海科学，这又要依靠精密的仪器、充分的天文学资料和制图学及先进的数学。

在陆地上，为拯救在大炮轰击影响的筑堡艺术产生了杰出的想法。意大利筑城图（trace italienne）出现在十六世纪中期，设计了有壕沟、陷阱、低矮而有角的棱堡的一个复杂系统，以抗拒炮兵易于击中目标和接近，而将他们暴露在毁灭性的反击火力中。安特卫普（Antwerp）由意大利工程师于1568年用这种方法建了要塞，开始了一个围攻重新盛行的趋势。到闻名的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里·德·沃邦（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年）的时代，工程师们重新获得了对炮兵的优势（见原书619页）。骑兵从未变得无用，但被迫进行改编，越来越划分为专门的团队。轻骑兵用于侦察和小规模战斗，枪骑兵用于战场上的攻击，龙骑兵用于运动中的火器射击。

监管这些发展的事，指挥官们面对着滚滚而来的技术和组织问题。业余的绅士士兵不能再应付了。付给薪金的职业军官的出现伴随着专业的陆军和海军等级制的巩固。军事职业不只为旧贵族的儿子们，也

为所有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前程。统治者建立军事学院以训练他们。

统治者也必须为他们的军队找到收入的新来源，并且管理他们找到新的官僚机构。但是他们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就发现拥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工具来削弱贵族的权力和迫使他们的臣民服从。现代国家没有军事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从火绳钩枪到绝对主义王权，或从海军臼炮到重商主义，都是一条直达的捷径。

而军事革命也是另一个题目，诱使那些自封的理论家们用他们从西欧各部分的本地化研究出发，做出关于整个大陆的证据不足的总结。它通常认为在欧洲的战争方式中，骑兵没有将最高地位让给步枪，就有些落后了。他们并不是这样。波兰或莫斯科公国的军队不需要他们的西方同行的教训。他们不久就熟悉了最新的技术和组织发展，但是在横跨东方广大的空旷开阔地上，在严酷的气候中战斗，他们遇到的必然出现的问题是在意大利北部或尼德兰的战场上所不知道的。当波兰神奇的飞快的轻骑兵遇到西方类型的步兵，如他们于1605年在基尔希霍尔姆（Kirchholm）对瑞典人作战时，他们施行可怕的屠杀。当他们于1610年在克鲁什诺（Klushino）或于1621年在乔切姆（Chocim）面对东方类型轻骑的游牧部落时，他们重演了这种行动。（见下文）在同时，由于他们灵活的、蜂窝状结构的分队，轻骑[520]兵“伙伴”（towarzysze）能够在敌对的国家内掠夺粮草和进行小规模战斗，而不那么能适应这种情况的军队就会遭到毁灭。在与波兰人遭遇时，莫斯科公国人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败，经常是因为错误地接受了西方的革新。但是他们从早期就拥有第一流的炮兵。而正是俄罗斯的炮兵在波尔塔瓦（Poltava）最终打破了瑞典的军事优势。[35]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经常应用或误用于十六世纪的词汇。它们更适于十九世纪，那时它们被历史学家发明来寻求他们那个时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它们确实不应该用于不成熟的民族同一性的先入之见。然而它们能够适当的表达的是君主和臣民都具有的一种强烈的主权意识来看待被中世纪所分裂的统一体。他们最主要的“政治理由”（raison d'état）是一个与重商主义相联系的经济范围，还有纯粹的政治范围。

《君主论》（Il Principe）写于1513年，作为所有希望达到不受束缚地控制地位的这类统治者的手册，经常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起点。它的作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历史学家、剧作家和佛罗伦萨的外交家，曾仔细观察过切萨雷·博几亚（Cesare Borgia）和“大骗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能鼓励一个君主来完成但丁统一意大利的

旧梦。但是它的魅力是普遍性的。它将政治与道德上的考虑分开，讲出了强权政治（Machtpolitik）或无束缚的权力政治的艺术。公平地说，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引发了严重的丑行。“高尚的骗子”（frodi onorevo li）或“光荣的邪恶”（scelleratezze gloriose）变得臭名昭彰。而更严重地公平地说，如果将《君主论》与《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联系起来读，可以将马基雅维利看作是一个由法律和自由治理的有限制政府的热心提倡者。他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提供宪法结构得以建立的根基，但是最被牢记的是他嘲讽性的警句。他写道：“人们离罗马教会越近，就越不信宗教。”“一个希望保持他的地位的君主，必须学会一旦必要时需要善还是恶。”“战争是君主惟一应学习的。他应该将和平看作只是一个获得喘息的空隙……这给他以实行军事计划的条件。”马基雅维利从不缺少信徒。

在模范的文艺复兴君主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认为像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或卢多维科·斯福扎（Ludovico Sforza）这样的意大利暴君应居首位。此后他们也许会提出那些强大的邻居和敌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和亨利八世（Henry Ⅷ），他们在“黄金布地”（Field of Cloth of Gold）会面（1520年），为那个时代的如此之多的奇思妙想和特有性质的范例。而没有人比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匈雅提·“科尔温”（Matthias Hunyadi “Corvinus”，1458—1490年在位）更值得关注。

科尔温的称呼来自他盾形纹章上的乌鸦，是一位社会新贵，一位[521]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男爵与十字军扬库·胡内多阿拉（Iancu of Hunedoara）（亚诺什·匈雅提 János Hunyadi）的儿子。他因与土耳其人战斗而闻名。他运用他的特兰西瓦尼亚基地和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征服了匈牙利的大贵族，开创了一个以意大利文化作为政治威望标志的朝代，他受过人文主义者维特兹（Vitez）大主教的教育，他与一位那不勒斯公主、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 of Aragon）结婚，他继承了一个从安茹（Angevin）王朝时代就培养起与意大利联系的宫廷。在布达的宫廷充满了书籍、图画和哲学家，与那个时代的主要学者有交往，从波利齐亚诺（Poliziano）到费奇诺（Ficino），它也以一个大图书馆而自豪。这个图书馆在版本书与手稿的收藏是佛罗伦萨美第奇（Medici）图书馆的主要竞争者。在1485年科尔温占领了维也纳，他看来即将建立一个匈牙利—奥地利君主国，不久就会作出坚实的努力控制帝国。结果，由于他的突然死亡所有计划都化为乌有。他学究气的儿子被匈牙利贵族排斥，而推举了一个雅盖隆家族的人。在略迟一段时间后，这块地方就被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人夺取了。就像被掠夺的王家图书馆的书籍，文艺复兴的匈牙利的痕迹随风飘散了。[科

尔温]

当然，在某些地区国王权力的加强，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说绝对主义的普遍出现，除非将几个相竞争的典型之一来看待。在法国，对国王的限制仍是如此之大，使得学者们可以长时间辩论，例如在弗朗西斯一世统治下，法国政府是“更具协商性”还是“比较不那么权力分散”。[36]在英格兰，在确立了都铎（Tudor）王朝的君主制后，是议会在此后的斯图亚特（Stuart）统治时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会议在反对皇帝上占了优势。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制战胜了君主制。

确实，一些文艺复兴学者如比代（Bude）以罗马帝国作为看待君主制的观点，但其他人如戈斯利基（Goślicki，Goslicius）主教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两篇政治论文中，让·博丹（Jean Bodin）的《论共和国》（De la République，1576年）赞成宪政君主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1651年）偏执地用契约理论赞成绝对主义。缺乏很多的证据，霍布斯就主张国王拥有无限制的权利，因为在过去某个未指明的时代他们的臣民被认为交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结果产生的“利维坦”，一个“由人们组成的巨兽”，这是他对现代国家的隐喻，是令人遗憾的必要，是对无休止的斗争的惟一选择：

> 在当人们生活在没有共同权力使他们保持敬畏的时代，他们处于被称为战争的状态……每个人与每个人为敌。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工业、航海、艺术、文学、社会的地位，……而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使人们的生活孤独、贫穷、卑劣、野蛮而短暂。[37]

文艺复兴促进了罗马法的研究，但这个时期各个国家法律进行整理与补充也是同样突出的。而在雨果·德·赫罗特（Hugo De Groot）[523]（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年）的论文《论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et pacis，1625年）中，国际法出现了。

重商主义或“商业体系”是一个标签，直到十八世纪晚期通俗化前几乎不流行。[**市场**]而这一套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会批到的理念构成早期近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系统。重商主义对许多人意味着许多事情，不过在本质上它倾向于坚信为了繁荣，现代国家需要运用所有可运用的法律、行政、军事和调节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亚当·斯密后来提倡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体系正相反。在一个通俗形式中它由硬币主义组成，即一种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依靠积累黄金。在另一种形式中，它专注于用援助出口，抑制进口来改进

[522]

科尔温 [CORVINA]

在1460年代的某个时候，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尔温开始收藏图书。他的热情是由他的老导师亚诺什·维特兹（Janos Vitez）、奥拉迪亚（Urad，Oradea）主教和主教的外甥亚诺什·切兹米茨（Janos Csezmiczei）鼓励的。两个人都是古典学者，在意大利受过教育，都是狂热的藏书爱好者。前者被升任为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后者作为亚努斯·潘诺尼乌斯（Janus Pannonius），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拉丁语诗人。当两人都因为一个政治阴谋而失宠，首席主教退休了，诗人自杀了，国王将他们的图书馆归为己有。在1476年马蒂亚斯与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 of Aragon）结婚时，她从那不勒斯带来了自己丰富的图书收藏。在1485年他夺取了维也纳，拟定了一个新的匈牙利—奥地利君主国计划，它的文化中心将是王家图书馆，那时正在布达（Buda）建设。配备有档案学家、抄写员、翻译家、装订工和书稿装饰工的一支队伍，和横跨大陆的一个代办人网络，科尔温图书馆（Bibioteca Corviniana）被设计得突出了在欧洲的“学问的复兴”。它甚至超过了在佛罗伦萨“豪华者”洛伦佐（Lorenze the Magnicifent）的豪华的图书馆。

马蒂亚斯国王的希望没有一个实现。当他在149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王位。哈布斯堡家族收复了维也纳，匈牙利的贵族们因对他们的征税而反叛。图书馆的工作停止了。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1526年夺取布达时，图书馆被抢掠，它的大部分收藏，包括650部有无比价值的古代手稿消失了。

但不是一切都丢失了。在纪念马蒂亚斯国王逝世五百周年时，匈牙利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展览以重新收集存留下来的宝藏。它显示出比阿特丽斯王后曾尽力将一些珍藏的物品送回那不勒斯。她的儿媳将其他一些拿到德意志。查理五世的姊妹玛丽（Mary）从前是匈牙利女王，将更多的带到了布鲁塞尔。最为重要的是，它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掠夺书籍的库房中，几个世纪来一直用于给予喜欢的外国大使的礼物储备。科尔温图书馆无价的带有说明的目录，是国王的佛罗伦萨代办人纳尔多·纳尔迪（Naldo Naldi）准备的，被一位苏丹给予一位波兰大使，保存在托伦（Toruń）。塞涅卡（Seneca）的悲剧被送给一位英格兰大使，保存在牛津。拜占庭的“礼仪书”保存在莱比锡。[**排序法**]26部送给弗朗西斯—约

瑟夫（Francis - Joseph）的手稿保存在维也纳。还有更多的被发现藏于奥古斯特公爵（Augustus）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uttel）的图书馆中。乌普萨拉（Uppusala）拥有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军队从布拉格掠来的一些物品……马德里、贝桑松、罗马和沃尔塔拉（Volterra）都有所贡献。

1990年的展览只包括失去的收藏的残留片段。但它们足以显示出这些藏书爱好者促进文艺复兴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在规模和多样性上，科尔温图书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正是由于它散失的命运，它在传播学问上也许不次于哪个图书馆。

贸易平衡，鼓励国内制造业。在所有的形式中，它关心的是加强经济力量的来源——殖民地、制造业、海军、关税——是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商业对手的。在荷兰的形式中——在那里甚至海军也由五个海军上将分别控制——政策大部分留给私人和地方倡导。在法国和后来的普鲁士的形式中，它非常牢固地掌握在国王的大臣手中。在英格兰它依赖于私人与国家倡导的混合。一个早期的表现可以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1549年）中找到。托马斯·曼（Thomas Mun）在稍后写道："增加我们的福利和财富的通常手段是对外贸易，在其中我们必然观察到这个法则：每年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东西在价值上要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东西更多。"[38]

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像重商主义思想那样，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兴起而发展的。在过去，君主们满足于一旦每个使命结束就召回他们的大使。在十五世纪，威尼斯是惟一在国外保持常驻使馆的强国，直到教皇使节团和其他意大利城市遵循了威尼斯的榜样。但是从大约1500年起，主权国家统治者们逐渐将任命常驻大使看作他们的地位和独立的标志。他们也重视商业和政治情报的汇集。首批这样做的一个人是天主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 the Catholic），他从1487年起在圣詹姆斯宫（Court of St James）驻有使团，最初由罗德里戈·贡德萨尔维·德·普埃夫拉博士（Dr. Rodrigo Gondesalvi de Puebla）领导，后来由一位妇女，国王的女儿、威尔士亲王妃、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领导。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通常被公认为有着第一个完整的皇家外交服务人员的，包括从1526年起在奥斯曼政府的一个大使团。

不久，外交使团（corps diplomatique）就出现在每个主要的宫廷

和首都。生活在有某些危险的状况下，这些外交官们很快就制定出必要的规则，如豁免权、互惠权利、治外法权、外交国书和席次优先权。在1515年，教皇规定教皇使节应该作为外交使团的团长，皇帝的大使应当优先于他的同行，而所有其他的大使应当根据他们的国家的依基督教的时间排定资历。实际上这个安排没有实行，因为查理五[524]世（Charles Ⅴ）任命西班牙人为帝国外交官，并且因为作为“最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他拒绝将优先权让给法国人。这引发了一场争执，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立场达200年。曾经于1661年在海牙（Hague），当法国和西班牙大使的随从们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相遇时，这些外交官们在一个地点牢牢站定了一整天，直到城市委员会拆除栏杆，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通过。莫斯科公国同样在形式上固执己见。沙皇的大使惯于要求在皇帝自己的廷臣之前的优先地位。在华沙，一位莫斯科公国的大使戴着两顶帽子到达——一顶照惯例在向波兰国王致敬时摘下，另一顶依据克里姆林的训令戴在他的头上。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外交官们不久就得到了欺诈的名声。他们必须熟悉密码、暗号和隐形墨水。亨利·伍顿爵士（Sir Henry Wootton）讥讽说：“一位大使是最诚实的人，他派到外国说谎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虽然如此，常设的外交使团的增长标志着一个国际社会形成的重要阶段。在1643—1648年，当一个大型外交会议在蒙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召集，以结束三十年战争时，“欧洲的和谐”已经开始存在了。

在十六世纪到来时，在欧洲地图上中心的轰动事件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突然兴起到一个过度巨大的地位。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功不是由征服获得的，而是由于敌对王朝的失败，由于有远见的婚姻计划，由于纯粹的好运气。流行的一句名言说：“让强者去进行战争，而你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吧。”（据说是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尔温所说）这里强调的是“幸运”和“结婚”。

在1490年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Ⅰ），罗马人的国王，仍是一位从匈牙利人占领的维也纳的出逃者。他对帝国的掌握看来是靠不住的；而他不得不以软弱的地位发动一系列帝国改革。他监督了帝国法庭（Reichskammergericht）于1495年建立，常设摄政委员会（Council of Regency）（Reichsregiment）于1500年建立，帝国议会（Diet）“委任权”（Mandate）（Reichsschlüsse）于1512年建立。将帝国议会分为三院：选侯（Elector）、王公（Princes）、城市（Cities），和将帝国分为十个领土圈（Circles），每个处于两个王公的督导（di-

rectorium）之下，管理司法、税收和军事事务，他实际上交出了所有对帝国的直接统治权。通过给予德意志王公所有他们想要的，他使哈布斯堡家族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在同时，马克西米连大大加强了哈布斯堡的宗族权力（Hausmacht），即这个王朝的私属权力。他第一个妻子玛丽（Mary）的早死，给予他神奇的勃艮第公国（Duchy of Brugendy）；在 1490 年他继承了蒂罗尔（Tirol），给了他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喜爱的住所；在 1491 年与雅盖隆家族的一个继承条约中，给予他波希米亚的继承权，另一个 1515 年的条约给予他匈牙利的继承权。两个政策在路易·雅盖隆（Louis Jagiellon）1526 年去世时都获得成果，留下了有着“一个多[525]瑙河君主国的基础”[39]的王朝。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与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女继承人的婚姻，放下了一个抓牢西班牙领地的钩子。在 1497 年他第二次婚姻是与米兰的比安卡·斯福扎（Bianca Sforza），这使大量现金涌来，帮助他在 1508 年被确认为皇帝。到此时哈布斯堡家族这位最理想家式的人必然感到他的使命完成了。此后不久，他有足够的信心打算被选为教皇！

当马克西米连去世时，他的孙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继承的地产集合起来“在其上太阳永不会落下”。再加上由于富格尔家族的金钱援助，查理克服了法国和教皇的反对，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直接继承了他的祖父。（见原书附录Ⅲ，第 1270 页）［**货币“元”**］

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皇帝 1519—1556 年）的领地从菲律宾延[526]伸到秘鲁，他逐渐被竞相出现的问题的多重复杂性所压倒。在体格上他最不像皇帝。衰弱的肿大腺体给予他一种哭泣般的声音并使他的嘴总是下垂着，一位傲慢的西班牙大贵族告诉他闭嘴“以免苍蝇飞进去”。但他有许多统治他巨大领地的才能。他自己选择说佛拉芒（Flemish）语，对他的官员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而“对他的马说德语”。他也不缺少坚强的意志。当他在米尔贝格（Mühlberg）拒绝留在后方时叱呵道：“让我做一个受到炮弹打击的皇帝。”作为天主教王公公认的领袖，他领导着最强大的事业，可以将基督教世界聚拢在一起。而内部和外部危机就其规模和复杂性使协调行动不能做到。在教会中，虽然成功地发起了宗教公会（General Council），他认识到在特伦特的协商只是在使分裂的观点更强硬。他恢复帝国宗教统一的计划灾难性地拖延下来，尽管有米尔贝格的胜利，施马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战争以奥格斯堡（Augsburg）和约（1555 年）的僵持局面而结束。在西班牙，他作为与他有精神错乱的母亲的共同国王，他与卡斯提公社（*comuneos*）斗争，然后与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阿拉贡

[525]

货币“元”[DOLLAR]

雅希莫夫(Jachimov)是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的一个波希米亚市镇，在比尔森(Plzen，Pilsen)以北约80公里。1518年，冯·施利克(Count von Schlick)伯爵被授予一项帝国专利，在那里开采银矿和建立一个造币厂。他们用“滚轧机”(Walzenwerke)生产的银币，被正式定为“大格罗特”(groat，小银币)，它的流行名称是“约阿希姆斯塔勒”(Joachimsthaler)，不久就简称为“塔勒”(thaler)。

到十七世纪“塔勒”成为一个中欧所有地方的通货单位。它被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仿效，它的“塔勒”(*taleros*)或“当八小银币”(Pieces of eight)，在整个南北美洲流通。它们在英语中被称为“元”(Dollar)，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的30先令(Shilling)银币被称为“剑元”(Sword Dollar)。在十八世纪，银塔勒广泛被从瑞典进口的铜“盘子钱”所取代。它得到了一个瑞典语名称daler。一个1720年的铜daler价值与一个银塔勒相等，虽然它的重量要重250倍，它只能用马或马车运输。[1]

然而这个系列公认的杰作是玛丽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1751年的“元”(dollar)。这种美丽的铸币有女皇的胸像，背面是一只双头鹰，铭文是：

R(罗马)IMP(皇帝)*，HO(匈牙利)BO(波希米亚)REG(女王)*，M(玛丽亚)，THERESIA(特利莎)* D(神)G(佑的)ARCHID(大公)AUST(奥地利的)* DUXBURG(勃艮第公爵)，COM(伯爵)TUR(蒂罗尔的)。

它在整个十九世纪继续成百万地铸造，所有在女皇死后发行的都得有女皇去世的年代，即1780年。墨索里尼(Mussolini)于1936年铸造它为侵略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提供资金。不列颠人在孟买(Bombay)铸造它。二百年后，它仍在亚洲部分地区作为一种国际贸易货币流通。[2]

“元”在1787年被采用为美国(USA)的货币，并被加拿大在1871年采用，但是它不再被用作欧洲的各种货币单位。

(Aragon)分歧的利益斗争。在“新世界”他为保护美洲印第安人进行一场失败的战斗。他将尼德兰留在他婶母玛格丽特(Margaret)手中，他痛苦地被迫用武力镇压了他出生地根特的叛乱(1540年)。在

哈布斯堡家族世袭地——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他委托给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他面对着本地领袖的持续反对。如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扬·扎波利亚（Jan Zapolyai）和在1546—1547年的第一次波希米亚叛乱。在任何地方他都必须与地方议会、任性的贵族、派别的利益作斗争。在战略的规模上，他必须应付法国的敌对，土耳其人的扩张和法国—奥斯曼帝国合作的威胁。

与法国的对抗酿成了五场战争，在所有的领土接触点上作战，在尼德兰，在洛林，在萨伏依，在比利牛斯，在意大利，并且间接地洗劫了罗马（1527年），成为他一生的大耻辱。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导致哈布斯堡家族接管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但是结果它们产生了一系列无尽的耗尽精力的纠纷。在巴尔干地区与地中海都是如此。[**奥兰治**]

[527]

奥兰治［ORANGE］

在1544年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战争的高峰，帝国军队的一位军官勒内·冯·拿骚（René von Nassau），在圣迪齐埃（St Dizier）被一颗法国子弹打死。他的死将会驱动的事件不只影响到他家乡拿骚的历史，而且影响到普罗旺斯、尼德兰和爱尔兰的历史。

拿骚是莱茵河中部右岸的一个德意志小公国，在韦斯特瓦尔德（Westerwald）森林和崎岖的位于威斯巴登（Wiesbaden）北面的陶努斯（Taunus）山之间，拿骚肥沃的莱茵高（Rhinegau）地区有一些德意志最好的葡萄园，包括约翰尼斯堡（Johanisberg）和吕德斯海姆（Rudesheim）。勒内的父亲海因利希·冯·拿骚（Heinrich von Nassau）住在齐根（Siegan），与这个家庭在迪伦堡（Dilenberg）的幼支共有这个公国。勒内的母亲克劳迪娅（Claudia）是一位帝国将军菲利贝尔·德·沙隆（Philibert de Chalons）的姊妹和女继承人，菲利贝尔领兵洗劫过罗马，得到了查理五世给予布拉邦（Brabant）土地的丰厚报酬。并且，她取得了菲利贝尔的奥兰治亲王领地（Principality of Orange）的头衔。当无继承人的勒内被杀，就出现了他将他所有的土地和头衔遗留给他十一岁的堂弟拿骚－迪伦堡的威廉（William）。

奥兰治是一个在罗讷河（Rhône）左岸，阿维尼翁（Avignon）以北的小的有主权的亲王领地。（见原书附录Ⅲ，第1254页）。它东面的边界是文图斯山（Mont Ventoux）的高峰，它是一个富裕的产酒区，它的几个村庄，如吉贡达（Gigondas）和夏托纳夫－都巴普

(Châteauneuf-du-Pape) 因而变得闻名。它的小小首府古代的阿劳西奥 (Arausio), 高耸着提比略 (Tiberius) 树立的巨大罗马拱门。从十二世纪起它是普罗旺斯伯爵的一个封地，因而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在 1393 年，奥兰治的女继承人玛丽·德·博 (Marie de Baux) 嫁给了勃艮第的让·德·沙隆 (Jean de Chalon), 是他们的后裔此后成为这个亲王领地的不在统治者。在 1431 年普罗旺斯伯爵急需一笔赎金，他同意沙隆赎买服从封君的义务。由此奥兰治的亲王们就以他们自己的权利称王。作为法兰西王国内的一块独立的飞地，奥兰治吸引了许多意大利和犹太人的商人，在十六世纪中期它很快变成了一个新教的堡垒。[1] 它最终被路易十四镇压，他在 1703 年消灭这个胡格诺教徒的巢穴。

由于在德意志，普罗旺斯和布拉邦都有继承，拿骚 - 迪伦堡的威廉（1533—1584 年）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甚至拥有已不存在的阿尔勒 (Arles) 王国的权利。身为一位路德教徒，但在布鲁塞尔的帝国宫廷被培养为天主教徒，在那里他称摄政玛格丽特 (Margaret) 为“母亲”，他在北布拉邦的布列达 (Breda) 建立了自己富丽的住宅，在 1555 年他搀扶着有病的查理五世的手臂参加其退位典礼，在 1559 年他作为全权大使签订卡托—坎布雷西 (Cateau - Cambrésis) 条约。他然后作为条约履行的三位保证人之一去巴黎。从所有表面现象看他是天主教与帝国机构的一个支柱，但是在巴黎他听说西班牙征服尼德兰，使他终生厌恶西班牙人的阴谋。他在历史上以“沉默者威廉”而知名。(见原书 536—538 页)[2]

[528]

因此，尽管它以后与荷兰联系，威廉建立的奥兰治—拿骚家族在起源上不是荷兰的。它是一个典型的王朝多民族混合，建立在偶然事件上，并因好运气一直存在下来。威廉的三个儿子中只有一个保持了这个世系延续。这个孩子是威廉的第四位妻子在西班牙特务两次企图谋杀威廉之间的时候怀孕的。威廉曾原谅了他有通奸行为的第二个妻子的情人，他后来逃到父亲彼得·保罗·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那里。威廉的曾孙，也称奥兰治的威廉（1650—1702 年），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生于一场荷兰革命之中，在他的父亲因天花死去后八天。

橙带党 (Orange Order) 于 1795 年在阿尔马 (Armagh) 建立，像较早的“白天偷窥的孩子们”(Peep o' Day Boys) 那样，它的目标是保持新教（主教派，Episco palian）在爱尔兰的霸权。它的英雄是“国王比利 (Billy)（威廉三世）”，它的口号是“绝不投降!”

在不列颠的法律对天主教徒和长老派教徒同样歧视的一段时期里，橙带党将自己看作反对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的"团结爱尔兰人"（United Irishmen）增长的群众性的一群孤立精英的盾牌。托恩（1763—1798 年）是一位孤立的新教徒，他寻求普遍宽容和一个有主权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双重目标。他向法国请求军事援助。

在 1795—1798 年的激烈斗争中，橙带党在不列颠击退入侵和镇压暴乱的计划中起了主要作用。面对无能的敌手，它占了上风。奥什（Hoche）将军的远征在 1796 年从布列斯特（Brest）出航，在班特里湾（Bantry Bay）遭到惨败。亨伯特（Humbert）将军在马尤（Mayo）郡的基拉拉（Killala）的成功登陆是短命的。在威克洛（Wicklow）和韦克斯福特（Wexford）的武装起义在瓦因格尔山（Vinegar Hill）战役（1798 年 6 月）后失败。托恩在穿着法国海军制服被俘后自杀。

在这些和所有以后的事件中，奥兰治党人遵循着他们自己特有的行动纲领。他们既反对《联合法案》（Act of Union）（1801 年），也反对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直到 1829 年以后一个由解放的天主教徒管理的自治的爱尔兰的前景可能出现，他们才改变了对"联合"的态度。他们还反对主流的不列颠统一派（Unionism）。在 1912—1914 年，他们为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s）提供了骨干，这些人训练以公然反抗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和爱尔兰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Bill）（见原书 831 页）。他们最大的影响在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部自治的 1920 年到 1976 年发挥出来。 [529]

二百年来，橙带党在博伊恩（boyne）战役周年纪念（见原书 631 页）举行年度游行。前进者戴着圆顶硬礼帽和橙色绶带，挑战性地徒步通过天主教街区，吹着口哨，踏着笛子与鼓的节奏，呼喊着古老的祝酒词：

为光荣的、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好国王威廉，他将我们从教皇制、奴隶制、无赖行为、黄铜钱币和木鞋中拯救出来。还有那个根本不是东西的科克主教（bishop of Cork）！

在查理五世的最后十年，他有一些乐观的理由。但奥格斯堡和约是一个挫折；并由于受到无休止的困扰，他退位了。他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留给他的儿子腓力普（Philip），其余的留给他的弟弟。他在退隐中死于尤斯特（Yustte）。他是最后一个抱有全面统一梦想的皇帝，被

当代的一些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支持者。一个感兴趣的人写道："查理五世曾经被看作是一次撤退行动的最后一位斗士，现在突然被看作一位先驱者。"[40]

在他退位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忘却了查理的幻想。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Ⅱ，1564—1576年在位）作为雅盖隆家族的孙子，从他被提名推选为波兰—立陶宛国王上没有获得什么。他的两个[529]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年在位，是布拉格[Prague]一位古怪的隐士）和马蒂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在位），完全陷入到他们互相的怀疑与宗教的不和中去。在1607年多瑙沃思事件（Donauworth Incident）之后的十年中，发生了200次以上的宗教叛乱和骚乱，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19—1637年在位），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Ⅲ，1637—1657年在位）和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1658—1705年在位）的精力完全消耗在三十年战争和其余波中。随着在维也纳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和分立的首相府（chancellery），他们工作的重心决定性地转向东部，而帝国似乎在即将瓦解的边缘上摇摇欲坠。在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中，让小酒馆饮酒者们唱道：

> 亲爱的古老神圣罗马帝国，
> 它是怎样团结在一起的呢？

依一位著名的不列颠历史学家的观点，答案更多在于"文明"而不是在于政治领域，即一系列的共有的态度和意识。[41]

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在布拉格的宫廷里聚集的确实是奇妙的怪物。他选择的伙伴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将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东西作为他们每天研究的重要工作。除了开普勒（Kepler），布拉赫（Brahe），坎波恩（Campion）和布鲁诺（Bruno）；还有朱塞佩·阿奇姆博多（Giuseppe Arcimboldo，1537—1591年），以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者而闻名（见图54），科内利乌斯·德雷贝尔（Cornelius Drebber，1572—1633年），一位魔术师和歌剧设计者，作为一个永动机发明者，德雷贝尔访问伦敦，答应给詹姆斯一世（James Ⅰ）一架望远镜，能够在一英里远的距离读书。他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empest）中普罗斯佩罗（Prospero），"着迷于神秘研究者"的原型。正如鲁道夫本人可能给"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的公爵形象创造以灵感。[42]鲁道夫极为富有的艺术收藏成为三十年战争后期瑞典军队的一个战略目标。[**炼金术**][**戏剧**]

[530]

炼金术 [ALCHEMIA]

在 1605 年，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 Ⅱ）是一位哈布斯堡大公们的一份正式的申诉的对象。他们在其《建议》中写道：“皇帝陛下只对巫师、炼金术士、神秘学者和类似的人感兴趣。”鲁道夫在布拉格的宫廷确实容纳了欧洲最突出的神秘术研究中心。[1]

在同一年，一位匈牙利炼金术士亚诺什·班菲—匈雅提（Janos Banffy - Hunyadi，1576—1641 年），从他的家乡特兰西瓦尼亚出发。他暂住在卡塞尔（Cassel）黑森的莫里斯（Maurice）的宫廷中，那是新教神秘主义的主要中心。[2] 他后来到达伦敦时正与有学问的威尔士人约翰·迪伊（Dr. John Dee，1527—1608 年）去世在同一年。迪伊从前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占星家，曾发明了“大不列颠”这个词汇以取悦他的女王，曾在布拉格和波兰度过了几年。如他们这些被称作“世界主义者”的人的职业是炼金术的国际巡回表演，是后来科学团体的真正先驱。

欧洲正经历一次确实的“神秘术复兴”，在其几种有关“神秘术”中炼金术是最重要的。“鲁道夫的世界”的历史学家写道：“炼金术是这个时代中欧的最大狂热。”[3] 它结合了寻找“哲人石”，它会使贱金属转变为黄金，还有类似地寻找人类精神上的重生。“在人间就像在天上一样”。

炼金术士需要跨越广泛知识领域的专门技能。用金属和其他物质进行他们的实验，他们必须熟悉最新的技术。为解释他们的成果，他们必须充分掌握占星术、神秘数字理论、玉石鉴别术、草药学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发明的“医疗化学”［**整体论**］。在一个宗教时代最重要的是，他们谋求以神秘的基督教符号象征语言表达他们的发现。绝非偶然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秘密的玫瑰十字会决定在卡塞尔公开出现，而且，玫瑰十字会通神学的主要系统化者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也是一位受尊敬的炼金术士。［**共谋**］

在后来的科学时代，炼金术士们被看作是一个畸形的分支，长期延迟了真正知识的增长。确实在所谓“科学革命时代”，他们有时被看作“反对派”。最宽厚的科学史家称他们为“没有科学的技术”的实践者。[4] 而在他们自己眼里和有权势的保护者眼里，没有这样的区别。他们是为“兽”而斗争的白巫师，他们是改革者，

他们从事的是寻求打开心灵和物质的秘密力量。他们直到下个世纪末没有被有现代信念的科学家击败；而化学要到更晚的时候才确立起来。[火气][5]

[531]

鲁道夫皇帝的世界主义炼金术士经常掌握有责任的职位。有几个人，如迈克尔·梅尔（Michael Maier）也在伦敦工作；胡格诺教徒的同情者尼古拉斯·巴纳尔（Nicolas Barnard），拥有宫廷医生的职位。其他人如西博尔德·施韦策尔（Sebald Schwaertzer）担任鲁道夫沃（Rudolfov）和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开矿的帝国主管人。[货币“元”] 海因里希·库恩拉特（Heinrich Kuhurath，1560—1605年），是宏大的《基督教神秘术永久智慧的圆形竞技场》（Amphitheatrum Sapitiae Aeternae Christiano – Kabalisticum）的作者，来自莱比锡。米哈乌·塞兹沃伊（Michul Sedziwoj）或名桑迪沃基乌斯（Sandivogius，1566—1636年）的《化学新光》（Novum Lumen Chymicum）（1604年）发行了54版，被伊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彻底研究过，他来自华沙。他与波兰一个亲哈布斯堡的大贵族强大派别有联系，与牛津有交往并将约翰·迪伊带到克拉科夫（Cracow）。约翰·迪伊可疑的助手爱德华·凯利（Edward Kelley）被认为是“坏化学家”（Cacochimicus），也许死在布拉格的监狱里。他们的同伴包括命运悲惨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糖浆］，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和一位名为伊丽莎白·简·韦斯顿（Elizabeth Jane Weston）的英格兰女诗人。

这里也有突出的犹太成分。布拉格的犹太教大法师（Chief Rabbi）朱达·利奥·本·贝札勒尔（Judah Leow Ben Bezalel，死于1609年）保护赞助了犹太教神秘哲学［喀巴拉］的复兴。它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Sephardi）作家的著作促进，如伊萨克·卢里亚（Issac Luria）或摩西·科尔多维罗（Moses Cordovero）的《庭院石榴》《*Pardes Rimmonim*》于1591年在克拉科夫（Cracow）出版。皇帝最亲近的伙伴之一，犹太人马尔多查乌斯（Mardocheaus the Jew），是一位生育力丹药的专家。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炼金术有着最积极的意义：

我看到一个光荣的早晨充满了许多东西，
用至高的眼睛抚爱各个山顶，
用金色的脸亲吻绿色的草地，
用超凡的炼金术为白色的河流镀金。[6]

[532]

歌剧［OPERA］

作曲家称它为“音乐的一种故事形式”。它的意图是模仿古代希腊戏剧。它产生于1607年2月，在曼图亚（Mantua）的“爱好者学院”的面前演出，也许是在贡查加（Gonzags）家族的公爵宫廷的河上回廊中。它的五场的一系列牧歌群和舞蹈，由乐器演奏的插曲和宣叙调联系起来。歌剧脚本是诗人亚历山德罗·斯特里格吉奥（Allessandro Striggio）。地狱场面的音乐用长号演奏，牧歌用长笛和舌簧八孔直笛演奏。它在第三场结尾以一个宏大的男高音咏叹调“强大的灵魂”达到高潮。它是克劳迪奥·蒙特瓦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奥菲欧》（Orfeo）“保留下来的第一部有生命力的歌剧。”[1]

从它于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的宫廷娱乐中起源以来，歌剧的类型，它结合了音乐、世俗戏剧和华丽场面，经历了许多阶段。严肃歌剧（opera seria），它最多产的支持者是皮埃特罗·梅塔斯塔西奥（Pietro Matastasio，1698—1782年），800部歌剧脚本的作者，他致力于古典的和历史的题材。此外还有滑稽歌剧（opera buffa），它开创了一个以轻松心情娱乐的长期传统，通过喜歌剧，导出了轻歌剧直到音乐喜剧。大型歌剧开始于十八世纪晚期，在维也纳、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俄罗斯各学派中达到顶峰。浪漫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突出的要素。最高的桂冠在威尔第（Verdi）、普契尼（Puccini）的爱好者们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狂热的侍奉者们之间争论着。现代主义歌剧始于德彪西（Debussy）的《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Pelieas et Melisande）》（1902年）。一个类别丰富的先驱者中包括伯格（Berg）的《沃兹泽克》（Wozzeck，1925年），布里顿（Britton）的《彼得·格里姆斯》（Peter Grimms，1945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浪子的游历》（Rake's Progress，1951年）。（见原书附录Ⅲ，1278页）**［苏萨宁］［特里斯坦］**

俄耳甫斯（Orpheas）的题材提供了反复出现的灵感。哈科沃·佩里（Jacobo Peri）的佛罗伦萨假面戏剧《欧律狄斯》（Euridice，1600年）先于蒙特瓦尔第在曼图亚的作品。格卢克（Gluck）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斯》（1762年）开创了这个古典的保留剧目。奥芬巴赫（Offenbach）的《俄耳甫斯在阴间》（1858年）是最愉快的标准轻歌剧之一。卢恰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的《歌剧》（Opera，1971年）将这个传统故事放到一个系列剧目之中。

西班牙 在一个世纪略多一点的时间就从辉煌走向衰落。“在神话般的几十年中，西班牙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强国”和“西班牙简直就是欧洲的主人”。[43]在查理五世即卡洛斯一世（Carlos Ⅰ，1516—1556 [531]年在位）统治下，它度过了十字架（crucero）、征服者（conquistadores）和步兵团（trecio）的时代，在美洲的黄金供应和在欧洲维持最好的军队之间有着清楚的相互关系。在腓力普二世统治下（1556—1598年在位），它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处于顶峰，直到被其内部的抵抗，被法国和英格兰的敌对和被尼德兰的反叛所破坏。在腓力普的继承者们腓力普三世（Philip Ⅲ，1598—1621年在位）、菲力普四世（Philip Ⅳ，1621—1665年在位）和愚病的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65—1700年在位）统治下，它再也没有从衰败的王朝、贵族的派别纷争，或它蓄意卷入的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这个衰落是如此突然，以致西班牙人自己往往奇怪：“最初的成就只不过是一个假象（engano）吗？”[44] [**弗拉门戈**]

[533]

弗拉门戈 [FLAMENCO]

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音乐在风格上现在被称为弗拉门戈，从十六世纪起就被演奏和欣赏，这种“歌唱”忧郁的曲调与戏剧性姿态和有节律的踏步的舞蹈合在一起有着无比的效果。不协和音与四分音符的乐音，绝妙的沙哑的歌唱表现力，有节奏的吉他和响板所传达出的一种音响，在欧洲的音乐民间创作中是无与伦比的。

弗拉门戈的历史显示出三个分别的特点，名称、吉普赛人和音乐。关于任何一个都不存在学术上的一致意见。[1]

Flamenco 的意思是“佛拉芒人”（Flemish），在艺术词汇中，它也获得了“异国情调”和“华丽”的含义。一个理论提出来，被宗教裁判所禁止的犹太人歌曲从弗兰德尔（flander）找到了回到西班牙的途径。在那里有许多西班牙犹太人流亡避难。另一个理论认为，Flamenco 源自阿拉伯语，fellah - mangu，意思是“唱歌的农民”。

吉普赛人在犹太人与摩尔人（Morrs）被驱逐后到达西班牙。他们被称为 gitanos 或 egipcianos，即“茨冈人”。英格兰旅行者和作家乔治·巴罗（John Barrow）在1840年代首次记录了这个民族并称他们为“弗拉门戈”。[**吉普赛人**]

安达卢西亚长期的摩尔人音乐传统起源自八、九世纪。科尔多瓦的倭马亚（Omayas）家族以东方歌手在古琵琶（lute）伴奏下唱歌娱乐。在阿布德·埃尔·拉赫曼（Abd-el-Rahman，821—852 年在位）统治下，因一位名为祖里阿布（Zoriab）的歌手从巴格达到来而达到高峰。另一个高峰出现在诗人国王阿勒·穆塔米特（Al-Motamit，1040—1095 年在位）的塞维利亚宫廷中，在那里已知有多于一百件由古琵琶和长笛组成的管弦乐队演奏。在十二世纪，哲学家阿维罗伊（Averroes）说："当一位学者在塞维利亚死去，他的书在科尔多瓦出售；当一位音乐家在科尔多瓦死去，他的乐器在塞维利亚出售。"

推测弗拉门戈与这个地区较早的摩尔人音乐的联系是轻率的。欧洲的吉普赛人有他们自己强有力的音乐传统，在其他地方产生了惊人的结果，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种音乐和音乐有怎样确切地在安达卢西亚碰到一起是一个谜。安达卢西亚心理上的创伤无疑构成了背景，古老的"深弗拉门戈"（flamanco jondo），特别是"无伴奏歌谣"（tonas），属于眼泪和悲叹的世界。像美国最南方的蓝调（blues），它们表达了人们在绝望中的忧郁心情。它们是被剥夺而贫困者的歌。在这方面，它显著地与"小弗拉门戈"（flamanco chico）夸张的风格不同，它于 1860 年代横扫了西班牙的咖啡馆生活，并推动了对安达卢西亚浪漫的"再发现"。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写道："深弗拉门戈是一种口吃的、奇妙的口腔振动，猛烈冲击我们平均律音阶的共振细胞，逃过了现代音乐冰冷严格的五线谱，使半音阶紧密闭合的花开出千朵花瓣。"[2]

腓力普二世必然是那些企图不离开他们的办公桌来进行统治的所有君主的模范。（见图 43）。严肃、刻苦、不知疲倦地坐在马德里郊外荒芜高原上阴暗的埃斯科里亚尔（Esconrial）宫一间单独的书房中，力求推行一种精神上和行政上的一致，而由于他巨大领地的多样性使[532]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通过两个并行的委员会来统治，一个致力于主要的政策领域，另一个专注于六个主要领土单位的政府。因为在他父亲卡斯蒂尔（Castilian）、阿拉贡、意大利、勃艮第（Burgundian）和美洲的遗产上，在 1580 年他又夺取了他母亲巨大的葡萄牙继承下的领地。他对各个议会（Diet）权利的蔑视在绞死阿拉贡的大法官（Justizar）上达于极点。而"一个君主，一个帝，一把剑"的梦想在国王知道怎样更好地为他的人民工作（trabajar para el pueblo）的借口[534]

下，无情地实行着。[45]在这个过程中，他迫使他有病的、被囚禁的儿子死去，他促使宗教裁判所掀起火刑判决（autos-da-fé）的浪潮，他逼迫使格拉纳达（Granada）受迫害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在1568—1569年反叛，被激怒的荷兰人在1566年反叛，受侮辱的阿拉贡人在1591—1592年反叛。他的对手们像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认为他简直是一个“杀人犯和说谎者”。从来没有一个显得敏感的人能如此完全地忽视其他人的感情。作为西班牙教会的绝对主义，他企图根除全欧洲教会的敌人。他发誓为纪念他的第二个妻子在英格兰复仇。他干涉法国以反对胡格诺教徒（Huguenots）。他错误地将荷兰的新教徒看作尼德兰所有不满的根源。但上帝像腓力普二世那样，没有给西班牙带来好运气。到1590年代，一个总危机阴森森地逼近了。1588年的“无敌舰队”（Armada）被风暴摧毁。荷兰人拒不妥协。瘟疫横扫了西班牙的城市。农村被税收榨干，被农业歉收打击，人口开始减少。世界上最富有的钱筐空了。在1596年腓力普二世第四次宣告破产。这是笼罩在辉煌中的悲惨状况，一种难于抗拒的幻灭感。腓力普就像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直在与风车作战。卡斯蒂尔的霸权为其他组成西班牙的各王国深深厌恶。一个铭文写道：“卡斯蒂尔造就了西班牙，而卡斯蒂尔也破坏了它。”[46] **[宗教裁判所]**

在腓力普死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徒劳地企图恢复他们的好运气。为此与他们的奥地利亲戚的力量联合起来作了协调的尝试。加斯帕·德·古斯曼（Gaspar de Guzman）、奥利瓦雷斯伯爵（Count of Oliverez）和圣卢卡公爵（Duke of San Lucar），以“伯爵公爵”（El Conde Duque）而闻名，他从1621年到1643年掌握了政策的制定，运用了较早的卡斯蒂尔改革者们的原则。但是他的事业在葡萄牙的脱离（1640年）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反叛（1640—1648年）中失败。西班牙卷入三十年战争以丧失“联合省”——它最富有的一个资源而结束。与此关联的与法国的战争延长到签订比利牛斯条约（Treaty of Pyrenees，1659年）。被直线上升的战争费用，多条复杂的战线，缺少获得休整的间歇所压垮，西班牙没能挽救自己或它的奥地利伙伴。由于“西班牙道路”有非常大的问题，支持在低地国家军队的后勤供应变得无法做到。“把一个枪矛兵放到弗兰德尔（Flanders）”成为一个西班牙成语，意为“试图做不可能之事”（Poner una pica en Flanders）。[47]一位政治后勤问题史学家写道：“哈布斯堡集团提供了历史上战略过度扩张的一个最大的例证。”[48] **[流浪汉] [瓦尔泰利纳]**

尼德兰的反叛开始于1566年，结束于1648年，构成了一个跨越从哈布斯堡霸权转变到法国霸权的长篇戏剧。在开始时，帝国勃艮第

[535]

流浪汉［PICARO］

“流浪汉”是西班牙人给乞丐和流浪者的名称，也就是生活在定居的和受尊敬的社会边缘之外的人们。它也用于一种类型的通俗文学，即流浪汉传奇，它从十六到十八世纪在整个欧洲比小说还要盛行。这种类型的典型之作是马特奥·阿莱曼（Mateo Aleman）的《古斯曼·德·阿尔弗拉齐》（Guzman de Alfrache，1599年），他在从塞维利亚到罗马的路上，由一位暧昧的女友陪伴的冒险，此书发行了二十六版。古斯曼揭示了乞丐们的同行关系如何形成了互相保护的社团，沉迷于他们足智多谋的诡计来欺骗统治阶级。

但古斯曼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一个叫做拉萨里洛（Lazarillo）的人的出现要早半个世纪。在德意志，一位有本事的讲笑话的人蒂尔·奥伊伦斯皮格尔（Eulenspiegel）在将其首次印刷出版前就已闻名。在1523年路德（Luther）为多次重印的《漫游者之书》（Libre Vagatorum）写的前言，它包括了对二十八类旅行的描述。《森姆普利西斯姆斯》（Simplicissimus），一位原来是三十年战争的士兵漫游了全世界，这是由H.J.G.格里梅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1669年创作的。在法国，在大量的较早出版物之后，勒萨日（Le Sage）于1715年写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出现了。在意大利出版了《流浪者》（Vagabondo）（1621年）。在英格兰，对于流浪许多较小型的介绍从乔叟（Chaucer）起，直到约翰·盖伊（John Gay）于1728年轰动一时流行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达到顶峰。[1]

流浪汉传奇文学明显地反映着广泛存在的社会状况。流浪和乞丐生活充斥了一个大的社会空间，处于中世纪森林中的亡命徒和十九世纪成群结队的城市穷人之间。它是由等级制乡村社会瓦解而产生的，并且被合并了残暴的惩罚和极为执行不力相结合的社会政策所促进。男人们和女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这条道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因为他们是逃犯，尤其因为他们渴望逃脱被压迫的，依附性的农奴或奴仆地位。流浪汉是野性的却是自由的。

流浪汉以成帮结伙和他们自己的社会等级寻求保护。他们成帮地带着家庭和儿童旅行，他们中有些人以伤残激起怜悯。他们有专门的帮会，如扒手、小偷、入室夜盗者、小贩、乞丐、真的和伪装的残疾人、玩杂耍者、歌舞表演者、算命的、补锅的、妓女、洗衣妇、游方教士、音乐家，每个帮会都有规矩和监护者。他

们甚至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秘密用语，被称为“暗语”或“黑话”。他们周期性地聚集起来开会或举行“议会”，选举他们的“国王”或“女王”，他们并与吉普赛部落和未领饷的士兵匪帮分配道路。

[536]

听！听！狗在叫了。
乞丐们来到市镇了。
有些衣服破旧，有些衣衫褴褛，
而有些穿着天鹅绒的长袍。

对流浪者的社会救助是极少的。只有最富裕的城市能够承担得起慈善收容所。如布鲁日从1565年起，米兰从1578年起，里昂从1613年起所作的那样。总之，“慈善”可以是一种恶意伪装的镇压的委婉说法。在1612年，当巴黎市要求它的8000—10000名流浪者在圣日耳曼广场集合接受援助时，只有91人前来。[愚蠢]

残暴的立法突出了当局的无能。例如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给每个教区权力在“顽固的乞丐”的肩上烙印一个字母“R”，即“rogue”（歹徒），鞭打无家者并将他们送回“家”，在实际上宣判他们“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受鞭打”。乔治（Georgian）（一世至四世）时代的英格兰企图区分出“应获救济的穷人”。在同时，1713年的《布莱克·沃尔瑟姆法案》（Black Waltham Act）使得有拦路强盗嫌疑者和他们的同伙可以不经审讯就被绞死。在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只能靠定时地对乡村进行军事征讨来镇压流浪者。在那里发生了儆诫性的绞刑和强制抓兵入伍。在东欧流浪现象随更严酷的气候和农奴制的持续性而变动。但是逃亡农奴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俄罗斯，疯癫的狂信教徒（yurodiv）或流浪的“神圣愚人”在传统上受到款待和施舍，这或许也证明了更为基督教的社会态度。[2]

[537]

瓦尔泰利纳 [VALTELLINA]

在1620年7月，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个遥远的阿尔卑斯河谷瓦尔泰利纳。这个河谷的天主教派别进攻与他们相邻的新教徒，在从米兰来的西班牙军队的援助下，杀死他们所能抓到的

尽可能多的人。这场瓦尔泰利纳大屠杀，在三十年战争的开端，使强国们警觉地看到瓦尔泰利纳的战略潜力。

瓦尔泰利纳位于阿尔卑斯山主脉伯尔尼纳（Bernina）地区的南面。它由阿达（Adda）河形成，从科莫（Como）湖顶端向正东延伸约 74 英里，然后向东北到达博尔米奥（Bormio）的古罗马温泉。一个重要的侧河谷，瓦尔·迪·波斯齐亚沃（Val di Poschiavo），经过伯尼亚山隘通向圣莫里茨（St Moritz）。主要的河谷越过斯泰尔维奥山隘（Stelvio Pass）或斯蒂夫塞尔约（Stielfserjoch）（9055 英尺），通向南蒂罗尔（Tyrol）。在 1520 年为蒂拉诺圣母（Madonna di Tivano）建筑了一个圣龛，在那里主要道路跨越了一条南北小路，通向瓦尔·迪·波斯齐亚诺，并进入瓦尔·卡莫尼卡（Val Camonica）。在 1603 年建立了一个西班牙人要塞，以从科莫湖控制河谷的入口。阿达河北边面向阳光的台地上一连串村庄以产栗子、无花果、蜂蜜和芳香的“雷蒂科”（Retico）酒而闻名。（见原书附录Ⅲ，第 1219 页）

然而起关键性的还是政治地理。到 1600 年代几乎所有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都被萨沃伊公爵（Duke of Savoy）、瑞士联邦或威尼斯共和国所控制。当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得到他们在意大利的西班牙亲戚的支持时，瓦尔泰利纳成为两块主要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之间惟一可通过的走廊。确实，因为西班牙与尼德兰之间的海上通道越来越受到荷兰和英格兰战船的威胁，瓦尔泰利纳成为从西班牙和西班牙属意大利向神圣罗马帝国运送黄金和军队的最后安全通道。它是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实体的颈静脉。

但行进的枪兵纵队和驮着“当八钱币”的骡队仍是极易受到攻击的。他们不受本地居民的欢迎，其中许多居民已转信加尔文教。他们公开地受到来自格劳宾登（Graubunden）或格里森斯（Grisons）自由州经由瓦尔·波斯齐亚诺的直接攻击。他们是属于因复杂的所有权争端而改变命运的人。哈布斯堡家族和格里森斯都宣称对瓦尔泰利纳有继承权，根源来自米兰的维斯康蒂（Visconti）公爵们与居尔（Chur）主教们的中世纪争端。为了不使别人超越自己，法国人断言查理曼将瓦尔泰利纳授予圣但尼（St Denis）修道院作为永久产业。

1620 年之后，这个河谷成为黎塞留与威尼斯，瑞士和萨伏依的外交活动的焦点。在以后二十年中它经历了法国与西班牙驻军的五次相互取代。在 1623 年与 1627 年它在调解时被交给教皇军队。在 1623—1625 年它被格里森斯夺取。在 1633 年和 1635—1637 [538]

年它被胡格诺公爵罗昂（Rohan）率领的法国军队夺取。但是这些法国人激怒了他们的新教同盟者，以致一个当地的牧师乔治·耶纳奇（George Jenatasch）改变了立场，召来了西班牙人，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此后，在夺取了莱茵地区后，法国人能够放心地将瓦尔泰利纳留给了天主教，并最终让它由意大利的命运支配。在一代人的动乱之后，这个河谷又回到它的葡萄园，生产萨塞尔拉（Sassella）、格鲁梅罗（Gurmello）、瓦尔盖拉（Valgella）、蒙塔纳（Montagna）酒，还有一种橙色的强烈的葡萄酒斯福尔扎特（Sfurzat）。

圈子的十七个省在1551年转归西班牙统治，它们表现为一幅地方特[536]权和社会与文化区域划分的镶嵌画。乡村的封建贵族与沿海市镇富有的市民与渔民形成鲜明对照。埃诺（Hainanlt）、那慕尔（Namur）和列日（Liège）讲法语和主要是天主教徒的瓦隆人（Walloons），与荷兰、泽兰（Zeeland）和乌得勒支（Utrecht）讲荷兰语的并日益增多的加尔文教人口形成对照。弗兰德尔和布拉邦（Brabant）的中央省份横跨主要的语言和宗教分界。二百多个城市控制着大约百分之五十的欧洲贸易，带给西班牙比西印度群岛（Indies）的金银多七倍的税收。确实在西班牙统治的最初阶段，对地方的自由权利和贵族对教会收益控制的威胁，比起宗教裁判所创立的威胁来，是使民众怨恨更大的原因。（见原书附录Ⅲ，第1275页）

在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摄政的统治下，即1559—1567年，不满在教会改革计划上爆发。三个抗议者，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沉默者威廉（1533—1584年）、埃格蒙德伯爵拉莫拉尔（Lamoral，Count of Egment）和霍恩伯爵蒙莫朗西（Montmorency，Count of Horn），在摄政的允许下向国王请愿。他们被嘲笑为“乞丐”（Genzen，les Gueux），而在1565年，在塞哥维亚敕令（Edict of Segovia）中，腓力普表示他拒绝批准变革。随着对改革的进一步请愿，1566年联盟贵族们在圣特隆德（St Trond）的会议要求宗教宽容，[538]出现了严重的暴乱和破坏宗教圣物行为，联盟者帮助摄政镇压骚乱的行动没有阻止腓力普下令普遍镇压。在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的摄政统治下（1567—1573年），一个勘乱委员会（Council of Tumults），即臭名昭著的“血腥委员会”（Bloedraad）建立起来审判国王的反抗者。埃格蒙特与霍恩在布鲁塞尔的广场上被斩首，他们被砍下的头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马德里。奥兰治的威廉逃脱并领导持续的斗争。随着尼德兰的全体人口被教会作为异端判为死罪，南方与北方一样反叛

了。“海上乞丐”攻击了航船。哈勒姆（Haarlem）被围攻并有条件投降。西班牙驻军放火和抢掠。数千人在任意逮捕、做样子的审判和暴力横行中死亡。

在唐·路易斯·雷克森斯（Don Luis Requesens），卡斯蒂尔的总司令于1573—1576年，和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于1576—1578年任总督的统治下，企图调解的努力失败了。在西班牙复仇期间（1576年）对安特卫普的洗劫使抵抗更坚决。在帕尔马公爵（Duke of Parma）于1578—1592年摄政期间，分裂变得不可挽回。通过阿拉斯同盟（Union of Arras，1578年），十个南方省份接受了西班牙的条件并恢复了它们的自由权利。通过乌得勒支同盟（1579年），七个北方省份决心为它们的独立战斗。此后是不间断的战争。西班牙的军事手段从来没能成功对抗荷兰人的堤防、金钱、战船和同盟者。在1581—1585年和1595—1598年荷兰人得到法国人援助，在1585—1587年得到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领的英国人的援助。在1609年他们享有了十一年的休战，但是从1621年到1648年被迫在反皇帝同盟的阵线中继续战斗。他们的坚定性获得了成功。一个新民族的精神铭刻在哈勒姆泽尔斯塔特（Zijlstaat）一位市民房子的前面：“我将忠于亲爱的尼德兰，永不动摇。”（INT SOET NEDERLAND; ICK BLYF GETROU; ICK WYCT NYET AF）[49]

“尼德兰联合省”的荷兰共和国（在英语中因为误用为“荷兰”Holland而得名）是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是与它自命的主人西班牙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通过八十年痛苦的诞生过程，它可利用的资源实际上一直在增长。在抵抗那时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际，它就以自己赢得的权利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它那坚强的市民社会广泛地实践了谨慎的经营、民主和宽容的优越性。它的工程师、银行家和海员有当之无愧的名声。它的宪法（1584年）确保了[539]七个省政府与仍在海牙（The Hague）的国家联省委员会分离。联省委员会由一位有执行权的执政（Stadholder）主持，他的职务通常与陆军统帅（Captain General）和海军统帅（Admiral General）一同掌握在奥兰治家族手中。[**奥兰治**]

荷兰共和国很快成为宗教异见者、资本家、哲学家和画家的庇护所。较早的佛拉芒（Flemish）画派的鲁本斯（Rubens，1577—1640年）和凡·代克（Van Dyck）被荷兰画派的哈尔斯（Hals）、勒伊斯达尔（Ruysdael）、弗美尔（Vermeer），尤其是伦勃朗（Rembrandt）（哈尔门松·凡·赖恩，Harmenzoon Van Rijn，1609—1666年）所超越。尼德兰并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闷的损害。它的宗教事务由于阿明尼乌教派（Arminian）的争论而活跃，它的军事事务由于和平主义观点的有力表达而富有生气，它

的政治由于一个极端共和主义的党派在扬·德·维特（Jan de Witt，1625—1672年）领导下，于1651—1672年成功地使执政职位空缺。它的政治力量由于在1651—1654年，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三次与英国的战争而衰落。尽管如此，尽管它有独特的非中央集权的宪法，它有一切理由被视为第一个现代国家。[50] ［巴达维亚］

法国也进入了一个恢复活力与辉煌的时期，她较少为遥远的殖民地拖累，在地理上更为结合紧密，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有分量的竞争者。而法国在战略上一边被神圣罗马帝国，另一边被西班牙所包围。北面是西班牙属尼德兰，南面是西班牙的地中海属地。法国人在企图得到他们感到应享有的统治地位上一再遭到挫败。

[540]

巴达维亚［BATAVIA］

在十七世纪中期，几位到阿姆斯特丹的旅行者，记录了他们看到或听到的令他们吃惊的“溺人室”。在城市的行为矫正所，为了教训懒惰的年轻人去工作，对所要矫正的人放进一个封闭的地下室中，只装备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手压水泵。不论何时停止压泵，就面临着被淹死的危急情况。这种装置是对荷兰共和国和它的堤防的自然危险境况的一个绝妙比喻。这也是对这个国家的“精神地理”，被称为“巴达维亚人气质”的很好描绘。[1]

荷兰共和国在它的全盛期以它的商业，它的城市，它的海军力量，它的运河，它的风磨和郁金香，它的艺术，它的宗教宽容，它的黑白花牛群，它的市民精英的清教徒文化而闻名。这幅图画是很真实的，但是它引发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些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充满着模糊不清之处，另一个是关于首先所有这些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一种农业、渔业和造船业体的适度分工，没有共有的语言、宗教和政府，怎样将其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的”。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位主要历史学家强调，这个奇迹不是由一个阶级作出的，而是由一个早熟的“民族共同体”作出的。[2]

荷兰文化的核心悖论在于它节俭、努力工作和敬畏上帝的民族精神和“令人困窘”的奢侈品收藏之间的奇怪矛盾。严肃的、穿着黑色服装的荷兰市民喜欢举行宴会，爱好烟草，建造豪华的房屋，屋内家具与装饰奢侈，收藏绘画，沉迷于肖像画的虚荣，并积聚钱财。性关系是较随便的。家庭关系是伙伴式的而不是父权制的。妇女按那个时代的标准是自由的，儿童是被爱护的。募

集帮助穷人的资金的常规活动是组织城市彩票或拍卖黄金、珠宝或银器。

在它这一切之上有一种无比的自由精神在支配着。它认为财富和安全只能由冒险的事业而获得。

这里躺着伊萨克·勒·梅尔（Issac le Maire），商人，在他遍及整个世界的事务中，靠上帝的恩典，体验了极大的富足，并在三十年失去（除了他的名誉外）超过150000盾。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死于1624年9月30日。[3]

对荷兰学者来说有许多这样的事是熟知的。但是为世界普遍重塑这种独特精神的任务落到一位父母是荷兰犹太人的不列颠学者身上（指英国学者西蒙·沙马 Simon Schama，1945年出生——译者注）。他使是否存在民族特点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

在将文艺复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Louis XIV）分隔开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国王们一再在国内外陷入令人窒息的错综纠纷之中。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在1494年发动了意大利战争，不切实际地要求得到安茹（Angevin）家族对那不勒斯的王权，只是使他的国家卷入了持续65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斗争。路易十二（Louis XII，1498—1515年在位），“他的臣民之父”（Père de son Peuple），维斯康蒂（Visconti）家族的后裔，类似地要求得到米兰的权利。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1515—1547年在位）生于科涅克（Cognac），是一位优雅的骑士，有教养的愉快的人，杰出的文艺复兴式君主，在1519年的皇帝选举上遇到第一次挫折。第二次挫折是于1525年在帕维亚（Pavia）被俘。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一切都完了，除了我的荣誉和生命。”（Tout est perdu, fors l'honneur et la vie）。他被释放并与皇帝的姊妹结婚，没有限制他继续法国与德意志的世仇之争，从此这场斗争在近代史的余下时期内支配着欧洲。他是一位有广阔视野的君王，是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远征加拿大的支持赞助者，拉伯雷（Rabelais）、列奥纳多（达·芬奇）、切里尼（Cellini）的庇护者，勒阿弗尔（Le Havre，城市）和法兰西学院的创立者，尚博堡（Chambord）、圣日耳曼（Saint - Germain），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建造者。**[阿尔科弗瑞巴斯]** **[鼻子]** **[酷刑]**

在瓦卢瓦（Valois）王朝最后四个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547—1559年在位)，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1559—1560年在位)，年轻的查理九世(Charles Ⅸ，1560—1574年在位)，在恶名昭彰的亨利三世(Henry Ⅲ，1574—1589年在位)的统治期间，因卡托—康布雷齐和约(Câteau - Cambrésis)(1559年)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得到休战机会，只是陷入了宗教战争的可怕泥潭(见上文)。玩世不恭的波旁家族(Bourbon)的亨利四世(Henry Ⅳ，1589—1610年在位)，将法国从宗教斗争中拯救出来，并与他好梦想的大臣苏利[541]公爵(Duc de Sully，1560—1641年)一道，准备了恢复繁荣和国际和平的计划。他许诺说："在我的王国里，将没有一个(农民)劳动者锅里没有一只鸡。"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也死于谋杀。[**大谋略**]

路易十三(Louis ⅩⅢ，1610—1643年)的长期统治和他儿子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的幼年时代(1643—1651年)，被两位强有力的教会人士阿尔芒·迪普莱西(Armand Duplessis)，即枢机主教黎塞留[542](Richelieu，1585—1642年)和朱里奥·马扎里尼(Giulio Mazzarini)，即枢机主教马扎兰(Mazarin，1602—1661年)的影响掩盖。外部事务完全专注于三十年战争，内部事务完全专注于中央集权的王权反对地方与贵族的特权。三级会议在1614年召开后被停止。黎塞留对地方上贵族财富和权力的根源的无情打击，引发了绝望的反叛和1648—1653年间的投石党(Fronde)战争。路易十四成年时代的日出打破了满布阴云的天空。

[541]

阿尔科弗瑞巴斯 [ALCOFRIBAS]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ebelais)原是一位僧侣和律师，后来是一位医生。他的著作构成了早期近代欧洲所能提供的文学与历史宝库中最丰富的收藏。但是它们的不合常轨引起了一个不宽容的时代的怀疑，首次出版时用了一个字谜式的笔名阿尔科弗瑞巴斯·纳西耶(Alcofribas Nasier)。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研究表明它们仍在引起广泛的学术兴趣。

费弗尔是年鉴学派(Annales)的创建人之一，在了解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庞大固埃(Pantagruel)和高康大(Gargantua)的创作者是一位秘密的和有斗争性的无神论者之后，他仔细研究了拉伯雷。拉伯雷在小说中发明一个名为"泰来美"修道院，它惟一的规则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由此谁也不会认为拉伯雷是一位传统的宗

教思想家。另一方面，指控他颠覆基督教，也说得太严重了。为回应这些说法，费弗尔发表了一部研究“集体心态”的名著《十六世纪的不信宗教问题》(Le Probleme de l'Incroyance au XVI Siècle)(1942年)。在考察了所有对丑行的指控，所有对非正规信仰的可能资料，激进的新教教派，科学、哲学和神秘术后，他断言拉伯雷在“一个需要信仰的世纪”同样有着“深深的宗教意识”。[1]

巴赫金是俄罗斯一位杰出的研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学者，从心理学的兴趣上研究拉伯雷。拉伯雷一直有粗俗的笑话大师的名声 [**鼻子**] 但是他也进入了使笑声混合着泪水的更深刻的领域。巴赫金提出了一个假设，以拉伯雷的一个著名命题为核心，“笑声是人性的标志”。“会笑的人是人类，是人就会笑。”(Mieux est de rire que de larmes crire. Pour ce que rire est le propre de l'homme.)

但是巴赫金怀疑现代文明严重地压制了这种最具人性的品质。从拉伯雷那时起，欧洲人已变得习惯于只为琐事发笑。确实，他们不再知道什么是神圣的以对其发出笑声。这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观念，类似于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nlt) 的社会分析。这使人们会想，是否拉伯雷是最后一位有真正人性的欧洲人。[2]
[**博爱**]

[542]

鼻子 [NEZ]

在1532年拉伯雷描述了在他创作的英雄巴奴日 (Panurge) 和一位英格兰男子之间想象的决斗手势：

> 于是这位英格兰男子做了这个信号。他将左手完全张开举在空中，然后立刻握起其中四个手指，将他伸直的拇指放在他的鼻梁上。接着他举起完全张开的右手，将拇指靠在左手的小指上，将右手的四个手指在空中轻轻移动。然后，相反地，他用右手做他左手做的动作，用左手做他右手做的动作。

根据近来的研究，“用拇指触鼻子”或“翘起鼻子”是所有欧洲人的姿势中最广泛运用的。它表达嘲笑挖苦。在法国，它被称为“‘傻子’的鼻子”(le pied de nez)，在意大利是“咪咪叫”(marameo)，在德意志是“长鼻子”(die lange Nase)，在葡萄牙是

“吹喇叭”（tocar tromfete），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吹笛子”（svivi ti svode）。它比起吻指尖、拧太阳穴、拉眼皮、挥前臂、用指头作圈、将拇指夹在两手指之间、敲鼻子和伸手指作 V 字形都更普遍和较少歧义。而所有这些姿势都有重要的地区性和场合条件上的变化。[1]

是否有一种欧洲或基督教世界所独有的手势文化是争论的。但无疑姿势是随时间变化的。英格兰人确实在中国拒绝叩头，也在十八世纪晚期在国内放弃了鞠躬，发明了握手作为不分性别和阶级问候的较随便的形式。“打一个英国人的招呼”，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1857 年在向一位绅士伸出手时说。然而在二十世纪英国人变得要固执地含蓄得多，在大陆人习惯这样做时通常拒绝握手。[2] 在欧洲范围内与他们位于相反一端的波兰人，他们乐于鞠躬，不分性别地拥抱和在公共场合吻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现代化、法西斯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后仍保存下来。

[543]

酷刑［TORMENTA］

在十六世纪中期巴黎的仲夏节集市上，烧猫是一个常有的吸引人的节目。建造一个特别的台子，以便能使盛着几十只猫的大网能够下降到下面的篝火上。观看者们包括国王和王后们笑着尖叫，看着动物们痛苦地嚎叫，被燎着毛皮，被烧烤，最后被烧焦。残酷明显地被认为是有趣的。[1] 它在欧洲许多更传统的运动中起着作用，包括斗鸡，用狗逗熊，斗牛和猎狐。[赛会]

两百年以后，在 1757 年 3 月 2 日，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 François Damiens）在巴黎被判处“作出最名誉的赔偿”。

他被一辆死刑犯押运车带来，光着身子只穿着一件衬衣，在他手中拿着一个有燃烧的蜡烛的火把。断头台立在格雷弗广场上。他的胸部、胳臂、大腿和小腿都被铁钳钳住，右手握着一把刀，他用它犯了所谓的罪行。他的手将用硫磺来烧，绑着的手臂末端被浸在沸油中、熔化的铅中和燃烧的松脂中，然后被四匹马肢解。此后将他的身体烧掉，直到变成灰随风扬散。

当火点着时，热度是如此之低，只有一只手手背的皮肤被烧坏。但是此后其中一位刽子手，一位强壮粗野的人，抓起每个有

1.5 英尺长的金属钳又拧又转，撕下大块的肉，留下撕裂开的伤口用红热的勺子浇灌。

在他的尖叫声中间，达米安一再地叫喊："我的上帝，怜悯我！"和"耶稣，救救我！[1]"观看的人们深受一位年老的教区教士不失时机地安慰他的热诚的感染。

法庭的书记德·布勒东先生（Sieur de Breton），几次走到受难者那里，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没有。

最后的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马匹不习惯这样拉。需要六匹马，但它们也不够用。

刽子手问是否要他们应将他砍成块，但书记命令他们再次尝试。叫忏悔的神父们再次靠近，他说："吻我，先生们。"他们中一个人吻了他的前额。

"又尝试了两三次后，刽子手们拿出刀子，砍下他的腿……他们说他死了。但是当躯体被拉开时，下颚仍在动，像是要说话……在执行判决中，直到晚上 10 点 30 分最后一块肉才烧光……"[2]

达米安因企图杀害国王被惩罚。他本人的家庭被逐出法国，他的兄弟姐妹们被命令改变名字，他的房子被夷平。他在路易十五进入马车时接近国王，用一把小刀造成了一个小伤口。他对高等法院作了某种申诉。他没有企图逃走，并说他只是要给国王一个惊吓。在今天他会被评判为一个妄想者。

拷打从罗马时代起一直是法律程序和处死时的一个既有特点。圣奥古斯丁认识到它是易出错误的，但承认它是需要的。处死时的拷打被认为有一种训诫的目的。当罪犯被钉尖桩，挖出内脏，在火刑柱上烧，被轮子碾碎，死是这种惩罚最少的部分。[**弗拉德**] [544]

达米安的死在法国是这种方式的最后一个。启蒙运动对此不赞成。不久之后，一位米兰人，切萨雷·贝卡里亚—博内萨那侯爵（Maquis Cesare Beccaria - Bonesana，1735—1794 年）出版了小册子《论犯罪与惩罚》（Die dilitti i delle pelle）（1764 年）。它的论证拷打是不正当的和无效的。它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并有伏尔泰写的前言。它是遍及欧洲的改革的催化剂。它广泛地被看作一个长期进步趋势的起点，首先敦促处死的人道方法，最终废除了死刑。这条"残酷性曲线"将会下降，直到自由的观点认为，拷打贬损的不是被拷打者，而是拷打者和拷打者的主使人。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拷打在欧洲还没有结束。[3] [**阿尔科弗瑞巴斯**]

意大利战争通常被当做近代史的起点，和作为一场本地斗争变得

[544]国际化的模式。(两者都不是)。法国军队在1494年9月越过蒙特热内夫尔(Montgenèvre)的隘口奔向那不勒斯，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与帝国的明文协议，帝国事先从弗朗什—孔泰(Franche - Comté)得到补偿，而阿拉贡则以鲁西永(Roussillon)作为礼物而打发过去。因而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法国人三次远征的结果，每次都引发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击败它。查理八世在1494—1495年的远征，在胜利地扫荡过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后，夺取了那不勒斯，但是被迫以同样的速度撤退。路易十二在1499—1515年的远征，以同样的方式夺取了米兰，用列奥纳多雕塑的骑马人像做打靶练习。但是它引起了由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发起的“神圣同盟”的反对。弗朗西斯一世于1515—1526年的远征，以在马里尼诺(Marignano)的一个漂亮的胜仗开始。它与其他事情一道，使瑞士转向永久中立，并促使教皇在1516年签署了《宗教事务协约》(Concordat)。但是它被皇帝选举的惨败所中止。这使弗朗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成为死敌。1525年在帕维亚报了马里尼诺之仇，弗朗西斯一世被释放后，他促使一位新教皇组成一个反对过分强大的皇帝的新神圣同盟。接着发生了帝国军队在1527年对罗马的可怕洗劫，这次是教皇成了俘虏。到此时意大利战争已经不过是法国与帝国普遍化的斗争中的一条阵线。

法国与帝国的战争操纵着大陆的平衡。在弗朗西斯一世企图打破帝国的包围时，他毫不迟疑地从所有地方吸收同盟者。在1519年，他[545]亲自作为皇帝候选人。尽管豪华的“黄金布地”(Field of Cloth of Gold)会见失败了，他最终赢得了英格兰亨利八世的同情。他与德意志的新教王公们拟定了可耻的计划，而于1536年通过著名的《治外法权协定》(Capitulations)中，他与异教徒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合作，并与苏丹(Sultan)的北非臣属们，包括海盗王凯尔·埃尔·丁·巴巴罗萨(Kair - el - Din Barbarossa)合作。在意大利多变的互动中，他得到教皇和梵蒂冈的主要对手威尼斯共和国多方的支持。

结果是又进行了四次战争。在1521—1526年帝国军队首先进攻了法国的勃艮第，这发生在倾全力于在帕维亚结束的意大利战役和《马德里条约》(1526年)之前。在1526—1529年皇帝过度扩张而丢了脸面，在康布雷(Cambrai)签署了“贵夫人和约”(Ladies' Peace)(1529年)。在1536—1538年和1542—1544年，他卷入了与土耳其人与德意志新教徒还有法国人的纠纷之中，被迫签订了《克雷皮—安—瓦卢瓦(Crépy - en - Valois)条约》，它造成了一个可以召开特伦特宗教公会的间歇，和长期延迟了对施马卡尔登同盟的进攻。在1551—1559年，亨利二世在位时期，法国人与德意志新教徒合谋占领了洛

林（Lorraine）的三个大主教区梅斯（Metz）、图勒（Toul）和凡尔登，由此发动了“向莱茵河推进”和一场边界斗争，直至1945年才结束。（见原书附录Ⅲ，第1281页）哈布斯堡王朝在低地国家以占领阿图瓦（Artois）回应，与英格兰的结盟立刻刺激法国人忘记他们的宗教分歧而夺取了加来（1558年1月7日）。玛丽·都铎（Mary Tudor）与腓力普二世的委托式婚姻是这个短暂的哈布斯堡—都铎友好关系的代价，她宣称：“当我死去时，你们会发现加来刻在我的心上。”由于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的普遍和平，法国保有了洛林和加来，哈布斯堡王朝保有阿图瓦、米兰和那不勒斯。英格兰永远地被排除在大陆之外。主要的问题被搁置下来而没有解决。**[诺查丹玛斯]**

[546]

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

王家传票在1556年7月初到达普罗旺斯的沙龙（Salon de Provence）。法国王后玛丽·德·美第奇（Maire de Medici）希望与前一年出版一本预言书的著者谈话。它的诗句之一看来预言了王后丈夫的死亡：

> 年轻的狮子将会战胜年老的狮子，
> (Le lion jeune le vieux surmontera)
> 在战场上一对一的战斗中，
> (En champ bellique par singulier duelle)
> 他将刺穿在他舍笼中的眼睛，
> (dans caige d'or les yeux lui crevera)
> 两个伤口一次造成，然后他痛苦地死去。[1]
> (Deux classes une, puis mourir, mort cruelle)

在一个月内，靠王家马匹的速度，作者被领到在圣日耳曼昂策（St Germain-en-laye）的王后面前。他使她的恐惧平静下来，说他在她的四个儿子中看到四个国王。

但三年后，国王亨利二世（Henri Ⅱ）在一次比武中被杀。他的对手蒙哥马利（Montgomery），苏格兰人卫队长的劈裂的长枪刺穿了国王镀金头盔的面罩，刺裂了眼睛和喉咙，造成的伤口使国王在十天后痛苦地死去。

米歇尔·德·诺斯特拉达姆（Michel de Nostredame，1503—1566

年)，被称为诺查丹玛斯，在法国南部的非传统的治病者而闻名。他来自圣雷米—昂—普罗旺斯（St Rémy-en-Provence）的一个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蒙彼利埃的医学专业。他学习了药剂和治疗，为卡尔卡松（Carcassonne）主教配制长生不老药，为教皇代表配制果冻食品。他在马赛和阿维尼翁遭受瘟疫时，所有的其他的医生离开时在那里工作。拒绝如惯例给病人放血，而主张新鲜的空气和清洁的饮水。不止一次他被怀疑为男巫，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注意并逃到国外。在1540年代的一次旅行中，据说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僧侣，原来是牧羊人，名为费利切·佩雷蒂（Felice Peretti)，他就毫不迟疑地称他为“宗座”（Your Holiness)。四十年后，在诺查丹玛斯死后很久，佩雷蒂被选为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Ⅴ)。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是在他生命的后期，靠魔法、占星术和犹太神秘哲学的书的帮助写成的。它们用四行一节的诗写成，分成世纪组织而成。它们分两部分于1555年和1568年出版，并立刻引起轰动。在它完全出版后一年，玛丽·德·美第奇的大儿子，国王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苏格兰女王玛丽的丈夫，在17岁10个月15天时突然死去。 [547]

第一个儿子，一位寡妇，一次不幸的婚姻，
(Premier fils，veuve，malheureux mariage)
没有孩子，两个岛处于不和之中，
(sans nul enfant；deux isles on discord)
在十八岁之前，一位年轻较小的
(Avant dixhuit incompetant eage)
比其他一位更年轻的，将会订婚。
(De l'autre près plus bas sera l'accord.)[2]

在这同一年，年轻的兄弟，后来的查理九世（Charles Ⅸ)，十一岁，与一位奥地利公主订婚。

这种作者去世后的成功确保了这些所有时代的预言的声誉。它们被无休止的重印，被应用到几乎每个知名的事件中。从潜水艇和洲际弹道导弹（ICBM）到肯尼迪（Kennedy）之死和人类登上月球。诺查丹玛斯正确地指出了索尔斯（Saulce）家庭的名字，路易十六（Louis ⅩⅥ）逃往瓦伦时曾住在那里。他相信有拿破仑和希特勒（他称之为“希斯特”，Hister)，他们的事业在星辰中可以

预见。这些四行诗奇妙地富于暗示性和模糊，可以用来适应各种方式的巧合。但是许多也接近于安慰：

当轿辇被旋风掀翻时
(Quard la licture du tourbillon versée)
人的脸孔被斗篷覆盖，
(Et seront faces de leurs manteaux couvers)
共和国将被新的人民扰乱，
(La république pars gens nouveaux vexée)
在那时，白党和红党将会反复进行统治。[3]
(Lors blancs et rouges jugeront à l'envers)

在 1792 年共和国确实降临法国，而红党确实推翻了白党。而在简短地描绘了二十世纪的生活时，下面的话是可怕的：

瘟疫消灭了，世界变小了，
(Les fléaux passées diminue le monde)
在一个长时期里，在空旷的土地上有着和平，
(Long temps la paix terres inhabit es)
人们将安全地在空气、陆地、海洋和波浪上行走，
(Seur marchera par ciel, terre, mer et onde)
然后再次掀起战争。[4]
(Puis de nouveau les gurres suscitées)

不列颠群岛越来越为英格兰人所统治，它们接近于已经有一两次颇具诱惑力的统一。在丧失了大陆上的立足点后，英格兰王国将它的精力转向它直接相邻地方的事务和海外的冒险。这个时代一个典型的复合政治实体，由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组成，它缺少苏格兰已经拥有的民族凝聚力。但是在都铎时期它表现出很大的活力。尽管这是个宗教斗争的时代，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和他的三个儿女，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1574—1553 年在位）玛丽一世（Mary Ⅰ，1553—1558 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58—1603 年在位），创立了英格兰教会、议会和君主制的长久共存和皇家海军。**[莎翁]**

斯图亚特从 1371 年起统治苏格兰，在都铎王朝绝嗣后接受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个人联合。（1603 年）他们有许多可以得到。被

[548]

莎翁 [BARD]

莎士比亚是在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切断了与大陆的直接联系之后，但还没有获取一个海外帝国之前的一个短暂间隙写作他的戏剧的。他的主要戏剧写作于首批英格兰殖民地在美洲建立的那几十年里。他的声音将在说英语的世界中有着无比的影响力，而就人们所知，他从未跨出英格兰一步。他的天才的世界性，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在欧洲没有被普遍承认。

而这一整套剧作提示着这位埃文河的天鹅（Swan of Avon）绝不是一个“小英格兰人”。他甚至可能是一位秘密的天主教徒。都铎王朝的检查制度很好地禁止了政治上敏感的题材。而在三十七个题目中，只有十个是整体或部分处于英格兰，而历史剧系列有很大程度与法国的地点相混合。《风流娘们》（Merry Wives）发生在温莎（Windsor），《终成眷属》（As you like it）发生在阿登森林（Forest of Arden）。三个悲剧故事《麦克白》（Macbeth）、《李尔王》（King Lear）和《辛白林》（Cymbeline）发生在古代凯尔特人的不列颠；八部古典戏剧发生在雅典、罗马、推罗（Tyre）和特洛伊。迷人的故事《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冬天的故事》（A Winter Tale）和《暴风雨》（Tempest），展现在神秘的伊里利亚，在一个由海环绕的波希米亚，和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但其余的明显是在大陆上：

剧名	剧中情节发生地点
《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墨西拿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
《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	帕多瓦
《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	维也纳
《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	纳瓦尔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雅典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维罗纳
《哈姆雷特》（Hamlet）	丹麦
《奥塞罗》（Othello）	威尼斯
《皆大欢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鲁西荣、巴黎、马赛、佛罗伦萨

莎士比亚避开的国家是爱尔兰，几乎不知道的俄罗斯。波兰只是在《哈姆雷特》中顺便提到。另外还避而不谈德意志，当时英格兰的主要敌人西班牙以及西属尼德兰。

至于这些国家确切地处于什么地方，莎士比亚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有着两种见解。《风流娘们》中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将自己描绘为“欧洲最活跃的人”。但是《驯悍记》中的彼得鲁乔（Petrucchio）向悍妇凯特求爱时，称她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可爱的凯特”。[1]“基督教世界”和“欧洲”仍应是在实际上可以互换的。

它在大陆的同盟者欺骗，苏格兰从弗罗登战役（Flodden Field，1513年）的血腥灾难之后就生活在英格兰的阴影之中。英格兰—苏格兰关系被废黜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1542—1587年）的阴谋严重地动摇，她死在英格兰的断头台上。但是玛丽的儿子詹姆斯一世与六世（James I and VI，1567〈1603〉—1625年在位）在普遍同意下得到了绕过他母亲的王位继承权。他及他的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1649年在位）[549]和他的孙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1649〈1660〉—1685年在位）在霍利卢德（Holyrood）宫和白厅（Whitehall）实行平行的统治。詹姆斯一世在威斯敏斯宫（Westminister）对他的第一次议会说：

英格兰和苏格兰现在……在预定的时候……以我个人的名义联合起来了。就像两个王权血统上相传下来的那样，由此它现在变得像在它本身之内一个小世界，被一个自然而可爱的池塘或沟渠环绕在周围防护着……

整合依附的公国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威尔士被亨利八世设郡治理，没有异议地进入了英格兰政府组织。英格兰—威尔士的乡绅有理由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但是爱尔兰从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起，它的议会就脱离了英格兰的控制，只是艰难地被约束着。在1541年，当英格兰教会和威尔士的各郡在1534年已经诞生后，亨利八世宣布他自己为“爱尔兰国王”，他给他的继承者们制造了麻烦。将爱尔兰酋长转变为伯爵和男爵的政策不过是一种姑息手段，特别是当爱尔兰人的习俗和语言被废止时。对王权的怨恨不久就与对新教改革的怨恨混合在一起，燃起了一系列的反叛。1592—1601年的“九年战争”，是围绕着休·奥尼尔（Hugh O'Neill），即蒂龙伯爵（Early of Tyrone）的阿尔斯特（Ulster）起义进行的。它以伊丽莎白女王的代理

总督蒙乔伊男爵（Lord Monntjoy）的毁灭性暴力报复中结束。他取消了英国辖区（Pale）和本地人土地的区别，废除了爱尔兰人的法律，开始了一种系统殖民化的政策。1630年代在斯特拉福伯爵（Earl of Stroffold）统治下和解的繁荣的十年后，跟着是1640年代更大的起义的十年，当时爱尔兰人从英格兰的动乱中得到好处，引进了宗教宽容和一个独立的议会。爱尔兰于1649—1651年被克伦威尔（Cromwell）野蛮地征服，并被有实效地合并。[布拉内]

[550]

布拉内 [BLARNEY]

在1602年，科马克·麦卡锡（Cormack McCathy），科克郡（County Cork）的布拉内男爵（Lord Blarney）通过一系列谈判、许诺、询问和浪费时间的讲话，以拖延他的城堡向英格兰人投降。尽管有西班牙登陆军队的支持，这些爱尔兰领主们已经于前一年在金塞尔（Kinsale）附近被惨重地击败，蒙乔伊（Mountjoy）的英格兰军队征服整个爱尔兰只是个时间问题。[1] 但是麦卡锡的无礼行动给了人们一个好的笑料，而“布拉内”成了一个通用说法，成为“讲话的奇妙力量”或“说唠叨话的天才”的同义语。[2]

确实，因为被打败的爱尔兰人以他们的音乐和文学技艺变得闻名，布拉内城堡成为爱尔兰人本质和爱尔兰人骄傲的象征。随着《布拉内的小树林》（约1798年）这首歌的流行，它成为一个朝圣的地方。这个城堡的奠基石，上面铭刻着“科马克·麦卡锡于公元1446年建造此堡”，被认为拥有魔力，而在悬垂的城垛下面“吻布拉内石头”的冒险礼仪，据说能使朝圣者得到能言善辩的报答。在历史上有趣的事，是使爱尔兰人成为如此熟练使用和能言善辩的语言不是他们自己的。

英格兰的力量和财富有可观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它海洋上的冒险。在阿尔斯特的新殖民地大部分是苏格兰人长老教会（Presbyterians）的移民，寻找同类的庇护地是由跨越大西洋的英格兰殖民地提供的。它们是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马里兰的建立（1632年）之后是牙买加（它是1655年从西班牙人那里夺取的），卡罗来纳（1663年）、纽约以前是荷兰人的纽阿姆斯特丹（1664年）和新泽西（1665年）。1651年的《航海法案》由克伦威尔的“残余议会”在荷兰独立的余波中通过。它坚决要求的各种事情中有荷兰船只向英国的旗帜致

敬。这是英格兰傲慢增长的一个标志。

苏格兰是剧烈的宗教与政治斗争的场地，它最终引发了十七世纪中期的“不列颠内战”。诺克斯（Knox）的长老派教会按照日内瓦的模式建立，由它的加尔文教创立者按神权政治设计的。但是一个对此不满的宫廷党一再地去除这种渴望达到的目标。在1572年诺克斯死后，一位摄政迫使教会接受主教，因此引起了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斗争。在1610年，为了保证主教继承的信徒传统，詹姆斯六世要三名苏格兰主教由他们的英格兰同行祝圣。在1618年，他将他的五项条款强制推行，坚决要求实行像在圣餐式上下跪等许多宗教仪式。在[550]每个步骤上他都中止举行教会的总会议（General Assembly），直到它屈服，因此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在1637年查理一世颁行了一个英格兰教会公祷文和祈祷书的修订版。它是以个人命令这样做的，没有向教会总议会咨询，激起了一场反叛。当公祷文在7月23日首次引入了爱丁堡的圣贾尔斯主教堂（St Giles's Cathedral）时，它引起了一场骚乱。在一段时间内它导致了“会议”（the tables）的形式，一个所有等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在1638年2月签订了《国民圣约》（the Conventent），“圣约派”招募了一个武装同盟，他们以波兰的方式宣誓，誓死保卫它的章程。他们寻求保护长老派教会不受国王和主教们的侵犯，苏格兰不受英格兰人侵犯。他们不久就宣称得到所有真正的苏格兰人效忠，并在没有国王授权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议会。在1640年8月圣约派几支军队中的第一支渡过了特威德河入侵英格兰。

这样苏格兰的宗教战争就与英格兰同样长期的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宪政斗争纠缠在一起。在都铎王朝时期，君主与各郡和市镇选举的代表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能掩盖这个事实，英格兰的议会是国王政策的一个工具。亨利八世对一个议会代表团宣称：“朕的国王地位从来没有如在议会中如此之高，在那里朕如同是首脑，你们如同是肢体而连在一起，结合为一个政治实体。”谁是首脑是无疑的；议会成员没有特[551]免权，有理由对国王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议会下院赢得了政治主动权，然而这就结束了议会的助手作用。从长期来看，议会对税收的控制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在1629—1640年，当查理一世决定实行无议会统治时，没有人有手段反对他。但在1640年4月，当苏格兰战争的费用迫使国王召开英格兰议会并要求给钱时，风暴爆发了。宫廷对国王的神权的谈论被引证《大宪章》（Magna Carta）的议会律师们反驳。根据已故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Sir Edward Coke）流行的意见；“这个王国的法律只能由议会改变。”一份《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1641年）摆在国王面前，有着一份数量很大的指控目录。国王的首席大臣斯特

拉福伯爵被议会弹劾，在国王不情愿的同意下被处死。

爱尔兰此时进入了双方较量之中。斯特拉福对待阿尔斯特的长老派教徒像他的前任们对待爱尔兰天主教徒那样严厉。他已着手招募一支爱尔兰军队，用以对付国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反叛的臣民。但当他于 1641 年 6 月离开爱尔兰而没有给军队支饷时，他留下了一个公开叛乱的国家。一支苏格兰军队到达爱尔兰支持他们的新教共同信仰者，于是多边的战争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查理一世受到各方面的阻碍，于是企图以都铎王朝的好办法逮捕英格兰议会下院拒不服从的议员。他失败了，"我看到鸟已经飞走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对他而言什么也没留下，只有逃出伦敦并号召他的臣民武装起来。他不希望召集公然反抗的议会，他也放弃了国王接受咨议会劝告的传统，在诺丁汉（Nottingham）升起了他的军旗。这是 1642 年的夏天。这场斗争使他赔上了性命。直到 1689 年之前都没有获得满意的宪政制度上的平衡。

因此，"英格兰内战"是个用词不当的名称，它不适用于描述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的性质。它不开始于英格兰也不局限于英格兰。它包括三场分别在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内战，牵涉到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区内所有部分互相关联的发展进程。英格兰在 1642 年 8 月的危机不能够孤立地看待。国王对待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的急躁行为无疑是由他在爱丁堡的不愉快经验造成的。英格兰议会派的好战精神由于他们所知道的国王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专制政策，由于他宗教强制的确实记录，由于斗争已经获得进展而高涨起来。这里毕竟是一场政治与宗教原则的斗争。将其依据社会群体式经济利益加以解释的尝试，虽然在有些问题上是有帮助的，没有取代以宪政与宗教信念的混合为基础的较早的分析。天主教和英国高教会教徒（High Church Anglicans）认为最大的忠诚对国王的，他的君主特权正受到攻击。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对议会提供了支持的核心，他们将其视为反对绝对君主制的屏障。乡绅们从中被分裂开来了。

[552] 英格兰人被教导说，他们的内战没有像大陆上同时代的战争那种宗教的偏执和无情的屠杀。常被喜欢引证的材料之一来自议会军少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的一封信，他是在 1643 年朗德维·唐（Roundway Down）战役的前夕写给保王党西部军司令拉尔夫·霍普顿爵士（Sir Ralph Hopton）的：

> 我对你的感情是不能改变的，敌意本身也不能破坏我对你个人的友谊，但是我必须忠实于我服务的事业。伟大的上帝是我的心灵的检查者，他知道……我是完全憎恨这场我看来是没有一个敌人的战争。

我们两个都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必须在这场悲剧中按分派给我们的各方表演。让我们以一种荣誉的方式而没有个人憎恨地去做吧。[51]

如果这种克制占了上风，这些战争就绝不能继续下去。

因为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准备表现出一点宽容。议会派的“低税收哲学”没有为国王提供有效统治的手段。占统治地位的英格兰权力集团也只对英格兰感兴趣，不关心爱尔兰和苏格兰各自的利益。尤其在宗教事务上，双方都决心要迫害他们对手，希望强制推行一种单一的宗教。这场战争“不是为宗教自由而战，而是发生在迫害者的两个敌对群体之间”[52]。保王党们拥护“宗教划一法”（Act of Uniformity）。在议会获得军事胜利的时候，企图强制推行长老教派的“圣约”。双方都发现绝对的宽容与划一是不能强加的。

这场战争也没有摆脱恐怖。有文件记载的暴行，如在博尔顿（Bolton）由莱茵的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 of Rhine）的军队施行的普遍屠杀（1644年6月），或德罗赫达（Drogheda）可怕的洗劫（1649年），在那里克伦威尔屠杀了一个爱尔兰市镇的全部人口，还伴随有杀死俘虏、夷平村庄这些没有公开的行为。

四年的斗争经历了包括有本地和中央军队的大量战役。保王党人将他们的司令部设在牛津的基督教堂，最初在英格兰的大多数郡占了上风。但是议会派的军队得到苏格兰的“圣约同盟”的援助，掌握着在伦敦坚不可摧的基地，因而也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机构。他们能够及时地招募一支专业的新模范军，它的创建者令人畏惧的奥立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年），逐渐在政治事务上如同在军事上掌握了指挥者的角色。议会通常控制着市镇，而国王控制着乡村。没有哪一方的战斗部队享有任何普遍优势，直至议会慢慢获得优越的组织，一位无敌的将军，和与苏格兰人的联盟得到的好处。最初的冲突在牛津以北的埃吉山（Edge Hill，1642年9月24日），此后决定的战役发生在约克郡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1644年7月2日）和纳斯比（Naseby，1645年6月14日）。一旦国王于1646年在纽瓦克（Newark）向苏格兰人投降，保王党人的所有公开抵抗就停止了。

当战斗减缓下来，政治形势就以革命的速度加快变化了。议会派阵营迅速激进化了，包括它的共和主义者也与它有联系的极端福音派教徒，他们中有平等派（Levellers）和掘地派（Diggers）。由于不能够[553]将国王束缚在一个牢固的协议上，克伦威尔决定处死国王，于1649年1月31日在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的前面执行，由此开创了共和国（Commonwealth）。由于不能控制长期议会，克伦威尔清洗了它。由于不能用劝导赢得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他先后入侵爱尔兰和苏格

兰。他在伍斯特（Worcester）战胜苏格兰人（1651年）使他在战场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从未能策划出与他的军事胜利相配合的政治解决方式。由于不能掌握甚至由挑选出的支持者组成的“残余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他解除了它。他告诉他们：“必要性没有法律。”只有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通过十一个军区的上校们统治。议会派的事业在抛弃了议会制政府后，在政治上破产了。

“伟大的奥立弗”是一个有无比坚强意志力的人。他对他的肖像画家说：“我的莱利（Lely），我要求你……画一幅真实地像我的画，表现出所有的粗糙皮肤、疙瘩和肉赘；否则我连一个铜子也不会给你。”但是他没有设计出持久的解决办法，并往往将一切事情，甚至德罗赫达的大屠杀都归因于上帝的裁判。在他死后保王党的事业复兴了。要回到战前状况没有其他选择，国王和议会都必须恢复。查理二世（Charles Ⅱ）于1660年5月29日在《保障与大赦法案》的条件下从流亡中返回。国王与议会都必须重新学会小心的共处的规则。

在某些方面不列颠内战是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围绕着现代国家成长造成的紧张关系的表现。但是它没有鼓舞任何大陆上的仿效者，并必须被看作是实质上只有地区重要性的一场悲剧。

在北海另一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向着脱离统一的相反方向发展。特别是瑞典长期烦恼地反对丹麦人的统治。从1460年代起它就拥有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Riksdag），从1479年起在乌普萨拉（Uppsala）有了自己的大学。在1520年圣诞节，一场叛乱在达尔勒卡里亚（Darlecar lia）爆发，反对又一个丹麦人国王加冕。一场大屠杀在斯哥德尔摩（Stockholm）的城市广场进行，在那里一百个叛乱的支持者以叛逆罪被处死，这只是煽起了怒火。由一位年轻的贵族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瓦萨（Gustav Eriksson Vasa）领导下的反叛者驱逐了丹麦的军队。在1523年，卡尔马同盟（Union of Kalmar）破裂了。瑞典在古斯塔夫·瓦萨（1523—1560年在位）统治下走上了自己的路。丹麦和挪威在腓特烈一世（Fredrik Ⅰ，1523—1533年在位）和他的继承者统治下，是路德教派的早期成员。这种结果形成的敌对，不只笼罩了有争议的哈兰德（Halland）省，并在一个多世纪内强烈地存留着。

瑞典的命运此后与瓦萨（Vasas）家族，与寻求在波罗的海的霸权，和在略晚一些时候与新教的事业联系在一起。1527年在韦斯特罗斯（Vasteras）的国会（Diet）上，古斯塔夫创建了一个埃拉斯图派（Erastian）的教会，比亨利八世在英格兰还要先行一步。他废除了天

主教的仪式，但是将教会的土地财富转给他的支持者，他创造了一个强大君主制的社会基础。他的第二个儿子约翰三世（John Ⅲ，1568—[554]1592 年在位）与波兰雅盖隆王朝的女继承人结婚，而他的孙子西吉斯蒙德·瓦萨（Sigismund Vasa，1592—1604 年在位）是波兰的被选举国王。西吉斯蒙德被看作是瑞典正在衰亡的天主教派的最后希望，而由他的继位出现的内战促使大多数贵族将国家的独立与新教信仰视为一体。在 1593 年乌普萨拉宗教会议（Synod）采纳了《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n of Augsburg）作为国家宗教。西吉斯蒙德被废黜，将王位给予他的叔父南曼兰的查理九世（Charles Ⅸ of Sodermanland，1604—1611 年在位），新教朝代之父。此后在与波兰的连续战争中，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利益斗争上又有了王朝和宗教的动机。

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1611—1632 年在位），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卫形式。拥有很高的才能，一个安全的政治基地，一支海军，和甚至大大超过西班牙人的一支本国军队，他完善了自己筹资的军事远征的艺术。在 1613 年他从丹麦人手中收复了卡尔马，在 1614—1617 年他干涉了莫斯科公国的“纷乱时期”，离开时夺取了因格里亚（Ingria）和卡累利阿（Karelia）；在 1617—1629 年他进攻波兰—立陶宛，夺取了里加（1621 年），并围攻了但泽（1626—1629 年）。他曾经以一个急驰逃脱了波兰轻骑兵的俘虏；但是他榨取维斯杜拉河的过境税而得到了很多钱，使他能下更大的赌注冒险。1630 年在法国的支持下，他大张旗鼓地进入德意志。他在吕岑（Lützen）战役中战死，（见下文）打断了他那充满希望的事业。

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1632—1654 年在位），成长于大法官奥尼森斯提尔那（Oxenstierna）的摄政时期，经历了瑞典由于征服哈兰德（1645 年）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上升到顶峰。但是她秘密地皈依天主教，退位而隐居在罗马。她的表兄查理十世（Charles Ⅹ，1654—1660 年在位）担心莫斯科的野心和一支失业军队的花费，诉诸于干涉波兰—立陶宛的老政策。他过早地死去给了一个机会得以在《奥地瓦条约》（1660 年）中全面解决问题。（见下文）

瑞典从未得到对波罗的海的完全控制，即多次预言的“波罗的海的主人”（Dominium maris balticae）。但是在半个世纪里她在欧洲事务中起到了不成比例的作用，是北方的恐怖者，那个时代的军事奇迹，最活跃的新教强国。

波兰—立陶宛是另一个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国家。后期雅盖隆王朝的领地绝对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并且它避免了宗教战争和奥斯曼帝国入侵这些困扰当时许多国家的问题。

齐格蒙特一世（Zygmund Ⅰ，1506—1548 年在位）与齐特蒙特—奥古斯特（Zygmund August，1540—1572 年在位）是又一位斯福扎家族王后的丈夫和儿子，与意大利有着强有力的联系，特别是威尼斯。克拉科夫是最富有文艺复兴氛围的宫廷之一。

“共和国”（Rzeczpospolita）是由卢布林联盟（Union of Lubilin，1569 年）创立的，部分是由于缺少一个王家继承人，部分是由于莫斯科公国扩张威胁的结果。它是波兰与立陶宛之间利益协调的一种早[555]期形式。波兰王国接受立陶宛大公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虽然它夺取了巨大的乌克兰王室领地作为补偿。大公国保留它自己的法律、行政当局和军队。这个双重国家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和一个共同的国会（Sejm，Diet）统治。进行统治的贵族（szlachta）设计的这个贵族民主制体系保留了其统治者的地位。通过他们的地区会议（sejmiki，dietines）控制着中央国会，它们处理税收和军事。通过“同意条件”（Pacta Conventa），将它们附加在“加冕誓言”上，他们雇用国王们如同遵照契约的经理。通过他们体现在武装同盟或联盟上的抵抗的法律权利，他们能够保卫他们的地位以反对所有的国王阴谋。通过全体一致的原则，它控制着他们所有的协商，他们确保没有国王或派别能够践踏共同的利益。这不是盛行于十八世纪的普遍无政府状态的体系。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它是在绝对君主制和宗教斗争时代民主制的一个大胆实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选择。“共和国”在民主追随者中的名声不应依赖于它后来的暗害者有偏见的宣传。

从卢布林同盟到 1648 年的普遍危机之间的八十年中，“共和国”比它的邻居们的情况更好。波罗的海贸易带给许多贵族非同寻常的财富。城市特别是但泽，在王家特许状下极快地繁荣起来。反宗教改革虽然有力地推行了，但没有引起公开的斗争。贵族们虽然在 1606—1609 年“法律大反叛”（rokosz）中使政府暂停运作，但是通常不使这种在较晚时代使政府瘫痪的行动推向极端。他们通常选举能对抗主教们和教皇至上论的亲哈布斯堡派别的国王。对外战争在边界地带或外国领土上进行。

君主制起的作用虽然要依赖于各国王才能的高下，仍保有着普遍的权威。确实，第一个选举国王亨利·瓦卢瓦（Henry Valois，1574—1575 年在位）是一个十足的祸害，但是他四个月后就逃走了，去危害他的祖国法国去了。没什么可惋惜的。下一个国王是有能力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斯特凡·巴托里（Stefan Batory，1576—1586 年在位），重新确立了尊重，驱使复杂的国家机构有效地行动。他于 1578—1582 年反对恐怖者伊凡的成功战争，夺得了立沃尼亚。第三位国王瑞典人西吉斯蒙德·瓦萨（1587—1632 年在位）遭遇了许多变故，但他度过了

“法律叛乱”和波兰对莫斯科公国在1610—1619年令人不安的干涉。他的两个儿子弗瓦迪斯瓦夫四世（Wladyslaw Ⅳ，1632—1648年在位，以前的沙皇）和约翰·卡西米尔（John Casimir，1648—1668年在位，以前的枢机主教），分别经历了平静和混乱。

灾难的连锁反应作为约翰·卡西米尔朝代的标志，从几乎是晴朗无云的天空爆发。在1648—1654年第聂伯河哥萨克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gdan Chmielnicki，Khmelnytsky）领导下，带领一支由哥萨克和鞑靼人组成的凶残军队直上维斯杜拉河，横越乌克兰留下一道被屠杀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血路。它将农民的愤怒与真正实际的东部省份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宗教上的不满联系起来，在绝望的赫梅利尼茨基转向沙皇救援时，它实际上被镇压下去了。莫斯科公国在1654—1667年的入侵，给立陶宛和乌克兰带来了死亡和破坏，引起了[556]瑞典人战略上的担心。1655—1660年加倍的瑞典人入侵，在波兰被称为“大洪水”（Potop），蹂躏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将国王驱逐流亡，大贵族们被处以叛逆罪。只有在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的雅斯那·戈拉（Jasna Gora）修道院，它的“黑圣母像”奇迹般地易于使瑞典的榴弹炮弹偏离，因而能够抵抗。伴随着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入侵和勃兰登堡人的推进，这个国家接近于总崩溃。但是波兰以奇迹般的复苏力量恢复了。莫斯科人被阻止住了；瑞典人被驱赶到一起；普鲁士人被收买了。在1658年司令官恰尔内茨基（Hetman Czarnecki）甚至能经得起去日德兰（Jutland）与瑞典人作战。奥利瓦条约（1660年）解决了共和国西部邻国的要求，结束了瓦萨王朝的争斗，确认了公爵领地普鲁士的独立，给一个较好的时代以希望。

此后，共和国看来有了一段时间处理它突出的问题。在1660年代每年的战争中，波兰的骑兵稳步地将莫斯科人驱回俄罗斯。然后，在已经可见的普遍恢复中，国王的宪政改革计划引起了贵族民主派不相称的暴烈反应。在1665—1667年卢博米尔斯基司令官（Hetman Lubomirski）叛乱的兄弟相残斗争结束了所有阵线上的进展。它造成了国王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政治僵持局面。在同时它迫使共和国签订了灾难性的“安德鲁索沃休战协定”（Truce of Andrusovo，1667年），它将基辅和左岸乌克兰交给俄罗斯人，在理论上是二十年，实际上是永久的。国王退位并隐居到法国，在那里他被葬于圣日耳曼—德—普雷（St Germain-des-Prés）教堂。他统治时期贬值的铸币标有他的首字母ICR（Iohannes Casimirus Rex，国王约翰尼斯·卡西米尔），这可以用来表示Initium Calamitatum Reipublicae（共和国灾难的开始）。

波兰不幸的开始与波兰的两个邻国普鲁士与莫斯科公国力量的激增在时间上正好一致。

普鲁士在十六世纪早期仍位于条顿骑士团国家的残余部分中，它已经被削弱了几十年，处于极为需要激进革新的状况。由于立陶宛皈依基督教，它已失去了使异教徒皈依的使命，它的军事霸权在格伦瓦尔德（Grunwald）遭到失败（1410 年）。它的商业突出地位由于波兰获得埃尔平（Elbing）、托恩（Thorn）和但泽（1466 年）而丧失。它的根本存在受到德意志宗教改革出现的威胁，它的最后一任骑士团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赶快将它转变为波兰国王的一个世俗封地。他皈依路德教，解散了条顿骑士团，在 1525 年为他的新公国在克拉科夫的城市广场实行了封臣效忠礼。从他的首府柯尼斯堡（Knigsberg）他安排了战略，最终将他的领地与他的亲戚在勃兰登堡的领地联系起来。靠获得他的公国的法律继承权，在确保了他没有自己的后裔时，可以自动地将领地给予柏林的霍亨索伦家族。这个政策在 1618 年得到了结果，此后，一个同是霍亨[557]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享有勃兰登堡选侯和普鲁士公爵的双重头衔，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诞生了。（见原书附录Ⅲ，1276 页）

大选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 年在位）讲波兰语，并抱有成为“波兰第一君主”的意图，在 1641 年为他的公国举行了封臣效忠礼，十五年后在“瑞典人大洪水”的高峰，他的军队占领了华沙，他的封君的首都。普鲁士的军队初次登场了。此后所有需要的就是一种两面派的外交欺骗，尽力谋取的首先是瑞典人，然后是波兰人对普鲁士主权地位的承认。它在奥利瓦得到了正式的认可。普鲁士的精神步上征途了。

莫斯科公国的伟大战略是由伊凡三世（Ivan Ⅲ）发起的，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坚持着它的宗旨。伊凡四世（Ivan Ⅳ，1533—1584 年在位）以“雷帝”闻名，完成了他的前辈们准备建立的世袭父权制国家。一位早期的西方旅行者写道：“所有人民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奴仆，也就是他们君主的奴隶。”[53]通过建立“特辖军团”（Oprichnina），所有后来俄罗斯安全机关的前身，他能够将地方力量抛在一边为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势力范围服务，并放手进行无约束的恐怖统治。靠着毁灭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在一场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血洗中几乎屠杀了它全部的人口，他巩固了莫斯科在俄罗斯的霸权。通过破坏古老的大贵族（Boyar）家族和他们的“缙绅会议”（Zemskii Sobor）的权力，他创建了一个严密的从属性的等级制的社会。靠任命第一个莫斯科总主教（Patriarch），它实现了一个分离而依赖性质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从此切断了一切外来影响。靠着吞并喀山汗国，在那里兴建了宏大的天使

报喜东正教大教堂（1562 年），作为基督教在穆斯林土地上一个胜利的纪念碑，他宣告了无限制的帝国野心。通过“兵役名册”与“衙门”，他严密掌握了所有的国家官吏和他们的任命。这是“户籍清单”（nomenklatura）的前身。在这样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移植术和截肢术后，病人变得更糟就不足为奇了。

“混乱时代”充满了从伊凡之子费奥多尔（Feodor）于 1598 年死后到罗曼诺夫（Romanovs）王朝于十五年后继位的年代。随着中央权力被破坏了，敌对的大贵族派别连续推举了五个命运不幸的沙皇，有着农民反叛和哥萨克的袭击，国家被瑞典人、波兰人和鞑靼人入侵。费奥多尔的首席大臣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1598—1605 年在位），一位鞑靼人大贵族，在谋杀合法继承人的指控中被推翻。伪季米特里一世（False Dmitri Ⅰ，1605—1606 年在位）是一个冒充者，宣称他是伊凡被杀害的儿子，得到一位波兰大贵族耶日·姆尼什克（Jerny Mniszek）和他的耶稣会朋友的支持，他与姆尼什克的女儿玛丽娜（Marina）结婚，并向莫斯科进军。他短暂的改革性的统治结束于一声爆炸，当时他被下一个竞争者瓦西里·叔伊斯基（Basil Shuiskiy，1605—1611 年在位）的追随者在红场上用一门大炮轰出去。叔伊斯基又被另一个冒充者，伪季米特里二世（False Dmitri Ⅱ），“图希诺（Tushino）的贼”所推翻。他不知怎么设法说服了玛丽娜他是她复活的丈夫。叔伊斯基在被波兰人俘虏后死去。他由一位波兰加冕君主瓦[558]迪斯瓦夫·瓦萨继承，他的候选资格一直为另一个大贵族派别坚决支持。

虽然许多像姆尼什克这样的波兰贵族私人卷入这场“混乱”中，“共和国”的官方政策是不介入。国王倾向于支持姆尼什克的计划，尽管俄罗斯的谣传与此相反。而国会警告国王不得将金钱与军队耗费在重新夺取斯摩棱斯克（Smolensk）有限目标之外。因而当波兰军队在 1610 年进抵斯摩棱斯克，与此同时瑞典人已到了诺夫哥罗德，没有命令继续前进。但是，像指挥官后来向愤怒的“议会”解释的那样，波兰人不顾训令推进了。当俄罗斯军队在克鲁申诺（Klushino）战败，通向莫斯科的道路没有防守时，他们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克里姆林宫。一支驻防军留在那里一年直到被迫投降。在他们被屠夫米宁（Minin）、博扎尔斯基（Pozharskiy）亲王和新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1613—1645 年在位）召集的俄罗斯爱国民众屠杀前，放火烧了莫斯科。俄罗斯人建立了他们的王朝和国家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个现成的歌剧主题。[**苏萨宁**]

莫斯科的复元是缓慢而有条不紊的。波兰人在 1619 年被送走了，弗瓦迪斯瓦夫亲王放弃了他的皇位要求。斯摩棱斯克被收复（1654

年)，在阿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tch，1645—1676年在位）统治下，根本性的改革引起的内部骚乱只是部分从领土获取上得到补偿。一项法律改革产生了1649年的《法典》（Ulozhenie），包括有1000条以上条款，将农奴制永久化和系统化，造成了酝酿斯杰潘·拉辛（Sten'ka Razin）农民大起义的条件。总主教尼康（Nikon，1605—1681年）的教会改革，他的目标是使礼仪现代化和减少国家的控制。引起了"旧信徒"的脱离教会和沙皇的恼怒。按西方路线进行的军事改革先于没有很成功地抵抗波兰人的战役之前实行。据此看来，安德鲁索沃休战协定（1667年）获得的大片领土是个意外的礼物。(见原书附录Ⅲ，第1277页)

还有从波兰获得乌克兰不会被估计过分。它给了莫斯科公国经济资源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而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它出现在将对西伯利亚的探险和征服推进到太平洋的同一代人中。莫斯科公国+乌克兰=俄罗斯这个公式在俄罗斯对自己的历史的论述中没有予以强调，但它是很重要的。在哪一件事情中俄罗斯帝国的真正创建者都是阿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而不是他更闻名的儿子彼得。[闺房]

[559]

闺房［TEREM］

索菲亚·阿列克塞耶夫娜（Sophia Alexeyevna）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tch）的第六个孩子，1657年9月17日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作为一个年幼的公主在一个从来不承认女性继承权的国家里，她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莫斯科公国，出身高贵的女士们被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1]她们生活在分开的住处"闺房"中，以穆斯林的方式，只能戴着面纱或在封闭的马车中外出。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增添了一个特别的闺房宫，给这些女士居住。还有，沙皇的姐妹们和女儿们经常被宣告独身生活。如官方所解释的，她们不能与贵族男人结婚，因为"将一位贵妇给予一位奴隶"是一种耻辱。而她们不能随便与外国王子结婚，恐怕异端或宗派污染宫廷。一位奥地利使节报告说："女性在莫斯科公国人中不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那样受到尊敬。在这个国家中，她们是男人的奴隶，男人很少尊重她们。"[2]

虽然如此，索菲亚与主要大臣戈利岑（Golitsyn）亲王联合，开始在她兄弟费奥多尔（Feodor）统治期间（1676—1682年）施加影

响。然后以一次军事叛变为媒介，她完全打破了闺房的束缚，在共位沙皇伊凡与彼得年幼期间成为摄政和俄罗斯的第一位女统治者。她个人主持外交政策，特别是与波兰的“永久和平”，它使莫斯科在东欧事务中处于首位。(见原书第657页)。

彼得大帝于1689年终止了她的摄政。索菲亚的名声被彼得大帝的支持者诽谤中伤。她被斥责为一个有野心的阴谋家。她常常被很可疑地被描述成“庞大的身躯，麦斗一样大的脑袋，脸上长着毛发，腿上长着瘤子”[3]。她在诺沃德维奇女修道院（Novodevich Convent）作为苏姗娜修女度过了最后十四年。这座修道院是她以前按照“莫斯科巴罗克”风格建造和捐赠的。

女人的传统经常被希望补偿男性有成就者的过分夸大的记载所鼓舞。这就是女性历史学的最早形式，并成功地运用于大量女英雄，从萨福（Sappho）和波狄卡（Boudicca）到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会误导的。这些例外的妇女的传记不能抹杀应强调将她们和一般妇女的命运分隔开的鸿沟。索菲亚·阿列克塞耶夫娜是一个统治者就证明了这种例外。

俄罗斯、波兰和瑞典之间的长期斗争决定了东欧的命运。回顾起来，人们可以看出1667年安德鲁索沃休战协定打破了力量平衡。波兰一立陶宛作为这个地区主导地位国家被俄罗斯在不知不觉中取而代之。但波兰与俄罗斯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它们都没有让自己陷入三十年战争。

奥斯曼帝国作为波兰和俄罗斯的南部邻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达到了极盛时期。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关键的进展在于奥斯曼人决定率领伊斯兰教的主要逊尼（Sunni）派反对什叶派（Shi‘ites）。当苏[560]丹（Sultan）谢里姆一世（Selim Ⅰ，1512—1520年在位）向波斯进攻时，他结束了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六十年的停顿，此后陆续进行了对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1534年）这些以前哈里发领地的征服。“大帝”苏莱曼一世（Suleiman Ⅰ the Magnificent，1520—1566年在位）给国王加上了先知的圣墓麦加，就有了很好的理由称自己为“伊斯兰皇帝”（Padishah-i-Islam）。许多纪念性建筑，包括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证实了这种豪华的现实性。

从基督教徒的观点来看，当土耳其人用他们新建立的力量向西推

进时，危险的信号就开始闪现了。他们直向多瑙河流域推进到匈牙利，并同时向北非海岸的海盗国家进攻。多瑙河战役随着 1512 年夺取摩尔达维亚开始。然后当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1 年）时，宽广的匈牙利平原就为奥斯曼进军敞开了。在 1526 年当最后一个独立的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雅盖隆（Louis Ⅱ Jagiellon）在莫哈奇战役战死后，奥地利本身处于威胁之下。土耳其人在 1529 年对维也纳进行了第一次不成功的围攻，三年后仍深入阿尔卑斯山谷进行袭击。1533 年的休战只是靠瓜分匈牙利为代价取得的。西部匈牙利留给了它的新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中部匈牙利包括布达佩斯成为一个奥斯曼省份，特兰西瓦尼亚成为臣属于奥斯曼保护下的一个分立公国。小规模战斗沿着所有新边界猛烈进行，直至阿德里安堡和约（Peace of Adrianpole，1568 年）的签订，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答应交纳年贡。在 1620—1621 年土耳其人沿着德涅斯特河越过摩尔达维亚，只是在乔切姆（Chocim）受到波兰轻骑兵的打击。[**乌斯考克**]

[561]

乌斯考克［USKOK］

在 1615—1617 年，威尼斯共和国在亚得里亚海进行着一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乌斯考克战争”。目标正如威尼斯所认为的，是镇压哈布斯堡王朝资助的海盗。而哈布斯堡王朝认为，乌斯考克，即“塞尼”（Senj）的海盗，是帝国防卫的必要部分，而威尼斯人是在破坏他们的安全。[1]

塞尼现位于克罗地亚，是一个亚得里亚海海港，位于靠近威尼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领土的交点。它的城堡是哈布斯堡“军事边疆”的海岸锚地，在 1520 年代建立，并最终沿着它建立设防的居民点来巩固它。它为海盗爱国者们提供了一个基地，他们部分靠捕鱼为生，但主要靠抢掠威尼斯在海上的船只和奥斯曼帝国在内地的市镇。

这些“乌斯考克”，他们的名称来自克罗地亚词汇 uskocti，即“跳进”或“登船”，他们依照荣誉和复仇的准则生活，他们是好战的边民的海上对手，这些边民中许多人是逃亡的塞尔维亚人和逃亡的农奴，他们保卫内陆边界的范围，有一天会起而反对克罗地亚的统治。像他们在波兰和匈牙利奥斯曼帝国边界的兄弟们，或乌克兰的哥萨克们，他们将自己看作信仰的斗士，基督教城墙前（antemurale chirstinitatis）的保卫者，圣战的英雄。他们被南部斯

拉夫人文学的史诗传奇歌颂为这样的人。他们的活动为哈布斯堡王朝鼓励并给予酬报，直至十八世纪中期。“克拉伊纳”（Krajina）（边区）直到1881年才被正式废除。

海盗像匪帮那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早期近代欧洲充满了“海盗”、“海上攻掠者”或称 klepts，hajduks，他们的行动可能为一个权力当局所赞许，而被其他人判为非法。

英格兰和法国的“海狗”就是恰当的例子。当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5—1595年）从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抢掠西班牙的主力舰队时或在加的斯（Cadiz）“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时，他得到了英格兰女王的许可，并因他的服务被封为骑士。但是其他人的类似行为在英格兰就会被指责为野蛮。例如在十七世纪早期一段时间里，穆斯林海盗从巴巴利海岸（Barbary）来，在隆迪（Lundy）岛建立了一个基地，攻击德文（Devon）和康沃尔（Cornwall）的港口，将他们的俘虏卖做奴隶。当敦刻尔克的让·巴尔（Jean Bart）在路易十四的许可下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对航船采取恐怖手段，他在凡尔赛宫被接见并被封为贵族。在他们的爱国同胞眼里，德雷克或巴尔是“海军将官”。在西班牙人眼里，他们是国际罪犯。一个人说的“海盗”，对另一个人而言就是“强盗”。

在地中海，重新进行的奥斯曼扩张以攻击罗得岛（Rhodes）和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s）有条件投降为预兆（1522年）。1529年夺取了阿尔及尔，1551年夺取了的黎波里，1571年夺取了塞浦路斯，于1574年在第二次进攻时夺取了突尼斯。马耳他在大围攻（1565年）中幸存下来。从天主教世界的观点看来，勒班陀（Lepanto）海战（1571年）提供了一个中央装饰品，在那里腓力普二世的非婚生兄弟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成功地团结了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的联合海军力量，摧毁了奥斯曼舰队。这是最后一次十字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海战，几十年里奥斯曼人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希腊人**]

奥斯曼人的汹涌而来产生了几种后果。首先，它复活了古老的十字军精神，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中。伊拉斯莫提出的问题“土耳其人不也是人或兄弟吗？”——反映出对当时狂热的一种异常反应。其次，它在新教宗教改革的高峰期分散了天主教的主要力量，有助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保持下去。苏丹是路德最主要的同盟者。第三，在外交阵

[562]

希腊人 [GRECO]

两位杰出的克里特艺术家在他们同时代人中以“希腊人”而闻名。一位是画家多米尼克斯·塞奥托克普洛斯（Dominikos Theotokopoulos），定居于托莱多（Toledo）。另一位是音乐家和作曲家弗兰吉斯克斯·莱昂达里蒂斯（Frangiskos Leondaritis，约1518—1572年），曾在卡斯特罗（Kastro）任天主教风琴师，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任合唱指挥，还曾担任巴伐利亚公爵的音乐教师。这两个人都是克里特文艺复兴的产物。

克里特从1221年至1669年由威尼斯统治，是希腊和拉丁文化的交叉路口。它的首府“埃尔·坎达克”（El Khandak）在阿拉伯人于827—961年占领期间建立并成为要塞，后来以拉丁名称坎迪亚（Candia）或坎达克斯（Chandax）成为一位威尼斯公爵的驻地。坎迪亚的市镇广场的侧面与公爵的宫殿相接，还有一个带钟楼的圣马可大教堂，并有一个凉廊，是这个岛的威尼斯—克里特贵族们喜爱的开会地方。从1648年到1669年9月16日最终的有条件投降，它是莫罗西尼（Morosini）公爵二十一年抵抗奥斯曼帝国围攻的神经中枢。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克里特迎接了众多前往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它因而对希腊文的复兴作出了贡献，它形成了对西方文艺复兴如此重要的一个促进因素。但是它对讲希腊语世界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向相反方向传播的影响。在威尼斯有一个富裕的克里特人侨民区，以圣乔治教堂为中心，在希腊文印刷和出版史上长期起着突出的作用。一个从克里特来的威尼斯人札卡里亚斯·卡利尔基斯（Zacharias Kalliergis）是马鲁奇（Marucci）的阿尔丁尼出版社的竞争对手，他于1509年出版了第一本用现代日常希腊语写的书。而在威尼斯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克里特本身经历了一次创造性的光芒照射，它留下的标记远超出这个岛的海岸，其焦点除了绘画、音乐和建筑外，在于通行的希腊语文学。一个戏剧家学校使用克里特方言创作了一部作品全集，使用押韵的双行诗，涵盖了宗教剧、喜剧、悲剧、田园剧的主题。乔治·乔尔塔奥斯（Geoges Chortatzis，1545—1610年）的《埃罗菲利》是一部发生在埃及的悲剧。维琴佐斯·考纳罗斯（Vizentzos Kornaros，约1553—1610年）的《埃罗托克里托罗斯》是一部阿里奥斯托风格的浪漫故事。马里诺斯·波恩尼亚利斯（Marinos Bounialis）的《克里特战

争》是一部史诗史，详述了奥斯曼帝国围攻的事件：

Ω Κάστρο μου περίδοξο, τάχατες όσοι ζούνε,
τάχατες να σε κλαίσινε και να σ' αναζητούνε;
Έπρεπε όλ' οι Καστρινοί μαύρα για να βαστούσι,
να κλαίγουνε καθημερνό κι όχι να τραγουδούσι·
άντρες, γυναίκες και παιδιά και πάσα κορασίδα,
να δείχνου πως εχάσανε τέτοιας λογής πατρίδα.

(S．亚历克西乌 1969a：229)

(哦！我光荣的卡斯特罗，他们还活着吗？/为你哭泣并寻找你吗？/所有卡斯特罗的人们应该穿上黑衣，/并天天哭泣不再歌唱。/男人，女人，儿童和每一个少女/应当让它看到他们是如何失去了祖国。)[1] [563]

埃迪亚、卡斯特罗和雷塞姆诺（rhethymno）的剧院和学院在1669年突然完结了。威尼斯—克里特文化富有成果的共生体也是如此。它曾在一个短暂的时间达到“一种独立的，创新的力量”的地位。但是克里特流亡者将他们的文学一起带到希腊本土，在那里不久就成为流行的读物。虽然为雅典的精英们蔑视，十八世纪的图书目录显示出它有着广泛的流通。确实，在狄奥尼修斯·索洛摩斯（Dionysius Solomos，1798—1857年）和爱奥尼亚学派之前，克里特戏剧形成了惟一丰富的通用语保留剧目。是克里特文艺复兴给予希腊人以作为一个现代的、有文化民族的开端。[2]

线上，它使西方强国更密切地考虑到东欧，开辟了与东方的首次尝试性接触。它导致了法国对土耳其政府（Porte）和波兰—立陶宛的开放政策，和神圣罗马帝国派使团去莫斯科。最后，它引发了一种对土耳其人的时尚和手工艺品的狂热喜好，这是欧洲的第一次“东方主义”（Orientalism）经历。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可以被看作是一年代长远的德意志皇帝与王公斗争的一个插曲。[563] 从另一个标准而言，可以看作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国际宗教战争的延伸。还有就是可以看作是卷入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与统治者的一场大陆争霸斗争的重要阶段。它产生于在波希米亚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争吵，它分四个明显的阶段越来越扩大。研究它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写道：“几乎所有的（参战者），都为恐惧所驱使，而不是出于征

服的欲望或信仰的狂热。他们需要和平，他们战斗了三十年来确保它。他们当时不知道，此后他们也没领悟到，战争只会孕育战争。”[54]

1618—1623 年的波希米亚阶段，开始于 1618 年 5 月 23 日，当时一个捷克贵族代表团进入布拉格的赫拉德昌尼（Hradcany）古堡，将哈布斯堡王朝的总督雅罗斯拉夫·冯·马丁尼茨（Janoslav von Martinitz）和威廉·冯·萨尔瓦塔（Willelm von Salvata）从一个高窗扔出去落到一个粪堆里（它阻止了他们落在地上）。他们抗议近来时对新教教堂的攻击，反对斐迪南大公对波希米亚王位有争议的僭取。反对他据称对 1609 年《王家宽容特许状》(Majesttsbrief) 的侵犯。(这个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对 200 年前燃起了“胡斯战争”事件的精心模仿) 在那时，斐迪南正在为当选皇帝而斗争，德意志的宗教和平被动摇了。路德教的王公们不安地注视着帕拉丁选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领导的福音派同盟（Evangelical Union）与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领导的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相对峙。波希米亚的反叛者攻击维也纳并在奥地利开始了一场叛乱。在 1619 年当斐迪南继承了帝国皇位时，他们正式废黜了他的波希米亚王位，选举了加尔文教徒帕拉丁选侯为国王。这意味着公开的战争。(见原书附录Ⅲ，第 1280 页)

[564] 1620 年 11 月 7 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Bíláhora, Weissenberg）战役中，波希米亚军队被帝国派击溃。然后在一场恐怖的复仇中，波希米亚本地贵族在处死和没收中被镇压了。捷克社会在文化上被斩首了。这个国家被系统地天主教化和德意志化了。加尔文教徒被驱逐。“冬天国王”逃走了。他在帕拉丁纳特的领地被西班牙尼德兰入侵，被巴伐利亚人夺走。天主教徒的将军蒂利伯爵（Count Tilly, 1559—1632 年），布拉格的胜利者，袭击了海德堡（1622 年），在北德意志纵横驰骋，追击冯·曼斯菲尔德伯爵（Count von Mansfeld, 1580—1625 年）领导的新教军队。没有供给的军队开始像许许多多的蝗群那样以掠夺土地为生。

1625—1629 年的丹麦阶段，开始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下萨克森帝国势力范围的长官介入这场斗争，以保卫他受到强大压力的新教成员。在英格兰、法国、荷兰财政的帮助下，他必须与由波希米亚天主教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尔德斯坦（Albrecht von Waldstein）或称瓦伦斯坦（Wallenstein, 1583—1634 年）募集的一支新帝国派军队对抗。在易北河上的德绍桥的战败（1626 年），新教军队企图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同盟者贝特兰·加博尔（Bethlen Gabor）会合。曼斯菲尔德经过西里西亚一直向多瑙河进军。然后就是帝国派的转机来了，在诺伊豪塞尔（Neuhausel）即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 附近，击败了曼斯菲尔德后，全力进军北方新教地区。蒂利在西班牙人帮助下进攻尼德兰，瓦伦斯坦入侵蹂躏不伦瑞克(Brunswick)、下萨克森、梅克伦堡（Mecklenberg)、石勒苏益格(Schleswig)、荷尔斯泰因（Holsetein)、日德兰、波罗的海沿岸，直到施特拉尔松（Stralsund）的郊区，宣称自己是“波罗的海与大洋的最高统帅”。根据吕贝克条约（Treaty of Lübeck，1629 年），丹麦人被说服撤军以归还他们失去的领地。依据《归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皇帝命令新教徒交出所有在奥格斯堡和约以来获得的所有以前的教会土地。瓦伦斯坦的军队中包括许多非天主教徒，他表示抗议并被解职。

1630—1635 年的瑞典阶段，开始于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派出一支小部队夺取施特拉尔松。在 1631 年，由于与法国的巴尔华尔德（Barwalde）条约而加强了地位，他率领瑞典主要军队登陆，进行挽回新教命运的努力。在 1631 年没能在帝国派无情地洗劫马格德堡(Magdeburg）之前收复它；但是在布雷坦菲尔德（Breitenfeld）他击溃了蒂利，进入帕拉丁纳特。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一位以前支持皇帝的路德教徒加入了他这一方。在 1632 年他进入巴伐利亚，慕尼黑和纽伦堡向他打开大门。当瑞典人准备向维也纳进军，萨克森人到达布拉格，绝望的皇帝被迫召回瓦伦斯坦。在莱比锡附近吕岑的猛烈战役中（1632 年 11 月 16 日)，瑞典人占了上风，但是古斯塔夫战死了。他赤裸的尸体在一堆死尸下被发现，一颗子弹洞穿过他的头部，一把短剑刺中他的肋部，另一颗子弹可怕地打在背部。新教的事业动摇了，直到结成海尔布隆联盟（League of Heilbronn）才又一次复兴。1634 年瓦伦斯坦开始谈判，只是他的辛劳的回报换来的却是帝国的放逐和谋杀。帝国派在内德林根（Nordlingen）胜利后，一位有病的皇帝与路德派王公媾和。《归还敕令》暂停止实行。

1631 年的一天，巴伐利亚的一个市镇罗滕堡—奥勃—德尔—陶[565]勃尔（Rothenburg-ob-der-Tauber）被帝国军队包围。根据传说，蒂利命令洗劫这个市镇，除非一个市民能喝光一只巨大酒壶里的酒。于是市长海因里希·托普勒（Heinrich Toppl）喝干了这壶酒，拯救了市镇，他却倒下死去了。他的功绩在一个戏剧《喝酒的市长》（Der Meistertrunk）中被纪念。它在每个圣神降临节星期一那天在拉陶斯(Rathaus）的凯泽萨尔（Kaisersaal）演出。

一个村庄的经历可以作为数千其他村庄的例子。在 1634 年 1 月，二十个瑞典士兵骑马进入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林登（Linden)，要求得到食物和酒。他们冲进了十三个农舍之一，强奸了农舍主人格奥尔格·罗施的妻子，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此后不长时间，他们

被村民伏击，夺去了他们的衣服，抢劫财物和马匹。第二天，他们与一位警官一道回来，逮捕了四个袭击瑞典人的人。警官后来向霍恩（Horn）将军作了一个报告，指出士兵中的一个芬兰人是强奸罗施太太的人。后来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不久后这个村庄就被记录为无人居住的。它的居民直到1690年还没有恢复到它战前的人口数量。[55]

［女巫］

1635—1648年的法国阶段开始于法国成为海尔布隆联盟的保护者，联盟中留下的加尔文教徒成员已从《布拉格和约》中被驱逐。黎塞留的战略此时公开化了。法国对西班牙宣战，给瑞典人以薪饷，并入侵阿尔萨斯。战争在三条阵线上开展，在尼德兰，在莱茵河地区，还有在萨克森。1636年西班牙人向巴黎进军，但在侧面受到威胁时撤回了。在1637年，皇帝斐迪南死了，唤起了持久和平的希望。从1638年起，当黎塞留的德意志同盟者送给他莱茵河上的布赖沙赫（Breisach）大要塞时，法国人的运气上升了。年轻的昂吉安公爵（Duc d'Enghien）、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的来到给了他们一位欧洲最好的将军。他在阿登（Ardennes）的罗克鲁瓦（Rocroi）漂亮的胜利结束了西班牙人从1525年帕维亚战役以来持续的军事霸权。从1644年起外交家们进行艰苦的工作，穿梭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ck）的新教代表与蒙斯特的天主教代表之间。当他们争论时，法国人和瑞典人蹂躏了巴伐利亚。

[566]

女巫［HEXEN］

贝内迪克特·卡尔普佐夫博士（Benedikt Carpzov，1595—1666年）是莱比锡的教授，其父兄均为萨克森最著名的法律家。他于1635年出版了《犯罪诉讼实践》（Practica rerum criminalium），论述女巫审讯的方式。尽管他承认拷打逼出许多假的认罪，但依然主张使用酷刑。“他应生活到成熟的老年，回首看有一种可称赞的生活，他读过五十三遍圣经，每个星期领圣体……并促成20000人死去。”[1] 他是一位新教徒，欧洲主要的女巫捕捉者。今天历史学家对这个数字提出疑问。

在此之前数年，法克克尼亚地区班贝格（Bamberg）的市长约翰·尤利乌斯（Johann Julius），被关在市镇的地牢里，因为参加女巫的半夜聚会被判处死罪。他被公国的中书官（Chancellor）告发，而中书官正因为在女巫审判中表现出“可疑的宽大”而被烧死。但

是他设法偷偷带出了这种诉讼程序的详细叙述给他的女儿。“我最亲爱的孩子……这一切都是假的和虚构的。上帝救救我……他们从不停止拷打，直到人们说出什么……如果上帝没有送来表明真理的办法，我们全体这些人都将被烧死。”[2] 班贝格天主教主教—亲王约翰·格奥尔格二世·富克斯·冯·多恩海姆（Johun Gerog Ⅱ Fuchs von Dornheim）拥有一个特意建造的女巫监狱，设有一个用《圣经》经文装饰的拷打室。在他十年的统治期间（1623—1633 年），据说他烧死了 600 个女巫。

欧洲的女巫狂热达到它的一个周期性高峰。在英格兰兰开夏，一批潘德尔山女巫在 1612 年被送交审判。就于同一年在波兰，在卡利什（Kalisz）的一次审讯记录，详述了这个程序。

她赤身裸体，上下的毛都被剃光，涂上圣油，从屋顶吊起来，以免接触到地面使她召唤魔鬼帮助她，并捆住她的手和脚。“她说除了有时给病人用草药洗澡外，不愿再说什么。将她用拉肢架拷问，她说她是无罪的，上帝知道。用蜡烛烧她，她除了说她无罪外什么也不说。将她放下，她说她对于全能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无罪的。再将她绑上拉肢架，再用蜡烛烧她，她说：疼！疼！疼！千万别这样，她与多罗塔（Dorota）和磨坊主的妻子去过……此后这个认罪被许可了。”[3]

在乡村，村民们经常自己动手做这类事，将被怀疑为女巫的人用浸刑椅浸入池塘，如果她被淹死，就明显是无罪的，如果她浮起来，就是有罪的。

许多有学问的论文写到巫术的妖术。它们包括让·博丹的《巫婆的魔术狂》（1580 年），洛林的尼古拉斯·雷米（Nicholas Rémy）的《魔鬼的罪恶》（1595 年）。耶稣会的马丁·德尔·里奥（Martin del Rio SJ）于 1600 年在卢万（Louvain）出版了大部头百科全书。詹姆斯国王的《魔鬼研究》（1597 年）在苏格兰出版。它们讨论骑着扫帚把在夜间飞行的技巧，符咒和咒语的性质和效果，女巫的大锅里的菜单，还有最重要的，女巫聚会上的性狂欢。魔鬼据说作为一个有胡须的黑人，或作为“有臭气的山羊”，它喜欢人吻它的尾巴下面，或作为癞蛤蟆出现。他能够是一个给女巫带来好处的梦魇，或是给男巫带来好处的娼妓。他有时召集他忠实的第五纵队在声名狼藉的地点，如瑞典的布拉库拉草地（Blakulla Meadow），哈尔茨（Harz）的布罗克堡高地（Blockberg Summit），或纳瓦尔的 [567]

拉·昂代（La Hendaye）的阿奎拉尔（Aquelarre）聚集举行总会议。

女巫狂热提出了许多问题。历史学家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证实有比起所谓“黑暗时代”在这方面要多得多的邪恶行为。为什么当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被认为向着相反的方向进行时，迷信却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通常将其归因于宗教斗争的病态反应。他们也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德意志和阿尔卑斯特别易受其害，还有为什么最热心的女巫抓捕者，如国王詹姆斯六世与一世，是属于最有学识的人，并在意识水平上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信基督教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较方面：即抓捕女巫的集体性歇斯底里和虚假指控，与迫害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的清洗的现象有许多共同之处。[**反常**][**收获**][**大屠杀**]

从1484年的教皇训令到它在十八世纪的衰落，这种狂热断断续续地维持了300年。消灭了数量巨大的无罪者。批评抗议的信号首先出现在巴伐利亚的耶稣会士中间。在那里迫害一直特别疯狂，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施佩（Friedrich Spee）的《慎防罪记》(Cautio Criminalis，1631年)。欧洲最后的烧死女巫在苏格兰发生于1722年，在瑞士和西班牙发生于1782年，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兹南发生在1793年。到那时它们都是非法的。兰开夏女巫中的最后一个，玛丽·纳特尔（Mary Nutter)，在1828年自然地死去。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它以两个部分同时议定，确定了中欧此后一个多世纪国际秩序的基本计划。它记录下了法国的优势和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王公的屈从。在宗教问题上，它通过给予加尔文教徒以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以同等的权利结束了在德意志的斗争。它确定1624年为教产归还的时限。除了上帕拉丁纳特（Upper Palatinate）和奥地利家族的世袭领地保留天主教信仰外，它做了教派改变的规定。在宪政问题上，它通过准予王公们签订对外条约的权利，并使帝国的所有立法要以得到国会（Diet）赞成为条件，使王公们的势力大为加强。它建议巴伐利亚和帕拉丁纳特都取得选侯资格。在大量的领土问[567]题上，它努力给所有主要的索取者一些东西。瑞士与联合省获得了独立。荷兰人要求斯凯尔特河（Scheldt）交通封闭获得成功。法国得到了最大的收获，对梅斯（Metz）、图尔（Toul）和凡尔登（Verdun）的主权，比内罗洛（Pinerolo）、南阿尔萨斯的松德高（Sundgau）、布雷沙赫在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的驻军权，还有十个阿尔萨斯城市的“地方监护权”(Landvogtei)。瑞典获得了不来梅（Bremen）和费尔

登（Verden），包括什切青（Stettin）在内的西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巴伐利亚夺得了上帕拉丁纳特，萨克森夺得了卢萨提亚（Lusatia），勃兰登堡夺取了东波美拉尼亚直至波兰边界的大部分，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明登（Minden）和卡姆敏（Kammin）前主教区，还有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候选权"。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 - Schwerin），不伦瑞克—吕内堡（Brunswick - Lüneburg），黑森—卡塞尔（Hesse - Kassel）各被赐给了一小块土地。最后的签字在1648年10月24日进行。

战争结束得很慢，在布拉格这个战争开始的地方，他们仍在战[568]斗。僧侣们、学生们和市民们守卫在查理（Charles）桥上，对抗瑞典人将实行的进攻。但后来在耽搁了九天后，和平的消息到来了。"教堂的钟声淹没了大炮的最后轰鸣"[56]。各支军队没有回家。1650年在纽伦堡不得不举行第二次大会，以解决军队要求的补偿。西班牙人在帕拉丁纳特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的驻军保留到1653年，直到皇帝用贝桑松（Besancon）与他们交换。最后的瑞典士兵直到1654年才离开。威斯特伐利亚的代表们已经开始称它为"三十年战争"。事实上，从在多瑙沃思（Donauworth）的一次暴力行动起，它一共持续了四十七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受到了凌辱。他终生的仇敌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曾企图否决他的当选。他被向法国和向新教徒作出的让步所激怒。他命令在蒙斯特的教廷大使谴责这个和约。在他简短的《热爱神殿》（Zelus domus Dei）通谕（1650年）中，他形容这个条约是"无效的、无约束力的、不义的、不公正的、该诅咒的、邪恶的、空洞的，在所有时代都是无意义的"。在他愤怒的背后是认识到，对一个团结的基督教世界的希望永远破灭了。在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之后，人们不能再习惯于说"基督教世界"，而代之以说"欧洲"。

德意志变得荒无人烟。人口从二千一百万下降到大约一千三百万。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死亡。像马格德堡这样的一些城市成为废墟。一些地区整个的人口、牲畜和粮食都被掠夺一空。贸易实际上中止了。一整代人的劫掠、饥荒、疾病和社会瓦解发泄为如此的大混乱，结果使王公们被迫恢复了农奴制，剥夺市镇的自由，取消了一个世纪的进步。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克罗地亚、佛拉芒和法国的士兵们的男子汉大胆行为改变了这个民族的种族构成。德意志文化受到如此大的损害，以致艺术和文学在外国的吸引力，特别是法国风格的影响下，完全改变了。

德意志的战略地位大为削弱了。法国人此时占有了莱茵河中部。德意志的三条大河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的河口分别被荷兰人、丹

麦人和瑞典人占领。帝国的共同利益屈从于较大的德意志国家各自的分别利益，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普鲁士。贫穷伴随着屈辱。有些历史学家将它看作绝望的土壤，只能培养出恶意的德意志骄傲的种子，会在以后一个复兴的时代发芽。奥地利已经开始了一个奇迹时代时期，此时衰落不过是许多德意志国家中的一个。

但是在1648年以后的年代里，不只是德意志处于苦难之中。西班牙与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反叛作斗争，另一方面仍然与法国作战。英格兰处于内战的余震之中。法国被“投石党”所动摇。波兰—立陶宛被哥萨克叛乱、瑞典人“大洪水”和俄罗斯的战争撕裂。这些[569]大灾变的连续发生导致了存在一个总的“十七世纪危机”的设想。那些相信存在着一个全欧洲的封建体系的人倾向于赞成由全欧洲资本主义成长阵痛引起的一场全欧洲社会政治革命的看法。有些相反的看法赞同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危机”，在危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不断增长的索求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其他人怀疑所有这一切也许是个巧合。

罗马，1667年2月19日 詹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1598—1680年），教皇的建筑师，递交了接近完成的围绕圣彼得广场的大柱廊第三也是最后部分的设计。他建议这个柱廊的第三只臂应该采用一个独立的门廊的形式，有九个间隔，上面耸立着一个钟楼。它应位于广场的入口，直接正对圣彼得大教堂正面的中心点。(见原书地图17，第570页)

当“建议论证”在十二年前与最初的计划一起提出时，贝尔尼尼解释了圣彼得广场的设计和象征意义。这个广场提供了一个到教堂的通道，一个人群接受教皇祝福的集合场所，和一个神圣空间的边界。这个柱廊是可以进入的，有着比柱子更多的开口，因此可以方便步行者通过，避免一种有形屏障的感觉。它由一个连续的山墙覆盖，在严酷的气候下给游行队伍以保护，在山墙上以一圈雕像加以装饰，描绘圣徒的共同交流。它的两个半圆形的臂凸出于紧连着大教堂前庭的直线边缘之外，特别像贝尔尼尼说的“母亲教会拥抱着的双臂，给所有人类以安慰”。建议中的入口将采用祈祷者双手相握的样子，与教会伸出的双臂的顶端相连接。

偏偏建筑教士委员会（congregazione della Reverenda Fabbrica）的枢机主教们管理着建筑工作，他们有其他想法。他们批准建筑广场的铺石路和第二座喷泉，但不是入口。此后不久贝尔尼尼的保护者——生病的教皇死了，再也没有作出关于第三条臂的决定。这个“基督教世

界的圆形竞技场”的封闭就没能完成。[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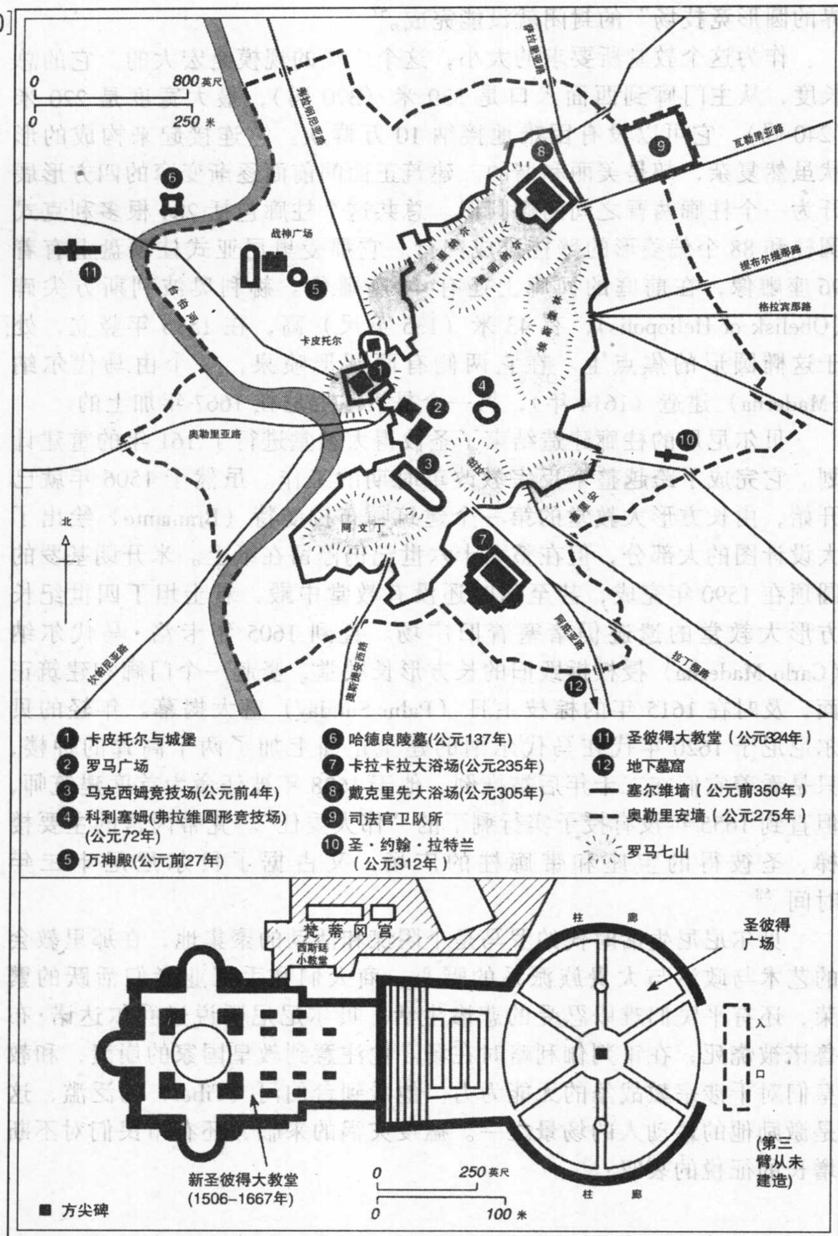
作为这个教堂所要求的大小，这个广场的规模是宏大的。它的总长度，从主门廊到西面入口是 339 米（370 码），最大宽度是 220 米（240 码）。它可以没有困难地接纳 10 万群众。它连接起来构成的形状虽然复杂，却是美丽和谐的。建筑正面的前面逐渐变窄的四方形展开为一个柱廊两臂之间的椭圆形。总共这个柱廊包括 284 根多利克式圆柱和 88 个偏菱形的壁柱排成四行。它那爱奥尼亚式柱顶盘上有着 96 座雕像，在前庭的回廊上还有 44 座雕像。赫利奥波利斯方尖碑（Obelisk of Heliopolis），有 43 米（135 英尺）高，在 1586 年竖立，处[571]于这椭圆形的焦点上。在它两侧有两圆形喷泉，一个由马代尔纳（Maderna）建造（1614 年），另一个是贝尔尼尼在 1667 年加上的。

贝尔尼尼的柱廊建造结束了圣彼得大教堂进行了 161 年的重建计划。它完成了跨越整个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工作。虽然于 1506 年就已开始，由长方形大教堂的第一个建筑师布拉曼特（Bramante）绘出了大设计图的大部分，但在整个十六世纪仍停留在纸上。米开朗基罗的圆顶在 1590 年完成，甚至那时还没有教堂中殿，君士坦丁四世纪长方形大教堂的遗迹仍堵塞着旧广场。直到 1605 年卡洛·马代尔纳（Carlo Maderna）授权拆毁旧的长方形长教堂，竖起一个门廊和建筑正面，及时在 1615 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盛大揭幕。年轻的贝尔尼尼于 1620 年代在马代尔纳的建筑正面上加了两个高耸的钟楼，只是看着它们在二十年后被推倒。他于 1628 年被任命为首席建筑师，但直到 1655 年没有授予实行剩下的“伟大委任”。梵蒂冈宫的主要楼梯、圣彼得的宝座和带廊柱的广场，又占据了贝尔尼尼十二年时间。[58]

贝尔尼尼生活时代的罗马是个阴谋和活动的聚集地，在那里教会的艺术与政治与大贵族派系的野心，商人们和手工业者们活跃的繁荣，还有平民们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贝尔尼尼听说过乔尔达诺·布鲁诺被烧死，在审判伽利略时在场。他注意到教皇国家的崩溃，和教皇们对干涉宗教战争的无能为力。他看到台伯河（Tiber）的泛滥，这是激励他的最动人的场景之一。瘟疫灾祸的来临，还有市民们对不断增长的征税的哀叹：

> 这个盐税教皇，
> 乌尔班和他的“侄子”们，
> 比起汪达尔人和哥特人，
> 对我们美丽罗马的伤害更甚！[59]

[570]



地图 17 罗马，古代与近代

教会如何能在如此之多的艰难中维持这样的豪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在68岁时，贝尔尼尼处于他千变万化的才能的高峰，并在此后仍有十年的创造力。他是为教皇服务的一位工程师和建筑师皮耶罗·贝尔尼诺（Pietro Bernino）的儿子。贝尔尼诺设计了斯帕尼亚（Spagna）广场的“船形喷泉”和其他许多东西。贝尔尼尼在八岁时随父亲来到罗马，他每天接触到这个城市的纪念物，享有与枢机主教们和富有的保护者们亲近的熟悉关系。他个人与八位教皇交往密切，从博尔盖塞（Borghese）、保罗五世（Paul Ⅴ，1605—1621年）到奥达勒斯奇（Odaleschi）、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ⅩⅠ，1676—1689年）。保罗五世告诉贝尔尼尼的父亲：“我们希望这个男孩会成为他这个世[572]纪的米开朗基罗。”乌尔班八世（Urban Ⅷ，1623—1644年）告诉他：“这个是你的幸运，卡瓦列雷（Cavaliere），看到枢机主教马泰奥·巴尔贝尼尼（Matteo Barbernini）现在是教皇。但是我们的幸运要大得多，看到卡瓦列雷·贝尔尼尼生活在我们的教皇任期内。”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1655—1667年）将他召唤到梵蒂冈，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晚上委任他以圣彼得大教堂的最后工作。

贝尔尼尼能够很好地回报这种赞美。对于路易十四在做模特时站着不动的能力感到高兴，他说：“陛下，我一直知道您在大事上是伟大的，我现在知道你在小事上也是伟大的。”而他也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心。他曾宣称：“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丽的。但在意大利女人的皮肤下流的是血，法国女人皮肤下流的是奶。”

在专业上，贝尔尼尼是一位雕塑家。他从最早年就表现了技术与艺术性上的最奇妙的才能。他的第一批主要委托作品，如《埃涅河，安切斯和阿森纳》（1618—1619年），塑造了一个肌肉健壮的人物肩上扛着一个老人，是在他十几岁时完成的。他最后的委托作品，如非同寻常的亚历山大七世墓，以大胆的形式以一个女性裸体的形象塑造了“真理”，60年后仍未完成。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与幻想相竞争的品质产生的紧张感为特征。他的石雕肖像能够惊人地栩栩如生；在大主教阁下蒙托亚（Monsignor Montoia）胸像的揭幕式上，教皇在谈到雕像时说：“现在这是大主教阁下”，然后转向蒙托亚，“而这是一个杰出的肖像。”戏剧性的姿势，富有活力的身体和面部姿态表情，还有无穷尽的独创性设计，带给最陈旧的主题以精神力量。[60]

根据美术鉴定家菲利波·巴尔迪努奇（Filippo Baldinucci）所写的第一部传记，贝尔尼尼拥有两种最优秀的美德：独创性和胆量。“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从不适宜的或难于适宜的条件中造出美丽的东西。”首先，他表现出不怕打破常规。他曾经说：“那些不会有时越出

规则之外的人，永远不能超越规则之上。”[61]

贝尔尼尼雕塑的目录，分为几百个条目。它们中最知名的包括英格兰查理一世的肖像（1638年），是从凡·代克的一幅绘画制作的。还有法国路易十四的肖像（1665年），《劫走普罗塞皮纳》，《大卫》，后面覆盖着一个拱形以拉紧弹弓，《圣特里莎的狂迷》，《贝娅塔·阿尔伯托尼之死》，《被时间揭示的真理》，和乌尔班八世的陵墓，在那里死亡天使表现为在写一本历史书。

但雕塑只是贝尔尼尼的起点。它为他提供了进入艺术家组织的入门权，它们要求对所有艺术有最广泛的协调与同等地位。他的专门技艺扩展到装饰、绘画、建筑还有雕塑。在圣彼得大教堂，在每一次都会用上这种专门技艺。在高祭坛上的龛盒那令人惊奇的线形图案青铜柱（1632），在支持圆顶的扶壁上的装饰，在前门上的浅浮雕，拱廊上多彩的大理石地板，圣礼礼拜堂青铜和天青石的圣体盒，“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殿堂圣场中最神圣的”。

贝尔尼尼对罗马城的众多贡献大概不少于45座主要建筑。他建[573]造了宏大的《海神特里顿喷泉》（1643年），从特里顿的海螺号中喷出一股水流，而海神坐在一个更宽的贝壳中，由三只海豚将其托起。他是纳沃那广场上菲乌米喷泉的部分作者，还有它的世界上四条大河的雕像——尼罗河、恒河、多瑙河和拉普拉塔河。他建造了传信学院的正面建筑，圣安德里亚·迪·蒙特卡瓦罗（S. Andrea di Monte Cavallo）的耶稣会教堂，和卡斯特里甘多尔福（Castelgandolfo）的市镇教堂。他重建了奎里纳尔宫（Quirinal）、基吉（Chigi）宫和在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的武器库（Arsenal）。

在当时人的眼里，贝尔尼尼最被欣赏的才能在于舞台与场面布景。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精力花在戏剧、假面舞会、狂欢节和游行上这个事实，对后代而言是个损失。它们以宏大的规模演出而没有留下记载。在1661年他装饰了特里尼达·德尔·蒙特（Trinita del Monte）山，以进行庆祝法国王太子诞生的焰火表演。在1669年他组织了一场有名的演出以纪念保卫克里特。在托尔·迪·诺纳剧院（1670—1676年），他作为剧作者、舞台设计者、演员和作曲者，像科雷利（Corelli）和斯卡拉蒂（Scarlatti）那样工作。戏剧性常常作为巴罗克精神被提到。在这方面，贝尔尼尼完全可以认为是这种风格最生气勃勃的创造者。

贝尔尼尼的失败很少但却是痛苦的。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钟楼被拆毁当然是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手下敌对的顾问们的恶意。但他在1665年进入法国的大失败不那么好解释。这个计划开始于柯尔培尔（Colbert）一个奉承的邀请，在一封信中将他说成是“整个世界称赞的人”。他旅行到巴黎与科尔培尔计划建设一个圆形剧场建筑，

以哥罗塞姆（Colosseum）竞技场为依据，填满卢浮宫（Louvre）和图伊勒里宫（Tuileries）之间的空间。但是这个计划被否决了，他在六个月后回国。他的沮丧只是由于与路易十四愉快地充当模特的回忆有所减轻。在他事业的末期，当圣彼得跨顶下的扶壁上的石雕出现破裂时，贝尔尼尼因他的错误受到指责，巴尔迪奴奇（Baldinucci）因此被激发起写了他的书，以反驳这些指控。

在 1667 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几乎就是贝尔尼尼同时代的人。作为枢机主教法比奥·基吉（Fabio Chigi），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作为在整个 1640 年代驻科隆（Cologne）的教皇使节，他是梵蒂冈解决三十年战争的主要谈判者。在那里，他得到了反对对新教徒的一切让步的名声。他完全认可贝尔尼尼的奇怪行为；"一个坏的天主教徒要比一个好的异教徒更好。"他是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St Francis de Sales）的热爱者并封其为圣徒。他对耶稣会士很友好，并采取了严厉的方针反对詹森教派。简而言之，他是一位典型的反宗教改革教皇。同时，他是一位有文学和艺术很高修养的人。他本人是一位公认的拉丁语诗人，是位书籍收藏家和坚定的艺术保护人。当他任教皇国务卿时，就已聘用贝尔尼尼建造基吉住宅，在他做教皇的第一个晚上就又召见了他。

亚历山大作为罗马的主要保护人的首要对手无疑是瑞典前女王克里斯蒂娜。她在亚历山大当选后的十二月来到罗马，克里斯蒂娜是她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天主教皈依者。作为一个有魄力的知识人士，她将[574]里亚里奥宫（Palazzo Riario）变成一座智慧和品味的沙龙，并通过枢机主教阿佐里诺（Azzolino）的"快速警队"（squadro volante）（行动群体），变成了教会阴谋的一个温床。她的女同性恋倾向，和她渴求一种理性的天主教义，这给笛卡儿最初留下深刻印象，使得她很难适合于亚历山大在宗教上极为保守拘谨的罗马。

在罗马看来，基督教世界进入了一个悲惨的境况。到 1660 年代反对新教的长期斗争进入了困境。使东正教皈依的希望丧失了。除了法国而外，主要的天主教强国都处于混乱中。而法国像葡萄牙那样，在暗中反叛教皇的权威。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被蹂躏荒废，人口减少，波兰一立陶宛也与其类似，西班牙处于破产中。

在欧洲北部，各种各样的斗争在无视罗马任何意愿的情况下发生。英格兰刚刚通过布列达（Breda）条约与尼德兰媾和，法国人就对西班牙属弗兰德尔（Flanders）发动战争。复辟时代的英格兰刚从瘟疫和伦敦的大火中幸存下来，以德莱顿（Dryden）的《惊人的一年》（Annus Mirabilis）来庆祝。在东方，在安德鲁索沃，东正教的莫

斯科公国在诱使波兰割让乌克兰，并威胁要永久打破这种平衡。勃兰登堡—普鲁士新近获得独立，作出了夺取瑞典人主要新教军事强国地位的姿态。

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土耳其人处于优势，威尼斯人顽强地坚守他们在克里特岛的坎迪亚（Candia）（伊拉克利翁，Heraklion）最后一个要塞。教皇国像意大利其他地方，遭受了剧烈的经济衰退。无法解释他们是如何提供资金支付贝尔尼尼的铺张华丽的表演的，还有那给威尼斯的补助金。虽然它是辉煌的，天主教的罗马实质上到了它最伟大的时代的末尾了。

梵蒂冈与法国的争吵植根于已死的枢机主教马扎兰的怨恨。马扎兰不能原谅罗马给予他最头疼的敌手巴黎大主教，枢机主教德·雷斯（de Retz）以庇护。他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帮助法尔内塞（Farnese）和埃斯特（d'Este）争夺在教皇国的财产。因为他制造的麻烦，他被排除在1655年的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之外，此次会议选举了亚历山大七世，排除的理由是枢机主教需要教廷的允许才能在国外长期居住。路易十四在马萨林死后选择了继续这场斗争。借口法国使馆在罗马的豁免权被侵犯，他驱逐了在巴黎的教廷大使并占领了阿维尼翁（Avignon）。倒霉的教皇被迫表示屈辱的道歉，并在罗马竖起了一座金字塔；上面刻下对教皇自己臣仆过错的承认。关系并没有改善，梵蒂冈在1665年由于贝尔尼尼对凡尔赛失败的访问感到屈辱。贝尔尼尼在与路易十四的交往中获得了一个大成功。在一次当模特时分开了国王的假发，他影响了一种被称为“贝尔尼修正”（la modification Bernin）的简便发式。但是没有人不会看出，在欣赏品味上与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一样，法国决心走她自己的路。当梵蒂冈反对迫害胡格诺教徒时，凡尔赛毫不理会。

[575] 在文学上，1667年发表了拉辛（Racine）的《安德洛玛刻》和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前者将时间定于古代的特洛伊，证实了古典传统的持续生命力，还有法语文学的优越地位。后者以无比的韵律证实了基督教主题持久的魅力：

啊，人的第一次不服从，
和那禁树上果实的致命滋味，
带给这个世界死亡，和我们所有的悲哀，
随着伊甸园的丧失，直到一位更伟大的人，
使我们复兴，重获至福的地位，
歌唱吧！天堂上的缪斯……
在这场大辩论的高潮，

我能够维护永恒的上帝，
并对人们证明上帝之道的正确。[62]

与贝尔尼尼同时代有创造力的人们处于每个可能场所的各种事业之中。在阿姆斯特丹，伦勃朗（Rembrandt）画了他最后一幅大油画《犹太人的新娘》（Jewish Bride）。在马德里（Madrid），穆里略（Murillo）为圣方济会托钵僧教堂（Church of the Capuchins）订做了一系列22幅绘画。在巴黎，克洛德·洛林（Claude Lorrain）画了《欧罗巴》。在伦敦，从大火中复苏过来后，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计划他壮观的教堂系列，理查德·洛厄（Richard Lower）在进行第一次人类输血。在剑桥，年轻的伊萨克·牛顿刚刚开创色彩理论。在牛津，胡克（Hooke）在计划系统的气象学记录。在慕尼黑，泰阿慕纳教堂（Theatiner Kirche）正在建设中。在1667年2月，肖像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刚刚去世；乔纳森·斯威夫特这位讽刺作家，正在被人们所认识。

确实无疑，圣彼得大教堂的长期重建成为教会改革时代的一个中心事件。圣彼得教堂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忠诚（对抗已经反叛的路德）和教皇自己阵营走向团结的主要圣殿和象征。认为贝尔尼尼的柱廊建筑标志着这个历史的一个明确阶段也是真实的。为了方便起见，历史学家可以试图说它标志着反宗教改革的结束。而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如此。

而在实际上，反宗教改革并没有结束，正如柱廊从来没有真正完成。文明史是个连续的整体，几乎没有简单的停止或开始。罗马教会已经由于世俗强国的兴起而失色，但是它没有停止作为欧洲生活中的一个突出角色起作用。反宗教改革的理想被坚持了几个世纪。它的制度以后仍然执行了近400年。确实，罗马教会的使命只要有朝圣者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在圣彼得的圣座前祈祷，就不会终止。虽然其中也混杂着在贝尔尼尼的柱廊下的旅游者。



地图 18 欧洲，1713 年